

五卅运动史料

第一卷

K262.22/2

五卅运动史料

第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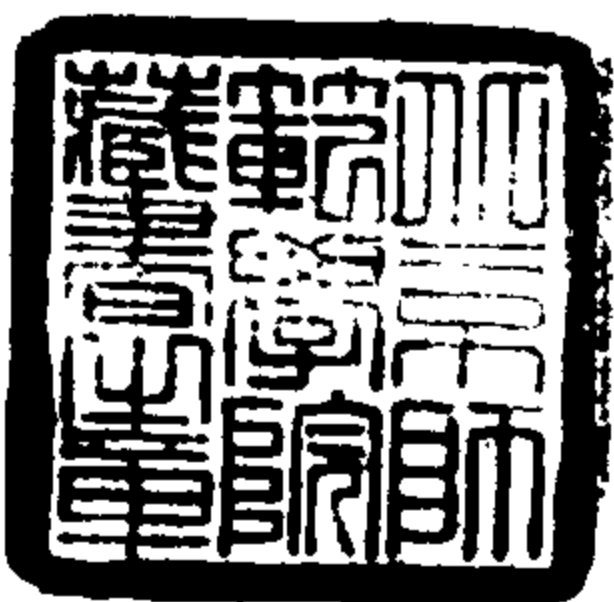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44474

844474



责任编辑 莫永明
封面装帧 杨德鸿

五卅运动史料

第一卷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4.375 插页 16 字数 491,000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书号 11074·468 定价 (七)3.70元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大會決議案及宣言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印行

(一九二五年二月)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议决案及宣言封面

處傳分

處傳分

導 向

報 週

◀ 期七十百一第 ▶

日 六 月 六 年 五 二 九 一

—— 枚 四 元 銀 份 每 售 零 ——

折五九作銀款代票郵。內下費郵。期十三足寄元一外國。期十五足寄元一內國：閱訂
次一算清期十。內在費寄。折四%以份百三。折五份百三毛份十。分二洋大份每：紙代

新致下轉請在安檢學政法卷坡馬 處信通行發

（第一一十七號）

一〇七五

中國共產黨為反抗帝國主義野蠻殘暴 的大屠殺告全國民眾

全國民眾！ 工人們！ 農民們！ 一切被壓迫的民衆們！

血雨腥風的上海，現在已成為外國帝國主義的屠場了！ 這是偶然的事麼？ 不

是的。這是資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必然現象。資本帝國主義存在一天，被壓迫民

族和被壓迫的民衆們，就都有被屠殺的可能呵！

印度、埃及、非洲等弱小民族和歐美各國被壓迫階級，不是常常被資本帝國主義

的殘害們定期的或不定期的大屠殺麼？ 我們中國民衆的被屠殺亦非始於今日呵，自

鴉片之役以至庚子之役，中國史，完全是一部外國強盜宰割中國民衆的血書。然而

這次上海的大屠殺，却是中國民族自覺的反抗。國恥之第一頁呵！

年來全國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之普遍的覺醒，早已促起了英美日法德俄家的殺

機。尤其是反帝主義。主力軍工人階級及勢力之形成，更堅決了各階級的團結。

（即帝國主義的資本家階級）對於中國的鐵血政策。上海的大屠殺，便是帝國

主義者重新表示他們的志願——只准中國人做奴隸，不准中國人謀解放，只准中

國人在「奴隸」與「鐵血」的兩種慘境中有個選擇！

帝國主義的對強，對於被壓迫中國和鐵血中國的民衆，是一致的，無論他是先運

的帝國主義（如英、美）或後起的帝國主義（如日本）。這次上海屠殺，起於日本帝

國主義。向上海以及為島抄辦工人領袖的進攻，而處於美國帝國主義向學生工人市民

的進攻。美國帝國主義在。大屠殺中完全與美國一致。在公租界租界武裝威

萬國商團，美商團的兇暴與英國的兩樣；美國海軍陸戰隊上陸加入英美的

隊伍之日，即在揚州一帶任意屠殺中國路人，尤其慘見。人學生經過如開槍；美

大檢閱英國守林西報一樣的兇惡，一樣的進逼，誰知道大屠殺其緣由和共產黨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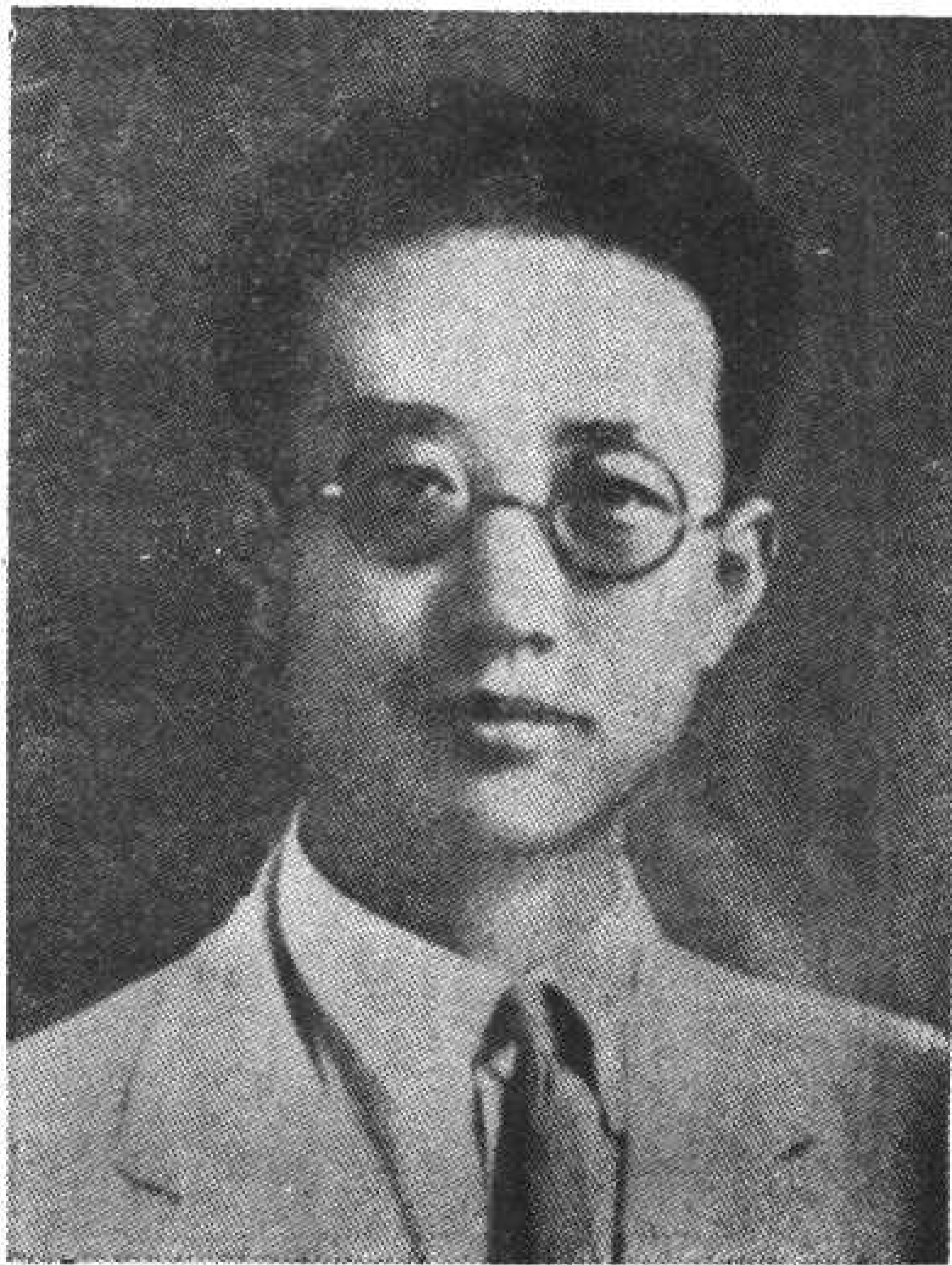
的，變官英國在華之三十餘艘軍艦將全部或大部份調向上海屠殺。然而另一方面

，各帝國主義之間的相互衝突與殺戮也在我們面前：日本帝國主義正在努力企圖將

此次屠殺的目標移嫁於美國，而美國駐滬領事亦向學生表示一種假仁假義的態度。



邓中夏



瞿秋白

蔡和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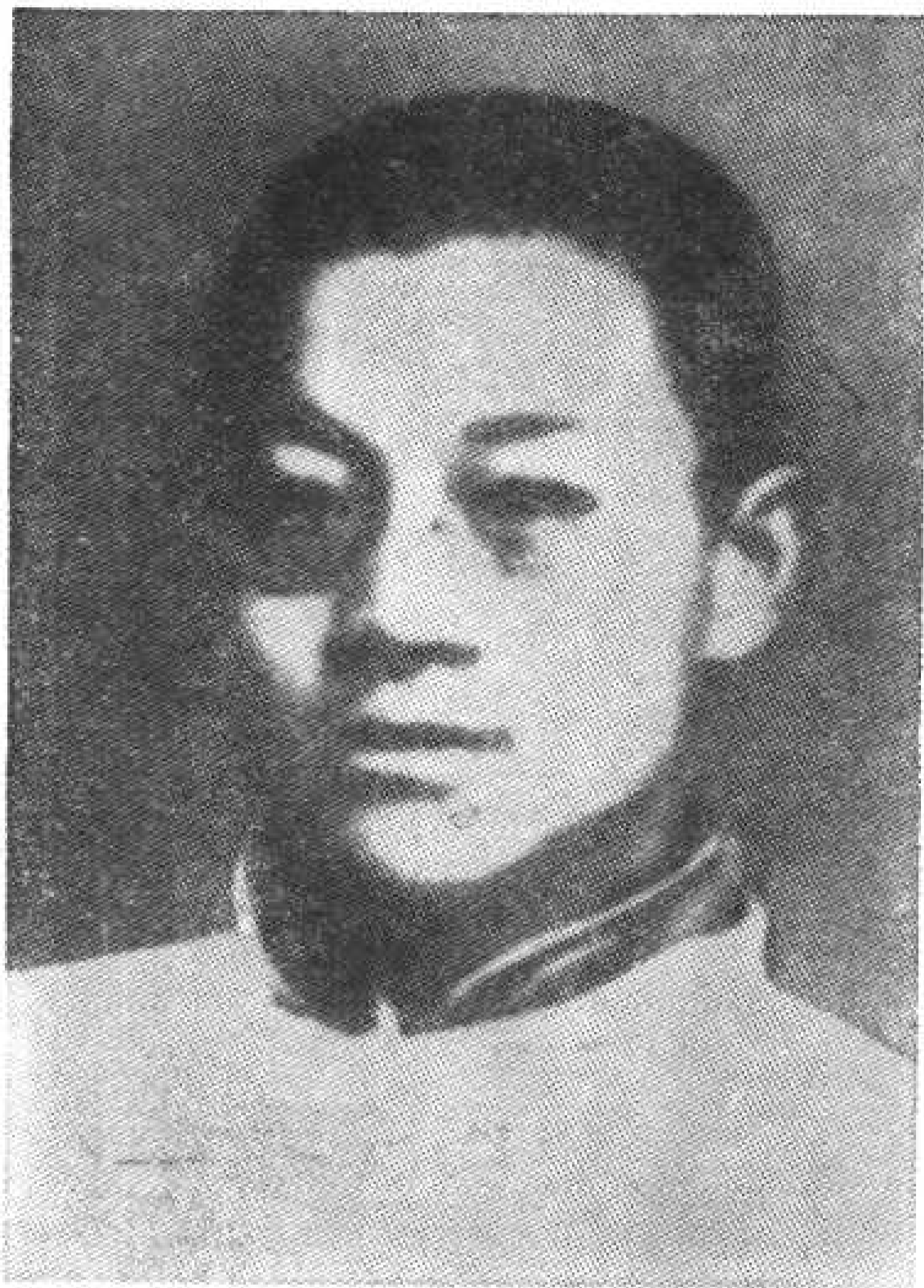
向警予

李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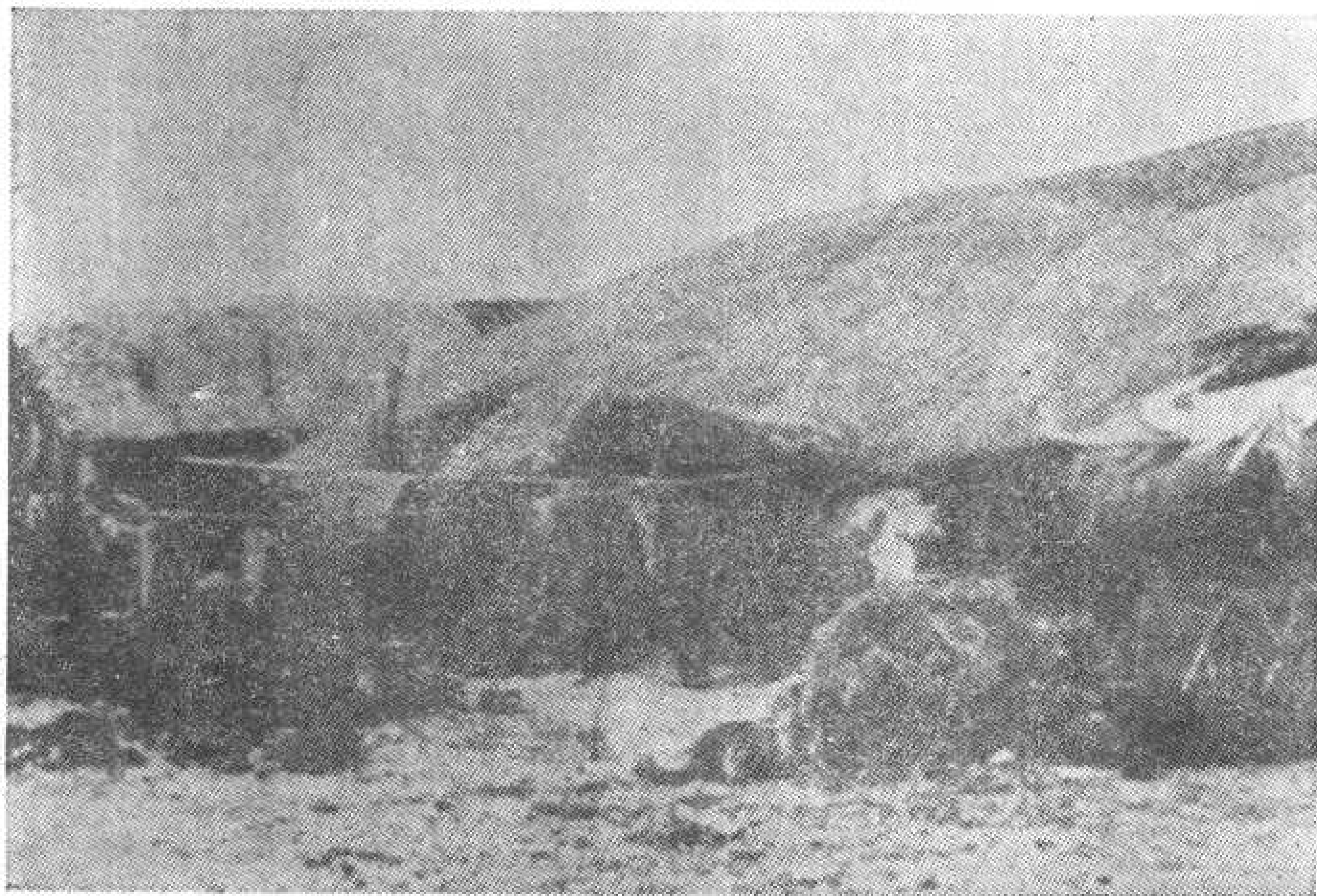
刘少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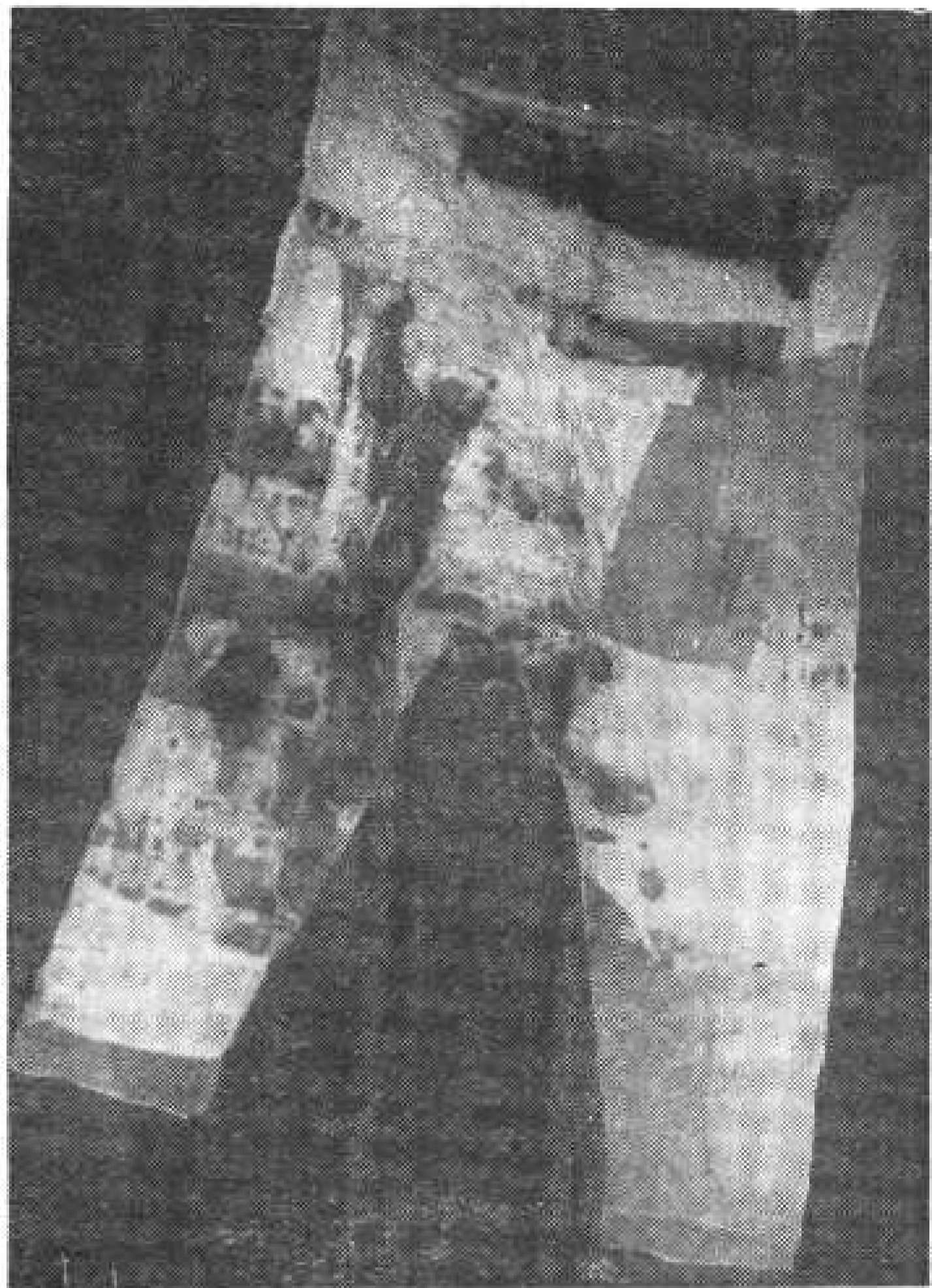




英代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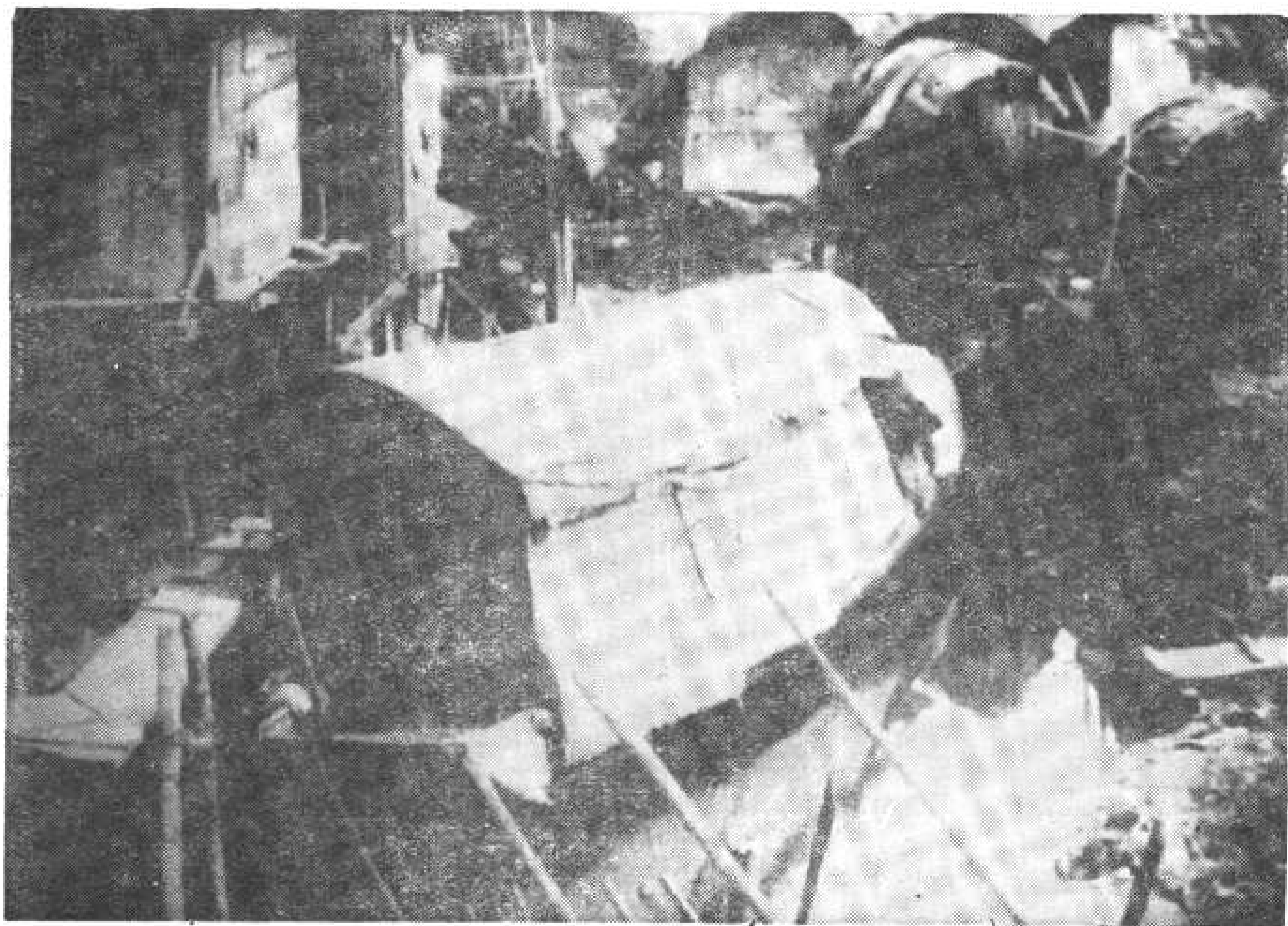
工人居住的草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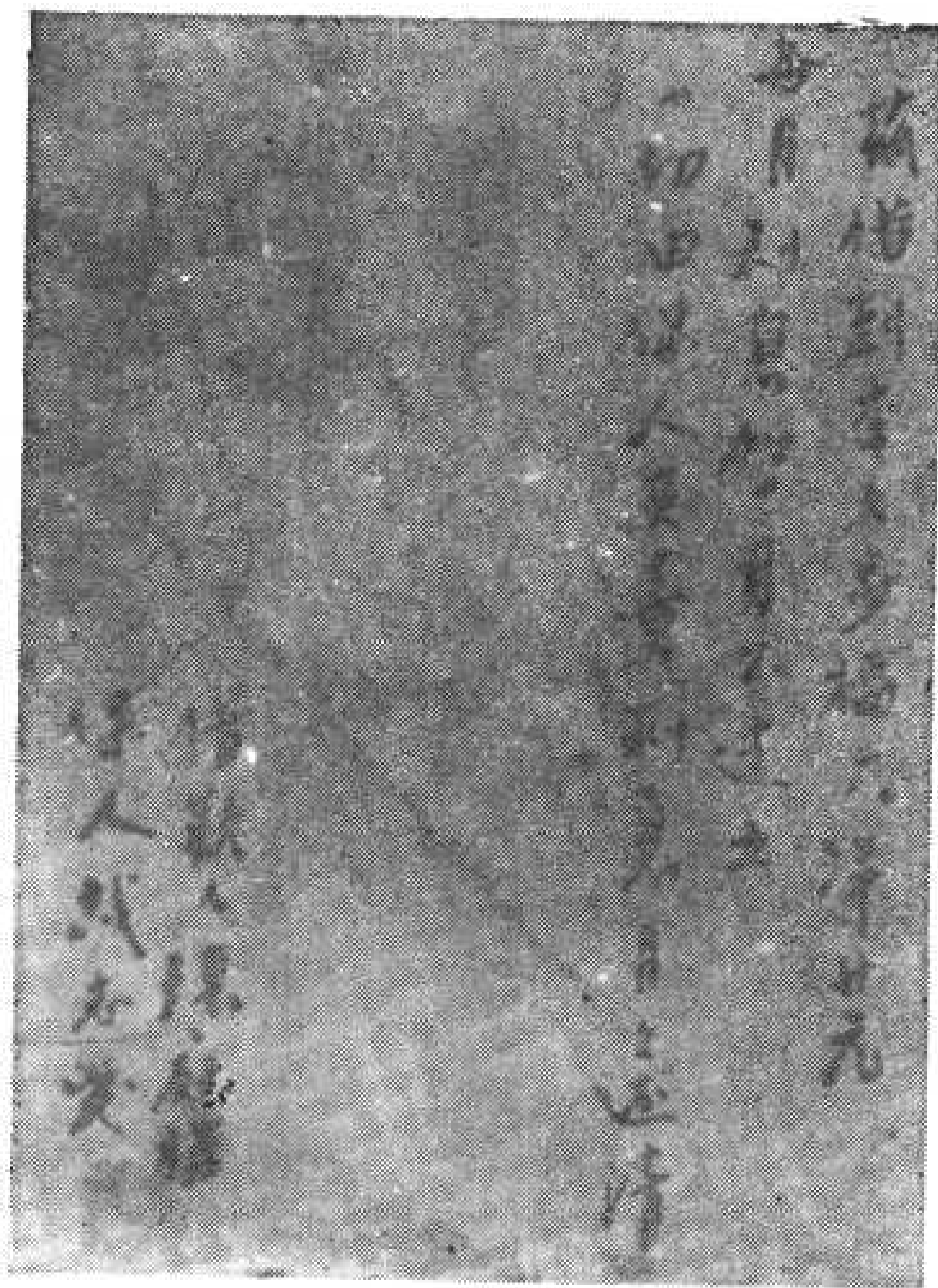




内外棉厂女工陶小妹
穿的补了又补的夹裤

工人居住的破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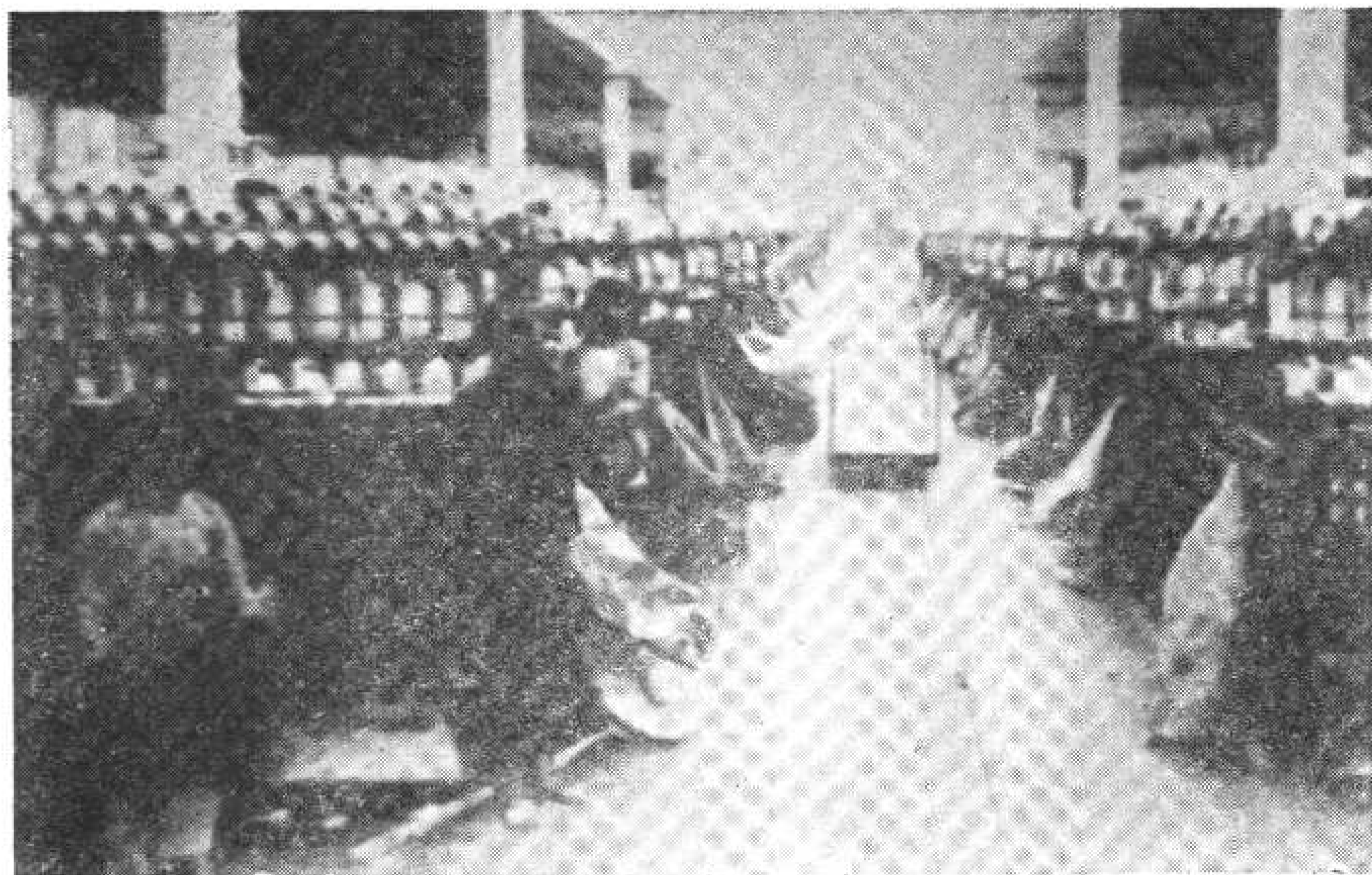




工人被迫借高利贷的借据



市民在上海米荒平价局挤购大米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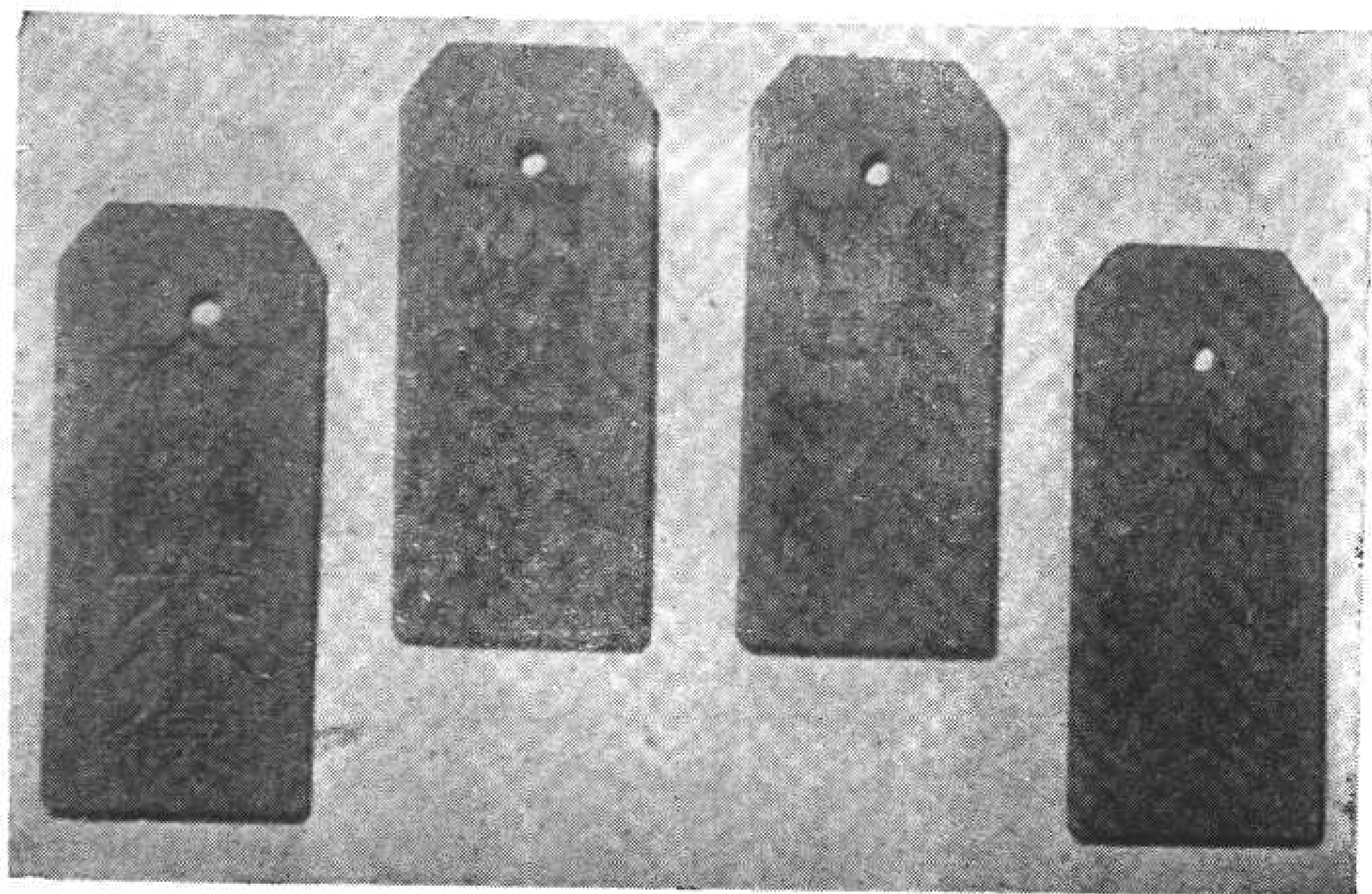
十岁左右的儿童象成人一样每天在车间里做十二小时的工作



工人家属涌向工厂送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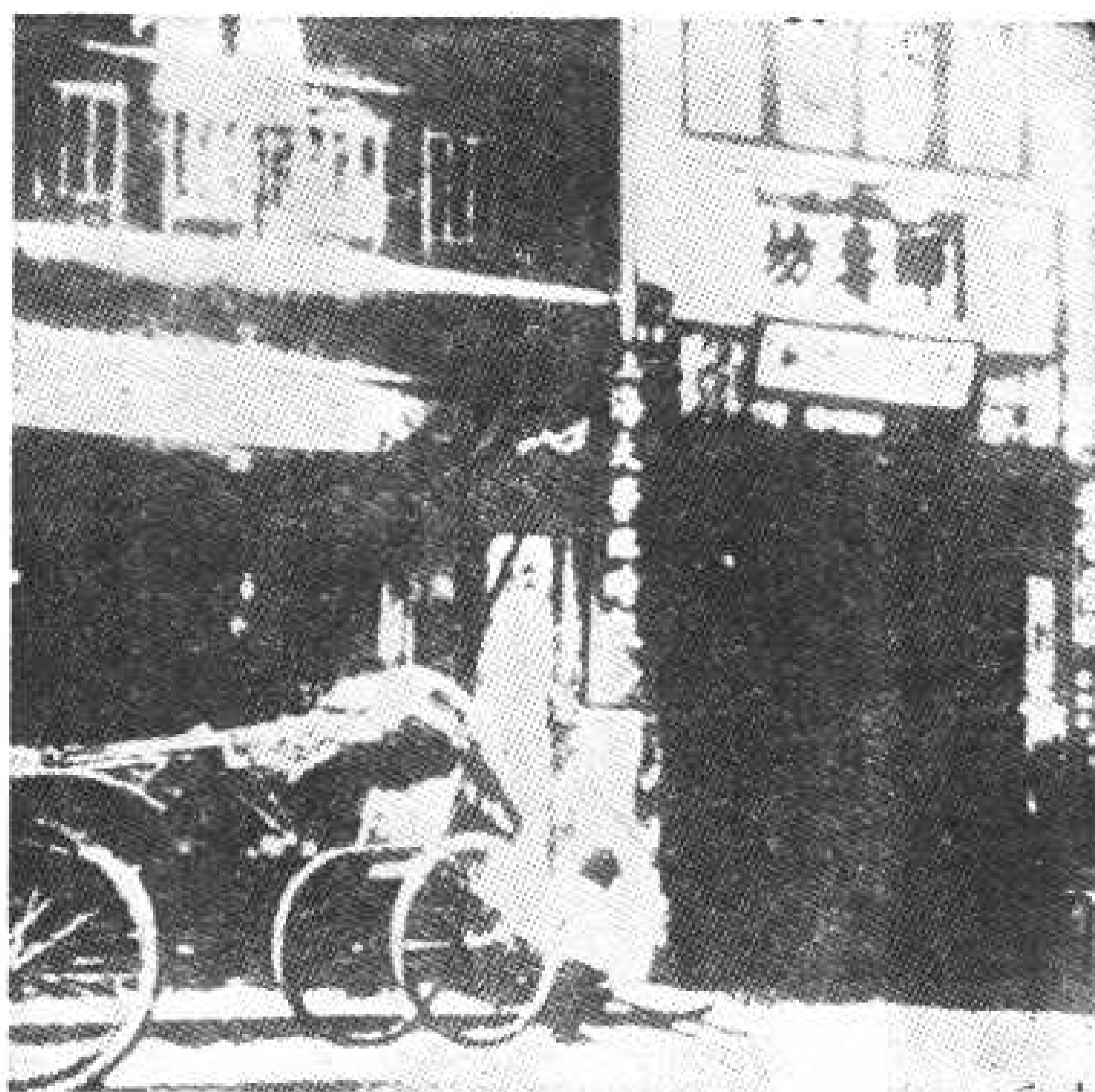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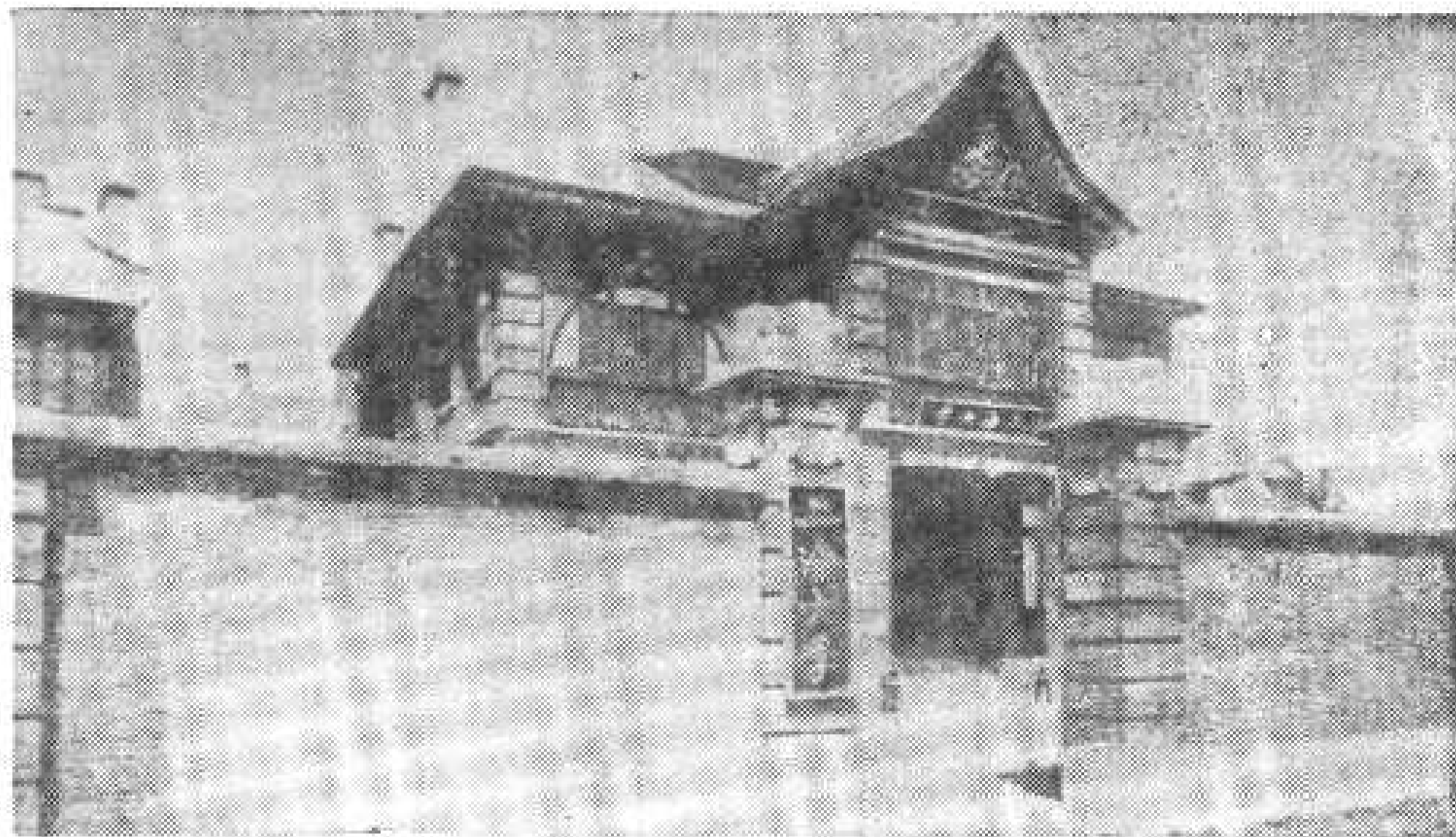


码头工人背着几百斤重的棉花大包上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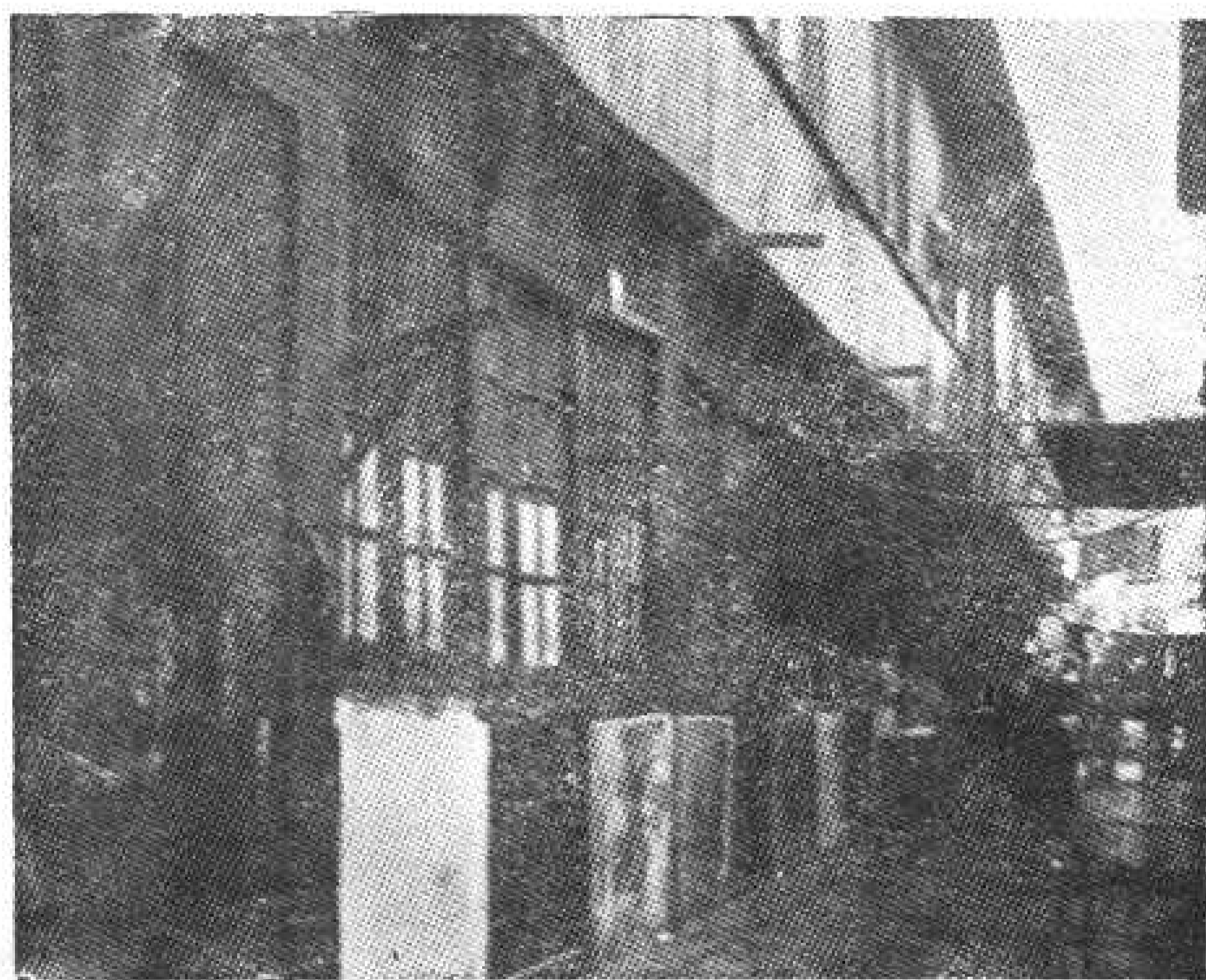
内外棉五厂和七厂的日本资本家为限制工人发的大小便牌子

上海大学
西摩路（现陕
西北路）校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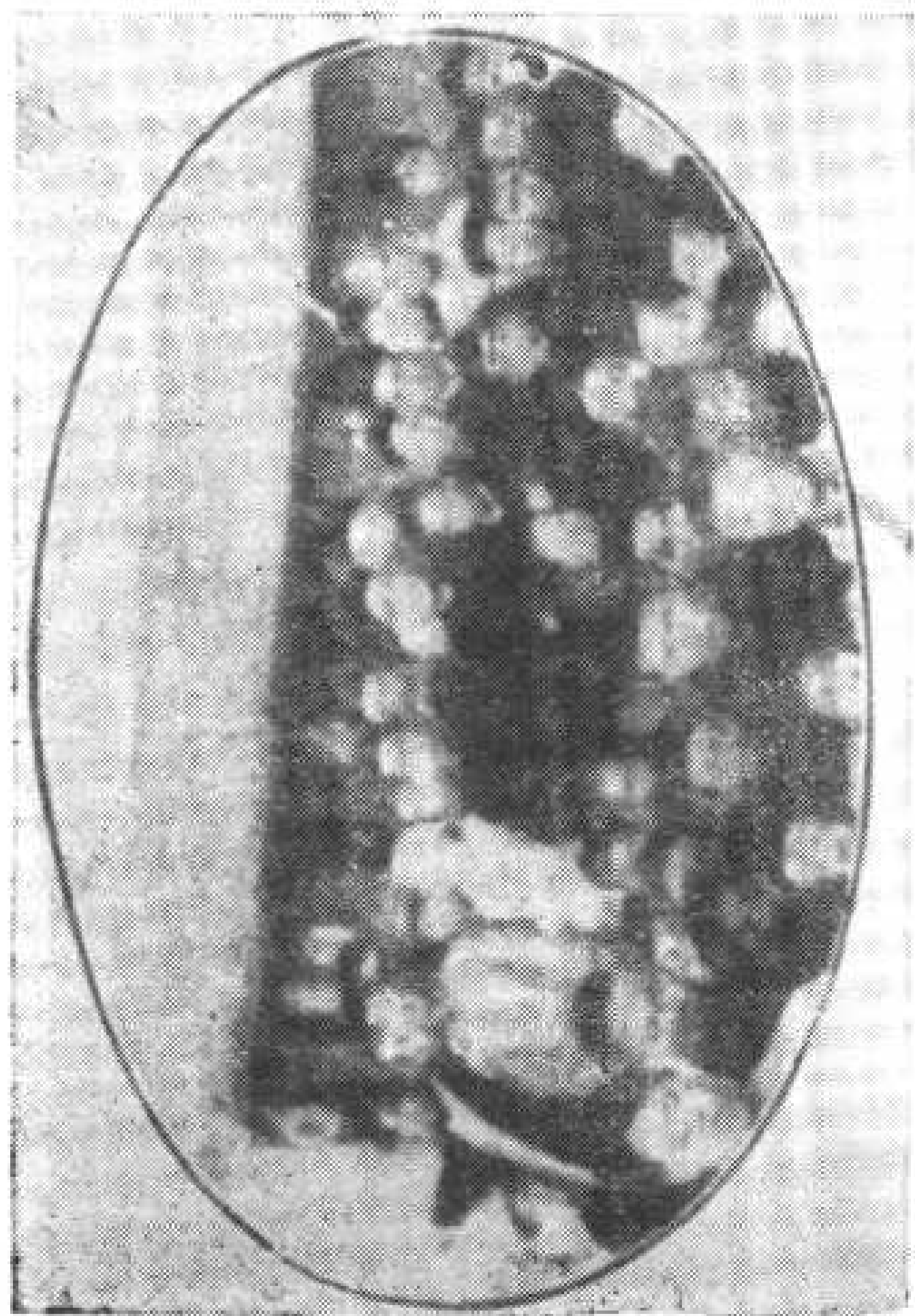
上海大学被封后，设
在师寿坊（现青云路 107
弄）的临时校址

沪西工友俱乐部
原址（解放后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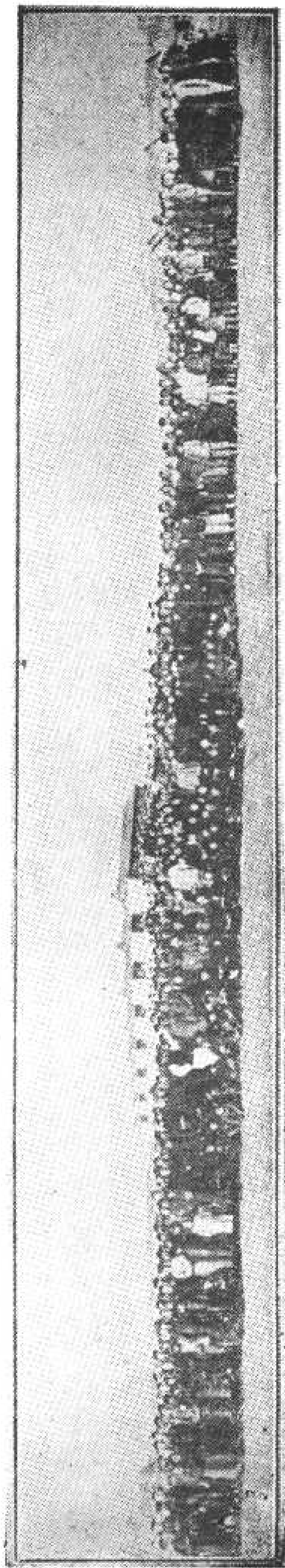




二月罢工领导人之一的刘华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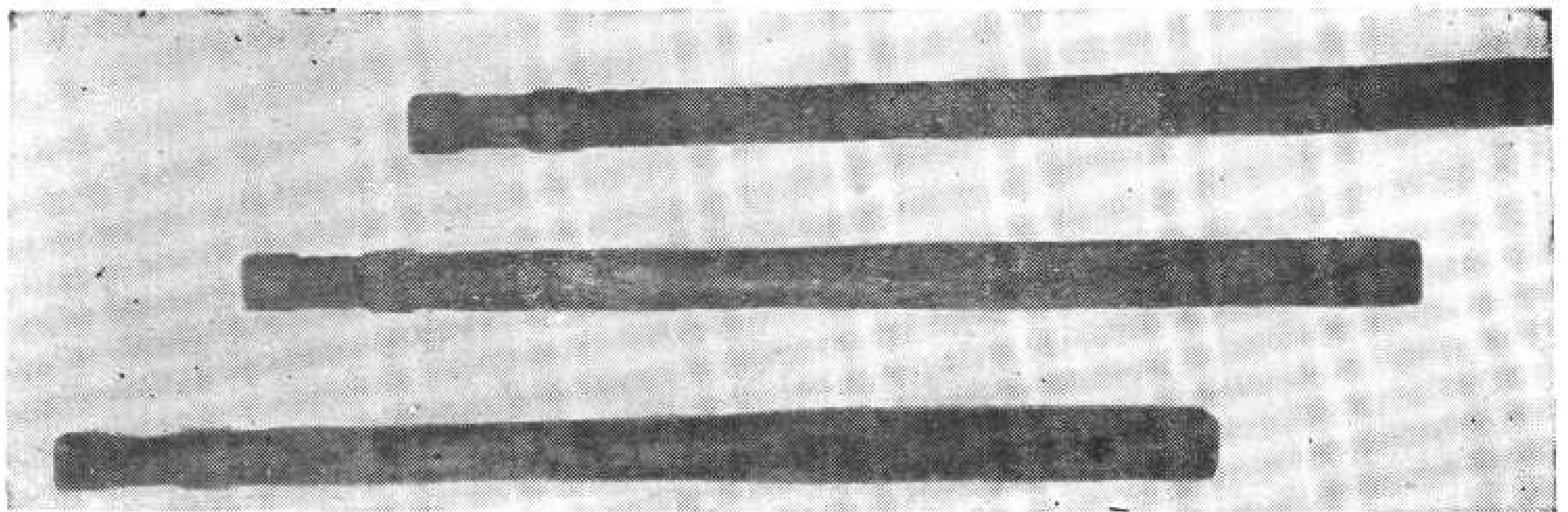
上图为下图照片的一部分放大，中央为刘华、刘贯之、朱国平，穿百装的妇女为杨之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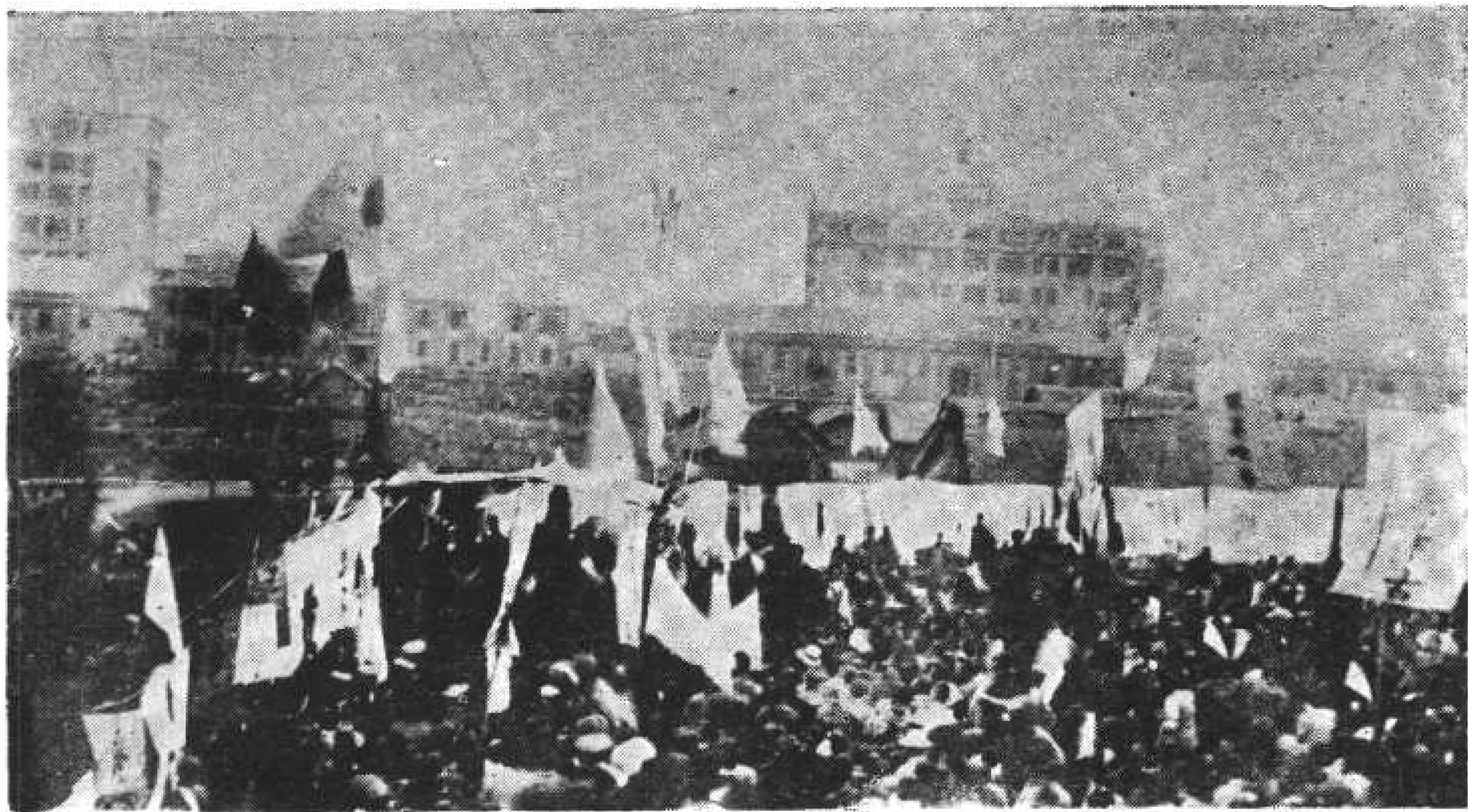
沪西纱厂工人与二月罢工的领导人在潭子湾沪西工友俱乐部前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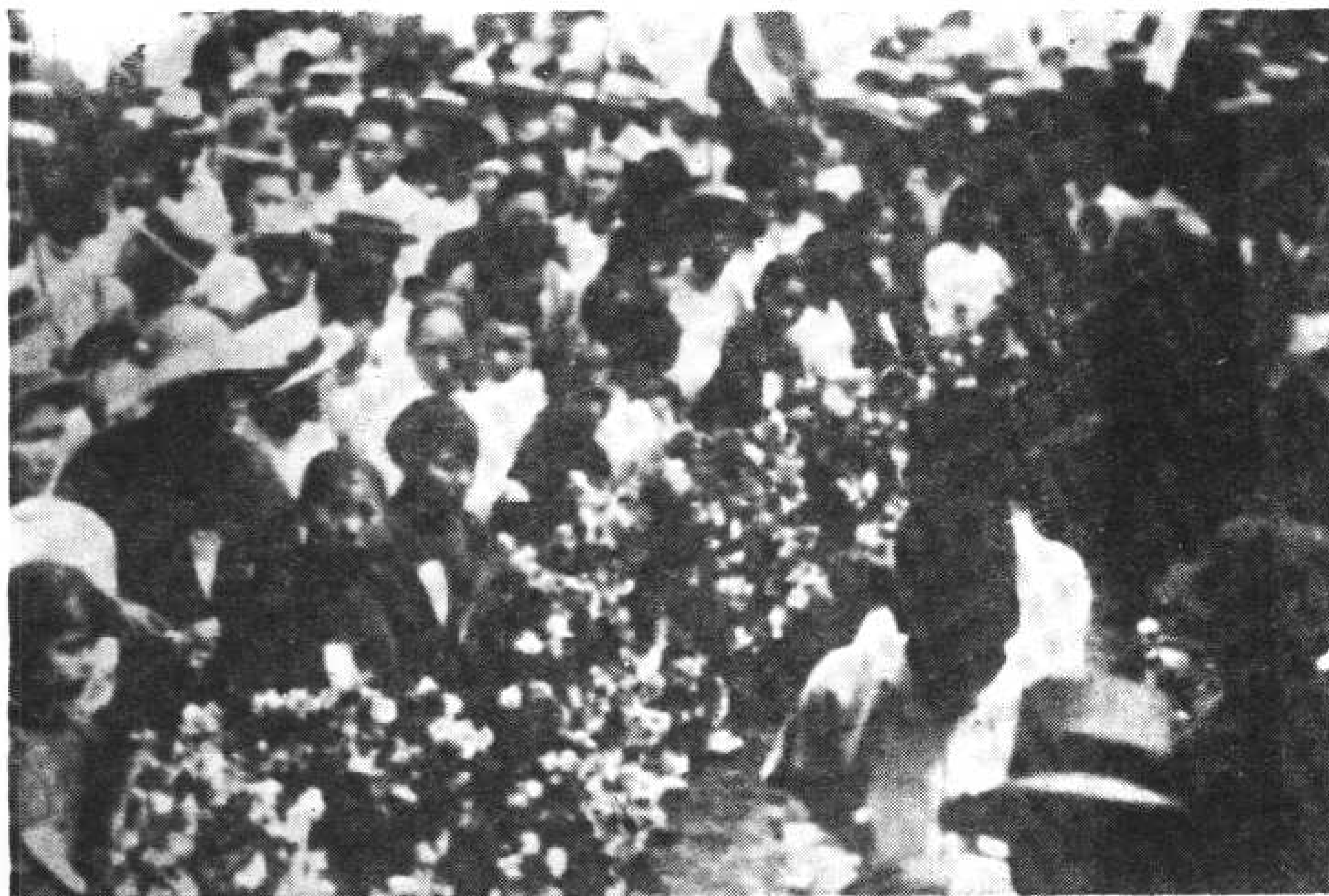
顾正红烈士遗像



顾正红烈士等与日本帝国主义者斗争时使用的打梭棒



五月二十四日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场景



女工们向顾正红灵柩献花圈

工友們

我們的弟兄顧正紅被東洋人打死了，還有許多弟兄，被東洋人打成了殘疾。

東洋人真是野蠻已經！此次不能雪恥，我們個個入都有被東洋槍殺的危險呀！

大家抱義氣！

雪恥報仇！

擁護工會！

聽工會的話！

工友們團結起來！

內外棉紗廠工會

日華紗廠工會

同興紗廠工會

內外棉、日華、同興三紗廠工會為顧正紅慘案散发的传单

同胞們呵！這天日人無理的慘殺中國工人顧正紅，也不
是單單是工人，也是我們中國的同胞，我們的政府敢見得這
存在，他們已如此慘無人道，這所敢為，視中國國家尊
於無有，我們學生並不是多事，實在是日人太輕視
中國，我們現在除了書本子，犧牲精神如斯，可天香
門，並非援助工人，是起來援助中國，如自來，多大大
的恥辱！今日是修親中國的工人，就是他日修及全
中國同胞的性命，古人說得好，兔死狐悲，物傷
其類，同胞們呵！快快覺悟！快快覺悟！大家
起來援助工人，就是援助全國同胞！就是援助中國
的民族。

文治大學學生會敬告

文治大學學生會為顧正紅慘案印发的传单

打倒帝國主義

呵！你們覺得生活困苦麼？你們知道為什麼比從前更苦麼？這原因：

(一) 英國法日各帝國主義佔領海關，把入口稅弄得比出口稅高，所以國貨不賣，外國人把洋貨來賺了，洋錢去；因而弄得我們一大窮一天了。

(二) 英美法日各帝國主義常常派兵駐軍，拿了鐵路或礦權的權利去，軍國佔了去，又向他們的國民國家去打仗。打得我們去盡苦力。

(三) 日本人殺我們工人同胞，還想殺我們工人去，學生也常常去送葬，弄得工人無路，無路又窮了去，我們又去受洋錢之罰，又去受洋錢之罰，又去受洋錢之罰。

(四) 最近工部局修路，佔領中國領土，又實行什麼印刷廠修路，修路又窮了去，一窮又窮，人人皆知，但官廳的人來管，來管又窮了去。

這四種原因，我們起來向他們爭執，我們起來向他們爭執！

大進國神起來！
打倒帝國主義！

上海市民反抗帝國主義大運動宣言

上海是中國人的上海！然而自從帝國主義強迫開埠以來，上海領土上的中國人，在野蠻的統治下，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比十幾國的奴隸還不如！

帝國主義者榨取稅捐，餉捐，各種雜稅，敲榨勒索，無所不用其極，現在又要加增鴉片稅及各項稅捐了，然而納稅華人完全沒有過問上海政治的權利！

帝國主義者在上海的報紙喧張中國各界人物，可以肆無忌憚；然而他們千方百計封鎖中國報紙，遠隔新聞記者，還更嚴布印刷禁律，剝奪中國人一切言論出版的自由！

他們在中國開設工廠，像牛馬一樣的役使中國工人，不許工人有一點反抗；幾位小沙被中國工人投的罷工，日本資本家封鎖了廠，殺傷許多工人，他們不但不懲辦凶手，而且禁止各種報載此項消息，拘捕其同情於工人的文化大學上海大學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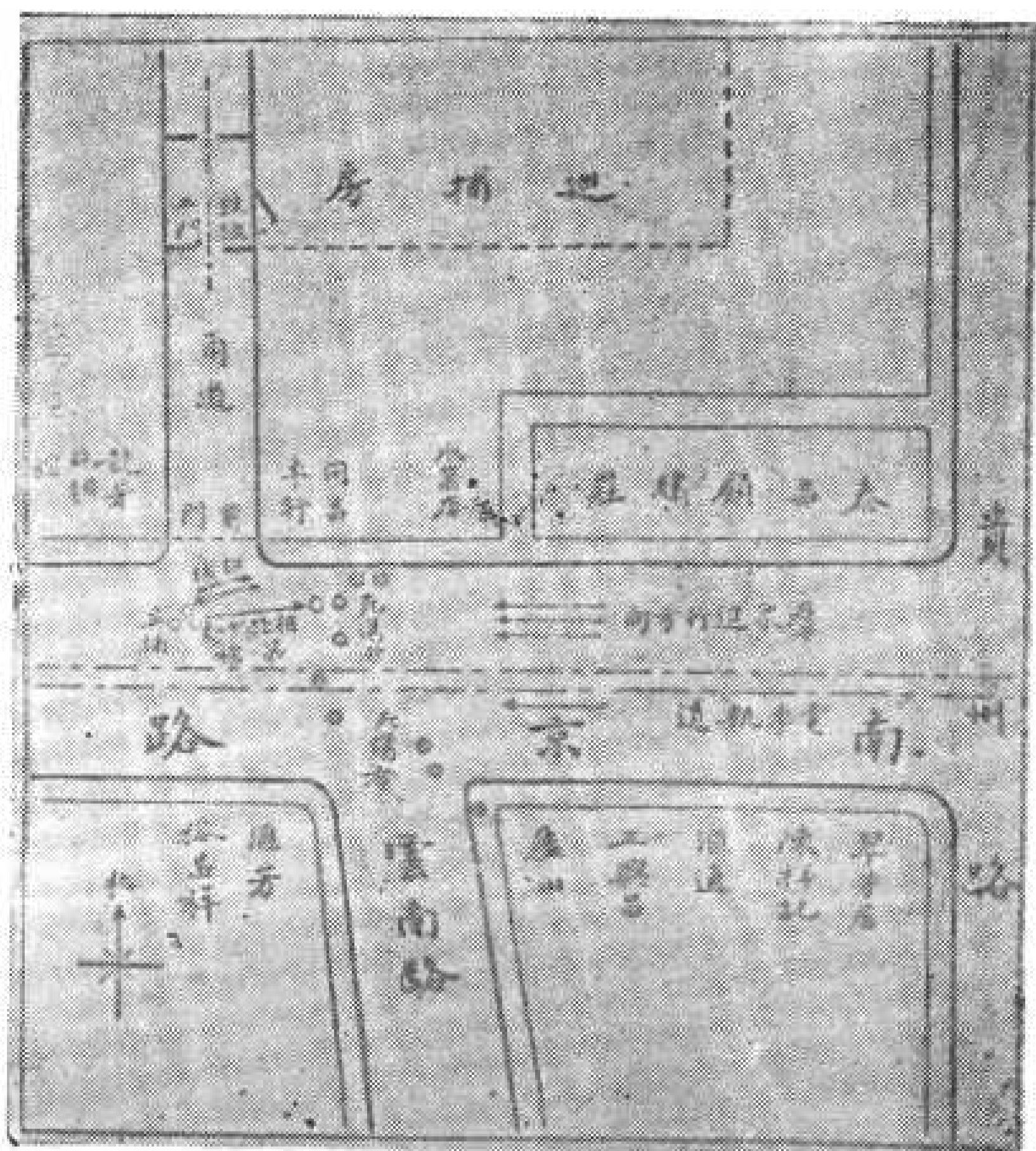
我們忍無可忍了！我們已經聯合各校學生及一切愛國的市民工人，從今日下午起，分隊到公共租界各處請願，喚醒全埠中國人，一致起來反抗帝國主義！

我們已經預備犧牲一切，冒犯各種刑罰與危險，為全中國反抗帝國主義的民衆革命作前驅！

我們希望全上海的中國人，聞風起來！
我們希望全中國被壓迫的同胞們，聞風起來！

五月卅日散发的传单之一

五月卅日散发的传单之二



一九二五年七月《东方杂志》“五州事件临时增刊”所载之五州事件地形图

帝國主義屠殺中之犧牲者

熱血日報附送

姓名	職業	籍貫	年齡	死因
鄭正紅	日籍工人	江蘇		
尹景伊	同濟學生	山東	二十一	
陳英	工人	浙江	二十二	
金和	工人	江蘇	十六	
陳英	工人	江蘇	十八	
...

《热血日报》刊印的五卅被难烈士名单



五卅烈士部分遗体照片(左第一人何秉彝,右第一人尹景伊)

五卅部分死难者



上海大学学生何秉彝



同济大学学生尹景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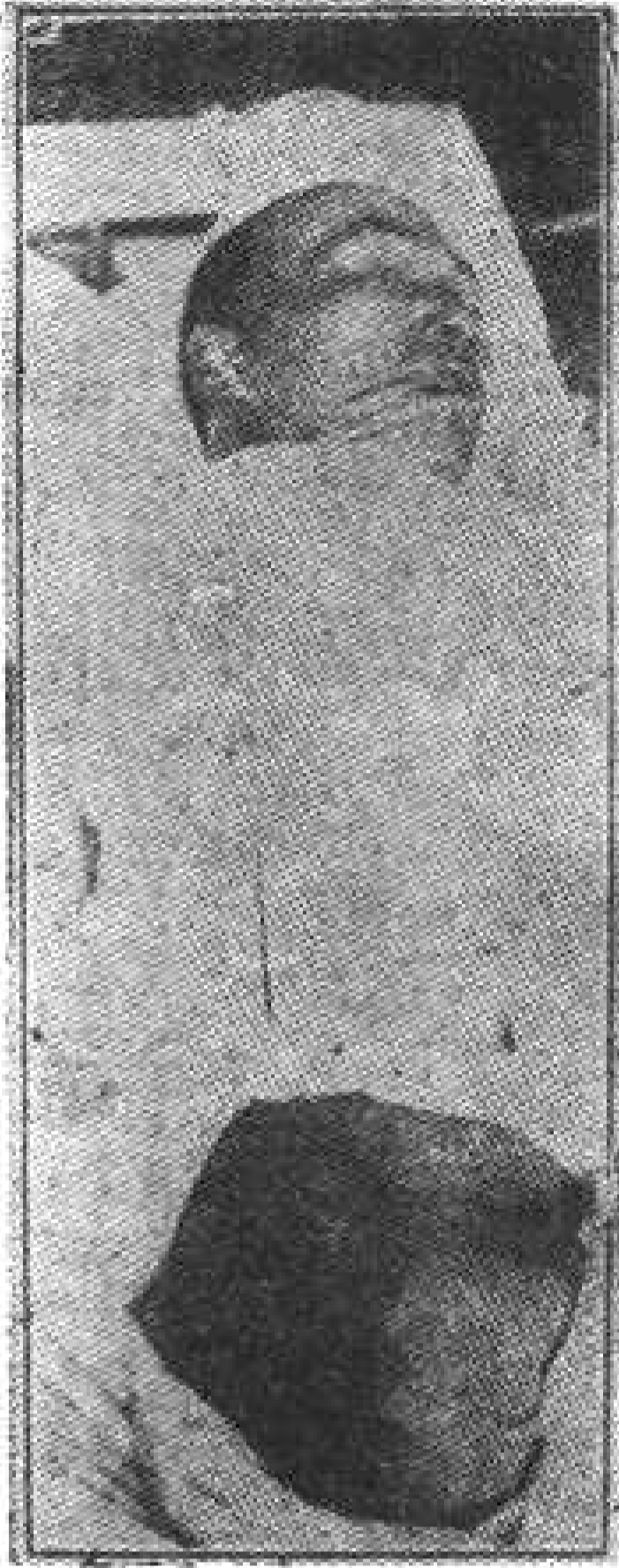


南洋大学附中学生陈虞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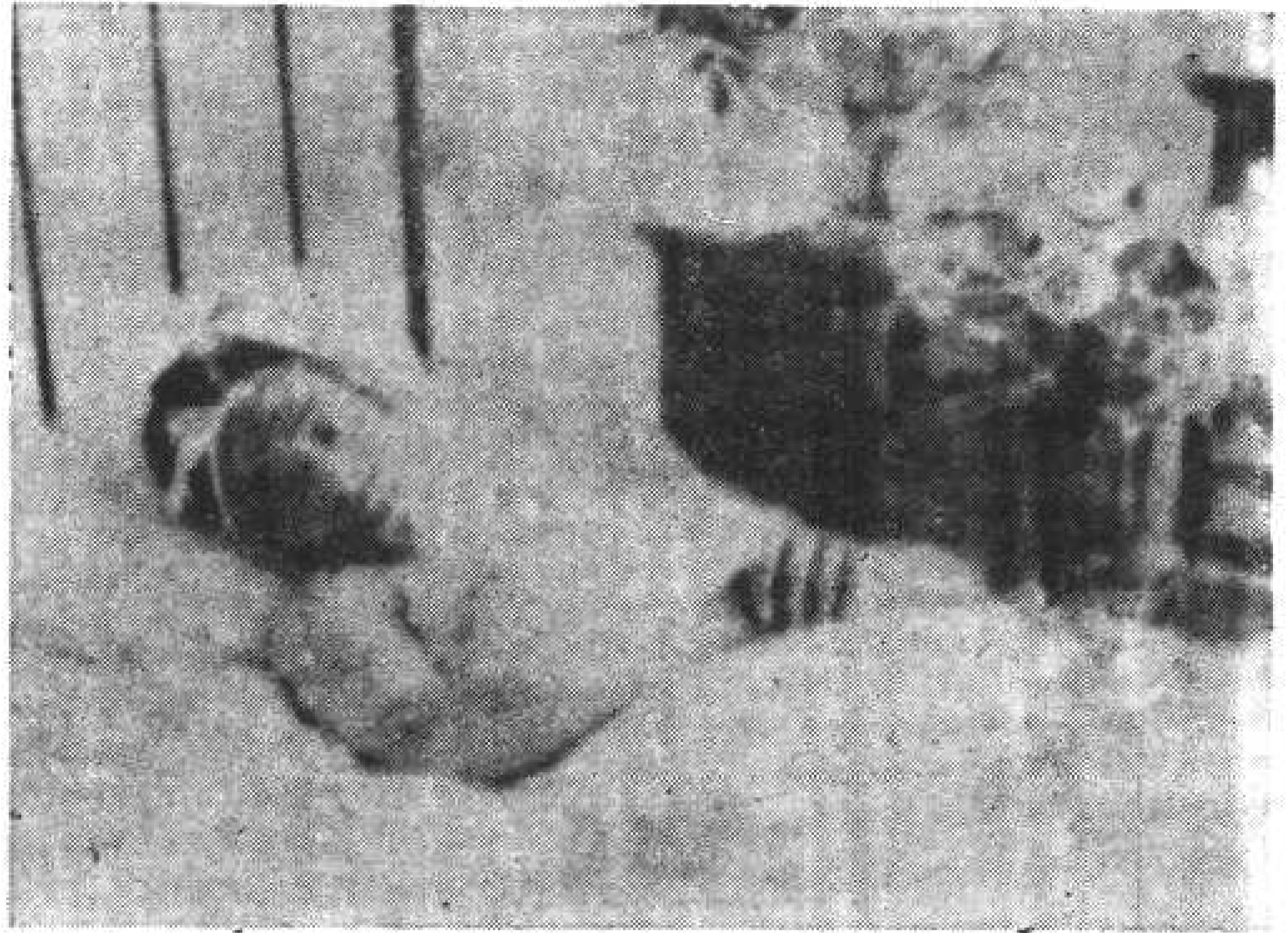


中华电器公司职员石松盛

五卅部分受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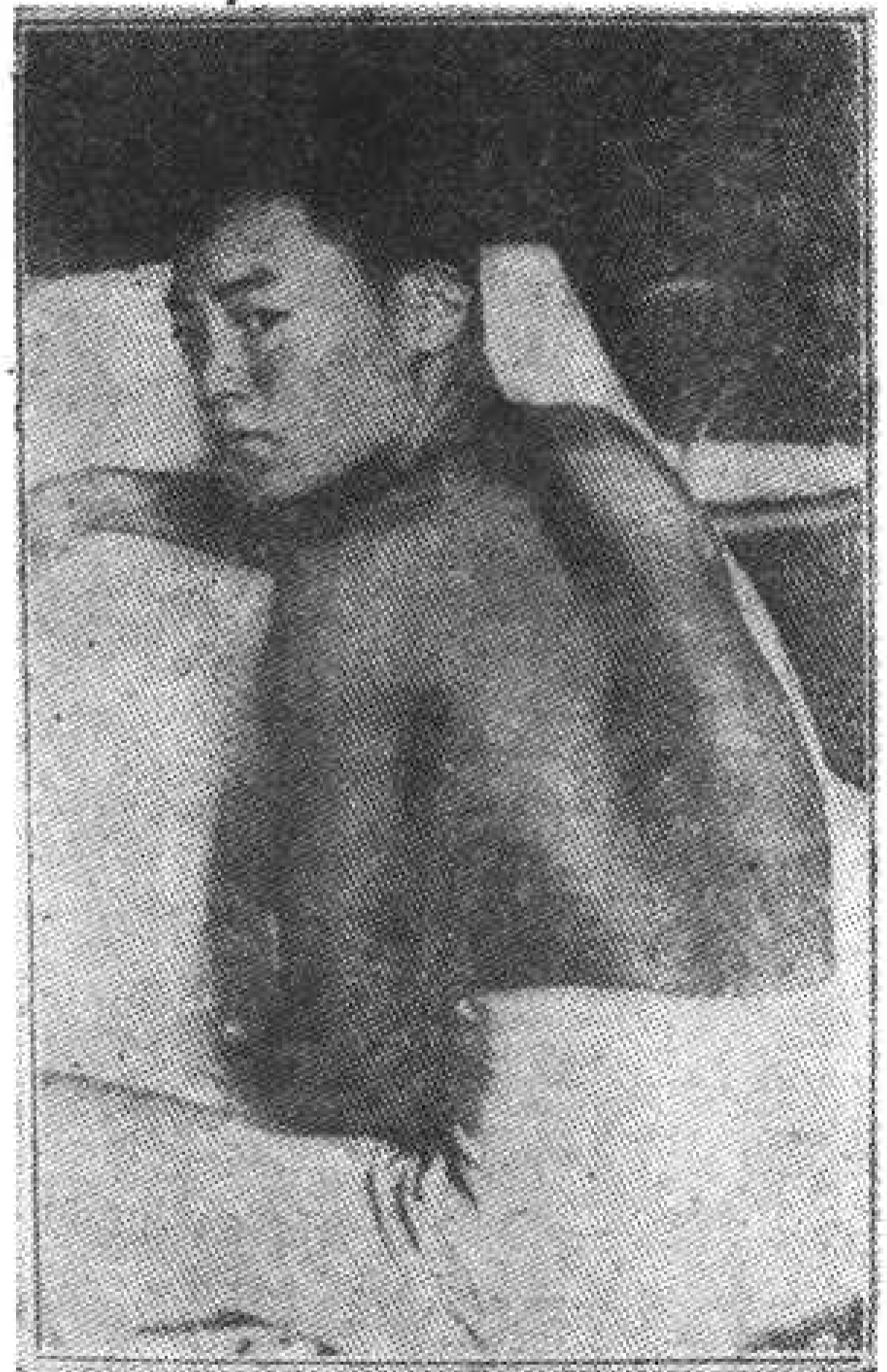
张九卿



陈宝聪



马彩忠



张惠章

巡捕正在同昌车行门前
前搬移五卅被杀害群众的
尸体



惨案发生
后巡捕房用消
防龙头冲洗血
迹

抗议五卅
屠杀的宣传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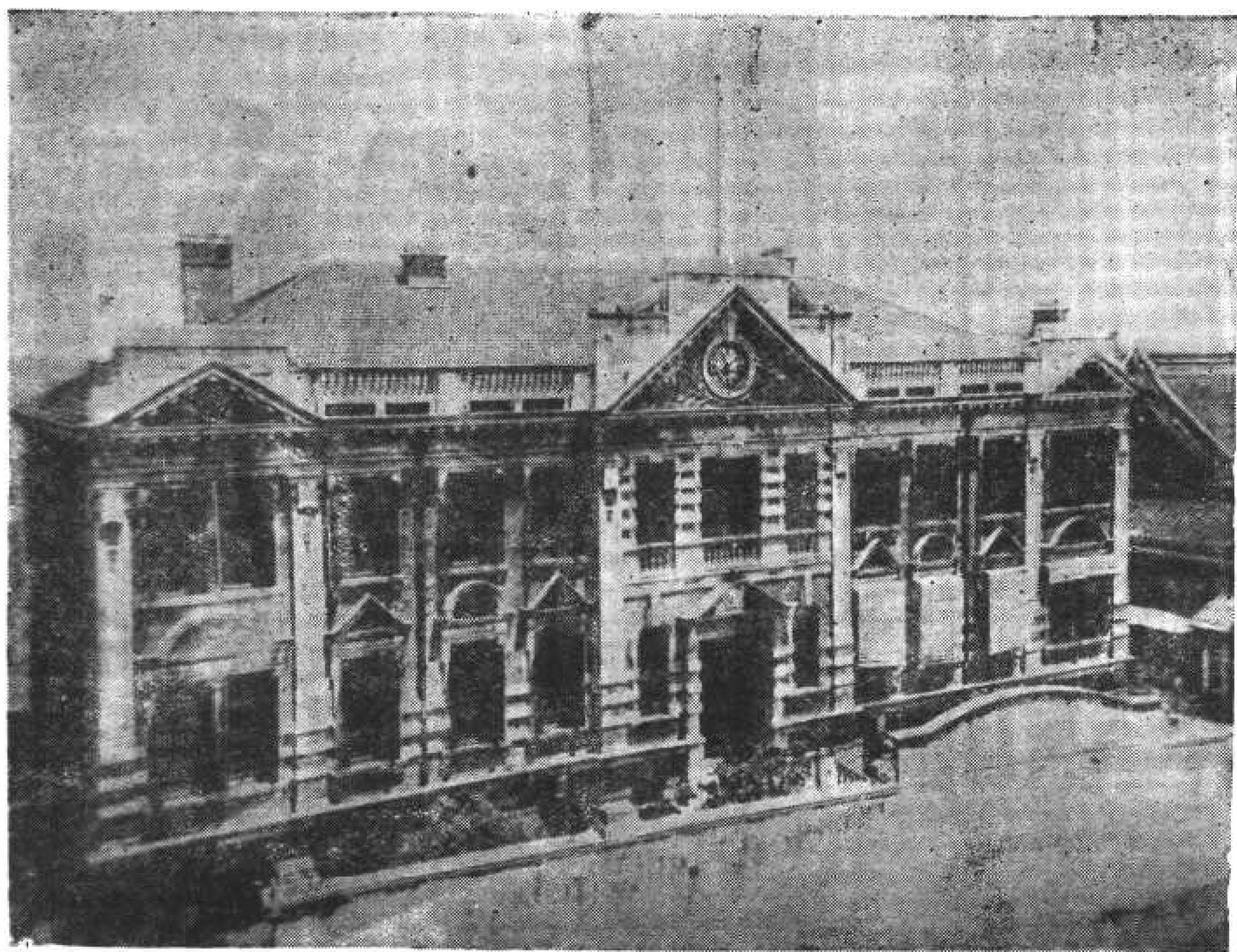


群众以愤怒的心情争看反帝宣传画



六月一日，愤怒的群众用石块还击帝国主义者。图为当时南京路上布满了石块。

上海总商会会址。右图为大门，下图为议事厅。



上海總工會告全體工友

工友們：我們中國，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掠壓迫，真是到了極點！土地被他佔去了，銀錢被他搶去了。上海本是我們中國的上海，但是住在上海的人，都要受外國巡捕房的管轄，那麼我們上海的人，便都成了亡國奴了！尤其是我們工人，更是苦不堪言！

我們的汗血，被他們剝削去了！

我們的身體，遭他們的打罵侮辱！

紅頭阿三，更是他們殘殺我們的劊子手！

我們工友被他們逼迫死的，毆打死的，汽車壓死的，那一天沒有？那一處沒有？

我們組織工會，要遭他們的壓迫禁止。同盟罷工，更要遭他們的摧殘！

我們的身體，好像是牛馬一樣！

我們的生命，好像是虫蟻一樣！

這兩日的虐殺殘暴，比豺狼虎豹，還狠毒百倍！

小沙渡紗廠工友，被日本資本家打死了幾人打傷了幾十人！

學生演講，又被巡捕打死了十幾人，市民罷市，他們更大施虐殺，打死了五十餘人，

被傷者數百人！

流血滿街，死屍遍地！這種殺人的強盜，應該趕快起來反抗他，打倒他！

從六月二日起上海全埠，各業工友，全體一致罷工！

報仇雪恥，反抗殘暴殺人的外國強盜！

工友們！起來呀！罷工呀！

●商界同胞們：

今日上海全体学校都已罷課起來反抗外國人慘殺中國同胞；今日上海各工廠亦已罷工起來反抗外國人慘殺中國同胞！

●我們商界亦應立刻罷市響應才對得住國人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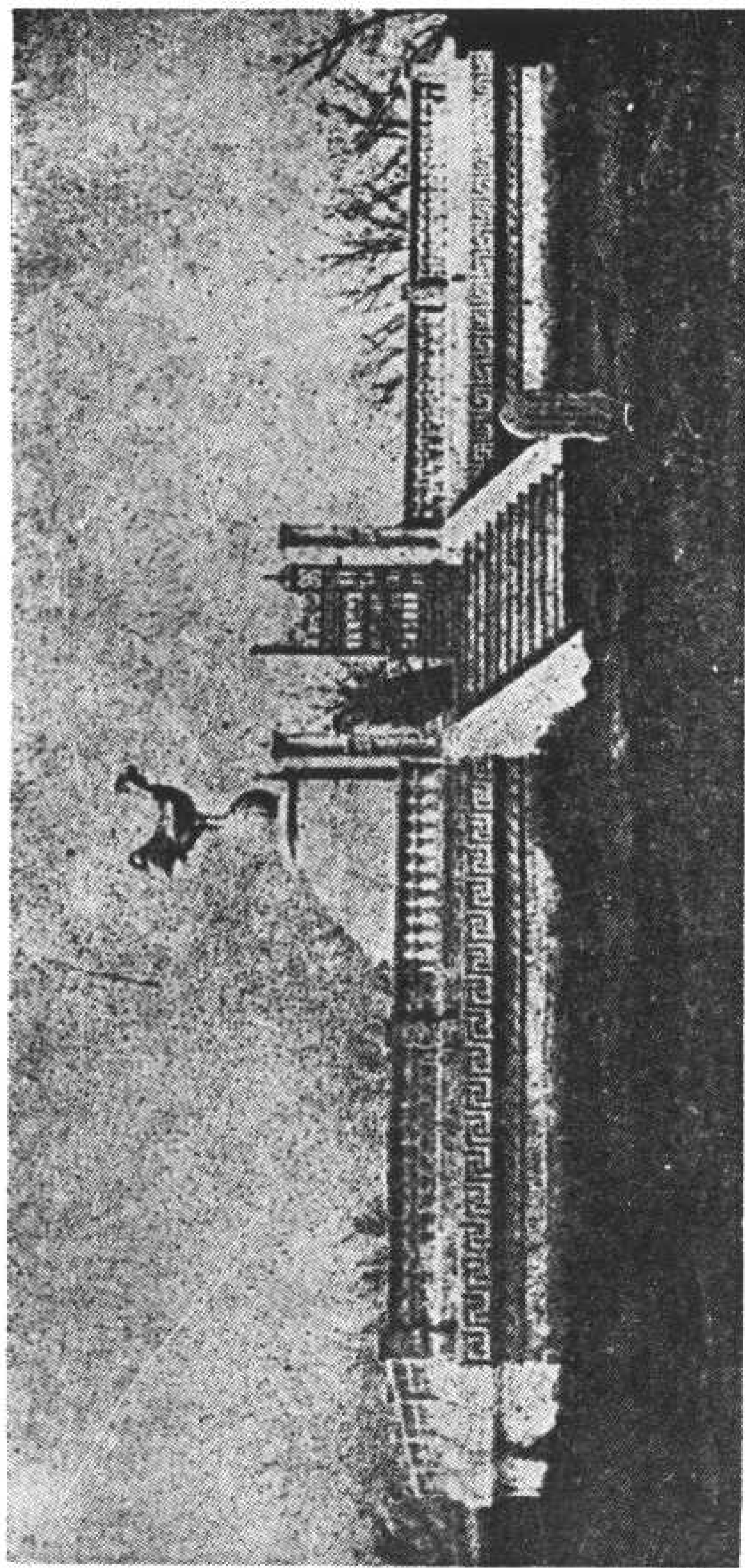
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印发的《告

商界同胞书》传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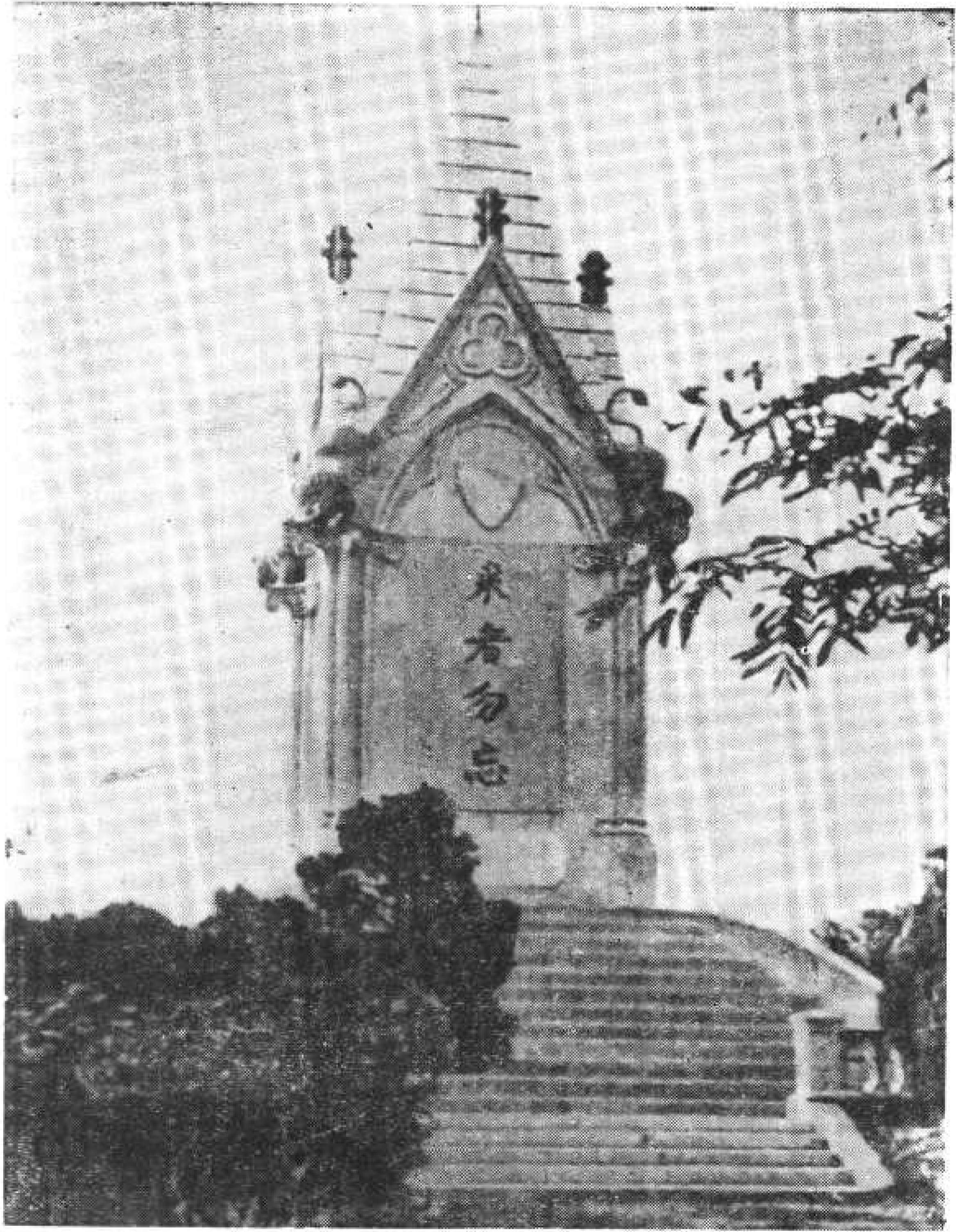
延捕房日為學
生反對印刷附
律及碼頭捐
鎗殺學生十餘人
同胞們趕快罷市
罷工抵抗

上海各學校學生 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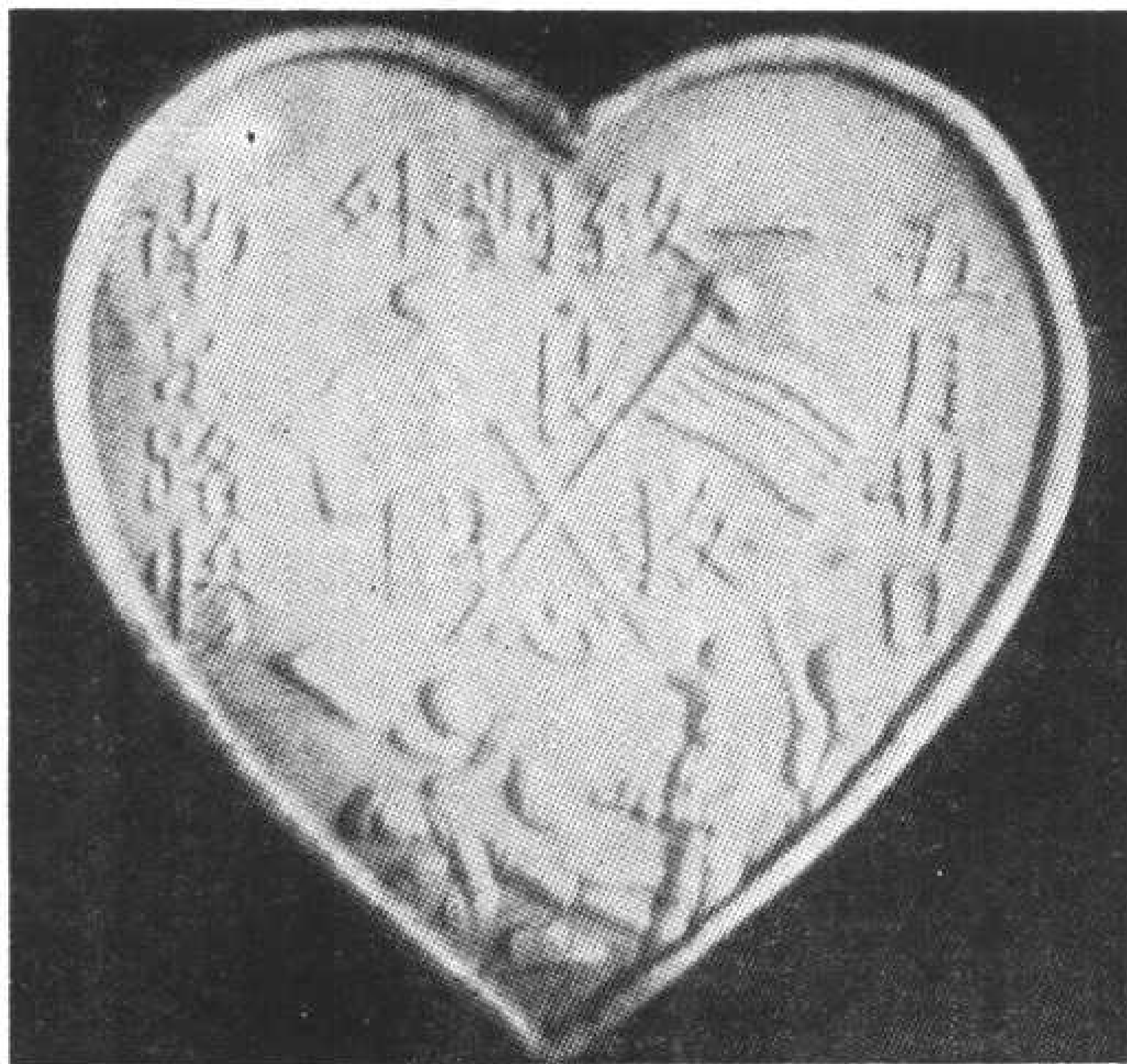
上海学联散发的号召三罢的传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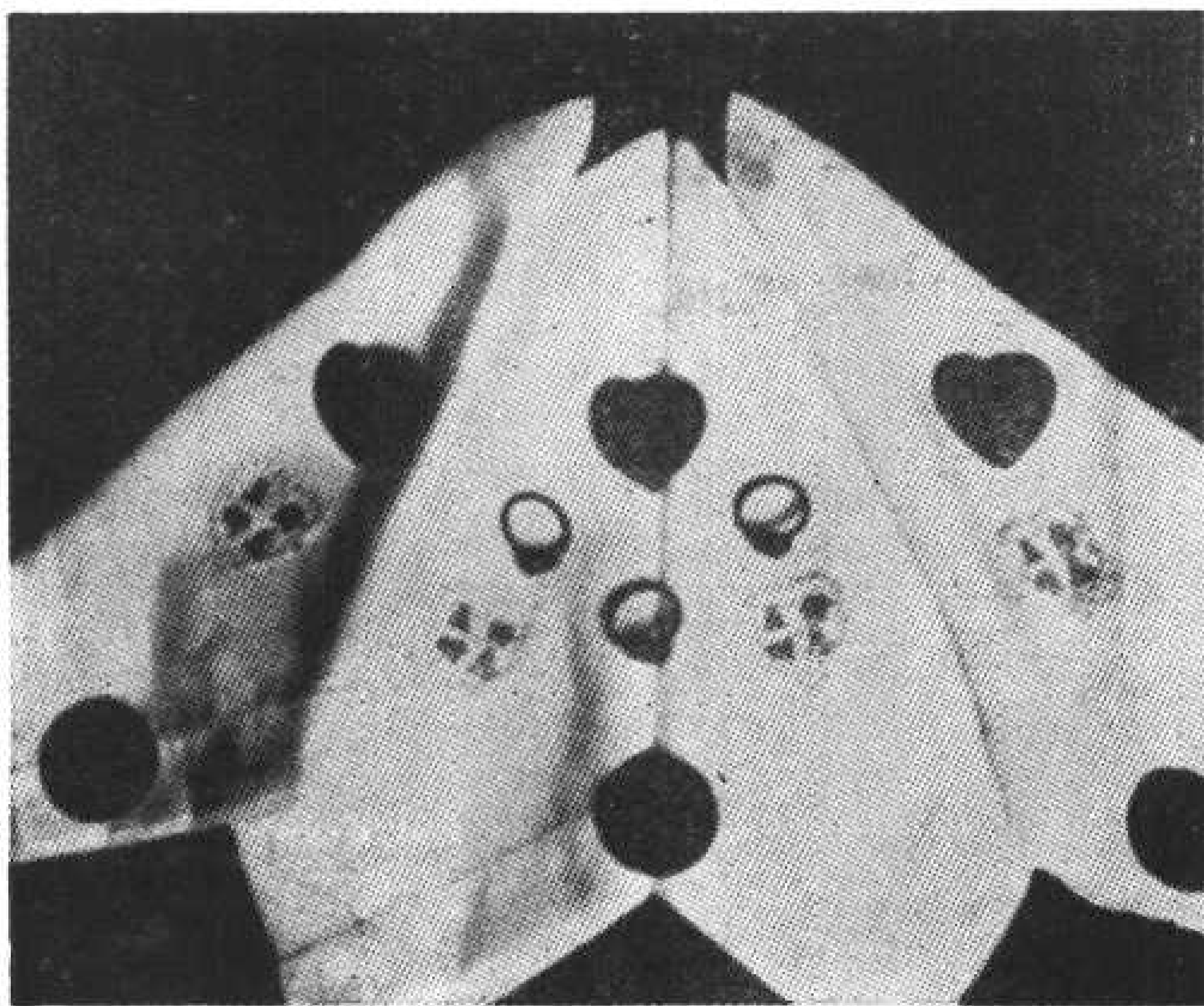
一九二七年告竣的五卅烈士墓全景



五卅烈士墓前之纪念碑



五卅紀念章



五卅紀念品：手帕、戒指等

前 言

一九二五年爆发的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场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声震世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为北伐战争作了重要的准备，成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第一个高潮。

在五卅运动中，中国人民手无寸铁，赤手空拳，面对着全副武装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高度发扬了不畏强暴，敢于藐视敌人的大无畏精神，体现了为国家、为民族慷慨牺牲的崇高品质。“赤血洗神州，浩气弥千古。”五卅运动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谱写了灿烂的篇章。

为了给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史、总结革命历史经验提供资料，我们选编了这部《五卅运动史料》。

本书史料搜集工作从一九六二年三月开始，至一九六四年，第一卷已初编成册。当时由张有年、傅道慧两同志主持，参加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同志，中文部分有：张有年、傅道慧、沈幽蕙、汪绍麟、刘运承、倪静兰、叶庆俊等；外文部分有：章克生、吴绳海、王作求、叶元龙、顾长声、金亚声等。参加第一卷初编工作的有：张有年、姜沛南、章克生、张铨等。其后，停顿十多年。一九七八年我所决定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整理和补充，以便陆续汇编出版。这一工作由傅道慧同志主持，我所刘运承、张

铨、张培德和上海财经学院张有年同志参加。全书由沈以行同志审定。

本书在收集史料过程中，曾得到全国各方面的支持。北京图书馆、中国革命历史纪念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北京外贸学院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东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中华书局编辑部图书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处、上海市纺织工业管理局、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上海第二棉纺织厂等单位，给予很多帮助。我们曾专程访问了李立三同志，作了有关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一些情况的访问记录。嵇直、陈宝聪、沈孟先、姚天羽等同志应约写了回忆文章。在此一并致谢。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编辑凡例

一、本资料书共分五部分：(一)重要论著、回忆和历史文件；(二)从二月罢工到五卅运动的爆发；(三)五卅运动中上海各阶级、各团体的活动；(四)五卅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开展、侨胞和国际支援；(五)帝国主义、军阀政府对五卅运动的镇压和破坏。

二、本书所辑史料选自《热血日报》、《民国日报》、《申报》、《新闻报》、《大陆报》、《字林西报》等十几种中外文报纸和《向导》、《中国青年》、《上海总工会日刊》、《血潮日刊》、《国闻周报》、《图画时报》、《密勒氏评论报》、《中国经济月刊》等四十余种中外文期刊，以及有关书籍、档案。我们还约请了一些亲身经历五卅运动的同志写了回忆录。这些史料来源不一，反映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为了保存历史资料的原来面目，一般不予更动；史料中涉及的一些人物，后来也发生了各种变化。有关上述情况，我们均不一一加注说明，希读者使用时注意。

三、所辑史料除文章外，凡内容相近者，皆归并于一个标题之中。

四、史料中()内之日期、补充说明和文中所用省略号，均系原文所有。凡编者删略的，则以(上略)、(中略)、(下略)标出，以示区别。注解为编者所加，个别原注均予注明。

五、史料中发现有错别字、脱漏、衍文，分别以正字注于

[]中，以脱漏字注于()中，以衍文注于< >中。不能确定者，则注明(原文如此)。字迹不清者以□示之。

D 44/24

目 录

图 片
前 言
编辑凡例

第一部分 重要论著、回忆和历史文件

壹、重要论著和回忆	3
五卅运动(恽代英)	3
“五卅”运动(邓中夏)	22
五卅运动(毛泽东)	59
五卅运动之分析及纪念之意义(太雷)	59
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刘少奇)	66
今年五一之中国政治状况与工农阶级的责任(和森)	83
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独秀)	87
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弼时)	90
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秋白)	100
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秋白)	109
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 一九二五年(瞿秋白)	115
英国帝国主义眼前所走的侧径(楚女)	129

反抗五卅惨杀运动中所见的阶级斗争(楚女)	132
我们的战略(F·M)	136
纪念蔡和森同志(节录)(李立三)	138
李立三同志对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的回忆(访问记录) ...	142
贰、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关于	
五卅运动的文件	149
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	
告全国民众(1925年6月5日)	149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言——告此次	
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1925年7月10日)	154
为工会条例事告全国工人(1925年7月20日)	159
五卅二周年月纪念告上海工人学生兵士商人!	
(1925年7月30日)	162
为南京、青岛的屠杀告工人学生和兵士	
(1925年8月11日)	165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告工人兵士学生	
(1925年8月10日)	167
全国被压迫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下联合	
起来呵!(1925年8月18日)	171
中国共产党为总工会被封告工友(1925年9月)	175
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1925年11月)	177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市民	
告全国青年(1925年6月13日)	185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市民	

告全世界青年工人(1925年6月13日)	188
为反帝国主义浩大战斗与赤化问题檄告国民 (1925年6月)	189
为海员工会济安会被扰告上海工人(1925年8月)	191
第二部分 从二月罢工到五卅运动的爆发	
壹、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二月大罢工	195
一、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的惨痛生活；中国共产党 教育和组织纱厂工人的活动	195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 加剧的几个统计	195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帝国主义对华输出商品比较表 (1913、1919—1924)	195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帝国主义由华输入原料 及其他货品比较表(1913、1919—1924)	196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华日商纱厂机器设备扩充表	196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五年全国中外纱厂、纱锭比较表	197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五年上海市中外纱厂、 纱锭及布机比较表	198
一九二五年全国华商、日商、英商纱厂一览表	199
(二) 上海日商纱厂工人遭受的残酷压迫和剥削	212
1. 前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的控诉	212
2. 《民国日报》关于纱厂工人状况的报道	231

纱厂做工记(卓熙) 厂主及管理人员对工人任意殴辱行凶 纱厂发生严重的工伤事故	
3. 外人的著述及调查报告·····	238
上海某日商纱厂工人年龄调查简表 上海工业医院八百八十件纱厂工人病情的分析报告(戴克耳) 日本国内纱厂与在华日纱厂劳动条件比较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童工委员会”报告(节录)	
(三) 一九二四年前后,党在上海工厂区	
教育、组织工人的一些活动·····	260
1. 创办上海大学,培养干部·····	260
上海大学定名启事 上大之使命(节录)(A·S) 张士韵关于上海大学的回忆 杨之华同志关于上海大学师生参加二月罢工的片断回忆 姚天羽同志关于上海大学的回忆 警探口中的上海大学	
2. 建立平民学校,教育工人·····	270
沪西区各校筹办平民夜校 上海大学师生积极办理平民学校 上海大学附设平民学校热烈庆祝十月革命节 杨树浦区开办平民学校 南市等区平民教育活动情况	
3. 组织沪西工友俱乐部和杨树浦工人进德会·····	276
沪西工友俱乐部草章 关于上海小沙渡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经过的回忆(嵇直) 刘贯之同志关于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回忆 顾汝舫关于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回忆 姜维新同志关于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回忆 日人关于沪西工友俱乐部的记载 杨树浦工人进德会的活动	
二、二月罢工的爆发和扩大,工人的英勇斗争·····	297
(一) 日商内外棉各厂全体工人罢工·····	297
内外棉八厂工人首起罢工 第五(东、西)、七、十二厂工人继起罢工 第九、十三、十四厂工人参加罢工 养成工全体参加罢工 内	

外棉其他各厂工人陆续罢工 沪西工友俱乐部号召罢工的传单
 内外棉纱厂工会发表的罢工宣言 内外棉纱厂工会敬告各业工友
 书

(二) 其他日商纱厂工人纷起响应,

举行同盟大罢工.....306

日华第三、四厂工人罢工 日华纱厂罢工宣言 大康第一、二工厂
 工人罢工 大康纱厂号召罢工的传单 丰田纱厂工人罢工 丰田
 纱厂罢工宣言 同兴纱厂工人罢工 同兴纱厂罢工宣言 裕丰纱
 厂工人罢工 裕丰纱厂罢工宣言 东亚制麻厂工人罢工 [附]二
 月罢工厂数、罢工日期、罢工人数统计表

(三) 工人加强团结,坚持罢工斗争321

1. 组织工会、纠察队和义勇队,加强战斗力量321

内外棉纱厂工人组织工会和纠察队 日华纱厂工人组织工会和纠
 察队 丰田、日华工人组织纠察队 裕丰纱厂工人组织纠察队
 各厂工人合组代表办事处 各厂工人组织义勇队,宣誓保卫工会

2. 集会演讲,鼓舞群众斗志324

内外棉纱厂万人集会,表示不达目的不上工 内外棉工会与日华、
 丰田、同兴等厂加强联系,决一致行动,坚持到底 大康工会开露
 天大会,宣布不到最后胜利不上工 工人上街演讲 沪西工人举
 行游行示威

3. 抗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镇压破坏活动327

沪西工人营救游行被捕工友 沪东工人包围警署,抗议逮捕工人
 工会被封,工人坚持斗争 拒绝厂主利诱,工人继续罢工 各工
 会登报启事并发函揭露、警告工贼的破坏活动

4. 向社会各界宣传,争取同情援助331

各工会联名发表泣告同胞书,要求各界奋起援助 工会招待报界,

吁请援助

5. 工会印发的传单和小报……………335

内外棉纱厂工会印发的传单 大康纱厂工会印发的传单 日华纱
厂工会印发的传单 内外棉工会印发的罢工新闻

三、帝国主义、日本资本家、军阀政府及工贼

对罢工的镇压破坏活动……………341

(一) 日本帝国主义、日本资本家的镇压和破坏……………341

1. 日本政府及其驻华使领的活动……………341

日本政府的对策 日本公使一再要军阀政府取缔罢工 日本驻沪
总领事迫淞沪警厅取缔罢工 日本驻沪总领事叫嚣要军阀政府赔
偿罢工损失 日本驻沪总领事策划武力镇压罢工

2. 上海日本资本家的活动……………346

各日商纱厂厂主会商对付罢工办法 内外棉会社社长专程来沪,
策划破坏罢工 内外棉厂利诱工人上工 大康纱厂称不上工者将
逐出工房 日商纱厂联合会电请日本政府出面干涉 上海日本商
会发出函电,称事态严重,要求惩办罢工者 [附]工部局总办鲁和
复函

3. 日本国内资产阶级团体和报纸的反应……………352

大阪金融界惊呼上海罢工是整个日本纺织业的生死问题 大阪日
本纺织联合会向政府请愿 东京纺织联合会要求日政府向中国军
阀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派人来沪研究“预防”罢工办法 《东京朝
日新闻》社论《上海罢工事件》 《东京朝日新闻》社论《上海罢工
的一次教训——尊重中国的国民性》

4. 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向外相币原

呈报上海日商纱厂二月罢工的经过……………359

(二) 上海公共租界当局的镇压和破坏……………369

1. 工部局的镇压活动	369
工部局派探捕保护日商纱厂，逮捕工人学生 镇压工人进德会	
2. 会审公堂审判《民国日报》社及被捕之工人、学生	372
因刊登罢工工人文告，《民国日报》社记者受审 审判被捕之罢工工人及学生	
3. 上海英美报纸的攻击言论	379
英国《字林西报》社论《布尔什维主义在纱厂》 美国《大陆报》社论《纱厂罢工的教训》 英国《上海泰晤士报》社论《纱厂罢工的重要意义》	
(三) 淞沪警察厅的镇压和破坏	387
四区警署不准工人开会 警厅制止工人开会 警厅布告胁迫工人“安分上工” 逮捕罢工领导人和工会干部 搜查和封闭工会 加强戒备，严防罢工扩大	
(四) 工贼的破坏活动	392
以调解为名，进行破坏 向日本方面提供工运情报 投靠官方破坏罢工 另立御用组织，阴谋分化罢工工人 向工人进行欺骗宣传	
四、各界团体对罢工的援助	400
(一) 各业工人热烈援助	400
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等四工会通启 五工会函张宗昌和警厅，力争罢工自由 恒丰纱厂等厂工人捐款援助罢工 杭州劳工协会援助上海工潮 绍兴工界援助上海日纱厂罢工	
(二) 学生会等团体的同情援助	406
全国学生总会通启 各团体代表纷赴工会调查，赞助罢工工人 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呼吁勿干涉工人集会 江西国民会议促成会援助上海罢工	

- (三) 工商学各团体合组罢工后援会,
积极开展援助活动……………408
1. 罢工后援会成立……………408
国民会议促成会等组织“东洋纱厂罢工后援会” 后援会两次会议
的报道
 2. 呼吁各界援助,进行募捐活动……………413
罢工工人后援会之宣言 通电呼吁同胞奋起对抗 募捐援助
 3. 警告日本厂主,反对军阀镇压……………417
书面警告罢工日厂厂主 责问警厅长为何答应“取缔”罢工 向警
厅交涉释放被捕工人

五、上海一些报纸对罢工的评论和资产阶级

团体的调解活动……………422

(一) 上海报纸对罢工的评论……………422

1. 《民国日报》……………422

宜一致援助内外棉厂工人(沉痛) 此次纱厂罢工工人是赤化了
吗?(次雄) 日厂罢工与民族争斗(成斋) 官厅与罢工工人(何
冰夷) 打人有什么稀奇!(非奴)

2. 《新闻报》……………428

日厂工潮之解决谈(记者) 调停工潮(独鹤)

3. 《时事新报》……………430

述日本纱厂罢工事(达仁) 论日商纱厂罢工事件(圣心)

(二) 资产阶级团体的调解活动……………433

1. 华商纱厂联合会……………433

公推吴麟书出任调解 吴麟书派代表赴工会调解,工人提出最低
条件 日本厂主对吴麟书的调解拖延不复 调解期间,永安纱厂
董事会讨论预防日厂罢工波及该厂办法

2. 沪西四路商界联合会	437
称罢工使地方不安, 决定进行调解 派代表与内外棉工会接洽 日本厂主态度强硬、拒绝调解 声明力不胜任, 已请商总联合会协助 调解	
3. 五马路商界联合会	439
函请华商纱厂联合会出面调解 推派代表分别进行调解	
4. 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	441
接受沪西商联会的请求, 参加调解 开会议决: 尽奔走之劳, 冀早日了结 派出代表进行调解 邀总商会会董、日本买办王一亭出面 面调解	
5. 上海总商会	445
工会代表与日本厂主在总商会谈判 日本厂主多方狡辩, 总商会 擅自取消重要条件 总商会讨好日本厂主, 复工条约草草签字 调解“成功”, 日本厂主设宴酬谢	
六、工人胜利复工, 巩固斗争成果	450
(一) 工会召开群众大会, 报告谈判经过, 宣告复工	
宣告复工	
内外棉工会等在沪西开大会, 刘华报告谈判经过 日人报道刘华 和各界代表在沪西复工大会上的演说 大康、裕丰工会在沪东召 开大会, 报告谈判经过 大康纱厂工会号召工人参加复工大会的 传单 上海日商各纱厂罢工工人复工宣言	
(二) 遵照工会号召, 各厂工人进厂复工	455
工会号召工人全体复工, 坚决维护工会(传单) 内外棉工会的命 令(传单) 各厂工人复工	
(三) 继续加强团结, 巩固斗争成果	457
1. 力争释放被捕工人	457

总商会函请警厅释放被捕工人 工人函请克威律师交涉释放被捕工人 数千工人热烈欢迎被捕出狱兄弟 函请总商会切实交涉释放邓中夏等同志 警厅被迫答应释放被捕人员	
2. 巩固和发展工会组织	460
大康、裕丰工会要求警厅启封会所 工人要求日本厂主正式承认工会 警探口中的工会活动 工部局警务处惊呼沪西工友俱乐部已成永久性机关 各纱厂组织联合办事处,工人踊跃入会	
七、党的领导人关于二月罢工的论述和总结	464
上海日本纱厂罢工中所得来的经验(中夏)	464
上海小沙渡日本纱厂之大罢工(双林)	471
民族的劳资斗争(双林)	474
帝国主义的佣仆与中国平民(双林)	477
看了《燎原》以后(节录)(李立三)	481
贰、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和青岛惨案	486
一、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第一次大罢工	486
青岛日本纱厂工潮之扩大——青岛通信,四月廿九日(硕甫) 青岛纱厂工人罢工之始末(吴雨铭) 日本厂主被迫让步,工人胜利复工	
二、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第二次罢工和青岛惨案	494
青岛日本帝国主义残杀中国工人之惨剧——青岛通讯,五月三十日(实敷) 青岛屠杀之经过——青岛通讯	
三、有关党领导青岛罢工的一些情况	503
邓恩铭同志领导青岛罢工斗争的片断 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的爆发情况 上海纱厂工会代表函告青岛罢工情况 日人论著中反映的情况 支援青岛罢工的上海纱厂工会代表返沪	

叁、上海人民反对公共租界工部局越界筑路	
和四提案的斗争	508
一、上海人民反对工部局越界筑路的斗争	508
(一) 工部局强行越界筑路	508
领事团擅自决定扩充上海租界 工部局日夜在沪西越界筑路 工部局对业主进行威胁利诱, 强行占地筑路	
(二) 上海各界纷纷反对越界筑路	511
沪西郊区农民愤起拔除工部局所立界桩木标 国民保土会议决制止越界筑路办法 淞沪市政协会电请制止越界筑路 学商界六团体电请外交部严重抗议 少年宣讲团出动演讲, 反对越界筑路	
(三) 军阀政府空谈调查交涉, 欺骗民众	514
二、上海人民反对工部局印刷附律等	
四提案的斗争	515
(一) 工部局阴谋通过四提案, 上海人民	
群起反对, 迫使流产	515
1. 工部局策划召开纳税外人特别会议通过四提案	515
公布会议议程及印刷附律等提案 竭力运动纳税外人到会通过四提案	
2. 上海各界群起反对印刷附律等提案	518
反抗印刷附律与码头捐(传单) 学生会、市民协会等团体合组上海市民反对印刷附律协会 总商会函交涉署反对印刷附律和增加码头捐 总商会再函交涉署抗争交易所注册案 上海的童工问题(其颖)	
3. 纳税外人特别会议因各界反对而流产	524
特别会议到会人数不足, 四提案未能开议	

(二) 工部局再谋通过四提案,上海各界	
坚持反对·····	525
1. 工部局再度策划召开临时纳税外人特别会,	
通过四提案·····	525
英领勾结日领策划于六月初召开临时特别会议 工部局通告六月	
二日开临时纳税外人特别会议 工部局发表四提案全文,变本加	
厉欺压中国人民 租界当局全力拉拢纳税外人出席特别会议	
2. 上海各界继续反对四提案·····	529
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传单) 商总联合会函交涉署要求咨照领事团	
迅速打消四提案 上海各商业团体联名抗议四提案的宣言 总商	
会函请银行公会,将宣言书转送外人,使其“主持公理” 工部局	
华顾问函促工部局严重考虑各商业团体的抗议 工部局被迫表示	
将“严重考虑”	
肆、顾正红惨案和上海各界人民的抗议运动·····	538
一、顾正红惨案和日商纱厂工人的反抗斗争·····	538
(一) 日本厂主不履行二月罢工的复工条件,	
加紧压迫工人,各厂陆续罢工反抗·····	538
二月罢工胜利后,工会组织蒸蒸日上 厂主蓄意破坏工会,出钱组	
织御用工团 日驻沪总领事函警厅“防范”罢工 工会根据复工条	
约提出三项要求,厂主无理拒绝 内外棉第十二厂工人罢工 内	
外棉第八厂工人罢工 同兴第一厂工人罢工 日华第四厂工人罢	
工 内外棉第三、四厂工人罢工 内外棉第十五厂工人罢工 日	
本厂主决议排斥工会,以高压手段对付工人 上海日文报纸报道	
工人暂行复工情况	
(二) 顾正红惨案·····	551
为日人惨杀同胞顾正红呈交涉使文 顾正红被杀伤时的惨状	

《时事新报》的报道 在枪杀中国工人中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上海
市民之威吓(若飞) 内外棉会社的歪曲报告 《民国日报》刊登的
死伤工人名单 顾正红烈士塑像碑文

(三) 内外棉纱厂工人愤起罢工, 强烈抗议

日人残杀顾正红, 吁请各界援助561

内外棉第五(东、西)、七、八、十二厂工人愤起罢工 内外棉纱
厂工会宣言(传单) 内外棉纱厂工人呼吁书(传单) 加强领导斗
争的机构, 推定刘华等为负责人 内外棉纱厂工会第二次宣言(传
单) 工会邀各报记者茶会, 说明惨案真相 工部局警务处关于工
会发放罢工维持费的情报

(四) 举行顾正红烈士追悼会, 号召工人

坚持罢工570

工人整队往迎顾正红灵柩, 高呼“要行凶的偿命!” 工人在顾正红
灵前集会演说, 大呼“坚持到底!” 工会筹备公祭顾正红烈士
万人大会追悼顾正红 追悼会上(味辛) 关于顾正红烈士追悼会
的回忆(沈孟先) 工部局警务处关于工会鼓动群众坚持罢工的情
报 东洋鬼子又来哄骗我们上工了(传单)

二、帝国主义、日本厂主及军阀政府镇压工人的

反抗斗争580

(一) 日本帝国主义及日厂主的镇压和破坏活动580

1. 日本官方迫使军阀当局取缔工会, 镇压罢工580

日本政府训令沪、青官宪, 坚决取缔罢工 日驻沪总领事迫使军阀
当局取缔工会, 镇压罢工

2. 上海日商纱厂联合会的活动582

接连召开紧急会议, 议定对付罢工办法 要求日领取断然处置, 迫
使军阀彻底取缔罢工 要求日本政府出面交涉

3. 日本厂主策划镇压罢工……………584
以关厂对抗罢工 以迁厂回国相恐吓 企图歇退罢工工人,另招
新工
- (二) 工部局的镇压活动……………586
逮捕和审讯被日人枪伤的工人 工人代表往领顾正红遗体被捕
严禁工人为顾正红出殓游行 沪西区加派日捕和印捕 工部局捕
头下令,准备对示威群众开枪
- (三) 淞沪警察厅的镇压活动……………589
通令所属严禁工人罢工 日文《上海日报》报道警厅向日本领事汇
报取缔罢工情况 四区警署监视沪西工会活动 警厅解散沪西工
友会,工友会迁地照常办公
- 三、社会各界对日厂工人斗争的援助和反应 ……591
- (一) 各业工人急起援助……………591
杨树浦工人探视被日人残杀的阶级兄弟 上海各工会代表纷纷慰
问 参加劳大过沪之北方工会代表前来慰问 纱厂工人等捐款支
援 海员工会上海支部电段政府速向日本政府严重交涉
- (二) 学生团体的同情援助……………593
文治大学学生亲往调查,议决援助工人 全国学生总会议决援助
工人办法 上海学联积极援助工人 同胞注意!!! 大家起来反抗
东洋人呀!(传单) 文治大学学生积极援助工人 南洋大学学生
会通电声援
- (三) 国民党妇女部等团体的声援活动……………598
国民党妇女部通告参加顾正红追悼会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
为日人惨杀同胞宣言 工商学会电促段祺瑞提出严重交涉 为日
人残杀小沙渡工人告同胞(传单)
- (四) 工商学各团体联合组织日人

残杀同胞雪耻会·····	601
三十五团体发起组织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 雪耻会发表宣言,呼 吁援助工人 雪耻会电段祺瑞严重交涉 各团体踊跃加入雪耻 会,并组织沪东支部 雪耻会开第二次大会,议决募捐等四项援助 办法 日本人无故枪杀中国人,大家起来雪耻,抵制日货,募款援 助(传单) 大家急速起来雪耻(传单)	
(五) 资产阶级团体的反应和活动·····	607
宁绍台工商协会决定调查惨案情况和慰问受伤工人家属 国民对 日外交大会组织“援助内外工人委员会” 《纺织时报》的言论 商 总联合会深恐罢工“影响治安”,决定先调查再设法调解 总商会对 顾正红惨案避不表示态度 总商会委托潘冬林试探调解,遭日本 厂主拒绝而作罢	
四、工人、学生横遭工部局逮捕,	
五卅反帝示威在酝酿中·····	611
(一) 工部局逮捕工人和学生·····	611
逮捕工人和工会干部 文治大学学生为工人募捐被捕 上海大学 学生因公祭顾正红途经租界被捕 一周被捕记(施文定)	
(二) 学生会等团体奋起援助工人和被捕学生·····	619
全国学总和上海学联向捕房交涉释放学生无效 全国学总开会议 决通告各校出动演讲,唤醒民众 全国学总发表宣言,抗议帝国主 义枪杀工人、逮捕学生,号召废除不平等条约 上海学联决定继续 募捐援助工人,并援救被捕学生	
(三) 全国总工会等团体吁请全国人民	
一致援助工人斗争,投入反帝运动·····	621
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援助沪、汉、青岛各厂罢工宣言 沪西工友 俱乐部收到全国总工会及各地工会声援电和传单 北京学生联合	

会援助上海、青岛、汉口各处罢工工人宣言 松江国民外交会援助
上海工人斗争

(四) 五卅反帝示威在酝酿中……………627

上海大学等校学生代表开会酝酿上街演讲,恽代英到会指导 六
十余团体举行援救被捕学生联合会议,决定扩大宣传 南洋大学
学生会为日人惨杀华工第二次宣言 援救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
工人学生(传单) 日人惊呼学生被捕后反帝宣传更加猛烈 上海
学联决定组织演讲队到租界宣传 学生代表偕工人代表赴各校呼
吁,各校学生决于五卅停课出发讲演

伍、五卅运动的爆发……………635

一、五月三十日的反帝宣传示威和

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635

(一) 反帝示威参加者和惨案目睹者的报告与回忆……………635

上海大学学生的流血奋斗 从杀工人到杀学生,从杀学生到杀全
国人 五卅之回顾(君梦) 关于五卅惨杀案的一封信(陈复) 流
血记(星无) 被捕者的一个报告 五卅杂忆(心冷) 上海大屠杀
事件写真(光) 关于五卅反帝宣传示威的回忆(沈孟先) 参加五
卅反帝斗争的回忆(陈宝聪) 五卅反帝宣传的回忆(俞昌时) 纪
录片“五卅沪潮”拍摄经过(徐碧波)

(二) 五卅反帝示威中散发的传单……………685

上海学生市民工人反抗帝国主义大运动宣言 打倒帝国主义 学
生被捕

(三) 中外报刊对反帝示威和五卅惨案的报道……………688

1. 中文报刊……………688

《热血日报》的报道 《血潮日刊》的报道 《民国日报》的报道
《时报》的报道 《申报》的报道 《新闻报》的报道

2. 外文报刊	704
《字林西报》的报道 《大陆报》的报道 《密勒氏评论报》的报道	
(四) 五卅殉难者调查表及部分烈士传略	720
五月三十日殉难者调查表 何秉彝烈士传略 悼五卅死难烈士何秉彝同学(传单) 尹景伊烈士传略 陈虞钦烈士传略 唐良生烈士传略 陈兆长烈士传略 五卅殉难烈士墓纪念碑碑文(蔡元培)	
二、全市人民紧急行动,决定罢工罢课罢市,	
一致反抗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	729
(一) 各界团体紧急集会,发表通电,	
反抗帝国主义的屠杀	729
1. 学生会和工会	729
学生会、工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对抗办法 全国学生总会通告召开临时紧急会议 全国学生总会和上海学联急电全国各界吁请援助 各校学生促交涉员向帝国主义进行交涉 各校代表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继续上街宣传,要求各界准备“三罢”	
2. 商会及其他团体	733
商总联会和各马路商联会讨论对付办法 商总联会函请总商会和纳税华人会举行非常会议 闸北商联会、法租界商联会称与各团体一致进行,援助学生 少年宣讲团紧急会议,决定扩大宣传,警醒群众 留日学会、教职员联合会电段祺瑞,要求严重交涉	
(二) 工人学生冒雨上街宣传,并包围总商会,	
推动实现“三罢”斗争	736
工人学生继续到公共租界宣传,推动商界罢市 学生在南市游行演讲 被捕女学生的一封信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圣陶) 暴风雨——五月三十一日(沈雁冰) 在工人学生包围下,总商会被迫同意罢市 关于五月三十一日总商会会议的回忆(孙筹成) 《字	

林西报»关于总商会被迫同意罢市的报道

(三) 号召罢工罢课罢市的传单……………754

上海市民速起反抗外国人的残暴!!! 同胞们,赶快罢市罢工抵抗!
告电车、汽车、黄包车工友 告上海自来水厂和电气处工友 商界
同胞应立刻罢市响应 告中国巡捕 罢市! 罢工! 罢岗! 罢课!

第一部分

重要论著、回忆和历史文件

壹、重要论著和回忆

五卅运动

恽代英^①

五卅运动，是中国一个很伟大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发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有几种很复杂的原因：

第一件，是日本纱厂的风潮。去年（十四年）一月时^②，日本的内外棉纱厂大罢工，这个纱厂是一个很大的日本资本事业，在上海、青岛、日本内部，都有他的工厂。他在中国原来只开了一个工厂，因为欧战发生，欧洲棉纱不能运到中国，一面中国工厂发了财，一面日本内外棉纱厂亦由一个工厂，发达到十一个工厂了，在上海一隅，便有八厂之多。^③日本资本家利用中国工人的穷苦，在平时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工资，并且常常痛打辱骂。一般工人久已感觉得压迫太厉害；前年（十三年）九月，有人^④在内

① 恽代英同志当时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团中央宣传部长，主编《中国青年》。

② 此处系阴历，阳历应为二月初，下同。

③ 内外棉系统当时在上海即有十一厂之多。

④ 据一九二六年五卅周年前夕，恽代英同志在汉口作《五卅运动》演讲记录稿，此处“有人”应为“我们的同志”。

外棉纱厂附近做工人运动，工人更加觉悟。日本资本家晓得这个情形，就另外养了许多男孩子和女孩子，叫做“养成工”，预备将来学习成功的时候，就可以开除成年工人，以养成工来补充。此时工人稍有组织，要反对这种办法，所以去年一〔二〕月，工人与资本家冲突，曾大大的罢工一次。这次罢工，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因为当时的棉纱价值很高，生意又异常发达，资本家以为罢工是极不合算的，所以就让步，相当的答复工人要求，承认工会组织，解决了罢工。自从内外棉纱厂罢工胜利后，许多工厂都相继罢工，工人气焰高起来了。日本资本家很不利于这个情形，到去年四月纱市清淡之时，便极力想法破坏以前的条约，随意开除工人，苛待工人，引起工人的愤怒。这时，如照做工人运动有经验的主张，是不可以罢工的；因为以前资本家的让步，固然工人能一致的坚持，尤其是为了棉纱价值高涨，资本家急于要生产棉纱的缘故；现在棉纱市场不佳，罢工是不易胜利的。但一般工人以压迫太厉害了，又以为前次罢工胜利，希望这回可得同样结果，所以他们都要罢工。罢工的时候，日本资本家用手枪打死了工人领袖顾正红，于是群情更加愤激，参与罢工的有四万人，社会上的声援，也很热烈。惟日本资本家态度强硬，把工厂关闭，延至一个月的时期。工人因生活关系，不能坚持下去，想找人调停让步，调停的结果，日本资本家不但不允赔偿罢工期内工资，并不承认组织工会，而且运动中国官厅与各国领事施压迫手段，要工人无条件屈服。顾正红的棺材停在美国人所买的地皮上，美领事压迫迁移。许多工人领袖，看见这种紧张情形，决定开一追悼顾正红大会，以为示威。这个大会，日本纱厂工人全体参加，

合学生与各界同情者，人数将近六万人。日本资本家运动了中国官厅，派兵压迫。但兵到时，会已开止。他运动英领事帮忙，不许持小旗子在租界上成群结队的赴追悼会；于是上海大学学生拿旗子在租界上预备到小沙渡参与追悼会，被巡捕房捉了許多人；文治大学学生为工人募捐，也被捕去了许多人。这时已是五卅日前后^①，工人五六万，无捐款救济，生活很难维持，学生被捕，亦无法营救，上海的空气，非常沉寂。中国纱厂资本家虽愿意帮忙工人，然并非有什么爱国思想，不过希望日本纱厂罢工，中国纱厂的生意便可以发达，可以赚钱，但又怕日本纱厂知道，不敢用钱来实地援助，只是空口说白话的鼓励工人。这样下去，万难维持生活的工人，简直不能不因被压迫而屈服了！

第二件事，是工部局三条提案。上海的租界，一是公共租界，一是法租界，租界上所有政权，均拿在外人之手，中国人在租界上，就等于一个亡国奴。工部局是上海租界的行政机关，管理租界上一切事务；纳税人会是上海租界的立法机关，工部局如有提案，须经该会通过。工部局那时有三个提案，要想纳税人会通过。这三个提案，是：

（一）印刷附律 外人因为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运动很热烈，想要禁止各种宣传，所以限定一切印刷品均须经过工部局的审查，才准付印。所谓印刷品，包括了报章、书籍、杂志、传单、广告等等，甚至油印品都包括在内。如果不经工部局审定，便要罚款。他用这个方法来箝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手段非常厉

^① 据一九二六年五卅周年前夕恽代英同志在汉口作《五卅运动》演讲记录稿为“这时已是五月二十日前后”。

害。

(二) 增加码头捐 码头捐这个东西,是中国人纳给外国人的捐款,现在工部局以为太少,应增加若干,加重商人的负担。

(三) 交易所注册 交易所无论外国人办也好,中国人办也好,本来都应纳费到中国政府来注册立案。现在外国交易所不但不在中国政府注册,工部局反要规定中国交易所到外国工部局去注册。

这三个案子,于商人大不利,比方印刷附律规定了,不独我们宣传上有很大的妨碍,就是商务印书馆出一本书,纵然印刷好了,如受其干涉,就不能发行,这是多么麻烦呢!至增加码头捐与交易所注册,更不必说是无理的苛索。所以工部局在去、前年提出这三案的时候,上海商人便反对得很剧烈。当时纳税人会的到会人数不足,没有通过。去年四月间,工部局又提出来,商人在报上大登广告,极端反对,纳税人会亦有许多人不到会,案子仍未成立。到了五月底,工部局又坚决的要在六月二日开会通过,所以亦引起了许多商人的反抗。

这两件事,可说是五卅运动的动机。在五月二十日以后,有人提出只有一个暴动,才可以给凶横的帝国主义一个大的打击。那时全国的民气很高涨,山西一省,有一万多学生包围阎锡山的运动,各地农民蜂起,全国都表现不安的样子。上海虽在表面上是很沉寂的,而大部分感情上均甚激烈。由五月底至六月初的中间,是一个顶好暴动的时候,因为那时上海工人,正已走到没有路走了。上海的商人为了要在六月二日以前给工部局一个示威,都希望发生一个暴动。学生联合会决定了要各校学生到租

界上去游行演讲^①。租界上是不许游行演讲的。最初大家都以为学生一定不敢冒险到租界上来演讲，有些人相信至多只有三百人可以出来，要做一个大运动，是很难的。其实这种见解错了。二十九日，有些学生偕同工人到各学校里去宣传，想去激动学生群众。当时有许多学校是不容易进去的，幸而有好多学校都有国民党的区分部，介绍宣传的学生工人到校内演讲。做了一天工作，于是三十日出来的学生有了三千多个，与大家事前所揣测的，多了十倍。我们不要把革命看得太难，只要我们努力，就可以使革命成功。

除了上述表面的原因外，五卅运动有他的根本的原因。其根本的原因，大概有四个：

第一，五卅运动，不仅为日本纱厂风潮与工部局提案而发生，帝国主义者八十多年来的压迫，实为其根本原因之一。我们知道不平等条约是束缚中国人剥削中国人的工具。为什么日本资本家能够杀中国工人呢？因为日本人能够在中国开纱厂，因为有马关条约给日本人以这种权利。为什么工部局能够压迫商人呢？因为上海租界上的政权完全操在外国人手里。中国人的事，中国人不能说话，中国商人想到这里，便不能不感觉十分痛苦。八十多年来的压迫，积至五卅这一天遂爆发起来。

第二，革命宣传渐普及，亦是一种根本原因。最近几年，各种宣传的出版物很多，到处都有编印分卖的。这种出版物，虽然

^① 据一九二六年五卅周年前夕，恽代英同志在汉口作《五卅运动》演讲记录稿，此处应补充：“在二十六日，我党才决定要学生在六月二日以前到租界上做一次很大的游行演讲的示威运动。”

很多很平常,很幼稚,但宣传的功效是很大的。这里这样说,要实行国民革命,求中国人民自由平等;那里那样说,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自然,许多人脑子里都受了影响。国民党改组以后,对于宣传工作亦特别注意。前年上半年,汪精卫、胡汉民诸先生在上海许多学校里演讲,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国民革命的主义,学生很受感动。在群众大会中,对一般反动的宣传,如黄炎培等的演讲,能给他们一个详细的批驳,更有更大的影响。五卅运动所以从上海起来,而影响到各乡村和各城市的民众,尤其是青年,以起此伟大的运动,这不是偶然的事情。

第三,民众组织的发展,亦是五卅运动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在最近几年内,民众渐渐起来组织了!工人的工会,学生的学生会,都有全国统一的组织;农人的农民协会,商人的商会,亦各有组织。假使没有学生的联合会,就不能号召民众,五卅运动就无从发生。所以民众的组织,关系也非常重要。

第四,革命党的发展,更是五卅运动的一个最大的原动力。五卅运动主动或活动的,差不多完全是革命党的同志,这些人在工作上因为有了党,可以彼此协调帮助。以前国民党的组织很散漫,所以一个党的内部,各做各的,没有几个人肯一致动作。自国民党改组以后,虽不能算顶好,然组织上、纪律上,均比较的很有进步。因此,所以五卅运动能够发生。但可惜革命党的发展程度还很有限,所以五卅运动的结果,亦只能做到这一步。

到五月三十日这一天,原定计划,要各校学生到租界上来讲演。但只说到租界上讲演,租界地面很大,没有指出集中的地

方。所以虽然出来了三千多人，都是散漫的。又因定于午后一时为出发的时间，而传话的人有些错误，使一些人在上午九时便出来，没有守一定的时间，这都是没有经验，所以弄出许多缺点。先出来的人，在茶馆里空等了半天。此时，国民党的内部，有人还觉得害怕。他以为这是触犯法律的，不敢拿他们的党部为指挥机关，所以上海学生会便成了指挥机关了。午后出来的学生很多，有些聚集在最热闹的地方，如先施公司等处，扬旗高呼讲演。起初外人也不大干涉，后来闹得太利〔厉〕害了，外人觉得这样下去，八十多年的威信都要扫地以尽了，遂决意要压迫这些学生。刚刚因为学生觉得不集中起来不能威吓外人，逐渐集中于大马路一带的时候，巡捕捉了许多学生去了。一般学生说要打〔捉〕大家都去，于是都跟着巡捕走；一般商店伙友见了，亦鼓噪起来，大家都闹到老闸巡捕房去了。许多人这样环集在巡捕房门口，巡捕房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将被捉学生一并放出，一是开枪轰击这些人。如果将捉了的人又放出来，帝国主义决不会这样示弱的，所以巡捕房看见环集的人太多，就开起枪来，打死打伤了许多人。这样一来，真是一不干，二不休，明天必再来，须有更大的示威才好。但有些人怀疑，学生是不是还肯出来呢？学生联合会以为让帝国主义者打死许多人，就这样了事，是最羞辱不过的。于是决定计划，要上海所有的学生，在明天都出来。并在通告中特别声明，要群众集中在大马路宣传，如果帝国主义来干涉，就由大马路往二马路退让，但总不要解散，而且一定要仍旧回到大马路讲演；同时派许多人到商店里去宣传。五月三十日的晚间，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开会，并请学生代表报告情形，学生代表的报

告是非常激烈的,商人亦决定帮助学生,但怎样帮助,还没有办法。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是一般小商人的组织,小商人比大商人的革命性——反帝国主义性要强些。但虽有反帝国主义之心,却是很害怕的。他们以为罢市的事一定要经过总商会的通过,下命令,他们希望工人先罢工,然后他们再行罢市。到了第二天,落了些小雨,学生出来的,还是很多。大家集合在大马路,但究竟有些胆怯,很少人敢讲演。他们有些到商店里去宣传,店员要罢市,店主还是狐疑不决,总说要等总商会的命令。到了下午四时,学生群至总商会,要总商会命令罢市。当时谣言很多,不是说这里巡捕又捉了人,便是说那里帝国主义者又枪杀了人,群众愤激得发狂起来,总商会亦不得不答应罢市。这时国民党党部亦打了一个电报到各省,说上海发生惨案后,已经是学生大罢课工人大罢工商人大罢市。卅一晚,总商会的罢市通告发出来了。六月一日,上海的空气最紧张,一个警察对车夫说:“尔不要拖外人哪!如果拖了外国人,我就要罚尔。”法租界有一外国人,从黄包车跳出来,预备上电车,因为给车夫力钱太少,车夫追索。一个中国巡捕又对车夫说:“将那外国人推下来,他们是什么东西!”保卫队表示亦很热烈。公共租界中国巡捕都要罢岗反抗。各地工会学生会都组织了起来。那时印了五六十万张传单分别告工人、兵士、警察,于是全上海人都哄动起来了,这时可见宣传的效力是很大的。那一天,上海的民众几乎暴动了起来,经学生会劝止,学生会在那时很有权威。有些学校原来是反动学生所把持,反对学生联合会的,自五卅的事件发生,学生群众都要求共同联合打倒帝国主义,自动的起来反对这些反动领袖。反动

领袖说,这个事情是国民党包办的,是共产党的阴谋,不要上他们的当,群众一点不相信,反骂他们是有意捣乱。上海国民党内部,纪律不甚严密,有些党员不肯服从党的指挥。他们因为自己想在学生联合会当会长,做主任或科长,主张要改组学生联合会,好给他们有出头的机会。学生会中真正能工作的人是很少的,学生会要派人到学校里去宣传,学生会内部就没有人办事,学生会各方面稍为顾到了,工会又感觉没人办事了。另一方面,则右倾的分子非常捣乱,他们除了说国民党包办,共产党有阴谋以外,另外还有孤军社的人,在六月一日发了一种传单,是一篇“告国人”的文章,印刷得很多,满街粘贴。他们的意思,是主张什么“不合作”,劝民众不要乱闹,要学印度那位甘地的办法,讲经济绝交,不买外货,不坐外国轮船等……。还有江亢虎主张就事论事,不要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只就巡捕房打死人这回事与之交涉,要缩小范围,才能得到结果。又有陈霆锐说,这事不消乱闹,把范围弄大了,一定要依法律解决,向法庭起诉才有结果。一般学生虽然受了一点革命的宣传,现在听了这般糊涂的论调,也觉得以前提的口号太高,恐怕不能做到,没有结果。他们至少也主张不要说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只好专对英日,不要得罪了美德及其他各国。有些国民党员不但自己不能宣传人家,纠正这些错误思想,他们反被人家宣传了,跟着人家乱讲。这时革命的宣传力甚小,反动的宣传很利〔厉〕害,党已不能有灵敏的指挥,党员又不能完全守纪律,这种工作的困难与缺点,发生了许多不好的结果。幸而此时有些国民党员与反动分子究竟联合不起来,他们感觉党团会议之必要,成立了党团的组织。国

民党员在学生会中虽没有很强有力的领袖，但有了党团的作用还可以领导许多学生，拉拢中立分子，与反动势力奋斗。工会方面有三十余万工人罢工，但要到工人群众去宣传，则感觉缺少人才，且没有工人运动的经验。国民党员亦不常听见政治报告，因之就不明了各方情形，不晓得怎样决定他们的工作方法，他们去演讲，亦不能动人听闻。后来外面商量好了，对帝国主义提出十七条要求，如收回会审官厅，赔偿罢工工人损失，不许外人越界筑路等等。这已得工会、学生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之赞成，但总商会不表赞成，只允站在从中调停的地位。那时学生、工人、小商人是一致的，组织了工商学联合会，只有总商会不肯与他们合作。六月一日、二日、三日这几天，帝国主义者常有击杀中国人的事发生，一般人非常愤激。孙传芳亦打一个电报，大意要学生努力，他愿以武力为后盾。张学良也打一个电报，并汇洋两千元捐与学生会。过几天，张学良亲自带兵来了，租界上本是不许中国军队通过的，张作霖的兵却都通过了租界，一般学生很高兴，以为收回租界是有希望的事了！其实，张学良一方对学生表示好意，一方却正和英国办交涉，以图妥协。有一次，学生会派代表见张学良，他很客气的说：“尔们是爱国的，我当学生时也很热烈的参加爱国运动，不过现在地位不同了，不能象尔们一样了！”学生代表听了张学良的话，喜欢得了不得。我告诉他们说，张学良的话是不错的，他现在地位不同了，他现在到底站在什么地位呢？是站在帝国主义走狗的地位，所以他不但不能帮助学生爱国，而且有一天还要压迫学生爱国运动的。他们觉得我这些话太过分了，但是没有好久，张学良的鬼面孔便揭穿了，学生

会再派代表去见他，他就说：“不要乱闹，我自有办法了”。这时候，岳维峻、段祺瑞、冯玉祥通同打电报，汇捐款；但除了冯玉祥真有点民族思想以外，其余都是假的、有作用的。那时奉系压迫他们正是十分厉害，所以他们要提高对外空气，使奉系不致还在此压迫他们，决不是真正有什么爱国的意思。所以段祺瑞派了一个人到上海来调查，民众很想请他出来讲几句话，他不但不敢出来，反住在租界内，以英国巡捕守卫。那时总商会既不赞成原来的十七条，他们以为太高，恐怕做不到，而且怕伤了外国人的感情，于是自己修改做十三条，好象对外人表示减价的样子，其实原提十七条固然做不到，尔就减低一点又能够做得到吗？学生方面也发生了不好的表现，因为学生家中的父母，非常害怕他们子弟在外面遇了危险，就纷纷来信，假说父亲母亲病重垂危，要他们赶快回去。六一、六二、六三，这几天学生是很勇猛的。到了以后，有些亦害怕起来，于是趁此就跑回去了。在五卅运动中，帝国主义者想了一个方法，出一种《诚言》报，造许多谣言欺骗中国人，但没有什么效果。然而到了三个礼拜以后，商人罢市既久，发生了一个开市的问题，以为长久罢市还是自己的损失，所以提出缩短战线的口号来。并且说罢工要款项来接济才能维持，不如商人开市，收一部分利润来援助工人；这般论调，自然容易鼓动一般生性比较妥协的人。那时罢市的只是限于公共租界。本来法租界与中国界的商人都已决定罢市的，但一些不明白的人，乃至学生会代表，以为不要得罪法国或中国官厅，劝他们不要罢市，不知法租界与中国界能罢市尚可引起法国及中国官厅与英国的交涉，他们自动要罢市，何必反去劝止呢？我们是

主张继续罢市的，以为开市并非缩短战线，而是减少我们的势力，解散一部分我们的队伍。但事实上已有大部分商人要开市，想再延长几天，亦是事实上不可能的事，结果遂宣布开市。但开市有两个条件，一是禁止买卖英货，一是接济罢工工人，要商人登报表明，但后来虽学生查货甚严，商人因而不买卖英货，至接济罢工工人一句话，则完全是空谈。开市以后，又发生开工的问题，有一般人主张专力对英，所以说罢工要有范围，于是他们硬要日本工厂工人复工，等到日厂工人复工了，英国工厂工人亦动摇起来，也慢慢地开了工了。学校里的学生，已有一部分回家，许多教职员也劝学生回家，在他们脑子里，以为让他们在上海闹坏学风，是不好的，所以特别准假，或提前放假。于是结果，剩了少数学生会的代表，他们只可代表自己，不能代表群众了。这样一来，各项运动既没有学生参加，商人又被煽惑退后，仅仅剩下许多工人在那里孤军奋斗！可是，工人生活困难，各方捐款不能接济，买办阶级与军阀勾结起来压迫他们。一般反动学者，也极力宣传不利于他们的论调，应付他们是很困难的。到后来五卅运动只剩下一件事，就是与英国经济绝交。一般学生检查仇货很勇敢、很热心，但是亦有些毛病，有些人是乱七八糟的，比方扣留水果，他们自己拿来吃了，不能久贮的货物，他们任其腐败，有些货物亦不管是否确系英货，随意扣留。并且学生会无专人办事，商人有事要接头，感觉非常麻烦，自然很不高兴。有些学生会的职员，喜欢坐汽车，吃西餐，尤其是爱与女学生讲交际，更引起一般无聊腐败的人的评议。加之学生内部又常常发生问题，如查账、争位置等，以后学生会力量亦成有限了。张学良既与英国

妥协了，便解散了上海总工会，开始向民众进攻。原来醒狮社、孤军社、民铎社等组织一个《公理日报》，内有国民党员参加，后来主持该报之权，归到国民党员手中^①，曾琦等便宁告退，为拆台之计。又有些共产党员组织了《热血日报》，有些国民党员组织了《民族报》，但因帝国主义军阀压迫日甚，都继续停了版。在全国说，开始大家都热烈的做救国运动，到后来，都渐渐的沉寂下去了！五卅运动所得的结果，有好的坏的两方面。先说好的方面，可以指出两点：

（一）使反帝国主义的潮流高涨 五卅以前，中国还有好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要反对帝国主义，就是一般有知识的学生，也不十分明白反帝国主义的意义。因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已有八十多年，中国人受压迫惯了；而且庚子之役，对于反抗帝国主义的人，又曾施加了无情的惩戒，所以中国人对帝国主义不独不敢反对，还要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的话，以为自己安心忍受帝国主义压迫之解嘲语。就是革命党，也是一样的懦弱心理。同盟会党纲第六条，还要说要求列强帮助中国革命这样不通的话，辛亥时亦最注意保护外国人，尊重外国人条约，简直同段祺瑞的崇信外国差不多，自国民党改组后，才提出反帝国主义的口号来，经过一番宣传，少数人才知道应该反对帝国主义。但经过五卅运动以后，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就普及于全国，大多数人都知道了。不过呢，仍然还有不少误解的地

^① 据一九二六年五卅周年前夕，恽代英同志在汉口作《五卅运动》演讲记录稿，此处应补充：“醒狮社、孤军社、民铎社等组织一个《公理日报》，事为我们发觉，沈雁冰诸同志均参加，结果该报归在我们手中。”

方,有些人不知帝国主义为何物,见了外国人就要反对,又如国家主义派不肯说反对帝国主义,要外抗强权,这都是不对的。但总而言之,今天再有人说要保护外国人和尊重外国条约,什么人都知道他是反动派了。

(二) 使民众的力量增大 五卅以前的工人、学生、商人等,大部分都没有组织起来。五卅运动后,各地工人、学生很多都组织起来了,商人亦渐知引他们的组织来参加反抗帝国主义,且有工学联合组织,这种民众的力量影响政治方面的运动,使军阀内部分化。那时,国民军通电对英宣战,便想站在民众方面得着民众的赞助。反奉战争发生,直系孙传芳痛骂张作霖压迫民众与摧残爱国运动,亦是表面的接近民众,利用民众去打击张作霖。若是没有民众力量,他们不会这样做的。后来国民军同情反奉,郭松龄发生倒戈的事情,亦是民众力量暗示的结果,可惜郭松龄为帝国主义所败,民众的革命潮流亦渐渐低落,现在国民军也失败了! 国民军失败的原因,固然由于帝国主义之联合进攻,而国民军内部不肯显然站在民众一方面,亦其实主因;比方冯玉祥不肯表明态度,二军与民众反有恶感,当然得他们失败的结果。但五卅运动后,民众已在政治上成功了一部分的力量了。

再说坏的方面亦有一点,便是过早的促成了阶级之分化。阶级分化是五卅运动一个最大的影响。那时学生回家了,商人软化了,只留下工人孤军奋斗。孤军社、醒狮社、民铎社讲的和平理想与江亢虎主张的缩小范围,丁文江的主张唱低调,戴季陶主张的单独对英,影响很大。学生本来多是专于读书,不肯参加实际运动,即参加各种运动,亦是爱出风头的。他们每每因嫉妒反

对作工作的革命党员的原故，跑到孤军社等一般人那边去。大商人、工人、学生、小商人各为其利益，惹起了感情的冲突；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又乘机破坏革命势力的联合，共产派和国民党左派分子也许不免有些左倾幼稚的地方，于是各阶级的分化很利〔厉〕害。结果，资产阶级有好些都离开了工人，附和帝国主义或买办阶级所唱的反赤论调，造成了一个反动的潮流，直至北伐胜利，这种反动潮流始被民众革命潮流所压倒。

最后，我们要说，五卅运动所得的教训。我们可以分三点讲：

（一）革命不要看得太容易，也不要看得太难了。五卅运动是全国数百万人共同联合起来的一件大运动，在普通的人一定以为是一件顶难的事情，但是有了相当的宣传和组织，并得到了相当的机会，实际是很容易号召起来的。但是，因为五卅以前，革命的宣传和组织都还不见得很好，所以亦只能够唤起一个这样大的运动，并且只能做到这一步田地，如果将来能够有更进步的组织和宣传，一定收效可以更大的！国民党那时在上海学生工人中，有区分部的组织，但上海八十几个学校，仅有二十几个学校有区分部，这可以表现组织力的薄弱；党内的宣传品，刺激性亦太少，并且只散布了一二十万份三民主义。在四万万万人中，共产党对于宣传虽比较努力，亦还不能达到深入农工学生群众的目的，这可以表现宣传力的薄弱。然而这样的组织、宣传的力量，居然唤起了两百万人的五卅运动，虽不久为反动势力压迫而消沉下去了，这亦很可以使我们今后注意对于宣传和组织的工作，更要加上一番特别的努力才好。

（二）在革命运动中，群众容易发生左右派的空想，这种空

想,于革命运动的影响甚大,若非很好的宣传工作,随时打破这种空想,每每使得这种运动走入错误的道路,以至于失败。在五卅运动中,发生左右派的空想甚多,大略可举五项:

A. 和平解决说 如果能够和平解决,固然很好的,但上海杀了人,汉口广州等处都杀了人,帝国主义者从来不与中国人讲点公理,你尽管说和平解决,谁替你来和平解决呢?

B. 法律解决说 法律是帝国主义和军阀拿来压迫人民的工具,比方租界上的法律,就不准去游行演讲,五卅在租界上游行演讲,便是犯法的,要靠法律解决,帝国主义者先便要办我们犯法罢了。

C. 外交手段解决说 北京派来的外交官,住在租界上不肯出来,这已可见中国的外交程度,靠这种人办外交,能够解决什么事呢?调查的结果没有在上海公布,后来法国调查员才拿调查结果公布出来,是说英国人不对,英国不肯承认。他们是这样不讲公理,还讲什么外交呢?

D. 联络帝国主义打倒司法解决帝国主义说 这个主张,就是要联络日美法意等国,专一对付英国。但是五卅的时候,美国占据了上海大学,意大利在上海亦故意杀人,他们与英国帝国主义有什么分别?我们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反可以使其他帝国主义站开,不敢与英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专说反对英帝国主义,则美日等国反可以大胆的压迫中国,所以他们反转帮助英国来压迫中国了。

E. 经济绝交说 这是孤军社和国家主义派的主张,就是要不买英货,不要工人替英厂做工,在经济上完全与英国脱离关

系。自然经济绝交并非全无用，但这种作用总是暂时的而非永久的，因为关税问题不解决，中国工业不发达，当真经济绝交，不但是工人总〔不〕在工厂中做工，不能维持生活，而且事实上中国已〔依〕然需要许多工业品，经济绝交，迟早总是维持不住的。所以从前与日本经济绝交完全没有结果，现在专想靠经济绝交来对付英帝国主义，这是何等靠不住呢？

再说左的空想，也有三项：

A. 暗杀外人说 他们以为外国人杀了我国的人，我们也便可以杀外国人。他们说我们天天开会游行演讲，是没有办法的，只有用手枪炸弹去杀工部局的外国人最好。我们虽不绝对反对暗杀，但暗杀只可为两军对垒交战时一种手段，如果没有预备交战，仅仅想暗杀一二个外国人，不但是没有什么作用而且还会发生不好的影响。因为一般商人最怕杀了外国人，以为象这样便会惹出大祸；学生亦有许多不赞成这样办的。倘若当真的杀了外国人，五卅运动更失败的快了！有些人因为朝鲜出了一个暗杀的烈士安重根，每每引为美谈。其实安重根虽然暗杀了日本的伊藤博文，但是朝鲜还是亡国，可想见没有组织的民众，专靠暗杀手段，是不会成功什么事情的。

B. 练学生军说 他们以为要学生军是预备与外国宣战，学生军是不是能够打仗，是一个问题。要说练军队打仗，中国的兵很多，为什么不可以打仗，还要练学生军呢？若是养兵不能打仗，又有什么把握可以说学生军便可以打仗呢？而且既说练学生军，便是将学生关起门来训练，使许多能够做民众中宣传工作的人都关到学校里去，那么，外面的民众，反转来一点也不懂得

反帝国主义的意义了！

C. 对英宣战说 这种主张的人，以为我们对英国帝国主义宁可玉碎，不可瓦全，所以他们要与英国背城借一。对英宣战，如果只是为一种空气的作用，自然是可以的，若真是梦想要与英国宣战，到底叫谁去战呢？假令我们要冯玉祥去战，张作霖会在后面打冯玉祥，又怎样办呢？

以上各派的空想，都是妨碍革命，叫人家认不清正当的工作是什么的。我们的真正的工作在于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不注意这一点，无论是右倾或左倾，都是不好的。

(三) 各阶级革命性，在五卅运动中，完全的表现出来。那时张学良在上海与英国勾结，加民众以压迫的手段；总商会修正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条件，要居于调停的地位，这可见军阀与买办阶级是反革命的。不过张学良等以前他打过电报并汇了捐款；总商会也提出了自己的十三条来装饰面子，所以虽然他们是反革命的，只要有革命民众监督，亦是不敢绝对反对“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小商人比较能革命，但他们没有组织力，如革命潮流低落时，小商人就跑到大商人一边去了。学生在平时是很散漫而且要闹意见的，到了革命空气浓厚的时候，就一致起来，不管什么国民党“包办”亦好，什么共产党“阴谋”亦好，他们总是拥护学生会。纵然有少数反革命领袖造谣，也不会有用的。但是，学生终究喜出风头，他们这种热度也不能长久维持，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他们若没有好的组织，尤其是若没有党来领导他们，便很容易弄糟。工人是比较学生好些的。我不是说工人道德和知识比学生好，只是工人的生活困苦，所以他们自然要起来革命。虽然

亦有少数工人和学生犯同样的毛病,但大多数工人都是诚实的,直率的,很守纪律的。在五卅运动中,开始有许多学生,到后来各种游行运动,满目所见的都是工人,可见工人在革命中的力量。有人说要知识阶级领导工人革命,这亦许是对的。但是,什么时候知识分子才出来领导工人革命呢?坐在屋里怕危险,怕困难,而且象梁启超、张季直,申报主笔、时事新报主笔,这些学者,他们做的文章,总是说学生工人胡闹,他们这些人也会来领导工人革命么?外国人很高兴中国有这些学者,谓他们是高等华人,我们也尽可让他们去当高等华人。因为普通人都不好象他们一样,若是都象他们一样,中国真要灭种亡国了!中国的革命运动,一定要特别注重工人、农人、学生、小商人,但是亦要尽力与大商人、大学者结成联合战线。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认清楚那种力量是靠得住的,那种力量是靠不住的,一方面要拉拢靠不住的力量,尽力使他们帮助革命,不要妨碍破坏革命。

上述经验,在以后比五卅更大的运动中,是很可以作工作上的参考资料的。五卅惨案至今日尚未解决,恐怕是不能解决的。帝国主义者很想以七万五千元来解决此案,我们是不肯承认的。为什么不肯承认呢?我们要留着五卅这个纪念,靠着每年的五卅纪念,使全国民众一致的觉悟起来,才能争得我们的最后的胜利。那时候,不平等条约可以废除,租界可以收回,中国人可以得到自由平等的地位,这比七万五千元强得多了!我们的同志,要准备第二个更大的五卅运动的工作,一直做到中国全民族解放,所以我们大家要一致努力!

(恽代英:《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第七讲,上海泰东图书局1927年出版)

“五卅”运动

邓中夏

中国大革命高潮之到来

“五卅”运动是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起端。从“五卅”运动起，中国工人阶级从痛苦和流血的经验中，不仅悟到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而且悟到中国经济和国际政治——喋血的帝国主义政治的关系。中国工人阶级从此不止回旋于日常生活的经济要求，或普通自由的政治要求，而已走上了革命的大道；并且事实上，它在这个大潮流中做了革命的中轴和重心。

帝国主义的军队所给予中国工人的教训，正象一九〇五年被鲜血所喷溅的尼古拉罗曼诺夫皇朝反动军队所给予俄国工人的教训一样，所以中国工人再不愿意安分了，造反了，而人民的喊声：“打倒帝国主义”，也愈喊愈响了。

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本不自今日始，早在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联军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〇〇年的八国联军战争，已经不知屠杀了中国若干万人。中国人民在无数血泊中被帝国主义降住了。但是中国被压迫民众始终与帝国主义成对抗形势；这种对抗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愈进展而愈加紧。一直到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民众自最受压迫的劳动阶级，以至幼稚的工业资产阶级，都或多或少的形成了反

帝国主义的心理和思想。最近一二年来,国民运动猛进,反帝国主义的喊声几乎普遍全国各地,而这种反抗的表示,与日俱进的要达到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短兵相接的阵势,这已非帝国主义的惯技如“亲善”、“和平”、“正义”、“文明”等欺骗口号所能麻醉了。特别是新兴的无产阶级,更成了帝国主义当前最厉害的大敌。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所了然的事,于是帝国主义不能不果断的采用屠杀政策了。

“五卅”屠杀的直接导火线

帝国主义与中国被压迫民众之流血接战已有一触即发之势。爆发此次屠杀直接的导火线,自然也是因帝国主义凶暴压迫而起。一九二五年开始以来,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因亲日卖国派段祺瑞政府上台,越发在中国横行无忌。二月间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已先中国各被压迫阶级发难反抗,举行四万余人的大罢工,接着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也罢工反抗。对中国工人这种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已断然采取屠杀政策。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开枪杀死工人顾正红,并杀伤十余人,二十八日,青岛海军陆战队得日本政府命令枪杀八人,并杀伤拘捕无数^①。因此引起中国被压迫各阶级的民族义愤。这便是“五卅”惨案的直接导火线。

首先代表此种民族义愤而起来援助工人的就是学生。五月二十一日,上海文治大学学生为救济死伤工人募捐,被租界巡捕

^① 据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民国大学出版的《五卅惨案调查记》所载:死者八人,受伤者十六人,被拘捕者七十五人。

捕去数人。二十二日上海大学学生赴顾正红追悼会，途中又捕去数人。于是激动上海各学校学生的愤怒，这便是五月三十日各校学生出发讲演之直接的动机。

同时，帝国主义还有一种压迫，兼能危害中国的商人阶级，即所谓上海“纳税外人会”要于六月二日通过工部局提出的“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取缔童工法案”等四案，反对此四案，亦是各校学生出发演讲之题目及宣传的口号，因而引起一般市民群众热烈的同情。

在这样全上海市反抗帝国主义的紧张空气之下，为消弭这种空气，为镇压这班“不安分”分子的反抗，列强帝国主义断然采取屠杀政策，决不是一件偶然的意外的事。

血肉横飞的“五卅”屠杀

五月三十日，上午各校学生二千余人分头到公共租界各繁盛马路散发“打倒帝国主义”传单，讲演顾正红被杀及学生被捕的事，并反对工部局的四提案。人数以日本领事署、会审公廨、南京路口等处为多。上午南洋大学学生出发讲演，当即被捕百余人，至下午二时即释放。各处讲演队闻南洋大学学生被捕信，乃逐渐集中在南京路一带讲演，特别以反对工部局四提案及越界筑路为宣传的主体，并提“上海人的上海”口号。到下午，讲演的学生愈集愈多，听众亦愈聚愈多，巡捕又开始捕人。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一处已拘留学生一百多在內。于是愈促起学生及听众的激昂，而聚于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者。至三时许，聚集捕

房门首之群众将近万人。三时四十五分钟，突有一西捕向空开一枪，接着印捕即平放一排枪，华捕向空放一排枪，登〔顿〕时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群众大乱四散。这一日计死者十三人，伤重者数十人，被捕者五十三人。上海大学学生何秉彝，同济大学学生尹景伊二同志死于是役，是谓“五卅”屠杀。

霹雳一声的罢工罢市罢课

南京路屠杀发生以后，上海全埠震动了。当晚各社会团体纷纷开紧急会议，讨论对此惨案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决定将这次运动扩大到各阶级去，结成各阶级统一战线，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一致向帝国主义进攻。当由党组织行动委员会，并派遣同志到各社会团体活动鼓吹。第二日（三十一日），女工和学生千余人到南京路散发罢市传单，此时南京路已入严重状态，此时虽大雨滂沱，但女工学生仍然奔走呼号，毫无所惧。又复被捕多人。本拟由南京路先行罢市，造成严重空气，逼迫总商会赞成罢市，但至下午四时，南京路罢市仍未成功。适闻总商会与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在天后宫开会，讨论是否罢市问题。群众遂赶赴天后宫。总商会为大资产阶级的组织，其分子为大商业资本家、银行资本家、工业资本家与买办等，加入资格以财产为标准。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为中小商人组织，每一马路或数马路的中小商店组织各马路的商界联合会，再联合成为总会；其中亦有大资本家在内，但为数较少。屠杀事起，受害者当中亦有小商人和店伙，于是各马路的商界联合会纷纷投函联合总会，激

烈地表示愿意牺牲,愿意罢市为学生后盾,于是各马路商界联合会通过六月一日罢市。在天后宫开会时,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主张罢市,总商会反对罢市。中小商人说:“学生为反对工部局四提案而被杀,难道是过激?如这也是过激,那末只有亡国便不是过激了。”正相持不决之际,工人学生群众适到,当天后宫开市民大会,议决总罢市、总罢课、总罢工命令,要求总商会签字,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站在工人和学生一边,共同胁迫总商会非罢市不可。总商会副会长避不敢出(正会长虞洽卿已赴京),群众促之再三,始出来说:“个人不敢赞成罢市,须候总商会开董事会决定。”群众异常激昂,再四胁迫,在此严重空气下,总商会副会长方签字总罢市命令。于是六月一日,霹雳一声,总罢市罢课罢工便实现了。

上海总工会乘时崛起

自二月日本纱厂罢工以后,上海工会虽茁然而生,然而仍不过二十来个雏形组织,人数总共不到两万,其主观力量之薄弱,概可想见。屠杀事起,共产党知非有一总工会不足以指挥偌大的群众,遂根据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决议,决定乘时组织上海总工会。屠杀之第二日(五月三十一日)晚,各工会开联席大会,通过成立上海总工会。于是光芒万丈的明星——上海总工会,便于当晚出现了。成立后,第一道命令,便是宣布六月一日上海总罢工。后在总罢工中立时组织各工厂工会,至六月五日加入上海总工会的已有一百七十余个工会,二十余万罢工工人,皆集中在它的领导之下。而上海总工会的基础,就建立在这二十余万罢

工工人的上面。

帝国主义继续屠杀

六月一日罢市罢课罢工起。自上午七时，南京路工人学生及其他市民极多，发传单者，演讲者，到处都是。至十时许，所谓万国商团和西捕印捕各临阵备战，先以自来水注射群众，至十时十分遂开枪。这日死伤比前更多，状况尤惨。二次屠杀后，南京路最繁盛街市，完全陷于战争状态。机关枪、铁甲炮车、马队占据各要害，一切车辆及行人，概不能通过。

二日，屠杀案到处不断地发生。南京路比前更加戒严。上午小沙渡纱厂工人被日本人协同西捕枪杀四人，沉尸河底。杨树浦码头工人亦被英人打杀三人，拘捕数人。帝国主义会审公廨复于是日开审三十日被捕的学生，公廨周围，外兵把守，异常周密。下午六时，帝国主义又用机关枪步枪攻打新世界游艺场，弹如连珠，历时二十分钟之久，死伤无数，被捕三百余人。在新闻桥又有西捕印捕携机关枪向中国保卫团示威，欲拘捕罢工之电车工人等事件。

三日，意美海军陆战队登岸，把守电气、自来水等重要工厂。其他各国军舰亦陆续来到，这日上午杨树浦又发生大屠杀。下午新世界被万国商团占领去了。海军陆战队登岸后，杨树浦完全变成恐怖世界，“文明”的帝国主义军队，遇见学生或工人装束的便打伤或杀死。杨树浦是日死四人，重伤六人，轻伤不计其数。是日并有美兵武装侵入华界寻衅。

四日,屠杀仍然继续下去。外舰来上海者日见增多,计至本目为止,各国兵舰共有十三艘,其中属于英国的二艘,属于美国的三艘,属于法国的三艘,属于日本的三艘,属于其他国家的还有二艘。陆战队全体登岸。杨树浦西捕复有开放排枪轰击罢工工人事情。美日陆战队有多人带枪入华界捣乱。英国商团和印捕亦有多人侵入华界。英界工部局下令通缉瞿秋白同志等。四日下午陆战队包围上海大学没收一切文件,驱逐学生出校,腾出为陆战队驻扎。此种暴行,后复施行于大夏、同德、南洋〔方〕等几个大学校。

五日晚,万国商团突然下令检查所有过路的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乘车或步行,在枪刺威吓之下,尽被驱入老闸巡捕房严行搜索,一千余人鹄立露天细雨之下数小时,结果西捕搜查无所得,方释出。当时并有一汽车夫行路稍缓,被商团刺伤,奄奄一息。

八日搜查旅馆,有河南来沪旅行之学生十五人在旅馆被捕。此时外舰已增至二十六艘,其中属于美国的十三艘,属于日本的五艘,属于英国的四艘,属于法国的三艘,属于意国的一艘。

十二日,西捕在北四川路华界拘捕学生,调来铁甲炮车两辆,英日水兵一二百名,几与中国保卫团开战。

总而言之,在此时期中,开枪日必数起,死伤时有所闻,上海成了帝国主义消闲寻欢的猎场^①。

^① 原注 据一九二五年七月北京晨报出版部出版的《五卅痛史》所载:自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十日,“总计十二日之内,英日人在上海九次枪杀我国人,当场立毙及因伤毙命者,凡六十余人,重伤者凡七十余人,轻伤者则不计其数。”正式列入上海学生法律委员会及上海地方检察厅调制的死伤调查表里的是死者三十二人,伤者五十七人。

反抗运动继续飞涨

与帝国主义的继续屠杀成正比例的，便是中国被压迫民众反抗运动的继续飞涨。六月一日起，公共租界全体罢市，法租界亦于五日罢市一天。各商店外粘贴许多标语和旗帜，店伙运动行人不坐电车。只南京路大商店有数家还开市，直至流血重演之后，才完全关门。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甚至不遵从总商会的决议，于全市停业声中，依然开门营业，只写一封信给工部局轻轻抗议而已，一直到工部局置此抗议信不理，及“字林西报”以滑稽口吻加以嘲笑之后，才于三日起罢市。

学生群众在此次运动中极其热烈参加，上海各学校自六月一日起无不罢课，甚至圣约翰大学（该校最顽固最反动）的学生，此次也激起义愤，与美国校长冲突，脱离学校，投入此次风潮，其他的学校便可想而知了。

反抗最有力量而最坚决的当然要算工人。自三十一日上海总工会宣布总罢工后，各工厂立即陆续罢工，特别是三十一日那天，罢工尤其突然高涨，已有十余万人；至五日便增至二十余万，其中最主要的是纱厂、电气、海员、码头工人。甚至于公共租界所用之华捕相率罢岗的也在半数以上。

上海人民八十一年在帝国主义高压之下过生活，此时他们不能再忍受了，于是在腥风血雨中与帝国主义对垒鏖战。

为各界行动一致起见，于是上海总工会向总商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四大团体提议共

同组织“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为此次运动的总指挥机关。总商会拒绝参加，理由是：“此次英人屠杀，凡属同胞，谁不发指？但各走极端，势必弄成僵局，本会今日之不加入，即为将来调和之余地。”大资产阶级开首竟以调停人第三者自居，其无耻反动，已可概见。但其余团体不管总商会加入与否，仍然热烈的成立“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每大团体各出代表六人共同组织之。不用说上海总工会是此会的灵魂。自有总指挥机关而后，于是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对抗形势愈形完成。

七日，“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提出条件，计先决条件四，正式条件十三(见后)。北京政府见风潮扩大，特派专员到沪调查，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特于十一日召集市民大会，邀请政府特派员及交涉员宣布意见。那日到会者，各工厂工人、各马路商人、各学校学生近二十万人。政府特派员及交涉员都规避不到，群众一致对外交官不满，散会后，并在华界游行示威，民气激烈异常。

全国各地的狂飙运动

事变的进展是很迅速的，不满一两个星期，上海南京路的枪声已震动全国各重要都会，直到最偏僻的城市与乡村。全国各地，特别是工人，都已纷纷起来参加这一反帝国主义运动。北京、汉口、长沙、九江、南京、济南、福州、青岛、天津、开封、郑州、重庆、镇江、南昌、汕头、杭州、广州……等等都发生大大小小罢市罢课罢工，而“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军”，“经济绝交”，“为死难同胞报仇”的呼声，到

处都可以在示威游行中听见。河南、广东的农民，也起来加入此运动。这些事实书不胜书，这里只能简单的说到几个大的地方。

北京。三日，北京学生便举行五万余人的示威运动，队伍行至东交民巷（即各国使馆所在地，自筑城堡，俨然另成一国，界内行政，不用说中国政府不能过问）时，帝国主义军警严阵以待，不许群众通过，以水龙射击群众，以骑兵冲散群众，并鸣枪示威以恐吓群众，群众只得退去。自那天起，界口密布刺铁线网，加紧戒严，如临大敌。十日，北京又举行国民大会，参加者突过二十万人。北京商会亦宣言与英日经济绝交。后来八月间，英国公使馆及兵营中的华人侍役，还宣布罢工，表示反抗。

南京。南京学生自得上海屠杀消息后，首先罢课。五日，英国和记蛋厂工人宣布罢工，坚持至七月十七日方有条件的复工；在罢工中还发生流血事情。和记蛋厂罢工是南京反帝国主义运动最壮烈的一举，给予各地影响不少。五日那一天，商人亦罢市。

汉口。继上海青岛大屠杀而起的是汉口大屠杀。武汉学生亦于二日起即罢课，四出讲演，劝导商人罢市。有数业工人首先罢工。但直系军阀萧耀南，极力压迫，提前放暑假，遣散学生回家。工人方面，积极准备于六月十三日举行大示威运动，十四日罢工。适十日下午英租界码头工人与太古轮船公司职员，发生冲突，十一日晚，汉口英领事调集海军陆战队武装登岸，用机关枪向群众轰击数百余响，死者无数，租界熄灭电灯，将工人尸首沉于河底以灭迹，据知者已死十余人，伤者不计其

数^①。屠杀发生后,萧耀南当即宣布紧急戒严,于是工人总罢工之计划不能实行。

广州。六月一日,广州工人得上海消息后,于二日举行示威大会。其时广州将有反刘杨战争爆发,故工人准备于帮助革命政府削平反革命刘杨的战事以后,立即罢工。十二日刘杨扑灭。十九日省港大罢工发生。二十三日工人农民兵士学生举行大示威运动,行至沙基,遭沙面英法帝国主义军队开枪扫射,当场死者五十余人,伤者无数,是谓“沙基惨案”。于是便促起广州人民愤怒,厉行抵抗香港,省港大罢工延续到二年多之久。

湖南。六月二日,长沙工人学生便举行二万余人的大示威运动,当场成立“雪耻会”。五日,又举行十万以上的大示威运动。军阀赵恒惕宣布戒严,派兵搜索群众领袖,并布告“宣传过激者斩,煽惑军心者斩”,于是工人学生不能活动。水口山铅矿于十七日停工示威,矿长下令军警开枪轰击,伤者十余人,工人代表被捕者二十余人,赵恒惕电令“就地正法”。

其他各地,镇江、九江、重庆,皆有帝国主义开枪屠杀情事。至于反帝国主义运动,无处不热烈进行,但天津为奉系军阀李景林压迫,山东为奉系军阀张宗昌压迫,张宗昌并于六月二十六日到青岛用铁血摧残日本纱厂工人,并杀害工人领袖李慰农同志与《公民报》记者胡信之。其他各地亦大致相仿。

^① 原注 据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民国大学出版的《五卅惨案调查记》所载:据当时地方警察厅和地方检察厅两厅的调查:死者十名,受伤者二十一名。后据学生会调查:阳逻捞获被枪杀之尸体二十五具,连同前十名共死约近四十人。

帝国主义者的策略

“五卅”屠杀，主犯虽是英国帝国主义，然而其他帝国主义，其残暴凶横并不减于英国；日本帝国主义屠杀纱厂工人，为“五卅”案之导火线，不待说了；若美国、意大利事实上派遣陆战队上岸与英国共同屠杀上海人民；法国则在广州与英国共同屠杀广州人民。但各帝国主义列强，在外交上当上海三罢实现之后，颇异其趣。除英国始终强硬外，日本欲卸责于英人而表示愿单独解决顾正红案，它说：“日纱罢工与英捕残杀，截然两事。”它并且还欲藉此风潮使中国人民抵制英货，使自己取得英货市场的地位。美国仍不放弃其向来面子上的卖好市恩政策，它说：“美兵在公共租界杀人，也出于英人指挥，与美无干。”它在会审公廨上还说什么“本领事历任七载，中美感情极为融洽”等鬼话。法国因自有租界，不愿替人受罪，表面上表同情于中国人民，它还说“英人此举乃强暴行为”。法租界罢市一日亦不禁止，开市后法领事更向中国商界大唱“中法亲善”。意大利在中国没有多大经济利益，自然随口乐得说句“愿为调人”的风凉话。

帝国主义在上海连日的屠杀，愈演愈凶，民众反抗，亦愈激愈厉。北京政府不得不向各国公使团提出抗议，敷衍场面。帝国主义列强于是有“六国调查沪案委员会”的组织（英、美、日、法、意与比）。同赴上海调查“五卅”案真相。调查结果，毫无疑义是英捕屠杀，但英国委员一味无理的强硬，因此各国委员大受一场没趣，扫兴回京，结果亦秘而不宣。只法国委员捣了一个小蛋，单

独将沪案调查所得宣布了。

当时各帝国主义在国际的关系是这样的：法国在东欧，在小亚细亚，和英国的利益简直不能并立；美国自英国保守党执政，道威斯计划受了打击，亦与英有裂痕；日本自英日同盟取消后，与英国冲突日多。这些强盗，特别在中国问题上彼此利益的冲突尤甚。“五卅”事变起，美、法、日本帝国主义的确想乘机挟制英国一下，且因此笼络中国人心。所以“五卅”事变后一个月，英国都在孤立的状态中。

但英国帝国主义者的外交手腕是有名的敏捷的，一是竭力宣传中国此次运动为“排外”、“赤化”，并以英日同盟恫吓美国，务造成英、日、美三国联合对华的局面；二是鼓吹武力对华，特别进占广东，以恫吓中国；三是主张司法调查，延宕时间，以待中国国民疲惫，再图有利的结果；四是勾结奉系军阀扑灭中国国民运动；五是以关税会议诱惑中国军阀及资产阶级；六是以租界停给中国工厂电气以挟持中国资产阶级；七是利用工贼破坏罢工运动。

果然英国帝国主义这些政策，有大部分成功了。

特别是武力对华与关税会议威迫利诱的把中国“上等人”弄瘫了。停给电气使中国资产阶级不得不屈服。勾结奉系军阀更是完全有效。

资产阶级的妥协与反动

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内部对于此次运动的态度是这样：

(甲) 商业资本家,内分国货与洋货两派。国货派起初对罢市非常赞成;洋货派则始终反对。

(乙) 银行资本家,内亦分土著银行与中外合办银行两派。土著银行此时与汇丰银行冲突,排斥该行钞票已久,故对罢市赞成;中外合办银行则反对。

(丙) 工业资本家,纺织业起初本欲利用工人打击日本,积极赞助工人;后来罢工延及于华厂,顿改态度,特别在日本单独提出解决时,日本资本家拟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权及增加工资百分之十,中国纺织资本家代表亲向日人表示反对,诚恐此例一开,祸延及己。

(丁) 航业资本家,以为英日轮船罢工,而中国轮船可以一时专利,竭力赞助罢工。

由上面的分析看来,各个资本家都以各自的利益做出发点,而各持相当差异的态度。然而尚未想到利用领导此次运动来取得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观察上面所已指出的,如罢市经工人学生与中小商人的胁迫方始赞成,罢市十日之内,绝不发表任何意见,置身事外,拒绝参加“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皆可证明。等到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由北京回来,而资产阶级顿然采取积极政策(虞洽卿系一流氓出身,曾为国民党陈其美部下,失败时,蛰居上海,充当买办,开设三北轮船公司发财,于是面团团作富家翁,而为上海资产阶级之佼佼者矣。直系全盛时,皖系政客匿居上海,与虞洽卿非常接近,因此介绍虞洽卿加入皖系。此次北京政变,直系倒台,皖系再起,段祺瑞以虞洽卿为上海商埠会办。虞洽卿因此入京,适在“五卅”屠杀时)。

虞洽卿回沪后,他看清楚“五卅”事件,英人是要让步承认相当条件的,于是欲藉群众的力量来做投机买卖了。他眼目中所欲得的有二:一、上海租界添加华董;二、收回会审公廨。上海租界纳税华人,占百分之七十,外人占百分之三十,但纳税会议董事会英人六,日人二,美人一,而华人一个也没有。董事会事实上系租界立法最高机关,一切重要法律及重要事件,皆须经董事会通过,交由工部局执行,华人只有纳税义务而无选举权利,不平之气,酝酿已久。虞洽卿乘机宣传,如董事外人九人,华人亦当为九人,最低限度华人亦得七人(此项主张日本人亦竭力利用,因为日本人亦欲平均董事权以打破英国的权力)。会审公廨比领事裁判权尤为岂有此理。领事裁判权为某国人归某国领事管理,中国法庭无权审判;会审公廨不仅华人与外人诉讼须由领事陪审,就是纯粹华人与华人诉讼领事亦得陪审。这是殖民地审判机关的雏型。此项会审公廨对中国资产阶级亦极不利,因为会审公廨在帝国主义操纵中,常罚中国商人巨款。这两样东西与中国资产阶级有切肤之痛,于他们有绝大利害,所以他们想乘此次运动,逼迫帝国主义对于他们有所让步。

虞洽卿回沪后,资产阶级的第一个策略,便是主张“单独对英”、“缩小范围”。这个策略的反面自然是“放开日本”。不用说,这是虞洽卿在北京时,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军阀段祺瑞商量好的。他们说:“纱厂罢工是经济事情,‘五卅’屠杀罪魁是英国。我们力量微薄,对英还怕不够,何能兼对他国。”他们主张罢市罢工范围以英租界为限。这个主张出来,果然发生效力,首先是小资产阶级开始动摇。

适六国沪案调查委员会到上海，总商会把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所提出的十七条件置之不顾，单独另提十三条件。现在我们把两种条件比较一下。

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提出的条件：

先决条件

- (一) 宣布取消戒严令。
- (二) 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
- (三) 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
- (四) 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正式条件

(一) 惩凶。从速交出主使开枪及开枪击死工人学生市民之凶手论抵，并由中国政府派员监视执行。

(二) 赔偿。因此次惨案所受直接间接之损失，如(甲)死伤者；(乙)罢工；(丙)罢市；(丁)学校之被损害者等项，须详细查明酌定赔偿额，应由租界当局按数赔偿。

(三) 道歉。除上述二项外，应由英日两国公使代表该国政府，向我国政府声明道歉，并担保嗣后不再有此等事情发生。

(四) 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五) 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

(六) 优待工人。外人所设各工厂，对于工作的华人须由工部局会同纳税华人会订定工人保护法，不得虐待；并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并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七) 分配高级巡捕。巡捕房应添设华捕头，自捕头以下各级巡捕，应分配华人充任，并须占全额之半。

(八) 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该三案历经我国政府声明否认,嗣后不得再提出纳税人特别会。

(九) 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筑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一〇) 收回会审公廨。(甲)民事案:子、华人互控案,华法官得独自裁判,领事无陪审或观审权;丑、洋人控告华人案,领事有陪审权,但不得干涉审判。(乙)刑事案:子、如洋人控告华人者,其有关系之领事,得到堂观审,但不得干涉审判;丑、华人互控案,华法官得独自裁判,领事无陪审或观审权;寅、华人犯中华民国刑法,或工部局章程,视(丑)项论,且原告名义,须用中华民国不得用工部局。(丙)检察处一切职权,须完全移交华人治理。(丁)会审公廨法官,均须由华政府委任之;(戊)会审公廨之一切诉讼章程,完全由中国法官自定之。(己)对于会审公廨一切事权,除与上(甲)至(戊)五项无所抵触外,均可根据条约执行之。

(一一) 工部局投票权案。租界应遵守条约,满期收回,在未收回以前,租界上之市政权,应有下列两项之规定:(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其华董及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年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国西人一律平等。(乙)公共租界外人之纳税资格须查明其产业为已有的或代理的二层,已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则系华人产业,不得有投票权,其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

(一二) 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

(一三) 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

总商会提出的条件:

第一条 撤销非常戒备。

第二条 所有因此案被捕华人一律释放，并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第三条 惩凶。先行停职，听后严办。

第四条 赔偿。赔偿伤亡及工商学因此案所受之损失。

第五条 道歉。

第六条 收回会审公廨。完全恢复条约上之原状：华人犯中华民国刑法或工部局章程，须用中华民国名义为原告，不得用工部局名义。

第七条 洋务职工及海员工厂工人等，因悲愤罢业者，将来仍还原职，并不扣罢业期内薪资。

第八条 优待工人。工人作工与否，随其自愿，不得因此处罚。

第九条 工部局投票权案。（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之，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国西人一律平等。（乙）关于投票权须查明其产业为己有的或代理的，己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其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享有之。

第十条 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第十一条 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

第十二条 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

第十三条 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由这两种条件比较起来，很明白看出：

(一) 资产阶级删去“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分配高级巡捕”和“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

(二) 资产阶级又删去“承认工人有组织与罢工之自由”而轻轻代以“工人工作与否随其自便”；

(三) 关于收回会审公廨,资产阶级亦只要求恢复不平等条约的原状(反面即承认不平等条约有效)。而不想根本收回。

这三点是最重要的;其余各条减轻要求的很多,由此比较,我们很明白知道资产阶级的倾向:对外只要求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华董,收回会审公廨,及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等——(当然仅限于恢复不平等条约原状);对内则压迫此次运动的主动力量——工人阶级。资产阶级把民众的热血、烈士的头颅,就这样的作了他们阶级利益的牺牲品了。

但是,总商会提出条件后,适帝国主义内部关于调查事件发生意见冲突,北京公使各将委员撤回,于是大资产阶级的买卖没有成功。他们从此就提出开市问题。他们说:“罢市一日,中国商家损失三十万。罢市无益。”但此项主张必招民众反对,于是他们同时宣言“援助工人坚持罢工”、“抵制英日货物”。上海总工会提出抽货办法,仇货抽百分之五十,国货抽百分之一,作为罢工费用,他们满口承认。六月二十三〔六〕日,终于开市了。

开市之后,资产阶级并不履行与总工会的成约。本来照总工会计算,抽货可得三十万两,足以维持罢工工人生活一月。但结果只抽得四万余元,此都因资产阶级阻碍所致。不仅如此,资产阶级还心灵手敏,取得罢工救济的经济权。各地及海外捐款皆寄给总商会(发款由其附属机关之“济安会”发放),资产阶级

财政在握，高下从心，于是对于罢工极尽操纵利用之能事。

第二步提出日厂复工问题，强制执行，他们藉口救济费不足，或故意延宕数日不发，以挟制工人。此时上海总工会的策略亦已变更（见后），于是日厂先行复工。

第三步提海员复工问题，亦强制执行。

第四步便提出中厂复工问题。

资产阶级本拟如此做法，可以挟制英国帝国主义对他让步，曾由所谓十国商会作调和人，他们向英国表明以华董和收回会审公廨为主要条件，其余都不重要。资产阶级虽然有点小聪明，但终不敌英国帝国主义者的老辣，英国人公布工部局停给中日工厂电气。于是发生电力问题。这样一来，使得资产阶级着实狼狈。英国人说：“电气工人罢工不得已停给电力”，其实是使中日工厂复工不成。资产阶级乃大发雷霆，归罪于总工会，完全反对工人罢工，要求交涉署与英领事交涉，以电气工人复工为供给电力的交换条件。工部局却要其他英厂亦一律复工。资产阶级终于不能不归屈服。

资产阶级对总工会的政策，也经过几次变化。最初是极力拉拢总工会，欲利用工人的力量，做他要求帝国主义让步的后盾。等到所谓十国商会进行调和时，内部发生三种主张：一派主张立即封闭总工会，罢工则俟调和后停止；一派主张调和后即封闭总工会，同时即停止罢工；一派主张调和成功后，先停止罢工后封闭总工会，但现在即须驱逐工会的共产党员，代以工贼，而收归自己指挥之下。这三种主张显然是最后一种最为毒辣，代表这种主张者即为虞洽卿。他看清了：一方面如果此时封闭总

工会,工人立刻看见他的狡谋,则无异自己打碎一个对帝国主义威胁的工具,安能使帝国主义有所让步;另一方面数十万罢工工人对总工会已有深厚的信仰,只可利用总工会招牌安然停止罢工。不然,难免不激成暴动。虞洽卿究不失为老奸巨猾,当时帝国主义本已与奉系军阀勾结妥当,首先封闭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海员工会和洋务工会,他认为利益尚未到手,尚非时机。于是向奉系军阀说项,出来挽回,重新启封三个团体。同时在另一方面则造出总工会职员吞款滥费的谣言,指使工贼捣毁总工会所,积极向共产党进攻。到电力问题发生之后,知英国帝国主义非可轻侮,连让步也不要,遂积极反对罢工,主张罢工立时解决。最后与帝国主义、军阀完全沆瀣一气,终于把总工会封闭了。而轰轰烈烈的上海“五卅”罢工,便在资产阶级的妥协、破坏、出卖之下而终止。真是“愈到东方的资产阶级愈卑鄙愈无耻”。

小资产阶级的动摇

首先说学生。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在社会阶级的分化与斗争尚未加厉的时候,还大半有革命的作用。这是很显明的,因为知识分子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压迫之下,与其他被压迫阶级一样的找不到经济的出路,所以很容易激发其反抗性而走到革命方面来。在此次运动中,首先激发民族义愤而表同情于工人的便是学生。“五卅”屠杀后,更激起学生群众的愤慨,与工人完全一致,非常勇敢,非常坚决。前面所叙述的事实已可证明。学生联合会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渐渐

变成软弱无力死气沉沉,此次运动开始时,上海学生联合会所包括的学校还只十多个,总罢课后,各校方重新组织学生会而加入上海学生联合会,于是乎上海学生联合会有了肉和血附着上去了,成为群众的组织了。学生联合会在此次运动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分子。

在资产阶级的眼中,学生是被他们所比较重视的,此次南京路的屠杀,假使是工人而不是学生,资产阶级一定是漠不关心,一屁不放(譬如资产阶级对顾正红案的冷淡,便是眼前的证据)。惟其是因为屠杀学生,他们方慢条斯理的讨论他们对惨案的态度。所以此次学生运动有很大的作用。

但学生因其家庭的经济地位各有不同,到一定的条件下必然会发生分化。此次运动中,自资产阶级提出“单独对英”、“缩小范围”的主张以后,学生中便分左右两派,右派赞成,左派反对。同时,此时国民党中起来一个新右派,代表人物为戴季陶。戴季陶高唱“单独对英”说,这是孙中山历来的根本主张,自然又给学生不小的影响,于是右派学生便有劝法租界商家及东北部商家开市等情事。不久学生联合会发生改组,左派得势,战胜右派。学生联合会与总工会完全站在一边,采取同一态度与策略,总商会主张开市时,学生联合会激烈反对,并派代表取包围政策打消总商会开市计划,此时学生左倾极了。

但学生究竟不是一个经济的阶级,力量很有限,又适值放暑假,学生纷纷回里,于是学生联合会的力量便形削弱。等到假后学生回校,他们已如隔世人,热度冰消。学生生活本来富于浪漫性,热度当然难以持久。故在运动的后半期,学生的毫无力量就

表现了。

再说到中小商人。中小商人在罢市开始虽曾有一度热烈的表现,但以后便始终是犹豫不定的态度,以至于最后完全倒在资产阶级一边。组织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时,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是积极参加的,后来见总工会与学生联合会站在一边,人数太多,于是害怕起来了,提出“每一个团体只有一票表决权;如某一团体不赞成时,此案不能通过”(按工商学联合会由上海总工会,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四大团体组织,每团体选出代表六人;如工人学生一致则占十八人,而商人只占六人。再则如以团体为单位,而工人学生仍占四分之三。因此他们提出此限制)。工学两会让步,同意此一提案,因此他们仍存留于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之内。惟此时一方面谣言极盛,说学生会都是共产党,甚至于还说参加了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的商人也“赤化”、“过激”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提出“单独对英”、“缩小范围”的口号,国民党右派又竭力鼓吹,于是中小商人由畏缩恐怖而动摇了。但还未退出工商学联合委员会。

虞洽卿回沪后,当然非将中小商人拉住在他的影响之下不可,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中本有少数总商会分子,于是他们积极活动,而中小商人倾向资产阶级也日益浓厚了。

此时摆在无产阶级面前,就是如何与资产阶级争取中小商人的领导权。适开市问题发生,总商会登报于旧历五月一日开市,其所以如此,因端午节为中国结账的时期,即每个大资本家大收入的时期,故定在节前开市。小商人说:“沪案尚未解决,条件尚未承认,今忽然开市,是我们商界的耻辱。”实际呢,这亦是

中小商人的油嘴，他们已感受罢市痛苦，希望早早开市，其所以说这堂皇冠冕的爱国大道理者，不待言的，就因端午节只大商人有收入，小商人只有支出，于己不利。上海总工会看清这一矛盾，于是在工商学联合会提议旧历五月六日开市，结果通过。资产阶级亦无可如何，只得屈从。但这种策略只一时有效，仍不能挽救中小商人之右倾，此后与无产阶级愈离愈远，而完全跟在资产阶级的后头跑了。

罢工策略的变更

“五卅”反帝运动，无疑的是无产阶级做了主力军。在此次运动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是在万分艰难的复杂环境中斗争着。他们不仅与对面的帝国主义斗争，而且要与民族的内奸斗争——与军阀斗争，特别与资产阶级斗争，所以他们的策略是针对这些敌人而斗争。

真的，这一斗争是极艰苦的斗争。在“五卅”运动初期，军阀、资产阶级及其教授学者，总之所谓“高等华人”，发生无数摇惑民众的言论与主张，这当然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劈头的大敌，要使此次运动发展，首先须要打倒这些卖国奴的言论与主张，这些卖国奴的言论与主张，择其重要者可列举于下：

一 惩凶赔偿说——他们以为南京路惨案，惩凶赔偿可以了事（其实此次惨案，杀人之罪不仅在英兵与英捕，而在帝国主义的国家之高压政策，如工部局历来的横暴，及此次海陆军警的行凶，都是国家行为而非私人行为）。

二 缩小战线说——他们主张对英日或专对英(其实此次惨案,罪魁祸首虽然是帝国主义之王的英国,而派兵遣舰向中国示威,并坚称上海西捕开枪无罪,日、美、法、意也和英国一样,尤其日本在上海、青岛直接杀了中国工人是此次惨案之起因)。

三 法律解决说——他们主张此次惨案用法律解决(其实法律只能裁判私人的犯罪行为,而不能裁判国家的横暴与民族间的冲突)。

四 局部解决说——他们以为上海惨案,青岛惨案,汉口惨案,都是地方问题,应各就当地局部解决(其实各地惨案,皆由于帝国主义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与特权而来,不但不是一个地方问题,而且也不是一个国家问题,而是要根本驱逐帝国主义才能解决)。

五 政府交涉说——他们以为只要依靠政府交涉就可以了(其实历来的卖国政府对外悬案山积,从未得着相当的解决,并且当时政府对于各地同时并起的大屠杀案,不特不敢向帝国主义严重交涉,反而严刑峻法抑压本国人民的爱国运动)。

这一切言论与主张,无疑的是军阀、资产阶级企图影响革命的民众,分裂革命的民众,把革命运动消灭下去,当时共产党曾与之作坚决的斗争。

共产党发表宣言,主张:

“第一、彻底明白中国的独立与统一,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方能达到。须有为此奋斗到底的决心,切不可信所谓‘高等华人’的‘缩小范围’、‘局部交涉’等等苟且妥协的口号;并不可依赖段祺瑞政府一纸哀求式的官样条文,可以达到废除不平等条

约之目的；

“第二、须有一个革命民众势力集中的组织，以为领导全国运动的统一机关……统一那散处各地的民众力量，以便一致的进行到胜利的道路上去。要有这样一个全国统一机关，便必须召集各界团体的大会于北京。在大会之前，应当赶快在各地组织工商学以至农民等的各界联合会，由这些委员会速派代表赴北京的大会。大会便举出执行机关，代表全体中国民众而实行种种必要的运动。……”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此时的总策略，是所谓“民族的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在上海方面，是以工商学联合会为其中心，由上海总工会联络学生会的左派，去压迫他们的右派；又以整个学生会去联络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左派，去压迫他们的右派；然后再以整个商界联合会联络总商会左派，去压迫他们的右派。的确，此时无产阶级已发生与资产阶级争取中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斗争的开始。

开市以后，情势日非，因为英帝国主义此时勾结奉系军阀业已成功。奉军初到上海的时候，还诡称“保护国民利益”，其实奉军之来，即为压迫罢工运动替帝国主义解围。奉军初到上海不敢立刻下手，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下手，而是那时运动初起，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非常之激昂，奋斗的决心非常之坚决，如果那时便直接压迫，民众必定要起来暴动反抗奉军。

过了些时奉军的压迫终于开始了，首先是在青岛天津压迫罢工运动，青岛日本资本家直接命令奉系军阀张宗昌枪毙工人领袖李慰农同志及“公民报”记者胡信之，并将纱厂工会封闭，四

出拿人,捉去四五十。天津日商裕大纱厂诳骗工人,假意答应他们的要求,等到他们去上工,就开枪袭击,奉系军阀李景林也立刻帮忙,派出军队警察五六千人围攻工人,死伤数百,接着还逮捕工会及学生会的领袖,严刑拷打,惨无人道。此外南京和记蛋厂原已答应罢工工人之要求,可是工人去上工的时候,英国资本家不但悔约,并且开枪打人,又叫英国水兵来帮着杀人,奉系军阀亦从旁帮助,这种情形眼见得就要出现于上海。英帝国主义的报纸“字林西报”公开指使奉系军阀邢士廉(上海戒严总司令)说:“枪毙一二首领,则余者当知彼等之恶作剧今应闭幕。”“如罢工必须以武力对付时,即直当诉诸武力,瞻顾无益也。”又说:“邢将军若无行动之决心,则势必令租界当局出而为之。”果然奉系军阀开始有封闭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海员工会,洋务工会之事发生。

军阀既一天天进逼,资产阶级一天天的反动,小资产阶级一天天的动摇——这种情形,工人阶级就应该变更自己的策略。

当时上海有一部分共产党员与先进的工人确有这样一种意见,想以武力暴动来救此种危机。但共产党中央认为“武装暴动乃是群众奋起之最高潮,并且应该有全盘计划的庄严工作,不应该在群众起恐慌之时,拿武装暴动当做一种浪漫的拚命办法,想借此以泄愤,或拿来替代现时困难的斗争。现在是群众的宣传及组织工作时期,是准备武装反抗时期,还不是直接武装暴动的时期”。于是武装暴动的意见被打消。

此时共产党中央决定“为防御工人阶级的孤立起见,为保存工人阶级组织及已得的胜利起见,应改变罢工的政策,以经济的

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至于全国性质的根本要求，工人方面应该提议委托南北政府合组一委员会来解决。工人群众应该纠合全国的力量，努力督促这委员会，不准它对外让步，使它不能不拥护民众的要求”。并且认定“为扩大上海香港罢工运动的新途径，增加总斗争中民权运动的成分，一直到平民的革命政权之实现，工人并联合一般平民起来反对摧残民族运动的奉天军阀是必要的，甚至于联合同情民族运动的军人反抗奉天军阀都是可以的”。于是准备结束上海罢工而开始反奉战争。

这个决定之后，上海罢工的局势一变，一是经济斗争，一是局部解决。

经济斗争与局部解决

经济斗争与局部解决是同时并行的，就是局部解决仍然是以经济要求为主要的条件。我们在这里先把局部解决叙述之后，再略略叙述经济斗争。

自“五卅”以来，到八月中旬，罢工已两月有余，而总要求并未达到，因资产阶级之出卖，中小资产阶级之淡忘，所谓各阶级之联合战线，至此已无法重新团结，而英帝国主义强硬依然如故，无产阶级何能孤军独战？故总要求“委托南北政府合组一委员会来解决”，而进行工人方面自身利益的局部解决。

第一日本纱厂复工。“五卅”惨案发生后，日本资本家便有先行单独解决的表现。八月中旬由日本领事、中国官厅商界调停人几经协商的结果，日本纱厂同业组合发表声明书，声明条件

如下：

(一) 工厂俟治安维持确定之后，得承认中国政府颁布工会条例所组织之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

(二) 罢工期内之工资，不便发给，惟对于良善工人，因长期失业，所受痛苦，各厂表示怜惜同情，当予以相当之帮助。

(三) 各工人之工资，除依照技术进步之程度，当然予以增加外，其余应斟酌工人生活情形，与中国纱厂协议办理。

(四) 工资向以大洋计算，惟其零数照习惯以小洋支付，以后将零数滚入下期，一律以大洋支付。赏金登记工折者亦付大洋。

(五) 工厂日人，平日入厂当然不带武器。

(六) 工厂无故不开除工人，并留意优待工人。

附件：各厂自备电机者，一律先行开工，其余复工须在工部局送电开始以后。

此外对于无电厂家不能即行复工的工人帮助费，为日人担任十万元，中国总商会另筹十万元。顾正红抚恤金一万元。

这些条件，总工会当然不能认为满意，但审查各方面的情形又不能不忍痛接受。日厂问题，算是暂且这样解决了。于八月二十五日早一体复工。

第二海员复工。日厂复工以后，接着就是海员复工问题。八月二十六日上海总商会与日轮公司代表及海员工会代表商量海员复工条件如下：

(一) 凡罢工船员(连小轮船驳船领江等)均复回原职。

(二) 罢工海员长期失业，各船务公司表示同情，当予以相

当之帮助,如不足由上海总商会补足。

(三) 复工后不得藉故开除。

(四) 各轮船由复工日起,照原有工资发给,其加资问题在复工一个月后,由海员另函请求,酌核加薪。

条件解决后,于八月二十八日复工。

第三工部局电气复工。上面已经说过,即是英帝国主义以工部局不供给中日工厂电气为挟制,如工部局不给电气,中日工厂复工等于不复。由此连带而及的,自然解决工部局电气问题。九月四日,上海总商会召集中国交涉员、工厂代表及总工会代表商量,由中日双方纱厂与总商会集洋六万元,作为补助三分之一的工资,再由中国纱厂联合会与总商会加筹三万元,作为特别津贴,于是工部局电气工人也复工了。

第四英厂复工。英国帝国主义是以英厂复工为供给中日工厂电气作交换条件的,当然亦须解决。九月二十六日,上海总商会与英厂商量条件如下:

(一) 工人之工会,须俟政府工会法颁布,并地方上治安及秩序恢复后,始得承认之。

(二) 维持工人,发给罢工期内工资,星期一总商会发一元,进厂时厂内发一元,至第七日厂内发一元后,总商会发二元。

(三) 各厂应调查工人之生活情形,将来到必需时,磋商酌加工资,与中日纱厂同样办理。

(四) 各厂所给工资,均照大洋计算,零数则并入下期工资内,一律发给大洋。

(五) 外国职员平时在厂内不带武器。

(六) 各厂如无正当理由,不得开除工人,并先对于工人待遇上加以注意。

(七) 各厂俟内部刷清后,即行复工。

条件议定后,于九月三十日起,各英厂亦陆续复工,只英船海员坚持至最后方解决。

“五卅”以来的罢工,至此已依次完全解决。

在另一方面经济斗争却同时勃兴,而且都是华人工厂。兹将几个重要的罢工,略略叙述:

一 邮局罢工。上海邮局工人,在“五卅”发生时并未加入罢工,八月十七日举行罢工,可算是大潮流中之异军特起。参加者约二千余人,声势颇为浩大。要求纯为经济条件。中国邮权表面隶属国家,实际为外人所潜夺,高位要职,尽为所据。故此次罢工亦含反帝国主义性质。罢工三日,由中国官厅、总商会调解,结果承认:一、工会改为公会;二、薪水除照部定新章外,因沪埠生活较高,另给津贴:甲、邮务生每月十元,乙、拣信生每月七元五角,丙、邮差听差每月六元,丁、苦力每月二元五角,戊、各部专门员役,及老大、汽车夫、机器匠、小手纸夫、铜匠、木匠每月五元。算是得到胜利。

二 商务印书馆罢工。八月二十二日,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印刷所、总务科全体职员工人罢工,后来编辑所亦加入,共三千六百余人。要求亦纯为经济条件。结果,由劳资双方协商条件,共十六条,承认工会,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完全胜利。至二十八日复工,计罢工七日。

三 中华书局罢工。接着中华书局罢工,要求与结果均和

商务印书馆大致相同。自八月二十八日罢工至九月二日复工，计罢工五日。

此外八月二十八日还有沪宁铁路车务处员役提出经济要求，路局批准增加工资，故罢工未发生。

“五卅”的上海大罢工，就在这样各种形式下解决了。但接着便是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工贼之联合进攻，而发生封闭上海总工会的事。

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工贼之联合进攻 ——上海总工会的被封

上海总工会的成立，在帝国主义是看得很清楚的，只有它是他们的最主要的仇敌，自然是无时无刻不想设法消灭它。然而因为上海总工会是在反帝国主义的高潮中涌现而出的，它不仅有余二十余万罢工工人的雄厚势力，而且得着社会、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之广大同情，所以在“五卅”运动初期，帝国主义是无可如何的。在“五卅”运动的后期，资产阶级一方面欲利用上海总工会胁迫帝国主义对于华董及会审公廨两问题有所让步，即资产阶级利益的部分的取得；一方面又欲利用上海总工会“统率”数十万的罢工工人群众，免得发生暴动，以至于最后顺利的解决（资产阶级明白他们自己是无此“统率”力量的），所以不赞成解散上海总工会。大老板虞洽卿的言论可以做代表。他说：“在国民对外运动尚未收束，工人人数又多，有一统率机关，于办事上较易接洽。封闭总工会实为不当。”这段话的反面，很明显的如国民对

外运动收束了(正确些说,他们资产阶级的利益得到了),封闭总工会,是大当而特当的。所以一到“五卅”运动末期,他们不需要总工会了,他们与帝国主义、军阀联合一致向无产阶级进攻了,于是九月十八日上海总工会终于被封了。他们大家都完全明白上海总工会是他们共同的仇敌。

上海总工会自成立之日起,即在一切反动势力环攻之中,自然敌人最合用的工具是工贼。上海本是工贼团体的中心。工贼的所谓上海工团联合会是在上海总工会宣布成立及加入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之后,他们说:“工团联合会是代表三十余万工人的组织,有三年的历史,难道还不如三天历史的上海总工会么?”要求加入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工贼的所谓工团联合会不仅工人切齿,就是小商人亦知他们没有群众和惯于招摇撞骗的丑史,不准其加入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工贼说:“明天召集全体大会以示信。”次日他们的大会果然召集了,到二百来个流氓。其时适洋务工人一千余人在同一屋内开会,工贼乘机欲藉洋务工人为自己的群众,以图掩饰。上海总工会代表即当群众宣布工贼罪状(如破坏南洋烟草公司罢工等),群众大愤,群呼“打倒工贼!”“肃清内奸!”结果一个工贼被打伤了,余则抱头鼠窜而去。又次日,上海总工会亦召集代表大会,并请商会代表列席,而工贼闻讯亦乘机赶至,欲藉大会煽动。工贼登台后,中小商人起而质问:“贵会有三十余万工人在那里?”工贼窘极,而信口说如洋务工人,码头工人十余万都在他们领导之下。当时洋务工会代表及码头工会代表起而申明:“我们工会始终是受上海总工会指挥的,并未加入过什么工团联合会。”全场哈哈大笑,工贼无法只得走了。总

之，在运动的初期中，工贼的一切企图和行动都失败。

罢工之后约一月余，工贼又抬头了，统率流氓数十百人到上海总工会以罢工工人名义，要求发给救济费。至时便将总工会所捣毁一空，殴打工会职员，而警察则故意置之不理，总工会请求他们保护时，他们说：“这是工人内部之争，警察不便干涉。”这显然是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指使。可是总工会是以广大群众做基础的，工人闻讯大愤，纷纷派人来保护总工会，因此，工贼这次的破坏，总工会虽略受损失，但他们捣散总工会的目的，竟未成功。

到九月，各方反奉战争忽然紧张，因为奉军入关以来，由直鲁直驱上海，所有中国北部中部海口尽为所夺，不仅战败的直系残余军阀朝不保夕，即战胜而于倒直有功的新起的国民三军（以冯玉祥为领袖）亦被逼甚厉，在人民方面，感受奉军残暴比直军还凶，因此各方面的反奉的空气顿浓。浙江孙传芳进攻上海的军事行动尤其紧张。上海罢工影响到了北方，唐山、天津皆发生猛烈的罢工风潮，此等地方即属奉军势力范围，同时上海造船厂、铁路在上海总工会领导之下，亦为奉军所注意，故奉军为免除战争时后方不稳起见，必须先给工人一重大打击。所以到此时决心要封闭所有工会。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已久，奸计得售，不用说眉开眼笑了。资产阶级亦因“五卅”罢工依次解决，所剩者只英厂而已，不再需要总工会；同时中国工厂经济斗争猛烈，由对外罢工延至对内罢工了，他们以为这是总工会所指使，又急于需要解散总工会。于是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工贼联合向无产阶级进攻，九月十八日由上海戒严司令部奉系军阀邢士廉执行封闭总工会，并指明逮捕委员长李立三及其他重要工人领袖。后

来还秘密枪杀副委员长刘华同志,不过上海总工会虽然被封,但仍秘密存在,仍能秘密指挥各业工人作种种斗争,上海总工会已深入工人群众的心坎之中,这是敌人无论如何封闭不了的,所以后来就有几次上海总工会自动启封的事。

戴季陶主义之出现

还有一事在这里不能不提及的,便是在这反帝国主义的大潮中发生戴季陶主义。戴季陶早年在国民党中算是一位左派。在民国初年,他在上海办“民气报”的时候,鼓吹劳动党;在“五四”运动中,他在上海办“建设”和“星期评论”的时候,颇竭力介绍马克思学说。就是当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时候,他确是参与发起会议,但他不愿出名发起,却与沈玄庐抱头大哭一场,说什么“我虽不加入共产党,我的精神与共产党一致”的鬼话。当国民党领袖主张容纳共产党加入的时候,他还是竭力赞成的一个,所以以前的戴季陶无人不承认他是一个国民党左派。这不算奇怪,在社会阶级分化还不大明和锐利的时候,急进的资产阶级分子思想的左倾,在各国都不乏前例,如俄国的司徒卢威便是明证。一九二五年大革命一来,新兴的无产阶级,更明显的表现它的阶级觉悟与斗争力量,而成功一独立的而超越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并且事实上成了威逼资产阶级的势力,这样一来,却使资产阶级及其学者吓坏了,于是宁愿抛弃反帝国主义而拚命进攻无产阶级。其着重点便是攻击阶级斗争的理论,戴季陶主义便是代表这一个倾向。

戴季陶当时七辛八苦的著了一本书叫做“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最重要的话是说：“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的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谈起。”“我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他批评中国共产党说：“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又说：“不把中国国家和民族的真实的需要认清楚，单是一味的盲进。”“使国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负无所得的痛苦，那就真可怜极了。”他说：“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需要取阶级斗争的形式，因为人类是具有仁爱性能的，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本家，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整个戴季陶主义的精神，就是“对外一致，对内不可斗争”。戴季陶主义在当时的影响确不小，促成国民党内部的新分化，而新右派遂以形成，其时旧右派已经离开党，所遗下的地位，便给新右派顶补了。

戴季陶主义一出现，共产党即与之作极猛烈的斗争，但它的影响仍是伏流而进，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广州有三月二十日的政变发生。

此次运动中的教训

总结起来说，在这次运动中，无产阶级及它的政党所采取的策略，巩固无产阶级的独立力量，与资产阶级争取对城市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尝试，罢工扩大到华厂不为什么民族学说所束缚，这些都可说是幼稚的党所难能而可贵的事。但是在此运动中，分明看见资产阶级的妥协与最后反动，分明看见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不可靠，分明又看见了无产阶级的孤立，然而却没

有教训我们的党,没有觉悟到无产阶级需要另找最可靠的同盟,这最可靠的同盟者就是广大的农民与城市贫民。很显明的,上海“五卅”运动之未能得到如何直接的结果,固然是由于资产阶级之出卖,小资产阶级之怠工,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无产阶级之孤立,无产阶级未能取得广大农民与城市贫民的赞助而孤立。论理这里应该启示我们的党,要开始积极做广泛的农民运动,然而结果没有,不仅没有,而且走到另一机会主义的道路上去了,这一道路便是所谓“联合同情于民族运动的军人,反抗奉天军阀都是可以的”。反奉战争,确是当时无产阶级所需要的,然而当时共产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现今成了共产主义的叛徒——陈独秀,从此得出的结论,是工人阶级力量到底不行,于是他专心致志的去祈祷冯玉祥之战胜,郭松龄之倒戈,联合军人反奉,成了当时共产党中央的“国是”。“联合进步军阀反对反动军阀反对帝国主义”,补充了陈独秀主义的一部。很显明的至于无产阶级应该争取农民这一伟大事业,在当时是连做梦也未曾想到。后来上海三次暴动,共产党不能利用这次运动中所得的教训,以至于暴动得到悲惨的失败,自然不是偶然的。

“五卅”运动以后,革命高潮,一泻汪洋,于是构成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
第十二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五卅运动

毛泽东

空前的反帝。在此运动中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如收回租界，收回海关，收回司法权，撤退驻华海陆军等。民众因此认识什么是不平等条约。此运动因奉系军阀高压失败。但有一成绩：即上海、香港的工人起来了。此次在宣传上收效极大，乡村农民群众已普遍的知道了本党有拥护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宣言。

（摘自毛泽东《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之宣传报告》，
《政治周报》第6、7期合刊，1926年4月10日）

五卅运动之分析及纪念之意义

太雷^①

（甲）五卅运动是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之扩大

（一）五卅运动发生之原因：五卅运动发生之直接原因，人人都知道的是五卅惨案。五月卅日之上海帝国主义军警惨杀中

^① 即张太雷同志。一九二三年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四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

国人民，激动中国人民的义愤，因此发生全国的大运动，称之为五卅运动。但是这原因不过是表面上的原因，其真正原因是中国民族运动近年来发展的结果。中国民族运动已发展到某程度，帝国主义为维持其在中国剥削起见，必与之冲突。五卅惨案即是中国民众与帝国主义冲突的爆发点。上海惨案一发生，同时粤、汉、青、浔即相继发生帝国主义的屠杀。帝国主义的枪弹在中国全国飞射，中国人民不分南北东西的到处流血。这正表示五卅运动不是偶然的事，而是中国民众与帝国主义的大冲突。

(二) 五卅运动的性质：五卅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开一新纪元。五卅运动是中国民众普遍的、自觉的、有组织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五卅运动是全中国各地民众及各种的民众都参加的运动，这样的普遍性的运动是中国从来所没有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都不能算是民众自觉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五卅运动反帝国主义旗帜的显明及民众参加运动目标的明白认识，是以前的运动所没有的。从五卅运动起帝国主义要遇见有组织的全中国民众的抵抗。

(乙) 五卅运动给与我们的教训

(三) 帝国主义凶恶面目的披露：帝国主义的文明在五卅运动中完全破产了。新式机关枪对于无抵抗的群众任意扫射，是历史上没有的现象。帝国主义者平时所鼓吹的和平，是不许被压迫者反抗的和平，被压迫者反抗时军队军舰大炮都是必须使用的。帝国主义者对于五卅的屠杀，表示完全不负责任，以图赖的办法

想把中国人民所流的血迹轻轻擦去。六国委员会、三国委员会调查沪案的报告,完全是怀疑外国军警是否放枪,中国人民是否倒毙的滑稽。但是帝国主义此种野蠢已经使中国的人民深深的知道。帝国主义的一切“文明”“和平”的宣传,完全失其效力。

(四) 军阀是帝国主义走狗的铁证;帝国主义这样一种惨无人道的举动,人人共愤,但是不能激动中国卖国军阀的良心。中国军阀非但不能帮助中国民众向帝国主义抗议,反而帮助帝国主义破坏及压迫人民这种抗议。这是证明军阀是帝国主义走狗最显明的例证。

(五) 商人的妥协性;五卅运动一方面证明在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中商人——特别是小商人有参加的可能性,一方面看见商人的妥协性。上海人民一致抗议屠杀的时候,上海商人也有三星期的罢市的表示,事后因为帝国主义的威吓和利诱,先是大商人继而小商人脱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最后大商人如虞洽卿辈反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破坏此民众运动。但是在广东方面,因为帝国主义的威吓与利诱不能(达)到,加以应付此运动之策略正确,如工商联合政策,因此广州的商人始终能在反帝国主义战线联合之中,虽然不能够积极的或则实际的参加,而至少也能随声附和唱唱革命高调。

(六) 学生的革命性;五卅运动开始的时候,全国学生是一致参加的,但是事后因为学生是反映社会各阶级的,五卅运动分化,因之学生中先后有退出此运动的,有继续与劳动群众坚持到底的。五卅运动将学生的革命性表现得清清楚楚。第一,学生的群众不能看他是一个整个的,所以对于学生的革命性不能有

一律的评定。第二,学生群众是反映各阶级的,所以革命性是参差不齐的。

(丙) 五卅运动与工农群众

(七) 工农阶级的领导地位:工农阶级在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由五卅运动完全确定。上海总工会,在上海是五卅运动的总指挥;省港罢工委员会,是广东对抗香港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是因为他的组织力及他的彻底的革命性而得来的。上海总工会与省港罢工委员会各领导二十余万工人,在第一次的奋斗当中,就有这样好的组织,上海的工人觉到四面八方的压迫,精疲力尽,方才退兵;省港工人,坚持十一个月,犹未停战。不过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训,就是在反帝国主义的战阵当中,工人阶级如不得一个同盟者,必陷于孤军奋斗终于失败的地位。无产阶级不间断要以正确的政策使商人、小资产阶级参加联合战线愈久愈好,并且最重要的要得到一个永久的同盟者,才能够完成国民革命。这个永久的同盟者,就是与工人一样穷苦一样受压迫的农民。

(八) 一般农民没有参加运动:五卅运动没有能够成功的最大原因是因中国的经济基础及人民的大多数——农民没有参加,中国国民革命如果没有农民的参加,没有不失败的。所以五卅运动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怎样使全国农民来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农民所受的痛苦与压迫,使他们有彻底的革命性,能为工人阶级的永久同盟。只有大数量的农民参加,才能使国民革命运

动成为一伟大的势力以抵抗强有力的敌人。

(丁) 五卅运动的结果

(九) 唤醒了全国人民：五卅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也成就的非常之多。五卅运动将中国的人民唤醒起来，反帝国主义的宣传深入穷乡僻壤。从五卅运动才能够产生将来更大的使国民革命成功的运动，这就是五卅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价值。

(十) 广东革命基础的建立：广东国民政府的成立，是在五卅运动正热烈的时候。广东省的统一，正在省港罢工与香港帝国主义相持中。在五卅运动使帝国主义惊慌失措的时候，南方革命基础于是建立而健强。广东革命基础是五卅运动的产儿。

(十一) 军阀的更形崩坏〔溃〕：五卅运动强迫军阀分化；反动军阀势必完全暴露其真面目于人民之前，如张、吴等军阀，人民已无不识其卖国面目了；另一方面，冯玉祥、郭松龄等军阀亦被压迫而表示反帝国主义态度。军阀中有对卖国勾当表示反对的情形，更促其自身的崩溃。五卅运动后国民军势力之膨胀，郭松龄之反奉，中国军阀几至于完全崩溃。

(十二) 对于帝国主义的打击：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在远东从没有受过如五卅运动中国人民所给他们的打击。大英帝国主义的威信完全丧尽。以大英帝国势力之大，不能使中国小小的广东一省屈服。中国五卅运动已使英国帝国主义考虑准许中国关税自主等问题。北京关税会议，虽然是一骗

局,但是在帝国主义方面着想是一个大大的让步,这种让步,至少可以鼓励中国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要求真正的让步。省港罢工使香港很难恢复其原有地位。

(十三) 给与世界革命之影响:五卅运动实震动了全世界。五卅运动给与欧洲无产阶级及东方被压迫民族决斗的勇气与胜利的希望不少。在五卅运动中各国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对中国民众表示同情与实际援助,添了中国民众极大的希望并使他们了解与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携手之必要。五卅运动已实际表示中国的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重要部分。

(戊) 今年五卅纪念应如何努力

(十四) 五卅运动因为我们未曾有充分的预备,我们的策略没有能够完全的正确,因此而失败了。五卅运动失败后,反革命的势力马上就开始进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想一举而铲除革命势力之萌芽,国民军被迫而退出,现在又趋向南方革命根据地进攻,全国民众运动因压迫而沉伏。帝国主义与反革命派用挑拨离间的阴谋,使民众内部分裂,所以我们现在要继续五卅运动的奋斗精神抵御帝国主义之反攻,我们现在要保存五卅运动给我们的革命基础,我们要内部团结起来,才能抵敌敌人进攻的阴谋,并且要预备反攻。在预备反攻之中,我们要改正五卅运动中之差误:第一,要实行联合战线,集合一切革命势力;第二,要多数的农民成为革命的基本队伍;打倒张吴固然要武力的讨伐,而得到最后的胜利及继续与帝国主义冲突,全国农民的参加及

一切革命势力之团结,是绝对必要的。

(十五) 我们的口号是:

1. 继续五卅运动的奋斗!
2. 实行工农商学的大联合!
3. 统一职工运动!
4. 把全国的农民组织起来!
5. 国内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6. 打倒敌人离间威吓的阴谋!
7. 联合世界革命势力!
8. 一致抗议帝国主义的野蛮横暴!
9. 抗议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
10. 反对帝国主义收买反革命派宣传“反赤”!
11. 打倒造谣离间的反革命派!
12. 拥护省港罢工!
13. 拥护国民党!
14. 废除不平等条约!
15. 撤消外人驻华海陆军!
16. 力争关税自主!
17. 收回海关!
18. 赞助北伐!
19. 拥护国民政府!
20. 拥护国民革命军!
21. 打倒张吴!
22. 打倒帝国主义!

23.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人民周刊》第12、13期,1926年5月26日)

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

刘 少 奇

各位代表:今日主席团要我来报告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我所报告的范围,只限于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换句话说,就是自第二次劳动大会至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中国职工运动发展的情形。

一、第二次劳动大会前后之中国职工运动概况及第二次大会之意义

1. 政治状况:当中国第一次劳动大会之前,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发生了利害冲突;此时北方之奉、直战争,吴佩孚被张作霖逐到岳州,表面上虽是中国国内战争,其实是英、日两帝国主义者的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英帝国主义之工具——吴佩孚的势力已消沉下去;张作霖则依靠日本势力而伸张兵力于长江一带。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又利用其老工具段祺瑞执政中央。如是,英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势力,一时衰落,而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则极为伸张。英、日两国在中国的利害冲突起来,造成中国的内乱;中国的革命运动,同时也得一个发展的机会。

2. 中国军阀政治之动摇：此时段祺瑞虽执中央政权，但并无实力，不过做奉张的傀儡而已；同时，国民军也甚有势力，比较与民众接近。那时张作霖因无统治中国的能力，段祺瑞更无法号令任何军阀；同时接近民众的武力——国民军也产生了。当此军阀政治并未稳固之时，所以无论任何派军阀对于民众尚不敢十分压迫，而中国职工运动得有发展的机会了。

3. 国民革命潮流之高涨：奉、直战争发生，国民革命的空气普遍全国，各处都有国民会议促成会之组织。斯时孙中山先生乘机北上，极力宣传，国民革命的潮流十分高涨。还有一事，即孙中山先生之死。固然，中山先生死了，中国革命要受很大的损失，然在各地纪念会之举行，全国民众对于国民革命的意义，益更明了；革命运动的空气，反因是而更加高涨。国民运动潮流之高涨，当然影响职工运动之发展。

4. 中国职工运动自“二七”失败后，至此已到复兴时期：在此时上海有二万工人之大罢工，青岛亦有万多工人之罢工，“二七”后在北方被封之各铁路工会，亦于此时恢复起来，湖北一带工会，亦渐次恢复而发生罢工。又广东之铁路工人罢工，兵工厂工人罢工，援助革命政府，肃清刘、杨，此为职工运动复兴之现象。

5. 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工作及其影响：各位或有参加过第二次劳动大会的，此次大会的重要议决案是什么呢？（1）工农联合：固然现在工农联合不成问题，此大会后或许更加发生密切之关系。但在第二次大会时却是很有意义，因在中国工农联合的议决案以此为第一次，故自后中国工农的关系更趋密切。

(2)中华全国总工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中国工人阶级与世界工人阶级发生正式关系自此始。中国工人阶级从此即得了良好亲挚之助友。(3)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因为有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做中国工人的总机关,就使全国工人有了统一的总组织。如是全国工人的团结更加坚固;各地工人的关系,更为密切;对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实有重大的影响。其次关于统一广州工会组织与统一香港工会组织等,均为第二次大会议决案最紧要之部分,到现在广东、香港工会之可能进行统一者,实种原于此。

至于第二次劳动大会在中国职工运动中之影响,也非常重大。我们在第二次大会中对于革命的工作,奋斗的方针,已经确定了。这次大会的精神,各代表都带到各地方尽量宣传,把大部分中国工人都影响遍了。因为有此关系,所以中国职工运动的潮流,已高涨至相当程度,在“五卅”运动中,工人阶级能领导社会各阶级走上反帝国主义的道路,省港罢工能即刻实现,广州、香港工会组织之能进行统一,可说是第二次劳动大会影响之结果。

二、“五卅”运动

“五卅”运动是中国有历史以来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大运动,也是中国职工运动自有历史以来一个最高涨的时期。这次运动,差不多全中国的民众,通通参加了。其影响之大,情形之复杂,我固不能一一详细报告。据统计,全国直接参加“五卅”运动的人数,约一千二百万人,间接参加者,乡村僻壤均有参加,难以

统计。我现在分别报告：

1. “五卅”运动之起源：为什么在中国这个时候会发生这样大的“五卅”运动呢？（1）因为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之急进，我国人民受帝国主义者压迫过甚，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之情绪亦十分激烈。（2）因为段政府之反动，对于民众运动非常压迫，如禁止“五一”、“五四”等示威巡行，又无条件解决金佛郎案，以引起人民极大之愤恨。（3）接近民众的武力国民军产生。（4）中国职工运动已在此时复兴，并有坚固的组织。（5）因为革命潮流之高漲，全国民众已知反对帝国主义之方法。有以上各种原因，所以“五卅”南京路之惨案发生，而轰轰烈烈之反帝国主义运动即因而兴起。

2. “五卅”运动各地之最初形势：

（1）上海罢工：“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参加罢工者有二十五万工人。所有英、日两国工厂之工人及洋务工人，莫不加入。有此罢工，上海形势异常严重，帝国主义者发生极大之恐慌。此时，上海工厂无人作工，商店罢市，轮渡不通，车马断绝，交通为之梗阻。此时的上海，真的入于荒凉恐怖之境况。同时上海学生也一律罢课，即各教会学校也都加入。那时我们到上海马路上一看，只见满街贴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图画；处处都有游行的，演讲的，募捐的，演戏的，闹个不休，个个人都忙着反帝国主义的工作，此是中国境地之情形。至于在租界内，则大不同了，我们只看见工厂闭了门，商店闭了市，侦探往来，巡捕满街，机关枪大炮布满街口，都作射击之状，此为租界恐怖严重之情形。

（2）在此期间，第二个大事件发生，就是省港罢工。我们知

道省港罢工系援助上海“五卅”惨案而罢工，也是“五卅”运动之最紧要的事实。自“五卅”惨案发生，广东政府肃清杨、刘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即派人到沙面及香港运动工人罢工。自罢工后，各工人都返省城，并将港口封锁，因为香港系无出产之小岛，粮食既已断绝，居住的人，自然远迁。如是香港即成荒岛，商人无贸易，房屋无人居住，街道之中，污秽不堪，所以有人说“香”港变成“臭”港了。沙面形势也是如此。但在省港罢工后，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案又继“五卅”惨案而起。所有英国帝国主义者货物不能再到广州；即沙面与广州虽仅隔一河，而沙面货物，如欲转运广州，非先运往香港、上海，而后才能运至广州。香港英帝国主义者自侵略中国以来所受之打击，以此次为最大。此为省港罢工之大略情形。

(3) 其他各地形势：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形势亦非常紧张，非常严重。比如北京，所有的学生、工人、商人也非常愤激而参加。北京的工人群众虽然处在压迫之下，亦开会巡行，演讲募捐，十分紧张。北京英国公使馆之工人，起而罢工，英使馆极感不便。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在“五卅”案未发生以前，已发生二次罢工；“五卅”后又起第三次罢工，复遭一次大屠杀。参加此次运动者有万余人，除纱厂工人之外，还有铁路工人参加，不幸遭帝国主义工具张宗昌残杀，工人领袖李慰农也被害，还有许多因为参加运动，被捕拿监禁者。青岛工人这种牺牲精神是很有价值的。各工友定要继续此精神而奋斗！

至于武汉，在“五卅”后，各界民众甚为愤激，曾有四十万人之水陆大巡行；汉口外国码头工人，此时起而罢工，复遭英国水

兵枪杀，死工人八九人。同时军阀萧耀南，也助桀为虐，枪毙萧英，被通缉者数十人，而武汉大运动，即因此沉寂。复次，天津在“五卅”后所有民众运动也极热烈，海员及大多数纱厂工人均同盟罢工；这些罢工，虽然有的是为本身利益，而大部分实为反帝国主义运动。不幸在罢工后，又被军阀李景林大惨杀。对于工人各界群众集会、结社种种自由，均被剥夺，并且逮捕各界及工人领袖五百余人，枪伤学生百余人，一切团体，概被封闭；天津运动卒为军阀所压下。唐山开滦之英国煤厂，在“五卅”后，亦同盟罢工，亦为李景林派保安队，封闭工会，捕拿数十人，用武力压下。南京方面，在“五卅”后也有极热烈的运动，英国和记公司工人罢工而得胜利复工；后因英人不履行条件，而举行第二次罢工，又为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压迫下去，死伤数十人。其它如九江、长沙、重庆、河南等处，“五卅”后均有罢工运动，而无处不遭帝国主义与军阀枪杀，无处不有工人死伤。

此外还有一个例外的地方，就是东三省。东三省的民众，对于“五卅”运动，本非常热烈，但被张作霖之严重压迫，巡行、演讲、集会、结社等自由均被禁止，故运动异常沉寂；即民众捐助罢工之款，也被政府动令发还。如此足见奉系军阀之压迫。以上所说，为“五卅”运动中各地民众及工人阶级奋斗情形。从以上情形可以看见各地均有极热烈的运动和巨大的牺牲；此种运动与牺牲，以工人为最多，而又以工人为最力，处处都有罢工，处处都有惨杀，而惨杀之结果，死伤者多是工人。工人阶级在此次运动中，实际地处在领导地位。此时工人阶级，几成全国总罢工的形势——统计全国在“五卅”运动中，工人罢工者有五十余万人。

(4) 帝国主义应付此次运动之策略：英帝国主义对付“五卅”运动，始终是强硬的。其初以武力在南京路惨杀我们之后，又继续在沙面、九江、汉口、重庆等处，施以枪杀。在交涉方面，他们总是不负责任，希图抵赖，同时又四放流言，谓此次运动是“过激”，是“赤化”，冀以离间中国民众之结合，并竭力勾结军阀及中国资本家压迫工人。至日本帝国主义又怎样呢？“五卅”后，日本的表现总是狡卸，而欲完全将“五卅”的责任推到英国身上。他说纱厂罢工是一个问题，而南京路之大屠杀又是一个问题；南京路事件，是英国的责任。他们又在日本国内的报纸上说，中国反抗英国的运动，是对的，而英国对中国人民之屠杀，是不对的。同时又提倡“大亚洲”主义，说“日本与中国同是亚洲人，应该联合反抗白种人”云云。其他在“五卅”后，对于日本纱厂罢工风潮，鼓吹单独解决，并向中国人表示好感，以促纱厂风潮之早日解决。此是日本帝国主义希图狡卸“五卅”责任之表示。至于美国呢？自“五卅”后，他就说“我们与中国素有好感，此次罢工，美国之洋务华工，不应参加。我们美国总是帮助中国独立的。”由此可见美国的假面具更戴得好看了。至于法国呢？也是向民众表示好感，希图民众不去反对法国。比如“五卅”后，群众能在法租界巡行，民众的机关，他亦不禁止。这亦是他的狡猾之表示。以上是“五卅”运动起初时，各帝国主义者的态度。观此，起初各帝国主义国家，实各自为战，并无一致之结合，到后来，各帝国主义国家，渐趋一致了；英、日、法、美渐有联合进攻中国民众的形势，尤其是日本与英国的结合，更为明显。比如张作霖初为日本走狗，“五卅”以后，张作霖竭力在各处帮助英国残杀中国爱国工人及

一切民众，禁止英国工厂及海员罢工，由此可见英国、日本已经结合向民众进攻。这是“五卅”以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民众之态度改变的表现。

(5) 大资产阶级之妥协与反动：上海在“五卅”事后，中国大商家也同有罢市的举动，但非其本意，完全是受工人、学生之包围而罢市的。在此即可见中国大资产阶级之革命性不充分，并有很多事实，可证明大资产阶级之妥协与反动。比如“五卅”事后，上海革命民众共同组织“工商学联合会”，请总商会(资产阶级的团体)参加，而总商会并不参加；他说：“我们要居在调停人地位才好。”这可见大资产阶级之妥协性。迨后“工商学联合会”提出要求条件十七条，全上海民众均拥护，而总商会则独反对，另提出要求十三条，把“撤退外国海陆军”、“工人集会、结社、罢工自由”、“收回领事权”等条删去，这又可以证明其妥协性。为了预备把工人、学生拍卖了，他们又提出“单独对英”、“缩小范围”，主张无条件解决日本纱厂罢工。其后，他们罢市二十三天，急于运动开市，虽有工人、学生、小商人极力反对，亦不顾及。这种种事实，足以证明中国大资产阶级之妥协性。及上海开市后，大资产阶级更变成反动了。因为英国人把上海电力截断，使上海各中国工厂不能开工；如是大资产阶级即反与帝国主义勾结反动，并破坏罢工了。此种事实很多：如华商纱厂联合会请奉军戒严司令部及电段祺瑞政府，解散工会，压迫工人上工；又如纱厂主穆藕初献计日人，不承认工人条件——增加工资及组织工会，并勾结流氓工贼，以破坏罢工，捣毁工会，殴打工人领袖。而且总商会又把持工人救济费，以断绝工人粮食，希冀罢工不能坚持；又勾结

军阀,通缉工人领袖,封闭上海总工会及各工会等等。皆为中国资产阶级反动之事实。

其次在北京的大资产阶级,亦是十分妥协,主张单独对英,不肯对日经济绝交。武汉、长沙大资产阶级主张亦与前同。汉冶萍资本家更勾结军阀,惨杀安源工人,枪毙黄静源。在此全国“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处处都表示中国大资产阶级之妥协与反动。

(6) 小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之地位:各地小商人与学生在“五卅”当中都积极参加。比如上海小商人与学生,每一次运动均热烈参加。他们并愿意罢市,大商家要开市,而他们却反对之。这可见其革命性比大商家丰富得多。其次,上海小商人的组织“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参加“工商学联合会”,并极力反对总商会所提出之十三条,删改“工商学联合会”之十七条条件。即如各种巡行、捐款等,小商人均极热烈。及后,小资产阶级因为中了帝国主义者的谣言离间,而渐渐消极,终至同大商人一路走去了。然而学生则始终与工人一路走。又如省港罢工,小商人也组织参观团、慰亲团等赞助罢工,极力反对英帝国主义,而香港学生更至今亦随工人罢课。他如南京、武汉、长沙等处的小商人、学生,莫不赞助工人,积极参加反帝国主义运动。由此可见,中国小资产阶级是能革命的,但同时又充分表示其游移的根性。

(7) 工人阶级之坚决:在“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工人阶级差不多处处都站在领导地位。比如上海“五卅”惨案发生的原因,是因为纱厂工人之经济罢工,而引起顾正红之被杀;顾正红被杀后,罢工工人即向小商人及学生各界民众,鼓吹反帝国主

义,由其本身之经济争斗,引至“五卅”政治斗争,这是上海工人所做的。上海工人除自己参加斗争外,还引导学生、小商人参加,并能集中自己的组织,举行极大的游行示威等。对于包围捕房、截留粮食、捉拿工贼等,工人无不勇往直前。数十万罢工工人,艰苦坚持至三月之久,尚无倦容;虽因军阀、帝国主义之严厉摧残和压迫,工贼流氓的捣乱和破坏,救济费时常断绝,工人并无退缩之表示。工人虽然受了极大的牺牲,空前之痛苦,然其主张最为急进,最能彻底;反帝国主义的奋斗,最能坚决。即在商人开市了,学生开课了,工会封闭了,领袖逃亡监禁了,尚能罢工一星期以相当条件上工。即在广东省港罢工,亦充分表示工人反对帝国主义之坚决。工人罢工至十月之久,尚能茹苦含辛、坚持奋斗;他们这次罢工,把香港变成了荒岛,巩固了广东的革命政府,促进了自己工会的组织;他们的纠察队在各处封锁港口,与帝国主义军队走狗直接奋斗,不知若干次。其他各处工人在“五卅”运动中,均有工人起来罢工,均能拚命与帝国主义及军阀争斗,均能给敌人以极大之打击,均能站在一切民众之前奋斗。此为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大略奋斗之情形。

(8) 军阀之压迫与摧残:中国军阀对于“五卅”运动十分压迫,极力摧残,充分表示为帝国主义的工具走狗。奉系军阀在上海设立戒严司令部,到处干涉工人行动。禁止一切集会结社自由,禁止封锁租界及封闭“工商学联合会”、海员工会等三团体,逮捕工人领袖,勾结工贼流氓,捣乱工会及封闭上海总工会及工会等,均为军阀摧残“五卅”运动之事实。他如天津、唐山、山东、武汉、南京、安源、北京、重庆、九江等处,都有很多军阀摧残民众

反帝国主义运动及枪杀运动领袖之事实。

(9) 工贼之猖獗：“五卅”运动中，中国职工运动固十分发展，而工贼在此时也非常猖獗。比如上海工会的工贼，借了工会的假招牌如“上海工团联合会”、“工人俭德会”、“制赤会”等，专门破坏工人组织，捣乱工人秩序，替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军阀作侦探。如上海总工会之被封，刘华同志之被杀，均出于工贼之破坏。其他各地，如香港之工业维持会，以及北方铁路等，无处不有工贼破坏工人运动。这是工贼猖獗之大略情形。

(10) 国外之同情：“五卅”运动起，国外华侨十分同情援助，捐款援助上海及香港两处罢工达二百余万元。世界各国工人阶级亦无不竭力援助。英、法、德等国工会，均有文电到中国表示同情；又有群众运动援助中国，捐款援助者亦属不少。英国各地工人，更有极大之示威运动，援助中国工人罢工。俄国、日本更不用说。日本曾派数次代表到中国，俄国总工会亦派代表四人来华慰问工友，并捐款五万余元。中国工人有了这次大运动后，已引起全世界工人阶级大注意，而中国工人阶级与世界工人阶级之联合，益加进步。以上所讲为社会各阶级在五卅运动中之态度，及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之奋斗情形。现在再讲反奉战争。

三、反奉战争

(1) “五卅”运动本为全国民众反帝国主义之大运动，但在此运动中处处均遭军阀之摧残和残杀，于是全国工人及一切民

众，深知欲使反帝国主义运动得到胜利，必须打倒国内军阀。故“五卅”运动虽被奉系军阀所压落，然因此引起反奉战争，此乃帝国主义者利用军阀压迫民众运动之反响；而孙传芳不过乘此机会，爆发反奉战争罢了。

(2) 孙传芳将奉天军队逐出上海以后，上海的民众运动复因之而起，此时民众的口号除反对帝国主义以外，并极力反对奉系军阀。在此时期，上海工人阶级十分要求恢复上海总工会，但此时上海政权，落于中国资产阶级之手。资产阶级对于工人运动的压迫，更甚于奉系军阀，一切由工人自行启封之工会及工人的秘密机关，均遭资产阶级之警察及保卫团严密搜查。上海总工会虽已恢复，但侦探满布，重要人员均不能到会办事；而刘华同志亦在此时被杀。虽然如此，上海工人之组织，反更能严密进步，并能为各种问题举行奋斗及罢工。此为上海之大略情形。

(3) 反奉战争一起，全国各地工人无不参加反奉运动，处处均有游行示威，各工会无不宣言反奉。北方铁路工人更实际参加反奉战争，如京奉铁路工人之离职，以打击奉军，及信阳铁路工人之拆毁铁路，以断吴佩孚军队前进之路，及帮助国民军之军事便利等，均为明确的事实。

(4) 天津、河南、北京职工运动之勃兴，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大会，均为此时职工运动发展之重要事实。此时天津亦被国民军占领，所有以前被李景林封闭之工会，概行启封，天津总工会亦已恢复。以前被李景林监押之工会领袖，亦均解放。如是天津职工运动大加发展，此时工会组织较前更为严密。在天津

总工会组织下之工人,凡三万余人。唐山的煤矿工会,此时亦恢复,但英国资本家借此停工,以阻碍工会发展。全国铁路第三次代表大会,亦于此时在天津开会,所有各种重要议案,关于职工运动之前途,十分重要。北京职工运动亦于此时兴起,组织有北京总工会,共有工人万余人,为北京从来所未看见的现象。河南职工运动此时非常发展,组织有河南全省总工会,有组织的工人凡四万余人,更时常发生罢工运动,胜利者居多。

(5) 粤港罢工之坚决:广东因有政治的自由,及有国民党帮助农工运动,所以粤港罢工尚能再接再厉,坚持下去;工人阶级此种奋斗精神,在全世界职工运动中,实所仅见。

四、全国职工运动之现状及其趋势

(1) 各地工会秘密组织之概况:现在北方政权,又重入反动军阀张、吴之手,所有工人一切组织和运动,无法公开进行,而中国职工运动又进入一个难关的时期了。现在各地工会秘密组织概况,略述于下:

上海:上海总工会现在虽能公开,但实际运动均须秘密进行;所有工人各种组织,也在军阀、帝国主义严重压迫之下。但上海总工会之力量,反能增加,上海工人之组织,较前更加进步,各工会除工会之委员会外,还有干事会及小组之基本组织。现在上海总工会组织下之工人,有二十万零九千四百人;能收会费者,有七万九千七百四十人。他们且不时为他们本身利益及民族利益举行奋斗。统计自一月一日起至四月一日止,四个月中,上海

罢工有十八次之多，参加人数有三万余人；罢工的时间，有五十八万六千一百五十小时；要求条件五十三条，要求次数五十四次，胜利者三十五次，失败者十九次。由此可见上海工人的奋斗精神，胜利者居多数。故上海职工运动，虽在严重压迫之下，实有发展之趋势，将来一有公开机会，上海职工运动之勃兴，当更非“五卅”运动时之上海职工运动所能比拟也。

山东：山东各地工会，完全不能公开，征收工人会费亦极困难，但工人十分信仰工会，团结尚能保存；现在各地均有工会小组，以胶济铁路及淄博煤矿工人为好。

河南：自吴佩孚占驻河南后，所有工会均被占驻。现在河南工人之有工会小组者：铁路、兵工厂、铜元局、纱厂、煤矿等处。

湖南：自赵恒惕被驱逐以后，湖南职工运动因而兴起，工会的组织，均能公开。现有组织之工人八万余人，工会二十余个，并有全省工团联合会之组织。所有纱厂、市政、码头及轮船、矿山、铁路均都在组织之内。

其他各地：现在天津、武昌、南京、哈尔滨等处，均有工人秘密组织，工会情况均好。

至于广东、香港、广西职工运动之发展，因国民政府给以人民集会结社之自由，所以两广之职工运动，均有发展和进步。广东各县均有工会组织，成立的县总工会也不少；比如现在汕头，亦有工人代表大会的实现。广西梧州、桂林等处，亦组织工会甚多；广西有组织之工人，已增加到十九万人，工会内部的组织，较前亦有进步。以上系中国职工运动之现状。

五、结论与进行方针

(1) 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有极大之发展，尤以“五卅”运动中，中国职工运动更有长足之进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均能领导一切民众，向帝国主义及军阀进攻，譬如各地惨杀案均因工人罢工而起，惨杀结果，以工人死伤为最多。工人阶级在“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牺牲为最大，主张最为急进，奋斗最能坚持，力量亦表现得非常伟大。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

(2) 一年来，职工运动均被军阀压迫与摧残，尤在“五卅”运动时奉直军阀摧残工人阶级更为惨酷。由这些事实，更可以明了国内军阀是帝国主义之工具和走狗；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永远是群众的敌人，也即是国民革命的对象。同时又可证明国内军阀必须打倒，方能使反帝国主义运动能够得到胜利。

(3) 中国资产阶级本来是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他们有参加国民革命之可能，但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终久是妥协的，不能彻底的，而且当无产阶级起来参加革命时，或要求生活改良时，资产阶级就马上反动起来了。“五卅”运动中，上海中国资产阶级之反动行为，已十分够我们领教了。我们工人阶级在某一个时期，即在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冲突最利害的时候，应与资产阶级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以增反帝国主义运动之势力；但当资产阶级一有妥协之倾向时，或压迫工人运动时，工人阶级应极力反对，以防备资产阶级骗卖自己。

(4) 中国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学生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过去一年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中,证明小资产阶级是有力量的,能革命的,工人阶级应切实与之联合,建立联合战线。工人阶级并应促进小资产阶级之左倾,以补救其游移保守之根性,而不为大资产阶级所利用。

(5) 农民为国民革命之重要势力,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中国工人阶级应切实提携农民,进行中国的革命;各处的工人应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及指示奋斗方法,在农民一切的奋斗中,工人应以实力援助之。工人并须顾及农民的利益,以确定自己奋斗的方式。

(6) 中国工人阶级在组织上,已有极大之进步及发展,全国工会会员不但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增加,且能改良他们的组织。现在各处工人群众,都有统一工会组织之呼声,譬如香港、广东工会之统一运动,及上海工人群众在严重压迫之下,尚能有二十万工人在秘密组织之内,且能不时为各种问题而奋斗,以此即可证明中国工人阶级之组织,已非反动势力所能消灭的了。

(7) 工会为工人群众之经济组织,所以必须公开。现在中国的工会尚不能得到法律上的保障和社会的承认,中国工人阶级为要发展中国的职工运动,必须积极的公开的作争工会条例的运动,虽然不能争得工会条例之颁布,亦可引导中国工人群众走到政治争斗的路上。中国职工运动,必因此种争工会自由的运动而发展。

(8) 过去一年的职工运动,因为反帝国主义之政治争斗,其中处处都可看到工人的经济要求。中国工人阶级劳动条件之恶

劣,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因此今后职工运动之方针,应作各种经济争斗。工人在任何时期,都不能离开要求其经济上之利益,经济问题,工人在所必争。经济争斗之发展,即为中国职工运动之发展。

(9) 中国工人阶级在过去一年伟大奋斗中,已经惊动了全世界,因此世界工人阶级均起而注意中国工人运动;中国工人阶级与世界工人阶级联合因此更加密切。如在“五卅”罢工中,各国工会之来文电援助者、示威捐款援助者、派代表来华联络者,已不知若干起。今后中国工人阶级应在各种行动及组织中,与世界工人阶级建筑更亲密之联合,进行世界革命。

(10) 中国职工运动之发展,工贼亦同时猖獗;在各地工贼破坏我们的力量非常的大,我们应设法对付工贼之破坏,工会中并应有自卫的组织。

各位代表,现在我的报告已经完了,我们高呼下列各口号:

努力国民革命!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

打倒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

打倒资本家!

颁布工会条例!

增加工资改良待遇!

中国职工运动万岁!

一切被压迫民众联合万岁!

全世界工人大联合万岁!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刊》第7至10期,1926年5月出版)

今年五一之中国政治状况与工农阶级的责任

和 森^①

今年五一的中国政局,我们工农群众人人都可感到一种与往年不同的状况:一面是国民革命潮流之涨高;别面是北方赶走了吴佩孚,南方赶走了陈炯明。这都是英美帝国主义最强固的工具,我们工农阶级最可怕的死敌;而且我们北方的铁路工友和广东的工农群众都亲自参加打倒这两个恶魔,这是我们今日可引以自慰的。

可是曹、吴虽倒,而代之以起的段、张又在北方企图从新巩固军阀专政的局面;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亦未因曹、吴失势而有所动摇,而日本帝国主义在此新安福时代又完全恢复了旧安福时代的盛势;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被卖国媚外的安福政府阻止了,真正的国民会议也被段祺瑞破坏了,所以全国几万万劳苦平民依然处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铁蹄蹂躏底下。

自“二七”大屠杀的祸首曹、吴倒了之后,我们被压了两年的劳动运动渐渐复苏。这固然由于政局的转变,但决不是帝国主

^① 即蔡和森同志,时为中共中央委员。五卅运动时,是党中央的主要决策者之一。

义与军阀对于我们的压迫有所轻减，不过由于各帝国主义各军阀之间加紧的互相冲突，我们才有此复苏之可能。然而这种可能现在还是很有限的。由京汉路总工会恢复后的现状和上海日本纱厂大罢工及数月中其他各处罢工的结果观之，便可显明最近劳动运动复苏之性质——还是守势而不是攻势。这种状况恰好是曹、吴倒后另一反动的军阀政局还未全臻巩固之反映。

事实告诉我们：若无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力，我们工农阶级不仅可以成功全国坚固的经济组织(工会)，而且将是政治斗争中最伟大的势力。帝国主义军阀知其然，所以自来即极力压迫，不使我们无产阶级有集会、结社的自由。现在我们又要起来了，他们将怎样？上海纱厂罢工时，日本报纸已公开的说：“曾被吴佩孚解散之工会均渐复活，而其运动之急进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故英美法日等国对于此种现象多怀恐怖之念。”

他们既然这样的恐怖，他们对于我们的第二次攻势自然正在准备着呀！同时国际的劳资阵势，还是资本继续向各国无产阶级进攻；资产阶级左派所自诩的和平民治时代业已终止，凶恶的法西斯蒂和军事的狄克推多正在西方一切资产阶级国家中横行。在这种反动的国际形势之下的中国，现在又由最反动的军阀段、张宰制着，我们未来的艰难是可想得到的。

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与军阀高压之下，中国劳动运动发生一种特性，即凡经济的运动都要变成政治的事变：自海员罢工、京汉罢工、上海日本纱厂罢工，以及衡山(前年)、花县、广宁的农潮，莫不如此。这种事实一面足以说明经济争斗与政治争斗的关连，一面足以说明中国工人阶级参加国民革命之必要。中国

是国际资本主义的殖民地，殖民地工人阶级天然的负有两重责任：一面应为民族独立的共同利益奋斗；同时应为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奋斗。怎样才能完成这种重大的责任？第一要有明白的阶级意识；第二要有独立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

我们若以“只问面包不问政治”的态度拒绝参加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那末不仅是一种错误，而且是一种罪恶。因为如此将使中国无产阶级永远屈服于帝国主义之下，而遗〔贻〕误自己解放的前途。但若没有明白的阶级觉悟，沉溺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幻术之中，而为什么“全民革命”、“阶级协调”的口号所欺骗，其危险亦将不减于过河拆桥，徒供资产阶级的利用。土耳其资产阶级胜利后立即解散工会，捕杀共产党，便是榜样。

资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的倾向，与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的倾向是完全不同的。无产阶级是要求彻底解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经济羁轡、政治羁轡的；资产阶级只要帝国主义肯把其特权让一部分给他们，他们老早就准备与帝国主义妥协了。

然而民族革命之客观的趋势终于要超过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范围，因为他的最后胜利是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不两立的。所以在民族革命运动的开始，资产阶级分子和智识阶级都踊跃的来站在这种运动的领导地位；但一俟劳动群众自觉的参加运动时，这些先生们便都会离开从前的立场去谋反革命。这便是我们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后，国民党右派起来反革命的原因（参看本报上期《冯自由派反革命运动的解剖》）；也就是今年五一我们工农阶级应当郑重温习的政治经验。

国民党改组一年以来，民族革命的潮流增高，同时反革命反

工农的潮流也增高。一些智识阶级随着买办阶级、地主阶级的口号，于未参加革命之前即行反革命反共产反工人反苏俄（如《醒狮周报》反动的国家主义者）；或跟着冯自由等涌入国民党，口头唤革命，实际干反革命的勾当。他们利用反共产的口号来抵制反帝国主义。这是甚么现象呢？这完全是“上流社会”帝国主义的附属物欲永远奴隶我工农而保持其特权之表征。

由沙面罢工、商团事件、广宁农潮，以及一年来各种各色的反革命丑剧证明：只有工农阶级是忠于反帝国主义和民族革命的台柱子。从今以往，我们工农阶级惟有增强反帝国主义的争斗才可领导中国民族达到真正的解放；亦惟有成功独立的阶级的组织才更能增强反帝国主义的势力，而完成我们工农阶级历史的使命。然而帝国主义的附属物就是要极力破坏这一点。他们天天散□(布)毁谤共产党的谣言，破坏工会农会的组织，打破罢工，收买工贼，组织招牌工会和什么“劳工反共产救国同盟会”等。资产阶级越在东方越无力，同时亦越在东方越反动、越卑鄙龌龊，无恶不作。

但我们绝不要因此退缩丧气，我们更要勇敢奋斗。世界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兴起是历史进化的必然律。帝国主义若被我们打倒了，这般反革命的附属物至少也要跟着打倒一半。这个责任当然伟大而艰难；但决不应因为艰难而减轻我们自己的责任！

(《向导周报》第112期,1925年4月26日)

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

独 秀^①

五月卅日上海大马路之屠杀，曲在英捕横暴而不由于学生市民之暴动，已由本月十一日会审公堂第三次研讯被捕者所宣布的判词完全证明了。

此次屠杀之最近直接原因，乃由于上海的学生市民对于日本纱厂枪杀中国工人而抗议，为租界英捕所屠杀。

同时，日本派遣军舰在青岛强迫中国军警，使其屠杀中国工人八名，伤者十余。

上海青岛同时的大屠杀，激起全中国各阶级各党派的国民公愤，罢工罢市罢课集会示威，遍于全国。在这全国国民公愤中，虽然有和平急进之分，而愤恨外人戮辱同胞，并且忆起历来的不平待遇，却已成了全国共同的心理，虽军阀银行家亦为此心理所征服。

苏俄政府及人民对于此次屠杀事件及中国国民奋起，极表同情。代表全世界革命工人的第三国际已起来号召全世界工人援助中国工人及中国民族运动。英国的工人及自由主义的学者已起来向他们的本国政府抗议此次上海屠杀事件。

英日法美意的海军在上海登岸驻扎，占领学校，搜查行人。

^① 即陈独秀，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英日法美意的公使团始终坚持上海西捕开枪杀人是应该的。

汉口英领事召各国海军登陆，英国义勇队枪杀中国工人市民八人，伤四十余。

段政府下令各省保护外侨。萧耀南、赵恒惕均令军警严阻学生游行演讲，并宣布戒严，以“就地正法”“格杀勿论”威吓市民。

依据上列各项事实，便可看出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了。

英捕英兵在上海汉口杀人，不过是此次争斗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凶暴现象，此种现象之真正根由乃由一切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民族醒觉与反抗之示威。因此我们应该明白：此次争斗若仅以惩凶赔偿了事是错误的，因为杀人之罪不仅在英兵与英捕，而在帝国主义的国家之高压政策，如工部局历来横暴及此次海陆军警示威，都是国家行为而非私人行为。第二应该明白：此次争斗若主张缩小战线对英日或专对英国是错误的；因为罪魁祸首虽然是帝国主义之王的英国，而派兵遣舰向中国人示威，并坚称上海西捕开枪无罪，日美法意也和英国一样，尤其日本在上海青岛直接或间接杀了中国工人是此次争斗之起因。第三应该明白：此次争斗若主张法律解决是错误的，因为法律只能制裁私人的犯罪行为而不能制裁国家的横暴与民族间的冲突。第四应该明白：此次争斗若看做一个地方的问题，上海人只管上海，青岛人只管青岛，汉口人只管汉口，妄想住在各个租界的中国人得着一点市民权利便可永弭未来的冲突，这也是错误的；因为一切帝国主义者是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全民族加以剥削与凌辱，即此次屠杀也不但上海，青岛汉口都同时流血。这种根本问

题,不但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并且不是一个国家问题,是要唤起国际的同情才能够解决的。第五应该明白:此次争斗若依靠现政府交涉解决是错误的;因为历来的卖国政府对外悬案山积,从未能得着相当的解决。现在对于各处同时并起的大屠杀案,并不向外人严重交涉,专知保护外人,反以严刑峻法压抑本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他们向来只是代表外国向本国人民交涉,不曾代表人民向外国交涉,现在上海的外交当局蔡、曾、许那一个不是这样的态度!?

我们若是明白了这些错误,便应该懂得此次争斗的性质,乃是全中国人民为民族的生存与自由反抗一切帝国主义之争斗,决不是那一个地方那一部分人对某一事件某一国家之争斗;换言之,此次争斗应该是整个的不是局部的。争斗的方法,不可依赖法律,亦不可依赖现政府,只有依赖国民自己的团结力。

因此,我们主张:中国国民应该运用自己的团结力,立即在上海召集全国工商学兵代表大会,议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严责政府宣布执行。倘政府不肯执行此议决,立起国内战争,建设一个国民革命政府。新政府第一个宣告,即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二个宣告,即是那一国承认废约的宣告,并派代表来华商订相互平等的新约,便许那一国通商,否则请他们将一切商品运到别国去贩卖。

我们这个提议,是立脚在全民族的生存与自由之意义上面,不是立脚在某一阶级某一党派的利益上面,希望全国人民不存成见,予以公正的考虑与讨论!

(《向导周报》第118期,1925年6月20日)

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

弼 时^①

(一) 上海屠杀案之经过

上海学生，因日商纱厂工人顾正红为要求入厂工作被日人用手枪毙命，及多数日厂中国工人同胞因罢工失业，乃组织学生讲演队演讲募捐，揭露日人的残暴，援助失业工人。学生这种举动，实为热心爱国，不忍同胞被外人残害欺侮之正当行为，亦为资产阶级国家法律——言论结社集会自由——之所准许者，而租界当局竟丢掉平日所谓和平亲善之主张，否认法律之效用，视中国领土之上海为自己属地，对中国国民如农奴时代及殖民地内的奴隶，竟敢捕获演讲及募捐之文治及上海大学学生。

青年学生，较易感受外界刺激，代表社会先进思想，富有反抗能力，对于社会上种种无礼的虐待，——何况是外国权力虐待中国学生——当然有所表示，此次上海学生，因为同学被捕以及工人同胞身死，发起在租界上露天讲演唤醒民众，租界当道不究学生之本心，任意囚捕，并开枪对付几千手无寸铁之学生工人市民群众，而至酿成这次上海英租界之大惨杀案及全上海罢工罢课罢市之破天荒之绝大风潮。并且从五卅以后又连日枪杀并捕捉无辜同胞，武装戒备，调遣兵舰到沪，陆战队上岸，封闭学校，

^① 即任弼时同志，当时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团中央组织部长。

越界行凶，任意搜查旅馆和住宅，俨如战胜国之对囚虏，以致中国民众愈益激昂，全国奋起，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此次蛮横的暴举，掀动了全世界的空气。

（二）上海屠杀案发生的原因

自这次风潮发生，罢工罢市罢课日见扩充之际，社会上代表软弱人们思想的论调，以为这个事变是学生援助工人强要到租界上去演讲的结果，仿佛是怪学生肇此祸事。帝国主义在上海所办的报纸，则诬为过激派所主使，苏俄帮助之所致。这种对于此案发生之推测，离事实实在太远，尤以外人报纸之论调更令人奇异。我们很难相信过激派有这样伟大的神通，能指挥全上海工商学界领导全中国惟一无二的大罢工罢市罢课，造成中国这样一个反对帝国主义一段极光荣的历史。

然则这次风潮的主因安在呢？若简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说：这次（反）屠杀风潮是世界帝国主义者历年向中国国民进攻所起的一种反映的爆发，是世界民族革命运动进步的表现，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阶段，是经济政治压迫下的自然结果。并非因学生援助工人而致于爆发，这样的简单，也非少数过激派之所能鼓动成功。这不过是敌人想减杀我们对他们反抗力的狡计罢了！

现在且将事实分析，我们就可以明了这个解答的正确意义。这次学生援助工人，原由于日本纱厂之工人罢工，以致日人枪击工人顾正红身毙所致。查日本纱厂中国工人之所以罢工，乃系

工人平日饱受日人虐待压迫所激成。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领土设立工厂，雇佣中国贱价劳力，已为侵略国权之不法行为，何况更加以奴隶对待中国工人，使之衣食不饱，饱受无礼的殴打和苛刻呢？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日本工厂中国工人之罢工，乃出于日本帝国主义者高压下的一种反动的表现。上海学生演讲募捐援助工人，表面上为发动之直接原因；其实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普遍到全国各地各阶级了，谁不感觉到这种半殖民地的痛苦。近来工部局又有印刷附律，码头捐，交易所领照之提议，和在中国擅恣惨杀人民，种种狂妄和蛮横的举动，以及工部局选举权的不平等，这才是此次罢工罢市罢课反对帝国主义大运动的主因呢。由全国各地罢课和种种对于上海屠杀表同情的运动上，更明白表显是饱受帝国主义压迫反映的表现。我们再看在这次风潮中各界所提出下列之条件更可明白：

一、惩凶 从速交出主使开枪及开枪击死工人学生市民之凶手论抵，并由中国政府派员监视执行。

二、赔偿 因此次惨杀案所受直接间接之损失，如(甲)死伤者，(乙)罢工，(丙)罢市，(丁)学校之被损害者等项，须详细查明酌定赔偿额，应由租界当局按数赔偿。

三、道歉 除上述二项外，应由英日两国公使代表该国政府，向我国政府声明道歉，并担保嗣后不再有此等事情发生。

四、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五、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

六、优待工人 外人所设各工厂，对于工作之华人，须由工部局会同纳税华人会订定工人保护法，不得虐待，并承认工人有

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并不得因此罢工开除工人。

七、分配高级巡捕 捕房应添设华捕头，自捕头以下各级巡捕，应分配华人充任，并须占全额之半。

八、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 该三案历经我国政府声明否认，嗣后不得再提出纳税人特别会。

九、制止越界筑路 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筑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十、收回会审公廨。

(甲) 民事案：(子) 华人互控案，华法官得独自裁判，领事无陪审或观审权。(丑) 洋人控告华人案，领事有观审权，但不得干涉审判。

(乙) 刑事案：(子) 洋人控告华人者，其有关系之领事，得到堂观审，但不得干涉审判。(丑) 华人互控案，华法官得独自裁判，领事无陪审或观审权。(寅) 华人犯中华民国刑法或工部局章程，照(丑)项论，且原告名义，须用中华民国，不得用工部局。

(丙) 检察处一切职权，须完全移交华人治理。

(丁) 会审公廨法官，均须由华政府委任之。

(戊) 会审公廨之一切诉讼章程，完全由中国法官自定之。

(己) 对于会审公廨一切事权，除与上“甲至戊”五项无所抵触〔抵触〕外，均可根据条约执行之。

十一、工部局投票权案 租界应遵守条约，期满收回，在未收回以前，租界上之市政权，应(作)下列两项之规定：

(甲) 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其华董及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年会

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国西人一律平等。

(乙)公共租界外人之纳税资格,须查明其产业为己有的,或代理的二层,己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则系华人产业,不得有投票权,其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

十二、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

十三、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

(三) 我们对于屠杀以后的希望

我们既已知道这次屠杀,是由帝国主义压迫(强定不平等条约、占有租界及领事裁判权)的结果,由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以后中国不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则这种屠杀的事变又将重现,上海为直接受帝国主义压迫最烈的中国领土,所以这次事变乃爆发于上海。如帝国主义仍继续其压迫的侵略政策,或者还要施行更甚于现在压迫政策的时候,则这样屠杀的事实,或不仅重现于上海,极有发生于北京、武汉、天津、长沙、广东等帝国主义势力已侵入地之可能。而重现的惨剧,必定比这次还严重、凶恶。

我们如望此种惨剧不再重现于上海及帝国主义势力所侵入之中国各地,则非使中国脱离帝国主义压迫,废除一切过去所订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及关税权不可。这种理由当然有一部分中国国民所明见而深知的,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则绝非部分的反抗力量所能做到,亦非现有的中国政府能以外交手段可解决的,能使帝国主义受打击而使其不能自由发展其侵略政策,而至于退让者,就只有全民众一致的力量。但是中国现有的国民对于

帝国主义侵略的真象,并没有十分明瞭,尤以大多数农民,虽身受其害,然并不知道受害的原因,这是我们反帝运动中的大障碍。甚至二年以前的国民党以及现在的国家主义者,还不敢提出反帝的口号。因此我们对于中国一班青年国民的希望:就是设法使这次上海屠杀的事实变成全国长期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平常我们向一班民众宣传,总难使他们明白反对帝国主义之必要。现在有了这次帝国主义残杀同胞的事实,当然容易唤起一班同胞的同情。同时须注意民众力量的组织,监督政府的妥协和卖国行为,以求达到这次风潮中所提出之各项条件,并进行或扩充反帝同盟的团体变成全国的大联络,集中反帝运动的力量作为长久斗争的根基。遇难的上海国民,应坚持反抗的精神,极力防范上层阶级之妥协及利用,以待全国民众及世界被压迫阶级的援助而求正当之解决。

(四) 反帝运动中应注意的事项

但是我们在这次反帝运动中应当明白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对象,及我们主观对抗之力量,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于中国侵略的政策,绝无分别,且将更残酷的继续,因为他们在欧战之后的互相关系,已与欧战前的形势不同。美国已经占到国际最高经济的统治地位——帝国王,英法等为求恢复其旧有统治,就只有对于殖民地政策更加厉行,美国为保存其现有势力也不会让英法日等国自由发展其殖民政策,使自己失掉现有的地位。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殖民地的政策,是为他们存亡所

系的重要条件。他们对于我们被压迫民族的侵略，决不能以什么人道、尊重国体等的美名所能制止的，互相竞争侵略手段必更将残酷，因此我们应当明白自己的敌人——帝国主义——也决不是仅限于某一国而已。我们若以某一国为反对的对象，则无异于帮助其它帝国主义者巩固其在华势力，认贼为父，将自己更陷于自绝之境，我们要求中国解放的反帝运动应认清所反对的目标是一切帝国主义者。

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主要的目的，当然是要求得政治经济的独立，脱除帝国主义的一切限制和压迫。换言之，就是推倒帝国主义过去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内一切统治的地位和势力以图民族独立和自由；但是我们要知道求得这样的民族自由、经济政治独立，绝非以单纯被压迫民族本身的力量所能做到，尤以在各帝国主义国誓死必争的市场，且为他们的工具——军阀——所分据的中国之民族解放运动，绝非中国民众主观力量能求得根本解放而达到国际平等地位的。这种单方面的进攻绝不能屈服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因此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应当注意联络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从多方面进攻方能动摇其统治威力。我们应认清结合反帝的统一战线，是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成功的唯一政策。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是以刮削弱小民族殖民地及本国工人阶级为生存之必要条件，他们主要的敌人乃是弱小民族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只有这两种力量的联络，一方面在弱小民族及殖民地使其殖民政策的经济根源不安，他方面各本国无产阶级加以政治上的进攻，这方是屈服帝国

主义统治地位的唯一要策，亦即为殖民地及弱小民族得到民族革命成功的主要机会。因之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中，应极力注意与一切被压迫民族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势力联络，绝非国家主义者的清高理论，只以中国民众力量可能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的，这种清高的国家主义理论，无异于使中国民族革命成功的期限延长，实质上则等于援助帝国主义者施行殖民政策延长机会，我们要明白统治阶级的国家主义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运动之环境和目标完全是两样绝不不同的东西。统治阶级是要借国家主义的精神去实行殖民政策，被压迫民族乃是要从各统治国家势力之下去求得自由平等。我们不要忘记联络被压迫势力，是我们长期反对帝国主义及推倒帝国主义运动中的主要条件。

（五）长期反帝运动中学生的责任

这次上海屠杀所引起的全国反帝运动，在中国民族革命上是含有极大意义的。我们对于这次运动的希望，就是使全国民众了解帝国主义的真正面目，同时使他们知道反对帝国主义应注意的几点，简言之，就是注意民众中的宣传。学生在这次运动中主要的责任，也就在宣传上的工作。在做宣传工作之先应认清现代中国学生界的使命。

欧洲学生界在资产阶级革命前，俄国学生在十月革命前，都是革命的先进分子，同情于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因为学生中的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亦受当时政治与经济的压迫，他们为自

身生存条件之改良，所以为革命而牺牲者非常之多。如俄国学生在十月革命前牺牲学业到民间去向农民宣传的，风盛一时；现在中国学生界无论在经济或政治上无不受尽各种压迫和限制，全国人民无不直接间接受尽帝国主义的压迫摧残的。在这种环境下的中国学生，负有民族革命的绝大使命；现在的中国学生应不惜本身的牺牲去为民众利益而奋斗，务须将民族革命的负担拿在自己的肩上，要用这样勇敢和毅力去执行革命的工作。

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第一步，还是要注意于民众的政治教育，取得民众同情于革命之多数，方才能使革命的实力发展。同时则须注意到民众力量的团结。综合言之，目前中国国民革命重要工作之一部即在于宣传与组织，这种工作也就是现在学生界应负的主要责任。

我们要知道革命事业的成功，绝非纸上宣传的力量可以做到，少不了要亲自深入群众，与革命的群众接触而明白他们的心理和需要，且指导他们应进行的组织和活动的工作，注意取得民众的大多数。遇到必要的时候，流血的牺牲亦为革命中不可避免的。我们宣传与组织的对象应当预先认定清楚，现在中国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当然为最大多数的农民和社会地位最苦的工人，而这两种中间最有革命力量的还是产业工人。因为工人阶级的经济压迫比任何阶级残酷，同时因受资本主义化的产业发展之赐，使他们特别容易觉悟而进行组织。如最近半年来的上海青岛武汉之罢工及全国劳动大会的事实就可以证明。因此现在的学生，应当打消宗法社会工学界限的观念，多注意与工人接洽，帮助工人的教育，开办平民义务学校，组织工人俱乐部及工

会，灌输工人政治常识，解释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等，使工人阶级能早日觉悟而团结，这是第一件重要的工作，凡在大城市及工业区域的学生尤应特别注意。农民在中国人民中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大多数因中国经济落后，交通隔阂，所以他们的思想和观念非常落后，然而我们应认定他们是革命中有力的军队。他们既占人口的最大多数，且在经济生产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我们绝不能放松，在他们中间工作的环境当然较在工人中为难。其工作的主要点也不外是宣传与组织两项，这种普遍的宣传组织工作，学生界应负大半责任。因为学生多为四乡集中于城市的，每逢寒暑假时节，学生回到乡村的时候，应特别努力在农民中活动。这种活动的方法当以各地环境为转移，但其共同点，不外为联络本乡同学组织讲演队、新剧团，开办平民学校，组织贫农农会，为他们做反对地主乡绅及减租等运动，提倡协作社、习武团，联络一班先进农民及本乡小学教师组织国民党，作为永久活动的基础，这都是每逢寒暑假期内可能做到的工作。

总之，我们要明白这次上海的屠杀和屠杀后所引起的罢工罢课罢市以致引起全国的运动，绝非偶然无因的事。这次遇害先烈的热血，在中国民族革命的历史上面有绝大的意义，亦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所认为有价值的牺牲。帝国主义者所目视的贱种，现在也有了觉悟反抗的能力了，恐怕他们从此也将要改变其以前任意屠杀的手段了。前途事业之如何，还待一班中国青年的努力！

（《中国青年》第81期，1925年6月23日）

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

秋 白^①

(一)

最近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使帝国主义者异常的惊惧;尤其是去年北京政变之后,国民党势力的向北部伸张,各地工人群众的斗争,有根本上动摇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之趋势。如北方铁路工人恢复工会的运动,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成立,青岛上海纱厂工人的罢工,北京印刷工人及汉口烟厂工人的奋起,以至于五月间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及全国总工会的成立——总之,从一九二五年年初起直到现在,中国无产阶级逐步的斗争,树立总的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新势力,当然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者反攻的高压政策;他们知道这是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可怕的力量,决不能放任它尽量发展。五卅以前帝国主义者早已逐步的防范,利用他们的种种工具,如工贼买办军阀官僚等,施以压迫。这两方面——一方面是国民革命的势力,尤其是它的先锋无产阶级,别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列强,尤其是现在占有政治权力的日本——相互之间的斗争,一天一天的激烈起来,直到五月三十日而大大的爆发。

我们应当知道,这五卅屠杀案,不但在国民革命运动的历史

^① 即瞿秋白同志,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

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对于世界革命运动,也有极密切的关系。世界资本主义在俄国革命之后,一直在动摇崩溃的过程中,直到最近方才有略略稳定的趋势,这就因为列强的资产阶级虽然在本国对无产阶级进攻不能得着像〔称〕心如意的胜利,可是对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经济侵略,近两年来,却能用着全力来经营。对于中国呢,尤其是英日两国的工业资本,进取得最为厉害。譬如这次世界纱业恐慌的期间,日本资本主义,首先便对于上海、青岛的中国工人进攻。他们以为中国工人最落后,最没有组织,纱业里减少生产成本的计画〔划〕,可以从这里实行起。原来英日两国,都已在中国设有多数工厂,尤其是纱厂;而日本又靠着有亲日派的中国政府,可以畅所欲为。这些资本家以巨大的投资和残酷的剥削,来和中国资产阶级竞争,已经并吞了不少中国纱厂,这次纱业恐慌,他们以为中国小资本家禁不起,他们可以一方面裁减工人,换用女工,以减低生产成本,一方面挤轧中国纱业,乘机投巨资来收买。殊不知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不能忍受这种残酷的剥削,已经觉悟自己的团结力,——在上海及青岛两处居然举行很大的罢工,给日本资本家以重大的打击,虽然上海青岛的工人都没有争到经济上的胜利(青岛第一次罢工,只加了一分钱一天的工资,非常有限的),然而工人的团结力已经表现出来,工会已经得了事实上的承认——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最痛恨的。不但如此,这两地的第一次纱厂罢工,都还有一种政治的民族的斗争的性质:中国工人反抗日本资本家的斗争,引起中国一般社会有意无意的同情,中国商会学生会等大半都趁此鼓起一种排日的运动。这种无产阶级领导着的国民革命运

动,不但对于日本,并且对于各国帝国主义者都是很可骇惧的势力。

于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一面极力造谣,说这是赤化,这是中国人排外的义和团的精神之复活,一面想尽种种方法与工会挑衅,想要扑灭它。青岛和上海两处,他们用同样的方法——闭厂罢业以拒绝“不安分的”工人,抵死不承认工会,以引起工人中的扰动。他们在青岛借助于张宗昌、温树德的兵力,残杀工人(死伤二三十,被逮七八十人,被堵在阴沟死者尚不计其数),并且停闭工厂;他们要摧残有组织的工人,所以趁此纱业恐慌期间,准备停歇生产若干时间后,再另招“驯服的”不敢要工会的工人。他们在上海也是如此扰动工人之后,就停闭工厂,工人要求发给薪资的时候,资本家竟开枪轰击,杀死工人顾正红,伤无数;他们更与英美意等国的帝国主义者——所谓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合作,以摧残这些工会。可是这决不仅是工人与资本家间的斗争;工会运动,他们固然怕,而援助工会的学生,一般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运动;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运动,他们尤其怕。并且这已不仅是日本一国,而是各国帝国主义者所共同敌视的运动。这种运动随着他们的压迫而起于上海。所以日本在青岛虽然能指使军阀完全扑灭工会,而禁止中国一般人民的反抗;在上海他却不能了。

上海自从顾正红被日资本家亲自打杀之后,一般的学生及小商人的群众,早已跃跃欲试的忿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残暴。同时,工部局不但帮助日资本家,压迫罢工工人,而且正在这个时候,又提出印刷附律码头捐等于上海的纳税外人会议,想在

上海更进一步的统治中国人。这两件事：日资本家及工部局摧残工会与纳税外人想剥夺上海中国市民的自由权——凑合在一起，于是把斗争的阵势扩大了。当上海学生为顾正红被杀，工会被摧残，并且反对印刷附律码头捐，而出发演讲时候——列强帝国主义者便大自惊扰起来。他们不想一想：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进攻，怎样扩大到各国帝国主义者共同镇压中国工人的反抗，共同压迫一般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之自由；他们却只看见中国人民一致的从排日而进于排外，从阶级斗争扩大而为民族斗争，“奴隶都想要自由了”，他们便毅然决然施行屠杀政策。上海南京路上的枪声响了，中国学生工人市民的血流了，帝国主义者想用这枪声血泪巩固他们对于中国人的统治！

(二)

虽然，帝国主义屠杀政策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引起了全国民众反帝国主义的怒潮。上海五月卅日南京路屠杀之后，帝国主义者的列强，英美日意法等国的军舰都开来了，海军陆战队都上岸了，各国资产阶级的武装“打手”——所谓上海万国义勇队都出巡了；上海市上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西捕水兵义勇队，通街大衢都放着机关枪大炮铁甲汽车。接着汉口九江镇江天津安东，凡是列强有驻军的地方，无处不实行这屠杀政策和炮舰政策。——各地死者百余人，伤的无数，被殴辱的更不计其数。越界捕人，强占学校等的寇盗行为，更是时有所闻。这种强暴的政策，帝国主义以为可以镇压住中国民众的反抗，可是事实上适得其

反,上海市民立刻便全体罢市罢工,没有三天,反抗运动普及全国,各大城市的示威游行及市民大会一致反对这种帝国主义的屠杀政策。各埠租界上外人工厂及企业中的中国工人已经继续起来,实行罢工反抗,天津、汉口、广州的工人已经发动。“假使五月卅日以前只有几千几万人知道帝国主义的罪恶,知道国民革命的必要,那么,五月卅日以后,至少已经增加到几百万几千万人!”我们听说上海街头巷口无一处没有不反对外人的招贴,无一处不唱反对外人侵略的歌谣,——便可以知道了。

五月卅日!这确是中国国民革命开始的一天!

可是这总的国民革命的怒潮里,已经立刻发现出内部的分化,这是不可免的。因为中国在列强帝国主义者的统治之下,有军阀官僚买办阶级等受某一帝国主义者的驱使;有许多妥协软化的分子,不敢为反抗帝国主义统治的制度,却只想求一个帝国主义的强国出来主持公道;亦有大多数的平民、小商人和劳动者,认清这种屠杀政策出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合谋,所以坚决的主张,从要〔要从〕此开始中国民众的大组织,实行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革命运动。因有这种分化,所以在这次国民革命开始急进的过程里,可以看出:一、对帝国主义的要求,二、反帝国主义的战线,三、反抗运动的范围,都有不同的主张。军阀官僚买办阶级纯粹做帝国主义的工具,他们或者替日本反对英国人,替英国反对日本人,表面上似乎投合一部分的思想潮流,实际上他们完全是反动而压迫民众的;譬如英国的萧耀南派兵保护外侨,出告示说“排外的格杀勿论”,禁止民众运动。他并且已经嫌英国人杀得不痛快,又帮着斩了七个“过激派”的头。日本的张宗昌严

禁学生市民提及青岛的事,却也不得不准人民对沪案表同情。这种人我们只能当他就是帝国主义者,一致的反对。至于其余两部分同在反抗运动里的人,他们的主张很值得分析一下。

反抗五卅屠杀案的各地各界的要求里,我们可以看见一种最正当和最彻底的主张,便是要求:

- 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 二、收回一切租界及租借地
- 三、收回海关及盐政管理权
- 四、收回领事裁判权
- 五、永久撤退驻华的一切外人的武装势力
- 六、中国人民之绝对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

同时,我们又可以看见一派的主张,便是只要求:

- 一、收回上海的会审公堂
- 二、上海租界纳税华人的参政权
- 三、停止越界筑路,收回租界外之工部局马路
- 四、道歉、惩凶、赔偿、罢业者不扣薪等

前一种的要求是革命派的,后一种是妥协派的。这里我们显然可以看见妥协派的要求只是恢复不平等条约的原状,争回外人在不平等条约以外所侵夺的东西,再则这种要求只是代表少数上海富商的利益——纳税人才有参政权,而且不敢剥夺外人在中国领土内的干预市政权;三则争一个空面子,速图了结上海五卅事件。革命派的要求呢,却是着眼在民族的利益,根本要中国的解放独立,脱离殖民地的地位;因为只有这样,中国自己的实业才能发达,中国平民的权利才有保障。关于废除不平等

条约,即使说不能以罢市罢工的手段达到,那么,至少我们可以提出这个要求,我们中国可以立刻提议召集国际会议,重新审定一切条约。如果中国现在的政府不能做这件事,那么,现在全国民众正在奋起,很可以自动的组织工商学农各界,推翻军阀的政府,而以革命政府来实行这种使命。再让一步说,我们即使现时还没有这种实力,那么,至少我们应当力争中国平民的政治自由,力争撤退外国驻军和取消领事裁判权——使平民有组织自己力量的自由,以为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准备,以进行国民革命的运动。如今上海总商会的主张就是那妥协派的要求;而上海工人学生及一般商人的主张,却是革命派的。尤其是上海的以及全国的工人阶级(如长辛店铁路工人,开滦煤矿工人)很明显的要求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这种革命派的要求,实在代表全民族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因为帝国主义暴行的代价,决不是道歉赔偿等所能了事——平民群众在这次斗争再不能取得这最小限度的自由,日后帝国主义的屠杀还要肆无忌惮,而中国方面却绝没有组织团结的力量去抵抗。

至于反帝国主义的战线问题,亦有妥协派和革命派的分别。妥协派以为我们若只对一两国进攻,我们的力量还够,如果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他们合力压迫,说我们是排外,我们便抵拒不了。殊不知:(一)现时各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利益互相冲突,此次事变中,决不会有“八国联军”的事;(二)如果我们窍〔核〕定名实反抗公共租界的各国,他们之间,自然互相推诿,各求卸责而卖好,而后我们的交涉能得着胜算。否则我们自己先唱甚么“中美亲善”,美国水兵杀了人,他们的领事却反过来问:为什么在美

国人那里做事的也罢起工来；(三)此次案件，事实上是各国帝国主义联合进攻，以求巩固其统治权，我们正应当指明出来，使民众一致起来反对这一帝国主义的统治制度，假使那一国果真要“亲善”，他便应当抛弃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自动的废除不平等条约。革命派的主张，亦并不是一定要扩张战线，反对一切外国人，恰恰相反，他们主张应当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及无产阶级联合，要求他们起来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他们主张缩短战线，不但只反对英国日本等，并且只反对英国日本等的军阀财阀。妥协派的缩短战线政策，却是向民众掩盖了法国派军舰、美国水兵杀人等的事实，去说中法亲善或中美亲善，希图美法主持公道。这结果“公道”是没有人主持的；民众却受他们蒙蔽了！所以妥协派只想速了，如梁启超、江亢虎等，竟要蒙蔽民众，把反对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变成对英对日的狭义的国家主义，甚至于变成反对工部局巡捕杀人的简单口号，这简直是代帝国主义想法，替他们巩固这种统治制度，把群众的目光只放到杀人问题上去，仿佛只要帝国主义不杀人，我们便无论甚么，都愿意容忍的。至于现在有一派人甚至于只主张反对英国而忘了日本，那就太明显了！——日本是这次事件的正凶，是摧残工会、摧残中国平民自由的首犯，如何可以放过，除非是受日本人及段政府的暗示——想把一切罪名脱卸在英国人身上，让日本仍旧实行他的压迫工会政策！

其次，关于反抗运动的范围，妥协派现在已经尽着叫——“这是地方问题，汉口上海各自解决！”事实上枪杀市民和压迫工人是同样的形势，而且汉口是为援助上海而起的。全国的民众

已经本能的自觉的起来一致奋斗，应当联合起来实行大规模的反抗帝国主义运动。正因为帝国主义在汉口安东等地方，到处实行屠杀政策，我们更可以提出总解决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问题。然而妥协派却只是为帝国主义者想法，务求速了，就地解决。

总之，妥协派的主张：一、是撇开大多数民众的要求，牺牲平民的自由；二、是缩短战线，不敢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制度；三、是缩小范围，只求就地解决。同时，他们尽着争一个表面上的妥协和面子，使五卅大屠杀案早日了结，只求“平平民愤”好使反帝国主义运动不能继长增高的起来。他们违背民众利益，已经显然，而间接的帮助帝国主义者，蒙蔽民众的民族意识，消弥革命潮流的“功绩”，也就不小了。五卅大屠杀案之后，国民革命是开始了，帝国主义的残暴政策不能镇压它，而妥协派的国民政策却想破坏它。妥协和革命派的分别，正在于：妥协派，看见国民革命开始，赶紧想法抑遏民众的自由，缩小范围，缩短战线，以阻滞这革命运动的进行；革命派呢，力争平民自由的保障，揭发各国帝国主义联合压迫中国的真相，联合全国奋起的民众，一致向帝国主义的统治制度攻击，以发展这革命运动，而求达根本解决中国的目的。

妥协派虽然表面上似乎还站在人民一方面，实际上简直是卖国背叛民族利益的分子，——因为中国民族假使不能觉悟革命的必要，假使只争着租界上些小的参政权，承认外人的统治，那么，以后的被屠杀，还多着呢。我们不能立刻达到我们的目的——并不要紧；最可怕的，是我们忘记自己的目的，故意欺骗民

众,阻止民众进行革命运动。革命派的要求和主张,才是代表多数民众的利益,引导革命运动的进行。最近反帝国主义的怒潮之中,我们应当竭力战胜妥协派的主张,否则已经开始的国民革命,始终要被他们破坏掉的。

最后,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指出,现时除萧耀南等反动的军阀,直接做帝国主义的刽子手之外,段政府外交官僚的抗议交涉,也都是一时的装腔做势,妥协让步的端倪早已暴露,还有上海总商会内少数买办阶级及富商,亦是只看见自己的利益,而牺牲民众。我们真正的平民,不依靠他们,应当独立起来力争我们的自由,团结我们力量,至少要商人、学生、工人等各自团结起来,甚至于有武装的准备,有全国的联合,——这是现时盛行的经济绝交口号之外的更重要、更切实的工作。中国的国民革命开始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快要崩溃了!团结我们自己的力量!

(《向导周报》第119期,1925年6月22日)

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

秋 白

五卅屠杀后,全国反帝国主义运动勃兴起来,上海香港广州的工人,实行同盟罢工,各地的学生商人积极的抵制英日货——各阶级的斗争一天一天的革命化起来。最初的运动里,我们看见上海青岛的工人,争工会的自由,争工资的增加,上海的商人反对码头捐、印刷附律等,还纯然是经济要求和地方问题;甚至

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条要求，也偏重于上海的会审公堂及工部局华董的问题，还没有完全离去地方的性质。可是全国各地屠杀案重叠而起，各地民众运动日益发展，对外的要求便自然变成全国的性质和政治的性质——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换句话说，便是要根本推翻列强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统治地位；具体的说来，便是要求收回一切租界，收回海关管理权，废除协定关税的制度，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军，废止外人在华得自由设立工厂等等的特权。

这一中国民族解放的总要求，自然使反帝国主义运动里实际上成立全国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五卅以前这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往往还有人说是赤化过激。其实这一要求是代表全国各阶级权利的要求，是代表全民族的要求。废止协定关税，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一切租界等，难道不是独立自主的民族所应有的权利？何以五卅以前一般社会提都不敢提，只有少数革命分子努力的宣传，还要被人指为过激？五卅以后情势便大不同了。不但工人阶级一致的提出这一要求，不但全国的学生群众努力的宣传和鼓吹，甚至于段政府都不能不提出修正不平等条约的通牒，上海总商会等类的团体，以及一般商人都赞助这一口号，而且参加运动。这是甚么缘故？因为五卅以后中国的历史已经开始一个新时期——实行国民革命的时期。中国工人阶级为着抵御帝国主义的压迫，首先开始斗争，他们不但要改善自身的经济地位，而且代表全民族的利益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工人阶级处于最受压迫的地位，他们除锁链而外，真是一无所有，他们不象资产阶级有患得患失的懦弱心理；而且他们知道中国

民族处于列强统治之下的时候，工人阶级决不能独得着解放，要解放自己，必须同时解放全民族——如果中国还在半殖民地的地位，即使工人偶然得着外国资本家极小的让步，也仍旧是靠不住的。因此，上海青岛日商纱厂里的工人，因为受压迫虐待到了极点而罢工反抗——这种局部的阶级的斗争，马上便使工人进一步而提出民族解放的总要求，而且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运动，使帝国主义者暴露他们极残酷的剥削制度；随后五卅以来青沪汉粤渝甯等处的屠杀——帝国主义所用以镇压“暴动的奴隶”的政策，尤其将平素大家所不大注意的列强统治中国的实状彻底的显露出来。于是全国工人阶级总同盟罢工以反抗这种屠杀的事实实现出来，而推翻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从此便成了人人所彻底了解的口号。尤其是上海香港的工人，罢工人数达四五十万，组织上非常团结，实际上与帝国主义者以很大的打击——表示中国民族的真实力量。汉口、青岛、南京等处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也都是工人做先锋队。因有工人群众的奋起，做实际的斗争，全国国民都觉到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不是不可能的，中国有组织的平民是有这样的力量的；于是上海便首先成立工商学联合会，学生商人也都能来参加，并且成立联合的组织和实际行动的机关。其他各地也有类似的组织成立。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为事实。所以五卅以后反帝国主义运动确已进了革命行动的时期，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也已经不仅是宣传上的口号，而成了群众斗争的实际目标了。由此我们可以得一结论：因为工人阶级最被压迫，因为帝国主义者实行露骨的残暴政策，所以全国一般民众都知道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必要；因

为工人阶级的组织和行动表示出中国人民的力量，因为工人阶级能代表全民族提出解放中国的要求，能以实力表示为全民族而牺牲的精神，所以全国一般民众都感到自身的力量，抛弃以前甘于奴隶的懦弱心理而起来联合工人做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如今全国各阶级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得以实现，实在完全因为有工人阶级的勇猛斗争。反过来说，譬如五卅以前，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没能集中，还没有表现，一般资产阶级连收回会审公堂等要求都不敢提出，何况废除不平等条约？北京政府日日对外人罚咒“外崇国信”以求媚，还敢说修改条约！可见这次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是工人阶级所引导的，全国人民敢于奋起与外国帝国主义者奋斗，敢于提出要求条件，也是全靠工人阶级做后盾。

五卅以后，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一日千里的扩大起来，各阶级实际上共同斗争的联合战线也渐渐的巩固起来。帝国主义者剥削侵略了中国八九十年，向来没有遇见这样有力的反抗，现在自然异常的恐惧，千方百计的要求破坏这一联合战线，夺回中国民众所已得的胜利。中国民众最近两月来斗争所得胜利是甚么？就是各地，尤其是上海香港的工人已经事实上组织起来；上海总工会及广州的罢工委员会已经成了群众的斗争的机关；各地的雪耻会、后援会、工商学联合会等民众的组织也逐渐集中革命的民族运动的力量。而且全国各界的联合战线，一致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向来所没有的。所以帝国主义的政策，便是要摧残这些民众组织，破坏这一联合战线。第一、他们赶紧声言要召集关税会议，他们的目的是在拿这点小利引诱政府和军阀，使政

府软化而帮助他们来压迫民众；帝国主义者（所谓十一国商会），在上海竟公然与总商会秘密谈判，口头答应交回会审公堂，工部局里准设华董等等，他们想借此欺骗中国的资产阶级，使商人等退出国民运动的战线，置工人阶级的利益于不顾。第二、帝国主义者的报纸和他们所发的华文传单《诚言》，拚命的宣传，颠倒是非，诬蔑工人学生，造作许多吞款暴乱等的谣言；雇用流氓打手，对于工会及工人领袖横加摧残，任意杀害。第三、帝国主义者更指使中国的军阀压迫工人，摧残国民运动。总之，他们的种种政策和手段，无非是要使工人阶级孤立无援；破坏了联合战线和工人的团体，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便自然解体，不足怕了。

对于中国人呢，却正要巩固我们的联合战线，保持我们已得的胜利——工人及民众的团体，才能有继续斗争的力量。而且应当更进一步，格外扩大联合战线，统一全国民众的力量，更加巩固工人及民众的组织。联合战线之中工人阶级是最忠实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这两个月来上海香港工人的罢工，力争民族的权利，便是明证。然而资产阶级是否能同样的忠实呢？上海工部局停止供给中国工厂的电力——这是中国实业完全不能发展，中国完全没有主权，使电气厂等主要的市政实业都落在外人手里的结果，正是中国实业家所应当反抗的。可是中国这些实业家，却只图小利，甘心屈服，反而来强逼工人去上工，反而帮着帝国主义者来破坏工会。罢工工人连身家性命都牺牲在民族斗争里，而这些资产阶级连停闭几天工厂的损失都舍不得牺牲，——就此破坏国民运动的联合战线！至于中国的军阀政客工贼等更不用说了。所以现在的急务，便是努力巩固联合战线和民众的

组织——积极反对那些直接的间接的帝国主义工具。谁破坏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破坏工人及民众的团体，谁便是卖国贼，便是帝国主义的爪牙，全国应当一致的反对他。全国各阶级都应当积极的奋斗，联合，保持我们已得的胜利。

我们应当赶紧进行全国工商学农各界的大联合，以人民的力量促成全国政治的和军事的统一，使政府真正成为人民的政府，武力真正成为人民的武力；各阶级都应当和工人阶级一样的决心牺牲和奋斗，那时我们最终的胜利才有希望。我们两月来困苦的斗争为什么至今还不能胜利？就是因为：一、资产阶级等只顾私利而破坏联合战线，二、没有统一的人民政府，三、没有真正人民的武力。所以我们必须先使各界一致努力于全国联合大会的运动；这全国人民的大会要以实力促成全国的统一，实现平民的政权，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等，武装平民，成立全国统一国民革命军。那时全国人民的力量才能得最大限度的集中和统一，向帝国主义者作战。这是一个很长期的斗争，工人阶级在这一斗争里，始终都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他督促各阶级一致前进，率领全国民众奋斗——一定要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目的。

(《向导周报》第125期,1925年8月18日)

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

——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

瞿 秋 白

(上略)

(二)

中国的劳工运动，自从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汉口的屠杀之后，一直到去年初，差不多全部在蛰伏之中，虽然上海、广州、香港等处，还时时有罢工的爆发，——尤其是前年的沙面罢工，然而概括而论，在中国的范围內，始终因受直系军阀及英美帝国主义等强暴的压迫和屠杀，不能有勇猛突进的发展。直到北京政变——两年来以无产阶级运动之酝酿为“底力”的国民运动之结果——社会上的革命力量才得着了一个开展的环境，尤其是无产阶级，处于严重压迫之下既如此之久，当然稍有可能便要乘机奋斗。北部铁路工人的组织正式的在北京、河南等处恢复过来；工会的自由、罢工的自由，成了全中国工人群众的要求。恰巧在这个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趁着奉张势力的复盛，一面赞助他压迫国民军，一面便因棉纱市场的恐慌，以增加工作、减少工资，裁减工人的方法向中国工人进攻。于是上海(二月初)的内

外棉厂及其他日厂，青岛(三月间)的日商纱厂相继罢工。中国工人在这几次罢工里，都因组织巩固得到相当的胜利。全国劳工运动从此又得了勇猛突进的形势——如北京三月间的印刷罢工，汉口五月间的英美烟公司的罢工等等。帝国主义者当然继续着以屠杀政策、威胁政策和中国人民相周旋；福州学生(四月间)抵制外货，美国军舰十二艘抵厦门，以武力干涉。上海、青岛的日本资本家在第一次罢工之后，千方百计悔约压迫工人，故意挑衅，要想趁势夺回工人的胜利。日商工厂里的压迫专制，向来便是绝无人道惨不忍闻的；工人所得的“罢工胜利”，也不过是比较上说，其实便是罢工之后，工人所受压迫，当然还仍旧是统治殖民地劳工的特别奴隶制度。日本资本家这样的手段，便使所有日本厂里的工人时时刻刻在激愤怠工之中，因此，他们便任意的敲打强迫，结果，在上海内外棉厂里的工人顾正红，因要求发给欠薪而被杀(五月十五日)；在青岛日本人指使张宗昌杀死工人二人，以武力强迫怠工工人离去工厂(五月二十九日)。

帝国主义者这种屠杀政策，引起中国人民一般的愤激；上海南京路上的五卅惨案，便因中国学生工人的抗议这种屠杀和列强帝国主义的上海政府(租界工部局)之印刷附律、码头捐等而发生。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近年来国民革命运动的奋起时期中，看着他们向来利用军阀的间接统治制度逐渐动摇，便想以直接屠杀威胁的政策来扑灭“废除不平等条约”、“国民会议”等的“过激派运动”，并且想在上海直接统治地的租界上，箝制中国人的舆论，进一步的压迫中国人(如印刷附律、码头捐等)。然而现时的中国——从五四、二七以来的中国，决不是义和团时代的中

国，可以用屠杀政策、“惩罚战争”征服得了！五卅的屠杀，立刻激起上海二十余万工人的大罢工，学生的罢课，商人的罢市。虽然帝国主义在六月初旬继续的施行屠杀，海军陆战队上岸，武装商团出防，军舰云集的来威胁，然而镇江、九江、汉口、南京、重庆、青岛、广州等处的民众，都还是更加勇猛的一致起来和帝国主义者奋斗，尤其是国民政府之下的香港、广州工人。五卅运动实际上是开始中国从古未有的群众革命运动，而且处处都是工人阶级当先锋，以最勇敢牺牲的革命精神，以实际的群众团结的力量，来争平民的权利，争自己阶级的利益和民族的解放。——除上述各地外，还有济南、河南（焦作矿工、郑州路工）、唐山、北京、天津等地的工人，他们都在这一国民革命运动和阶级斗争里，团结集中自己的力量，各地（河南、北京、天津）都和上海一样，有总工会的成立。

五卅运动的意义，正在于中国工人开始执行他的历史使命——领袖国民革命以解放中国民族和自己。——中国的国民革命从五卅开始了！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跃登历史舞台，使国民革命中充实了群众的革命力，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统治根本动摇。五卅运动的第一点特性，便是使中国的政治运动第一次群众化。——列宁说，平时过问政治的只是几百几千至多也不过几万人，可是真正的政治运动，真正的“民权”，只有劳动平民的革命政治，只有几百万人几千万人所过问的政治。五卅以前，北京政变，孙中山北上以前，尤其是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所谓“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等运动，只有共产党努力去做，差不多连国民党右派——张继、

谢持、邹鲁等,都认为是过激派的赤化宣传,是离间国民党与“友邦”、“友军”的奸计。可是,到了五卅之后——一般民众以至大资产阶级的总商会,都觉国民革命的实力已经实现,或者存心利用以达自己的阶级利益(如大资产阶级)或者受着列强侵略的刺激和平民力量兴起的兴奋,都一致的趋于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

五卅后民众运动的发展,一直波及于穷乡僻壤,山西太原等处都有工会的成立,江浙则甚至于小小村镇如双林、义乌等处,都起来响应。上海的街头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岁的儿童,争着写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争着唱五卅流血的时调山歌。这岂不是革命运动深入普遍的群众之明证。

中国国民革命的经济基础,本来是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间之冲突,尤其是国外资产阶级与中国劳动平民之间的阶级斗争。如今帝国主义者因为不能痛快地继续他们的统治政策,不能如意地利用卖国军阀——直系势力一经摧败,奉系势力之发展又遇见国民军和劳动民众的障碍和抵御,于是从上海五卅起,竟实行大规模的屠杀,汉口(六月十一日)、广州(六月二十三日)、九江、重庆、泸州、青岛、福州、天津、大连,……暴露他们向来的种种假面具,惊醒了一般民众。中国资产阶级之发展早已使中国社会里发现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酝酿着三四年的国民革命运动,断然不能再忍受这种强横的压迫。于是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实现,全国各阶级各自奋起而汇合成一空前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第一次实现于实际行动上——这是五卅运动的第二点特性。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租界、收回治外法权等,从此已经为一般群众所了解,从此

便有了实际上的意义；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成立，他所提出去的条件，就足以证明联合战线的实现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口号实际上为一般平民所接受。五卅运动初起的十几天内，不但上海小资产阶级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积极的参加这一斗争，全国各地的平民商人，没有不赞成这些条件、同情这一斗争，就是半买办半资产阶级的上海总商会，至少也以消极的态度参加这一战线——上海总商会的破坏联合战线，在他表示参加运动，组织所谓五卅委员会起，他没有参加工商学联合会并且没有表示态度的时候，虽然可以说是有意的怠工，可是实际上是他没有影响总的运动，没有敢来争这一斗争的指导权。上海而外，汉口有工学联合会的组织，北京、天津、河南等处也有类似的组织；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正在找寻他的党的组织形式。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在头两个月差不多成了地方政府。其他各地，虽然组织上没有确定的形式，然而商会、教育会、教职员，甚至于省议会等官僚机关，无不随着五卅运动的总潮流而随波上下；可以说，这一开始于日厂工人的运动，开始于无产阶级全国大罢工的实际斗争——领袖着爆发的国民革命中之各阶级而前进，震荡了全社会的一切活力。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里无产阶级的领袖地位和政治指导，不但实现于实际行动，而且在这斗争里证实了无产阶级是能解放中国民族的主要力量。再则，中国国民革命和世界的社会革命之联合战线，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联合战线也在这一次实现出来——苏联、英、法、德、日等无产阶级及其革命的政党，共产党，都奋起援助。全国各阶级，如果能持久继续这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坚持废除不平等条

约等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诚意的参加革命,承认劳动平民的一切罢工结社的自由权,赞助上海、香港以至全国的工人阶级艰苦斗争,——并且有国外无产阶级的援助——当然不难根本推翻帝国主义者的统治和他们的代理人——军阀。

现时帝国主义的世界里,如果失去中国这一大殖民地,决不是对于某一强国的打击,却是对于帝国主义制度的致命伤。因此,英、日、美、法等国都是想一致的进攻,他们不能不以种种卑劣欺诈的手段来破坏这一联合战线。可是,国民革命有巩固的联合战线,并且在无产阶级的指导之下的时候,革命潮流高涨到顶点,举国一致反抗帝国主义制度的统治,列强之间的一致进攻是不可能的——他们各国在中国的势力与利益各不相等,而且互相冲突,各自想保持自己的势力和“华人的同情”,不能为英国所牺牲。六月初旬至中旬的时候,除英国之外,都不敢公然进攻,无不竭力声辩,甚至于倡言赞成废除不平等条约,如六国委员不一致,不肯公布调查结果,美国立刻解决蔡继贤案,日本政府的非正式表示等等都是明证,这恰在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呼声最高的时候。再则,段祺瑞的军阀政府,恰在这个时候(六月二十四日)正式以外交公文要求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种种方面表示自己的“爱国”;张作霖原本在五月底要想进京攫取政权的,五卅运动一起,只能退出关外;张学良到上海来镇压民众运动的时候,也不得不先捐给学生会两千块“买路钱”,表示是来防御外敌的。军阀的统治,在这时候显然是失去了自己的基础,至少也在极端动摇的状况之中。所以,五卅运动的第三点特性便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足以使帝国主义不敢一致进攻,

军阀统治根本动摇。

可是，这一联合战线不过继续一二十天之久——上海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商阀——总商会——“积极”起来了。国民党的右派“站起来”了。总商会的积极，立刻擅自修改代表上海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市民的工商学联合会的对外要求，抹煞工人的罢工结社权利，取消撤退外国驻华武装势力的条件——出卖平民的权利以谋与帝国主义者妥协，破坏国民的联合战线。一般高等华人，不用说研究系的梁启超、丁文江等卖弄他们的“学问”，主张妥协和平渐进，甚至于反对抵制外货；就是所谓“站起来”的国民党右派，如戴季陶先生等，在浙江国民党临时省党部通过反对阶级斗争的议案后，立刻公布他们单独对英的主张，希望日本“回东方来”（见季陶之《中国独立运动之基点》）。五卅运动的发展到七月中便完全陷于“单独对英”的对日妥协运动之宣传里；理论上既有戴季陶先生的高论，以及北京一般反动的大学教授和国民党的种种右派的宣传，事实上便有上海总商会方面的买办分子竭力压迫上海总工会和日厂谈判，如此四面八方——戴季陶、大学教授、反动的右派、买办资产阶级、交涉员等——强迫恐吓欺诈种种手段的对付上海总工会，结果竟使日本厂的罢工工人不得不屈服而上工（八月十二日）。这种现象，显然是中国资产阶级想在国民革命中争得指导权以停止革命的解放运动，而用妥协策略取得自己的阶级利益。帝国主义者在这时候，一方面驱使奉系军阀到处开始屠戮革命的平民（青岛、天津、上海、南京等）；一方面便因为中国国民运动的目标单集于英国，其他各国无所顾忌，正可一致进攻，同时利用机会以稍稍挫折英国在

远东的气焰，而且用空口的人情诱惑中国的高等华人以破坏联合战线，于是所谓关税会议、法权会议的提议都通过了。威胁劳动平民、利诱高等华人以一致进攻而破坏革命联合战线的帝国主义政策，便在总商会、国民党右派的妥协之后完全实现了。并且奉系军阀也是同样的政策，他们（七月间）封闭工商学联合会，不准许启封，以示恩威于资产阶级，同时极端戒严，压迫工人。帝国主义、军阀的这种离间政策和资产阶级自身的妥协策略之下，上海总商会第一步修改条件（六月十三日），第二步先行开市（六月二十五〔六〕日），第三步压迫日厂工人上工（八月十二日），第四步与十一国上海侨商商会妥协而暗示军阀使封闭总工会（九月十八日）。全国小资产阶级逐渐受军阀资产阶级的暗示和压迫，一方面倾向于妥协，别方面畏怯革命的斗争，于是部分的退出革命战线——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在总工会封闭之后，自行取消工商学联合会。这时候，帝国主义者的列强，自然可以安心的一致进攻，沪案重查便公然实现，英美日三国一致判决五卅以来所杀的人都是该杀的。——五卅重查的提议（使团领袖的照会）还远在十月一日，即离上海英厂工人上工不过一星期，离总工会的被封不过两星期而已。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革命里的领袖地位，是何等的明显呀！同时，上海总商会在总工会被封后的第三天（九月二十三日）^①，便开募所谓爱国募金，名为接济英厂工人，实则五卅以来总商会所经手发的罢工维持费，大部分是各地捐来的，小部分是总商会办事人垫出的，爱国募金的作用，不过

^① 总工会系九月十八日被封，此处应为被封后的第五天。

是为这些办事人弥补自己的“损失”罢了；况且到九月二十七日，上海的英厂工人，已经因总工会被封，没有革命行动的公开指导机关和自己的组织，因为总商会克扣募金，不发维持费，又被压迫、“调停”而上工了。资产阶级的妥协当然再明显也没有，外交部、总商会口头上尽管抗议沪案的司法重查，实际上他们每一步的行动都是成就这一沪案重查的；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退缩懦怯，当然也是资产阶级策略的实行中所必要的助力——因为他们可以减杀革命派方面的势力。所以五卅运动的第四点特性，是在经验上证明：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畏怯，足以破坏联合战线而使革命运动失败，同时，也就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

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本是中国一般平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斗争，目的在于解放中国民族，当然就是解放平民；如果资产阶级阻挠、障碍、压迫这一斗争——否认工人的罢工结社自由，保留外国驻华军队以备压迫平民，强制群众，对日妥协，而只想借对英罢工之力达到仅仅利于高等华人的工部局董事位置及中国轮船公司和英日竞争的优势等等——劳动平民的反抗目标自然同时要注射到中国资产阶级方面来。帝国主义者方面的毒计，在七月四日停止供给马达电力于中国工厂（上海租界的电气处本是垄断上海的电气业的），当然不是使中国资产阶级更加愤激的反抗，而是使他们急速的倒到外国资产阶级一方面去，帮同着压迫工人阶级。短视的浅见的中国资产阶级，为了保持几万元（就算他几十百万元！）的利益，居然甘心卖国卖民，实行摧折上海总工会。五卅国民革命运动的过程里，无产阶级的势

力在政治觉悟上在组织上是非常之澎湃的时候，资产阶级的这种态度只有使无产阶级得到更深切的觉悟——阶级的觉悟：“压迫禁止我们的自由结社、克扣我们的工资、保持租界制度……的，不仅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而且还有中国的资产阶级”！况且中国劳动平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原因，本在于要求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和增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于是五卅以来中国华商工厂里的罢工，突然由对外示威性质，变为切实要求经济政治地位改善的罢工。——八月中旬上海邮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罢工，便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对外妥协对内压迫之答复，随后全国电报局的罢工，天津、河南、山东的中国纱厂罢工，都是同样的性质。无论是资产阶级的市侩，是中外资本家走狗的工贼，是大名鼎鼎的戴季陶先生，是所谓国家主义者……他们只准工人为着争民族利益国家体面而罢工，不准工人要求加几分工钱承认工会而罢工，此等论调，决不能使工人相信的。赞成国民革命而反对阶级斗争这种“学说”，假使对于资产阶级的学者是天经地义，那就对于无产阶级是极端的荒谬：一方面要求工人为“民族”而流血牺牲，别方面这个“民族”又不许工人加几分钱、几角钱的工资，不许他们结社罢工的自由，不承认工会，这是何等的矛盾！无产阶级正因此而要扩大自己组织和奋斗力，在五卅运动对外因资产阶级的妥协而渐次失败的过程里，国内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内部的阶级分化，自然而然格外暴露的急速。五卅以后，全国罢工波及中国企业的潮流，不但是简单的经济斗争，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中国工人阶级在这次总的民族斗争里锻炼自己的阶级意识，扩大自己的组织，集中自己的力量，以

备在后来更伟大的斗争里，整个儿的负起解放民族解放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五卅运动的第五点特性，是在经验上证明：国民革命的过程里，阶级斗争和阶级分化的必然性，并且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巩固扩大阶级意识明确坚定之后，才能引导一般平民达到打倒帝国主义的目的；“工人阶级的自由是要用自己的力量去争来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革命斗争去夺来的”。

五卅运动的发展，开始于中国工业中心的上海，波及全中国的穷乡僻壤，开始于中国的无产阶级，震荡到了大资产阶级，甚至于官僚军阀。不但全国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一开始便站在革命派势力的一方面，直接参加这一斗争；甚至于河南、陕西、湖南、湖北、直隶、江苏（苏州、角直、宜兴、江阴乡下）等地的农民，也都渐渐的开始活动，成立农民协会，反对苛税杂捐及预征漕粮，反抗地主，有些地方农民的运动往往是工会或学生会引起的——这亦是五卅运动间接的影响。总之五卅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极重大的关键，他引起了一般下层的民众的积极斗争。可是，不用说，许多小城市里的五卅运动，往往限于抵制英、日货或者捐款援助工人。抵制英、日货的运动在上海就受买办资产阶级的怠工，内地（如太原、福州等处）甚至于因此而引起学生会、国货商和洋货商的武装斗争。捐款虽然有些力量，始终便宜了上海买办阶级，使他们可以不出一钱而坐享“盛名”。因此，我们要知道：中国现时资产阶级内部虽然还是买办分子占优势，而在五卅运动后，大部分中小商人之中，反对把持包办商会、总商会的少数买办分子之对抗派，也在逐渐发生。革命运动自五卅之后，冲

破了思想上、政治上的万里长城，深深的渗入工人群众、农民、学生、小商人之中，是绝无疑义的。然而：一则各地的罢工运动第二次起来——八月十一，唐山罢工的爆发——八月中，南京工人的流血——八月初，北京英使馆的罢工——八月六日以及其他地方，都在上海日厂罢工结束，工人阶级已经疲于应付帝国主义者、军阀、资产阶级、买办、工贼等四面八方的压制逼迫捣乱的时候；二则农民的运动还在刚刚开始，不能和五卅的总斗争合流并进；三则各地的小商人，真正能为民族利益斗争的资产阶级分子，还在买办分子或顽固派包办的商会势力之下，不能脱离妥协政策的影响和卖国政策的蒙蔽，以致不能诚意的彻底的和无产阶级合作；四则各地工商学各界的联合斗争，还只是所谓纯粹对外的反抗宣传，没有能力推翻当地的军阀政府，处处受军阀政府的压迫而另另碎碎的摧败。再则，一九二五年的世界史上虽然要以“中国革命运动”占第一等重要位置，可是同时还有埃及的解散国会问题(三月廿三日)，印度的纱厂罢工(九月十六日)，非洲坦及尔因地方的罢市(七月三日)，摩洛哥战争(六月廿七日)，叙利亚革命(八月六日)，波斯政变——殖民地革命已经开始世界的发展，而中国的五卅运动都还不能和这些地方的革命运动直接联合，互相呼应，始终还是各干各的。所以五卅运动的第六点特性，便是在实际行动上证明：无产阶级的全国指导要更加集中统一，无产阶级与农民运动虽开始联合，还要有百倍于现在的深切关系之领袖地位；五卅运动实际的具体的提出革命平民的政权问题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各国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互相联合的问题——只有工农小商等革命势力巩固的团结，

和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作战，在各地直接的组织武装势力，推翻军阀政府，才能使民族解放运动胜利。

帝国主义者伟大的五卅运动的时候，自己觉着对中国的统治和他们走狗的军阀政权日益动摇，他们的屠杀政策，实际上不过是自杀政策而已，于是一转变而注全力于宣传反赤化、反共的政策来，并且用种种方法破坏联合战线，这种政策在中国北部似乎稍稍有些成绩，可是在南部却完全失败。杨、刘、唐继尧等里应外合的进攻广州革命政府失败之后（六月十三日），不过一礼拜，英帝国主义者已经用离间政策，挑拨许崇智和蒋介石，使许崇智宁可放弃潮、汕与陈、林妥协（六月十七日）而回广州与蒋介石争权。可是五卅运动爆发于广州（六月廿一日罢工，廿三日沙面屠杀）之后，民众方面既然一致对外，内部的冲突自然不易暴露。国民政府的成立（六月廿五日），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成立相差不过六七天；这亦是一种联合战线的形成，国民政府之政治的内容，便是代表农民、工人、大多数小商人的利益，而且有革命的武力——国民革命军。他与上海工商学联合和上海总商会共同管理对外斗争的差异点，就在：他——国民政府，有农民群众和革命武力的赞助，而上海是总商会的武力（保卫团）和军阀相勾结。并且国民政府之中是劳动平民占优势而不是买办分子占优势。广东的农民工人，不用说是争得了阶级斗争的自由和集会结社等的自由；就是大多数商人，自从商团叛国之后，渐渐觉悟买办商阀的罪恶，而自己组织起来，尤其是革命政府肃清内部反动军阀之后，他们都一致的拥护这一政府。广东国民政府和香港罢工委员会在这种环境之下，当然能以全力坚持五

卅运动的总罢工,予香港空前的打击(外国新闻记者詹密士的谈话,说香港因罢工而损失的每月在七千五百万以上),尤其是黄埔的开港,足以争回中国的经济独立和交通独立。虽然帝国主义者和上海一样的勾结军阀、妥协派、右派来破坏这一联合战线,可是四五次的尝试无不失败:八月二十日廖仲恺先生被右派军阀刺死;九月十五日许崇智完全放弃潮汕,陈炯明因此复图侵袭广州;九月二十日许崇智部下莫雄、郑润琦又在广州谋叛,私自释放刺廖要犯;十月三日熊克武叛谋发觉……随后,段、张派“永绩”等军舰,帮助邓本殷从南方与陈炯明(东江)及熊克武部下(北江)三方夹攻广州(十一月间)。然而广州的国民政府不但没有推翻,并且已经统一全粤,把这些反动军阀完全肃清:苛捐杂税烟赌拉夫完全消灭,农民协会、工会有充分的斗争自由,财政、军政统一……成了模范的国民政府。对外的交涉,虽然沙基惨案还没有最终的胜利,然而日、美等国看见这样的巩固的国民政府,境内的革命运动又确没有明显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的目标,自然都软化下去,不敢与英国一致进攻,美国煤油税问题,黄埔戒严区域枪毙违法的日本水手问题,汕头日人行凶问题,广东政府都得到中国自有外交以来所未有的胜利。就是英国,现在也已经不能不俯首求和,香港罢工不但没有失败,并且还有中国商人预备以罢市促港督的觉悟(今年一月)之消息。固然,广州的国民政府,种种方面的革新计划和建设事业还做得很少,内部亦许有种种缺点,可是在二三十年骚扰压迫的中国政局之中,他实是唯一的一线曙光。中国的人民现在没有不希望在中国有这样的中央政府的。五卅运动的一九二五年中只在广州一

· 给 · 了 · 一 · 个 · 民 · 族 · 解 · 放 · 运 · 动 · 里 · 国 · 民 · 革 · 命 · 与 · 阶 · 级 · 斗 · 争 · 会 · 流 · 并 · 进 · 的 · 联 · 合 · 战 · 线 · 而 · 后 · 能 · 胜 · 利 · 成 · 功 · 之 · 缩 · 形 · [· 影 ·] —— 打 · 倒 · 代 · 表 · 买 · 办 · 土 · 豪 · 阶 · 级 · 的 · 右 · 派 · ， 肃 · 清 · 反 · 动 · 军 · 阀 · ， 然 · 后 · 劳 · 动 · 平 · 民 · 工 · 农 · 小 · 商 · 的 · 联 · 合 · 战 · 线 · 才 · 能 · 巩 · 固 · ； 政 · 府 · 的 · 武 · 力 · 才 · 变 · 成 · 平 · 民 · 的 · 武 · 力 · ， 然 · 后 · 对 · 外 · 的 · 反 · 对 · 一 · 切 · 帝 · 国 · 主 · 义 · 侵 · 略 · 的 · 运 · 动 · 才 · 能 · 充 · 分 · 的 · 发 · 展 · ， 而 · 得 · 着 · 胜 · 利 · 的 · 形 · 势 · 。

(三)

(下略)

(《新青年》第3号，1926年3月25日)

英国帝国主义眼前所走的侧径

楚 女^①

文明的大英帝国，既然首先做了“文明的义和团”，用了杀人效力最大的机关枪，对于我们举行了空前未有的无条件无限制的民族的大屠杀。它要怎么样才能转湾，才能使鲍尔特温所代表的英国帝国主义还能多戴几天威武的“如官壳”呢？

它只有一条路可走。便是勾结中国军阀，引起中国内战，借戒严而压迫中国人民。日来屡有张作霖与英国帝国主义业已谅解之谣——我们虽然不可遽尔相信，但在事实上，英国现在确有

^① 即萧楚女同志，一九二三年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编辑《中国青年》。

不得不勾结中国军阀引起中国内战之势。我们若就各方面的情势以为推测,则英国现在正在进行的,大概不外下列各端:

一、表面上极力强硬,并且提出反抗议,反而向中国要求条件,以压服中国人之气。

二、到处施行汉口广州式的武力屠杀,而以不致激起中英战争为度。现在上海断绝供给电气,便也是此种挑战法——因为它如此一做,你们必起愤怒,你们如稍反抗,他便又给你一顿机关枪坦克炮大屠杀一阵。

三、乘中国大商阶级,只顾金钱不要国家之弱点,极力示好于大商阶级——对于北京交涉,则取一个“对于中国资产阶级让步,对于中国民众极力压迫”的方针(譬如对于工人集会自由,绝对不许;而对于纳税华人之投票权,则许其与西人平等)。

四、以种种方法利用中国之绅士阶级——即所谓“高等华人”(如梁启超、张君勱、江亢虎、张东荪、丁文江、胡适之之徒),替它来鼓〔盪〕惑人民,涣散民气,提倡“修约”与“沪案”分为两事;使北京政府有个向外妥协的地步。现在北京已居然照着高等华人们所主张的,实行分为两事。这是预先彼此约定计划好了的——以便遵照大英帝国主义之意旨,将修约成为悬案;而向人民则借口于“两事”以卸责。

五、实行勾结日本资本主义平分中国市场,由英日两大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用张作霖和唐继尧吴佩孚三人为工具,使成一大三角同盟的反动战线,尽量压迫中国国内以及国外的一切不利于他们的势力——如苏俄在华的感情、国民党、国民军、觉悟的工人学生等。原来日本帝国主义内部亦分两派。比较进步

一些的代表开明的资产阶级的是加藤高明等，他们主张利用安福系，新旧交通系，稍做一点假仁义的事，笼络中国人民，把持北京政权，以为一实际上之“立宪式的日本殖民地的甲必丹政治”。另一派则为保守的军阀，他们仍抱着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的老思想，要想灭亡中国，夷于朝鲜之列。他们信任北方某大军阀。现在有些人不明白，以为某大军阀与某系首领，同是日本帝国主义之工具，为什么又互相捣蛋起来？殊不知暗幕中，乃由于日本的守旧军人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已与英国帝国主义联盟（此联盟系专对沪案，并非攻守同盟），以“非战争”的形式一致压服中国民众。所谓曹锟出冷宫，吴佩孚要出山等事实，都只是说明英日两国之合作。

在以上所说五大阴谋同时并进之下，自然不用打仗，所谓“无一矢之遗”，便可以使中国全民众之气压服——我们底外交便只有一个“完全失败”！英国帝国主义——真正是狡猾极了！

然而象这样便算是我们失败了么？一点也不然！我们不但并未失败，而且占了永久的胜利——徒然显出英国帝国主义是一个杰克箱中的笨拙的杰克！因为它这样的做法，事实上使我们更认识了资本帝国主义之真面目；越发用了胶水把我们——工人、学生、农人、小商人、兵、警察、巡捕，世界上一般的被压迫者、一般的弱小民族——粘贴得更坚固，更紧密。反面呢？越发把军阀、官僚、名流、高等华人、买办阶级，用X光照得骨胳嶙峋，叫每个中国人都认出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再也不致于受他们的欺骗而缓和了我们底国民革命之工作了！

我们只有一点可算失败，便是涣散了我们——工、农、兵、

学、小商人——的团结，而缓和了我们对于他们底“报仇”之进攻！我们若能永远向他们作报仇之进攻，我们只有失去我们身上的枷锁而得到胜利的！

(《中国青年》第84期,1925年7月25日)

反抗五卅惨杀运动中所见的阶级斗争

楚 女

这次“五卅”事，是一件什么意义的事件？

明明白白是一幅紧张无比的超国界的世界的“阶级斗争”！

看咧！杀中国工人的，是日本底资本家。奉日本资本主义之钩命而在青岛工厂中执行屠杀工人之任务的，是居在中国治者阶级、以掠夺中国平民为生活的海陆军阀（张宗昌和温树德）。在南京路上轰击中国徒手民众及以武装镇压中国爱国人民的，是在华各国资本家和中国资产阶级纳税设立的工部局，纳税训练的万国义勇队，纳税豢养的巡捕。事情闹出了之后，反抗的是些什么人呢？无产阶级的工人，没有生活上利害之打算而感觉着社会制度之不平等的青年学生，不满意于大商买办阶级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依赖于大商家为生而饱受资本主义之压迫的店员们。切实主张公道，预备以罢工之实力援助我们的，又是哪些人呢？各国的无产阶级，第三国际，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四十二国底代表工人的党派（左派社会党和共产党），印度革命党，朝鲜兄弟们所组织的五百多个团体。虽然虚张声势，而

事实上却不能不表同情于我们的，又是谁呢？第二国际，各国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半无产阶级的阿姆斯特丹黄色职工国际。受我们底讲演之感动，帮同我们维持对外罢工，竭力供奉茶水安慰我们游行示威之疲劳的——是穷苦的小商人、学徒、兵士、警察、水兵（南京有一水兵，自言系应瑞舰上者，特为帮助学生反抗五卅惨杀，请假一月），洋车夫、木匠、皮匠等手工业者。捐款捐得很自然，很热烈，而不象东南大学副校长任鸿隽博士，只以大铜元十七枚敷衍我们的（据东大学生会所宣布）——是奉军中的兵，南京城里的乞丐，未满十五岁的穷苦人家的国民小学生，东南大学的校役们。气愤自杀，以身殉国的——是男女青年、学徒、小商人、工人底儿子、俸给生活者。

反之，被学生工人包围着，跪求了一两点钟，而犹不肯签字罢市的，是会说洋话的总买办方椒伯。故意不提工商学联合会十七条原案，而为英国人做内奸，以减轻的十三条件付诸交涉员的，是完全代表中国大商阶级——即与洋商往来最大的中国资本主义——的“上海总商会”。与海员罢工刚刚成一反照，借了“华商”之名，于举国痛哭国亡无日之时，而犹替日本人运海带入长江的，是大财东虞和德所开的“三北公司”。甘心订立条约，以不登不利于英美烟公司之文字为条件，违反全国民意，故意替“大英牌”留下空白广告地位；藉口“克劳广告公司送来”，替英国帝国主义登载《诚言》的，是绅阀而兼财阀的史量才等所有的《申报》、《新闻报》。挂中国报纸招牌，而实际上代表了美国侦探福开森，去操纵日报公会，以致凡是有利于中国而表现此次事变之不公道的文稿，一概不得登出于上海新闻界的，也是资本家集股所

开的《新闻报》。压迫学生,不许学生爱国,枪毙爱国志士,明为帝国主义作伥的,是治者阶级的萧耀南、王永江、杨森、王陵基、邢士廉、李景林。高唱“缩小范围”,“就事论事”,“法律解决”,以涣散国人对外之气,故使英人知我怯懦,使卖国政府有所藉口而让步的,是属于生活优裕的绅士阶级的梁启超、张君勱、丁文江、胡适之、江亢虎、汤尔和。实行勾结军阀官僚,操纵教职员联合会(上海),操纵人民外交组织(南京)的,是一般饭碗教育派,“我们巡帅”派的教职员(曹慕管说:“学生所提条件,如尽可能达到,则此后学生,将更扩大势力而闹事了”!他们是宁可亡国,不愿学生扩大势力的)。

还有,假使这次运动,若没有各地三十万人的大罢工,英日帝国主义者便能就这样平复了么(虽然他们还是在强硬)?我们若没有这一大劳动阶级站在阵线上,就能够使这件事震动世界,使一般社会都认这事是一个世界的问题了么?我们若不能在五月卅一日,用了迅速的手段,叫各华商工厂罢工,使一般大商买办阶级感着利害痛苦,则六月一日的上海大罢市,又何能象那样很敏捷地使之实现?而且,我们正因为没有能够在五月卅一日,使得上海租界中的电灯自来水罢工,所以到底总不能在短时期内制服英国帝国主义。假使我们若能于五月卅一日,使全上海成为一个“黑暗世界”,则代表英国帝国主义的领事和巡捕房,在那两天或者也不能象那样硬法,而六国委员或者又另是一个态度了吧?

国家主义派,睡在他们自己底幻觉世界里,始终被他们自己底现实生活蒙蔽着——硬咬定了在世界的社会革命尚未实现之

时,便有所谓“各阶级融和一致的国家”。他们不看事实,纯凭自己脑中幻成的抽象的空的理论方程式瞎说。他们不知道“阶级”和“国家”是两个绝对矛盾而又系同始同终相并存亡的东西。有国家时,便有阶级;无阶级时,便无国家——国家起于阶级的分化,即甲阶级在一个族类的生活团体中,地位超过于其他阶级时,所用以制服其他一切阶级以保其优越地位的一个工具;阶级的存在,是由国家制度保证它存在的。只要有“国家”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便总是不能协和而永远冲突的。所以“国家”和“阶级调和”这两个概念,刚刚是绝对矛盾的。要得人类协调过日子,除非消灭阶级。要得消灭阶级,除非消灭国家。只有无国家的时代,才无阶级;惟其是无阶级的时候,才无国家。九万五千(?)年前,原始共产时代,尚无国家,所以也就无阶级。X年以后,社会主义实现时代,既已没有了阶级,所以也自然没有了国家。因为国家主义派,对于这种很明显的理论,不肯从唯物的历史观察上和眼前的实在事实上去虚心研究,他们就不晓得“阶级”是反“国家”的,是反“国家主义”的,而且是反“民族独立”的。虞和德、方椒伯、萧耀南、王陵基以及所谓上海总商会底伦理观念,只有“如何与我有利”一语。他们宁可亡国——只要外人的利益和他们底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不愿牺牲自己底利益,以利全国国民。他们——军阀、官僚、政客、名流、绅士、买办、教职员——是和侵略中国、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站在一条线上的。事实摆在鼻子尖上,亘古今中外,只有各阶级互相杀伐,各争自己阶级利益的国家,决没有“各阶级融和一致的国家”,更没有“各阶级的国家主义”!

伟大的阶级斗争，教训中国人益发感觉得世界的社会革命是产生正义的催生妇了！有志于拥护人道，要求人间完满幸福之实现的朋友们！你们既在这次运动中，得到了这样的教训，这样的经验，当然应该知道我们今后的革命的基本工作，要在哪一方面着手。

组织一切下层被压迫阶级——农人、工人、兵士、小商人、店员、学生——成一条国民革命的坚固的联合战线！

联合世界被压迫阶级，和一般弱小民族，组成一条世界革命坚固的联合战线！

尤其要紧的，是训练农工兵士时时作经济的阶级斗争，扩大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与燃烧性！

(《中国青年》第86期,1925年8月1日)

我们的战略

F·M^①

让那些妥协派去鼓吹和平了结的论调，让那些空想派去鼓吹暴动开战的主张，我们真诚为反抗帝国主义而作战的人们，应当认清客观的事实与我们主观的力量，决定我们切实可行的战斗方针。

为甚么要和平了结呢？全国至少有几百万人都激怒起来了，

① 恽代英的笔名。

而且在现在全世界劳动阶级与弱小民族革命势力渐次抬头的时期，帝国主义自身亦开始摇动而不能自己支持，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用敷衍苟且的方法欺骗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反懈弛了即刻可以成功的反帝国主义的工作。

但是现在如何说得到即刻便要暴动开战呢？我们民众还有多数不了解帝国主义的罪恶，还有多数误认反帝国主义便是义和团的排外复仇运动，还有多数不知道为反帝国主义先须组织民众训练民众，这种乌合之众，而且很多易致失败的弱点，如何能即刻引导他们上战场去呢？自然在这运动之中，有少数冒失激烈的人，要以为非暴动开战不为快；然而若象今天这样，是不是多数民众可以跟着他们起来！而且起来以后是不是能为持久的战斗，不至于一哄而散，反失了以后号召他们行动的可能，都是丝毫没有把握的事情。

然则现在应当怎样办呢？

第一、倘若不是世界或中国有了急激的变化，不是我们现在应当暴动开战，我们应当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宣传组织工作，以预备这个暴动开战。

第二、我们反对重查沪案与国际会议等帝国主义的阴谋，反对减低现在的交涉条件以迁就帝国主义；我们与其要不满意解决，宁可不要任何解决，让它成为悬案，永远悬在四万万人的心中，象二十一条交涉一样。因为这样，我们还可以长久用为宣传民众的资料，使他们永远不忘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残忍，以激起他们时常为反抗帝国主义而战斗。

第三、每一个帝国主义的惨杀，每一个军阀的压迫爱国运

动,都应当即刻用为宣传材料,广为宣传此种事实,使人人都发生打倒帝国主义的决心。

第四、注意宣传的结果,不是要被宣传者浪漫的暴动,更不是要他们悲愤而自杀,是要使他们知道只有组织群众才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实力,而且果能组织群众,亦一定可以打倒帝国主义。

第五、注意利用各种机会,宣传组织学生工人农民小商人乃至兵士。我们要组织学生会、工会等职业团体,尤其要组织可以指导此等职业团体之同志结合。只有有了好的这种结合与职业团体,才是我们暴动开战的日子。

(《中国青年》第88期,1925年8月8日)

纪念蔡和森同志(节录)

李 立 三

(上略)

一九二一年终,蔡和森同志被法国政府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驱逐回国。到沪后,即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中共第二次大会选举和森同志为中央委员,以后各次大会,和森同志均被选入中央,未曾间断。

此时中共内部,发生有李汉俊等为首的合法马克思派的倾向,反对工人运动,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党的纪律,企图使党成为一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和森同志归国后即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这一机会主义的派别,要求党成为真正工人阶级

的革命政党,当时得到全党同志的拥护,而驱逐了这些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分子出党。这一斗争在树立党的基础上是有异常重大的意义的。

同时,和森同志坚决拥护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指示,主张进行国民革命运动,实行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这在第二次大会上得到了一致通过。因此中央决定停刊以前党的机关报——《共产党》,而新出一机关报——《向导》,并指定蔡和森同志为编辑。《向导》在中国革命中起了极大的领导作用,从数千份扩展到十万余份,在大革命准备时期和大革命时期中是真正成了全中国革命的向导。我们还记得当和森同志等在《向导》上开始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口号的时候,胡适之忙以他的“学者”态度讥笑这一口号为不通。然而正是这一口号推动了而且正在推动中国千百万群众起来进行革命的斗争,正是这一口号团结了而且还要团结中国全体人民,争取国家的独立,争取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只要回忆这一简单的事实,即可知道《向导》在中国革命上所尽功绩是何等的伟大。和森同志的名字是与《向导》不可分离的,他自始至终(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七年,除了他曾离国数月的短时期以外)是《向导》的主编。《向导》的功绩,正是和森同志在中国革命中表现的极大的功绩。

在这一时期中,和森同志是中央决定一切战略策略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特别在五卅运动的事变中,表现了和森同志运用战略与策略的天才。我们记得在五月十六日^①,顾正红同志被日

^① 应是五月十五日。

本资本家打死以后,沪西爆发了二万余纱厂工人^①的反抗罢工,同时提出了增加工资等的经济要求。当时,日本资本家采取关厂抵制的策略。但是,罢工支持十余日以后,日本资本家表现了明显溃散失败的形势。和森同志提出,现在战略,应当把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到民族斗争。五月二十八日的中央会议上,他解释这一口号说:现在要把工人的经济斗争与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帝斗争汇合起来,要使工人斗争表现明显的反帝性质,以争取一切反帝力量的援助,同时就使工人加入总的反帝战线而成为这一战线的中坚。在目前形势,这一策略的实现,将要发展出空前未有的全国反帝的巨大运动。因此他提出策略主张,在五月三十日在租界上组织反帝示威运动。一方面反对当时公共租界所提出压迫华人的四个法案(码头捐、交易所注册、童工保护等);另一方面援助沪西工人罢工,反对日本资本家屠杀工人。最初在中央内部如陈独秀之流都认为是“空泛不切实际”。经过长久的辩论以后,得到了多数的通过。然而陈独秀还说如果在示威时有三、五百人参加,便算是我们的成功。和森同志马上起来批评说:这是一种犯着近视病的观点,只看到上海有多少党员团员的机械估计,而没有看到目前正在酝酿着的整个革命运动形势,没有估计到广大群众的情绪。假如我们估计到了这些方面的话,则我们的目的决不是动员三、五百人,而是动员三、五万人,至少也是三、五千人。和森同志的预见在五卅这

^① 此处数字有出入。参加罢工者为内外棉第五(东、西)、七、八、十二厂,共七千余人。

一天是完全证实了,而且参加示威运动的不是三、五千人,三、五万人,而是全上海将近十万的学生,无数工人群众与示威区域的全体市民。英帝国主义巡捕房竟开枪屠杀示威群众,因而造成五卅血案。在五月三十日深夜的中央会议上,和森同志马上提出进一步的策略主张,号召全上海罢工罢市罢课,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他说现在学生总罢课是无问题的,总罢工也可逐渐实行,现在要用一切力量促成总罢市的实现,以造成全上海市民总联合的反帝大运动。于是在这一策略之下,又组织了五月三十一日的大示威,和在上海总商会的上海市民大会,结果通过了总罢市的决议。六月一日,全上海罢工罢课罢市的口号就完全实现了。在六月一日晚上的中央会议上,和森同志又提出新的策略说:在上海应当马上成立工商学联合会,为这一反帝运动的总的领导,以巩固和发展这一运动,成为长期的斗争,同时要马上把运动扩大到全国去,这就是我们最近几日的任务。一切工作就在这一策略指导之下而进行。果然不几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起来了,使运动有了公开的总的领导机关而继续发展扩大。同时在汉口、青岛、天津、重庆、成都,以至全国各地都爆发了伟大的反帝运动,特别是广州“六·二三”大示威发生的沙基惨案,爆发成为支持一年余之久的省港大罢工,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因此五卅运动就开展了全中国大革命。

(下略)

(一九三五年写于莫斯科)

(《红旗飘飘》第五集,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 年出版)

李立三同志对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的 回忆^①(访问记录)

一九二四年我到上海时,上海只有几十个党员,只有两个工人党员,还不是纱厂工人。一九二五年初二月罢工前,上海只五、六十个党员。我那时是上海地委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开始去时没有办法,就是运用毛主席在安源的经验办平民夜校,共办了七个:沪西、沪东、浦东、吴淞、南市、闸北、虹口。在一九二四年六、七月间每个区有一个平民夜校,先是工人子弟来,后有工人来上夜校,然后再发展工友俱乐部(也有叫工人进德会的),吴淞也叫工友俱乐部。我每星期到每个地区去上课一次。

俱乐部开始参加的人不多,几百人,没有搞斗争,都是宣传教育工作。俱乐部下面以工厂分小组,这是成立工会的核心组织。当时俱乐部负责人,沪西是项英、沪东是蔡之华^②,吴淞没有人,我就当主任,还有闸北、浦东、南市、虹口共七个。

我们在潭子湾时租一幢两层楼房子,很坏,旁边有家茶馆,我们有时在茶馆谈工作。二月罢工时邓中夏同志被捕经过是这样的(不是打厂被捕的):那是二月罢工后很久了,有十几天了,工作没有办法,我们就开大会鼓励工人坚持斗争。我在讲话,警

① 这是一九六〇年十一月,我所专程到北京访问李立三同志的一篇谈话记录。

② 蔡之华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杨树浦工人进德会的领导人。

察来了,有很多,大约一、二百人,邓中夏同志叫我下来,我刚下来,警察一围起来就抓人,抓了不少人,但我与邓中夏均未被抓。警察走后,我们又召集工人开会,当时工人也没经验,吵着要请愿。我与中夏不同意。工人说:你们过去老叫大家要抱义气,现在工人被捕了,你们又不抱义气了。我们觉得不去不行,不去群众就会散掉了,我就与中夏同志商议,我说由我去,中夏同志说由他去,认识他的人少,因为他当时是党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结果他带了七、八个工人代表去就被捕了。被捕后工人更愤慨,我们就加紧宣传,罢工就坚持下来了。后来中国纱厂资本家出来调解,罢工基本胜利。肯同工人订条约就是胜利。

谈判是有的,但我没有去。情况记不得了。

纠察队是二月罢工开大会时成立的,我还发过旗帜。

刘华^①是二月罢工后过好几天才去潭子湾的,刘华是上海大学学生,邓中夏是上大教务长。中夏说让刘华去潭子湾工作,我记得我与中夏还同刘华同志一起谈过一次话,那时项英好象已走。也许项英与刘华在一起到过工人中。

二月罢工我记得很清楚是从内外棉五厂开始的。二月罢工中工会成立后,俱乐部在实际上还起作用。工会还只有一块牌子,因为这个过程发展太快了。

上海工人工作最大问题是青帮问题。第一次搞工人工作时不理青帮,结果资本家利用青帮使浦东日华纱厂的斗争失败了。

^① 刘华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沪西工友俱乐部负责人之一,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被敌人杀害。

第二次李启汉^①就加入了青帮,但过于相信青帮,结果被青帮头子出卖,也失败了。我去后研究了上海工运的历史情况,觉得不理不行,加入也不行,就采取另外办法,研究青帮中徒弟是被压迫的,因此联合下层,反对老头子,把阶级斗争在帮会中搞起来。那些老头子都被帝国主义收买,弟子是被压迫的。五卅时保护我的都是青帮的徒弟。

工会成立后,青帮就不起作用了。他们与虞洽卿搞在一起,成立“工团联合会”。

上海总工会是五月二十四日左右成立的(不是五月三十日成立的),地点在宝山路。党中央二十八日会上我们斗争口号就变了,把经济斗争转为民族斗争(这个内容我写过)。我们当时联合资产阶级反对四提案,传单中都有反对四提案的口号。五卅指挥部(秘密的)设在二马路一个旅馆里。三十日工部局一抓人,我们就号召跟上去,一下子把老闸捕房围起来了,要求释放被捕者,巡捕房用自来水冲也冲不散,就开枪,这样就造成了五卅惨案。

五月三十日晚上决定第二天继续上街。五月三十日上街只有学生没有工人,你们去查死者名单,其中没有工人的。工人是六月一日才上街的。我们的口号是罢工罢市罢课,反对工部局开枪杀人。在上午还罢不下来,我们到那里叫罢工,罢下来了,等我们一走又开了。我们觉得只有罢市后,工人罢工才罢得下

^① 李启汉同志,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一九二四年十月出狱去广州,一九二五年五月以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和组织部长,一九二七年四月在广州牺牲。

来。下午二时南京路还罢不下来,忽然听说总商会要开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也参加,我们与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联系也不多的,但听说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同情罢工,而总商会反对,因此一下子几千人拥到总商会。那天林钧讲了话,话讲得很激昂慷慨,我没有出面,大多数人都赞成罢,虞洽卿不在,方椒伯溜走了,我们派代表到他家请他来,方在大家愤慨下签了字。总商会通知一下,就罢市,罢工就很快了。纱厂都罢。当时我们的工作据点是纱厂,二日是都罢了,人数有三十一—四十万^①。总工会会员不到五十万人。总工会当时热闹得很。那时才组织罢工委员会,后来这名义用得很少,都用总工会名义。总工会由宝山路搬到共和新路,我记得最深刻的是总工会隔壁就是戒严司令部。

坚持罢工中,斗争最尖锐是码头工会,因为码头工会有两个工会,我们一个,青帮一个。这时虞洽卿回来了,工商学联合会已成立了,总工会也出面了。虞洽卿想把十七条改为十三条,想利用青帮破坏罢工斗争。青帮中好一些的有一个王汉良。上海总商会不参加工商学联合会,但捐款它要管,把捐款给青帮码头工会,我们就斗争,结果两个工会合并成一个,两边人都参加。青帮这时与总商会、工部局联合破坏罢工。在开市后就有工团联合会了,负责人姓包(名字记不起来)。成立时来个通知在总商会开会,我知道是破坏,就去找虞洽卿,说他破坏。他说他不知道。我说你为什么借会场给他们。结果还是开了。我就自己去参加开会,我找了王汉良(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一起去。王汉良很

^① 根据已有史料看,此数字嫌大。

紧张,把手枪放在身上。我到那里,工人一见我,溜的溜,跑的跑,剩下只有二、三十个人。我与包说我来参加会。包说总工会贪污了工人的钱,要算账。我说好,明天总工会开个代表会。他说不行,要我缴总工会的图章。我说明天开会我才交。当时其他人都不说话,王汉良就说今天的会也不要开了,明天的会也不要开了,一切事我负责。过几天,王汉良叫我送给包××一个红帖子,在名义上算他的徒弟,我说不行。王又说他请次客,让包××坐第一位,我坐第二位,我说行。请了一次客,包××坐第一位,来了很多徒弟。工团联合会破坏没有搞成。但问题也没有解决,就想搞暗杀。那时少奇同志已来,他是五卅罢工罢下来后,来上海的。中央把他从安源调来搞上海工作的。搞暗杀的时间大概是六、七月。我和少奇同志都在共和新路总工会,那里有两幢房子,一前一后,我和少奇同志在最后一幢楼办公。那天可能是下午(记不清),一个人来找我,是个已被开除会籍的工贼,他向我表示悔过,我说很好,那你就回工人中去,说完后我要走。他说还有个问题要谈,谈了一个又要谈一个。我一看情况不对,就推有事进去一下,跑去告诉少奇同志,一面赶快调纠察队,两个办事处调二百人,一面叫他先走。我和少奇出最后一幢屋前门到前一幢屋后门时,想起要通知会计科把钱锁在保险箱里,我就叫少奇先走。当时大家不认识少奇,少奇出去时茶馆店里坐满了人,有个汽车也装满了人,少奇赶快去中央报告。我交待了工作后,出最后一幢屋前门,想从前一幢屋的后门进去。里面已打得不得了,保护我的两个人把我拉进最后一幢屋,想从后门跑,但后门开不开,其实开了就不得了,后门都是流氓打手。两个保护我的

人就守在楼下,我上楼从屋顶上出去,走了两家人家,第三家有个老奶奶招呼我到她家,把我锁在阁楼上。我叫她赶快找几个总工会的人来,他因儿子、媳妇都是工人,对工人很熟,就找来了四、五个人。我赶快通知他们几件事:第一、通知各办事处来二百个纠察队保护总工会;第二、纠察队全部集中保护办事处,晚上各办事处开代表会,第二天进行示威,反对打总工会。

那时我知道纠察队已到总工会,戒严司令部不准工人进去。我就去戒严司令部找邢士廉的参谋长(姓李),我第一句话就问他“你们组织了多少工贼打总工会?”他说:“没有啊,都是工人自己打的。”那时刚好抓了两个人,我叫不准放,叫他审问一下,他说好。第二件事要他令工贼撤出总工会,让纠察队进去,后来他们一商量同意撤退。我就与他一起到总工会,工人已打伤了七、八个,有没有死的我记不得,保护我的两个人都伤了,我把伤员送进医院后就到中央。中央当时很急,都不知道我在那里,陈独秀是消极主义,认为恐怖来了撤退吧,蔡和森反对。我就告诉他们我通知办事处的几条,蔡和森同志、少奇同志都赞成,就又大示威,开大会,罢工就又一次高涨起来。

虞洽卿的捐款我们随时要,他随时拿,但到底有多少,我们都不知道。

过不久罢工不能坚持了,中央要我离开,大约八月份我离开到北京,组织学生支援斗争。

我原叫李隆郅,这名字工人不容易认识。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左右,我与中夏同志去吴淞,在火车上,中夏又说我的名字不好写,改一个吧!改什么呢?刚好看见三个人立在火车门口,中

夏就说叫立三吧。所以自此以后我的名字就改为立三。

我到上海后是用的安源办法，安源是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下工作的。主席有个很著名的话“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这是最能动员群众的口号，二月罢工提出“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也是从这个指导思想来的。办夜校是主席在安源的办法。我在上海对付青帮的办法，就是运用安源对付红帮的办法。利用合法，统一战线思想都是毛主席的思想。

上海情况与安源不同，在上海我每星期到俱乐部只有去一次，因此影响比较间接。再有上海的工作是我受了毛主席思想的影响在干工作，毛主席不在上海，中央是陈独秀，所以主席思想不能起大作用，当然蔡和森的思想与主席思想也是一致的。

(原稿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贰、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关于五卅运动的文件

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 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

全国工人们！农人们！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们！

血肉横飞的上海，现在已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屠场了！这是偶然的事么？不是的。这是资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必然现象。资本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每日都有被屠杀的可能呵！

印度、埃及、非洲等弱小民族和欧美各国被压迫阶级，不是常常被资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们定期的或不定期的大屠杀么？我们中国民族的被屠杀亦非始于今日呵，自鸦片之役以至庚子之役的中国史，完全是一部外国强盗宰割中国民族的血书。然而这次上海的大流血，却是中国民族自觉的反抗帝国时期之第一页呵！

年来全国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民众之普遍的觉醒，早已促起了英美日法侵掠家的杀机。尤其是反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工农阶级势力之形成，更坚决了各强国的强盗阶级（即帝国主义的资本

家阶级)对于中国的铁血镇压政策。上海的大屠杀,便是帝国主义者重新表示他们兽性的志愿——只准中国人做奴隶,不准中国人谋解放,只准中国人在“奴隶”与“铁血”的两种惨境中有个选择!

帝国主义的列强,对于侵掠中国和镇压中国的民族运动是一致的,无论他是先进的帝国主义(如英国)或后起的帝国主义(如日本)。这次上海事变,起于日本帝国主义向上海以及青岛纱厂工人积极的进攻,而成于英国帝国主义向学生工人市民狠毒的残杀。美国帝国主义在这大残杀中完全与英国一致。在公共租界耀武扬威的万国商团、美国商团的凶暴与英国的没有两样;美国海军陆战队悉数上岸加入英兵的队伍之日,即在杨树浦一带任意残杀中国路人,尤其望见工人学生经过即开枪;美国大陆报同英国字林西报一样的凶恶,一样的造谣,诬指这次运动为苏俄和共产党所主使,声言美国在华之三十余艘军舰将全部或大部分调向上海厮杀。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相互冲突与狡猾也摆在我们面前: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努力企图将此次事变的目标移嫁于英国,而德〔法〕国驻沪领事亦向学生表示一种假仁假义的态度。

这次上海事变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因为这次事变是起于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民族运动的主力军——工人阶级——进攻,而成于英国帝国主义对援助工人的民族运动之铁血镇压政策。所以因英日帝国主义之大屠杀而引起的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了事”的虚文,解决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所以

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不平等条约一日不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一日不推翻，中国民族的生命与自由便一日没有担保，随时随地都有被横暴残酷野蛮无耻的帝国主义蹂躏屠杀之危险。全中国人民的生命与自由，决不能由惩凶、赔偿、道歉等虚文得到担保，只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才能得到担保。所以由这次大屠杀引起的全上海全中国的反抗运动，将是一种长期的民族争斗。这争斗的得失将不以英日帝国主义是否允许惩凶、赔偿、道歉为转移，而将被决定于下列的两个条件：第一、这争斗是否能长期的持续的摇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与统治，并使其在经济上生活上发生永久的危机；第二、这争斗是否能引导全国各阶级的民众入于反帝国主义的高潮，并形成各阶级分别的群众组织与联合的民族组织。

中国共产党敢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中国共产党更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坚持到底的来维持并发展这个长期的民族斗争；务使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与统治不断的动摇，务使其在华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永久的危机；而在这个争斗中务必提高并普遍反帝国主义的宣传与组织，成功各阶级分别的与联合的民众政治势力。

中国共产党请全国愤激的反抗帝国主义之屠杀的人民，注意四件事：

第一、须将这个斗争持续的依靠于全国民众自身的力量，万不可倚赖和相信政府的交涉而中辍民众的反抗；须知段张政

府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卖国媚外是其特长;我们虽不必拒绝政府的交涉,却不可相信并倚赖政府的交涉而中辍民众的反抗。

第二、须知中国人民与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无调和之余地。更须知外国大资本家、大商业家、大银行家是外国帝国主义的主人,在上海的外商厂主(工部局的主人)更是这次大屠杀的正凶,万不能自欺欺人把残杀之罪专移于其雇用之巡捕,而反认真正的敌人为“调人”,希望他们出来讲什么“斡旋”、“公道”和“谅解”。帝国主义对付我们只有奴隶地位与铁血政策,我们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只有我们屈服他们,或他们屈服我们之两条路。与其认贼为父,敷衍〔衍〕面子以了事,毋宁干脆的斗争、干脆的失败之光荣。

第三、在这如火如荼的大反抗运动中,上海上流社会和各报新闻记者已多少暴露其调和妥协和“速了”的倾向;纵然上流社会现在还是这反抗运动中的要素,然这种倾向若不停止,实大有害于全民族的利益。

第四、须谨防帝国主义的离间破坏政策。帝国主义的离间破坏政策,第一是用种种方法捏造苏俄和共产党主使的谣言,第二是离间商界与工人学生的一致,并企图和缓商界领袖使与商人群众分离。

中国共产党敢告全国人民不要受帝国主义的暗示与欺骗。这样反抗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大运动,各阶级各党派都应当积极的参加,积极的鼓动或主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农阶级的党,工农阶级既不是冷血动物,又不是帝国主义的附属品,乃是

帝国主义之最坚强、最可怕的死敌，中国共产党那有不参加运动的道理？假设这次运动真如帝国主义机关报之所说——是共产党所鼓动的，那末这不仅不足使各阶级群众畏避共产党而观望不前，反而要使他们亲近共产党，并加倍勇往的团结中国民族之一致的奋斗。因为中国共产党只有这样的积极努力，才能使各阶级群众深信共产党不仅为工农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并且为全中国被压迫民族而奋斗。

苏俄亦然。假如帝国主义机关报所说苏俄鼓动是真的，那末不仅不足使各阶级民众畏避苏俄停止运动，反而要使他们证实只有工农共和国的苏俄是被压迫民族唯一的挚友；挚友的帮助，无论是精神的或物质的，都要大大增加他们反帝国主义的情绪与勇气。只可惜苏俄的力量现在还不能助中国民族一举打倒帝国主义，使他从野蛮残暴的列强中解放出来。然而中国全国民众正殷殷的望着苏俄及其领导的各强国无产阶级有帮助中国民族如此解放之一日啊！

中国共产党敢提醒全国民众的注意：这次上海的大事变是由帝国主义向工人阶级之进攻引起的，这是证明各阶级的民众已经深悟拥护反帝国主义的新动力之重要。几十几百几千几万的上海学生市民不惜殒身饮弹在帝国主义的炮火中前仆后继的来援助工人，这是何等可敬的精神，何等重大的牺牲呵！务望上海和全国奋起的民众，承继流血烈士之遗志，在长期的民族斗争中时时拥护最被帝国主义仇视压迫的工人群众之利益；勿中帝国主义的离间政策，使最忠于民族利益的工人阶级有任何不堪之危险，而民族解放运动亦因此而遭断羽不振之打击呵！

全国工人们！农人们！一切被压迫的群众们！起来，起来！
打倒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
各阶级联合战线万岁！
中国民族解放万岁！^①

(《向导周报》第 117 期, 1925 年 6 月 6 日)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言

——告此次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

此次民族运动已由局部的发展到全国的，并且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已非常明了。全中国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同时奋起，因各国工人阶级与被压迫民族之援助及同情，而增其前进的勇气。同时，大商阶级之妥协，绅士学者之“速了运动”、“缩小范围”，与夫军阀勾结英日帝国主义者向民众进攻，不但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障碍，而且简直是要破坏这个运动。所以一方面真为民族利益奋斗的，是工人、学生、中小商人等所谓“下等华人”，别方面背叛民族利益的，是大商、绅士学者、军阀等所谓“高等华人”。下等华人中，犹以“最下等”的工人为主力军，是以各处运动都以罢工为最后可靠的武器。高等华人中，犹以最高等的军阀为帝国主义的刽子手，是以奉天、天津、山东、上海、武汉、长沙的民众运动，无不遇着军阀之摧残压抑，有的地方几至于完全停顿或消灭。

^① 根据《六大以前》一书，本件落款：“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

当此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发展的时候，中国内部居然分成两个营垒，——这是现时民族运动里的特性，我们应当特别的注意。

帝国主义者因中国人民的奋起与其本国工人之反对，现时已想用种种狡猾政策，以求保存其在中国之特权及威力。譬如美国，现在主张在中国召集第二次“华盛顿会议”讨论取消领事裁判权，他明明知道自己的在华特权比英日较少，英日未必赞成他的提议；他又明明知道他所提议的召集国际会议之先决条件，事实上中国一时不能办到，他不妨用这样口惠而实不至的方法，愚弄中国人心，以遂其垄断在华商业之欲。其实美国如果真是“对中国要求修正不平等条约及收回领事裁判权深表同情”，便应当步武苏俄自动的放弃此等特权，以身作则，为各国倡；何必一定要等什么国际会议？岂不是明知道国际会议结果难测，各国互相牵制，托辞延宕，即使有决议也可以不实行，所以送这一个空口人情的吗？华盛顿会议的决议怎样？议决后的实行又怎么样？我们受过一次骗，不受第二次骗了。中国民众只能信事实，决不能信空言的。不论那一国，如果事实上能放弃在华特权，停止一切侵略行为，中国民众当然承受这种好意，——可是骗人的狡猾政策，中国人民却不能信的！

英日帝国主义呢，很早他们使用武力侵略中国。一切割让的土地、租界、租借的港口（实际上也等于割让），以及其他种种特权，他们无不是以战争威胁等方法劫夺去的，中国因此所受的损失，所死丧的性命正已不计其数了。这次五卅以来，上海、汉口、广州、安东等处的屠杀，不过帝国主义的小试伎俩罢了。尤其是英国，素来总是自称为“文明民族”、“文化国家”、“基督教的国

家”；然而实际上他对于中国的政策里，只有炮弹、鸦片、流血甚至于賂买中国官僚等等卑污不堪的手段，——这本是他对于东方的根本政策。随后，日本以及其他各国，亦都学着他这种“文明的”政策了。

最近英日帝国主义者亦仿佛表面上取和缓态度，实际上都用“以华制华”政策，以高等华人来宰制下等华人，这又是他们在殖民地惯用的方法。

日本在欧战时候，对于中国曾经露骨的表现他那“新进的”帝国主义的贪狠；二十一条的要求，已经早成中国民众切骨痛恨的目标。此次上海事件，也正起于日商纱厂在上海与青岛摧残工会打死工人。然而他现在一方面鼓吹日厂事件单独调解，想把一切责任推卸到英国身上去，仿佛他和中国同文同种，极想亲善似的；一方面在实际行动上都和英国取一致政策；可是这种狡计，中国人民一眼便看透了，也和英外相张伯伦答复工党议员的演说词一样的。张伯伦的演说，虽然竭尽他那造谣诡辩的长技，但始终不能掩盖英帝国主义的强盗政策。至于“赤化”、“过激”、“苏俄阴谋”等类的谣言诬蔑，也决不能骗着中国民众，——不论他们造什么假证据，诬告什么苏俄宣传员，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最简单的理由便是：中国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及压迫，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远在苏俄及“赤化”出世之前！

帝国主义者一方面从外面侵略压迫中国，同时必定利用军阀，从中国内部来压迫中国人民的民主民族运动，破坏中国。去年秋天的北京政变以前，他们利用吴佩孚做工具。如今他们又挑着了张作霖了。张作霖本来因得日本的援助取得了半个中国，今

后又加上英国援助，他以为不难消灭一切政敌，奄有全中国；所以他不踌躇的以武力镇压从奉天到上海的民众爱国运动，出卖祖国，以博得英日帝国主义者之欢心！

凡是奉系军阀所在之地，民众运动最受压迫，如奉天——张作霖的老家里，如天津——张作霖爪牙密布的地方，一切民众运动及平民组织都受压制，到处逮捕拘禁人民。奉军刚到上海不久便宣布戒严，要禁止游行集会出版等的自由，军队占据工会机关……这种压迫和专制，并不比帝国主义势力下的租界差别到那里去！

张作霖要执行帝国主义者的命令，他不但要镇压国民运动里的主力军——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甚至于镇压工人的职业组织——工会；他还要摧残学生与中小商人一般的民众；再则，他并且要毁灭领导民族运动的国民党与同情于民族运动的国民军。

实际上的情形如此，民族运动的策略，便当依此而定。

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应当注意两点：第一、彻底明白中国的独立与统一，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方能达到，须有为此奋斗到底的决心。——一切不可信所谓“高等华人”之“速了”、“缩小范围”、“局部交涉”等苟且妥协的口号。并不可依赖段政府一纸哀求式的改约条文可以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第二、须有一个革命民众势力集中的组织，以为领导全国运动的统一机关。

民众已经奋起抗争，但是我们应当知道：要达到胜利是不得经过极大的困难。敌人的力量是很大的——外国帝国主义者之外，还加上国内军阀，尤其是张作霖的力量，还有许多所谓

高等华人也要加入中国人民敌人的伙里去；假使我们能联合，能统一民众革命运动的力量，我们才能得到最终的胜利，因此，应当有全国集中势力的机关，统一那散处于各地方的民众力量，以便一致的进行到胜利的道路上去。

要有这样一个全国统一机关，便必须召集各界团体的大会于北京。在大会之前，应当赶紧在各地组织工商学以及农民等各界的联合委员会，由这些委员会速派代表赴北京的大会；大会便可以举出执行机关，代表全体中国民众而实行种种必要的运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集中的指导，而达到最后的胜利。

我们号召民众一致团结，以实力赞助国民党和国民军，同时，必须要极明白的在一致反抗的中国民众及全世界工人和被压迫民族之前并指出下列的要求——这是中国民众奋斗的目的，这应当是国民党和国民军的目的；只有根据这些要求，民众才能完全积极的参加斗争去力争自己切身的利益，亦只有根据这些要求，指导者才有实在的民众力量做后盾。这些要求是：

一、宣告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废除；

二、解除全国不愿反对帝国主义的军阀的武装；

三、保障平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

四、废除妇女在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之不平等待遇；

五、废止厘金及一切苛税杂捐；

六、限定享有田地之最高额，大地主逾额之田地颁给贫农及无田地之农民，限定田租之最高额，佃户所出田租须尽量减低并禁止预征钱粮；

七、工会之绝对自由，承认工人有同盟罢工之权，依生活程

度规定最低工资,制定保护劳工法;

八、农民工人有武装自卫之权;

九、确定全国教育基金;

十、召集真正人民之国民会议。

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们!至少须实行这些办法,中国才能得到独立和自由。其速兴起为这些要求而奋斗!亦只有这些办法能保障劳动平民的发展——劳动平民负荷着全部运动的重任,用他们的精力,用他们的血,用他们不断的斗争,筑起自由统一的中国之基础!

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们奋斗到底!

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

自由统一的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日

(《向导周报》第121期,1925年7月16日)

为工会条例事告全国工人

最近北京政府的工会条例草案已经在报上发表出来了,——这种工会条例对于新兴的工人运动非常之危险。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应当懂得这一草案的政治上的作用!

现时中国的国民运动奋起于全国,已经出于列强帝国主义

者的意料之外。而中国工人的团结和奋斗的力量，尤其使帝国主义者恐慌，甚至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也害怕起来了。

北京政府最初还装腔做势，说什么容纳民意力争外交的话，想欺骗人民去承认他这所谓中央政府，而今他的工会条例草案却明明表显他对工人阶级的敌意了。

各国历史上都有明显的公例：只要工业一发现〔展〕，无产阶级逐渐增多起来，他们便要组织自己阶级的经济组织，就是工会。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等等都是这样的。现在我们中国也是如此。

这是当然的事。不管是破产的农民或是小手工业者，只要一进工厂做工，他们很早就知道在工厂里要反抗资本家，没有团体是不行的。而且只要经过一两次罢工，工人便觉得团结之后的力量。有组织的罢工运动，往往可以在很大工厂或产业里，得到胜利，工会的组织也就成为很大的力量，使资本家不能不尊敬他。——资本家本来是只看见实力的。

工人在罢工〔工〕时偶然的团结之后，常常就此进步而求永久的组织，成立工会。

工会的任务是很多的：力争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礼拜日和年节的放假休息，改善一切劳动条件，保护童工女工。工会帮助失业的会员、有病的年老的会员。创办通俗及职业教育、俱乐部、寄宿舍，使工人能够得到娱乐和休息。当然，工会最重要的职任，便是团结工人的力量，反抗资本家的压迫。所以资本家总是反对工会。

资本家和政府最初总是绝对禁止工会，不准工人团结，用警察、巡捕、监狱、审判厅以及种种手段来压迫。工人开会——他

们便来解散，甚至于开枪杀人；罢工便算犯罪，便算违背法律，破坏秩序。

可是等到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力量表现出来之后，他们知道单是一味禁止工会是不行的了；到这个时候，资本家的政府，便想用欺骗的方法。北京政府现在也是如此。表面上承认可以组织工会，可是限制得非常之严，使工人阶级的力量不但不能发展而且还更受束缚。

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反抗剥削，要争劳动条件的改善，必定要有自由的工会，不受外界和官厅势力的压迫和干涉。工会应当代表工人自己的意志和要求。所以政府的限制，工人一定不能承认——政府只是帮助资产阶级，真是工人阶级的仇敌。

一切工人都可以加入工会，都可以发起工会。——决不能讲年龄、工作、年限等等资格。在那一工厂或那一职业做工，便可以组织这一工厂的工会或是这一职业的工会。随便十几个几十个工人都可以发起工会。工人开大会或代表会议，用不着官厅和警察来监督干涉。

工会成立完全是自由的，只要成立之后通知官厅注册就完了。工会的经费财政，由工人自己选出来的机关管理，无论什么条例不应加以限制。

只有这样，工会才能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意思和要求，工会才能是工人自己的组织，去力争劳动的解放，推翻资本主义。

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已经表现出来了，工人阶级的觉悟一天一天的增高起来了。资本家和资本家的政府也已经觉到了，知道单是禁止是不行的了，知道一味的高压迫是危险的了。可

是他们还不知道工人的力量究竟有多大。他们不知道工人阶级是不会受他们骗的。中国工人决不承认北京政府那样的工会条例。北京政府的背后站着外国的和中国的资本阶级。他们拟出那样的工会条例,是想用来束缚工人,使工人不能自由结合。中国工人要求极自由的工会,要求保障工人权利的工会条例!

不准干涉工人! 将来的社会是工人的!

中国工人已经表显他们和帝国主义奋斗的力量,工人阶级担负了力争民族解放的重任。

工人阶级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奋斗,当然要表现更大的力量,更坚决的决心,更勇敢的奋斗。

推翻违背工人利益的工会条例!

绝对自由的阶级工会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日

(《向导周报》第 122 期, 1925 年 7 月 26 日)

五卅二周月纪念告上海工人学生兵士商人!

今天是七月卅日。外国帝国主义者屠杀我们上海学生、工人已经两月了。

我们上海罢工也已经两个月了。广州、香港、汉口、天津以及其他各地的民众也早已起来奋斗。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一天天的扩大。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当我们中国人是奴隶

牛马已经八九十年。他们想不到我们中国工人居然会起来反抗，他们还是蔑视中国民众；现在他们竭力的想消灭罢工运动。最近英国人的字林西报乱放谣言，说罢工工人是暴徒，说只要邢士廉枪毙一二暴徒的首领，一切运动便会停止，并且主张邢士廉不实行屠杀政策，上海工部局当局要来执行了。这是不是胆大妄为到极点？

我们知道字林西报这种宣传之后，立刻将海员工会、工商学联合会等团体封闭。帝国主义者以为这样便可以摧残上海的罢工运动，扑灭全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可是他们这种希望是达不到的。我们民众的力量非常之团结，非常之大，决不怕任何压迫，所以当局都不得不把海员工会和工商学联合会重新启封。我们今天纪念五卅的惨案，我们应当说：大家一致坚持，不达到目的不上工！

帝国主义的进攻计划大致有三种：一、各国帝国主义者虽然利益互相冲突，可是暂时极力想联合起来一致对付中国，以保存他们的主人地位。二、他们想法利用中国军阀反对中国人民，挑拨各军阀间的战争。三、上海、广州、汉口、重庆、青岛等处的惨杀案，他们都想变成地方问题，好各就当地欺骗，勾结地方政府草草解决。譬如帝国主义者故意叫上海工部局反对北京公使团的决议，借此想指说上海问题归上海解决，便是一个证据。

帝国主义者这些计划，完全是想扑灭我们的运动，有时恐吓，有时又欺骗——我们民众是不上当的，我们要格外的团结，格外的努力，联合全国的民众一致的坚持，反抗！

我们的力量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力量一天一天的增高起

来,各大都市里的工人已经起来罢工,甚至于穷乡僻壤的民众也已经起来奋斗。全中国全世界的被压迫者都募款援助我们。我们上海、香港的罢工,使全国的劳动平民都震动,都觉悟。各大都会的学生,散到全国内地去宣传,几千万万民众的力量一天一天的集中起来,团结起来了。

各地的工人都组织工会,各地的学生、商人,以至于农民,都要象上海一样,组织起工商学农等各界联合会。各地的罢工和抵制英、日货的运动,有这些联合会做统一的集中的指挥机关。——我们民众的运动一定可以胜利;无论我们的敌人有多少奸计,有多大力量,决不能镇压住我们的反抗运动的。

我们怎样的达到目的呢?

第一、我们应当有全中国统一的指挥机关。所以赶紧召集全国工商学农等各界人民的联合大会,举出中央执行机关。

第二、我们应当集中工人阶级的力量。所以要召集紧要的全国劳动大会,由全国总工会来指导全国罢工的进行。

第三、那全国各界联合大会便应当立刻筹备真正代表全国人民——工人、商人、学生、农民、教育界、自由职业者、军人、兵士——的国民会议,组织真正统一的中国国民政府。这种统一政府未成立以前,我们以为现时全国国民已经奋起一致对外,国民革命运动渐渐普遍各地,南方的国民革命政府当然要出来号召建立临时的南北各派联合的政府,共同进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斗争。

第四、我们民众应当要求武装,并成立全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不象现在各军阀私养军队,不能抗御外来的帝国主义者,

却只会压迫人民。真正人民的武力——只有统一的国民革命军，服从人民的中央政府的军队。

上海的工人、学生、商民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我们十七条的要求，才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上海的市民、警察、兵士呵！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解放，你们才能做独立国的国民，不做外人的奴隶牛马！

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总罢工万岁！

全国反帝国主义的大运动万岁！

全国革命的平民的国民会议万岁！

全国统一解放万岁！

全国国民革命军万岁！

全国平民武装万岁！

推翻帝国主义！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撤退驻华外国海陆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向导周报》第123期，1925年8月10日）

为南京、青岛的屠杀告工人学生和兵士

工人、学生和兵士们！帝国主义者感觉中国民族解放革命怒潮之高涨对于他们万分危险，所以他们此次坚持着，绝不肯让

步，以求正当的解决。他们的政策：一面使交涉期限无期延长，坐待民众怒潮自趋疲惫；同时仍继续以自己的武力或利用军阀的武力直接制止全国各地运动。

南京英国和记公司的工人，经过了长期罢工奋斗，以有组织的力量，才迫得外国资本家承认罢工之要求。工人以为复工后外国资本家必能履行这些要求条件，殊不知万恶的外国资本家，不仅不履行前所承认之条件，反倒调遣英国水兵上岸，在完全中国主权的领土上任意屠杀徒手工人。要求执行条约之男女老幼工人当场中弹而死者三人，伤者无数。这便是“文明的”帝国主义使用自己武力的例证！

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张宗昌，受了日本指使，早已不止一次屠杀过罢工工人了。现在他又明目张胆地枪毙工人领袖李慰农和表同情于工人的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并逮捕工人数十人解往济南，藉此表功于日本帝国主义。这便是帝国主义利用军阀武力的例证！这班当帝国主义鹰犬、帮着帝国主义屠杀人民的军阀乃是人民的公敌，人民应该起来象打倒帝国主义一样去打倒他们。

我们知道在此次外国资本家屠杀和记工人当中，南京军队不忍见此惨无人道的凶剧而起来保卫工人抵抗外国资本家的屠杀。兵士们！你们这种行为是很可钦佩的。你们也是被压迫者，正和工人学生一样，你们的爱国热忱是不让人后的。你们的利益与工人学生的利益初无二致；在必要的时候，你们应该起来反抗卖国长官压迫爱国运动的暴行，而一齐参加爱国运动，争得共同的利益。——至少，你们亦不应该接受卖国长官命令，去压

迫摧戕那做爱国运动的民众机关。

工人学生和兵士们！帝国主义及其工具虽然用尽种种延宕的或屠杀的方法镇压中国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然而我们确信今后的中国民族解放革命运动决非帝国主义及其工具的种种方法所能镇压下去。

同志们！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我们惟有团结自己的势力，联合全世界一切被压迫者向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进攻！

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

打倒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

中国民族解放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一日

（《向导周报》第124期，1925年8月15日）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告工人兵士学生

工人、兵士、学生们：

沪港等处工人，为中华民族独立与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已经两个多月了。罢工工人不但力争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并且奋斗打破帝国主义者束缚中国的种种条约。因为不平等条约，实为屠杀中国人民的工具；而上海、汉口、广州、重庆以及最

近的南京、青岛等处惨杀事件，即由是酿成。上海方面，虽有驻沪奉军竭力威压，托言爱国须维持秩序，实际却摧残罢工运动与抵货运动；但是工人仍然坚持，丝毫没有畏惧退缩。

外国资本家向来以中国为其殖民地，认为他们已经征服了的，中国工人是他们任意蹂躏的奴隶，丝毫不准反抗的。在罢工开始的时候，英日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即以“暴动的奴隶”看待中国工人，采用最横暴的镇压政策。

迨至上海、香港等处五十万工人，一致奋起反抗，组织之坚强，奋斗之勇猛，为前此所未有；举国沸腾，同情四起，尤以学生、小商人等的赞助罢工，最为热烈。如是帝国主义者乃大起恐慌，因不得不与中国政府及资产阶级开始谈判，声言愿意和平解决。罢工运动日趋扩大，帝国主义者亦更觉得非为相当让步不可。事态的严重，使他们觉得现在已非从前可比，不能一味压迫中国工人，使他们生活在极无人道的状况里，替外国资本家挣钱。

帝国主义者这才明白，中国已有工业的无产阶级既能力争自己的阶级利益，又极努力于中国的解放，已成了全国解放运动的先锋；因此使各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国政府，不能不在国会中提起“中国问题”，不能不将两年来早已抛在脑后的华盛顿会议的决定，重新提起来。

可是，工人、学生、兵士们呵！除少数工贼、买办，当此全国各界一致赞助罢工工人之际，而帝国主义者亦已不能不预备让步了；适于此时，奉系军阀张作霖竟遣其部将自告奋勇的来帮助英、日帝国主义者。

奉军南下的时候，诡称保护国民利益，其实张作霖和帝国主

义商量好了，奉军之来，即为压服罢工运动，恐吓学生和商人替那些帝国主义者解围罢了。邢士廉初到上海之时，所以不敢立刻上〔下〕手，并不是因为张作霖或邢士廉不愿下手，却是因为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非常之激昂，奋斗的决心非常之坚决，如果那时便直接压迫，民众必定要暴动而反抗奉军。

然而过了些时，奉军的压迫终于开始了，帝国主义便兴高彩烈起来。英人报纸天天鼓吹杀人压迫，邢士廉便天天封闭团体，逮讯工人学生——这可把英国人和张作霖之间的秘密关系，完全暴露出来。

工人、学生、兵士们！邢士廉来到上海，华界马上就戒严，上海四处都布满了侦探汉奸，造作种种谣言来破坏工人及一般民众的团体。然而在这种情形之下，罢工始终还是继续下去，工人群众深知他们已经得着的胜利——是非常之可贵的。工人阶级因有种种团结的能力，已经使帝国主义者都不能不让步，至少口头上已经不敢强硬。上海、香港的罢工运动引起全国解放运动的发展，各地都起响应，然而现在这一潮流，还不能立刻形成全国的反抗运动——工人还必须要有长期斗争的预备。而且军阀一天天的进逼；甚至于大资产阶级已经想中止罢工及抵货的运动。这种情形，工人阶级如果不顾环境孤军独进，也决不足以使帝国主义者立刻抛弃不平等的条约。

因此上海工人现时应当明白表示，对于自身的经济上及法律上的要求，当然继续以罢工方法力争；至于全国的总要求和工商学各界所提出的条件，工人当以全力赞助南北政府，使一致的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而奋斗。

上海工人,假使能满足自己的经济要求及法律要求而上工,这决不是停止与帝国主义奋斗。这不过是总斗争中之一个段落和部分的胜利;因此,工人得以更进一步的团结组织,联合一切革命的民主主义的分子,继续斗争——在共产党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旗帜之下,达到完全解放中国及工人阶级的目的。

工人们!罢工仍须继续坚持,先求达到经济上、法律上的要求,团结在工会里面。你们既是有组织的罢工奋斗,你们也要有组织的上工。

学生们!对于工人精神上及物质上的援助,此时更须努力。工人的胜利便是学生的胜利,也是全国人民的胜利。

兵士们!你们也是中国的国民,也和工人阶级是一样的。你们从此不好反对工界同胞,不应听任何人的命令压迫工界同胞。工人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帝国主义者的胜利,是反抗帝国主义走狗的奉系军阀之胜利,所以亦就是你们的胜利。

工人兵士学生的胜利万岁!

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万岁!

中国国民自由万岁!

工人学生兵士以及一切劳动平民联合万岁!

反抗帝国主义之继续斗争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

(《向导周报》第125期,1925年8月18日)

全国被压迫阶级在中国共产党 旗帜底下联合起来呵！

工人们！学生们！兵士们！

中国工人和学生的血流了不少了。自从五月卅日上海大马路大屠杀之后，中国各地接二连三的屠杀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中国工人阶级为着争自己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而奋斗，可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却始终想用屠杀政策压倒这种解放运动。两个半月以来，被杀的受伤的已经有几百几千——上海五卅屠杀之后，汉口、广州、重庆等处又继续着惨杀，甚至于九龙也有不少中国工人被枪毙，他们不过因为不肯替英国人掘战壕，帮英国人预备打广州。

全中国的民众都已经因愤激而反抗，帝国主义者却还在预备更厉害的压迫，更残酷的屠杀。最近又有好几次大屠杀。第一是南京和记工人——他们罢工之后和记公司的老班〔板〕已经答应要求，可是工人去上工的时候，这些外国资本家不但悔约不肯履行并且开枪打人，又叫了英国水兵来帮着杀人。第二是青岛的纱厂工人——日资本家直接命令他们的奴才张宗昌枪毙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将工人王伦斩首示众，并且四出拿人，捉去工人四五十。第三是天津的纱厂工人——日商裕大纱厂诳骗工人，假意答应他们的要求，等到他们去上工，就开枪轰击。奉系军阀李景林也立刻帮忙，派出军队警察五六千人围攻工人，死伤

数百,接着还逮捕工会及学生会的领袖,严刑拷打,惨无人道。

工人们!学生们!兵士们!英国帝国主义者想用炮火政策镇服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想用卑鄙齷齪的手段贿赂买卖国军阀和工贼,一面压迫一面破坏,来强迫中国的人民仍旧做他们的驯服的奴隶牛马。他们永不用妄想罢!从此以后我们中国民众,工人学生一定永久不息的奋斗,反抗我们的仇敌。虽然我们的仇敌还在天天遣调海军上陆,天天命令军阀屠杀工人,天天贿赂工贼破坏工会;然而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觉悟,已经奋起斗争,几十万几百万的中国工人,广州、上海、汉口、青岛、天津、开封等大都市里无产阶级,努力参加斗争的,也正一天天的增加呢!上海的五卅惨案激起汉口、广州的工人;汉口、广州的屠杀,又激起南京、天津的工人……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一日千里的发展;当然这种民众的力量同时亦便反抗帝国主义的奴才——张作霖手下的奉系军阀。五卅以来,上海、汉口、广州、南京、青岛、天津等处被杀的人,固然已经有几百几千,可是全国各地因此而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人,又何止几百万几千万!

帝国主义者现在还在兴高彩烈,他们的机关报拚命的颂扬李景林,感谢张作霖,他们指使邢士廉——教他照天津李景林的模范镇服上海的工人。

工人们!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奴才奉系军阀真会照着天津的“模范”来压迫上海的工人。我们应当及早的预防,上海日商纱厂罢工问题所已经签订的条件,本来只是上海交涉员和日本领事的谈判,我们工人是不能满意的——可是他们自己签字的条件,也未必肯诚意的履行,亦许也是帝国主义者诳骗工人的。

帝国主义者在北京、青岛、天津已经屡次悔约，屡次指使军阀压迫——难道在上海他们不会如此吗？我们工人应当准备自己的力量，应当准备对付他们的阴谋。工人应当一致团结，以全力拥护工会，工会组织应当特别严密，使我们团体，不论帝国主义者、军阀、工贼等怎样压迫破坏，始终能够存在，而且工人还要有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是最觉悟的工人所组织者，永久领导着工人奋斗，不论是成功是失败。工人们！赶快加入共产党罢。共产党能领导你们的斗争达最到〔到最〕后的胜利。

学生们！努力的继续帮助工人，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罢！军阀的压迫和残杀决不会吓退你们，只会使全国的革命运动格外发展。赶快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高举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向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奋斗。

兵士们！不要向工人和学生开枪，他们为全国的解放而奋斗，亦就是为你们的利益而大奋斗。你们赶快组织兵士的革命机关，反对那些使你们变成帝国主义工具的军阀。

工人们！学生们！兵士们！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一天一天的发展起来。现在矿工铁路工人还没有直接加入斗争哩！还有许多地方以〔的〕工人阶级没有完全组织起来加入运动哩！这种准备正在进行，假使全国一致的团结成功，我们的力量比现在还要强几千几万倍哩！群众里面的这种力量正在一天天的积聚起来，准备着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决死的斗争。这是很长期的工作，要组织得好，要有耐久的战斗力的，要有统一的政治上的指导——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便是

共产党,共产党的政见是:只有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及其他一切被压迫民众联合一致,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然后中国工人和一般民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工人们!学生们!兵士们!帝国主义者固然还很利害,他们有兵舰,有飞机,有机枪,有种种杀人的利器;他们还有军阀,有工贼,有侦探,有种种破坏中国内部的工具。可是中国的民众,并用不着害怕。列强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人群众一天天的奋起反抗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中国民众和各国工人的联合,便可以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各国革命的工人联合——共产国际,指导着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大家赶快加入中国共产党,增加他的力量,就此可以保证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的胜利。

中国工人阶级斗争万岁!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万岁!

推翻列强帝国主义的强盗!

推翻帝国主义的奴才奉系军阀!

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万岁!

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被压迫民族领袖之共产国际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向导周报》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

中国共产党为总工会被封告工友

亲爱的上海工友们：

你们所受奉系军阀最近的摧残——封闭了你们的总工会及各业各厂工会，这不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不幸，并且是中国民族运动的不幸，因为中国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上海的工人群众，已经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之急先锋。

奉系军阀久已公然做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在山东，在天津，都为了替外国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的民族自由运动，封闭了许多工会，杀了许多工人，现在他们又在北方压迫唐山矿工罢工的工友，在上海压迫你们了！

你们此次被摧残的原因更是复杂：第一、英国帝国主义者看见日厂工人上工，他的势力孤了，更急于要命令他的走狗封闭你们的工会，好叫你们无条件的上工；第二、日厂工人上工后，日本帝国主义要大批的开除工人，恐怕工会领导工人反抗，所以也不得不命令他的走狗封闭你们的工会；第三、段政府想在关税会议求外国帝国主义开恩多加点关税，恐怕人民坚持关税自主怒恼了洋大人，所以急于压迫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上海工会是人民团体之最有力最急进的部分，更要解散它以见好于洋大人；第四、江浙战争又日见紧迫，直奉两系军阀都急于各在杭州、上海封闭工会，肃清内部的障碍；第五、资产阶级不但嫉视工人阶级，并且向来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便不顾国家和民族的

死活,所以五卅运动以来,全中国的资产阶级都厌恶工人阶级阻碍他们和外国帝国主义者妥协的道路,尤其是上海自各中国厂罢工以来,纱厂联合会更公然请求军阀压迫工会,总商会也希图破坏现在工人的工会,再由他们出来组织归商会操纵的工会;第六、工团联合会及其变相的工团自治联合会这班工贼们,一方面用暴力打毁总工会及恒丰纱厂工会,威吓小沙渡各工会,一方面向戒严司令部造谣密控总工会,这也是军阀藉口摧残工会之重要原因。

这些复杂的原因凑合起来,上海各工会遂至不免于奉系军阀的毒手了!上述六个原因之中,前四个都是外来的压迫,虽然一时能破坏工会这一形式,却不能破坏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或反而使内部的团结更加坚固起来。真正能够破坏工人团结的乃是后二项:工会由商会操纵,这种工会是为资本家利益而存在的,不是为工人利益而存在的,有工会还不如无工会;替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资本家做走狗,破坏工人团结,这本是工贼的职务;工贼破坏工人团结,或者用硬的方法,打毁工会及工人,或者用软的方法,混在工人群众中,造谣诬蔑工人的领袖及最能帮助工人的共产党,使工人孤立无援,又或鼓吹地方主义,拆散工人阶级整个的产业组织,不但使工人不便罢工,并且使每个工厂每个产业的全体工人以籍贯不同而分裂,而竞争,为资本家所利用。

亲爱的上海工友们!你们已经组织成了伟大的力量,你们的工会虽然被封了,军阀们只能一时封闭你们的工会,不能永久封闭你们的工会,更不能封闭你们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只要你们的内部团结不为商会及工贼的阴谋而涣散,帝国主义者军

阀外面的压迫,都是不足惜的。

现在的中国工人已成了一种社会势力,不象从前那样容易压服了;各省都有了工人的组织,并且有了全国工人的组织,并且有了代表工农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并且全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及共产党,都要实力援助你们。你们已经不是孤立无援的了,不可因工会一时被封而灰心,应该万众一心,不断的奋起!

打倒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

工人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向导周报》第131期,1925年9月25日)

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

我们人民自古就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级。在这四个阶级当中,士是专门读书的人,他们是以知识擅长,可以称他们是知识阶级。商人是拿金钱做买卖的,可以称他们是资本阶级。农工都是以劳力谋生的,本是四民中的劳动阶级。

从前只有读书的士人有知识,所以做官治民的都是士人。商人有钱即便有势;有钱可以在政府买得官做;有钱可以在城市雇工人开工厂做厂主、做资本家;有钱可以在乡间买田地雇佃户做

地主。士人做官发了财，也要到乡间买置田地做起地主来。最苦的只有劳动阶级的工人和农民。

世上吃的穿的用的一切东西，那一样不是农民和工人劳力做出来的？然而工人农民自己的吃穿用却是很苦，完全为厂主地主做了牛马，这是世上第一不平的事。

工人农民在全国人数中，差不多要占十分之九，若说人民应该享幸福，便不该把工人农民除外。在实际上，全国享幸福的人，只有少数资本家和地主。占国民最大多数的工农劳动阶级，不但为厂主地主做牛马，而且还要受其他各方面的压迫，几乎不能活命，还说什么享幸福！现在单就农民说，你们所受各方面的压迫，待我们一一讲来。

第一个压迫农民的自然地主。地主召佃户耕田，只是供给他若干亩田地，或者有几间茅屋，此外一无所有，所有耕牛犁锄稻麦种子肥料以及一切收获前所需食用，都需佃户自备，此外立约承租时，还要交地主若干银钱做押租。地主丝毫不费气力，到收获时，便向佃户收取租谷；无论是照约收取额租或是临时分租，每亩地主所得约占收成之半，即少也要三分之一，有些地方（如湖北汉川县）还要预收来年的租。非遇到水旱奇灾，佃户没得吃，地主的租谷是不能减少的。佃户因为无力缴租或是因为缴了租后吃用无着，便不得不向自己的地主或〔或〕别人的地主重利借贷，冬春借谷一担，秋收时便须归还两担，最客气的也要一担半。农民一经这样的重利盘剥，便永世不能翻身。现在许多军阀官僚到乡间去买置田地，这些地主也和别的地主一样是不耕不种的寄生阶级，土地由他们更集中了，集中的结果农业上

并不能改良进步，只是使农村中的佃业贫农增加，农业反退步。地主绅士们所把持的民团局或团防局，更是欺压农民的乡村军阀政府。

第二个压迫农民的要算外国资本家。自古道男耕女织，自从外国资本家把他们的洋货潮水般的输入中国以来，乡间手工的纺纱织布生意，都被外洋机器制造的棉纱棉布夺去了。据海关报告，洋纱洋布入口，每年价值二三万万元，就是每年中国种棉纺纱织布的农民工人之损失。此外洋油、洋火、洋灯、洋针、洋肥皂、洋头绳等都一一运到乡间，成了农民的日用品；就是农民日用所需的本国货，如油盐纸张茶叶酱醋等，也因为厘金等捐税增加及别的洋货输入的影响，价钱日见高涨，尤其是盐税归外国人管理，因为偿还洋债，他们拚命增加盐税，盐价日见高涨，农民生活因之更加困苦不堪了。最可恶的是法国资本家派人到中国传天主教，英国美国资本家派人到中国传耶稣教，这些教士在乡村庇护教民欺压良懦，真是无法无天。

第三个压迫农民的就是军阀。军阀们连年战争，一方面以筹饷为名增加各项间接税如厘金盐税等，使一切物价无不高涨，又复巧立各种名目直接勒捐，加之预征钱粮，增加田亩捐，强迫公债，逼得农民非典田卖地卖儿卖女无从活命。一方面军队经过的地方，抢虏焚烧，更是悲惨，往往整个的农村，都被这般野蛮的军队毁灭了。即在不受兵祸的地方，军阀们只顾筹款增兵，民间的水利农田，从来不暇顾问，因此水旱灾荒遍于全国，最厉害的象淮河和洪泽湖一带，历年淹没田地，总在一二万万亩以上，直隶山东沿黄河一带，历年淹没田地一万万亩。其余若天津的白

河,湖北的襄河,湖南的洞庭湖,都久未疏浚,河身淤塞,泄水蓄水都不灵,屡成水旱奇灾。这些地方农民的困苦便可想而知了。

第四个压迫农民的是贪官和劣绅。各县征收的钱粮,除国家正项之外,另收陋规至少也在正项一倍以上,譬如地丁银一两,至少须缴纳银元三元以上,此项陋规,国家丝毫得不着,乃用“赢余”的名义归县官房班以及征收人员私分了。此外催钱粮的差役下乡,还要另外需索。印契税照地价收百分之九,也只有三分归国家,县官得三分,房班衙役共得三分。农民欠了钱粮欠了租谷,都要到官办罪。乡间的劣绅多半是地主,他们往往勾结贪官鱼肉农民,农民得罪了他们,他们就挑拨农民到官兴讼,于中取利,或者因欠税欠租,借官势威吓农民,甚至诬告农民抗粮抗租,禀请县官派兵究办闹出大乱子来。劣绅们不仅借官势威吓农民,并且还要摊派亩捐,办理什么民团局或团防局作威作福,直接的欺压农民。至于乡村自治机关和各县议会选举,更是劣绅们包办的了。

农民受上述种种压迫,不但生活艰难,有些并不能在农村安居,只得弃农改业了。各地乡间充满了没有田地耕种的农民和有田种而吃穿不够的农民,再加上水旱兵灾便不得不去当兵随匪替军阀匪首充当炮灰,能跑到城市里做苦力的还算得法。

农民做了耕种粮食这样重要的工,又占了国民大多数,现在如此困苦流离,这不但是农民自身的不幸,并且是国家的损失和危险。解除农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实行“耕地农有”的办法,就是谁耕种的田地归谁自己所有,不向地主缴纳租谷;此外,废止盐税和厘金,关系农民生计也非常之大。可是要达到废止盐税厘

金和实行“耕地农有”这些目的，那就非农民工人联合起（来）革命，打倒军阀政府不可。因为军阀政府是断不肯把盐税和厘金废止的；至于“耕地农有”，更须革命的工农等平民得了政权，才能够没收军阀官僚寺院大地主的田地，归耕地的农民所有。为农民目前自救计，本党主张全国农民应该有下列几个最低限度的要求：

（一）政府须承认由农民组织的农民协会代替非农民的劣绅所包办的农会。

（二）乡村自治机关，应以普通选举法直接选举之，不得由绅士包办。

（三）农民协会有会同乡村自治机关议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之权。

（四）由各乡村自治机关动用地方公款办理乡村农民无利借贷局。

（五）各乡村须禁止私人积谷居奇。

（六）反抗各种苛捐杂税及预征钱粮。应往（缴）之钱粮，无论地丁或糟米，均只按照实际市价缴纳，不得缴收陋规。

（七）中央及地方政府均须专设治河局，政府预算均须指定治河专款不得移作别用。

（八）由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并要求政府发给枪弹，以防土匪及兵灾。

这些都是农民目前急迫的要求。但是要想达到这些要求，非农民自己大家结起团体来出力奋斗不可。

怎样的结团体呢？就是组织农民协会。或者有人以为农民一向这样涣散，恐怕不容易结成团体。其实不然。我们根据广

东的经验，农民的团体是可以组织成功的。自从民国十二年七月本党第三次大会后，本党才起首在广东帮助农民组织团体，经过不到二年，农民组成了协会的，有二十多县，各处协会会员现在已经有四十六万五千多人，并有几千的武装自卫军和地主开了好几次战，这二十几县的农民协会代表，于今年五一劳动节（每年五月一日是全世界的劳动节），在广东省城成立了广东全省农民协会。适逢这一天（五月一日）全国各工会代表也在广东省城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劳动大会的二百七十八个代表，和广东全省农民协会一百二十五个代表，开了一个联席会，喊出工农联合的口号，大家都十分亲密。在这些集会中，第一、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可以组织协会和工人可以组织工会没有两样。第二、我们可以看出农人和工人同属一劳力谋生的劳动阶级，实有联合互助的必要。并且工人大半集中在大都会，如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处，都站在政治斗争之重要地位，尤其是五卅运动以来的上海、广州工人，都有了二十万人以上的工会组织，他们不断的经济斗争及政治斗争，使中外资本家都心惊胆裂，这更可以看出农民有了城市工人做有力的领导者。第三、我们可以看出一向被厂主地主当做牛马的工人农民，一向被绅士们看不起的工人农民，现在都结成团体，便渐渐有抬头之一日了。

或者有人以为广东农民有国民党政府的帮助，所以能够组织起来，他省恐怕不行。这话一半对一半不对，广东国民党政府固然肯帮助农民，而同时广东各地方的地主商团勾结国民党中右派（国民党中官僚分子）的军队和县官，破坏农会，摧残农民的事，也不在少数，有时国民政府也无如之何，还是要靠农民自己

的力量奋斗才行。现在除广东之外，湖南、湖北的农民，也渐渐起来组织农民协会了。可见没有政府帮助，农民也能够团结起来。

亲爱的农好〔友〕们！你们要解除你们的困苦与压迫，只有大家起来结团体，组织农民协会，再由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各省各县现有的协会都是地主绅士们所组织的，他们的利益和真正农民的利益相反，非耕田的真正农民自己另组织农民协会，决不能保护农民的利益。本党是代表工人农民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不用说应该帮助你们，就是国民党左派（国民党中革命分子）也必须帮助你们，因为他们的国民革命运动，没有你们参加是不会成功的。

农民协会应该怎样组织呢？各地的农民协会章程，按照各地情形，自然会有些小小的不同，至于主要的办法应一致如下：

一、农会会员以年满十六岁之佃农、雇农、自耕农及农村中手工业者、体力劳动者为限。凡不耕田之地主，重利放债者，不耕田之宗教家如神甫、牧师、僧、道、尼、巫等，均不得为会员。

二、凡会员须缴纳入会费与月费若干。

三、各省协会须分为四级。

（甲）村农民协会以一村或合数村组织之，会员人数须在二十以上。由会员互选三人组织村执行委员会。

（乙）乡或区农民协会以本乡或区内三个以上村农民协会联合组织之，由全乡或区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五人组织乡或区执行委员会。

（丙）县农民协会以本县内三个以上乡或区农民协会联合

组织之,由全县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七人组织县执行委员会。

(丁)省农民协会以本省内五个以上县农民协会联合会组织之,由全省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九人组织全省执行委员会。

四、各村协会所收之会员费,百分之六十用于本村协会,百分之四十用于高级各协会。

五、非协会会员不得加入农民自卫军。每年由省执行委员会召集全省会员代表大会一次,改选新执行委员及候补委员若干人。县及乡或区会员代表大会,均每半年由该县及邻〔乡〕或区执行委员会召集一次,改选新执行委员及候补委员若干人。全村会员大会,每月由村执行委员会召集开会一次,改选新执行委员。^①

七、村执行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三次,乡或区执行委员会、县执行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二次,省执行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一次。

八、各级执行委员均互推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一人,秘书一人为常务委员,驻会办事。

九、各级执行委员均得指定会员若干人组织特殊团体,办理自卫军,消费合作社,教育会,水利局,害虫检查会等公益事业。

十、各级执行委员会均得聘请非农民为顾问,及各项技术人员,助理各种事务。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171—177页)

^① 原注原件疑缺六。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反抗帝国主义 屠杀中国市民告全国青年

全国青年工人、农人、学生、兵士及一切被压迫青年们！各资本主义国家，知道中国民族运动之发展，对于他们自己的运动有极大的危险，他们已采用平常对付印度、埃及、非洲等弱小民族和他们在本国对付被压迫阶级反抗运动的手段——大屠杀——来对付国犹未亡的中国民众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学生群众的奋勇，尤使他们畏惧。日本帝国主义者，无端枪杀工人顾正红，并指使他们手下的军阀，屠杀青岛工人。英、美各帝国主义者，竟敢在中国领土——上海、汉口——前后枪杀上海、汉口工人、学生和商民。他们这种杀人之罪，还要推在示威群众的肩上，且妄加市民以排外、赤化、亲俄等罪名(?)借以绝灭民族自觉的精神，蒙[蒙]昧世界的舆论。请看帝国主义这种兽性的淫威，何等凶恶野蛮呵！

我们要知道，上海、汉口市民的举动和被惨杀的事实，是帝国主义历年压迫中国国民所激起的反抗爆发之表现。外人证[说]我们为排外，我们确是要排外。但是我们所要排诉[斥]的外国人是专以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压迫欺骗中国人民和他们本国工人阶级的外国人。我们对于这种外国人——帝国主义者——不独只以我们的力量去攻击，并且还要联络他们本国的无产阶级共同推翻他们的统治地位。外人证[说]我们为赤化，

我们也确是要赤化。因为我们要达到真正的平等自由，就只有赤色的流血革命，方可以成功。外人说中国工人学生亲善苏俄，我们也承认确有与苏俄联络之必要。因为苏俄既是平等待我，而且同样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们自应与之接近以结成御防敌人的统一战线，这是自然无足怪异的事情。我们要与苏俄接近，以抵御他们的侵略，与他们联络一致屠杀我们的政策是无两样的。我们希望自己为争自由的革命运动能早赤化，我们应更希望与苏俄能结一友谊互助的统一战线，来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屠杀，以图早日达到自由幸福的胜利。

全国青年工人、农人、学生、兵士及一切被压迫的青年们！你们要知道中国民族为求得真正独立与自由，就只有脱离帝国主义的一切压迫；收回租界及关税和领事裁判权，取消一切不平等待遇的条件。上海、汉口这回大屠杀，就是我们争自由独立的第一幕，在中国民族革命历史上有极重大的意义。但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并非上海、汉口单独的特别需要，亦非仅以上海、汉口的民众力量，可以收到成效的。我们要知道，帝国主义势力所侵入之各省区乡镇的人民，与〔无〕不受尽他们政治经济上的侵略和压迫。他们还要用伪善的基督教义，来达到思想上奴隶中国青年界的目的。这种文化侵略的阴谋，最近一年以来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利用国内军阀的势力来侵扰刮削民众，使中国经济生产、文化程度，永远不能提高，一般青年失掉求学机会。中国人民如犹不早自觉悟，将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屠杀，定必愈加激烈而凶恶，因此中国青年界的职任，应极力将这次反对上海、汉口屠杀运动，变成全国民众长期与帝国主义斗争的运动。

你们——尤以学生青年——应将这次上海、汉口惨杀的经过情形，向一班被压迫的青年群众说明，使他们深知帝国主义之凶恶可怕！尤须注意各社会阶级民众力量的团结，务期达到以全国民众力量去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统治势力的目的。要知道我们与帝国主义的斗争，绝对没有调和妥协之余地。只有我们屈服他们，或是我们被他们所屈服的两条路。但是我们相信他们终久总是要被我们全世界被压迫者的联合所屈服的。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号召全国被压迫青年群众，准备这次长期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斗争。并通知全世界共产主义青年团，作一致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希望全国民众注意自己力量的团结，绝不要畏怖〔怖〕妥协一味倚赖政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的外交去解决，并希望防避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造谣诬蔑和阴谋以离间我们的民众力量。

全国青年工人、农人、学生、兵士及一切被压迫青年们！这次上海、汉口先烈的血，决不是虚流的，他将引导我们达到解放的目的。我们绝不是用投江自尽等方法，可以了事的，我们应当加倍努力“趁热打铁”，以继死者未竟之志！

全世界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

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民族革命万岁！

世界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中国青年》第81期，1925年6月23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反抗帝国主义 屠杀中国市民告全世界青年工人

全世界青年工友们！

在最近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市民中，我们青年工人也受了同样的惨害，帝国主义对于青年工人的压迫，中国较其他各国更为厉害。每天工作时间总在十二点到十四点以上，而所得的工资，比劣等成年工人的工资还要低。帝国主义者不给我们青年工人以受教育的机会，使我们永久变成他的奴隶，任其自由压迫。

我们中国青年工人，现在也渐觉悟起来了，已认识那班压迫我们的外国人是我们的永远的仇敌。我们以后当努力于争自由独立而斗争，无论帝国主义者怎样凶恶的屠杀，我们不达到自由独立的目的，决不停止我们的奋斗。

全世界青年工友们！我们已经开始向最残酷的敌人战斗了，自己经验和力量非常单薄，希望你们——兄弟们——处处给我们一些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并望你们也努力向你们就近的敌人进攻，以图从速消灭我们共同的敌人！

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全世界青年工人联合万岁！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中国青年》第81期，1925年6月23日)

为反帝国主义浩大战斗与 赤化问题檄告国民

民族主义的战争，是促成国际资本主义崩坏的一个必然阶段，反帝国主义的被压迫民族之奋斗，是世界革命的一件必具原素。世界革命已走上大道，所以民族革命的高潮不断的掀动起来。

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现在开始对帝国主义举行总战斗了！

让那般帝国主义者“从殖民地滚开去”——我们于此时要高呼列宁遗留下的口号。

被压迫的国民啊！这一次，上海与青岛的外人屠杀中国工人学生商人事件，是最老辣的英国帝国主义，与最离近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由经济侵略政策，进而为压迫屠杀政策的公开行使。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劳动阶级；攫犯其怒而遭惨祸的，是革命的学生群众；受疾〔嫉〕恨而波及的，是商业阶级；但在立时的行动上，帝国主义者进攻的总射击目标，则是整个的中华民族。战斗啊！为整个民族主义的战斗，我们立刻在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旗帜之下行动起来！

这个行动是革命的——为民族主义的战斗，为反帝国主义而采取的民族革命行动。这个行动不能脱离世界革命而存在，即不能脱离国际劳动阶级共同利害而存在。国际劳动阶级革命之前途，没有退缩，没有妥协，不是灰色，更不是黄色白色。革命

都是赤色啊!

反对外人侵略的爱国国民!“赤化”有什么可怕呢?

在中国宣传“赤化”的不是别人,都是外国帝国主义者自己所做的事。把我们压迫,逼起我们反抗,把我们屠杀,逼起我们复仇。他们说,这是“赤化”了,我们说,为生存,为人道,我们只有“赤化”的反抗,才能免去“白色”的恐怖对我们之屠杀!赤化的原动力与高等煽动员,不是别人,就是上海青岛的日本资本家,与上海北京的英日领事、公使和巡捕。当此帝国主义统治之时,“赤化”、“暴动”、“共产党煽动”几个名词,成为帝国主义的屠杀动员令;然而在这个恐吓的词调之下,帝国主义者自己先就浑身发抖。俄罗斯的赤化(布尔塞维克主义),便是由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与俄皇专制而产生,中国民众之赤化(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斗),便是由布尔塞维克主义十月革命而产生,经过帝国主义者提出“赤化”、“暴动”、“共产党煽动”而切实实行。布尔塞维克主义包括世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革命,与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帝国主义之斗争。赤化是从残暴的资本主义坟墓里反映出来的革命之光,与白色帝国主义侵略屠杀恐怖里含苞的自由之花——免不掉,除不去,躲避不可能,也不必遁辞解释。站在民族革命前线的战士们,你们不要为帝国主义谰言所愚,堕其计中,松懈了队伍,你们要扎紧阵脚,愤〔奋〕勇直前!

战斗民众啊!记着布尔塞维克主义创始者列宁的话,不要受别人表面恐骇而背地狞笑的奸计,我们要勇敢的站起来,以全副精力战斗,而做到将外人在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租界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关税管理权,驻兵与航行权,资本的进攻,宗教的传

播,文化的侵略——“从殖民地滚开去!”

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斗之胜利万岁!

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之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北京区执行委员会

(《政治生活》第42期,1925年6月10日)

为海员工会济安会被控告上海工人

工人们!

前几天上海总工会发出宣言,大致说上海工人罢工已经两个半月,现在提出最低要求九条,愿意和英日帝国主义开始谈判了。

无论那一个中国人,甚至于随便一个外国人,只要不是把工人当奴隶看待的,都要赞成你们工会提出的条件;这些条件实在是工人所最必需的要求——工人要组织团体,工人要活命,这是应有的权利。

世界各国工人都有这样的权利。总工会的宣言里,并没有加入民族的政治的要求,譬如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因为我们达到这种目的的方法,不仅是罢工而已,上工之后,一样要继续奋斗。总工会宣言的目的,便是表明我们上海工人愿意开始上工的谈判。帝国主义者一直到现在对于工人的宣言,都置之不理。可是这次的宣言,他们不但不理,反而想出恶辣的手段来对付我们。码头工人发钱的那一天,他们雇了几百个流氓,教他们捣乱

海员工会和济安会。他们是想捣毁工会，抢掉工人的生活维持费，反过来再说工会骚乱秩序，他们的计划真在〔是〕狠毒极了！

帝国主义者竟用这种土匪式的手段来压迫我们了；因为他们连工人这种最低条件都不肯接受，社会一般的舆论都赞成我们，各国的工人都快要来帮我们的忙，所以急急于捣乱。

工人们！帝国主义者真正无耻到极点了。我们不要上他们的当。现在我们特别拥护工会。在上海的奉系军阀很踊跃的封闭工商学联合会、海员工会、洋务工会，干涉电车工会，对于帝国主义者所雇用的流氓却不敢干涉，放任他们捣毁爱国团体，而不出来维持；这种军阀决不是来上海保护中国人的，而是来帮外国人压迫民族运动的。我们应当要求撤退奉军，我们工人要自己组织工人保卫团，保护我们的工会。

工人们！坚持罢工，一定要达到工会所提出的要求。大家拥护工会，严守纪律，不相扰乱，不让帝国主义者有隙可乘，无论他们用什么卑鄙无耻的办法，都不能破坏我们的工会。

推翻帝国主义者的强盗！

上海工人的奋斗万岁！

推翻捣乱工会的卖国贼！

工会万岁！

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

(《向导周报》第125期,1925年8月18日)

第 二 部 分

从二月罢工到五卅运动的爆发

壹、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二月大罢工

一、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的惨痛生活；中国 共产党教育和组织纱厂工人的活动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对华 经济侵略加剧的几个统计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帝国主义对华输出商品比较表^① 单位：海关两

年代 \ 国别	英 国	美 国 ^②	日 本 ^③	法 国	总 计
1913年	96,910,944	35,427,198	119,346,662	5,299,517	256,984,321
1919年	64,292,239	110,236,706	246,940,997	3,375,809	424,845,751
1920年	131,719,952	143,198,962	229,135,866	4,878,519	508,933,299
1921年	149,935,615	175,789,652	210,359,237	9,639,138	545,723,642
1922年	145,292,550	169,004,534	231,428,885	4,555,510	550,281,479
1923年	120,397,229	154,447,651	211,024,297	7,548,654	493,417,831
1924年	126,011,025	190,956,942	234,761,863	10,560,018	562,289,848

① 根据1913年、1919年至1924年《海关华洋贸易总册》编制。

② 包括檀香山。

③ 包括当时被日本霸占的我国领土台湾。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帝国主义由华输入原料及其他货品比较表①

单位: 海关两

年 代 \ 国 别	英 国	美 国②	日 本③	法 国	总 计
1913年	16,346,413	37,650,301	65,544,186	40,749,782	160,290,682
1919年	57,186,242	101,118,677	195,006,032	34,285,989	387,596,940
1920年	45,804,536	67,111,451	141,927,902	21,016,444	275,860,333
1921年	30,913,956	89,541,816	172,110,728	23,945,151	316,511,651
1922年	38,507,874	97,579,046	159,754,351	40,755,834	336,597,105
1923年	43,207,130	126,803,772	198,517,346	39,577,659	408,105,907
1924年	50,250,851	100,754,411	201,175,926	45,096,158	397,277,346

① 根据1913年、1919年至1924年《海关华洋贸易总册》编制。

② 包括檀香山。

③ 包括当时被日本霸占的我国领土台湾。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华日商纱厂机器设备扩充表①

年 份	纱 锭(枚)	布 机(台)
1913	111,936	886
1919	332,922	1,486
1922	621,828	2,986
1924	932,728	3,929
1925	1,268,176	7,205

① 摘录严中平著《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9月版)第177页所载日商纱厂之机器设备有关部分。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五年全国中外纱厂、锭比较表①

年 份		1919	1920	1921	1922	1924	1925②	
共	厂数	实数	45	97	109	113	122	118
		百分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计	锭数	实数	1,468,142	2,832,920	3,261,060	3,610,720	3,645,226	3,572,440
		百分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华	厂数	实数	29	63	73	76	76	69
		百分比	64.5%	64.9%	67%	67.3%	62.3%	58.5%
厂	锭数	实数	889,032	1,774,974	2,134,854	2,272,098	2,176,166	2,034,816
		百分比	60.5%	62.7%	65.5%	62.9%	60%	57%
日	厂数	实数	11	29	31	32	41	45
		百分比	24.4%	29.9%	28.4%	28.3%	33.6%	38.1%
厂	锭数	实数	332,922	801,662	866,920	1,080,756	1,218,544	1,332,304
		百分比	22.7%	28.2%	26.6%	29.9%	33%	37.3%
英	厂数	实数	5	5	5	5	5	4
		百分比	11.1%	5.2%	4.6%	4.4%	4.1%	3.4%
厂	锭数	实数	246,188	256,284	259,286	257,866	250,516	205,320
		百分比	16.8%	9.1%	7.9%	7.2%	7%	5.7%

① 摘录上海市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筹备会《中国棉纺统计史料》(1950年整理出版)第1页《全国纱厂锭设备历年统计表》有关部分。1923年资料缺。

② 据严中平著《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00—201页载,一九二五年全国中外纱厂锭总数为3,339,728枚,其中华厂1,866,232枚,占55.9%;日厂1,268,176枚,占38%;英厂(包括美资)205,320枚,占6.1%。又由于当时华厂有的系中外合资;有的已归外商接管;有的因积欠外商债务,其营业已直接为外商攫取利润服务。著者认为这些为外资侵占的华商纱厂应列为外资势力,按此原则,对中外纱锭数进一步修正如下:华厂1,469,828枚,占44%;日厂1,514,174枚,占45.3%;英厂355,726枚,占10.7%。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五年上海市中外纱厂、
 纱锭及布机比较表①

年 份	1919	1920	1921	1922	1924	1925	
共 计	纱厂数	26	48	52	51	59	58
	百分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纱锭(枚)	923,474	1,655,718	1,695,448	1,781,168	1,897,494	1,918,106
	百分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附设布机厂数	14	16	19	31	37	37
	百分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布机(台)	6,339	7,829	10,419	12,909	14,857	13,774
	百分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华 厂	纱厂数	11	21	23	24	26	22
	百分比	42.3%	43.7%	44.2%	47.1%	44.1%	37.9%
	纱锭(枚)	364,364	647,772	742,786	803,746	815,794	714,614
	百分比	39.4%	39.1%	43.8%	45.1%	42.9%	37.2%
	附设布机厂数	5	8	9	11	11	10
	百分比	35.7%	50%	47.4%	35.5%	29.7%	27%
	布机(台)	2,000	3,690	4,840	6,140	6,576	5,590
	百分比	31.6%	47%	46.5%	47.6%	44.2%	40.6%
日 厂	纱厂数	10	22	24	22	28	32
	百分比	38.5%	45.9%	46.2%	43.1%	47.5%	55.2%
	纱锭(枚)	312,922	751,662	693,376	719,556	831,184	998,172
	百分比	33.9%	45.2%	40.9%	40.4%	43.8%	52%
	附设布机厂数	4	3	5	15	21	23
	百分比	28.6%	18.7%	26.3%	48.3%	56.7%	62.7%
	布机(台)	1,986	1,486	2,986	3,969	5,421	5,836
	百分比	31.3%	19%	28.6%	30.7%	36.5%	42.3%
英 厂	纱厂数	5	5	5	5	5	4
	百分比	19.2%	10.4%	9.6%	9.8%	8.4%	6.9%
	纱锭(枚)	246,188	256,284	259,286	257,866	250,516	205,320
	百分比	26.7%	15.7%	15.3%	14.5%	13.3%	10.8%
	附设布机厂数	5	5	5	5	5	4
	百分比	35.7%	31.3%	26.3%	16.2%	13.6%	10.9%
	布机(台)	2,353	2,653	2,593	2,800	2,860	2,348
	百分比	37.1%	34%	24.9%	21.7%	19.3%	17.1%

① 摘录上海市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筹备会《中国棉纺统计史料》(1950年整理出版)第86—87页《上海市纱厂纱锭及布机设备历年统计表》有关部分。1923年资料缺。

一九二五年全国华商、日商、英商纱厂一览表①

一、华商纱厂

厂名	厂址	*常务董事 **总经理	资 金	锭②		布		机	工 人	注 *开办年代
				已 开	未 开	已 开	未 开			
恒丰纺织新局	上海杨树浦 华盛路	*聂云台 **聂瀚生	1,080,000两	44,400		614			3,046	*1890
振华纱厂	上海杨树浦 兰路	*席聚星 **薛文泰	300,000两	13,548					760	*1907
同昌纱厂	上海南市机 厂街	**沈明贤	335,000两	11,592					760	*1908③
申新第一纱厂 ④	上海陈家渡 白利南路	**荣宗敬	3,000,000元	39,752		1,100			4,000	*1916
申新第二纱厂 ⑤	上海宜昌路	**荣宗敬	1,000,000元	34,934					2,000	*1907

① 根据《中国经济月刊》(The Chinese Economic Monthly)1926年1月号第71—88页所载一九二五年全国华商、日商、美商纱厂统计编制。

② 据上海市棉纺织业同业公会筹备会编《中国棉纺织统计史料》(1950年版)第26页一九二五年全国纱厂概况统计表，纱锭数包括线锭数。

③ 原为1879年，据严中平著《中国棉纺织史稿》第350页，改为1908年。

④ 据同上书第198页，申新第一纱厂负欠日商债款。

⑤ 据同上书第349页，申新第二纱厂原为恒昌源纱厂，1917年售与申新。又据同书198页，该厂亦负欠日商债款。

续表

厂名	厂址	*常务董事 **总经理	资 金	纱		锭		布 机		工 人	备 注 *开办年代
				已 开	未 开	未 开	已 开	未 开			
申新第五纱厂 (前德大纱厂)	上海华德路 高郎桥堍	**荣宗敬		26,508						1,441	德大开办于 1914年。1925 年售与申新
鸿裕纱厂	上海麦根路	*郭鸿辉 **郑培之	1,800,000两	43,900 ①			240②			3,400	*1916
鸿章纱厂	上海麦根路	*郭鸿辉 **郑培之	1,500,000两	20,736			416			1,968	*1921
厚生纱厂	上海杨树浦 西湖路	*薛宝润 **李迪先	2,000,000两	57,744	4,032		620			2,743	*1918
溥益纱厂第一 厂	上海西苏州 路	**徐静仁	1,000,000两	26,520	1,600					1,400	*1918
溥益纱厂第二 厂	上海劳勃生 路	**徐静仁	1,000,000两	24,000				500		1,200	*1924
统益纱厂	上海莫干山 路	*胡耀庭 **吴麟书	1,500,000两	52,552						3,000	*1920
华丰纱厂③	上海吴淞蕴 藻浜	*王儒堂 **崔景三	2,000,000两	25,600						1,146	*1921
纬通纱厂	上海杨树浦 平凉路	**陈玉亭	1,200,000元	23,808			200			1,600	*1921

恒大纱厂	上海浦东杨思桥	* 许秋帆 ** 陈子母	1,000,000元	15,552				970	*1921
振泰纱厂	上海曹家渡西首	* 余葆三 ** 王启宇	800,000两	24,420	2,800			1,110	*1921
永豫纱厂	上海小沙渡西北	** 潘树塘	400,000两	12,000				630	*1921
三新纺织工厂	上海杨树浦	* 盛泽承 ** 盛玉麟	4,500,000两	69,880		1,000		4,887	*1922
崇信纱厂	上海谈家渡浜北	* 邵声涛 ** 董仲生	1,500,000两	34,000				2,300	*1921④
大丰庆记纱厂	上海潭子湾苏州河边	* 徐庆云	1,500,000元	20,736		200		1,740	*1923
永安纱厂第一厂	上海杨树浦引翔港	* 郭乐 ** 郭顺	6,000,000元	39,000		700		2,200	*1924
永安纱厂第二厂(前大中华纱厂)	上海吴淞蕴藻浜	* 郭乐 ** 郭顺		45,000				2,633	大中华开办于1921年。1925年售与永安

①② 原为已开纱锭数38,400,已开布机数5,500,未开布机数240。据上海市棉纺织业同业公会筹备会编《中国棉纺织统计史料》(1950年版)第26页一九二五年全国纱厂概况统计表,鸿裕纱厂已开纱锭数38,400,已开线锭数5,500,已开布机数240。二者相较,前者已开布机数偏高,似为已开线锭数之误。故据后者改为已开纱锭数43,900(包括线锭),已开布机数240。

③ 据严中平著《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98页,华丰纱厂负欠日商债款。

④ 原为1922年,据同上书第358页改为1921年,该厂系中美合资。

续表

厂名	厂址	*常务 **总经理	资 金	纱		锭		布		机	工 人	注 *开办年代
				已 开	未 开	未 开	已 开	未 开				
大生第一纱厂	南通唐闸	**张啬庵	2,500,000两	77,380			720				5,000	*1899
大生副厂(永丰公司租办)	南通南门外江家桥	*王伯棠 **戴西仲		15,000							1,500	*1924
大生第二织厂 ^①	崇明久隆镇	**张啬庵	1,200,000两	29,000	6,000			200			2,000	*1907
大生第三纱厂	海门长乐镇	*张退庵 **费善本	2,400,000两	34,340			422				2,500	*1921
大通纱厂	崇明南堡镇	*朱吟江 **姚锡舟	800,000元	10,800							690	*1922
久安纱厂	南通四安市		800,000元	5,440	5,000							*新建
业勤纱厂	无锡东门外兴隆桥	*杨伯庚 **张趾卿	200,000元	13,832							1,200	*1895
振新纺纱厂	无锡西门外	*荣华生 **戴鹿岑	1,000,000元	30,000							2,650	*1906
广勤纱厂	无锡广勤路	*周辑之 **杨翰西	1,000,000元	19,968			52				1,880	*1917

庆丰纱厂	无锡北门外 周三浜	*薛翼云 **唐滋镇	1,000,000元	16,000	2,000②	200	100	3,310	*1921
豫康纱厂	无锡梨花庄	*薛南溟 **杨冠华	1,000,000元	16,000				1,400	*1921
申新第三纱厂	无锡西门外	**荣宗敬	2,000,000元	43,000	8,000	450	50	4,000	*1921
苏纶纱厂(洽 记公司租办)	苏州盘门外			22,568				1,450	*1896,1925 年租与洽记
源记纱厂 (前裕泰纱厂)	常熟支塘			12,740					*1906
太仓纱厂(公 泰公司租办)	太仓沙溪乡	**刘聚卿		22,700					*1906,1925 年租与公泰
利用纱厂	江阴北门外 阡西保	*薛醴泉 **钱以湘	720,000两	15,000					*1896
常州纱厂(申 新第六纱厂租 办)	常州小南门 外	**荣宗敬		14,200	4,000				*1921,1925 年租与申新 第六纱厂
大纶久记纱厂	常州大南门 外	*顾吉生 **杨学贲	1,000,000元	10,000		260			大纶开办于 1921年。1925 年售与久记
广新纺织厂	常州东门外	**戈蓬生	240,000元	5,600					*1885

① 据严中平著《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98页，大生第二织厂负欠汇丰银行债款。

② 上海市棉纺织业同业公会筹备会编《中国棉纺织统计史料》(1950年版)第27页一九二五年全国纱厂概况统计表，庆丰纱厂未开纱锭数为2,400。

续表

厂名	厂址	*常务 **总 *理	资 金	纱		锭		布		机 未 开	工 人	注 备 *开 办 年 代
				已 开	未 开	未 开	已 开	已 开	未 开			
华新纺织津厂 ①	天津河北小 于庄	*杨树枏 **林志熙	2,700,000元	27,000							2,156	*1918
华新纺织唐厂	河北滦县唐 山镇	*王小汀 **周叔弢	2,200,000元	24,300							2,000	*1922
裕元纱厂②	天津小刘庄	*王景杭 **倪幼丹	7,200,000元	39,800	40,200		800		200		3,840	*1918
恒源纱厂	天津河北西 窑洼	*宋文干 **田韞山	4,000,000元	31,400	840		310				3,100	*1920
北洋商业第一 纱厂	天津海河挂 甲寺	*曹秉权 **范竹斋	2,000,000元	25,000							1,700	*1921
裕大纱厂③	天津大直沽 下老盐坨地	*冯幼伟 **陈淮生	3,000,000元	30,000	5,000							*1921
宝成第三纱厂 ④	天津盐坨地	**刘伯森	3,000,000元	26,000⑤							1,700	*1921
大兴纱厂	石家庄	*毛树棠 **徐荣廷	2,100,000两	24,768			292				2,300	*1922
楚安纱厂(前 湖北纺织官局)	武昌文昌门 外			90,000			700				5,100	*1903

汉口第一第二纺织厂⑥	武昌胜门外曾家巷	*毛树棠 **李锦章	一厂 3,000,000元 二厂 1,200,000元	90,400		800	400	8,000	*1919
裕华纱厂	武昌胜门外上新河	*徐荣廷 **张松樵	1,560,000两	41,000		500		3,770	*1922
震寰纱厂	武昌胜门外	*刘子敬 **刘李五	1,200,000两	20,736	4,000		250	1,500	*1921
申新第四纱厂⑦	汉口宗关	**荣宗敬	5,000,000两	15,000				1,200	*1921
广益纱厂	河南安阳县车站	*顾桂生 **袁毓英	1,500,000元	28,000	10,000			1,800	*1909
豫丰纱厂⑧	河南郑县城外襄府寨	*薛宝润 **穆藕初	2,000,000两	34,560	17,280	200		4,200	*1920
成兴纱厂	河南武陟县木栾店	*鲁连城 **鲁联卿	200,000元	5,040	1,740			470	*1919

① 据严中平著《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97页，华新纺织津厂负欠日商债款。

② 据同上书第197页，天津裕元负欠日商债款。

③ 据同上书第197页，天津裕大负欠日商债款。

④ 据同上书第198页，宝成第三纱厂因无力偿还借款，1923年被慎昌洋行接管。

⑤ 上海市棉纺织业同业公会筹备会编《中国棉纺织统计史料》(1950年版)第27页一九二五年全国纱厂概况统计表，宝成第三纱厂已开纱锭数为26,002。

⑥ 据严中平著《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97页，汉口第一纱厂负欠沙逊、安利洋行债款。

⑦ 据同上书第198页，申新第四纱厂负欠日商债款。

⑧ 据同上书第197页，豫丰纱厂因无力偿还借款，1923年被慎昌洋行接管。

续表

厂名	厂址	*常务董事 **总经理	资 金	纱		锭		布		机	工 人	备 注 *开办年代
				已 开	未 开	未 开	已 开	已 开	未 开			
华新纺织卫厂	河南卫辉	*周缉之 **吴伯生	2,800,000元	22,400							2,000	*1922
鼎新纺织厂	杭州拱宸桥	**高懿臣	400,000元	12,000			125	250			1,200	1897
和丰纺织第一 第二厂	浙江鄞县江 东冰厂跟	*戴瑞卿 **钱中卿	一厂 900,000元 二厂 600,000元	23,200							2,500	*1907
通惠纺织局	浙江萧山东 门外	**俞丹屏	450,000元	10,920		3,640					738	*1899
鲁丰纱厂①	济南城北林 家桥	**潘馨航	2,200,000元	26,000							2,400	*1916
华新纺织青厂	即墨县沧口	*周缉之 **周志俊	2,700,000元	32,800							3,000	*1920
晋华纺织厂	山西榆次县 北关	*徐一清 **曲佩环	1,500,000元	9,600②		3,200					912	*1924

新集纱厂 (前利生纱厂)	河北宝坻县 新集镇	**吴崧乔	150,000元	1,080	12,400			110	
裕中第一纱厂	安徽芜湖陶 沟	*李伯行 **汪仰韩	1,000,000元	15,200				1,200	*1919
湖南第一纱厂 (华实公司租 办)	长沙银盆岭	*黄藻奇 **	600,000元	40,000				2,380	*1920
奉天纺纱厂	奉天十间房 后身	**孙祖昌	4,500,000元 (奉币)	21,368		200		1,781	*1923
久兴纱厂	九江官牌夹	*张松涛 **陶星如	1,000,000两		15,360		300		*新建

① 据严中平著《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97页，鲁丰纱厂负欠日商债款。

② 原为900，加上未开纱锭3,200，其纱锭总数为4,100。据上海棉纺织业同业公会筹备会编《中国棉纺统计史料》(1950年版)第27页一九二五年全国纱厂概况统计表，已开纱锭数9,600，未开纱锭数3,200，合计纱锭总数为12,800。参考《中国棉纺统计史料》第25页、第29页，晋华纱厂1924年纱锭总数为12,800，1927年纱锭总数为13,600。几者相较，原纱锭总数为4,100有误，故据《中国棉纺统计史料》改为9,600。

二、日商纱厂

厂名	厂址	所属会社	资 金	锭		布		工人①	注 备 *开办年代
				已 开	未 开	已 开	未 开		
上海纱厂 第一、二、三、四厂	上海杨树浦	上海纺织 会社	5,000,000两	96,424		1,869		9,048	*一厂1895 二厂1896 三厂1916
日华纱厂 第一、二、三、四厂	二厂上海 浦东 四厂上海 三、海 海、劳勃生 路	日华纺织 会社	8,800,000日元	107,808 ②		500③		6,434	*一厂1877 二厂1918 三厂1918 四厂1921
喜和纱厂 (前华商宝成 纱厂第一、二、三厂)	上海劳勃生 路	日华纺织 会社		107,776				6,800	宝成纱厂开 办于1921年, 1924年售与日 商,改名喜和
内外棉纱厂 第三、四、五、 (东、西)、七、八、 九、十、十一、十二、 十三、十四、十五厂	四厂上海 西路 三厂苏州路 五厂(东、西) 七、八、上海 九厂上海 十厂澳门路 十一厂上海 十二厂上海 十三厂根 路 十四厂上海 十五厂上海 戈登路	内外棉 纺织会社	10,500,000日元	291,428 ④		1,600⑤		17,189 ⑥	*三厂1911 四厂1913 五(东、西) 厂1915 七、八、十二 厂1919 九厂1908 十三厂1921 十四厂1922 十五厂1922
东华纱厂 第一、二、三厂	上海华德路	东华纺织 会社	6,000,000日元	45,440				2,914	*1921

同兴纱厂 第一、二厂	上海戈登路 上海杨树浦	同兴纺织 会社	6,000,000日元	89,360		952	4,000⑦	*1921
公大纱厂	上海平凉路	上海制造 绢丝公司	400,000两	49,972			2,000⑧	*1921
公茂纱厂 (前英商老公 茂纱厂)	上海杨树浦	上海制造 绢丝公司		45,516		515	2,500	老公茂开办 于1895年。 1925年售与 日商

- ① 本栏所录青岛日商纱厂工人数之前有▲符号者，是根据宇高宁著《支那劳动问题》第112页所载数字增补的。
- ② 原为215,616，据上海市棉纺织业同业公会筹备会编《中国棉纺织统计史料》(1950年版)第23页、26页、28页，日华纱厂1924年、1925年、1927年纱锭总数均为107,808，故改如上数。
- ③ 原为1,000，据同上书第23页、26页、28页，日华纱厂1924年、1925年、1927年布机数均为500，故改如上数。
- ④ 原为312,218，据同上书第23页、26页、28页，内外棉纱厂1924年、1925年、1927年纱锭总数分别为261,984、291,428、294,316，几者相较，原数偏高，改为291,428。
- ⑤ 原为未开布机数，据同上书第26页一九二五年全国纱厂概况统计表改为已开布机数。
- ⑥ 原为19,289，据同上书第23页、26页、28页，内外棉纱厂工人1924年、1925年、1927年，工人数分别为14,419、17,189、14,383，几者相较，原数偏高，改为17,189。
- ⑦ 原为2,240，据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编《我国纺织业罢工事件与五卅事件以及各地的动荡》第一辑第248页沪西方面日本人经营纺织工厂职工在籍人员及锭数一览表，仅在沪西的同兴一厂即有工人1,880人。参照上海市棉纺织业同业公会筹备会编《中国棉纺织统计史料》(1950年版)第28页一九二七年全国纱厂概况统计表，同兴第一、二厂工人合计为4,750。原数偏低，改为4,000。
- ⑧ 原为726，据上海市棉纺织业同业公会筹备会编《中国棉纺织统计史料》(1950年版)第26页一九二五年全国纱厂概况统计表注④，改为2,000。

续表

厂名	厂址	所属会社	资金	锭		布		机	工人	备注 *开办年代
				已开	未开	已开	未开			
大康纱厂 第一、二厂	上海腾越路	大日本 纺织会社	5,000,000日元	58,080					4,000 ①	*一厂1922 二厂1923
丰田纱厂 第一、二厂	上海极司非 尔路	丰田纺织 会社	5,000,000日元	60,768		400			3,450	*1921
裕丰纱厂	上海杨树浦 路	东洋纺织 会社	31,850,000日元	45,600					2,687	*1921
内外棉纱厂第 六、十、十一厂	青岛四方	内外棉 纺织会社		63,200					▲4,500	*1916
日清纱厂	青岛四方	日清纺织 会社		20,600					▲1,400	*1921 一名隆兴纱厂
大康纱厂 第二、二厂	青岛四方	大日本 纺织会社	3,000,000日元	58,000					▲2,500	*1921
富士纱厂	青岛沧口	富士纺织 会社	27,950,000日元	31,360					2,200	*1921
钟渊纱厂	青岛沧口	钟渊纺织 会社		42,240	384	865			▲2,800	*1921
长崎纱厂	青岛沧口	长崎纺织 会社		19,988					▲1,500	*1921 一名宝来纱厂

泰安纱厂	汉口太平路	泰安纺织公司	20,336	5,000	300	*1924
满洲纱厂	奉天辽阳	满洲纺织会社	31,360		504	*1924
内外棉金州分厂	奉天金州	内外棉纺织会社	24,000			*1924
福纺纱厂	大连周水子	满洲福纺会社	17,664			*1912

① 原为 1,500,据上海市棉纺织业同业公会筹备会编《中国棉纺统计史料》(1950年版)第26页一九二五年全国纱厂概况统计表注⑥,改为 4,000。

三、英商纱厂

厂名	厂址	**总经理	资 金	锭		布		机	工 人	注 备 *开办年代
				已 开	未 开	已 开	未 开			
怡和纱厂 二厂 怡和 三厂 杨树浦 三厂 公益	上海杨树浦	**怡和洋行 (Jardine, Matheson & Co.)	5,400,000两	153,320		1,900			13,000	*怡和 1896 杨树浦 1907 公益 1914
东方纱厂	上海杨树浦	**安利洋行 (Arnold & Co.)	1,450,000两	52,000		448			3,500	*1897

(二) 上海日商纱厂工人遭受的残酷压迫和剥削

1. 前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的控诉^①

一、残酷压迫

(一) 经常遭到打和骂

日本厂主歧视中国工人，把中国工人看成供其任意奴役的牛马。他们经常骂工人是“贱种”，是“亡国奴”。老工人周高升亲耳听到他们骂工人说：“在上海找一百条狗难，找一百个工人很容易。”

殴打工人是日本厂主和管理人员的常事。退休工人陈翠珍四十多年前进内外棉五厂摇纱间做工，那时她只有十二岁，和其他工人一样，经常吃日本领班和中国工头的“火腿”^②或“毛栗子”^③。在她十五岁那年，有个星期天，轮到她做加班，头天晚上六点进厂，直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才放工，整整做了十八个小时。放工前数小时，陈翠珍又饿又累，头晕眼花，有时纱头断了，

① 根据中共上海第二棉纺织厂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七月举办的“回忆对比展览会”材料，由我所向有关老工人访问、核对，作了一些调整、补充，编写而成。工人所受压迫剥削的分类，仍保持展览会原样，未加改动。该厂是一个具有六十多年历史的老厂，其前身为日商内外棉东五、西五、七、八、十二厂。该厂工人所受压迫是有代表性的。

②③ 日本领班和中国工头用脚踢工人，称为请吃“火腿”，以指骨击头，则称为请吃“毛栗子”。

她也接不上。正在这时，日本领班来查生活，从她摇下的纱绞中查出了一绞小纱^①，立即告诉监工的东洋婆子。东洋婆子抓住陈翠珍，狠命地打耳光，这还不算，又把陈翠珍的辫子一把拉过去，绕在摇纱车上，再加一顿拳打脚踢，直到她手打痛了，脚踢累了，才把陈翠珍放下来。这时陈翠珍已被打得全身青肿，不能走动。由小姊妹搀着回到家里，从此一病半月，而厂里却因此把她开除了。

日本领班还儿戏人命，借以取乐。有一次，内外棉七厂工人陆福根正在刷机器油线，不料日本领班田山走到他背后，无缘无故地猛踢一脚。陆福根未及提防，倒在机器上，立刻脖子上的肉被轧去一大块，鲜血满地。但是田山却若无其事，看也不看一眼，洋洋自得地阔步而去。日本领班不但不给医药费，而且以其可能残废为理由，竟把陆开除出厂。

象这样惨遭日本厂主及其走狗毒打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据一九五九年厂里召开的一次退休工人座谈会上的即席统计，到会的八十位老工人中，就有七十四人遭到过日本资本家和工头的殴打，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二以上。

(二) 出厂要抄身

日本厂主蓄意蔑视工人的人格，实行恶毒的抄身制。他们在厂门两旁，装了弯弯曲曲只容一个人通过的木栅栏。放工时，男女工人分两边由这里一个一个地走出去，受抄身婆的搜查，从

^① 一种不合规定长度的纱绞。

头发一直抄到脚跟。出口处站有“垃圾鬼子”^①监视着，还有手执木棍的包打听，准备随时殴打工人。

有一天，抄身婆在细纱间措车工人王登洲身上抄出了一小团油回丝，这团回丝是他匆忙中遗忘在衣袋里的。包打听立时窜上来，打了他两个耳光，又夺去他的工摺，要停他的生意。王登洲声辩说：要是存心偷，为什么偷这一小团没有用的油回丝呢？“垃圾鬼子”看他不服，又上来打了他几巴掌。后来，王登洲在工人弟兄的支持下，向厂里一再交涉，才算没被开除。

女工陶小妹讲到另一件侮辱工人的事。一次，抄身婆抄到一个年轻女工时，说她裤子里藏有东西，其实那是月经带。但抄身婆心怀恶意，硬要她拿出来看。这时排在她后面的陶小妹和其他一些女工非常气愤，鼓励她掼给抄身婆看。那个女工在大家的支持下，一横心把月经带解了出来，陶小妹立即接过去，掷在抄身婆的脸上。第二天，陶小妹和那个女工都被开除了。

(三) 大小便没有自由

据前内外棉七厂老工人周阿大回忆，从一九二二年下半年起，厂里实行了上厕所领牌子的恶毒办法。大便是红牌，小便是白牌。牌子是用竹筹子做的，存在工头处。上厕所必须凭牌子进去。那时厕所门口有专人看管，他的职务是：(1) 检查进厕所是否有牌子，没牌子就不许进去；(2) 检查工人身上是否带有纱头

^① 指看门的日本人。

等物，防备工人“偷”东西（厕所后面有铁栅门，通厂外）；（3）离厕所时发还牌子，借以检查工人大小便时间的长短。

工人为了讨一根牌子进厕所，常常在车间里东奔西跑找工头。有时找不到人，有时找到了人又没有牌子（因为人多牌子少），实在熬不住，只好把尿撒在身上。特别是年龄小的童工，时常发生这种事情。周阿大自己也不止一次尿湿过裤子。

工人对这种制度非常气愤，为此经常和工头争吵，或者磨洋工。到一九二三年，厂主被迫取消了小便领牌子的办法。但大便仍要领牌子，直到一九二五年二月罢工，经过工人的坚决斗争，才被取消。

（四）思想行动受控制

日本资本家最怕工人觉悟起来，团结起来，因此对工人的思想、行动实行严密的控制。

内外棉五厂有个女工名叫金娣，为了工作安全，剪掉辫子，留了短发。谁想第二天被绰号叫耗子的日本领班松下看到后，硬说她是“过激党”，要她说出是由谁指使的。金娣一再否认，并向松下说明原委，但松下全然不理，一口咬定她是“过激党”，并拿小刀向她的脸上刺去。金娣忍无可忍，抓住他伸过来的手咬了一口。第二天，厂里出布告说她“无理滋事，殴打领班”，金娣就被开除了。

日本厂主严防工人团结，规定工人不得在车间内交谈，更不许进出其他车间，即使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夫妻在别的车间工作，也绝对禁止往来。工人郭金桃有一次听到隔壁车间

里东洋人打工人,他出于同情,在那个车间门口望了望,给日本三班看见,即被叫去痛骂一顿,并要停他的生意,后经一再交涉,才改为罚一个星期的工资。

日本厂主为了控制工人思想,还有意搞封建迷信活动,向工人宣传宿命论。每逢阴历七月十五日(俗谓鬼节),厂主请了许多和尚到厂里念经做道场,提倡迷信。有时机器轧死工人,也请和尚到车间念经,欺骗工人说,这是他前生注定,代他超度来生。

日本厂主还禁止工人读书识字。鲁三妹在车间拾起一张包瓜子的旧报纸,随便瞧了瞧,被领班卡米生看见,骂她说:“工人不配识字读书”,还打了她一顿。童工乔贵工拣筒管时,在竹箩里发现一本破烂的淮剧小唱本,拿起来看了看,日本领班跳过来,就是一顿耳光。

(五) 万恶的养成工制

一九二二年,日本厂主实行养成工制度。他们委派一些招工头,到内地乡村去欺骗破产的农民,说什么上海日本纱厂专招一批女孩子做工,生活非常惬意,保管住楼、吃肉、穿绸。农民虽不大相信这些鬼话,但为了求生,也只得横着心把孩子交给他们。内外棉七厂头几批养成工李菊珍、徐二姑娘、刘柏氏等,就是这样被招工头范老大从苏北骗来的。

养成工被招来后,日本厂主利用她们年幼无知、远离父母、人地生疏等弱点,对她们的肉体和精神横加摧残,妄图把她们变成不敢反抗,永供其剥削的奴隶。那时养成工的身上满是被打

的伤痕，往往旧伤未愈，新伤又起。李菊珍脚上生疮，肿得很厉害，但不准请假。她只得忍痛含泪，照旧十二个钟点不停地在车前车后走动工作。刘柏氏害了眼病，东洋婆子怕她传染，令她留在工房里，不许工作，并断了她的饭食。养成工李小二子，就在这种残酷压迫之下，被活活折磨致死。

日本厂主除了极野蛮地摧残养成工外，还严密禁止她们和外界来往，防止她们受到影响而觉醒起来。在“训练”期间，她们被集中在一个车间，由东洋婆子监督劳动，不准老工人和她们接近，更不准她们和老工人交谈。放工以后，她们即被关进“养成宫”里，这是专给她们准备的宿舍，四周高墙，大门常锁，并有“垃圾鬼子”看守。她们进出没有自由，外人更不能进去。在上下工时，也由招工头押送，进行监视。

压迫越厉害，反抗越激烈。一九二五年二月大罢工爆发后，养成工也参加了罢工，对日本资本家展开了英勇斗争。在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运动爆发后，日本厂主被迫暂时放弃了养成工办法。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日本资本家又变本加厉地推行养成工制度。

（六）巡捕、流氓的欺凌

工人在厂里受尽日本人的压迫，出了厂门又受到巡捕、流氓的欺凌。

老工人周阿大曾遭遇过这样一件事情：一天早晨下雨，因家里只有一把伞，他就同妻子孙小妹合撑着去上工。当他们走到同兴纱厂门口时，巡捕房的包打听袁富忠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周

阿大正想闪开，不料袁富忠抬手就打了他两个耳光。周阿大当即责问袁富忠为何打人。那家伙说他们一男一女合打一把伞，是轧饼头。孙小妹气得浑身发抖，申说他们是夫妻。但袁富忠硬是诬赖他们，并把他们押到戈登路(今江宁路)巡捕房，关进拘留室。几个钟头过后，另一个巡捕进来说，如果愿出十元、八元香烟钱，可以代为“说情”，否则别想出去。周阿大没法子，只得把孙小妹昨天刚领到的半个月工资五元钱送给了巡捕，这才放了出来。

当年流氓成群，他们都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爪牙，到处寻事生非，欺压工人。工人走路，他踏你一脚，还说坏了他的鞋子，要你赔鞋子钱；他们打了工人，还要向工人收打人的“手工钱”或“手续费”；过年过节，他们挨户送臭鱼烂肉，说是“送礼”，你得用高出市价几倍的钱去买它。周阿大还遭遇过一件这样的事：有个星期天，他在石灰窑母亲家里碰上流氓吴二拐子收“更钱”^①，因为他问了一声收什么“更钱”，吴二拐子就借机生事，骂他有意装蒜。到下一个星期天即带着一批流氓打手闯上门来，抓住周阿大，把他象打夯一样的直往地上掼，被掼得昏了过去。第二天吴二拐子还威逼周阿大的母亲请人出来“拉场子”，结果在大自鸣钟老人和菜馆办了一桌酒，又替吴二拐子“换季”，从头到脚，全部换上新的行头，才算了事。

至于年轻的女工，更是经常遭受到不能容忍的侮辱和迫害。每当放工，流氓结队在厂门口调戏女工，或者暗中钉梢，到僻静

^① 流氓借口打更巡夜，向居民进行勒索的一种名目。

处肆意进行侮辱。有个叫林宝的女工，就被沪西大流氓、内外棉五厂总管拿摩温吴万章强抢去做了小老婆。更有许多女工，因为威逼不从，惨遭毒打，甚至被推入苏州河中，死于非命。

二、惨重剥削

(一) 工资低

日本资本家到中国来开厂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国的劳动力低廉。据老工人回忆，那时工人的工资，一般是三角钱一天，而进厂不久的工人，则仅有二角左右，有的甚至更少，只有极少数工人才在三角以上。日本厂主还百般限制工人工资的提高，在一些技术要求不高的部门，他们往往借故开除工资较高的熟练工人，以低工资的新工人替代。

工人拿这点微薄的工资，是很难养家活口的。据老工人回忆，当年次等米是十元左右一石（一百五十六斤），工人拚死拚活地劳动，一月所得只有七、八元（四个星期天无工资），还买不到一石米。如按一般工人一家四口人计算，一月的工资，仅够买米，其他生活费用全无着落，甚至把生米煮成熟饭的柴火钱也没有了。工人是怎样生活的呢？老工人张廷扬回答了这个问题。那时他在厂里工作了十二个小时以后，回来还要拉几个钟头的黄包车，这叫拉“车屁股”。逢星期天，就到乡下去拾柴火。他还叫小孩子去拾菜皮，拣破烂。就这样在死亡线上挣扎着。象张廷扬这样的家庭，那时是很多的。

(二) 克 扣 多

工人的工资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但日本厂主还要针尖上削铁，想出种种办法进行克扣。

工人进厂后，得先给日本厂主白做半个月，把工钱存在厂里，这叫“存工”，要到退厂时才能发还。实际上，很少有人能退到这笔钱，因为按厂里规定：无故退工的不发，退工半月内进别厂的不发，至于被开除的工人，更拿不回“存工”。厂主还规定工人必须在厂里参加储蓄，几年以后发还，但却规定工人如被开除，则储金充公。实际上，工人往往在领储蓄金以前就被开除了。厂主还想出一种大洋换发小洋的办法克扣工人。当时一元大洋可换十二、三角小洋，可是厂里发工资，除整数发给大洋外，尾数则一律按小洋计算，那怕九角九分九，也只给九角小洋和九个铜板。这样，工人的工资无形之中又被盘剥了几角钱。

日本厂主还通过名目繁多的罚款来克扣工人的工资。据老工人回忆，当时在车间里讲话要罚；工作劳累打一下瞌睡要罚；走错车间要罚；损坏工具照市价加倍罚；出了坏布要罚；其他如皮辊有油花、断头多、车上花衣堆积……都要罚。一罚起来，少则二、三角（相当于一天的工资），多则一星期甚至半个月工资。事实上，厂里并没有明文规定哪些应该罚，要罚多少，而是随他们的高兴。内外棉八厂工人李宝才有次出了工伤事故，轧断了手指，东洋领班不但不给医药费，反而跳起来就是一个耳光，骂他做生活不当心，弄坏了机器，罚他半个月的工钱。

(三) 勒索凶

工人被日本厂主残酷剥削后,还要遭到工头的额外勒索。当年工人中流传着这样两句话:“人情^①逼似债,头顶锅子卖!”就是说的工头勒索。

工人如果不给拿摩温送“人情”,休想进厂门。当年许多女工因为没有送礼钱,就拿自己结婚时做的花布衫当钱送礼。老工人张廷扬是把他的衣服典当了一块半现洋送拿摩温后,才进到内外棉五厂的。

工人进厂后,更经常受到包打听、拿摩温的剥削。除了逢年过节必须送礼以外,还经常接到各种各样的帖子。那些家伙发帖子的名堂特别多,婚丧大事发帖子,老婆生孩子发帖子,孩子满月发帖子,一家大小做寿发帖子,而且除了阳寿,还要给死去的祖宗八代做阴寿。工人们收到帖子后,必须去送礼,迟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女工姚美英一次接到绰号叫“一扫光”的总管拿摩温章阿三为儿子打百日锁的帖子,她自己孩子正在生病,但也只好把原来准备替孩子买药的八十个铜板,装进红纸袋,送去给“一扫光”的孩子打“长命百岁”锁。可是章阿三还嫌少,说是看不起他。第二天就叫两个小流氓在路上打了姚美英一顿,打得她几天不能起床。工人刘俊才曾在一个月里接到七张红白帖子,迫得他只好借“印子钱”去送礼。这样,虽然免除了眼前的灾祸;可是为了这笔“印子钱”,一家大小忍饥挨饿足足苦了十三年

^① 当时送礼叫送“人情”。

才还清!

(四) 利 钱 高

工人在厂主和工头如此剥削之下,生活不够维持,只得靠借债度日,然而这一来又落入了另一种剥削的罗网。

当年借债的利息高得惊人。老工人李小妹因孩子生病,一次借了七块“礼拜印子钱”,规定三个星期连本带利要还十二元,每星期还四元。李小妹勉强还掉两次后,还有四元实在还不出。这时债主逼上门来,硬借给她三元,加上未还的四元,算做本钱,照旧三星期还清,本利共十二元。急得李小妹几乎要投河。后来夫妻两人一面拚着命干活,一面勒紧裤带,省下每一文小钱,才慢慢还清了这笔阎王债。

当时放高利贷的大多是流氓坏蛋,他们还借放债敲诈工人。张廷扬有次向一个流氓借十块钱,立有字据,并画了押。但流氓欺他不识字,事后说是借给他二十块,如不照还,要送他去吃官司。

此外工人还受到当铺的高利盘剥。老工人王高坤说,最多的时候,他手里有十五张当票。可是“当当容易赎当难”,当到后来,剩下的只有身上穿的衣服了。往往是当了冬天的去赎夏天的,当了热天的去赎冷天的。因此,经常五、六月天穿不上单的,十冬腊月穿不上棉的。有一年冬天,还不得不借印子钱去赎回棉衣。

(五) 劳 役 苦

工人不但身受多种经济剥削,而且还受到日本领班和工头

的劳役剥削。据老工人回忆说,当年每逢星期天,日本领班和一些工头,就要叫些工人到他们家里去当差。男工拖地板,揩玻璃窗,女工洗衣裳,抱孩子。谁要是不去,以后就有停生意的危险。过年过节时,劳役更多,必须先给那些家伙办好过年过节的事,然后才能回家。所有这些服役都是无偿劳动。但也有过一次例外。有个日本领班,叫八个工人从厂里把木柴送到他家里,他一时高兴,给了他们二十个铜板,每人所得可买大饼一个。工人看着这个吝啬鬼拿出这么一点钱,真是哭笑不得,后来就讽刺地送他个绰号叫“二百文”(一个铜板是十文)。

三、奴隶劳动

(一) 冗长的劳动时间

工人工作时间长达十二小时,实行六进六出。即日班工人早上六点进厂,晚上六点出厂;夜班工人晚上六点进厂,第二天早上六点出厂。到了周末,为了停人不停车还要晚班工人加工六小时(无偿劳动,只给一副大饼油条充饥),从星期六晚上直到第二天中午,一连做十八个小时。

日本厂主是不许工人少做一分钟的工作的。陶小妹的孩子因无钱就医,在夜里一点多钟死了,家里请人到厂里叫她回来。当陶小妹得到这个悲痛的消息时,已五点多钟了,离下班不到一小时,她就去向日本领班请假,但领班说,还没到下班时间,不准请假。结果陶小妹只得做到下班,也一直哭到下班。

工人为了做工所花的时间,实际上远不止十二小时。当时工人根本买不起钟表,也没有钱乘车子,而厂里只要上工的汽笛

响过三遍,马上就把大门上锁,不再放人进厂。迟到的工人不但因此失去了一天的工资,而且还有被开除的危险。所以,虽然规定六点上工,工人往往四点左右就起身步行,老早等在厂门口了。更有一些离厂远的工人,甚至半夜就得准备上工了。工人王美真家住郊区庙头,步行到厂要几小时。她说如果鸡叫第一遍去上工,就要迟到了。工人放了工也不能立即离厂,在厂门口排队等候抄身要花去半个多钟头。所有这些加起来,工人每天为资本家卖命的时间至少也得十四、五小时,留给自己的时间就少得非常可怜了。

(二) 恶劣的劳动条件

日本厂主只顾赚钱,不管工人死活,厂里根本没有劳动保护的设施。纺纱车间的花衣满间飞扬,一天下来,都成了“棉花人”。当时吃饭不关车,工人一面管车一面吃饭,一顿饭要吃半个小时,因此饭碗里飞花落了好几层。只得硬着头皮吃进去。夏天,车间里的温度非常高,特别是布机间,高达摄氏四十度以上。布机间老工人李秀珍回忆,那时车间象蒸笼,汗从额头上流到脚后跟,不仅衣服湿透,鞋子里也灌满了汗水,工人昏倒在车间里是常事。有一次她做夜班昏倒,被姊妹们救醒后,也不敢回家休息,又扶着墙壁勉强上车做生活。夜工做完,她早已精疲力尽,在回家的路上又遇到一阵暴雨,滚热的身体被冷雨一浇,得了伤寒症,因此被停了生意。

工伤事故也是经常发生的。女工李珍弟开的布机已经坏了,日本人也不修理,结果织布的铁梭飞了出来,把她的两个牙

齿打落了，嘴也被打破。老工人谈达亭亲眼看见一个女工被飞梭打瞎了一只眼睛。更惨的是不少工人因此送命。有一次，细纱间保全工人顾瑞铜做礼拜工，接连做了十几个钟头，累得气都喘不过来，可是日本领班还逼着他去校七号车。顾瑞铜实在支持不住，身子一歪，手臂一下子被卷进了飞速旋转着的天轴大皮带里，他还没有来得及喊叫，身体已被大皮带吊上去，高高悬挂在天轴上。工人兄弟急忙过来关掉马达，把他放下来，但因头部已受重伤，死了。当时在场的日本人，根本不管救人，只忙着去检查机器有没有损坏。事后经工人弟兄多次据理力争，厂里才发下二十块钱的所谓“抚恤金”。

（三）骗人的“福利事业”

日本厂主在一九二五年二月罢工期间，对外欺骗宣传说，厂里举办了很多福利事业，甚至还为工人办了医院。工人们用自己痛苦的经历，揭穿了这个弥天大谎。

那时厂里根本没有食堂，工人都是自己带饭吃。中午，饭凉了，也没有给工人热饭的设备，厂主仅在各车间放一只木槽或水桶，吃饭前冲桶开水进去，让工人把饭篮放在里面泡一泡，叫做吃泡饭。冬天天冷，水又不烫，不多几个人一泡，水就冷了，而且又黑又脏，后来的工人就只好吃冷饭。夏天车间温度高，带来的饭临到吃的时候已经馊了。工人就这样经年累月吃冷饭，吃馊饭。至于浴室，根本谈不到，而且如果谁偷偷地拧开自来水龙头擦一下身体，被日本领班看到，还要打骂受罚。特别可恶的是厂主故意把厕所弄得脏臭不堪。一只大缸，也不加盖子，到了夏

天,苍蝇碰脸,蛆虫满地,一下大雨,由于雨水倒灌,粪便和蛆虫甚至流进车间。日本厂主所以把厕所弄得这样脏,为的是使工人不得在里面休息,好尽力为他卖命。

至于医院,那绝不是为工人开的。老工人杨宝山说,他不但未曾进过厂里的医院看病,而且生了病还不准请假。一次他生病,被迫带病工作,稍许打一下瞌睡,还被日本领班拳足交加,一顿痛打。工人出了工伤事故,也进不得厂办的医院。事实上,所设医院,只是给日本厂方和少数职员看病的,与工人毫不相干。

(四) 女工生育最苦

女工生育的苦痛更是一言难尽。日本厂主不准孕妇请假,而且如被发现,还要开除。因此,许多怀孕女工在繁重的劳动下小产了;许多女工怀胎六、七个月,不得不用宽布带子把腹部扎起来,以避免日本厂主的眼睛。有的女工直到临产前还在车间工作,孩子养在厕所里。工人李贵金说,她比较幸运,是把孩子养在家里,但是婴儿刚落地,上工的汽笛响了,为了不被开除和多挣一天工资糊口,她只得马上撑起虚弱的身体走进厂去。

工人卞小妹养了六个孩子,每次生育时都是死去活来。第六胎分娩时特别悲惨。那天她正做夜班,到下半夜,肚子痛得厉害,实在熬不住,只得向日本领班请假。日本领班不仅不准,还恶狠狠地踢她一脚,要她快去工作。卞小妹把心一横,冒着开除的危险,冲出了厂门。可是在她回家的路上,阵痛加剧,胎儿已经冒顶了。这时四周一片漆黑,不见人影,她只得痛苦地跪下,用脚后跟把胎儿顶了回去。谁知走不了几步,胎儿又冒顶了,她

又照样顶了回去。她就这样挣扎着挨到了家门，但是她的力气也已耗尽，倒在门前，婴儿即刻落地了。

孩子出生后，也得不到起码的照管。贾阿大生了孩子无人照顾，只好放在饭篮里，用破布盖好带进厂里。为了不被日本厂主发现，就藏在又脏又闷的车肚里。后来长大了些，才交给她的七岁的儿子带领。而更多的婴孩的命运，则是死的死，送人的送人。

据一九六四年八月对三纺工场（即当时的内外棉五厂）前纺车间生过孩子的退休女工的调查，二十八个女工，在旧社会共生过一百六十九个孩子，死亡了一百零八个，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六十三点九。其中白赵先生了四个，死了四个；沈小妹生了八个，一个也没有养活。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

（五）可怕的失业威胁

在日本厂里做工，职业毫无保障。那时社会上到处是失业工人和流落城市的破产农民。厂主需要时，随时可以招进一大批。厂主不需要，就把工人开除出去。所以很多老工人都说，那时在厂里做工是一只脚在厂里，一只脚在厂外，成天提心吊胆，早晨不知夜晚。

据老工人回忆，厂主开除工人有以下种种“理由”：一、搞工会活动的开除；二、反抗厂主和工头的开除；三、被认为工作马虎的开除；四、在车间里打一下瞌睡的开除；五、抄身抄出一点东西的开除；六、怀孕开除；七、生病开除；八、年纪大开除；九、工资高开除；十、因工伤事故身体残缺者开除。

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条:一是敢于反抗者开除;二是不拚命干活者开除;三是榨尽了血汗者开除。总之,凡是不利于厂主的压迫和剥削的,一律开除;厂主往往不宣布任何“理由”,就一脚把工人踢出厂外。可怕的失业时时威胁着工人。

四、悲惨生活

(一) 衣不蔽体

工人纺了数不尽的纱,织了数不尽的布,但是他们穿的都是鹑衣百结,破烂不堪。工人在厂里劳动了一天,衣服早汗湿了,但他们没有第二套换洗的衣服,只好下班回家立即脱下洗好晾干,待上班时再穿。有时来不及晾干,就放在被窝里用身体烘干。许多工人只有一套薄棉衣,冬天穿它,天热了把棉花拆掉,还是穿它。但是这已经算是好的了,更有的工人连这样的棉衣也没有。女工彭志真,曾和她的丈夫合穿一条裤子达十年之久;每天她上班时,丈夫就呆在屋里看孩子,而当她下班后,丈夫就穿着这条裤子出去拉黄包车。

工人穿鞋子也是困难的。那时许多男工终年赤脚。女工鲁三妹从垃圾箱里捡出一双破旧的白布孝鞋,就用墨染黑了穿。至于袜子、手套之类,很多工人把它看成奢侈品,根本不敢问津。

(二) 食不果腹

工人吃的饭食,是价钱最低的糙米和杂粮;工人吃的菜,是白水煮的菜皮或咸菜萝卜干。女工蔡阿妹生病三个月,没尝过一口荤菜;买了一块乳腐,算是营养菜,吃了两个星期。工人不但

吃饭困难，甚至吃不到一口干净的水，因为出不起自来水钱，只能吃苏州河里的肮脏水。但是就象这样的生活水平，也不是所有工人都能维持的。很多人经常吃不饱，有时还断炊。沈小妹生了八个孩子，死了八个，其中就有两个是饿死的。陶小妹因为无米下锅，含着眼泪把孩子送给了人。张廷扬一家时常拿人家喂猪的泔脚来糊口。有一年夏天吃泔脚得病，不到一个半月，他的母亲和两个孩子都死了。

（三）住如地牢

日本厂主盖了一些简陋的工房，都是些又矮又小的平房。住在里面的工人拥挤不堪，往往一间不大的房间，要住好几家人，大大小小几十口。所以工房里除了床铺还是床铺，而且都是双层床。在上层的人，坐起来，头几乎碰到房顶。这一家和那一家人家，是铺挨铺，当中用条破麻袋隔一下，就算两家了。不仅居住拥挤，而且工房阴暗潮湿，冬天不能御寒，夏天又闷又热，苍蝇蚊子满屋飞，臭虫满墙爬。

但是就象这样的工房，为数既少，房租又贵，所以绝大多数工人都住不进去。不少工人是住在他们从家乡摇到上海来的小船上，搭个席篷，就是他们睡觉的地方。当小船破漏不堪时，就把它搬到岸上去住，叫做“旱船”。一九一八年来上海内外棉五厂做工的刘寿山，一家八口就挤在一条小破船上，整整住了十五年，直到小船完全腐朽不能用为止。

有很多工人住在石灰窑。这是一块臭水环绕、杂草丛生、荒冢累累的荒地。它紧靠苏州河。工人带了几条芦席来到这里，

用竹头撑起来，里面地上铺些稻草，就算是他们的住处。人们叫它“滚地龙”。这里，每下一场大雨，家里都是水，四周洼地里也积满臭水，石灰窑就成了“水牢”。天晴久了更加发愁，那些“滚地龙”晒得又干又脆，见火就着，一烧就是一大片。工人袁老三在一九二一年住进石灰窑，几年之内连遭五次火灾，越烧越穷。所以在工人中流传着这样的话：“宁坐三年牢，不住石灰窑！”尽管如此，许多无地容身的工人还是不得不住石灰窑。

(四) 行路艰难

工人上工没有交通工具，电车乘不起，自行车更是想都不敢想。厂门前的苏州河上有摆渡船，但是住在河对岸的许多工人，为了省下一个铜元的摆渡钱，还得绕道从几里路外的桥上走过。帝国主义在租界筑了不少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那是给富豪享用的；在工人居住的地区，根本没有象样的路。象那石灰窑的所谓路，工人叫它“阎王路”，那是一条被众人的脚步踏成的高低不平的烂泥路，一不小心，就会掉进路旁发绿的臭水坑。

遇到下雨天，行路更加难，胶鞋买不起，许多人连一把伞也没有，只好冒雨上工。在泥泞的路上摔跤是常事，往往跌成一个泥人。

老工人徐兰英年轻时一直赤脚，穿不起鞋。夏天走在路上脚板烫起许多泡；冬天走路，脚上长满了冻疮，真是走一步路掉一滴眼泪，可还得忍着痛苦进厂去做工。

* * *

以上种种，是一九二五年前后日商纱厂工人在帝国主义、资

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残酷统治下所受苦难的一些片断回忆。正如老工人们所说的,当年的痛苦几天几夜也诉不完,因此,工人除了闹革命,再也没有别的路。

2. 《民国日报》关于纱厂工人状况的报道

纱厂做工记

卓 熙

一、引线——南京兵变

民国二年的时候,我在南京一家杂货店里当伙友。那年四月里,便逢革命军和辫子兵开仗,接连打了四十几天。七月里乱兵到处抢掠,因此商业非常萧条。商店的主人们大半把店门关了,携着款子到上海去逃难;伙友们大半改到各地的工厂里去做工。

我的店主人也和别人一样,关了店门,携着家眷,往上海去安住;伙友们也各自分散。我是无资产的,当然不能再在南京立足,就算当时有钱,在那乱哄哄的南京城里,也不能做什么生意,所以也想到上海去。

我在上海虽没有什么亲戚,但总希望到了上海,能够遇到老店主,托他替我找一个位置。所以竟大着胆子,收拾了行李,乘火车直往上海。

到了上海,在小客栈里住下,每天在马路上逛着,想碰到一、二个熟人。谁知一连一个多月,连一个熟人的影子都不看

见。从南京带来的三十几块钱，倒花去了大半，剩下的只有六块钱。这个时候，我真焦急得了不得！心里一急，加以旅馆里饮食不良，就生起病来了。旅馆主人把我送往医院里。巧极，在病房里遇着一个同乡，他是一家纱厂里的工头。他对于我非常照顾。我把由南京到上海的缘故说给他听了以后，他便答应介绍我到他们纱厂里做工。当时我心里说不出的欢喜，我的病不多几天也就好了。出了医院以后，我就寄宿在他的家里，养息了几天。他已替我向帐房说好，允许我进厂做工了。他便叫我把应用的东西预备。我那同乡工头，几天前已替我在衣铺里买了一套蓝布短衫裤。他对我说，厂里的规矩是不许穿长衣服的。

二、第一天进厂的情形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亮，他们就叫我起来。我就换了那套蓝布短衫裤，手提着他们老妈妈给我预备的一只小圆篮，跟着左右邻舍及我的同乡，男女一共十几人，进了厂门。厂里的职员当即派我在车房里给女工们搬运纱筒管、挑纱等工作。

可怜我毛病才好，出医院并没有多久，为要吃饭，不得不去做这种劳苦的工作。当时我想坐坐歇歇，但是车房里的规矩，工人是不许坐地休息的，也不许空手站着，须得时时刻刻拚命地做工。那时我的苦楚，现在要说也说不出。忽然转眼看见在我的一间里还有比我幼小的弟兄，也在做和我同样的工作。可怜，可怜，我一面可怜自己，一面可怜他们。我暗里掉了许多眼泪，

在心里叹着说：天啊！天啊！你为什么生我们这些穷人到世界上来专门受苦呢！

三、工人吃饭没有桌子

大烟囱里的汽笛响了。工人们各拿自己带来的冷饭，放在热水缸里烫热，一同提回车房。厂里没有一只给工人吃饭用的台子。工人们各将装纱管的竹箩翻转来，当作吃饭的台子用。没有凳子可坐，便各把身体蹲着。他们的饭菜多半是些腌萝卜干、油炸黄豆等等东西。

四、饭司务大打工人

还有些弟兄，连这种最起码的饭菜都没有！我看见五、六个弟兄拿了一只小铅桶到厂里的厨房里去，倒些职员们吃剩下的残羹冷菜。但是这件事触怒了饭司务，他便恶狠狠的拿起挑饭担的竹扁担，将那班倒冷菜的弟兄们毒打一顿，打得他们拚命的逃回车房。听说若是厨役们把这事告诉帐房，还要罚他们钱咧。

五、这天的下午

草草的总算把中饭吃了，大家将饭篮丢在一边，继续着拚命做工。我说“拚命”两字，并不过分。

一天十二个钟头，连续着做工，休息的时间一点也没有。可怜的我们啊，谁不是拚着命做工的？我那时真支撑不住了。额角上的汗珠，黄豆般大的流下，沾湿了我的蓝布衫裤。并且车房

里的窗子,四面都关得很紧,满房里充满了蒸气,连呼吸都窒塞不灵,真把我闷得头昏目眩。无奈何乘着工头不注意,偷到车房外面透透气。不料刚出到外面,又给他看见。我的耳旁但听见一声怪叫,接着便见这工头举着哭丧棒,虎狼似的向我赶来。吓得我赶紧跑回车间,哀告我的同乡工头,请他替我说情,这才总算没有挨打。

六、放工时候搜查工人

挨到下午六点钟,才听得放工的钟声。工人们换衣服的换衣服,收拾饭篮衣包的收拾饭篮衣包,都忙着预备出厂。我没带什么衣包,但将身上的灰尘拍了一拍,提了饭篮,跟着众人走出车房。将近大门,已有一排牢狱似的木栅,拦在大门的前面。那木栅的门,狭得只容一个人侧着身子走。立在栅外的一个红头阿三,恶狠狠的拿着棍子,圆睁两眼看着我们工人。另外有两个专门搜查工人的穿长衫的人,将从木栅里挤出来的工人,一个个浑身上下的搜查,连饭篮衣包都要解开来看过,才放你出去。听说布机房里的裹脚的姊妹们,连裹脚带都要解开给搜过,才好出厂呢(她们是由女搜查员查的)。

七、做了一天工夫后筋疲力尽

我的同乡工头家里,搁起了二层搁楼。我那天放工回来以后,连夜饭都不想吃,跑到搁楼上,脱去了油污的蓝布衫裤,倒在床上纳头便睡。到了第二天早晨,他们的老妈妈喊我道:“起来吧,厂里的汽笛已经叫过了!”我在睡梦里被伊唤醒,睁开了睡

眼，跑下搁楼。只见伊正在将烧熟的饭，一篮一篮的装起来。墙壁上一盏没有罩子的灯，发着闪闪的昏光。我蹙出门外，解了个溲，仰头看天，天空里还散布着一天星斗。我回到屋内，浑身骨节酸痛得厉害。眼看他们都已起来，提着饭篮，催促我与他们一起进厂。可怜我这时虽怕工厂如虎，很有在家休息一天的意思。但是那里禁得起我那同乡工头对我发话：“卓熙！你可别推病躲懒啦！就是有点小毛病，也要撑撑。我虽然当了一个工头，每月的薪水不过二十五元，一家老小都靠这二十五元来活命。现在的柴米、房租，这样昂贵！我做了工头，尚且不能生病，你赶快撑起精神，同我们一起进厂吧！”我听了这些话，眼泪直向肚里倒流。咳，诸君啊，我便为这几句话所逼，硬撑着进厂了！

八、结 束

此后一天天的只象落在地狱里一般的受苦！这些苦楚，我很想用笔统统写出来，但是时间不允许我，只能就此搁笔。

亲爱的诸君，我们且待下次相见的机会吧！

（《民国日报》副刊《平民之友》1924年6月12日、20日、27日）

厂主及管理人員对工人任意毆辱行凶

青岛路大康纱厂工头王某，于去年十一月五日，将一十七岁的工人任大涛打死，并恫吓各工人不准泄漏秘密。

（《民国日报》1924年5月1日附刊《五一特刊》）

沈树德诉东华纱厂翻译陆大贤,向伊妻沈陈氏调戏不遂,行凶毆死,请求验究。当由五区四分署派警将陆拘送地检厅,请派员往验。该厅委派王检察官于昨上午十时许,莅引翔港西栅沈家内尸所相验。当据沈树德投称,我妻陈氏向在东华纱厂为女工,陆大贤是该厂翻译。上星期三,陆向我妻调戏不从,老羞成怒,将妻毆伤致毙,现求讯究,免于相验。王官遂谓曰,尔妻既遭毆毙,应当伸雪,现在不能不验。乃命将该氏尸体移至空地,验得该氏四肢略有皮伤,并不致命,委系羞忿后服毒而死。判令尸夫备棺收殓,听候返厅讯办。

(《民国日报》1924年5月3日)

杨树浦华德路七十六号日商康大〔大康〕纺织厂工人,被该厂日人吊打,受伤多人,并被诬指工人郭巧官偷窃螺丝钉,致激动公愤,前日同盟罢工。事经杨树浦捕房得悉,派中西包探前往弹压。昨经受伤工人郭巧官等投驻沪日本领事,提起刑事控诉,经日领谕两造和解,免生恶感。

(《民国日报》1924年5月31日)

杨树浦裕丰纱厂工头朱金洪行凶将小工胡金宝打死,情形很惨,现在正在打官司。

(《民国日报》副刊《平民之友》1924年8月22日)

纱厂发生严重的工伤事故

沪西劳勃生路日商(内外棉)第十三纱厂弹花间加油小工顾兆善, 昨晨六时半钟正在加油时, 机器皮带外面之铁钩忽然断裂, 致顾之面部眼鼻嘴完全被铁钩摘去, 顿时血肉横飞, 痛极昏倒在地。当经该厂日人立用电话通知捕房, 派捕将顾车送仁济医院医治。闻伤势非常危险, 恐有性命之虞。据医生云, 已失人形, 从未见过云。

(《民国日报》1924年6月3日)

劳勃生路日商(内外棉)第十三纱厂弹花间加油小工顾兆善, 本月二号早六时半被机器皮带上铁钩摘去眼鼻嘴脸, 送仁济医院医治, 因伤过重, 前日下午身死, 由院通知捕房, 派探昇送虹口验尸所, 候报请解官相验。(下略)

(《民国日报》1924年6月6日)

杨树浦黄浦码头近旁某纱厂, 前天一江北童工受工头的吩咐, 伸手到正在转动的机器里去取落下的棉花, 以致这童工被机器轧伤, 右手快要断落, 满身血肉模糊, 可惨之极! 现虽送进医院, 但伤势很重, 性命恐怕难保。

(《民国日报》副刊《平民之友》1924年7月11日)

3. 外人的著述及调查报告

上海某日商纱厂工人年龄调查简表①(三万锭工厂)

年 龄		男		女		合 计	
		人 员	百分比	人 员	百分比	人 员	百分比
十五岁以下	10岁	1	...	1	...
	11岁	8	...	8	...
	12岁	6	...	37	...	43	...
	13岁	13	...	60	...	73	...
	14岁	22	...	128	...	150	...
	15岁	29	...	138	...	167	...
	小 计	70	12.1	372	27.8	442	23.0
十二至六十岁上下	16岁	23	...	135	...	158	...
	17岁	27	...	116	...	143	...
	18岁	16	...	108	...	124	...
	19岁	33	...	92	...	125	...
	20岁	32	...	111	...	143	...
	小 计	131	22.6	562	41.9	693	36.1
二十一至二十五岁上下	21岁	23	...	63	...	86	...
	22岁	25	...	51	...	76	...
	23岁	24	...	40	...	64	...
	24岁	50	...	40	...	90	...
	25岁	26	...	40	...	66	...
	小 计	148	25.6	234	17.5	382	19.9
二十六岁以上	26—30岁	116	...	116	...	232	...
	31—40岁	91	...	47	...	138	...
	41—50岁	14	...	8	...	22	...
	51—55岁	7	7	...
	小 计	228	39.4	171	12.8	399	20.8
不 明		2	0.3	1	...	3	0.2
合 计		579	100	1340	100	1919	100
平 均 年 龄		24.5	...	19.6	...	21.1	...

① 原标题为《年龄调查表》。本简表系根据原表简化而成。

(字高宁:《支那劳动问题》,上海国际文化研究会1925年版,第330页)

上海工业医院八百八十件纱厂工人病情的分析报告^①

戴克耳^②

自上海工业医院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在杨树浦沪东公社^③创立以来,社会服务工作者、厂主、医师、旅行家、教徒、地方官以及其他各界人士,曾就本院所诊治的疾病,特别是就因工伤事故而造成的疾病的性质及其严重程度等,提出许多问题。因此,我们觉得,为供特殊参考起见,根据他们最经常提出的问题,尽可能就本院许多病情进行分析,也许会对社会学与工业卫生有所贡献。

本报告所涉及的范围,只限于棉纺织业,有几个理由:我们选定一种工业,这样可以避免因危险性质、工人年龄、性别等等比例各不相同而发生混淆;纺织业是参加本院的各合作团体中

① 据《中国经济月刊》(The Chinese Economic Monthly)一九二四年九月号的有关论述,这篇分析报告是应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帝国主义统治当局所组织的“童工委员会”的需要而撰写的。报告就上海杨树浦工业医院从一九一九年创办以迄当时的四年间八百八十件纱厂工人住院治疗的病情进行分析。这些纱厂工人包括男工、女工、童工,绝大部分都是由于发生工伤事故,或由于工作与生活条件恶劣,病势沉重而住院治疗的。当时纱厂工人所处的悲惨境地,由此得以窥见一斑。

② 戴克耳(H. W. Decker, M. D) 是美国基督教浸礼会派遣来华的医药传教士。

③ “沪东公社”即沪江大学在上海杨树浦设立的所谓“杨树浦社会中心”(Yangtsepoo Social Center),主要以该地区的工人群众为对象,开展俱乐部、书报阅览、业余学校、医院、讲演等等活动。沪江大学是美国浸礼会在上海开办的一所教会学校。上海工业医院系由美国浸礼会与沪江大学发起,得杨树浦区许多工厂主的赞助而创立的。

唯一最大的工业^①；所有各该纱厂都雇用男工、女工和童工。

在分析材料时，我们十分惋惜地注意到：关于中国工业卫生和工业医药问题，书面记载有如凤毛麟角，异常稀少。的确，要研究该项问题，就需要大量的材料。本报告所提供的材料虽然零碎不全，可是我们希望抛砖引玉，鼓励其他掌握更详细材料的人士把材料发表出来。

首先要指出我们的统计材料的某些缺点，这样做也许是有好处的。这些数字都是从多数由外人管理的大型现代工厂得来的。我们认为，如有纯粹本地纱厂的统计材料，对于帮助我们正确了解中国的实际工业状况，将具有更大的价值。我们认为，本报告的另一个缺点就是对于每次工伤事故究竟在什么时间发生一点，都略而不提。根据其他国家对这一问题的调查报告，大多数工伤事故发生在每个工作日将近终了的时光。中国的工作时间特别长，如果能在中国取得有关这一问题的精确数据，那是颇饶兴趣的。然而，我们很抱歉，本院的早期记录没有注明工伤事故所发生的时间；但是根据我们手头所有的材料，也足以确定上项调查结论。我们也认为，若要取得关于工伤事故的全部事实与详细情节，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许多病情简直找不到谁知道事故发生的细节。甚至机器的名称也往往说不出来，因为直到现在，中国工人的日常语汇似乎不包括他们所使用的外国机器

① 据《中国经济月刊》一九二四年九月号的有关论述，参加上海工业医院的合作团体，绝大多数为棉纺织厂，计有英商怡和纱厂、杨树浦纱厂、东方纱厂，日商上海纱厂第一、二、三厂，华商厚生纱厂、德大纱厂、恒丰纱厂。此外，尚有英商祥泰木行、培林蛋厂、工部局电气处等。这些工厂都设在杨树浦区。

的名称。应该准备好工伤事故的报告,随同病人一道送至医院,以便帮助医生提出防止工伤事故的意见。再者,本报告并不说明每一件病情的永久残废的范围。工人的工作效能与赚钱能力究因工伤事故而丧失多少,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些统计材料的另一个缺点就是所根据的因工伤事故而造成的疾病,特别是女工因工伤事故而造成的疾病,件数太少。事实上女工所遭受的事故次数不多,这也是颇饶兴趣的。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些统计材料起见,让我们略述本院的组织概况。上海工业医院和药房是应杨树浦区若干工厂厂主的请求而创立的。医院由各该厂供给经费。各该厂所属工人如有受伤患病等情,由厂方给予证明卡片,即可按照病情,享受住院治疗或在药房门诊的权利。如果病人需要住院,住院期间的费用即由厂方供给。本报告只包括对于住院病人的分析研究,因为医院的记录比药房的记录更为详尽。当然,只有病情比较严重的病人,始得准其住院。各类总合的百分比,系按各类病情的总人数计算而得,不是各栏百分比的总和。

表一 住院疾病人数与工伤事故的百分比^①

工人类别	病人总数	各类工人百分比	工伤事故人数	占疾病总数百分比	其他疾病人数	占疾病总数百分比
男 工	566	65%	231	41%	335	59%
女 工	164	18%	43	26%	121	74%
童 工	150	17%	100	67%	50	33%
共 计	880	100%	374	43%	506	57%

^① 本表原文所载数字与百分比略有错误,现已分别校正。

上表分为男工、女工、童工,以及他们的工伤事故与疾病。凡十五岁以下的工人,一概认为童工。曾发生工伤事故的儿童共一百人,其平均年龄为十二岁,最幼者五岁。病人总数中,男子占百分之六十,女子占百分之四十。表内列出医院所诊治的病人总数与各类病人的百分比,同时并注明因工伤事故与非因工伤事故而遭致的疾病的百分比。我们在比较上表所列数字,特别是所列工伤事故的数字时,应该知道各类工人的工作危险各不相同这一个重要的因素。例如男工的工作比女工、童工危险得多,因此男工所受工伤事故的次数和严重程度,与女工、童工所受的,不能相比。但是根据经验,我们认为女工与童工的工作危险大致相同,因此把他们的工伤事故的次数与严重程度相比,是公正而有价值的。

上表数字虽不包括药房门诊的病人在内,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其中男工、女工、童工三类病人的百分比,与药房门诊三类病人的百分比几乎完全相同。

本院服务对象中的纺织工约有工人一万五千人。不容置疑,杨树浦西头虽有其他外国医院诊治本区的男工与童工,但是大多数女工如果愿意由西医诊治,必须来本院就诊,因为本区附近一带,并无其他特为女工设置病床的医院。本市男工、女工、童工三类人数的精确比例不易取得。各厂经理似乎都无该项数字。工厂各部门工作大都由包工头承揽,因此除各部门的包工头外,谁也不知道详情,而各包工头也只知道本部门的情况。即使各包工头所承揽的本部门工人,仍然逐日更动。然而,根据我们和各厂经理与包工头的多次谈话,再参照

本区社会服务工作者所得的数字，三类工人的比例可估计如下：

女工占55%；男工占25%；童工占20%。按照上项估计，虽然各厂所雇女工的数目为童工的两倍以上，但据上表，在相同的时期、相同的纱厂内，发生工伤事故的童工为一百人，女工四十三人。正如上面所谈到的，男工发生工伤事故的人数，不宜和女工、童工相提并论。因为不仅男工所担任的工作较为危险，而且男工对西医的疗法偏见较少，发生工伤事故时，比女工、童工更易来院诊治。至于女工与童工，两者之间可以相互比较。但是我们不禁要问：纱厂内女工受伤的人数何以如此之少？所有女工工伤事故是否件件都有报告？这些问题可以有多种解答，但是我们认为有一重要理由，必须加以指出：按照我们的共同经验与世界各国的工业统计，大多数工伤事故是在既无经验又无技能的工人中间发生的。许多人主张机器要有安全设备，我们并不轻视安全设备的重要性。但是根据我们在中国的经验，我们深信要为机器装置安全设备，使它不伤害既无经验、又无技能的工人，那差不多是办不到的事。我们坦白地说，先期训练工人，使其知道如何使用机器，如何免除工伤事故，从而熟悉防止事故的手段，那才是减少事故的最重要办法。女工小心而有经验，对于机器的运转及其事故易于熟悉。另一方面，童工缺乏经验，也不容易教他们懂得机器的危险；而且他们很快就感觉疲劳。因此，只要让童工在机器旁工作，要使他们不发生工伤事故，那确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表二 工伤事故受伤部位的比较

工人类别	上肢	下肢	头部	躯干
男工	35%	34%	16%	10%
女工	53%	18%	20%	6%
童工	51%	30%	15%	3%
各类总计	42%	31%	16%	7%

上表指明身体各部位受伤人数的百分比。男工与女工、童工间受伤的百分比大有差别。男工所担负的工作门类繁多。自装配工以至搬运负驮的苦役，都有男工。他们的受伤部位因其工作而不同，上下四肢都有。至于女工与童工，差不多全都在机器旁工作，大多数人伤在上肢。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为手部或以上的部位受伤。因受伤而致永久残废的女工和童工多数为手部的残废。对于工人，尤其对于纺织工人，手的用处最大，而受伤的部位往往就在手部，这真是最堪痛惜的事。

表三 伤害性质的分析

工人类别	裂伤	复杂折骨	普通折骨	烫伤
男工	67%	13%	3%	8%
女工	37%	35%	2%	6%
童工	57%	21%	9%	12%
各类综合	59%	18%	5%	8%

正如我们所意料的，纺织工业所发生的伤害，其中裂伤的百分比最高。

上表所列的复杂折骨，大部分为手掌或下肘的骨部。

裂伤者约有百分之七十五已沾染微菌,若及早诊治,不致造成死亡。但手部沾染微菌,常使其因此而致残废。现已推广工厂的治疗工作,并叮嘱工头在急救治疗以后,立刻将受伤工人送至本院,我们希望治疗的结果或可逐步改善。有时病人虽立刻送院,我们使用各种方法洗净伤口,清除不可救治的折断筋络,然后缝合,但其结果仍然令人失望。著者深信工人不讲卫生实为沾染微菌的重大原因。他们的两手经常污浊不堪,皮肤又往往皱裂不平,恰好成为无数微菌荟萃之所。当工伤事故发生时,微菌乘机侵入热血管,随即受毒而发炎。皮肤受伤常有肌肉强直症,但本医院与药房所有疾病记录中,仅有肌肉强直症两件。其中之一为一纱厂工人因全手绞缠于梳打废棉的机器中,手背有若干小孔。当时本院因限于经费,不能按惯例施用预防剂,致成肌肉强直症。现已备有此项预防剂,遇有认为可以造成该项病症的危险者,即予施用。

由于纱厂内棉花极易燃烧,且热气管甚多,本院曾诊治为数颇多的烫伤病人,其中有若干名伤势极重。

表四 因工伤事故而致永久残废与死亡的比较

工人类别	永久残废	死亡
男 工	20%	1.7%
女 工	44%	0%
童 工	29%	3%
各类共计	25%	1.8%

上表指明因工伤事故而致残废的百分比，我们发觉其中童工的死亡率最高。就永久残废的百分比而论，童工比男工高百分之九。其原因不外上述的论断：年幼而无经验的工人，其所发生的工伤事故最为经常而严重。

我们还看到在女工中并无因工伤事故而致死者，但永久残废的百分比却达到百分之四十四，殊堪惊异。其所以如此，理由非常简单。表二(受伤部位的比较)已指明头部受伤的女工约占受伤女工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倘再进而研究其受伤的部分，则眼珠的伤害居多。在多数女工所操作的织布间中，尖利的梭子常将不少女工的眼珠刺伤。该项事故往往使受刺的眼珠因而完全失明，或一部分失明。

表五 非因工伤事故而发生的疾病的分类

工人类别	肺 结 核	非结核性的呼吸病	脚 气 病	寄生虫病	慢性腿疮
男 工	5%	7.5%	6%	22%	5%
女 工	14%	15%	3%	4%	10%
童 工	22%	8%	0%	32%	0%
各类共计	9%	9%	5%	19%	5%

上表将本院所治疗的非因工伤事故而发生的各种普通疾病，分别列出百分比。本表的特点之一就是，严格地说，其中并无职业病。如对纺织业的性质加以思索，这是不足为奇的。在其他工业部门，有毒的化学药品最易致病，但纱厂很少使用这一类的药品。各纱厂内漂白粉的刺激气味也都作了有效的清除。但

是这种气味对于肺结核与其他呼吸病的相当高的百分比，确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纱厂内空气既热且湿，促使这两种疾病盛行。我们要请读者注意女工、童工的肺结核百分比很高，女工百分之十四，童工百分之二十二。除上述原因外，过长的工作时间与恶劣的生活条件也应加以注意。其他工业部门如有伤害疾病的统计数字，可资比较对照，将使上表更有意味。纱厂男工的肺结核百分比，显然并不比其他工业为高。至于女工与童工，因本院的合作团体，除纺织业外，各厂大多不雇用女工，也没有雇用大批童工，因此无从比较。

脚气病值得注意，因为患者都是从中国其他各地到上海来谋事的人，而这种疾病又是在他们来沪以后才发生的。当然工作与生活条件的完全改变都可认为患病的原因。

杨树浦区的居民多数来自中国各地。我们认为倘能查明究竟中国各种寄生虫病可在本区发现若干种，也许是颇饶兴趣的事。可惜此项工作刚刚开始，尚无材料可资论述。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工业问题。著者与中国其他医生对于多数病人患有慢性腿疮一事颇感兴趣。许多病人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来院医治，因此我们的经验极为有限。即就已诊治的病症而论，尚未能发现其直接原因何在，但大多数人不讲个人卫生与营养不足，似系容易致病的原因。这种病症异常普遍，我们往往对它未加精细而适当的考虑。腿疮必然使中国工人的工作效率大大减退。倘能对此种病症的预防与迅速治疗方法进行透彻的研究，那么对于中国工人的效率与赚钱能力，必有极大的贡献。

我们认为上列各表既已说明各种情况，不再试图进行系统的总括说明。但著者切望读者对于死亡率百分之一点八与永久残废率百分之二十五，特加注意。该两项百分比系根据医院所诊疾病三百七十四件计算而得，我们认为这些数字已足据以得出结论。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童工本应担任最为容易、最少危险的工作，然而他们因工伤事故而致死亡与永久残废的百分比最高，在各类工人中，他们所受的苦难最为惨重。

表五所列的肺结核病人，据临床诊断，都在病菌活跃时期，大多数病势极为沉重。各纺织厂的女工与童工，如果一一详细检查，很可能会发觉肺结核病的蔓延范围已到达十分惊人的地步。

在中国，工业卫生与工业医药的有系统的组织工作，尚极幼稚。即此间工业界的医药卫生组织，也还在草创时代。因此，全国医界人士应密切注意：切勿使中国的工业充分发展而没有医界人士的辅助与指导。两者倘能携手并进，则不仅医界人士对医药卫生组织的工作易于着手，而且各厂工人可以因此而免于不可计数的灾难与丧失工作效能。

(译自《中国医药杂志》第38卷第3期，中国博医会
[China Medical Association]，1924年3月出版)

日本国内纱厂与在华日纱厂劳动条件比较^①

(日本外务省社会局书记官吉坂俊满 1925 年 8 月 15 日报告要点)

	日本国内工厂	在华日商工厂
纺织工人工资	<p>平均 1.28 日元 男工 1.33 日元 女工 1.202 日元 以上根据大正十三年^②下半年纺织联合会的调查。</p> <p>日本国内纺织工人，几乎全部被收容在寄宿舍中，每日自付膳费 0.15—0.18 日元。倘所供膳食的实际价值为 0.28 日元，则应将厂方贴补的差额 0.10—0.13 日元当作工人的工资计算。</p>	<p>平均 0.40—0.50 银元^③ 倘按照日元 10 元兑银元 7.50 元的兑换率，则其平均工资相当于 0.533—0.667 日元，即相当于日本国内工资的 41.6%—52%。</p> <p>中国工人虽有宿舍，但膳食以完全自理为原则。仅青岛纺织工厂由厂方以实物供应午餐；对夜间工作者付膳费 0.04 元，或供给实物；且对每月工作满十五日者，可供应面粉一袋，其价较市价低 0.40 元，惟以一袋为限。</p>
宿舍	日本国内单身工人不付宿费，且由厂方供给被褥。工人之有家族而居住宿舍者，每月付费约 5—8 日元。	单身工人须负担宿舍费（但亦有在某种条件下可予免除者）。中国工人的宿舍费每月约 1.20—2.50 银元。

① 原标题为《日中劳动条件比较》。

② 大正十三年即 1924 年。

③ 据当时北京军阀政府驻日本使馆的报告（载《外交公报》第 47 期，1925 年 5 月），日本《东京日日新闻》1925 年 2 月 18 日关于中外工人平均工资的记载如下：

中国职工	男工	0.50 元	女工	0.45 元
日本职工	男工	1.50 元	女工	1.20 元
英美职工	男工	5.00 元	女工	2.50 元
荷兰职工	男工	10.00 元	女工	5.00 元

续表

	日本国内工厂	在华日商工厂
工 资 的 支 付	<p>每月一次。普通于十日或二十五日结算,月底支付。</p>	<p>普通每月支付一次,但亦有支付两次者。有的厂家,自结算至正式支付,相隔达两星期之久。此点值得注意(钟纺与日本国内相同)。</p> <p>特有的工资问题:工资在计算及支付时,或按现金,或按纸币,又有官帖、大洋、小洋、铜币等之分,相互之间因货币市价涨落不一,工人受害不浅。因此,要求增加工资,或变更计算标准,俾能获得保证。此种情形,尤以东北为甚。</p> <p>纺织业支付工资,一般以大洋为原则。不满大洋一元时,以小洋支付;不满一角时,每分以铜元一枚支付。此亦为此次青岛及上海工人所要求改正的事项之一。</p> <p>上海的中国纱厂,如恒丰厂,已一律按大洋计算支付。</p>
劳 动 时 间	<p>一向从六点钟到六点钟,共工作十二小时,其中有一小时休息,故实际工作时间为十一小时。</p> <p>日夜轮班制,但从数年前起缩短一小时。目前(大正十四年六月)全国五十三个会社中,已有二十四个会社,改为从六点钟到五点钟,其中有一小时休息,成为实际工作十小时的日夜轮班制。</p>	<p>从六点钟到六点钟(钟纺是五点五十分出厂),实际工作时间为十二点钟或十一点五十分。</p>

续表

	日本国内工厂	在华日商工厂
休息 时 间	<p>上午九点钟休息二十分或十五分钟。正午休息三十分或四十分。下午三点钟休息二十分或十五分钟。共计一小时。(夜班准此。)</p>	<p>三十分、四十五分、五十分钟不等。</p> <p>中国华新纱厂，仅在正午休息二十五分钟一次，机器不停。</p> <p>青岛除钟纺外，一向仅在十二点钟时休息二十分钟一次，但从本年四月纠纷以后，在下午三点钟增加休息十五分钟一次，共计三十五分钟。</p> <p>天津采取休息三十分制度。</p> <p>钟纺的实际劳动时间为十一小时。</p>
休 假 日	<p>每七日休假一日，每月休假四日。普通于休假日交换日夜班。</p> <p>在休假日，因机器停止二十四小时，故一组的休假时间为二十四小时，另一组则为三十六小时。</p> <p>在大节日，不一定全部休业。</p>	<p>虽然采用每月休假四日的制度，但由于机器并非停止二十四小时，大多数仅停止十二小时。故名义上虽称休假一日，实际上多数不过获得半日，即十二小时的休假。</p> <p>(亦有每月机器停止二十四小时一次，其他三次则停止半日的。)</p> <p>不依照中国的节日，而依照日本的大节日。且休假日不支付津贴。</p>

续表

	日本国内工厂	在华日商工厂
福利补助事业	<p>对于因业务而致负伤、疾病者，一律根据工厂法由各会社订定补助规则。</p> <p>根据大正十四年调查，纺织业共施医二万八千件，计八万三千日元；疗养三千九百件，五万四千日元；休业补助一万件，一万一千日元；伤病补助四百八十件，三万二千日元；遗族补助一万零九十二件，一万四千日元；丧葬九十二件，二千日元；工人返乡旅费二万三千日元。</p> <p>此外，在日本国内各工厂，一般设有共济组合。其最发达者，为钟纺共济组合，对于私伤、疾病、死亡、怀孕、生产及工人家属死亡等，在大正十三年下半年，即支出二十万零一千一百三十五日元，大正十四年上半年，支出十三万六千六百七十六日元。每人平均得七至八日元。此外，还设有救济院、疗养所。</p> <p>会社对共济组合的补助金，大正十四年上半年支出三万三千日元。过去二十年累计支出共达一百九十六万日元。关于年金制度，大正十四年上半年获得负伤年金、长期工作年金、退職年金者共一万五千五百六十人，支出金额达八万九千九百余日元。</p>	<p>对于公伤事故的实际医疗费用，虽由厂方负担，但对于其他方面，较诸日本国内的规程，则颇不充分。</p> <p>青岛的纺织工厂，虽有病伤补助的规约，但对于最易发生的公伤事故，如工人仍能从事其原来工作者，则不予补助。且补助亦以六个月为限(日本内地为三年)。</p> <p>又如满铁虽有补助规则，但秘而不宣，工人不知其内容如何。</p> <p>钟纺在华工厂，上海从大正十三年起，青岛从大正十四年起，对中国工人公布共济组合制度。此外尚未见有设立此种制度者。</p> <p>闻满铁刻下正在研究为中国工人设立共济制度云。</p>

续表

	日本国内工厂	在华日商工厂
惩	以开除或斥责为主，很少停工或赔偿。停工普通为二、三日，多为关于男女风纪问题，或在工厂内吵闹，或发生暴行者处罚之。	对屡次发生问题者，施行罚金惩戒制度。也有工厂对于民智浅漏、怠惰狡猾、盛行偷盗的工人，除开除外，不得不设立各种制度。关于罚金制度，如对迟到、早退罚金过多，时常引起不满。钟纺的罚金数，以三日内工资为度，且对初犯不罚。对于罚金的利用，则未闻有何适当方法。处罚中最多者为殴打。如此次青岛、上海两次罢工中，均有日本人不得殴打工人的要求。此外，例如大正六年八月公主岭车站因有助理员殴打中国工人而引起罢工事件；又如大正十年三月营口东亚烟草会社、大正十一年十月五日满洲织布株式会社、同月十五日铁岭织布会社，均因日本人殴打中国人而引起罢工。其他如以监督过分苛刻为理由而罢工者，亦复不少。
戒		最近日本人虽不亲自动手殴打，但命令中国监工鞭打工人。 钟纺已规定凡殴打工人者，予以斥责或停止待遇之处分。 奉天英国烟草工厂，亦规定凡殴打工人者，予以开除处分。

续表

		日本国内工厂	在华日商工厂
工 作 时 情 形	一、检查制度	出入工厂时，不检查身体及所携带的物品。	为预防偷盗起见，在出入口严格检查。特别在放工时，多进行检查。 青岛罢工团的陈情书中称：“每日下工时，分数千人为两班，进行检查，需时一小时余。不论下雨下雪，甚至解开女子之缠足施行检查，是有伤我国体也。”
	二、椅子问题	工作时不供给椅子休息，颇为遗憾。	中国妇女有缠足之风，脚力孱弱，椅子更为必要。数年前曾供给椅子，但有人借此休息，现已废止。
	三、厕所监视问题	据某工厂的调查，妇女大小便一日三次，每次六分钟，计十八分钟。 厕所中不设立监视人或供给草纸者。	厕所中设监视人，或实行厕所牌子制度。
	四、膳食	就工作条件言，日本国内较有秩序，且较整洁。	食堂设备，逐渐完善。在车间内膳食的风气已见减少；但由于设备及椅子不足，仍有在车间内进餐者。 青岛罢工工人的陈情书中称：“进餐时一部分人工作，一部分人进餐，因此每次均有不少棉尘一同下肚。”
	五、卫生状况		工作时多脱去上衣，成半裸体，且多赤脚。患皮肤病及眼病者亦多。结核病的发生尚少，但在南部的工厂中，仍须进行调查。 多无医院或医疗室设备，即有此种设备，亦多不设医师。

续表

	日本国内工厂	在华日商工厂																	
保 证 金 制 度 及 储 金 制 度	<p>根据工厂法施行令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禁止预收违约金或损坏赔偿费。强迫储蓄制度虽可实行，但必须获得主管官厅的许可，并有相当利息，保证偿还，管理方面亦须严格加以监督。</p>	<p>(内外棉)设立保证金制度，作为留住工人或奖励不请假的方法。形式上，除工资外，每月累积一定数额，到二十个月时全部支付。</p> <p>强迫储蓄，实质上即是扣除一部分工资，且不付利息。储蓄数额如下，但闻最近拟予废止。</p>																	
		<table border="1"> <thead> <tr> <th>每月收入</th> <th colspan="2">储 金</th> </tr> <tr> <th></th> <th>熟练工</th> <th>非熟练工</th> </tr> </thead> <tbody> <tr> <td>4—6元</td> <td>0.40元</td> <td>0.20元</td> </tr> <tr> <td>6—8元</td> <td>0.60元</td> <td>0.30元</td> </tr> <tr> <td>8—10元</td> <td>0.80元</td> <td>0.40元</td> </tr> <tr> <td>10元以上</td> <td>1.00元</td> <td>0.50元</td> </tr> </tbody> </table>	每月收入	储 金			熟练工	非熟练工	4—6元	0.40元	0.20元	6—8元	0.60元	0.30元	8—10元	0.80元	0.40元	10元以上	1.00元
每月收入	储 金																		
	熟练工	非熟练工																	
4—6元	0.40元	0.20元																	
6—8元	0.60元	0.30元																	
8—10元	0.80元	0.40元																	
10元以上	1.00元	0.50元																	

续表

	日本国内工厂	在华日商工厂
文 娱 活 动	<p>最近工人的文娱活动，颇为发达，既易于□□，又可增进工作效率，且对工人的体质与知识，可望有所裨益。</p> <p>尤以纺织厂的工人，百分之九十为青年女工，住在寄宿舍内，易受诱惑，因此需要特别细心考虑。例如，利用余暇教以裁缝、手艺、音乐、插花等，同时设立娱乐室、运动场等。此外，有电影、远足、舞蹈等。</p> <p>对男工则奖励棒球、网球、角力等，并设有图书馆。</p>	<p>时常看电影，中元和新年看戏，中秋节有分发月饼者。</p> <p>(钟纺)在上海各厂，最近设立茶馆和庙宇。</p> <p>(内外棉及青岛钟纺)计划设立茶馆。</p>
教 育 设 施	<p>对学龄儿童，强制入学。此外，对自愿参加者，授以补习教育，使工人保持其健全的精神，经常予以注意。</p>	<p>以前曾讲授日文，后因参加者日见减少，无形停顿。</p>
中 日 工 人 的 隔 阂		<p>一般中国工人与日本工人无接触机会，尤以出入各有不同门户，居住宿舍，亦不相同，差别自然更大，因此愈来愈造成两者之间的疏远。</p>

(译自日本外务省档案显微胶卷第575卷

MT 5.3.2.155—10,第243—257页)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童工委员会”报告(节录)

工厂、制造厂及类似的工业活动场所——童工开始工作年龄按雇用的性质而不同,但是可以断言,一般在纱厂或工厂劳动的童工是在对他们的雇主一有经济价值时就开始的。本委员会曾在日间或夜间参观不少工厂及其他类似的工业活动场所。我们看见很多童工在工作,其年龄不可能超过六岁。普通工作时间为十二小时,其中至多一小时停下来吃饭。童工常常是自始至终立着劳动的。许多行业通常用日夜两班制,十二小时为一班。多数厂在周末停止一班,有些厂除采用前述办法外,厂主设法使工人每两周得到一天的休息,但这种办法很少成功。除了受到阻碍和春节期内习惯的假日外,工作是经常不断的。工资按照实际工作日计算。许多厂里空气和灰尘情况很坏。大多数工厂和制造厂里卫生设备也很差。一个童工每天平均工资往往不超过银洋二角。包工制度很普通。在这种制度下,包工头供给需要的劳动力,而按生产成品付酬。这种制度显然导致严重的弊害。本委员会曾听到证人说,有些包工头从农村里骗到幼童,仅给其父母每月二元作为幼童做工的报酬。这种幼童在厂里工作后,包工头从每个童工身上每月可以赚到银洋四元的利润。这些幼童食住情况常常十分恶劣。他们自己得不到一文钱。他们生活情况几与奴隶无异。

除上述一般意见外,兹将关于本委员会有机会特别加以研究的几种工业方面所听到的见证,摘要记述如下:

一、纱厂——一般说来,对于空间问题很少意见,但有时

通风不足。空气温度必然略高于寻常。空气中夹有一定成分的灰尘和原棉纤维。有些厂里温度特别高些，灰尘情形坏到超过合理的程度。卫生设备情况不能令人满意。许多厂对厕所清洁状况很少关心，厕所邻近地方的臭气十分显著。纱厂平时都开夜工。日夜两班，每班工作十二小时。有些纱厂在周末停止一班，但最后一班的时间是在十二小时以上。有一纱厂，这种末班时间长至十三小时有半；另一纱厂则竟长至十五小时。有时没有夜班，则日班时间常是十三小时或者甚至更长一些。有些纱厂，经常有一小时吃饭的时间；另一些纱厂的工人，只好一边工作，一边吃点东西。大部分童工在纺纱车间里工作。他们绝大部分在全部工作时间内是立着劳动的。很难明确地说，童工开始劳动的最幼年龄是几岁。但是，本委员会看见许多劳动着的童工，其年龄不可能超过六、七岁。这些童工中，有些并未经正式受雇的工厂许可，而是他们的母亲把他们带到厂里以便得到照顾的。照西方观念看来，有不少纱厂的夜班状况十分罕见。放着婴儿或孩子的竹篮，他们有睡着的，也有醒着的，一排一排地安置在飞快运动和喧闹的机器之间。那些假定是在工作的幼童，由于疲劳过度或利用没有适当监督的机会，躺卧在每个角落里睡着，有的一无遮盖，有的睡在盖有棉花的篮里。纪律似乎很松弛，负责管理的人对这种情况佯为不见。本委员会注意到，当我们进入车间时，听到一声警告的口笛，许多幼童由他们邻近的人唤醒，赶快跑回机器前工作。上述包工制度，在纱厂里很普通。但有许多幼童是跟着自己父母来劳动的，有些则是自己单独来的。这类童工每一班工资是银洋二角。

(下略)

(译自《上海工部局一九二四年报告》，第66—67页)

(三) 一九二四年前后，党在上海工厂区 教育、组织工人的一些活动

1. 创办上海大学，培养干部

上海大学定名启事

本校原名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因东南二字与国立东南大学相同，兹从改组会议议决，变更学制定名上海大学，公举于右任先生为本大学校长，此布。

(《民国日报》1922年10月23日)

上大之使命(节录)

A·S^①

如有人问我们的教职员“你们为什么要办上大？”我敢断定至少十分之九的教职员会这样的回答：“为建国。”如有人问我们的学生“你们为什么要进上大？”我也敢断定有十分之九的学生会这样回答：“要建国。”

何以见得？上海大学的经济状况，在国中各大学比较起来，我们不自讳亦不必讳承认上大是一个穷而又穷的学校，所以教

^① A·S 是“安石”的英文缩写，即邓中夏同志。时为上大校务长。中共中央委员。

职员薪水有的是完全尽义务，一文也不拿，有的为维持生活亦只拿到很少数量，还比不上一个高等机器工匠的工资，有的原在别校拿到很多的薪水，却情愿抛弃了来上大吃苦兼课。据此看来这三四十个教职员如果不为建国的目的而来，试问是为什么？上大的声望地位，在国中各大学中比较起来，我们不自讳也不必讳承认上大是一个微乎其微的学校，他既不象国立大学毕业了可以图一个出身之阶，也不象教会大学毕业了可以谋一条出洋之路。有何好处，可广招徕？然而在这一年当中，有的学生是从偏僻省份赶来，有的是从海外归来的，有的脱离有名大学（如北大）而来的，有的情愿不考别的有名大学而来考上大的。学生人数现已超过原有人数三分之二以上。据此看来，这几百个学生如果不为建国的目的而来，试问是为什么？

我们在这国际压迫和国内扰乱的时代和环境之场合中，使我们大家都觉得建国是中国今日唯一的出路。我们教职员和学生虽没有一种事前的会商和协定，却是不谋而合的凝成了一个共同的意识和希望。所以上大的宗旨便不客气把“养成建国人材”六个大字规定下来（再有一项是“促进文化事业”）。这是建国方略中应有的而且必要的一种手段。故宗旨条文虽为两项，实际却是一端。（中略）

有人疑心上大不是超然派，因为他内中有政党的组织。诚然不错，上大内中确有政党的组织，上大确然不曾象有些无头脑的或反革命派的学校禁止学生加入政党和开会，但是上大同人为了要建国，自然不能不相信需要一个以建国为职志的政党，所以实在有不少的人加入了政党。不过政党自政党，学校自学校，

不可并为一说罢了!

又有人疑心上大不是和平派,因为他内中有急进的趋向。这也不错。吴稚晖先生说:人家出机关枪来打,我也用机关枪对打,等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上大同人如看见什么为建国进行的大障碍物,便毫不犹豫的无情的施以抨击和打翻。

上大学系虽什,而各欲以所学从多方面企图建国目的的完成则一。只此一片耿耿孤忠,是我们大多数教职员和学生所不能一日忘的。所以努力从事的这便是和别的大学不同的地方。也便是上大的使命。

(《上海大学周刊》1924年5月4日)

张士韵关于上海大学的回忆

当我动手写这篇关于上海大学的文字时,那一幅幅的画面从我的脑中涌现了那些热烈的青年,密集的群众,雪片样的传单,火样的演讲与口号,机关枪,禁闭,血和永不屈服的精神。

这一幅幅的回忆,使我痛苦,但也带回我的精神上的青春,因为这些画面所表示的是一种充塞太空的浩瀚的热情,它自己是永远地青春,而且它也能唤回别人的青春!多少上海大学的同学将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对于民族的热爱,然而他们的行为本身与行为的效果,却永远存在。

上大之成为一个民族运动的核心,是从理论方面与实际方面同等着重的工作上表现出来的:

第一,在理论方面主要有下面三项:

一、研究:上大在平时的教学方面,特别着重于使同学“读

活的书”，使读书与生活（尤其是社会的民族的）打成一片，所以在平日有研究会的组织，师生之间的以诚相见的勤奋的研读与热烈的讨论，所给予的彼此印象以深刻化，活力化，由此深刻化了的印象与研究的结论之统一，与结论对实行的要求之坚决，所以从上大的师生看来，如果在第一分钟达到了清楚确定的结论，第二分钟便开始实行这结论，他们鄙弃那讲坛上高谈阔论之教授，和学而不行的大学生，认为那只是把学问储藏起来作为自己个人生活资本的凉血行为。所以上海大学的教育方式，可以说是作者在上大以前同以后从未见过的具有活生生的动力与集体性的教育。

二、传播：上大的学生可以说没有一个是只读书不做事的，他们知道在这危机存亡之秋，救国的工作是有时间性的——一刻不容缓的，所以他们多数虽是节衣缩食来使得自己能听课听研究，然而决不苟安自足于教室与图书馆中。他们都或因自知其长，或因大家讨论认为他应当做什么工作而一一有所分派，有许多是到各地大学或中学去教课，从他们的网篮里带去的革命理论与反帝的热情，星星之火，也引发了各省各地的青年的革命狂焰，有的到军队，有的到工厂，无非将那“给别人越多，自己也越丰富”的革命思想与情绪，一化十，十化百，百化千地播种。于是，课堂里殚精竭力的讨论，街头巷尾是如火如荼的演讲，舞台上的民族的血泪灵魂的活动，刊物与传单是成堆地从印刷所的机器中吐出来，成捆的运送，各地的青年与工人与妇女的通信，忙碌、热爱、爱、不分彼此，一条心要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反抗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三、著述：精湛的理论是行动的中心，思想的武装是反帝反封建的大本营，而上海大学的教授们将素日研究的成果，从历史上推演下来的结论，从实际社会现象与社会活动中抽出来的理论，编辑成书，印发全国，由这些“无声的炸弹”，我们曾摧毁多少军阀与帝国主义者深沟高垒是无从统计的。然而上大一时成为革命学说，革命理论之渊藪是人所公认的。

(张士韵：《中国民族运动史的上大》〔节录〕，《上海大学留沪同学会成立大会特刊》1936年9月27日)

杨之华同志关于上海大学师生参加二月罢工的片断回忆

那时候^①，党以上海大学为基础，在上海各区开办了好些工人夜校。这些工人夜校大部分设在有党的支部或国民党左派活动分子的大学、中学内。课室是现成的，教员是义务的。我执行党的指示，也参加了工作。秋白是很关心工人夜校的，他对于工人有着浓厚的感情，常常要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他。我和上大的同学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或是不能解答工人群众提出的问题，就去请教秋白。他虽在工作非常紧张的时候，也一定停下来答复问题，并且有时指定书本，和帮助收集材料，教给我们有系统有计划地编课本，解答工人的问题。

二月初^②，我们接到上海地委^③的紧急通知，要我们派人组织罢工委员会，领导工人起来罢工。学校支部派邓中夏、刘华、郭

① 指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初。

② 指一九二五年二月。

③ 上海地委当时叫上海地委兼区委，领导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党的工作。

伯和^①和我等几个人到了潭子湾工人俱乐部，和李立三同志一起工作。（中略）刘华同志原是中华书局的学徒，原名刘剑华，考入上海大学后，还是半工半读，他常做抄写、油印工作，生活很艰苦。秋白经常找他谈话，帮助他解决工作中的困难问题，关心他的生活，常常要我送些钱给刘华同志用。有一次刘华同志感冒了，还要我买了白松糖浆给他吃。并且经常告诉我：“他是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

二月罢工从二月九日持续到月底，由小沙渡的内外棉十一个厂蔓延到同兴、日华以及杨树浦的大康等纱厂，罢工人数共四万人左右。我第一次看见工人阶级强大的力量和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无论在组织纠察队，或者交代具体任务时，工人们那种爽快、不讲价钱、坚决服从工会的精神，使我深为感动。我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秋白。他说：“你才知道工人阶级中有无数的天才吗？苏联掌握政权的就是工人阶级，他们战胜了国内外的敌人，正在迅速地建设自己的国家。”他接着又说：“的确，工人学习起来比知识分子进步快的多，在斗争中他们是最坚强的。”

（中略）

二月罢工失败后，^②我们在潭子湾召开了工人大会，提出“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工人群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十分愤怒。大会正开得轰轰烈烈，突然有大批军警和马队向会场冲来。邓中夏同志一看情况不对，急忙做手势叫正在台上讲话的李立三同志下来。立三同志立刻混杂在群众中，避开了警察。

① 郭伯和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七年牺牲。

② 应是二月罢工之中。

但却有二三十个工人被捕走了。中夏和立三同志躲避在附近一个工人的家里,等警察走了以后,就出来组织工人商量对策。当时工人情绪激昂愤慨,纷纷提出包围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捕工人。虽然明知道这样做会有不利,但不能拒绝工人的要求,中夏同志提议派代表去,大家一致同意了。在讨论代表人选的时候,立三同志要求去。中夏同志认为认识立三同志的人很多,作为代表不妥当,白色恐怖又很严重,中夏决定自己和工人代表们一起去。果然不出所料,到了警察局,中夏同志和工人代表们被捕了。

我把这件不幸的消息告诉秋白,他十分焦急不安,在我们住的客堂前楼小小的一角地方踱来踱去,那天晚上通宵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一早,他就叫我化装成家庭妇女,到外面去探听消息。在大街上一家茶馆的门前,我和看热闹的人们站在一起,看到一队警察,押着工人代表们走过来了。他们排成一队,带着手铐。在他们中间,我看到了中夏同志,他勇敢而镇定地走着,脸上还浮着从容的微笑,充分地表现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大无畏的英雄气魄。

这次中夏同志和工人代表们被捕,在群众正义的压力下,不久就被迫释放了。直到这时,日夜焦虑的秋白才放下了心。(下略)

(杨之华:《忆秋白》〔第五节节录〕,《红旗飘飘》
第8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出版)

姚天羽同志关于上海大学的回忆

一九二三年二三月间,邓中夏同志随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

部”的迁移，由北京来上海。李大钊先生商得于右任的同意，介绍邓中夏同志来“上大”工作。邓来校后，于右任即出布告，委中夏为校务长，主持全校行政。中夏同志那时用的名字是“安石”，全校师生也只知道他叫“安石”，湖南人，北京大学学生。

中夏同志进“上大”的时候，正值曹锟贿选，直奉军阀内哄益烈，举国哗然。中夏同志为了使“上大”从事培养革命人才起见，决心改组“上大”。他把“上大”起始的一些老朽教授（从“东南高师”转来的大部分人）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除去了。请瞿秋白为社会学系主任。瞿当即在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提出了上海大学需要有革命性、时代性，以担负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和革命的责任。在瞿秋白担任主任之下，各科教授有：施存统（复亮）、张太雷、彭述之、蒋光赤（即光慈）、郭任远、李季、李达、周建人、任弼时、任卓宣（即叶青）、蔡和森、肖楚女、恽代英、安体诚（存真）等。同时原有“国学科”也改为“中国文学系”，由陈望道任主任。各科教授有：沈雁冰、邵力子、叶楚伦、郑振铎、田汉、赵景深、朱湘、任讷（中敏）、胡朴安、俞平伯、刘大白等。其他各科也进行了改组，并设立“中学部”，杨明轩曾任中学部主任。

“上大”除了改组各学系外，还举办了“特别讲座”，先后请有李大钊、戴季陶、杨杏佛、沈玄庐等担任讲师。记得李大钊讲题为《研究历史的任务》，指导同学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从事研究。

中夏对于“上大”是有着很大愿望的，这也就是要把“上大”造成为培养革命干部的最高学府。一经改组，“上大”真的很快

地实现了他的愿望。青年们有志于革命事业而进“上大”的，各省各地都有，甚至有老远从南洋、日本、台湾等地负笈求学的。同学以社会学系最多，约三百人之数。中国文学系次之，英文美术系更次之。中学部，初、高中两部分约百人左右。社会学系功课以马列主义为中心，该系讲义如“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社会问题”、“社会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上述讲义除在学校油印分发学生外，并曾由“上海书店”（当时中共上海地委所办，徐白民^①主持，设上海小北门，为一开间门面）出版活页本，供校外爱好社会科学的青年选购。

由于校务发展，原有校舍不敷应用，经中夏亲自出马，多方奔走，始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南阳路口）觅得有广场的西式楼房一座作为校舍，并在新闸路找到了里弄中几幢房屋作为学生宿舍，于一九二四年间迁移过去。

“上大”学生成份，多半是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家庭中出来的，工人、农民很少，华侨也有一些。在邓中夏和其他革命教师影响下，不少同学很快成了革命者，有许多同学本来不喜革命，生活腐化者，看了别的同学样子，也转变了。甚至有许多同学，别了母校，路远迢迢地跑到广州黄埔投考军官学校，也有去汕头、广州等地参加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上大”充满了革命空气，当然也有右派分子。

正因“上大”是造就革命干部的学校，和其他专事培养学究的大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其他大学里的学生对于功课都是死

^① 徐白民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三年九月至一九二四年任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委员。

咬书本、讲义，他们所吸收的知识都是食而不化的，而“上大”的同学则着重在社会的实际活动。“上大”的同学平时有好多人在不在教室里上课，而在外面搞活动。

五卅事件爆发前，中夏早已离开“上大”，不知何往。实际中夏同志离开“上大”后，即在上海专门从事工人运动了。

(原件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警探口中的上海大学

最近几个月来，中国布尔什维克之活动有显著之复活，颇堪注意。这些过激分子的总机关设在西摩路一三二号上海大学内。彼等在该处出版排外之报纸——《向导》；贮藏社会主义之书籍以供出售，如《中国青年》、《前锋》。该大学三大部分教授均系公开的共产党人，彼等正逐步引导学生走向该政治信仰。教授中计有：邵仲辉，又名邵力子，民国(日)报编辑，彼系共产党人已几年了；社会系教授瞿秋白，瞿系中国布尔什维克领袖陈独秀之密切友人；施存统，于一九二一年因共产党活动在日本被驱逐出境。其他地位较低之教授而为《向导》写稿的则有：蒋光赤、张太雷、刘含初。以上三人与施存统同住于慕尔鸣路彬兴里三〇七号。

本市代销《向导》周刊的除上海大学书店外，尚有河南路九十一号知识书店(Intelligence press)及民国路之上海书店(Shanghai Book Store)。此一由上海大学集团所主持之刊物之内容，至目前为止，尚无足够可以进行法律控诉之煽动性文件，但最近一期之内容中似有超过范围之处，现在翻译中。

(工部局《警务日报》1924年12月2日)

2. 建立平民学校,教育工人

沪西区各校筹办平民夜校

寰球中国学生会,受上宝平民教育促进会之委托,昨日下午六时邀集租界西区各学校,在卡德路九十五号该会所内商议筹办平民夜校事宜,到者有朱怡剑(中华工业专门学校)、程永言、卜世畸(上海大学)、郑一得(南洋高级商业学校)、徐山民(竞雄女学)、顾秀中、冯兰馨(坤范女子中学)、金星(苏州旅沪公学)、及该会总干事兼日夜校校长朱少屏、干事朱少章、教员李百书、朱秋岑等十余人。先由各校代表签名,分认各承办平民夜校一所,次讨论征求义务教员及招生方法数种。至课程及一切办法,俟上宝平民教育促进会举行大会后决定。闻今日未派代表来出席之各校,如志愿办理平民夜校者,亦随时向该会接洽加入。

(《民国日报》1924年3月11日)

租界西区各校致工厂经理函云: 经理先生大鉴: 敬启者, 教育之盛衰, 关系国家之强弱; 观一国国民识字人数之多少, 即可知其国文明程度之高下, 尽人知此, 不待赘言。中国地广人众, 教育普及, 难期实效, 各处人民未受教育者, 殆十居八九, 此实为我国国家衰弱不振之大原因。是以近数年来, 一般热心人士, 咸注意于平民教育, 自熊希龄夫人来沪演说后, 更得各方面之响应。乃者上宝平民教育促进会已于本月十二日宣告成立。敝校等既以实施教育为职志, 对于民众教育, 宁敢自后于人, 并鉴于

沪西人口繁多，未受教育、目不识丁者不可胜计，平民教育之设施，尤为刻不容缓。爰各就校舍内创办平民夜校一所，不收学费，每晚用最新方法授以日用必要之知识，以为平民失学者之救助。查贵厂营业发达，工人众多，内中未受教育或年长失学者尤必甚伙，用特函达，敬乞先生将敝校等此旨转知贵厂各工人，俾得就近分头前来求学。所幸时在晚间，无妨工作，谅荷赞同此举。尚希鼎力襄助，以救多数工人缺乏知识之痛苦，无任盼禱。上海大学、中华工业专门、南洋高级商校、坤范女学、苏州旅沪公学、寰球学生会启。

(《民国日报》1924年3月17日)

上海大学师生积极办理平民学校

本埠上海大学，自迁移西摩路以来，对于校务锐意图谋发展，如新校舍建筑之筹措，添办学系之规划，以及校刊、学生娱乐诸事，皆进行不遗余力。而该校人士向以改造社会为职志，对于社会事业，尤其勇猛进取的精神。

近闻该校因鉴于中国现社会实有提倡平民教育之必要，爰于四月一日，召集筹办平民教育大会，首由校务长邓安石，说明开会宗旨；次由程永言报告参预全国平民教育运动大会之经过情形；复次讨论实施平民教育之种种方案。当场即通过上大平民夜校组织大纲，并于教授及学生中公举卜世畸、程永言、马建民、刘剑华^①、郭磁、杨国辅、朱义权、王秋心等八人为上大平民

^① 即刘华同志。

义务学校执行委员,克日招生云。

(《民国日报》1924年4月5日)

西摩路上海大学附设之平民学校,自委员会成立以来,筹备不遗余力,报名学生已达一百八十余人。现该校为求教授上便利起见,暂分为两级四组,以成年识字者为一级一组,成年不识字者为一级二组,童年识字者为二级三组,童年不识字者为二级四组,将来尚需设妇女特别班,以利成年妇女。又闻该校订于十四日午后七时举行开校式,已缄知上宝平民教育促进会及西区平民教育联合会派人参观,并有电影、音乐等以助余兴。

(《民国日报》1924年4月13日)

西摩路上海大学平民学校,昨晚举行开学式,校门前高悬国旗校旗,并置通告开学之五彩花灯及图画多种。到会者有学生二百八十余人,来宾及学生家属约百数十人,由该校教职员殷勤招待,秩序井然。七时十分振铃开会。一、奏乐;二、全体向国旗行礼;三、该校主任卜世畸致词,详述开办平民学校之缘起;四、总务朱义权报告筹备经过;五、演讲,有邵仲辉、刘剑华、曹斌等,大致谓平民教育为当今之急务,使学生能了解平民教育之意义;六、有寰球中国学生会之留声机及电影以助余兴。十时散会。并闻该校定于今晚七时起分班上课。

(《民国日报》1924年4月16日)

西摩路上海大学附设之平民学校,自十五日晚分班开课后,

因学生过多,该校全体教职员已将原有规定之班级,依年龄程度严格改为六班。现在计分为:一级一班为成年不识字者,一级二班为童年不识字者,二级三班(甲、乙两组)为成年已识字者,二级四班(甲、乙两组)为童年已识字者,共分六大教室上课。该校全体教职员共四十一人,均系平素对于教育富有研究兴趣的。此番对于平校,尽量招收附近一般失学之平民,实地给予相当的教育。闻报名者已达四百五十余人,实际上课者已达三百六十余人。科目分六种,最注重的是识字和算学。又该校鉴于国内语言之不统一,以致一般失学的平民不能从普遍的语言当中(如演讲之类)得着相当知识,所以对于国语一科亦同时并重。近来该校更为管理便宜起见,已由全体教职员选举级任四人,主持各班教务,同时又由教务部指定课堂助教四人,每晚分头到各班课堂视察。该校之最能令人满意的,便是每晚放学时,对于学生途间之照料,尤为周至。规定每晚女生早十分钟放学,男生则由各级主任及助教员依次领出校外,护送归家。并闻该校为适应一般商业人才的需要起见,已由上大英文系同学等另组织一英文义务补习班,学费免收,书籍自备,定今晚七时上课。

(《民国日报》1924年4月21日)

上海大学附设平民学校热烈庆祝十月革命节

上海大学附设之平民学校,上期颇行发达,本学期照章改组委员会,继续办理。前由全体教职员公推杨之华、刘一清、王秋心、李秉祥、薛卓江、朱义权、林钧、王杰三为委员。由委员推定林钧为平校主任,王杰三为教务主任,李秉祥为总务主任,王秋

心为会计,刘一清、朱义权为书记,薛卓江、杨之华为庶务。后以王杰三因事返乡,改推王华芬为教务主任。开学以来,学生已达四百六十余人,大都为十四岁以上之工人,分高、中、初三级,每级分甲、乙两组教授。前日为苏俄十月革命纪念,特于下午七时开庆祝会,到者有五、六百人。主任林钧报告开会宗旨,继由王华芬、李春蕃、刘一清演说,并请蒋光赤先生演讲俄国革命后之情状。末呼中国国民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世界劳动革命万岁而散。

(《民国日报》1924年11月9日)

杨树浦区开办平民学校

杨树浦平民学校,于本年六月一日成立,分男女两校。现共有学生一百五十多人,多是杨树浦各纱厂的工人,分甲、乙、丙、丁四班教授。甲班课程,除了国语、算学外,因学生的要求,添英文、历史、地理。该校每两星期开校务会一次,教员学生聚在一起,商议校务的改进。

(《民国日报》副刊《平民之友》1924年6月27日)

杨树浦平民学校,开学到现在,已经有四个月。前天(九月七日)该校举行第一次毕业礼,来宾和学生到会的,有一百五十余人。先由主席致开会词,次由主任报告毕业生成绩,然后依次给凭。来宾演说,如沈泽民^①、杨之华等几位先生,都说得很有意思;学生亦有好几位演说。末了并有许多游艺,如表情唱歌、双簧、滩簧、京戏等,都很有趣味。散会的时候,已快四点钟了。当

^① 沈泽民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四年任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委员。

日他们还出了一张纪念的特刊——《平民声》，内容很丰富，完全是学生的作品。读者如果要阅看这张特刊，只要寄一分邮票去，他们就会按地址寄送的。该校的地址是杨树浦韬朋路惟兴里九百号。

(《民国日报》副刊《平民之友》1924年9月19日)

南市等区平民教育活动情况

南市平民教育促进会昨午假职工教育馆开成立会，出席会员五十余人，来宾到恽代英等。公推沈瑞琨主席，报告后，由恽代英等演讲《平民教育之要点》。后通过简章，即选举职员。当选者总干事陈即卢，干事顾作之、顾修、李士林、沈资田^①、苏俊章，候补干事潘仰尧、张梅庵、洪杨生、吴见亲、沈瑞琨。散会后随开干事会，讨论一切进行事宜云。

(《民国日报》1924年4月21日)

吴淞中国铁工厂热心平民教育诸同人，自本月初筹备开办吴淞平民日夜学校以来，诸事均竭力进行。现已招得日夜生各二十余人，昨日下午二时正式开学，并敦请邓中夏、邵力子、王荷波^②诸君，以及同济大学热心平教之周修齐君等到校，均作有关于平教的演讲，学生颇为为之感动。

(《民国日报》1924年4月21日)

① 沈资田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

② 王荷波同志，时为中共中央委员，一九二三年九月曾任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委员，一九二五年时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

闸北第二平民学校起初开办的时候,学生共有五百人,但是以后上课的人天天减少,到现在只有一百多人上课了。教员是尚公学校的教员与商务印书馆的职员几个人担任。全校共分五班,女生比男生多。除了教读书本以外,还注重演讲,已开过二次讲演会,学生到的很多。女生,除教平民千字课以外,每星期还教一点钟的唱歌,增加伊们的兴味。听说千字课已开始读第三册了。

(《民国日报》副刊《平民之友》1924年6月13日)

3. 组织沪西工友俱乐部和杨树浦工人进德会

沪西工友俱乐部草章^①

第一章 总 纲

第 一 条 本部由沪西工人组织之^②, 故定名为沪西工友俱乐部。

第 二 条 本部以联络感情, 交换知识, 互相扶助, 共谋幸福为宗旨。

① 关于“沪西工友俱乐部章程”, 就编者所见有两种版本: 一是本书里选用的《沪西工友俱乐部草章》; 另一是《沪西工友俱乐部规则》(以下简称《规则》), 系《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据宇高宁《支那劳动问题》一书译出。两个版本内容基本相同。前者系中文本; 后者是由中文译成日文再译为中文。本资料选用前者。对其中有些条文出入较大的, 依《规则》的译文加注。

② 《规则》为“本部由沪西职工组织之”(着重点为编者所加)。

第二章 部 员

第 三 条 凡属沪西工人^①，不分男女，愿遵守本部章程者，均得为本部普通部员。但须一人以上之介绍，填写(志)愿书，方得为正式部员。

第 四 条 部员之权利：

(一) 有享本部举办各事之利益。

(二) 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三) 有发言权及表决权。

(四) 有提议权及弹劾权。

第 五 条 部员之义务：

(一) 遵守本部规约。

(二) 纳入部费和常月费。

(三) 服务本部一切职务。

第 六 条 凡热心赞助本部者，由委员会认可，得请为本部特别部员。

第三章 组 织

第 七 条 每厂有部员三人至十人者，即组织某厂基本小组，公推组长一人，有三小组以上者，即组织某厂支部^②，公推书记一人。其细则另订之。

① <规则>为“沪西职工”。

② <规则>为：“各工场若有部员三人乃至十人时，或其工场中基本小组在三个以上时，皆得组织工场支部”。

第 八 条 全体组长会议，为本部最高立法机关。审议本部预算决算及一切重大进行事件，选举执行委员。

第 九 条 执行委员会由全体组长会选举九人组织之，总揽一切部务，为本部最高执行机关。其职权如下：

- (一) 执行大会议决事件。
- (二) 决定预算案。
- (三) 决定大会未决定的一切事件。
- (四) 征收会费。
- (五) 解决部员纠纷。

第 十 条 执行委员会之职务分配如下：

- 委员长一人，总管本部一切事宜；
- 秘书委员一人，掌管本部一切文书事宜；
- 会计委员二人，分管本部银钱帐项事宜；
- 庶务委员二人，分管本部购买及保管各物件事宜；
- 教育委员一人，掌管本部教育事宜；
- 交际委员二人，掌管本部交际事宜；
- 游艺委员一人，掌管本部一切游艺事宜。

第 十 一 条 执行委员任期六个月，组长及本部^①书记任期三个月，均连选得连任。

第 十 二 条 委员会得酌量情形，得指派部员为各股干事，襄助各股事务^②。

① <规则>为“支部”。

② <规则>为：“委员会得酌量情况，派遣部员指挥各支部之干事，赞助各支部之事务。”

第四章 会 议

第十三条 全体大会，每一年一次，由委员会定期召集之。组长会议及支部书记会议，每月一次，由委员会召集之。有特别事故时，得由三分之一组长请求，或委员会认为必要时^①，由委员会召集临时会。

第十四条 小组会议每两星期开会一次，由组长召集之。支部全体会议每一月开会一次，由支部书记召集之。

第十五条 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一次，由委员长召集之。遇特别事务时，得开临时会议。

第五章 规 约

第十六条 本部部员必须遵守之规约如下：

- (一) 不得违反本会章程及各种议决案。
- (二) 不得分出地域、界限、职位等项。
- (三) 不得顾及个人私利，违反公共利益。
- (四) 不得有破坏本部和有碍部员之言动〔行〕。
- (五) 不得迟缴或不缴月费。
- (六) 不得彼此互相争斗、排斥、倾轧^②。

第十七条 凡部员有犯以上之规约者，经委员会审查，认为属实者，得令其出部。

① <规则>为：“如有特别之事故，经三分(之)一组长之请求，委员会认为必要时。”

② <规则>为：“不得有相互间之斗争或越轨之行动。”

第六章 部 务

第十八条 本部部务计分八种，(依需要之缓急，及能力之所及，其次第举办。)由执行委员会指定若干部员，组织各个委员会办理之。

(一) 补习学校，(二)讲演会，(三)合作社，(四)书报室，(五)各种游艺会，(六)储蓄会，(七)部员救济会，(八)职业介绍所。

第七章 经 费

第十九条 本部经费计分下列三项：

(一) 入部费 每人小洋一毛。

(二) 常月费 以部员工资为比例，十元以内铜元十枚，十五元以内小洋一毛，二十元以内小洋二毛。

(三) 特别捐^① 由部员及外界捐助之。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章程如有未尽善之处，得由全体组长会议三分之一提议，五分之三通过修改之。

第二十一条 本章程自本部正式成立日起施行。

(译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编《我国纺织业罢工事件与五卅事件以及各地的动荡》第一辑，1925年9月30日，第57—61页)

^① 《规则》为：“特别义捐”。

关于上海小沙渡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经过的回忆

嵇 直

正如大家所知，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开始于上海的反帝五卅运动，而五卅运动的发源地，正是一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小沙渡沪西工友俱乐部。现仅就这个俱乐部成立的经过，凭自己还能记忆的情况概述如下。

小沙渡位于上海西部，是日本帝国主义纱厂在上海比较集中的地区。自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就派李启汉（即李森）同志来此开始做组织和教育工人的工作，但不久因形势的需要，他便离开此地忙于支援香港海员罢工，领导浦东日华纱厂罢工，和为英帝国主义控制的上海邮局职工罢工。由于罢工获得了胜利，帝国主义者对启汉深恶痛绝，通过英租界工部局，用“煽动罢工”、“破坏治安”等罪名，先将他逮捕，后又秘密地解交给中国军阀淞沪护军使何丰林。而后者禀承洋大人的意旨，也认为这是个危险人物，将他投入龙华军事监狱，长期监禁。一九二二年秋，上海SY（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号）市委书记张秋人同志通知我说，组织上已决定派我去小沙渡继续启汉开始的工作，并且同时仍当做些学生运动的事，因此要我不进上海大学而转到南方大学去。于是从那时起，我就从闸北上海大学宿舍搬到这个工人区，在劳勃生路（现名长寿路）一家安徽人开的木材行楼上租了一间房子，并在南方大学当了个“挂名学生”。

启汉我是认识的，在他的领导下，我曾于上述两次罢工运动中做过一些工作，如印发传单，召集工人开会，鼓励他们团结起

来,坚持共同的要求。在支援香港海员罢工时,背着一个竹筒(这是我们当时做的,即将毛竹锯成数段,每段要保留上下两个节,只在一个节上凿一小横口,以便投入钱币),手持“援助香港罢工海员”的小旗,在街头巷尾向来往行人拦路募捐,等等。可是当他在小沙渡时,在什么地方办过工人学校,而最要紧的是,有哪些工友与他接触过,我就一无所知了。因自己没有经验,为摸点线索以便得到一些帮助,曾花费了许多时间,而结果并不乐观,但总信迟早定会有所发现,于是决定先到工人中去交朋友。

在戈登路(现名江宁路)转向劳勃生路的拐角上,竖立着一个露天邮筒,而在它的斜对面开着一家代售邮票的杂货铺。我就有目的地常到那儿去,混熟后便与它的老板商量,可否在他那“代售邮票”的招牌旁边挂一块用马粪纸做的“代写书信,不取分文”的广告,我每天下午来借用他一点空地方为人写信,并请寄信人买他的邮票、信封和信纸。他觉得有利可图,当即表示同意。我也就每天按时去“办公”。可是顾客虽然不少,但多为工人家属。不过也碰着了几个青年男工。我就对他们特别注意,乘写信的机会向他们解释学习文化对工人的好处。并说,如愿意,不妨找几个同伴来我的住所共同学习,我定尽力帮助。以后因见没有人来,我乃按照替他们写信时顺便记下来的各人地址作个别访问,并带到自己的住处,商议如何进行学习。就这样不但交到了朋友,还办起了一个工人补习班。人数虽只有四个,但我已觉得如获至宝。

开始学习的时候,就一再向他们说,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对我们劳动人民学起来没有味道。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一

套“死”书，更没有去念的必要。我们工人应掌握的是新知识，而后者只有从“活”的教材中方能获得。因此，我所准备的都是“活”的教材，大家在现实生活中，既能看得见，听得到，又能用得着，而且与自己皆有切身利益关系。

所谓“活”的教材，当然绝大部分是从我党刊物《新青年》、《向导》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的《劳动周刊》中找来，但有时也就地取材。就用这些教材，编成一个一个的课题，每星期讲三课。在每一个课题（如“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或“香港海员大罢工”）中，凡说到地名时，必定打开地图，指出方位，使人能一目了然。而有些词句（如“为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斗争”、“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啊”等等），除扼要解释清楚外，还写在纸上，教他们抄写。就这样几乎每上一课，他们都能增添一些有关工人阶级的新知识，学会一些生字，或知道一些地理常识，对此大家都尚满意。

后来鉴于来补习的工友逐渐增多，经获得张秋人同志同意后，我乃吸收了一个名叫徐玮的同学来分工合作，即他也在自己的住处办个补习班。凡住在劳勃生路以北和宜昌路的，就到他那儿去上课；而住在劳勃生路以南槟榔路（现名安远路）和海防路的，则到我这儿来上课。教材和教学方法大致相同。由于徐的态度和蔼可亲，讲起课来能引人入胜，工友们对他特别满意。

大概在一九二二年初冬的一个星期天早晨，我刚起来正忙着在汽油炉上做饭（每天早晨做一次够吃上下午两顿，那时在上海的外地穷学生，一般都是如此生活），忽然来了个不速之客，外貌象工人，也有点象职员，犹如老朋友一样，一进门便往床上一

坐,向周围注视了片刻,就亲切地问道:“李启汉到哪儿去了?什么时候还能回上海?你一定知道的吧?”当他见我有点紧张,没有马上回答问题,随即解释似地说道,他在同兴纱厂做过工,现临时在一家银行里当门警,但仍住在小沙渡。启汉在此办工人夜校时,他常去上课,并且按照启汉的指示,还到浦东日华纱厂联络过工人,“五一”游行也参加了。因听说我在工人补习班上讲的话,与启汉曾经对他讲的道理差不多,所以特来看看我,并乘机打听打听启汉的消息,等等。我见他态度诚恳,说话对头,也就轻松地随便与他攀谈起来,直到他起身走时,才问他的姓名以及愿不愿也来上课。他当即说:“我叫孙良惠^①,一定常来。”以后他果然常来,有时还带着他的朋友们来听讲。在上课时他总带头发言,用自己的体会和工人语言,帮助我解释问题。这给了我很好的印象,从而不禁使我一再想到:“启汉,启汉!你在此开的荒,下的种,并没有白费。看,我不是已经发现其中的一粒正在发芽成长吗?”

关于以上这些情况,我向秋人已反映过几回,并于最后一次曾郑重表示,我很想介绍孙良惠和徐玮入SY。当见他对此不加可否,我乃继续说道,徐玮我很早就认识,是海门人,会接近群众,有鼓动能力,因反对洋奴教育,一九二一年被苏州东吴大学开除。如今思想更有进步,经常与我交换阅读我党公开刊物,很想靠拢我们的组织,如对工人补习班的工作积极,就是明显的例证。至于孙良惠,据我的了解,他确实是个工人,年来因在工厂

^① 孙良惠同志,后来参加中国共产党,为沪西工友俱乐部负责人之一。

中反抗压迫和剥削，已被开除两次，现在某银行当门警，是出于不得已。他自己也认为这是替守财奴当看家狗，如不干，就又会失业。由于受启汉的影响很深，他已觉悟到，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共同斗争，才能获得解放，光靠个人反抗，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等等。倘若把这两个人吸收入我们的组织，则对目前在沪西开展工作，定会带来不少好处。听到这里，秋人才带着同情的口吻说道，此事还得研究一下，但约定了时间让我把孙、徐二人找到我的住处，当面谈谈，然后再作决定。当大家如期会晤时，谈得都很满意。秋人乃问孙、徐，是否真诚愿意参加革命组织，严格遵守纪律，为社会主义奋斗终生。他们的回答都很庄严而又肯定（在此不妨顺带说一下，后来由于任弼时、邓中夏、项英诸位同志的不断培养，和个人具有的艰苦奋斗精神，当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革命高潮时期，孙良惠和徐玮两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在上海都做了很多工作。一九二五年五月孙曾代表上海工人参加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执行委员。徐玮在一九二七年，当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成立上海革命政府时，曾当选为代表青年的委员。而在“四·一二”反动政变后，孙、徐都先后为党的事业壮烈牺牲，也从而忠实地完成了自己加入革命行列时所宣称的誓言）。于是秋人便说，孙、徐二人从今就算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团员，并成立上海SY第四支部，由我们三人组成。大家随即又公推我当支书。就这样总算在沪西小沙渡地区开始有了一个只具雏形的SY基层组织。

在上面已经说过，在这个地区此时已办起两所工人补习班，

但工作总开展不起来。如与当时的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相比,那简直望尘莫及。在支部里就这种情况曾研究过好多次,总认为两个班的共同缺点就是,工友们有时来得多,有时来得少,流动性太大。当然,在我们宿舍里上课,对他们的出入有许多不方便。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们不是集中在一个企业工作,而是来自内外棉四厂、五厂、八厂、九厂以及其他工厂,早晚班又多不一致。虽然按照居住地区把他们分成两组,可是问题并没有获得解决。即使从总的方面来看,与我们有联系的人数比以前多了,可是这种联系并不巩固,而且仅仅限于男工。与为数众多的女工,则连一个也没有接触过。此外,当时在小沙渡的一些工厂里,如在上海其他许多工厂一样,虽然有时发生过各种类型的劳资冲突的事件,但很快就被压制下去,总是扩大不起来。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同兴纱厂曾有一个女工,下班经过厂门时屡受一个印度巡捕的污辱。一回到家就痛哭不已。她的哥哥(也是工人)忍无可忍,乃约好几个同伴,于一天傍晚等着他妹妹下班又被调戏时,就一拥而上,把这个印度巡捕痛打了一顿。由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污辱女工而又受不到任何惩罚,已不是偶然现象,所以当时目睹这事的群众莫不称快。但很快就有两个工人,因这次殴打事件而被捕。我们得到这一消息后,随即写了许多口号如:“打倒帝国主义”、“反对人身搜查”、“改善工人待遇”、“释放被捕工人”等等。带着几个来补习班上课的工友,到同兴纱厂工房等地张贴,并分别在两处举行了露天演讲,以期激起公愤,联合起来,共同奋斗。可是我们的目的并未达到。这就是说,在任何工厂里,如果那儿没有我们的组织,除工人的自发行

动外,不管大小工潮,都是不易掀起来的。

为了开展工作,我们曾把上述情况经常向组织上作了反映,并提出过一些建议。记得秋人还先后带着任弼时、邓中夏两同志来我们这里作过亲身的了解。一九二四年春,组织上终于决定,同意我们团支部意见:在适当地点,另找一所比较宽畅些的房子,把两个补习班合并成为一个工人补习学校,分日夜两班上课,以便工友学习,并在课余时安排一些文艺活动。与此同时,应设法分别在工厂里建立职工小组,每个小组先有两三人也行。至于要求增派女同志去工作一事,待以后有可能再说。

根据这一指示,孙良惠就在小沙渡路槟榔路口新建的一群平房中租下一套三间,两间作为日夜班课堂,一间作为文艺活动场所。所需桌凳和乐器,主要也是由孙良惠和几个热心的工友,向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那里临时借用,或从自己家里拿来。而徐玮不等一切布置完全就绪,便在大门左旁贴上一张写着“小沙渡沪西工人补习学校”字样的大纸条了。

这样一来,在工作中逐渐出现了一些新气象,虽然流动性仍然很大,而来上课的人比较多了,并且又都不象从前到我们宿舍时那么拘束。每天下课后还总有人留下来,或谈话,或下棋,或玩弄乐器。经过一个时期,在个别工厂里也开始有了二三人的职工小组,如在同兴和内外棉四厂的小组,就是孙良惠首先串连成立起来的。每当市团委要我们在本区内散发什么传单,或到什么地方集合参加什么运动,支部总能带着一些工人去执行。虽然这些活动当时还不多,但大家在参加的过程中,都表现了工人阶级应有的觉悟和组织性。为联络群众,有时还举行晚会,节

目虽很简单,如由徐玮和几个工友合编的双簧和小曲,但因内容都是讽刺资本家和官僚的,演唱起来,都曾受到大家的欢迎。

一九二四年夏,有一天,秋人约我去会见一个人,经介绍才知道就是项英(即项德龙)同志。听取我的汇报后,秋人便说,中央决定在小沙渡组织工人俱乐部,要我们支部从中帮助。当即商妥,先由项英同志到我们那里就地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再作具体安排。我回来后随即将这消息告诉了孙良惠和徐玮,对此大家莫不欢欣鼓舞,认为今后工作定能得到开展。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我把项英同志带到补习学校,与早在那儿等待的孙、徐见面,并到处观察了一下,然后一起来到我的宿舍。项英乃对我们说,就在学校现有的基础上成立“小沙渡沪西工友俱乐部”,在这个星期天就召开成立大会,选孙良惠当主任并负责在各厂组织职工小组的工作,徐和嵇照旧进行教育和文艺活动等事宜。此外,还应选两三个工人当干事。在这几天内,团支部应做的筹备事项是,尽量宣传成立俱乐部对工人的好处,并把安源煤矿俱乐部如何维护工人利益,作为例子向工人解说。工友俱乐部的章程可准备几条,其中关于宗旨一条,概称以团结互助、增进知识、改良待遇为主。其经费一项,应指明由个人自愿捐助,等等。于是我们就按照指示,分头进行。

当举行成立大会时,到会者约三十余人。会议由孙良惠主持,项英讲演,徐玮招待,我当记录。后即根据项英的讲话精神和大家的发言,把我们准备好的几条俱乐部章程草案,略加修改,由大家一致通过。并照章公举孙良惠为主任,我为秘书,徐玮和两个工友(其中一个失业工人刘贯之,因他当时表现积

极,又有空闲时间)当干事。于是进行募捐,作为俱乐部的经费。当时我就把自己的硬边草帽反放在主席桌上,请大家随意捐助,但失业者可以暂免。捐款为数虽不多,可是到会者对成立俱乐部表现的热忱,却很令人兴奋。上海小沙渡沪西工友俱乐部,也正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宣告诞生了。

过不多久,约在一九二四年的十月间,遵照组织上的决定,我便离开了上海。当我于一九二五年六月间重返上海时,虽在时间上相隔只有七、八个月,可是随着革命潮流的高涨,由于党的坚强而又正确的领导,加上许多后来的同志,如刘华等等的英勇奋斗,这个上海小沙渡沪西工友俱乐部,已不是象成立时那样,只拥有几十个工人的组织,而竟成为伟大的“五卅”反帝运动的策源地了。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于北京)

(原稿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刘贯之同志关于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回忆

一九二四年八月间,刘贯之在小沙渡戈登路口租得房屋三间;九月一日,在这里举行俱乐部成立会,由孙良惠约来几个朋友给我们工人介绍,其中一位名叫项英,说是印刷工人,其他三位叫刘华、顾秀、江元清,说是上海大学学生。我当时打量他们几个人,觉得项英虽然工人打扮,但行动举止派头都像个知识分子,气派很大,不像个印刷工人;刘华长得很俊秀漂亮,确实是好学生,这些人都给我们工人一种极其良好的印象。大家经过商量之后,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担负俱乐部的事务,并推委员

会负责人如下：

项 英 委员会主任
孙良惠 委员会副主任
刘 华 委员会宣传委员
顾 秀
李瑞清 委员会组织委员
刘贯之 委员会总务委员

宣布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宗旨为：“互相帮助，共谋幸福”，当即请项英同志写成横匾，张贴在俱乐部的中堂。

随即举行第一次委员会，议定试办下列工作：（一）征求俱乐部会员，会员资格暂定经过两人介绍并每月缴纳会费一角；规定会员互相保密，不对外公开会员姓名。（二）开办工人识字班，工人夜校补习班，入学的人不限定会员，凡是工人均可入学，一律不收学费；聘请刘华、顾秀、江元清等同志担任教员，均为义务职，并指定刘贯之常住俱乐部。

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工作方针，是运用宣传工作来开展组织工作。开设工人识字班，文化补习班，讲演会等都算作宣传工作。

工友俱乐部这块招牌挂出之后，很快就在沪西工厂区传开了，很多工人陆续不断的前来戈登路工友俱乐部打听，有的询问俱乐部是什么作用，有的询问参加识字班或补习班的手续，有的想找俱乐部的人谈天。刘华同志在工友俱乐部担负主要责任，处理一切事务，从清早来到俱乐部，要深夜才离开俱乐部返回他的住处休息。

工人要求参加识字班的非常多,因为房子太小,虽然按一小时一班分成好几个班,仍难满足工人的需要。文化补习班也是一样的应付不暇,因为补习班只开两班,乘着识字班空出的时间上课,所以更觉紧张。担任教学的几位同志,每天都是忙得吃饭时间都不易空出来,休息就不用说了。看到工人要求学习这样踊跃和急切,项英同志建议改变宣传方法,一方面继续识字班和补习班的工作,一方面开办讲演会,宣讲故事、时事,以及有关工人利益等项目。讲演会不一定在俱乐部房子里举行,有时借用附近的空房子,有时利用附近的空地或行人来往较少的街道,地点随时决定。讲演会发生的功效比识字班还大,容纳人数较多,宣传的内容可以多种多样,工人很欢迎。

刘华同志很会说话,工人都喜欢听他讲演。记得有一次刘华讲一个女工遭受资本家虐待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引起了不少听讲的人流出眼泪。又有一次刘华讲述某工厂一个洋人监工如何辱骂工人,毒打工人,把工人不当人看待;当时有一听讲工人表示极端忿怒的高声喊道:“我们去打死这个狗腿子”,许多工人连说:“对!对!”

由于俱乐部的宣传工作做得好,所以自动请求加入俱乐部的组织的人一天天增多。首先在同兴纱厂组织几个小组,不到四十天,同兴纱厂工人秘密加入俱乐部的就有三百多人了。内外棉三厂、内外棉四厂、内外棉九厂和日华纱厂等日本纱厂都跟着同兴纱厂陆续组成了俱乐部小组。中国资本家办的几个纱厂也有少数工人秘密参加了俱乐部组织。到当年年底统计,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内,有十九个纱厂建立了俱乐部的秘密组织,

俱乐部会员将近两千人。

在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的同时，从俱乐部会员活动分子中挑选了一批骨干特别加以培养，其中主要的人如同兴纱厂工友郭尘侠、李振西、韩阿四等，内外棉三厂工友陶静轩、孔言南(女工)等，内外棉五厂工友王有福等，都是后来上海工人运动中的中坚分子。担任培养工人骨干分子的工作是专由项英同志直接负责的。项英同志分批分组集合骨干分子谈话，开会，耐心教育，灌输一些爱国知识和争取人格、争取应有生活福利的斗争知识等等，启发了工人的阶级觉悟。有的工友表示，应该对东洋资本家进行反抗。有的工友说，俱乐部讲演的先生不是时常说过吗，说是工人团结起来就是力量，我们工人应该团结起来，大家一条心，大家一致行动，就可以反抗东洋资本家对我们工人的虐待了。因此，工人们非常喜欢俱乐部的先生，并且积极希望俱乐部的先生替工人出些好主意。

项英、刘华等同志很重视工人所提出的“最好能够替工人出些主意”这一点，并且根据这一点，认真细致的研究了俱乐部今后工作方针。

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影响，已使日本资本家严重注意。同兴纱厂的工友有的曾遭到监工或工头的警告，劝戒不要到俱乐部去玩耍，因为资本家无法侦知那个工人加入了俱乐部，所以只能一般的提出警告，这是东洋资本家对工友俱乐部进行破坏阴谋的形式之一种。我记得阳历过年的前几天，曾经有人到俱乐部识字班和讲演会捣乱，那时还未曾警觉到这是资本家的阴谋。后来日本监工一再劝告刘贯之不要住宿在俱乐部，并愿意给刘贯

之找较好的住宿房子,这时才初步警觉起来,认识到这是资本家企图破坏工友俱乐部。但是,东洋资本家的这些打算都失败了,工人爱护俱乐部的热忱不但没有降低反而逐渐增加,俱乐部在工人群众中所起的影响天天在扩大和深入。

沪西工友俱乐部在上海工人运动的历史上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因为共产党的组织是从这个俱乐部而开始打进产业工人群众中的(在这以前,共产党的组织还是以学界为主要发展对象)。例如,同兴纱厂以及内外棉三厂五厂等,都是由各该厂的工友俱乐部会员中加以选择和培养然后发展为共产党小组的。

(刘贯之:《关于1924—1925年上海工人运动的回忆》第一节〔节录〕,
《中国工运史料》1960年第1期,工人出版社出版)

顾汝航关于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回忆

有一天,大约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阴历),孙良惠来找我,说有一个俱乐部,免费教工人读书、看报,还可以练武术,问我去不去。我那时是内外棉五厂粗纱间乙班总管拿摩温,一字不识,但最喜欢听人讲报,听说有人教识字看报,正中下怀,至于练武术,那更有兴趣,于是我就跟孙到俱乐部去。我记得去过两次(俱乐部在槟榔路转角上),都是日班放工后去的,第一个晚上去,俱乐部没有什么人,是项英和我谈话的;第二次晚上去是邓中夏、刘华和我谈的,他们向我谈了许多道理,如中国工人要团结起来反抗日本老板,改善待遇等等。那时我曾听到俱乐部不要拿摩温的说法,我就问刘华是否这样?刘华说,这话也对也不

对。俱乐部所以不要拿摩温，因为大多数拿摩温是站在工人对立方面的，是帮日本人欺侮工人的，如果是肯帮工人做事的拿摩温，肯站在工人方面的，我们当然还是要的。我听了很高兴，就这样加入了俱乐部。以后，我还发动了不少工人加入了俱乐部。

(摘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九六五年一月访问顾汝舫记录)

姜维新同志^①关于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回忆

我是一九二四年初去沪西工人半日学校学习的。学校在劳勃生路以南，东京路以东。学校的房子是个矮楼房，上课在下面，办公在楼上。听说是孙良惠找的房子。有时老师叫我们到楼上去谈话。学校门口贴着一张纸写的“沪西工人半日学校”的牌子。说是半日学校，其实我们上课只有两小时。教科书是学校发的，老师也不一定照课本讲，主要是进行阶级教育。

一起读书的大约有几十个人。和我一起去的有内外棉五厂工人陶汉和(坐牢死)、李宝林(被枪毙)等，记不清了，很多人都牺牲了。

教书的有项英、孙良惠，还有邓中夏等，还有一些大学生，是轮流来的。以后学校发展为俱乐部，来的人更多了。刘华来教了约一个月，即发生二月罢工。

俱乐部成立后，形式上仍上课，但我们一些骨干分子每天忙着开会、宣传，已不能安心听课。为了工作上的需要，我急切

^① 姜维新同志是内外棉五厂老工人，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希望多认识一些字。我曾建议多印些通俗易懂的传单，最好是印些图画发给工人看。后来组织上常把一些通俗宣传品（包括画刊）和《向导》一起发给我们，这样，我们向工人宣传就方便多了。

（摘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九六五年一月访问姜维新记录）

日人关于沪西工友俱乐部的记载

平素被认为不足信赖的工部局警察（巡捕房）之所以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取缔措施，是由于它理解到：事件的爆发点不仅仅在于近来已获得谅解的内外棉公司，也不单单是劳资问题，而是在于工部局从最初起就看到了这是由于共产派的过激运动（参照“俄罗斯共产党的魔手”节），并且非加以抑止住不可，同时估计这一事件对英美各国的事业上也将有影响。但是另一方面，职工们在大正十三年十月就成立的沪西工友俱乐部逐步发展起来。当时作者早就知道了这件事，预感到这个工会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曾向工人加入工会最多的内外棉当局提出警告。这一工会是陈某^①最初注意到有三万多工人居住的小沙渡附近地方，他认为以这里为中心，可以使内外棉、日华、喜和、制麻、同兴、绢丝、丰田等以及其他华商纺织厂大约五万多工人加入该工会。他开始使从内外棉解雇出来的他的朋友四五人加入工会，同时又声称要办夜校吸收了十三四人，教师是附近的上海大学和大夏大学的学生四五人，学生不交费用，

^① 陈某疑有错误。可能指孙良惠，因孙、陈音相近。

教师则口头讲述社会主义和劳动问题。啊！这是谁也不曾想象到以后造成了大罢工以及展开了引起世界注意的南京路事件的吧！

(译自宇高宁《支那劳动问题》，第593页)

杨树浦工人进德会的活动

一九二四年下半年，有蔡之华（湖南人）等在杨树浦眉州路永安纱厂后面，办了一个革命团体“工人进德会”，以提倡工人福利为号召，在沪东纱厂工人中进行工作。据十七厂^①老工人回忆，当时在工人进德会工作的，除蔡之华外，还有一个男的跛脚和女的剪短发的^②。当时只知道他们是学生，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派来工作的。同年十月，清花间工人金才子（一九六二年退休）等看到“工人进德会”的传单，就找到那边去要了一批传单回来散发。以后，裕丰纱厂工人每逢星期例假，就三三两两的到“工人进德会”去玩，有时在那里听讲演或看话剧。蔡之华等当时向他们宣传工人怎样受资本家压迫，工人团结有力量等道理。一九二五年一、二月间，“工人进德会”里的剪短发女学生到大康纱厂参观，在向群众宣传时，被日本人报告杨树浦格兰路捕房捕去。裕丰工人知道这消息后，就立即集合了数百人，与大康、同兴、上海三厂（即现在的上海第十二、十、九棉纺织厂）等厂工人一起到捕房要人，结果被帝国主义用自来水龙头注射冲散。工人进德会在当天被帝国主义走狗陈海标（安徽人，是捕房包

① 今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一九二四年时为日商裕丰纱厂。

② 即该会之女教员吴先清。

探)等捣毁,跛脚者也被捕去(当天即释放),蔡之华则暂时隐避起来。这是裕丰工人最早的一次斗争。

(《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人斗争史》初稿〔节录〕)

二、二月罢工的爆发和扩大， 工人的英勇斗争

(一) 日商内外棉各厂全体工人罢工

内外棉八厂工人首起罢工

据内外纱厂工人之宣言及丰田纱厂工人代表之报告，谓二月二日，内外第八厂夜班粗纱女工，有于出厂前半小时倚机假寐者，为管理日人所发见，大发雷霆，拳足交加，遂致损伤女工腿部。众工见之，咸以日人虐待过甚，大抱不平，然以慑于积威，没如之何。旋因女工之姊，向日人理论，亦遭批颊，男女工始皆愤不可遏，群起而向日人交涉，亦声明当局如果庇护，虽停止工作，亦所不惜云云。不意日人即以此语为根据，谓汝辈既无意工作，尽可出厂，因将粗纱部五十余工人全体削除工籍。嗣日班工人到厂，虽表同情于被斥工人，尚幸无意外举动。比至四日，被斥工人赴厂结算存工，日人复不肯发给，且将为首工人送入公廨。七日竟判一人监禁，五人训斥。第八厂全体工人至是遂蠢然思动矣。此大工潮之原因也。

(《日商纱厂罢工记》〔节录〕，原载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第6卷第1期)

本埠小沙渡内外棉纱厂,系日人所设。二日下午,该厂开除第八厂粗纱间甲班工人约五十名,其原因关系工人与管工早有龃龉,致解〔遭〕厂家之忌,久欲开除;此次以换用女工^①为名,先将甲班全数停工。乙班工人见之,前晚未入厂上工。昨日(二月四日)甲班工人要求算还工资,乙班依旧入厂,皆为厂家所拒绝,并捕去工人周保之、仇玉福、钱建扬、蒋思俊、杨阿四。又前日下午工人许福铨行经该厂门首,为该厂中人瞥见,即拥入厂禁锢,先后共捕去六人。

(《民国日报》1925年2月6日)

第五(东、西)、七、十二厂工人继起罢工

小沙渡日本内外棉纱厂之第五厂、第七厂、第八厂、第十二厂,昨日下午四时忽发生全体工人九千余罢工之风潮。

据工人方面申述原因,为每日工作时间十二小时以上,工钱很少,管理之日人又动辄殴打罚钱;本月二日又无故将第八厂粗纱间工人四十名全部开除;四日工人去领工钱,又拒不发给,且将工人代表拘押云云。

其要求条件则为:一、以后不准打人;二、按照每人原有工钱加给十分之一,并无故不得克扣;三、恢复第八厂开除之工友,并立即释放扣押之工友;四、以后两星期发工钱一次,不得延期;五、罢工期间以内的工钱,厂里须照常发给;六、以后不得无故开

^① 据该报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二日报道,是以养成工代替男工。

除工人。

昨日下午四时,各厂工人在厂内散发传单,停止工作,厂中办事人立即关闭厂门,并通知捕房派中西探捕弹压。但工人已蜂拥而出,过苏州河,至对面之大丰纱厂附近空地开会演说。不知此项风潮将如何结果也。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0日)

第九、十三、十四厂工人参加罢工

前日下午开始罢工者已有五厂,昨日上午又有三厂继续罢工。前日罢工者于昨日十一二时即至未罢工之数厂^①前传递信号,竖大旗,上书“反对东洋人打人”等字,并发有传单,在厂工人亦即蜂拥出厂。当时该厂已通知捕房,并下手拦阻,以致稍有冲突,工人被捕十余人。工人即在旷场上集会演说,并分队组织。工会方面并致函捕房及警察区署及当地绅商,说明工人罢工之理由及苛虐之真情。再则捕房曾派捕探多名,监守沪西工友俱乐部。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1日)

兹悉此次罢工原因,系西苏州路日商第五纱厂之工人,以上星期六(七日)日商第八纱厂控工人许阿大等六名煽动罢工,经捕房拘解公共公廨讯办,故出而援助,乃于本星期一(九日)晚间决定罢工,加入者有五百余人。前日(十日)上午,罢工之工人二

^① 指内外棉九、十三、十四厂。

百余名,各持“内外棉厂全体罢工”之白旗及铁条、木棍、竹竿等物,拥至麦根路日商第九纱厂、劳勃生路日商第十三、第十四各纱厂,迫令各厂工人取一致行动,将厂中机器、电话、玻璃门窗等什物纷纷捣毁,并将各厂之监工日人数名殴伤,复散发传单。当时各厂大班见此情状,即报告普陀路捕房,由捕头福来率同五十二号西探及华探目沈崇礼,包探陈广义、荣锦林等通班探捕驰往各厂弹压。当场拘获苏言才、沈子良、董小秋、张长坤、王浦定、汤锡春、刘秀林、郑布远、周光卿、李兴生、许金台、季小四子、张荣、姜文宣等十四名,连同所执之旗帜、器械、传单带入捕房。昨晨解送公共公廨请究。有沪西大夏大学教员王祉伟到堂供称:逮捕之张荣,系我校学生,昨被误拘,请求交保出外。经关谘员商之英领马君,以原告系日商,判张荣准交二百元保,余人一并押候礼拜六(十四日)日领堂期解讯。现第十三、四两厂仍照常开工,惟西苏州路第五、七、八及第十二各厂,前昨皆未开工云。

(《申报》1925年2月12日)

养成工全体参加罢工

该厂日人,平日即养有一批练习女童,谓之养成工,其计划乃以此等日渐长成之养成工调换“不安分”之男工。此等养成工既大半系女子,且受厂中训育,一方面技术已熟,别方面当然较外来工人驯服。此次罢工之近因,即出于第八厂以养成工调换男工,开除四、五十人。厂中方以为养成工当不致连带罢工,然至前日晚,此等养成工亦已全数加入,并推有代表至工会。罢

工工人自得此项援助后，意志更为坚决，今方着手于内部之团结。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2日)

内外棉其他各厂工人陆续罢工

昨日，小沙渡路内外棉纱厂罢工工人方面仍甚坚决，且似已激起当地绅商居民之注意。前昨两日，曾有老妪数人至工会帮贴传单，制旗帜等事。又有一大夏大学学生被捕。罢工风潮，显已扩大。至工人方面，内外棉十一厂中^①，截止昨晚，已有十厂完全罢工，惟第十五厂六百余人，因防守严密，故尚未动手。据一第十五厂工人云，彼等昨早入厂，本欲略相商议，通知全体即行退出。后日人将铁门严锁，并系上四百磅电力之电线，又用自来水管冲散外来之工人，因此彼等只得隐忍，云云。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2日)

小沙渡内外棉十一厂昨日已完全罢工，最后罢工者为第十五厂。工人向例在厂午餐，昨日第十五厂工人并未携饭具进厂。午刻，厂中因防工人出厂午餐后即行罢工，故运面包入厂。然工人趁午饭休息时，群起讨论，金谓其余十厂均已罢工，我等尚在此工作，太无义气，坚持欲立刻出厂。群与厂中管理员争执，自一时至三时，管理员无法维持，始开门放出。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3日)

^① 内外棉株式会社在沪共有十一厂，即三、四、东五、西五、七、八、九、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厂。如以九厂分东、西厂计，则有十二厂。

沪西工友俱乐部号召罢工的传单

内外棉厂的工友们！

我们在日本人厂里做工，真是十分苦呀！每天要做十二小时以上的生活，赚的工钱却是很少。一点不好，日本人就是拳打脚踢。一点小错，就要罚钱。日本资本家真把我们中国工人看作牛马奴隶一般，要打就打，要罚就罚，不管我们工人的死活，不讲人道，毫无公理。本月二日(二月二日)又无故将第八厂粗纱间的工友全体开除。四日他们去领工钱，日本人不特不发工钱，还把他们的代表捉进厂里去，再送到巡捕房去吃官司。日本人真把我们不当人呀！工友们！每年厂里赚的几百万元，都是剥削我们工人的。日本人吃了我们的血，还要剥我们的皮，真是岂有此理！工友们！日本人真是迫得我们没有路走了。现在只有大家齐心协力罢工，反抗日本人的虐待，要求厂里承认我们的条件：①

- 一、以后不准打人；
- 二、按照每人原有工钱增加十分之二；
- 三、恢复第八厂被开除的工友；
- 四、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
- 五、罢工期内的工钱，厂里须照常发给；

① 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所藏内外棉厂全体工人宣言，提出的条件如下：一、以后不准打人；二、按照每人原有工钱加给十分之一，并无故不得克扣；三、恢复第八厂被开除之工友，并立即释放被拘押之工友；四、以后两星期发工钱一次，不得迁期；五、罢工期间以内的工钱，厂里须照常发给；六、以后不得无故开除工人。

六、以后职工非犯通奸、斗殴等事者，不得开除。

工友们，大家齐心呀，一定要厂里承认我们的条件，我们才有生路。工友们，大家齐心呀，一致罢工，坚持到底，反抗日本人的虐待，达到最后的胜利！

（译自宇高宁《支那劳动问题》，第637—638页）

内外棉纱厂工会发表的罢工宣言

最亲爱的同胞呀！我们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你们也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比如亲兄弟亲姊妹是一样的呀！现在我们受外国人的种种虐待，不得已而出于罢工。此事有关于国家的体面，同胞的人格，务求各界同胞，竭力加以扶助呀！

我们二万余工人同胞，多年在东洋人办的内外棉纱厂内做工，血汗流出来的金钱，都被东洋人坐收去了。他们把此项刮来的金钱，逐年开设新厂，从第一厂开设到第十五厂，都是我们工人同胞的血汗给他造成。他们不但不感激我们，反还要虐待我们。他们虐待我们惨状，真是笔难尽言。今约略举其数端：东洋人纵容他们日本走狗做监工、管理员的，让他横行胡闹，随意无故乱打我们的工人同胞，有时打得头破血流，还要送去吃官司；或是借故克扣我们工人同胞的工钱；无故或是借故开除不合其意的工友。工资照章本是每两星期发一次，往往延期，有时延到一个星期以上。我们工人同胞，都是靠血汗去换来的工钱去买米做饭吃的，他们反拿我们的工钱到银行去生利息，使我们拿重利去借钱或当衣来吃饭。此外，东洋人还要强迫我们每月将工钱储蓄一些存在厂里。我们的工钱已经是不够开销，哪能有储

蓄？把应得的工钱储蓄起来，而家中不够开销，反再向外面出重利去借钱用，这是我们顶苦的事。并且这一笔储蓄的钱，我们工人有疾病丧葬时，厂里并不曾提出来给我们工人用。我们的血汗工钱，储蓄在他们厂里，不拿来救济我们的急难，储蓄起来是什么用意？有什么用处？岂不是巧立名目来克扣我们的血汗工钱吗？唉！这种虐待我们工人同胞的事实，说来真是要令同胞们气死。譬如这一次他们东洋人把我们第八厂粗纱间的工人同胞无故开除百余人，工钱不给。我们被开除的工人同胞去向帐房领工钱，厂里反把我们工人的代表七人捉到巡捕房里去。这样的事，岂不是十二分的欺侮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吗？并且他们日本人，时常骂我们中国工人为“贱种”，为“亡国奴”。因此，我们忍无可忍，所以九日下午不得不举行大罢工了。我们的目标，就是八个大字：“反对东洋人的虐待！”这是我们为国家争体面、为同胞争人格的事。所以我们是非常保守秩序的，我们的工会组织非常严密，我们工会里办事人非常负责任。盼望军、警、商、学、工、农各界同胞，念同胞之情，顾国家的体面，共同起来援助我们，为国家争光荣，为同胞争面子，这才是大中华民国的国民，这才是最亲爱的同胞。倘有甘心去做卖国贼的败类，为外国人的走狗，来干涉我们的自由权，来破坏我们的进行，就是我们二万余工人的公敌。特此敬告各界同胞鉴察。内外棉纱厂工会全体工人敬启。

附录我们向东洋资本家要求的条件于下：

- 一、以后不准打人；
- 二、按照每人原有工钱加给十分之一，并无故不得克扣；

- 三、恢复第八厂被开除之工友,并立即释放被拘押之工友;
- 四、以后两星期发工钱一次,不得迁延期;
- 五、以前所有储蓄金,扫数发还工友,储蓄赏算为工钱,按期发给;
- 六、以后不得无故开除工人;
- 七、罢工期间以内的工钱,厂里须照常发给。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1日)

内外棉纱厂工会敬告各业工友书

各业工友们!我们是日本人所办内外棉纱厂的工人。我们与你们都是不做工没有饭吃的苦同胞。我们所受的痛苦,大概与你们的相差不远,不待我们多说,你们一定是懂得的。不过我们有一点不同的,就是我们的东家是东洋人。东洋资本家非常可恶,看待我们中国工友如同“亡国奴”一般,随时任意打骂,无故克扣工资,开除工友。所以我们到忍无可忍时候,就大家起来一齐摇班了。于今罢工已有四天了。我们二万多的工友同胞,大家都非常勇敢,并且已经组成工会,一切都在会中公决进行。

各业的工友同胞已有许多表同情,来帮助我们的了。还有许多还不知道我们这件事的原委的,所以要说说给各工友们听。东洋人一向虐待我们是不必说了,只说本月一号东洋人无故开除我们的工友百余人。这些被开除的工友们去领工钱,不但工钱拿不着,反被厂中的东洋人唆使巡捕、包探将我们工友的代表拿了七人去吃官司,因此激动了众怒,就在二月九号下午四时宣布了同盟罢工。现在加入罢工的共有二万多人。这几天东洋资

本家不但不答应我们的要求，而且更加用高压手段来对付我们了。他们强迫六、七百养成工(女童工)做工，将电网布满窗门，谁要是开门出来，便触电身死。

各业工友们呀！资本家总是只想赚钱，一味剥削我们。外国资本家靠着自已政府的威势，更加压迫我们中国工人。我们中国工人同胞应当大众联合起来抵抗他们。各业工友们呀！我们的力量，就是万众一心，万望各业工友大家联合起来援助我们。这是谋我们工人自身的利益，这是争我们工人同胞的人格。内外棉纱厂工会全体工人启。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4日)

(二) 其他日商纱厂工人纷起响应， 举行同盟大罢工

日华第三、四厂工人罢工

小沙渡内外棉厂罢工，延长五日，迄未解决。日华纱厂工人前数日曾派代表至内外棉纱厂工会接洽。至昨日早八时，日华第三、四两厂工人即相约出厂，发表宣言及要求条件。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5日)

日华纱厂罢工宣言

同胞们！

我们真苦呀，我们受东洋人的虐待已经够了。我们天天做十二点钟的工，工钱本来是少到极点，现在柴米一天天的贵起来，

工钱却丝毫不加。不但如此，以前一礼拜有一天赏工，现在东洋人却破坏旧例，改为每月赏一工，还要工人整月不停工才有。照例我们的工钱，两礼拜发一次，东洋人却总是压着不发，每每压到三礼拜再给一次。

我们在厂里整天立着做工，橙〔凳〕都没有坐。我们做工做得很疲倦，有时一瞌睡，稍微一弯腰，东洋人便拳打脚踢，并且还要罚扣工钱，再不好连生意也要停掉。我们每天自己带去的早饭，东洋人不准我们吃，定要等到十一点半停车时才得吃。

我们在厂里要是发了病请假，东洋人总不让我们立刻出厂，还诬我们是装病。而且在病中我们的工钱，总是打折扣发给我们的。

我们从前粗纱间工人三个人管两部车，现在改为一个人管一部，因此无故开除了不少的工友。在工厂里的工友，工作重得做不下来。

我们的痛苦真是说不尽呵！我们要求东洋人加我们一点工钱，不要虐待我们。但是东洋人那肯理呢？我们一直忍着痛苦，现在小沙渡纱厂工人也因为东洋人虐待，他们摇班了。我们全工厂的工友听了，大家也齐心起来一致摇班。我们摇班的宗旨如下：

- 一、每天工钱加十分之一，并且不得无故克扣；
- 二、赏工照旧例每星期赏一天，不得更改；
- 三、工钱按旧例两星期发一次，不得延期；
- 四、不准打人，并不得无故罚钱；
- 五、生病及有事故请假时，工钱须当天结算发结〔给〕，不得

押善〔着〕不发；

六、在摇班期中工钱照常发给；

七、不得无故开除工人；

八、援助内外棉纱厂全体工友达到要求条件的目的。

同胞们呀！以上八项是我们最低限度的要求，誓一致坚持，必达到目的才上工。我们点点滴滴的怨泪，饱受东洋人欺侮，苛待，不得已我们摇了班。现在班已摇了，还要望同胞们一致起来援助我们呀！

日华纱厂工会全体工人三千余人宣言

正月廿二日〔二月十四日〕

(原件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大康第一、二工厂工人罢工

杨树浦大康纱厂第一、二两厂工人四千余人，因该厂近来减人加工，工人大起恐慌。昨日早四时，工人一致罢工，提出七项要求(下略，七项要求详见下面该厂号召罢工的传单)。

当发动罢工时，有一工人被巡捕拘往捕房，三四百工人随之拥至捕房。旋由捕房将工人驱散后，工人咸蜂拥至华界开会，约有三千余人到场。开会有四点钟之久，当场组织各团代表会及纠察队六十余队。散会后，又派代表至警署声明罢工理由。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5日)

又杨树浦大康纱厂第一、二两厂工人四千余人，因该处近来减人加工，工人大起恐慌，并又素来感受日人虐待，一闻小沙渡

工人罢工反抗日人，亦多磨拳擦掌，跃跃欲试。及至昨日早四时，罢工终于爆发。

(《时事新报》1925年2月15日)

大康纱厂号召罢工的传单^①

工友们：

我们在大康纱厂做了多年生活，东洋资本家剥削我们赚来的钱，何止几千百万，我们工人却是痛苦万分。每日要做十二点钟以上的工，赚的工钱，还是不够食用。东洋人还把我们不当人，说打便打，说开除便开除，不管我们的死活。更可恶的，我们的工作，加了几倍，工钱还是一点没有加。从前一人管一部车的，加到一人管两部车了，现在还要加到一人管三部车。工友们！我们工钱这样少，工作这样苦，真是做了东洋人的牛马奴隶一样呀！工友们，东洋人压迫我们真是到了极点，惟一的办法，只有大家齐心，一致罢工，反抗东洋人的虐待，必须要求厂里承认我们的条件。

- 一、不得裁减工人，并不得借故开除工人；
- 二、以后厂中不能打人；
- 三、不得多罚工钱；
- 四、照原有工资加给十分之一；
- 五、开除中野，永远不得任用；
- 六、工人自愿退工者，工钱不得充公；

^① 据《民国日报》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五日报道，这张传单是在二月十四日散发的。

七、厂里须切实注意卫生(如马桶必须加盖,吃的水必须烧开)。

以上七条是我们最应〔低〕限度的要求,必须完全达到目的。工友们!内外棉厂的工友因受了东洋资本家的虐待,二万余人大家一条心,起来罢工,反抗东洋人的虐待。大康更是东洋纱厂中虐待我们中国工人最利害的,我们尤其要齐心,反抗东洋人的虐待。工友们齐心呀!反抗东洋人的虐待!达到最后的胜利!

大康纱厂全体工人

(原件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铅印,无题)

丰田纱厂工人罢工

兹据调查所得,该厂待遇工人本来苛虐,打骂为平常事。近因内外(棉)发生罢工风潮,该厂日人愈加仇视,是日①因一女工多上马桶间一次被打,众人多抱不平,一致援助;而日人视为抵抗,故以严厉手段解决,致用手枪轰击。一华人被击倒地未死,众乃愤夺手枪,还击未中,此时人声嘈杂,遂群相抗拒,结果日人伤数人,重伤一人,华人死一人②,失落二人,被捕九人。

(《时事新报》1925年2月19日)

星期日(二月十五日)夜间,一群煽动者把注意力转移到极司非而路靠近铁路交叉点的丰田纱厂,致使日本纱厂的罢工更

① 二月十五日。

② 其他报刊只有工人被打伤的消息。

趋严重。这家纱厂的工人将近五千名，分日夜两班。星期日，夜班工人上班不久，就发生事变，聚集在梵皇渡的一帮人前往丰田纱厂，企图说服或者强迫该厂工人停工。纱厂方面自然关起大门，不准他们进厂，但他们立刻爬墙而进。其中有一些人冲向最靠近的梳棉机车间，另一些人开始拆毁机器，其余的人跑到各个车间号召工人参加罢工。在几分钟内，整个纱厂陷于极大的混乱，工作全部停顿。机器上的线筒、梭子、纱绞都被劈断，许多玻璃窗、电灯泡被击碎。

厂方以电话向静安寺捕房告急，探目麦格里各 (McGregor) 偕同数名巡捕赶往出事地点。当他们到达丰田纱厂时，看到大约有七百名男女聚集在厂门口，显出惊惶不安的样子。进厂所见的第一件事，就是一个男孩子正在连续锤击一架梳棉机。

巡捕在日本监工的协助之下，将暴徒平息下去，并劝他们出厂。这时厂门口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但是更加不幸的事变紧接着又发生了。这家纱厂恰好位于租界以外，闸北警察厅的警察也到场协助恢复秩序，但是他们中间一些人的愚蠢行为却造成了更加严重的骚乱。正当工部局的巡捕和厂内的职员引导激奋的群众出厂的时候，闸北警察厅派来的警察突然在厂内开了两枪，后来又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开了四枪。这时，厂外的群众以为是厂内的日本职员在开枪，乃企图重新冲到厂里去。

正当这时，一辆汽车开来了，车子里坐着该厂的厂长、厂医、四、五个日本职员。厂门口的群众正以为是日本人开枪而变得暴怒的时候，看到汽车开上来，就都立刻向汽车冲去。日本人在猛烈的袭击下，不得不起而自卫，他们全都受到程度不同的严重

伤害。有人开了一枪,子弹击中了一个日本职员胸部,穿过他的右肺。厂长被群众用棍子猛击头部,最后被抛到苏州河里,有一个船夫把他救了起来,安全地送到闸北方面。其余的日本人都被打得很厉害,后来都被送进了医院。中弹受伤的日本职员,由日本医生篠崎医治,因伤势过于严重,无法送往医院,只好暂把他放在厂内的一间办公室里。汽车也被捣毁。

其时有一部分群众正在用石头扔击纱厂的玻璃窗,闸北派来的警察就报之以更多的来复枪弹。但迄今尚未听到有何伤亡发生。

巡捕开来的汽车,成了暴徒第二个注意的目标。他们直截了当地将汽车抛到苏州河里去。后来把它捞出来的时候;车子几乎没有什么损坏。

一共拘捕了九个人,他们都是在拆毁机器时被捕的。他们被捉走后,使附近一带陷于骚乱将近一个小时的紧张局面平静下来。这九个人已于星期一(二月十六日)在会审公堂审讯,奉庭谕还押,以便由日本陪审官续讯^①。

(译自《字林西报》1925年2月17日)

丰田纱厂罢工宣言

同胞们!我们在丰田厂做工实在苦,比其他工厂的工人更苦。我们工钱最多四角一天,连吃饭都不够,请你们想想看我们怎样度日呢?日本资本家延期发给我们工钱以前,本来每两周

^① 原标题为《丰田纱厂的暴动》。

发放工钱一次，现在要拖延到三周才发给，我们怎么能够等待呢？我们每天买米、买柴、买炭，处处要钱。原来我们每月有四次奖金，现在减为两次。我们工作疲劳，时常害病，我们一害病，厂方就扣工钱或罚款，有时还要停生意，甚或稍不称日本人心意，马上拳打脚踢。以前吃饭休息时间是一小时，现在只有半小时，稍微慢些，就要挨打，不挨打就挨一顿辱骂；如慢五分钟，不仅不发奖金，还要扣工钱。因此，我们实在有难言之痛！还有，我们上厕所要凭木牌，可是全厂只有两牌〔块〕木牌，六千多工人有什么办法能到厕所去呢？同胞们！这许多痛苦，无论怎样说也说不尽！各位同胞，日本人坏到什么程度，从这些总可以晓得了吧！内外棉、大康、日华各厂工人所受痛苦，同我们一模一样，现在都已罢工。我们丰田纱厂工人受日本人的苛酷待遇，忍无可忍，听到其他厂的工友们抱义气，纷纷起来反对日本人，所以我们也罢工了。希望各位同胞体会自己手足之情，起来声援我们！我们提出以下九条要求^①：

- 一、以后不准打人并罚工；
- 二、工钱应按照原数各加十分之一，并须用大洋计数发给，不得无故克扣；
- 三、释放被拘押工友，并抚恤伤亡工友；
- 四、以后两星期必须发给工钱一次，不得迁期；
- 五、赏工每月四赏，并不得借故克扣；
- 六、生病及有事故请假时，工钱适当发给，不得措着不

^① 工人所提九项条件，该书只列第四〔三〕、五、六条，兹根据《民国日报》二月十八日报道所载补齐。

发；

七、厕所不得再用木牌；

八、罢工期内，工钱照常发给；

九、援助内外棉、日华、同兴、麻袋各厂工人达到要求目的。

丰田纱厂工会六千人全体泣告

(译自宇高宁《支那劳动问题》，第645—647页)

同兴纱厂工人罢工

小沙渡日商内外棉十一厂二万余人之罢工，至昨日（十六日）已第八日。前昨两日，日华、丰田厂加入，人数已达三万，尚无解决办法，而昨早同兴纱厂四千余工人，又已加入^①。

前晚一时许，同兴纱厂工人相约罢工。厂中管理员派人闭厂门，工人力争，坚不上工，至昨早五时许始得出厂。当即由每一纱间及拆包间各派代表二人组织工会，并已推定总代表，以便与内外棉、日华、丰田各厂联合。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7日)

同兴纱厂罢工宣言

同胞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东洋人的厂里做工真是痛苦极了！第一，东洋人动辄打人，不依理性。第二，东洋人毫无天良，罚工

^① 另据《民国日报》二月十九日报道，参加罢工的是小沙渡同兴一厂，沪东同兴二厂未加入，若此，罢工人数应为二千余人。

钱还要无故停生意。第三，东洋人淫乱无礼，调戏女工。看见我们女工长得漂亮的，便昂头歪嘴，动手动脚；不漂亮的就拳足交加，而且有时生意也不保了。真是令人切齿，要吃东洋人的肉！第四，从前每半月赏工一天；现在东洋人破坏旧章，每半月只要是有一天的请假，赏工也就没有了。第五，工贼东洋人大石和藤田打人骂人，调戏我们女工友。凡是有女工进厂时，他们总是要先摸摸头，看看要大脚时髦的才要。第六，从前柴米价廉，工钱就小极了；现在什物昂贵，工钱还是不加，可恶已极。第七，我们每天拿到厂里去的饭食，东洋人要我们饿起肚子作工，硬要等到十一点半钟停车时才准备给我们吃。并且水不烧开，常常使我们吃冷饭生病，真伤心呀！第八，东洋人常常骂我们是奴隶，是贱种，是亡国奴。不齐心，象一盘散沙一样，把他们无可奈何。

同胞弟兄姊妹们呀！这几条简简单单的东洋人的罪恶，真说不尽东洋人的万恶之一哩！我们早已忍无可忍，那时就想动手摇班了，可是因为我们的力量不够，恐怕失败了，东洋人更要加害我们，所以容忍万分，总是不敢动作。现在好了，内外棉、日华、丰田、大康、麻袋厂都抱义气，一齐起来摇班反对东洋人了。我们有了这个出头见青天的机会，也就抱义气摇班了。

我们摇班的要求是：

- 一、不准打人骂人，不准无故罚工钱；
- 二、工钱加十分之一，并不得无故克扣；
- 三、不准无故开除工人；

- 四、赏工每星期赏一天,不得缺少;
- 五、开除工贼大石和藤田,永久不得任用;
- 六、不得调戏女工,任意嬉笑怒骂;
- 七、摇班期中工钱一律照常发给,不得扣减;
- 八、援助内外棉、日华、丰田、大康、麻袋厂全体工友,一律达到胜利。

以上几条要求,不达到目的,誓不上工。但是我们的力量微弱,而且我们的苦情,外面也很不知道,所以我们很望外界的人士了解我们的真象,再加以实力援助。

同兴纱厂工会全体工友两千余人宣言

(《时事新报》1925年2月17日)

裕丰纱厂工人罢工

罢工风潮自沪西而蔓延至(沪东)大康纱厂,该方面之日人纱厂,遂非常恐慌,而为严重之警戒。昨晨东洋纱厂^①遂卷入于工潮漩涡中。据公司方面所说,罢工状态,与大康纱厂同一系统,有称为大康纱厂之多数罢工者,对于十七日夜工作之夜工要求其为同情之罢工,是夜工作非常不安。次日六时换班,罢工团邀入厂工作之工人,至工厂附近道路上,要其罢工,即有不稳之形势。工厂遂急报捕房,派数名巡捕到场,亦拱手旁观,毫无效果。从罢工团之手脱出者约十分之六,入厂工作;精纺部之定额一百五十余名,仅有三名到厂;工作困难,一时停工。并声明午

^① 即裕丰纱厂。罢工自二月十八日开始。

后六时之夜工,如入厂者可以工作,则仍继续开工。但工潮波及之说传出后,入厂工作者,仅二百数十人,到底不能开工。工厂方面遂将工厂锁闭。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0日)

裕丰纱厂罢工宣言

同胞兄弟姊妹们:

我们在东洋人厂里做工,真正痛苦极了呵!每天做十二点钟的工,不许休息。从前在吃饭的时候,还有半点钟的休息,现在改变只许一刻钟的休息了。做夜工时更加苦,一个礼拜夜工做下来,面皮就要变成黄色,并且浮肿起来。这样一年四季的帮他们做,流出了我们无数的血汗,给他们赚下了数千万的利钱。他们黑良心,使我们的工钱反是一天一天的不够开消〔销〕,因为百物都是一天一天的涨价,我们的工钱仍旧是不给我们增加,家中老小要吃饭,工银不够开消〔销〕,真苦呀!这还不算,最可恨的是乱打人,他们东洋人的领班、监工等,仗着他们厂长的势力,把我们中国人当做牛马奴隶一般看待,稍有半点不合他们的意,就要拳足交加的痛打,“亡国奴”“贱种”的毒骂,有时打得我们工友的头破血流,还要抓着送巡捕房去吃官司。那个想出头来讲讲话,就要马上开除他。我们的工钱已经是不够开消〔销〕了,他们还要设种种的方法来克扣我们的,譬如我们稍微有一点点小错处,就是重重的大罚我们的工钱;有病请了假,也要罚我们的工钱;我们的工钱,原是两星期发一次,现在常常延迟到三、四个礼拜才发。我们工人是靠工钱吃饭的,他们却拿来给他们在

银行里生利息。唉，东洋人虐待我们的事实真是说不尽呵！他们从前还有一种笼络我们工友的手段。做日工不停一工的偿〔赏〕钱一元，做日夜工不停一工的偿〔赏〕钱一元三角，这是他们用金钱来笼络我们，想使我们永远不停他们的工。其实这些偿〔赏〕钱都是我们劳力的工钱中所应得的。不过他们巧立名目，想来笼络着我们这些无知识的工友们罢了。现在连这种偿〔赏〕钱也减少了，只有五角多，这样叫我们怎么过日子呢！唉，东洋资本家真是可恶，逼得我们真是忍无可忍了。现在大康、日华、内外棉、丰田、同兴的工友都起来罢工，反对东洋人的压迫，我们为着抱同胞的义气，为着谋自家的利益，所以我们也起来罢工了。我们的要求条件是下列八项：

一、不准打人。

二、工人自愿退工者不得将工钱充工〔公〕。

三、不准无故开除工人。

四、偿〔赏〕钱须恢复旧例，以后将偿〔赏〕钱结入工钱帐内不得另发。

五、吃饭时间须要关车半小时。

六、开除日人伊藤(一厂甲班摇纱部)塚田(电汽部甲班)寺家(二厂甲班粗纱间)樋口(乙班细纱间)。

七、每年加工钱一次，在四角以下者加十分之二，在四角以上者加十分之一。

八、罢工期间的工钱须照常发给。

同胞兄弟姐妹们呀！日本人虐待我们的工界同胞，就是侮辱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家体面，望全国同胞大家起来援助我们，争

我们中华民国的面子。快快起来呀！

裕丰纱厂工人全体四千余人敬谨宣言

(原件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铅印,无题)

东亚制麻厂工人罢工

东亚制麻工厂^①因恐罢工风潮波及,早在警戒之中。但前夜^②十二时左右,已开始罢工。厂内窗户电灯等,被外面侵入之暴徒破坏,机器亦有一部分损坏。然该厂与纱厂系统不同,如就职工人较多,工厂秩序恢复,即可开工。惟现在之情势,日人之内外、日华、大康、丰田、同兴等纱厂及东亚制麻厂六工厂之罢工,前途未许乐观。而设在大丰纱厂内〔旁〕之工团本部,昨日闸北保卫团已命其解散,但谣言甚多,有昨夜袭击内外、丰田、日华三厂之说,惟并未有何事发生。中国人经营之申新、溥益、统益等纱厂,亦有罢工之传说,故中国纱厂业者亦发生恐慌,并协商对付之法云。

(《新闻报》1925年2月18日)

① 即东亚麻袋厂。

②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显微胶卷第564卷所载《日本驻沪领事矢田向外相币原呈报上海日商纱厂罢工经过》内称,麻袋厂工人自二月十四日开始罢工。

〔附〕 二月罢工厂数、罢工日期、罢工人数统计表①

会 社	厂 名	厂 址	罢工日期	罢工人数	备 注
内外棉纺织会社	内外棉第五(东)厂	沪西	二月九日	17,100余人	
	内外棉第五(西)厂	沪西	二月九日		
	内外棉第七厂	沪西	二月九日		
	内外棉第八厂	沪西	二月九日		
	内外棉第十二厂	沪西	二月九日		
	内外棉第九(东)厂	沪西	二月十日		
	内外棉第九(西)厂	沪西	二月十日		
	内外棉第十三厂	沪西	二月十日		
	内外棉第十四厂	沪西	二月十日		
	内外棉第三厂	沪西	二月十一日		
	内外棉第四厂	沪西	二月十一日		
内外棉第十五厂	沪西	二月十二日			
日华纺织会社	日华第三厂	沪西	二月十四日	3,500余人	
	日华第四厂	沪西	二月十四日		
大日本纺织会社	大康第一厂	沪东	二月十四日	4,000余人	
	大康第二厂	沪东	二月十四日		
丰田纺织会社	丰田第一厂	沪西	二月十五日	3,400余人	
	丰田第二厂	沪西	二月十五日		
同兴纺织会社	同兴第一厂	沪西	二月十六日	2,000余人	
东洋纺织会社	裕丰第一厂	沪东	二月十八日	2,600余人	据该厂工人宣言及其他资料称该厂有四千余人。
	裕丰第二厂	沪东	二月十八日		
	东亚麻袋厂	沪西	二月十四日	1,500余人	见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编《我国纺织业罢工事件与五卅事件以及各地的动荡》第一辑第248页
总 计	22厂			约35,000人	

① 根据《民国日报》、《申报》、《新闻报》所载有关各厂罢工的报道编制。

(三) 工人加强团结,坚持罢工斗争

1. 组织工会、纠察队和义勇队,加强战斗力量

内外棉纱厂工人组织工会和纠察队

日本内外棉公司共有十五纱厂,在上海者十一厂,工人二万余人,均在小沙渡。平日该厂非常苛待工人,最近本月一日^①又开除四五十人,被开除者索取工资时,并有六人被捕,工人愤激。延至昨日(九日)下午四时,日班工人约齐同时退出工厂,即至附近旷地开大会。至五时许,夜班工人得知罢工消息,亦均未往上班,至会场集会。当时到会者约在一万以上,即时由内外棉纱厂工会当场宣布成立委员会。委员会开会后,议决罢工后之进行办法十余条,及告各界同胞宣言。当时并组织纠察团,巡视罢工区,维持秩序,传递消息。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1日)

昨日小沙渡浜北一带,沿路均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工会中且有纠察员多人守护。工人住宅各区,亦均派有专员传达消息。据闻此等纠察队之组织,系各厂、各间(如粗纱间等)推出代表,并按十人一队,有什长、百长、千长以至总队长。现共有六十

^① 二月一日晚工人进厂,二日晨被开除,故有一日开除工人之误。

七队组成,其中且有女工纠察队十四团。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2日)

据云,浜北又添组纠察员二十余队,浜南租界地方亦已秘密组成二、三十队,工人行动甚有秩序。然租界巡捕布满小沙渡一带。闻在华界华〔药〕水弄地段,有二工人被捕,可见日本厂主仍无和平解决之意。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3日)

日华纱厂工人组织工会和纠察队

日华纱厂同情内外棉厂罢工,昨日下午开代表会,决定成立日华纱厂工会,每纱间推举代表二人,并由代表推举总代表九人,负工会办事及对外交涉之责,代表中女工约十人。又决定各纱间组织纠察队,明日一体成立。又决定致一函于大班,略述罢工理由及开具要求条件。当推一人持函往见大班,明日下午当有分晓。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6日)

丰田、日华工人组织纠察队

午前^①十时,丰田厂开大会,到三千余人。因昨日工人二人被打,全体异常愤激,一致主张坚持到底。但秩序必须严肃,故纠察队六十四队已组成,誓与内外纱厂一致行动。

^① 指二月十七日午前。

下午三时，日华纱厂工人开全体大会，出席者二千余人。代表会已成立，纠察队四十五队亦已组织完竣。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8日)

裕丰纱厂工人组织纠察队

杨树浦之日商裕丰纱厂，突于昨早六时罢工，全厂四千余人一致出厂，当即至沪江大学附近旷地开全体大会。当时雨雪虽大，而工人精神异常振作，立即组织纠察队三十余队，秩序甚佳，并议决发表宣言作同一主张。似此情形，则此次罢工风潮一时实未易解决也。

(《时事新报》1925年2月19日)

各厂工人合组代表办事处

昨日，罢工各厂曾开工人代表联席会议，到会者一百余人。重要议决：一、一致坚决不达目的不上工；二、组织代表办事处，定每日下午七时开会；三、组织义勇队，保护工会，维持秩序。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7日)

各厂工人组织义勇队，宣誓保卫工会

昨日上午八时，小沙渡罢工各厂开全体代表会议，到会代表二百二十余人。因闻厂主方面拟即停止男工，另招女工；且昨日丰田厂日人用汽车袭击，有二工人不知下落，故代表大会一致决议，誓必坚持到底，且组织义勇队维持秩序。计内外第三厂、第四厂、第五东厂、第五西厂、第七厂、第十三厂、第十四厂、第十五

厂、日华第三厂、第四厂、内外〔东亚〕麻袋厂、丰田纱厂等十二厂，共一百三十余队。各队员立有誓约，为“反对东洋人到底，不占面子不上工；维护工会，铲除工贼；同生死，共患难；听总队长的话，如有假心，天雷打死”。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8日)

2. 集会演讲，鼓舞群众斗志

内外棉纱厂万人集会，表示不达目的不上工

昨日，小沙渡日纱厂罢工事件仍无解决办法，十一厂已完全停工。工人方面，于下午二时在浜北召集大会，到会者一万余人。当时工人演说，多谓不达目的决不上工，群众高呼“大家齐心”。浜南、浜北已组织之纠察队共有千余人，皆列队在会场游行。各界代表到会慰问演讲者甚多，沪西商界联合会代表四人并到工会表示援助工人，愿积极着手调解。其时警察到会场视察，大会群众即高呼“中国人不要帮外国人压迫同胞”。大会散后，工会委员会即开议，讨论继续进行办法，并决定坚持，以待厂家方面之答复。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4日)

内外棉工会与日华、丰田、同兴等厂加强联系，

决一致行动，坚持到底

内外棉工会昨日开大会欢迎日华、丰田、同兴及麻袋厂之工人代表，到会者甚众。工人及代表均在旷场演说，全谓不达目的不

止；并有提议谓，如日人欲以利诱工人入厂，工人亦将里应外合。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7日)

同兴、日华纱厂工人均各自开会讨论进行办法。日华工会并于昨日宣布决议数条，大致为一致坚持到底，上工与否，与内外棉纱厂一致行动。同兴亦然。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0日)

大康工会开露天大会，宣布不到最后胜利不上工

昨日下午一时，大康纱厂工会借东边空厂〔场〕开露天大会，由主席报告开会宗旨。继由内外棉厂工人代表报告小沙渡情形。后由各工人相继发言，金谓大康纱厂开办不过数年，厂主赚金钱不下几千百万，均是工人血汗，而所得工资，不够一饱。现在既已明白，一致反抗，不得到最后胜利不上工，云云。结果一致赞同坚持到底，并当场组织纠察队六十余队，专负维持秩序责任。中国警察(署)已派专员曹某到工会表示愿作仲连，请工会及大康纱厂各派负责代表二人到署，由该署秉公调解。工会方面极表赞成，彼即召集代表会议讨论对于调解意见。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6日)

工人上街演讲

现总计罢工之纱厂为内外纱厂、日华纱厂、大康纱厂，共有十二班工人，约计两万人。昨日下午，此辈工人三五成群，徘徊于劳勃生路、小沙渡、曹家渡一带。另有一部分工人，则于浜北

某地开会,组织一机关,从事活动。并有董某、王某等在劳勃生路一带向工人演说,聚而听者数十人。

(《申报》1925年2月16日)

沪西工人举行游行示威

下午①四时许,警厅方面有人至工会声言保护工人,注意地方治安。保卫团第一支团副团长韦伯成亦到工会,谓保护地方安宁,责任所在,不得不注意。工人当即答以我等罢工为对付东洋之资本家,非愿危害我同胞之国人,秩序自当严守,但诸君亦当负援助之责,云云。于是工人整队游行,由华界向租界进行,沿途高呼“抵制东洋资本家”、“中国人当帮助中国人”。队伍随向前进,工人沿途加入,愈聚愈众。行经恒丰路至警察第四区某署前,队伍已过一半,而冲突起矣。方工人高呼向前时,突来警察数十人,有穿制服者,有不穿制服者,冲入队伍,并不开言,即动手乱打。游行者不知来意,秩序稍乱。前方队伍是时亦已闻耗,相率折回救援,一时游行者旁观者混杂不分,一齐被打。旋经纠察队出而维持秩序,以工人游行,本为请当地市民表同情于罢工者,初无意扰乱地方秩序,即决定散队。被捕去者已有二十余人。工人已开会计议,派代表一人至警察第四区,请释放被拘之工人,但至晚一钟尚未出署。惟据警厅长消息,则谓仅派卜督察长会同四区刘署长、四分所李署员、侦缉队樊队员、游巡队王队长等,各率长警侦探,前往该处善言开导,该工人等并未抵抗而

① 二月十七日下午。

散。当将工人所组〔持〕之义勇队大旗一面扣留，带回警厅存案。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8日)

3. 抗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镇压破坏活动

沪西工人营救游行被捕工友

日商各纱厂工人，前日在曹家渡集队游行，经警察厅长常之英派警解散，发生冲突。昨日，工人方面推派代表至工人后援会报告经过详情；并谓当场被拘者二十余人，嗣工人方面派代表二人至警厅要求释放，亦遭扣留，至晚未曾放回，请予援助，云云。闻该会已定今日上午十时召集紧急会议，将谒警厅长请示释放。

又录工人致该会函如下：我们昨受警察压迫，把我们的工友和我们的办事人及恳求释放我们工友的代表统统都被捕了。不但被捕，一个个打得头肿面烂，并且还加上镣铐。我们工友并非罪囚，都是苦恼的良民，惨遭这样无理的摧残，天理何在！真令人心伤胆裂。现派工友刘君前来求援，千请贵会主张公道，以实力援助，将我工友等救出，感激得很。敬祝公安。内外棉纱厂等全体工人三万余人泣书。正月二十六日(二月十八日)。

闻该会接信后，当即函复，请工人等严守秩序，以待调解。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9日)

沪东工人包围警署，抗议逮捕工人

昨日裕丰纱厂工人在沪江大学附近旷地上开全体大会，到会者千余人，正在讨论继续进行方法，主席报告调解经过，略谓

日厂主本约昨日正式开谈判签字,不图厂主又复反复。时全〔会〕众倾听演说,突有武装警察二十余人到场捕人,当时捕去两人。时大康纱厂亦在附近开大会。裕丰工人见警察捕人,即至大康工人会场报告。大康工人闻讯,当即议定两厂工人同至警署请愿释人。霎时间围拥警署五、六千人,群众咸高呼:“中国人不要做东洋人的走狗!”署长见势急,便命警察开枪。未几有大队武装印捕、华捕、西捕到来,警察即动手捕人,陆续捕去十六人。工人仍高声抗议,自下午二时起直至四时始散。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0日)

一九二五年二月,(中略)爆发了二月同盟大罢工。首先由沪西内外棉纱厂发动,以后杨树浦大康纱厂起而响应,裕丰工人接到通知后,也在“摇班”那天,男女工人一千余人在蔡之华等领导下,集体到沈家桥后坟山上开群众大会。当时的口号是:“反对东洋人打人,要求工钿加一成。”那时日本人看到工人罢工,就想法破坏,打电话到引翔港警察所,借找领导人去谈话为名,把跛脚学生捕去(当时他也参加这次大会)。第二天数百工人(大多数为男工)自动集合到引翔港警察所要求释放。帝国主义派了十余个英捕、印捕、包探,前来镇压,英捕并威吓工人说,如不回去就要开枪。工人听后大愤,将警察所的篱笆推倒。结果警察真的开枪,当场有清花间工人朱连科(一九六一年退休)等二十余男女工人被捕,蔡之华也被捉去,但工人罢工并没有停止。以后又到马玉山路等处去开会。

(《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人斗争史》初稿〔节录〕)

工会被封，工人坚持斗争

杨树浦罢工，昨日双方仍在坚持中。工人方面，以前晚多数工人被捕，益注意于内部组织。大康纱厂本有纠察队，今则大康、裕丰两厂之男工，几于每人皆成纠察员。罢工工人皆至工会探问消息。昨日下午二时，突有警察九人到工会中，将工人驱逐出会所，随用木条将门钉起。工人被逐后，即召各总代表开一会议，决定将此变动通告工人，并立即改换组织方法。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1日)

拒绝厂主利诱，工人继续罢工

小沙渡方面之罢工，调解尚无眉目。惟闻纱业公会又有出任调停之说，各厂工人均坚持不上工。日厂则又出招贴令工人领钱，欲引诱上工，然迄无工人到厂，盖各厂工人正在进行秘密组织。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0日)

内外棉厂已挂牌召集长工修理机器，准即日开工，盖厂中自以发红簿子赏及发上月工资招徕工人后，有一部分工人去领，然昨日则仍未能开工。工人方面，数日来虽极沉静，而组织工作仍在进行。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4日)

日纱厂罢工已延至十余日，工人生计极感困难。内外棉纱

厂厂主利用此点,宣告开工,给发赏钱工资。前日早内外棉第九厂因罢工工人阻止小部分工人,发生纷扰。昨日上午曾有一小部分工人前往领赏,亦经工会劝阻。并闻工人〔会〕方面,临时发给工人小洋一、二角不等,以维持工人生活,因之厂主计划目下亦难成功。

又据工人方面消息,调解之各公团及表同情于工人之个人,已纷起捐助。闻前日起已按照各人生活情形,酌量发给伙食费,至昨日已发出一千三百四十七元,工人纷纷前往领取。因此今日内外棉五厂及九厂无一人上工者,并闻工会将于今日普遍发给工人伙食费。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5日)

各工会登报启事并发函揭露、警告工贼的破坏活动

内外棉、日华、同兴、丰田、大康、裕丰纱厂工会紧急启事:昨日各报载称:上海纺织总工会已在小沙渡、杨树浦等处设立支部,又有徐锡麟、李恒林、朱润彬等自称纺织工会代表,向各界接洽。敝会等为各厂全体工人组织,此次罢工完全出于自动,一切对外交涉,全由敝会等负责,并无上海纺织总工会及各支部之组织。至徐锡麟等,敝会等向无其人,恐系奸人冒称,藉图私利,或因传闻失实所致。特此登报声明,以免各界误会。

(《申报》1925年2月26日)

徐锡麟先生鉴:日前在总商会调解工潮时,未允先生加入调人之要求,至为抱歉。顷见报载先生等启事,至为诧异。先生有

无纺织工会,我等不知,惟我等各厂工友并未加入贵会,则是事实。至于此次罢工,委系出于群工友被迫不得已而自动,何待外人指使!先生诬罔我等,竟为〔谓〕此次罢工为共产党所包办,岂非暗示官厅,希图破坏我等之会而何!前登启事,乃由我等各工会盖章送发,何得谓之冒捏名义。我等对先生除拒绝加入调人外,别无私怨,倘再造谣诬蔑,我等惟有诉之法律以自卫。内外棉、日华、同兴、丰田、大康、裕丰各工会启。

(《申报》1925年3月2日)

4. 向社会各界宣传,争取同情援助

各工会联名发表泣告同胞书,要求各界奋起援助

昨日罢工之各厂工会召集联席会议,金谓此次日人压迫中国工人实系民族问题,故决议联合各厂工会,发一宣言,以唤起全国注意。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0日)

上海日商纱厂罢工工人,发出泣告同胞书云:

中国处处受东洋人的欺侮,各界同胞没有不知道的。我们都是上海日商纱厂里做工的,受的苦更是说不尽。东洋人在中国开办工厂,已经是侵犯我们中国的权利。大家可知道,他们是怎样对待我们中国的工人啊!中国还没有亡,我们已经比亡国奴还苦了;东洋人办的纱厂里百端虐待,比地狱还苦。

第一,东洋人天天殴打工人,拳棒交加。我们工人一天站到

晚,或是一晚站到天亮,每天要做十二点钟的工;以前吃饭时,还有一点钟或半点钟休息,现在一点钟的改成半点钟,半点钟的改成一刻钟。工人实在疲倦不过,稍微一打盹,东洋人便是乱打。大小便偶然多几次,或是多耽搁些时候,又是拳脚交加。还要随口乱骂“亡国奴”、“贱种”。

第二,东洋人给我们的工钱,实在不够养活一家数口。柴米一天一天贵起来,工钱丝毫没有加,每天至多四、五角,少的只有一两百钱。这还不算,稍微不如东洋人的意,便是扣工钱。而且照例每两礼拜发一次工钱,东洋人却要图利钱,款子存到银行里去,工钱压着不发,往往压过三、四个礼拜。我们穷人天天等米下锅,哪里禁得起。平常东洋人总是想法压着我们做工,有些厂里立了赏钱的规矩,要人一个月一天不停,一夜不停,才赏一元二元钱,如今赏钱也巧借不〔名〕义的裁减了。内外棉纱厂更立什么储蓄的名目,每月又扣去工资若干。

第三,东洋人的厂里,看着做工的中国人,简直是牛马。厂里的设备,比马棚猪圈还要坏。毛厕里的马桶也没有盖子,有些厂里(譬如丰田),甚至于上毛厕都要领木牌,总共五、六千人,那木牌却只有两块。吃的水也总是不开的。早上五点半便进厂,一直要到十一点钟才准吃饭。这样吃不饱,喝生水,大小便都有限制,整天熏着尿尿的臭气,还要天天做十二点钟的工,自然要生病。可是病了停工便要扣工钱,东洋人却总是说工人装病,不准请假。病重了没钱医,十人中总有九人只能躺着等死。

第四,东洋人对于女工尤其侮辱得利害,丑陋的是随心打骂,漂亮的便任意调戏。女人比较软弱,所以受的苦更多。有吃

奶的小孩子的女工，东洋人也不准他们喂奶；既不准带小孩子到厂里去，又不放女工出厂。

第五，东洋人心黑的狠，只要赚钱，只想工人替他们当恭顺的奴隶，因此有些厂里（如大康）时时刻刻藉端开除工人，裁减工人数额。要节省厂里的支出，便教剩下的工人加倍做工。譬如一个工人原来管一部车的，因为裁人，便管到两部、三部。有些厂里（譬如内外棉）竟预先养一班女孩子（叫做养成工），施以奴隶教育，长大了便叫他们代替男工，把原有的男工开除。他们以为这样打惯骂惯的女工，以后可以永久低头服气，榨出汗血来替他们挣钱，所以要这样制造奴隶。那些能替中国人争气的男工，他们都想开除。试想这几万人开除出来，失了业，岂不活活要饿死。

东洋厂里的这种虐待，写几千万字也写不完，这里不过说个大概罢了。诸位同胞呵！我们在东洋人手下做工，岂不是牛马奴隶的活地狱。我们这次罢工，实在是迫不得已，罢亦是死，不罢亦是死，穷人除了拚命还有什么法想呢？所以我们三万多人齐心罢工了，就是所谓养成工也一致罢工。我们罢工的要求，实在是最小限度的。我们也没有要求减少时间，其实工会条例规定，至多只能叫工人做十点钟。我们也没有要求医药费，以及什么大改良，要大破费东洋老爷。我们最重要的要求，只是不准东洋人打骂中国工人，不准克扣工资，恢复〔被〕开除工人的工作，工资要按期发给，并且增加十分之一，其余的更是很小很小的请求。可是东洋人教巡捕警察捉拿我们的工友，一定要扣我们罢工期内的工钱。其实这几个工钱，在东洋人不过九牛一毛，在我们

中国工人却要靠他过十天半个月呢。

诸位同胞呵！我们大家不幸做了中国人。到外国当侨工，受外国人的欺压不用说；在中国境内做工，还要受这样的压迫，受这样的剥削！听说东洋人要教他们的海军陆战队上岸弹压。中国的主权呵！中国人的脸面呵！我们已经亡国了吗？日本人在中国办工厂，这样刻薄压制我们中国的工人，每年赚整千整万的洋钱，拿回去造了枪炮来打中国，这是怎么一回事呵！我们中国就算没有亡，亡国也就不远了；我们工人总算已经做了没有亡国的亡国奴，各界同胞难道逃得过这个命运吗？

诸位同胞呵！快快救我们，救我们便是做〔救〕自己。诸位同胞呵！快快起来替中国争些面子，替中国争主权！诸位同胞（呵）！国已经亡了，国快要亡了，大家一致反对东洋人，一致起来救国吧！内外棉纱厂工会、裕丰纱厂工会、日华纱厂工会、大康纱厂工会、同兴纱厂工会、丰田纱厂工会、东亚制麻厂工会三万余中国工人泣血谨启。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0日）

工会招待报界，吁请援助

昨日，有内外、日华、丰田、同兴、裕丰、大康及东亚麻袋厂七工厂出面，邀本埠新闻界同人于昨日下午二时在西门方浜桥勤业女子师范茶话。工会代表到者，有内外李天涯、日华张应龙〔李瑞清〕、丰田刘贯之〔张应龙〕、同兴王瑞安等四人。

据刘贯之报告工潮起因，略谓内外棉纱厂第八厂，有女工年十二岁，系夜班女工，照例于晚间五时半上工，须次早五时半始

可出厂。该女工至五时许^①，因工毕倚几假寐，为管理日人所见，因以足踢其腿受伤，为工人所见，已抱不平，然无如之何。适其姊（年约十七、八岁）亦在是时作工，睹状与日人交涉，亦为其批颊。其余男工大愤，遂与日人理论，虽停止工作亦所不惜。日人谓：你们既不愿作工，尽可出去，遂将粗纱间工人五十余人一概开除，并将工资扣留不发。嗣该间日班工人到厂，知情亦表同情，相率求去，工潮至此，遂益扩大。至其余情形，大致与报载相同。其余张应龙等亦有报告，大致要求新闻界援助。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3日）

5. 工会印发的传单和小报

内外棉纱厂工会印发的传单^②

男女工友们！日本人虐待我们，殴打我们，辱骂我们，日本人随便开除我们工人，日本人不断克扣我们工钱，日本人经常延期发给我们工钱，这些都是迫害我们，使我们不能容忍，我们能够不起来罢工吗？

罢工已开始了，内外棉十一个工厂通通一起罢工了。这种奋不顾身的斗争，是你们的生死关头！我们罢工如果胜利，究有什么好处呢？第一，日本人不能再打我们。第二，我们工钱能够增加十分之一，例如十五元可增一元半，十元可增一元，其他照此

① 系二月二日晨五时许。

② 以下几张传单，有的未署名，但从内容和原书排列次序看来，可能都是内外棉厂工会印发的。

类推。第三,罢工期间的工钱,照常发给。第四,以后工钱每两周发一次,一次也不准延期。第五,恢复被开除的工友,并释放被拘押的工友。总之,能有很大好处,只要大胆做去,不要害怕。

我们要怎样才能胜利呢?

第一,我们要团结一致。我们两万多工人要万众一心,不要怕日本人,不要向日本人低头。

第二,我们要听工会的话。工会是保护我们利益的团体。工会要我们不去工作,我们就不去工作。如果工会要我们去工作,我们就去工作。这样,我们大家都照工会的话做,决不会失败。

各位工友,这就是工会要向各位说的话。希望坚持到底,如果这样,胜利就是我们的。

各位工友,要坚持一条心,反对资本家!

以后宣传的传单,凡盖有工会图章的可以看,否则就不要看。希望对这点大家好好注意!

(译自宇高宁《支那劳动问题》,第639—640页)

工友们!罢工是工人对资本家斗争的武器。如果没有武器,士兵就不能和敌人作战。工会就是我们工人的武器。资本家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工人和资本家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果没有工会作武器,是不行的。不过,我们不要误会,工会不是从天而降的玉皇大帝,也不是慈航普渡的观世音,而是我们工人本身团结起来的组织。这种武器的好处,可以看出我们各个人有无决心,可以看出我们是否听工会的话,可以看出我们能否

切实维护工会,使其不受破坏。如果我们决心听工会的话,无论如何都能保证加以维护,那么,我们的这个工会就是真正的好工会,同时也就是我们的好武器,从而也就能够得到成功。

(译自宇高宁《支那劳动问题》,第638—639页)

各位工友,不要惊慌!不要着急!工会自然有好主意。昨天我们的游行队伍和警察冲突,解散时被拘捕二十多人。今天各公团都出头说,中国人一定要帮助中国人,已派几十名代表向警厅交涉,谈得好就可以释放出来,谈不好要打电报到北京,唤起全国同胞声援我们,这样,警厅还能不释放被拘押的兄弟吗?现在罢工后援会都在街头替我们募捐,工会照常办公,同时,对群众情况很了解,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如果这样,日本人一定会答复我们的。日本人已发生大恐慌,每天损失约几十万元,机器生锈,而产品毫无,除向我们工人低头认错外,其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希望大家团结一致,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内外棉工会通告(十八日)

(译自宇高宁《支那劳动问题》,第654—655页)

日本资本家日前访问溥〔统〕益纱厂(中国厂)代表,答应在昨天签订条约,据溥〔统〕益工厂代表说,日本资本家重新考虑以后,又说要在星期四(二月十九日)再谈。从这点看来,日本资本家毫无和解诚意。他们这种狡猾的手段,不仅是欺压我们中国工人,而且是侮辱那些善意出来调解的各界同胞。日本人自以为他们有钱有势,并且相信他们的走狗巡捕和警探能替他们弹

压这次罢工,大丢中国人的脸,所以不愿和平解决。我们工人虽然无钱无势,但是大家团结一致就是我们的力量。即使我们这次失败,只要牢牢记住,一定有报仇雪恨之日,其办法无须再说。只要大家采取一致行动,不要多久,就可以打败日本资本家。

内外棉工会出版(二月十九日)

(译自宇高宁《支那劳动问题》,第657—658页)

工友们:

分胜败的时候到了,我们更要齐心呀!如果大家能齐心,便可得胜;如果大家不齐心,便要失败。得了胜利,东洋人便不敢打我们、骂我们了,大家才有面子;如果失败了,东洋人更会把我们不当人,把我们做牛马看待,那就真是没有面子呀。现在商会、纱厂联合会都出来调停了,我们工会已经派出代表去与他们接头,几日内便有好消息。如果东洋人不受调停,我们便联合全国各界一致抵制他,看东洋人有什么办法,看他承不承认我们的条件。工友们,大家要齐心呀!决不可贪三个钟头的小利^①上东洋人的当。工友们要听工会的话,决不可上工,大家都有面子,大家都有好处。

(原件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址纪念馆,铅印,无题,亦无落款^②)

① 内外棉厂主曾宣布罢工期内留厂者发给工资三成,妄图利诱工人上工,因此工会号召工人勿“贪三个钟头的小利”。

② 原件无落款,从内容看来,可能是内外棉厂工会所印发。

大康纱厂工会印发的传单

工友们！我们在东洋人厂里做工，东洋人把我们看做牛马一般，要打便打，要骂便骂。我们统统是中国人，天天受东洋人的打骂，做东洋人的牛马奴隶，不仅是我们工人的耻辱，并且是中国四万万同胞的耻辱。工友们！大家一条心，反对东洋人的虐待！从前做牛马，以后要做人。为工人争面子，为中国人争面子。内外棉十一厂统统摇班了，日华、丰田也都抱义气摇班了。工友们！大家一条心，联合起来，反对东洋人的虐待！大家要听工会的话。能听工会的话，便是一条心。大家一条心，便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

大康纱厂工会

（原件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日华纱厂工会印发的传单^①

中国人要抱中国人的义气。

工人要抱工人的义气。

大家一条心，反对东洋人。

大家一条心，反对资本家。

要听工会的话，不要听资本家的谣言。

听了工会齐了心，摇班一定得胜利。

得了胜利要加钱，摇一天班有一天工钱。

^① 原件无落款。据宇高宁《支那劳动问题》第649页所载，系日华纱厂工会印发。

要是不齐心,大家没面子。

大家一条心,反对东洋人。

大家一条心,反对资本家。

(原件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内外棉工会印发的罢工新闻

△一个喜讯来了,被拘押的兄弟马上可以释放。我们几十位兄弟日前被拘押,昨晚工会去交涉,今天上海几十个公团也劝告警厅不可帮助日本人欺压中国人,因此,现在杨树浦方面的警署已不加干涉。

△裕丰纱厂(东洋纺)的工友,也抱义气罢工了。裕丰全厂男女职工四千多人,今天早晨全体罢工。他们的罢工也是出于抱义气,高呼反对日本人打人和改善工人的痛苦生活。他们四千多人团结一致,不管天上下雨,召开大会,还组织三十多人的纠察队,精神奋发,秩序井然。

△华商纱厂联合会也愿意出来调停。工会决定派人到溥〔统〕益纱厂面会总经理,说明工人的要求和请求释放被拘押工友的理由。

△大康纱厂的资本家尚未接受工人的要求。前天晚上,大康纱厂厂长答应同工人谈判。厂方知道后,昨天又说,罢工期间的工钱绝对不发,同时工钱也不提高,日本人工务主任中野决不解雇。因此,工友们仍然团结在一起,不去工作。希望各厂工友们同心协力,加强团结!

△日本资本家的诡计。日本资本家始终没有诚意,所谓和平

解决等等,不过是他们假意托人一次两次表示和解,用来欺骗人们的鬼把戏。现在派出包探和奸细,怂恿他们故意乱打工人。警察队虽也想来压迫工人,但他们也是中国人,对于帮助日本人不高兴。由于日本人买通中国警探,我们工人第一是不理他们,第二是团结一致不去工作。我们要派全权代表到上海各公团联系,请求大家都来帮助我们。

(译自宇高宁《支那劳动问题》,第655—657页)

三、帝国主义、日本资本家、军阀政府 及工贼对罢工的镇压破坏活动

(一) 日本帝国主义、日本资本家的镇压和破坏

1. 日本政府及其驻华使领的活动

日本政府的对策

第一项 暂时观望形势

上海纱厂罢工已暴动化,外务当局认为罢工性质已非专对资本家之单纯劳动争议,而带有排外之性质,除令矢田总领事采取慎重之措施外,又向北京政府、上海地方官宪交涉,要求取缔。作为日本人,固应准备保护日本人之生命财产,但目前如采取急躁办法,命令陆战队登陆,则对将来有碍,故决定暂时观望形势^①。

第二项 外相在议会中之答辨

币原外相在二月二十日贵族院内对藤山雷太氏之质问作如下之答辨,由此可知当时我政府之态度:上海纱厂之罢工,日本经营之十一厂中,已有七厂实行,其性质渐次化为暴动,确系事实。虽然彼等高呼改善待遇,提高工资,但真正目的究竟何在,难以测知。最初散布传单,反抗东洋资本家,近日则不称反抗东洋而反抗各国资本家。故急于与各国协调,求得解决。关于保护日本人之手段,总期万无遗漏。但在目前,除改善待遇之要求以外,别有目的,有如前述。关于此点,此际拟避免明言,所可言者,惟有期望对日本人生命财产之保护,不致有遗憾而已。

(译自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编《我国纺织业罢工事件与五卅事件以及各地的动荡》第一辑,第50—51页)

日本公使一再要军阀政府取缔罢工

十九日北京电 日本公使馆参事太田氏至外交部面访沈次长,要求取缔上海纱厂罢工风潮,谓有危及日人生命财产之势,宜令地方负责官吏从速遏止。沈次长答称:保护日人,中国政府自当尽责;但罢工风潮,当由各该厂自行解决,中国政府无能为力。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1日)

① 据《申报》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所载日本电通社东京电称,日本外交当局主张暂时观望形势,并于二十日会见大阪纺织联合会代表,说明当局的这种态度。

二十日北京电 日使馆今日又照会外交部，请注意上海纱厂罢工事件，要求严重取缔工人行动。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1日)

日本驻沪总领事迫淞沪警厅取缔罢工

驻沪日总领事馆，因日商内外纱厂罢工事发生后，有逐渐扩张之形势，曾以公函致淞沪警察厅常厅长，请其保护租界外之工场，并取缔倡议罢工者。

至昨日，罢工风潮复波及日华、大康两纱厂，日总领事矢田君因于午前十一时，特偕长冈副领事访问常厅长，有所交涉。略谓：“对于租界内之工场，因工部局巡捕充分取缔，尚无不稳之事。而在中国方面，依于日前之函请，对于租界外工场，虽修正为相当之取缔，而尚难言为充分。特此次罢工与普通之劳动争议有异，在劳动者之背后，明有煽动之人。至于今日，不独内外纱厂，而日华、大康两纱厂亦遭波及，有逐渐扩大之形势。此际拟请中国官场对于租界外之各工场，无论现在是否在争议中者，均予以严重之取缔与充分之保护。”常厅长答称：“在租界外，不独有日人之工场，且有诸外国与中国之工场甚多。对于不稳当之罢工风潮，当然为严重之取缔。自争议发生以来，即拟行相当之取缔。特承尊驾走嘱，誓当为严重之取缔。”云云。

(《申报》1925年2月16日)

驻沪日总领事矢田氏,因罢工风潮前晚波及丰田纱场,化为暴动,致日人办事员三好清一郎受有重伤,事关重大,昨特偕长冈副领事再访淞沪警察厅常厅长,亲行交涉。略谓:“对于租界外各日纱厂,前曾面请保护,兹因中国方面警察取缔不足,致有昨晚之伤害事件,殊为遗憾。请即检举暴行首谋之人,并彻底取缔。”对此,常厅长答称:“日来本警察(厅)曾与在沪之一部分军队协力注意取缔,昨晚事出仓卒,警察力不及行施,诚属遗憾。且在警察方面严重监视之时,并无不稳之形势,难以检举首谋之人。唯此后为应急起见,当要求军队方面派遣骑兵团,且为检举肇事者起见,当派便衣暗探从事侦查。又关于保护工场事,当更讲求严重之手段。”

日总领事嗣更访问陈交涉使,报告本案经过情形,并交涉善处之法。陈交涉使已允促请警察方面充分注意。

(《申报》1925年2月18日)

驻沪日总领事馆因留沪日商各纱厂工人罢工者续起,迭向我国当局交涉,请予取缔。日总领事矢田氏昨复偕长冈副领事,至罢工区域之第四区警察署交涉,请对罢工工人予以十二分之取缔,并要求保护日商纱厂。该署允即取缔,并有拟请北站奉军骑兵团前往弹压之意。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8日)

日本驻沪总领事叫嚣要军阀政府赔偿罢工损失

日本驻沪矢田总领事,以此次日商纱厂罢工风潮日益扩大,

丰田纱厂且有工人凶殴日人之暴动行为，中国官厅保护不力，除向上海特派交涉员抗议外，特电北京日公使，即向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要求赔偿罢工时期之各厂损失，并转令沪官厅制止工人之暴动云。

(《申报》1925年2月19日)

日本驻沪总领事策划武力镇压罢工

日总领事因为罢工风潮万一之备，于昨日午后，邀请驻沪海军武官猪濑氏及第一遣外舰队参谋等，有所协议，俟会商各中国方面官场之保护实不可恃时，即毅然派遣陆战队上陆之事。又在日海军方面，因于各工场保护人命，须计策万全，亦曾充分研究以备非常。即于各工场，将接近租界之一面，作为非常时之出入口，请愿租界巡捕警备此处，余皆严重闭锁，以备暴动等突发时，可自有非常口出入于警官之保护下，而取慎重之态度。若罢工团欲由封锁之处闯入，而中国警察之保护暴露完全无力时，即须派遣陆战队上陆云。

(《申报》1925年2月18日)

日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军舰“对马号”，本定日内回沪加防，嗣因形势紧急，急驶来沪，已于昨日下午四时进口。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3日)

扬子江日本第一外遣队“伏见号”兵舰，自由沪调赴汉口下游后，刻下又经本埠驻沪司令电促该舰开来上海，以上海工潮未

息,特命驻沪警备,故该舰昨午业已抵沪。

(《申报》1925年2月25日)

2. 上海日本资本家的活动

各日商纱厂厂主会商对付罢工办法

内外纱厂昨日正午开职员紧急会议,协商善后之策。其会商结果,认工人之要求为越轨之行动,决无容纳之可能,因决定停止全部工作。故昨日继续半〔部〕分工作之三、四两厂,及全部工作之第十五厂,因工厂方面既已决定方针,亦完全停止工作,故已陷于全部罢工状态。

(《新闻报》1925年2月14日)

本埠日商各纱厂,因鉴于此次罢工风潮日益扩大,为协商共同应付方法起见,各推代表,于前日(十五日)上午十时半,在汉口路内外纱厂事务所,举行日商各纱厂代表会议。计派遣代表出席者,有内外、日华、大康、同兴、东华、公大、丰田、上海、东华^①九社。各代表先分别报告本社工场之罢工状态,或工人之形势,后讨论关于罢工工场之应急办法。结果,各厂约协同应付,对于罢工工人,暂不出于积极之态度,任其自然,静候解决,亦不为徒博罢工工人恶感之事。各代表对此,均甚赞成云。

(《申报》1925年2月17日)

^① 原文如此,当时罢工者尚有裕丰,故可能是裕丰(东洋纺)之误。

连日各方出任调停者颇多。日纱厂方面，特于昨日下午三时，在日侨俱乐部召集各厂代表举行谈话会，到内外纱厂等代表十余人。席间各厂代表报告各厂近状，为各方接洽调解情形。多数意见，以为近日出任调解者颇多，惟意见纷杂，难以适从，且是否具有实力，亦难信任。故会商结果决定，如有真实负责之人，诚意与工厂方面之解决办法，则各厂自当诚意研究所提之条件。此项议案，各厂均取一致态度。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5日)

内外棉会社社长专程来沪，策划破坏罢工

内外纺织株式会社社长阿部彦太郎，接得沪厂罢工急电，十四日即急行来沪。昨日下午四时，阿氏乘轮抵沪，沪厂冈田厂长偕同全体办事人员赴虹口码头迎接。入晚即协商解决工潮方法。

(《申报》1925年2月17日)

内外棉厂利诱工人上工

据内外棉各厂经理宣称，昨夜各厂经理会议后，决定暂时一律停工，俟风潮确实解决后，再行开工。其愿留厂者，每日酌贴工资额三成云。

(《申报》1925年2月15日)

最初发动之内外棉纱厂，则于昨日宣布发“红簿子”(工人之

红赏),诱工人上工。诨工人方面,浜北浜南至今尚无一人往领。盖因沪西四路商联合会出任调停以来,日人方面始终无和平解决之诚意,谈判虽开过两三次,而日人至今尚无正式表示,因之工人颇有决心云。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7日)

大康纱厂称不上工者将逐出工房

昨日杨树浦罢工工人,表面上颇沉静,惟仍无人上工,亦不集会开会。工厂方面,裕丰纱厂无若何动静;大康则已下令明日开工,不上工者概行逐出工房(该工房为厂中所盖,赁与工人者)云。

(《申报》1925年2月23日)

日商纱厂联合会电请日本政府出面干涉

昨日上海每日新闻(日文版)所记之罢工情形,译录如下:在沪日纺联合会向日本外交部请愿罢工之情势益扩大而恶化,昨日(十八日)本埠纺织联合会开谈话会研究对付之策,并交换意见,决定为损害之报告及警察保护之要求。十七日夜并电致币原外交大臣,报告罢工状况,并说明其有过激之性质。日本虽与劳农政府提携,但在华日人,目下受彼等宣传之祸,希望外交部有相当之措置。

(《申报》1925年2月20日)

上海日商纱厂联合会,因驻京日使芳泽氏,与北京外交部交

涉纱厂工人大罢工事，外交部答称，对于工人问题，须由纱厂方面讲求适宜之处置，认为不得要领。昨日(二十一日)午后一时，更于日本人俱乐部开会，讨论此事与中国纱业公会所通知之罢工调停条件，及上海大学校长等所提出之调停希望等。结果，更以纱厂联合会名义致电芳泽公使请愿，略谓此次罢工，对于工人问题，固拟由纱厂方面讲求应付之策，以谋解决；而在彼等工人之里面，更有教唆煽动罢工之团体，切望要求中政府对于此等团体定取缔方法。如第三者之解决告成，则对于工人之问题，亦自解决云云。

(《申报》1925年2月23日)

**上海日本商会发出函电，称事态严重，
要求惩办罢工者^①**

内外棉厂罢工，其后形势日益恶化，其祸患竟波及六社二十二厂，事态颇为严重。本会^②于二月十九日召开职员会，经慎重审议后，向当局发出如下之电报。

决议：一、向外务大臣、驻北京公使电报请愿如下：

“此次当地日商纱厂爆发之罢工风潮，日益恶化。现在九社三十二厂几全部不能开工，生命财产颇受危害，事态严重。查此次纷扰之经过与普通劳动争议不同，煽动风潮之不逞分子之幕后，似有援助并操纵罢工之共产党员暗中活动之事实。倘任其

① 原标题为《关于向当局电报请愿的决议》。

② 即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简称上海日本商会。

发展,不但日本人生命财产之损失不可预料,我国对华工业发展之根基将受极大之打击,且将进而破坏中日之友好关系,诚属不胜寒心。为此特请惠予考虑采取机宜之措施,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使其惩办煽动者与暴行者,并对日本人因骚扰而遭受之一切损失负责。”

二、上述电文后增加“此旨已电请外务大臣、驻北京公使尽力援助”一句。向下列各团体发出电报:国内六大商会、日华实业协会、大日本纺织联合、日本工业俱乐部。

三、向加入在华日本商会联合会之各商会,书面陈述本事件之真相,请其援助本会^①之行动。

四、吁请上海工部局总董、上海外国总商会^②会长尽力镇压风潮。

按照上述决议,即日致电外务大臣、驻北京公使,同时对上述(国内)各团体亦发出电报;对加入在华(日本)商会联合会之各商会,已于二十日以“上商外第一三二七号”函,连同致外务大臣电报抄本,请其援助本会之行动。

(译自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编《我国纺织业罢工事件与五卅事件以及各地的动荡》第一辑,第34—35页)

工部局总董费信悖先生(S. Fessenden)阁下:

刻下泛滥于本埠所有各日商纱厂之重大罢工风潮,业已引

① 上海日本商会是在华日本商会联合会成员之一。

② 通称和明商会。

起本会之特别注意。本会长兹谨代表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为此专函奉达阁下。

自本月九日内外棉会社之一纱厂开始发生工潮以来，迄今已历二星期。刻下工潮波及六社二十二厂，情势日趋险恶。大批到厂上工之工人，深受煽动者胁迫之苦，而有关各厂之主人，在营业上则蒙受惨重之损失。

此次运动之性质，绝非仅以日本雇主为对象之普通劳工骚动。若干方面曾就此点声称，尤以本地若干报纸曾以更明白之语调声称，工潮之全部过程，证明其为具有周密计划之运动之第一步，该项运动系在苏俄以及与苏俄保持密切联系之国民党过激分子之影响下，反对在华外人事业与一般资本主义；而煽动工潮之经费，则由一本地大学发给煽动者与狂热分子，一般认为该大学系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之宣传机关。因而舆情颇为不安。

本租界及其近郊竟成为彼破坏贸易、扰乱治安之煽动者之非法活动场所，诚属不能容忍。是项工潮与胁迫行动，倘不立即予以制止，则性质更为严重之骚动，势将随之而产生，盖刻下仍在开工之其他各厂，必将受运动之影响。

于此期间，局势实甚严重。为保障外人之生命财产计，并为保障安分华人居民之生命财产计，本会长谨代表本埠日本商业会议所，请求阁下尽早采取必要之严厉措施，俾便制止扰乱上海及其近郊治安之骚动与胁迫行为。

专函奉达，顺颂

公绥！

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会长田边辉雄谨启^①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附〕 工部局总办鲁和复函

径复者：本总办奉命确认收到执事于二月二十一日致总董一函，涉及刻下正泛滥于多数日商纱厂之严重罢工风潮。兹于奉复之际，本总办敬向执事保证：本局对于因罢工而引起之扰乱治安，以及由此而造成之营业停顿，表示严重关切；刻正采取种种办法，以便结束此深堪痛惜之事态。此复
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会长田边辉雄先生。

工部局总办鲁和启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译自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编《我国纺织业罢工事件与五卅事件以及各地的动荡》第一辑，第36—40、43、44页)

3. 日本国内资产阶级团体和报纸的反应

大阪金融界惊呼上海罢工是整个日本

纺织业的生死问题^②

上海日本纱厂罢工事件始于内外棉，蔓延至大日本、日华、

① 原函系英文。同日，田边辉雄将同样措词的英文函一件，送交上海和明商会 (Shanghai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主席柏乐克斯密士 (A. Brooke-Smith)。

② 原标题为《罢工及大阪金融界之观察》。

丰田、同兴四社，东洋制麻与上海绢丝两厂亦告不稳。其余日本纱厂及与日人有关事业之各社亦均被视为难免发生罢工之命运。与此等事业关系最深之大阪金融界，对于目前日本人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多表示愤怒。其中一部分人甚至主张强硬对付。纱厂关系者认为：正因为所受损害系属于根本性质，唯恐此次之暴动造成将来无法收拾之恶例。国内粗纱厂基于下列观点：（一）得到更廉价之劳动力，（二）希望在更宽大之劳动法规之下开业，（三）有利之企业条件，如纺织机器免税输入及廉价之工厂地基，（四）原棉购入地理上之便利，（五）粗纱需求接近消费地方等，企图在中国兴办粗纱纺织业。并鉴于以往纱厂情况良好，今后拟逐渐将国内粗纱厂搬到中国，以后国内专纺细纱，中国专纺粗纱。但由于此次事件之发生，遭受重大打击，一向在中国之日本纱厂已告萎缩，今后不再新设，因此上述良好倾向亦将中断。此不仅对日本纺织业者不利，对中国劳动者及一般消费者亦不利。作为纺织业者之意见，上海日本纱厂不能脱离日本纺织业整体，而是国内纱厂主要部分之一。惟其如此，故视之为整个日本纺织业之生死问题。（下略）

（译自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编《我国纺织事业罢工事件与五卅事件以及各地的动荡》第一辑，第87—88页）

大阪日本纺织联合会向政府请愿

大阪电云：日本纺织联合会十八日在大阪旅社开对付上海罢工协议会。除决议外，并决定派喜多（日华）、儿玉（上海）、福本（日本）、高田（东华）、大谷（内外）、上阪（纺联）各代表赴东京

请愿,并发慰问电,慰问负伤者。

(《申报》1925年2月19日)

东京纺织联合会要求日政府向中国 军阀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闻日本东京纺织联合会,除呈准外务省训令驻沪矢田总领事设法处置并慰问受伤职工外,并已呈请外务省即日令知芳泽公使,向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外务省业已批准。其呈文云:上海日侨经营之纱厂,此次发生之罢工风潮,与寻常劳动条件争执案不同。中国工人胆敢手持凶器,殴伤日侨职工多人,决不能以寻常方法解决。此项风潮,惟有环请外务省速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中国政府彻底严查,究办为首肇事之工人,及从中煽动之暴徒,并设法使此项风潮早日解决,回复原状。又此次各厂所受之损害及职工所受之损伤,均须由中国政府担负责任。此项要求,务望日政府决心毅力,提出交涉为幸。日本东京纺织联合会会员:日本纱厂、日清纱厂、东洋纱厂、同兴纱厂、东华纱厂、丰田纱厂、东亚制麻厂、钟渊纱厂、日华纱厂、内外纱厂、长崎纱厂、满洲纱厂、富士瓦纱厂、福岛纱厂、上海丝织厂、上海纱厂等共呈。

(《申报》1925年2月20日)

派人来沪研究“预防”罢工办法

此次日商各纱厂发生罢工风潮,日本各地同业及商业团体等颇为关心。昨日,兵庫商业恳谈会及神户联业补导会等,特请

常务理事石野为之介为代表,乘“日光丸”邮船抵沪,调查此次罢工风潮之真相,并研究将来预防方法等,连日正与各方接洽云。

(《申报》1925年2月25日)

《东京朝日新闻》社论《上海罢工事件》

上海纱厂罢工事件发生,其后依然呈现出险恶的形势,由于内幕情形非常复杂,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据上海传来的各种报道,暂时没有复工的希望,但是按照局势的趋向,颇有蔓延至华商各纱厂的可能,因此华商纱厂联合会愿任斡旋之劳,居间进行调停。经过纱厂联合会的协助,罢工事件或能顺利结束,在这方面曾寄予一线希望;但是据本社上海专电,由于华商纱厂联合会在劳动条件上,弄错了日本方面的意见,致调停工作又告停顿。由此看来,调停工作似乎暂时不会有什么希望。关于我国政府当局对此次罢工事件,究竟怎样观察,准备采取怎样的解决办法,十九日贵族院议会开议时,藤山雷太曾提出质询,币原外相承认“罢工的性质已逐渐变成暴动,乃是事实”,并且强烈地意识到此次事件极其严重;至于解决办法,则仅作以下的答复,即“最初曾经散发反对东洋资本家的传单,到了近几天,则已不限于东洋,对其他各国的资本家,也开始进行攻击,故正在与各国共同取得协调,急速求得解决”云云。

罢工工人的目标,不仅限于日本,而且正在广泛地牵涉到有关系各国。照此趋势看来,很容易令人想象到日本以外的外国同业,也受到极大的威胁。另一方面,与这些利害相同的外国之间取得协调,固属必要,但受到实际损失与痛苦最为深重的我

国，难道不应当毫不迟疑地采取最完善的措置吗？政府对保护日本人生命财产采取万无一失的方策，乃是理所当然的举动。又鉴于事件的性质，政府无意采取高压手段，也是我们所完全赞成的。然而，此次的问题，绝非普通的劳资纠纷，倒不如说，善良的工人反而感到为难，故而使人怀疑有一部分不法的过激分子、政客、学生等，利用改善工人待遇、提高工资的借口，作为打倒北京政府的一种别有用心之政略。中国政府不应以此为单纯的劳资之间的问题而听其自然，而是要把责任担当起来，断然加以取缔。

历来每逢排日的场合，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交涉，徒然往来互提抗议，大多不能发生任何实际的效果。但是当被目为排日黑幕中人的直系取得天下后，却能理解我国的立场而厉行取缔排日，结果便是素有排日巢穴之观的汉口及长江一带，排日骚动完全销声匿迹，我们对此记忆犹新。中国政府当局素以逃避责任为其故伎；然而，如果不仅限于形式上的往来抗议，而能使中国最高当局充分理解我们的合理要求，即可指望产生相当的功效。此点从直系取缔排日的情况中已有实际的事例。现在上海完全处于段政府势力范围之下，因此北京政府如果严厉取缔，并不一定是困难的事。我国纺织业界，既经忍受此次考验，当然应以这一宝贵经验为龟鉴，谋求今后根本防止的办法；但是作为当前的问题，希望我国政府鞭策中国政府尽快解决这一事件。

(译自《东京朝日新闻》1925年2月21日)

《东京朝日新闻》社论《上海罢工的一次教训 ——尊重中国的国民性》

蒙受空前重大打击的上海日本人经营的纺织业，在罢工骚扰之后，劳资双方渐次达成协议，并已开始复工。过去所涌现的风云，已逐渐消散，使事件得以告一段落。据本社上海特派员的报道，因此次大罢工而不得已停业的日本会社，有六社十八厂，罢工实际总锭数在五十万六千锭以上。特别象丰田厂，有负伤者九人，其中一人因伤重而殒命。受直接损失者，以内外棉为最大，据云总额为五十万日元，若再加上间接损失，将在一百万日元以上，由此可以想象罢工的激烈程度。

罢工的原因，据本社特派员熊田的精密调查，大要是：一、我日本纺织业经营者中，不少人以中国人终究是中国人的因袭的差别观念来对待中国人；二、过激派的煽动也是原因之一。至于日本从业员怎样以对待中国人的差别观念，挫伤了中国工人的感情，虽不必一一举例，但在此次大罢工的解决条件中，在内外棉就有一条提到“不许殴打中国人”。这好象是可笑的事，但其实是异常重要而值得注意的一点。特别把国民性的不同所带来的感情上的冲突，作为此次罢工的原因之一，我们日本人对这一点，必须深切注意。日本在华的企业——合办的企业自不待言，即在外交上或两国其他关系上，由于日本人不理解中国的国民性，就会造成感情疏隔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都足以妨碍两国之间的友谊。作为中国人，不论个人或国民，都最重视面子。中国人重视面子的习惯，与日本人的重视面子有很大的差异。正因

为如此,只要是对中国人的面子略有损伤,即使能做的事也不能做了。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

最近莅临日本考察职业教育趁便来东京的方梦超氏,与我日本朝野人士坦白交换意见时,也谈到此次上海罢工的重要的远因,是由于国民性的差异,并力说日本方面对此点理解不足。日中两国,除一小部分有识之士与有识之士的接触外,国民与国民之间的关系,尚未臻于圆满。那是因为中国国民多数为旧习惯所支配,是不科学的;而教育普及的日本国民,则是科学的。而且两者在历史上、地理上,情况也有显著的差异。日本人多性急,无雅量,与钝重而散漫的中国人有难于融洽之感。日本人对待非科学的中国人,应理解其国民性,并以同情而豁达的胸襟与之接触,云云。方氏更指出日本政府或日本国民有过于重视中国政府的倾向。中国国民的中心不在政府,因此,并不是政府支配国民,而是国民支配政府。国民的中心,不在于政府、政党、乃至军阀。对国民作思想指导的,乃是教育界,即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广东大学等知识阶层。希望对这方面的思想或倾向,比诸对政府与政党势力的消长,给予更大的注意,俾便正确判断中国全局的趋向。方氏的言论,大体上可以看作是代表中国公正而有识之士的见解。

以罢工的教训而论,好象是把话说得远了,但由于此次罢工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企业经营者应该取得种种的教训了。其中我们认为极其常见的,就是日本人没有自觉到国民性的差异,真是引为遗憾。今后还要特别加以重视。作为具有共存共荣关系的日本人,首先必须理解中国的国民性,并要对它有充分的尊敬。

今天在日本人中间，大概已经没有完全无视中国国民性的人了。然而，由于不知道中国国民性究竟是什么，往往纵使出于善意，却带来了恶果。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近来有明显的改变，这是可喜的；但在日本人的头脑里，还相当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对中国人的优越感的偏见。若不抛弃偏见，尊重中国的国民性，则所谓日中提携之说，也只是徒托空言而不能见诸行事。作为对此次上海罢工的教训，我们特为提出以上的论述。

(译自《东京朝日新闻》1925年3月7日)

4. 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向外相币原呈报 上海日商纱厂二月罢工的经过

矢田致币原函

机密第八〇号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送呈上海日本纺织会社罢工经过报告书

兹将本年二月当地我国纺织会社所发生之同盟罢工制成报告书，随文送请察阅。

本件已抄送北京、青岛。

大正十四年^①二月上海日本纺织会社罢工经过报告

第一，关于同盟罢工爆发前之劳动风潮

(中略)

^① 即一九二五年。

一、直接原因

大正十三年十二月中旬内外棉第八厂厂长三宅清一郎就职以来,该厂男工中已有人对三宅之监督殊感不满。此时有工人赵某,盗窃机器附属零件,厂内对之处罚极为苛酷。对于女工之抄身检查等,亦有颇为不当之行为,男工袒护女工,情势更为不稳。而三宅厂长对此种不平,则采取暴力压制。特别在就职初期,一心一意想表现工厂之经营成绩,最初招致工人之反感。一月初,①工厂内一部分男工与三宅及其他职员等发生冲突,互有负伤,不得已停工四、五日。形势继续恶化,波及东五厂、西五厂、第七厂等,各该厂相继发生罢工。上述五厂董事长川村伴三将第八厂男工开除,代之以女工,因此形势益加不稳。当工人集会研究对策时,由于厂方宣布会社命令,自今年一月份起一部分工人工资每人每天平均在三角上下者减低一成,罢工立即扩大到各工厂。在此前后,对大日本厂②厂长中野英二之横蛮无理抱有反感之工人,遂为内外棉之罢工所激发,提出七条要求,四千工人一齐实行罢工。

再者丰田纱厂厂长原田与惣治,于巡查时斥责女工工作怠慢,不慎踢其腰部,造成需要治疗两星期之伤,因而引起男女工人之反感。彼等秘密集会商议殴打原田,但由于厂方监督疏忽,未讲求何种防止办法,以致不稳情况,日甚一日。正当此时,内外棉罢工爆发,无赖之徒约十名与一群不良工人,认为时机已至,遂实行破坏、放火之大暴动。厂长原田、事务员三好、竹谷均

① 指一九二五年一月,疑为二月之误。

② 即大康纱厂。

负重伤。善良之工人亦在彼等强迫之下，参加罢工。

二、间接原因

罢工之间接原因，基于外部之煽动或教唆之成分为多，但各纱厂亦不能辞其咎，应负一半责任。日本纺织业者，一向对于中国国民性之研究及劳动风潮之变迁等，预先并未具有何种知识，只知发挥日本职员的传统优越感，不尊重中国国民性。尤其是内外棉，自创业以来已历二十余年，墨守陈旧之经营方法，对于中国工人之有不满与反抗情绪者，不加注意。例如解雇工人时，只凭下级职员之片面报告，立即解雇，并不说明理由；如有人向厂方责问，据闻屡次均被以暴力驱逐。因此会社方面与工人不断发生事故。而高级职员则一任下级职员专断行事，彼等职员（工厂工作人员）中多数不但对中国国民性毫无基本知识与理解，甚至不懂中国语言，仅知根据该社之命令行事；至于新参加工作，更经常以暴力压制工人，误认为借此即可获得生产成绩。

再者，对于中国工人住宅之制度，亦漠不关心。例如内外棉纱厂宿舍，按规定只能住宿三百名，实际则容纳六百名之多。同兴纱厂、丰田纱厂除规定名额外，有其他会社工人数百名混杂寄宿其间。会社对此不作任何监督或调查。故二月十一日内外棉纱厂工人罢工后，立即通过其他会社在宿舍内寄宿之工人，将传单带回至各该会社之工厂内，予以散发，于是罢工迅速扩大，参加罢工工人迅速增加。毋庸讳言，虽由于外界具有共产主义思想之人物出谋策动，但在会社工人宿舍内，由于秘密集会与策动所造成之形势，对罢工亦有所助长。故作为罢工策源地，虽有沪西工友俱乐部，亦有共产主义者的团体，但直接进行之策源地，

则可以肯定首先系在宿舍内之会议中进行。但会社方面对于此种事实,完全一无所知,其漫不经心,可谓达于极点。又如在自己会社内之中国工人,系各种运动团体之成员,屡次成为争议问题之后援,或与集会有关,会社对此等情形并无所知。尤其是与纱厂密迩之工友俱乐部,正可巧妙操纵各纱厂,伺机而动。据说此种情况,直至罢工爆发后方始逐渐了解。又由于无工人出身省别之统计,在外有湖北省劳工会、湖南省劳工会以及安徽联合会等,各省出身之工人,加入原籍地之团体,或参与集会,会社对此类事实,亦一无所知。在罢工爆发前,对于举行二月七日京汉铁路罢工殉难者共产主义首魁黄爱、庞人铨之追悼会^①一事,纺织工会及沪西工友俱乐部方面,必然有所活动,希望工人参加赞助,但会社方面却泰然予以放任。凡此种种,足以说明会社方面之疏忽大意,乃不可否认之事实。

第二,各工厂之罢工经过与损失情况

(中略)

八、罢工损失之估计^②

① 二七殉难者是共产党人林祥谦、施洋,不是黄爱、庞人铨。

② 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编印的《我国纺织业罢工事件与五卅事件以及各地的动荡》第一辑,第81—82页所载罢工损失估计,较本件为详。现补充如下:

第(一)条,除本件所载外,有下一段:“就是说,罢工中的锭子占总锭数百分之三十,棉纱市价也上涨百分之三十光景。罢工前棉花四十一两,棉纱现货一百六十五两半,每包盈利二两半。现在棉花四十二两,棉纱现货一百六十九两,每包盈利四两。”

第(二)条后半段,本件按每包盈利二两半计算,估计损失为四千五百两;该书则按二月二十一日棉纱市价上涨后每包盈利四两计算,估计损失

(一) 上海纱厂总锭数一百九十万锭中,我国人经营之六个会社罢工者有五十七万锭。罢工前棉纱市场现货十六支纱市价为一百六十八两,二十一日市价涨至一百七十三两。

(二) 罢工开始后,迄二十一日止,生产减少约一万三千件,预计每件盈利二两半,损失达三万三千两。若仍继续下去,每天生产减少约一千八百件,损失四千五百两。

(三) 罢工工人总数三万五千人,每日工资约四角,共计一万四千元,即一万两。如对罢工工人付给一半工资,亦约损失五千两。

(四) 我国从业员薪给及工厂维持费损失约二千四百两。

(五) 以上三项,罢工一日之损失合计约一万二千两。

(六) 此外,上海工部局之电力供应收入减少额,以运转锭数四十万锭计算,约为七千两。

以上系直接损失之估计,如加上一般有关方面之间接损失,其数字可能颇为巨大。

第三, 罢工之策动与参加团体之行动

达七千二百两。

因此,该书第(五)条:“以上三项一日损失额共计约一万四千六百两”,较本件同条计算损失额一万二千两为大。

除本件所载六条外,该书还有以下三条:

(七) 除因暴动而发生的直接损失外,单从纱业经营来看,迄今厂方损失约三万三千两,今后(即二月二十一日后)损失每日约一万四千六百两。

(八) 以上系将直接损失折合金钱估计。若罢工延长,成品减少,二月份交割的货品发生障碍,则以前著名的商标或将因此而中断。且职工有离散者,将来要从新养成,故间接损失当亦不少。

(九) 再加与职工交易的中国零售商的销路减少,且赊欠货款无法收回。鉴于这些情况,此次罢工的影响,可说是重大的。

一般认为此次罢工之策源地主要为沪西工友俱乐部。该会多以日商各纱厂之从业人员为会员。当罢工范围扩大时,该会迁移至中国人经营之大丰纱厂内〔旁〕,研究对策。

其主要骨干则留在俱乐部,与工会之首脑部门相联系;对各厂宿舍杂居之同志,则令其联系各厂,或转送传单,或负责对会社方面进行侦察。此外,为扩大罢工起见,通过各工团联合会^①以获得各团体之声援,或与共产党互通声气,进行策动等,努力使斗争更形扩大。

(中略)

第五, 罢工之影响

作为罢工之影响,除日商各厂外有可能被卷入罢工漩涡之工厂,其大要如下:

一、溥益纺织公司

该公司纯属中国资本之工厂,工人约有一千七百名。二月十五以后,曾陷入罢工风潮危险之中,工人约十分之三停工,因而生产操作发生障碍,约达六小时。该公司工人因受到优待,未提出要求条件进行交涉,故仅止于同情罢工。

二、公益公司

该公司系中英合办之工厂。厂内罢工风潮出现后,英官方即督促中国警察,采取充分之应付办法,故未形成罢工,仅少数工人缺勤,厂方并无损失。经将主动者两、三人及可疑者数人解雇后,事件即告解决。该公司中国经理吴麟书,立即至罢工本

^① 大约是指各团体联合组织的东洋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

部,提出对日商各厂调停意见,并付出工人救济金若干,努力缓和局面;另一方面,则于工厂严加警戒,禁止集会,使彼辈无机可乘。

三、申新纺织公司

该公司系茂新、福新面粉厂所经营之纺织工厂。其实权现属于东亚兴业株式会社,故厂内工人对于日商感情在某种意义上并不良好。外部一有煽动,即拟参加罢工。但由于工人为数甚少,且有过半数纱锭停工,其势未被煽动,即告终止。

四、统益纱厂

该厂设在莫干山路,系与公益公司经理吴麟书有关系之纺织厂。近年来以业务不振,从业工人不过六、七百名,对罢工采取冷静态度。石锦坤^①一派到厂煽动,虽有少数人参加,但由于经理临机应变予以处理,终归平稳。罢工方面作为要求提出交涉者,只有天雨时上下班道路泥泞难行,希望厂方增加渡船而已。厂方对此立即采纳,满足工人之要求。

五、大中华纱厂

该厂位于吴淞,为一新近开设之工厂。因工厂雇用外国技师,工人怀有疑惧之心。由于中国工长接受参加罢工之交涉,进行煽动,有卷入漩涡之可能。但被厂方及早识破。厂方一面以捐款赠送罢工救济团,一面则以警察之力严禁集会,故生产仍能继续,亦未受若何损失,情况甚为平稳。

^① 据老工人回忆,石锦坤是沪西一个流氓,住在同兴纱厂工房内,曾混入工会进行投机活动。五卅大罢工结束后即被租界巡捕房收买,专干破坏工会的罪恶勾当。工人激于义愤,在一九二六年将石打死。

以上为纺织业同业间所引起之影响。

(中略)

第六，取缔罢工之情况

一、工部局巡捕房之取缔

罢工开始爆发时，工部局巡捕因处理不彻底，只是表面上敷衍塞责，不免受到非难。例如对于工厂方面之请求保护，仅派出能力不高之华捕，且无具有监督指挥权之负责者陪同前往。有时虽有英国捕头同往，但往往立即离去。故华捕与会社雇用之守门印度人同样，当暴徒袭击时，仅作毫无诚意之取缔而已。再则，罢工煽动者多数系在公共租界内策划，但对此调查不够充分，未采取任何积极之措施。且对彼等之集会、煽动等活动不彻底予以取缔，亦为不可掩饰之事实。但在丰田纱厂暴动发生后，对于在公共租界内印刷传单并策动工潮之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馆曾进行搜查，没收其证据文件，拟尽力依法办理。又如风闻海员工会有不稳定之传说后，立即派遣巡捕多名至有关船舶方面，实行严重警戒。

总之，工部局巡捕房之取缔情况，以我方之见解视之，未能令人满意，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在各国人聚居之当地，对于从人口方面看来巡捕力量显然比较微弱之工部局，吾人如指望其作出万全之措施，可能为过分之要求。但工部局之首脑部门完全由英国人组成，对此次日本纺织会社罢工之取缔，是否已表示与英国人所办工厂发生罢工时之取缔同样之关心与诚意，可断言其颇有值得疑问之余地。

二、中国警察厅之取缔

中国警察当局，一般对于公安秩序，漠不关心，固不待言；尤其对于租界内或越界筑路地区一向与中国警察几乎全无关系之日本工厂中所发生之罢工，并不具有重大之责任观念，毋宁可称为当然之事。最初接到本职所提出之取缔要求时，并未立即采取适当手段。但自二月十五日丰田纱厂伤害我国人之事件发生后，常警察厅长始知事态甚为棘手；且由于彼本人到任不久，对地方情况尚不够了解，主要督促在职多年而经验丰富之蔡督察长，担负对集会、暴行等取缔之责任。同时探查内情，努力于问题之解决。固然，对于素质不良之中国警察，不能期望其有周到之取缔。虽然如此，二月十七日，警察一队与罢工工人发生冲突，双方均有负伤者；并逮捕其中之三十名。又于二十日^①在与租界巡捕共同协力之下，将主谋者之一蔡之华逮捕，拘留于附近之警察署，结果有七百名罢工工人前往袭击，经过开枪威吓，始未逞退去，罢工更有进一步缓和之兆。以后又到处张贴告示，阻止煽动者妨碍工人上班等。总之，过去在发生罢工之工厂附近，中国警察对于上述多少带有对〔排〕外倾向并具有群众色彩之运动，经常以放任主义之态度对待之；现在可称为具有相当之诚意。在打击煽动者之气焰与支持善良工人方面，可认为已有良好之影响。

第七，调停与结束

罢工工会向会社方面提出要求条件系于二月十七日左右，由居间调停者沪西四路商联会，向内外棉经理冈田源太郎非正

^① 系十九日之误。

式提出。当初罢工者预定扩大罢工范围，并拟将罢工交涉权交由罢工工人后援会办理，向会社方面提出要求条件，然后开始交涉。但商联合会由于地区上之关系，认为与各罢工工厂有其共同之利害，因于二月十七〔二〕日召开紧急会议，成立委员会，代表工人方面，向内外棉会社提议调停。但此乃内外棉会社与工人方面之单独交涉，并非属于罢工团全部范围之事；四路商联合会代表内外棉工人开始交涉所提出之七条件，亦即罢工当初传单上所记载之条件，而通过商联合会之手，送达会社而已。

最初，袭击内外棉会社之后随即退至闸北沪西工友俱乐部之工人团体，并未向会社提出何种要求条件，与一向之罢工及其出发点完全不同。其所以使会社方面对之抱有怀疑之感者，乃由于罢工之实质，已说明其并非单纯之工人罢工，而其运动方针乃系有组织之活动故也。

至于会社方面，认为罢工之出发点甚为简单，按照中国工人之通例，数日后，工人为生计所迫，即将要求复工，而不讲求任何调停之道，徒然等待“彼等之屈服”，以漫不经心之态度对待之，不着手于对罢工原因之调查研究，以致稽延调停之机会，致使自身之损失增加。且对偶有少数女工提出复工要求，或对会社所称为善良工人之来厂，即误认为罢工方面业已软化。迨罢工变为暴动，大举袭击，发生多数之负伤者，器物更遭破坏，眼见受到巨大损失时，始狼狈商讨善后对策。事件发展至此，罢工工人之凶暴气势益形嚣张，事态益形严重，并无何种镇压手段可用，只得任其发展而已。

因此，会社方面屡次召开职员会议，由于不能作出任何有关

对策之具体方案，多次流会，徒然浪费时日。会社于茫然惊恐之中，恳求总领事馆出动陆战队，以求解决罢工，因此更引起罢工工人之反抗心，并授予反帝国主义运动集团以攻击之利器而已。

然与罢工策源地邻近之沪西四路商联会，于二月十二日下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出面调停；邀请罢工团体代表，于听取其经过报告后，推选会长马松岩等四名为调停员，经与工会协议后，提出解决办法七条，加上中国纱厂代表统益公司经理吴麟书，至十七日正式向内外棉会社提出调停案。其后双方经过多次交涉，会社方面重要职员之间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于是决定由目前之负责者内外棉单独交涉，即主要以经理冈田源太郎担当交涉之责任。后双方意见逐渐趋于一致。继就罢工工人后援会之意图协议以后，二月二十五日，该会社董事长武居、经理冈田两人，在总商会与中国方面之总商会会长、商总联合会会长、淞沪警察厅长、代理交涉员等开会，对以下的调停条件进行协商。

(下略)

(译自日本外务省档案显微胶卷第564卷，第419—463页)

(二) 上海公共租界当局的镇压和破坏

1. 工部局的镇压活动

工部局派探捕保护日商纱厂，逮捕工人学生

日商内外纱厂罢工风潮仍未解决，昨日除第三、第四及第十五三工场外，均未开工。工部局麦总巡特派副巡率带探捕多人，

分驻各工场保护。日前被捕之工人十三名,押在捕房,原定昨日开审,因手续未完,改期明日(星期六)递解公堂,由日领事田岛会审。又大夏大学学生一名,已由该校校长代缴保证洋二百元存案保出,明日亦将到堂候审云。

(《申报》1925年2月13日)

兹悉,自此项风潮发生后,所有日商第五、七、八及十二、十三各厂,迄昨仍未开工,只第三、四及十五三厂则照常开工,但每日到厂工作者皆不能足数。而罢工之工人,因其不与取一致行动,故前日有多数罢工者拥至开工之厂滋扰。经该管普陀路捕房得报,即派包探施金生、荣锦林、崔顺扣等驰往弹压,拘获周世元、姚文豪、王小四子三名,余人乃各散去。昨晨,将该三名解送公共公廨,由关谘员会同美领雅君,略一质讯,判均押候日领堂期解讯。

(《申报》1925年2月13日)

江北人王阿二、宋安桂、钟宝康、高永林、王永祥、陈红发、高仁进、严金波、谢怀松等,同在沪西极司斐而路日商丰田纱厂内做工。前日午后,全体工人罢工时,因机件毁坏,当被该厂经理日人用电话报请戈登路捕房,派令中西包探往将以上各人一并拘押。昨解公共公廨,即据中西包探上堂,禀明前情,中西官得禀,以原告系属日商,判被告等押候日领堂期解讯。

(《申报》1925年2月17日)

镇压工人进德会

自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之纱厂发生罢工风潮后，杨树浦方面之日商纱厂中大康、裕丰两厂之工人，亦相继卷入漩涡。此项工人，并组织工仁〔人〕进德会于眉州路六百零三号门牌，推举某校学生湖南人蔡之华为该会会长。前数日，已经杨树浦捕房得悉，以彼等将有越轨举动，稟请公共公廨出有拘票查提讯究。正在进行间，蔡之华又于前日午后邀同工人数百名往引翔港周家湾露天演讲，言词颇为激烈。该处系华界，为警厅五区四分所辖境，故警局即派警察到场干涉。而杨树浦捕房，以其地昆〔毗〕连租界，亦特派包探程海彪、耿德标驰往察看举动。各工人不服干涉，警察遂开枪示威。捕房得报，当加派印度骑巡及西捕武装前去制止暴动，并将蔡之华暨附和之工人高雨田、沈荣泉、陶阿毛、陈竹三、严宗荣、戴宝成、张阿三、张文奎、许品高、范凤移、乔云芝、董泰岱、杜万荣、江海坤、陆荣田等十五名拘获，其余工人，始各走散。此一场纷扰，计自二时起，至六时止，风波才息。

昨晨九时半，捕房将所获各人，并解公共公廨第二刑庭，由邵襄猷会同英领惠君审讯。程、耿两包探，即上堂陈明闹事情状，并称第一被告蔡之华，自称为工仁〔人〕进德会会长，煽动各厂罢工，聚众开会，业由公堂出票飭提有案。乃蔡复于十九日下午邀同工人在租界外之引翔港开会，胆敢拒捕。查各工厂皆属日商，请将本案归日领陪审云云。中西官遂谕被告等拘押，候下礼拜六(二十八日)查明再讯。

(《申报》1925年2月21日)

吴先清前在工人所组之工人进德会演讲，被捕得释。前日吴又在引翔港周家湾分发传单，鼓动大康等纱厂罢工之各工人坚持到底，非达到要求条件目的不止。事经杨树浦捕房得悉，派探程海彪往将吴先清逮捕，移提至捕房，昨晨解送公堂，经中西官讯供一过，判吴交一百元保，候礼拜六(二月二十八日)讯明再核。

(《新闻报》1925年2月24日)

兹悉杨树浦捕房捕头强生氏，深恐工人中一般激烈分子仍有用工仁〔人〕进德会名义聚众在界内秘密开会演讲情事，昨特派通班中西包探分往华租交界之区，严密侦查，以保公共安宁。

(《申报》1925年2月23日)

2. 会审公堂审判《民国日报》社 及被捕之工人、学生

因刊登罢工工人文告，《民国日报》记者受审

本报因于本月二十日登载日商各纱厂罢工工人泣告同胞书，由总巡捕房向公廨起诉，控本报记者邵力子扰乱治安，违犯出版法第十一条第二项。昨晨传讯。首据西探长萨拉夫译述案情，将报纸与译就之西文呈案，并请展至日领堂期再讯。邵君延代表克威律师声称，被告近曾三次到堂，第一、二次均判注销，第

三次交千元铺保在案，此次本律师可保证其到案，请无庸交保。所载泣告书，系工人方面印成送来，他报亦有登载（萨西探长即声明，尚有两家^①亦已起诉）。至被告本人对于工潮之真意，系主张由中日两国商会出任调解，二十日所载被告署名之言论即可作证。堂上如即开讯此案，请主持公道云云。关谏员核供，商之英马副领事，令判展期至本星期六（二十八日）日领堂期解讯，被告仍交一千元原保，保其于本案到庭，并具五百元切结，于本案未讯结前，不得再有此项登载。

又本案传票送达本报记者时，为前星期六（二十一日）下午三时，是捕房请由公廨签发搜查谕证，由西探二人，华探捕六、七人，至本报全部房屋实行搜查，直至六时许方返捕房，带去帐簿等多种。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4日）

审判被捕之罢工工人及学生

前次日商纱厂罢工风潮，公共捕房将牵入罢工漩涡之学校男女教员学生及工人拘获五十六名，连同传单旗帜并捣毁纱厂之物件，分别解廨讯判交保、收押。昨日午后二时半，由陆襄谏会同日副领事田岛氏开审。各被告由杨树浦捕房解到者二十二名，普陀路捕房解到者亦二十二名，静安寺捕房解到者九名，戈登路捕房解到者三名。

先由工部局代表梅脱兰律师请求堂上挨次研讯，以便逐案

^① 指《商报》和《中华新报》，最后判决各罚洋九十元，而《民国日报》则罚洋三百三十元。参看《申报》四月五日和《民国日报》四月十九日报道。

结束。继由克威律师声称：敝律师代表同兴、裕丰、丰田、日华、大康、内外棉各纱厂五〔三〕万余名之工人。今罢工风潮已经解决，至其起因，当系工人吃苦过甚所致。日前陪审领事回国时，适敝律师正在进行调停之际，敝律师在总商会与厂主冈田等磋商，订立条件签字后，工人均已上工，而冈田君亦不主张将被捕之工人重办。各被告在押已有两三星期，如堂上以为被告应按法惩办，应请从宽发落云云。

堂上遂审所控张和尚散发煽惑罢工传单案。张供在大康纱厂做夜工，传单系于放工时该厂门首拾得，并非我受人指使散发。某号日警供称，伊目睹张散发传单，故此将其逮捕。问官磋商之下，判张罚洋十元，无力改押七天。

继审所诉工人诸小大、徐开宝阻止工人进厂上工案。结果判诸罚洋二十元，无力改押十四天。徐讯无证据，将案注销。

继审控告蔡之华、吴先清、张阿三、郁甫良四人鼓动工潮案。中西包探上堂禀明拘获被告情形，并称因蔡在引翔港周家湾露天演说时，语多激烈，中有“捕房中西包探若来，我们打死他不要紧，因此处系中国地界”之语。克威律师起称：第一、二两被告既系教员，并非工人，当与此案无关，应请将控案撤销。

堂上质之蔡之华。蔡供称湖南人，来沪谋事，去年十一月就眉州路六百零三号工人进德会书记之职。该会内容我实不知，亦不审是谁组织，但知会长前为郁少如，会员尽是工人，数约三百余人，经费由会员缴纳。会内学校系该会所办，我月支薪金十五元。罢工之事，初由工人来会，与我谈及，（中略）并无说过将包探打死不要紧之话，想因言语不通误会。会内抄出小册，系由邮

局寄来，传单则系工人持来。

又据女教员吴先清供，杭州人，去年八月来申，任五区小学教员，至十一月始担任工人进德会学校教职。对于罢工之事，我未干涉，初次被误拘入捕房，旋即释放。是日我往申新纱厂左右之某纱厂唤女工进校读书，包探说我煽惑大康纱厂工人摇班，遂又被拘去等词。张阿三、郁甫良两人均否认加入罢工之事。问官核供，以蔡、吴两被告身为教员，不应干预外事，实犯新刑律第三百二十一条妨害秩序罪，判蔡罚洋二百元，无力改押西牢六月；吴先清罚洋一百元，无力改押女所三月。并着两被告各具以后不得再有同样行为切结。审至此已五时，问官退庭。

休息十五分钟，继续开庭。捕房将戴宝成等十六名带案。即据被告等所延之克威律师声称：对于本案案情，敝律师并无机会研究，要求改期。堂上未允所请。遂由梅脱兰律师向九十号西探诘据供称：控告被告等扰乱治安。缘十九号下午三时，我在引翔港捕房内，见外面有工人约七百余名，半在租界，半在华界，用野蛮手段将捕房所围之竹笆推倒，势欲拥进，当经我等向空开枪始止，尚不散开，内有工人为首，即高雨田、陈竹山。后我电告杨树浦捕房，未几捕头强生等到来，喝令散开，否则开枪。华捕持棍冲锋，约有五百码；华界巡警向空放枪数响，始各散去。惟获案之被告十五名不退，故与巡警协拿。

第五被告高雨田供出，发起罢工者系周锦章，九日在厂中吃饭时，周曾言及罢工之事，在眉州路六百零三号开会。我于正月初二日（一月二十五日）去过一次。到校者每日出资六分。第九被告陈竹山，亦有供词，据云四年前在纱厂工作时，被机器轧断

足骨后，在眉州路六百零三号学校内为看门，该会曾开会三次，到者甚众，周锦章系校中首领，传单等件均系周携至校中。又据西捕头强生，包探程明德、耿德标先后禀陈各节。堂上核供，向各被告诘问，均称并不预闻。官判陈竹山罚洋一百元，如无力缴洋，改押三月；高雨田罚洋八十元，无力改押二月零十天；董泰岱、沈荣泉罚洋五十元，或各押四十天，并着具安分结；其余戴宝成、夏宗荣、许品高、范凤贤等十一名，各罚洋五元。

继讯冷双新、徐德贤、王吉成因阻止女工进厂工作案。讯明结果，判冷罚洋二十元，无洋改押十四天；徐、王各罚洋十元，或押七天。

时已七点余钟，尚有三十一名不及讯问，着带回押候礼拜六上午九时半再讯。

(《民国日报》1925年3月11日)

日商各纱厂罢工时，捕房拘获参预工潮之工人、学生等五十六名，本星期二(十日)经公廨讯诘二十五名，已志本报，尚余三十一名，昨晨由捕房解堂，由陆襄猷会同日副领事田岛君提讯，先将张荣、苏定才、沈子良、董小秋、张长坤、王甫定、汤锡春、刘秀林、郑布远、周光卿、李兴生、许金台、季小四子十三名提案，捕房代表梅脱兰律师声明控告各被告扰乱治安；旋由普陀路捕房捕头及中西探捕相继禀诉一切，并称二月十日上午十时半，得报第九纱厂发生罢工风潮，见各工人分执铁条毛竹木器，虽驱逐不散，嗣经取出手枪示威，若辈乃各惊散，只将第十三被告拘获。该工人等又拥入第十三、十四纱厂捣毁机器，并将厂中日人打伤身

死，故又往该纱厂拿获第二、三、五、八、九、十、十一等被告，其第四、六两被告系在路上拘获；第十二被告在捕房门首拘获；第一被告张荣由一一九九号华捕拘获云。随将铁条棍棒两捆、榔头一个呈案请察。工人代表克威律师以各被告除张荣外在押已久，如讯明有罪，请求堂上格外从轻发落云云。讯之张荣供称：四川人，去年九月来沪，在大夏大学肄业，学校离纱厂约里许，是日往观看，毛竹片系在路上拾得等语。

其他各被告，除王甫定供非工人外，余均承认系第五纱厂小工，但对于捣乱〔毁〕机器，殴打东洋人均各否认。中日官核供会商之下，陆襄猷宣谕云：本案情节较星期二所审者为重，因星期二所审之工人仅有罢工举动；本案罢工而外，并毁物伤人，故处断应予稍重。李兴生、季小四子两名证明各执凶器，应各押满西牢六月，凶器没收；张荣具结开释；许金台被控证据不足，将案注销；苏定才等九名着各罚洋五十元，无力各押满五十天。

继提姜文宣、溥云汀、郭振嘉三名上堂。由探目沈崇礼及华探二人禀明，见彼在途分发罢工传单，故而拘案。讯据姜供传单系拾来；溥、郭两人同供，传单系他人给与散发。堂上则判姜、溥、郭各罚洋二十元，无力各押十四天。

继审捕房控告周世元、姚文豪、王小四子在途阻止工人上工案。讯明以王胸挂内外棉厂工会纠察员白布徽章，无可抵赖，因判罚洋二十元，或押十四天。周、姚二人讯无证据，将案注销。

继提赵海清、盛逸生、赵小富子。讯据沈探目禀称：赵海清系公堂出票飭提之犯，在其家内抄出传单四纸。盛系在东京路拘捕，其身畔抄出传单及代表工人往（浜）北开会之信函，并查其

充当义勇队,赵小富子则充义勇队百总等词。质之赵海清供称,传单系人发来,盛供信函等件系会场中人给我;赵小富子否认在会场令工人不去做工。问官会判赵海清具结开释;盛罚洋十四元或押七天;赵小富子罚洋二十元,或押十四天。讯至此,已十二句半钟,尚有九名不及讯问,判仍带回静安寺捕房,定二十五号再讯。

(《民国日报》1925年3月15日)

日商各纱厂工人罢工时,捕房曾拘获工人数十名,迭经讯判,尚有九名未经讯结,于昨日下午二时开审。静安寺捕房解到王阿二、宋安桂、钟宝康、高永林、王大祥、陈红发、高仁进、严余波八人,尚有谢怀松一人,则因患病已送医院医治,故未解案。先由捕房代表梅脱兰律师说明案情,继由西探报告当时肇事情状,谓十五日下午六时得丰田纱厂电话,以该厂发生罢工风潮,机器等物被毁,当于七时半驰往,见厂外聚集工人千余,即入厂查察,见电灯已被熄灭,拘获第一被告,其第二、五、六、七、八被告,系捣毁机器者。聚集路上之工人,则拾石向厂中投掷,该厂乃将门关闭。后我至厂外,尚有二、三百名未散。第三、四被告系拾石掷击者,遂将其拘获。我往该厂时所乘之汽车,停于极司斐尔路,几被工人推入河内。时有日本人乘汽车经过其地,若辈将车喝阻,并开枪,致有一日本人遭枪击伤,此外复有一日本人被若辈殴打后,摔于河内,旋经舟子救起,送往医院,隔数日而死,惟凶手迄未拿获云云。各被告除高永林系豆腐店伙外,余均系丰田厂小工,高延斐斯律师代辩,余人概由克威律师代表辩护。质

之各人，皆否认熄灭电灯，捣毁机器，拾石投掷等事。经陆襄猷核供，商之日副领事田岛，以高永林既非纱厂工人，更不应插身滋事，判罚洋二百元，无力改押西牢六月；余人各罚洋一百元，无力各押西牢三月示儆。

(《民国日报》1925年3月26日)

3. 上海英美报纸的攻击言论

英国《字林西报》^①社论《布尔什维主义在纱厂》

日商纱厂罢工事件最有重要意义的现象是：虽然从罢工开始到现在已有一个多星期，竟没有一个人真正能够明确地说出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不用说有一万五千个工人，就是只有一千五百个工人，或只有五个工人，总不免有个别工人怀着委屈不满的情绪，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昨天本报登载的内外棉纱厂总经理关于工人待遇的谈话中自称他们所做到的事，都是与当事双方无利害关系的旁观者所能证实的。厂方以极低廉的租金租给工人居住的工房占用了公司很大一部分的地面，其条件比其他工厂都好得多；工人子女可以免费就学；而结合其他有利于公司的情况来看，他们说他们特别当心防止工头和监工有任何迹近压迫的行为，这也是完全可以信得过的。我们没有特殊利害关系要为内外棉纱厂辩护，当然也绝不想仅仅因为工人是罢工者而谴

^① 《字林西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是英国在中国发行最早、历时最久的英文日报，创刊于一八六四年七月，名为商办，实际上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机关报。在经济上得到工部局的补助。

责他们。不过我们相信,任何公正的评论家都会承认,这家公司对待工人至少可以说是很公平的,如果我们不想用更热情的字眼的话;这里肯定有一项事实证明,即有大批工人曾于通常鸣汽笛的时候前往工厂,虽然他们人数不足,还不能使工厂开工,但因他们曾到厂上班,公司还是算给他们每天百分之三十的工资,记在他们的工钱折子上。

罢工的整个过程证明,罢工是煽动分子和狂热分子制造出来的;而且,虽然可能并没有俄国的直接影响在起作用,但是根据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含意的布尔什维主义,那肯定是有的。在上星期二,后来又一次在星期天,两次暴动,在摇旗呐喊的行列中,人们看到有学生,其中有一两个还是女学生。狂暴的过激主义,就象麻疹和其他的婴儿疾病一样,本来是幼稚的知识分子发育中的一个正常的阶段。不过在中国,在这样的危机中,有学生积极参加,可不能象在别国那样放任,因为这里随时有一伙恶棍,准备在群众骚动中混水摸鱼。而且,虽然那一时发狂,以错误的自我正义感走上街头,为罢工工人大声疾呼的少男少女,也许与其说应受责罚,不如说应该可怜,但在他们背后指挥的往往是一个象蛇一般恶毒的教师。在递交给内外棉纱厂的一份文件上盖章的那些联合会和大同盟的领导人当中,有很多是著名的捣乱分子,捣乱好象是他们生活的唯一目标;顶好的办法是把这种人从租界上和租界附近地区连根拔除。

这种情况以及其他类似情况,使人们对闸北警察工作的松懈更加感到遗憾。毫无疑问,罢工之所以持续下去,是因为工人们正受到威胁。有很多工人住在苏州河对岸的闸北,每天要摆

渡过苏州河，而煽动分子一直在渡口设有纠察，把工人们赶走。有一些工人设法到达工厂，照上文所讲到的办法在工钱折子上记上工资，竟有人尾随他们回到家里，在他们家里把工钱折子抢过去，加以撕毁。这种情况已经不只一次或两次提请闸北警察当局注意。特派交涉员陈世光先生和淞沪警察厅长常之英上校都曾受到人们催促在上述渡口增设岗位，实行警卫。一点有效的行动他们也没有采取。他们的确派出了警察，不过不是警察所到的地方不对头，例如昨天有四十名警察在丰田纱厂值勤，一无所事；否则就是他们根本没有奉到指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事。其结果人们就可能看到这样的现象：一边煽动分子举行妨害治安的会议，威胁那些非常想做工来维持生活的工人，一边警察却站在那里袖手旁观。我们了解，常之英上校是奉军第一军张宗昌将军的近亲。他对于警察工作的专业知识可能比较缺乏，不过，出身于这样的家庭，他总该懂得一点纪律；而容许煽动分子、恶棍和着了迷的男女学生，把只有百分之十不到的工人支持的罢工维持下去，乃是与一切社会正义和良好秩序背道而驰的。如果工人真有委屈，让他们向公司提出来解决好了。可是这恰恰是煽动分子所不容许的，这在香港和广州的罢工中已经得到非常充分的证明。

在此期间，形势真是严重极了。整个公众情绪是处于如此不安的状态，通常的统治机构的权威是如此的不稳，随时可以发生冲突的因素是如此之多。任何骚乱，即使表面上看来是地方性的骚乱，都是不能容忍的。倘不立即制止，无论其扩展的范围或扩展的程度都不知将到达什么地步；而且，如果租界境外的警

察不能对付那些捣乱分子，人们很容易会要求工部局的巡捕来对付他们，这个要求非常强烈，不能置之不理。我们可以肯定，常之英上校绝不希望在他任职之始就留下一个布尔什维克分子暴动的疤痕，一旦他对苏州河边的形势有了认识，他就会认真责成闸北警察给予煽动分子以应有的惩处，把纱厂工人解救出来，让他们在和平中谋生。

(译自《字林西报》1925年2月18日)

美国《大陆报》^① 社论《纱厂罢工的教训》

谁也没有真正地意料到上海各纱厂的罢工会持续多么长的时间。在罢工过了约两星期以后，发出了一条令人兴奋的部分复工的消息，这可以十拿九稳地被看作是不久即将全部复工的信号。不复工是不行的，因为工人们手头无钱，而且到了现在，恐怕他们对罢工也都从内心感到厌倦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古老的“面子”问题，怎样可以最最不失面子而复工。

纱厂罢工与公共汽车罢工^②两者都暴露了一个显著的事实，那就是，在这现代中国的多事之秋，对付工人乃是一件极其微妙而困难的事。就纱厂罢工而论，几天前内外棉纱厂总经理曾发表一篇谈话，似乎可以证明，工人们总的说来是得到厂方的良好待遇的。在该厂所有的一大块地皮上兴建了许多工房，供工

① 《大陆报》(The China Press) 是美国资本在上海所办的英文日报，创刊于一九一一年八月，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间，由于工部局美籍总董费信悖(Stirling Fessenden)等参加了《大陆报》的理事部，该报就和工部局发生密切的关系。

② 指英商公共汽车售票员从二月十二日开始的罢工，结果遭到破坏。

人们居住，租金非常低廉，而居住条件不比别处差；还为儿童设置了免费的学校；厂方还特别注意避免工头和监工有任何类似压迫的行为。讲到公共汽车罢工的事件，应该对它说公平话，公司在录用售票员一事上是煞费苦心的，所有售票员都得到在外人所办的学校里受教育的栽培。他们赚到优厚的工资；为了鼓励工人，还实施奖金制度；他们中间，有的人还有免费的宿舍可住。然而，一到职业的捣乱分子，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或某种特殊的政治目的而开始在工人中间煽动的时候，对于防止罢工，所有这些东西都无能为力了。但是为了替中国人讲句公道话，同时必须说，中国工人并不是个个都是忘恩负义的，具体的事例就是，当售票员背离他们的雇主时，司机员仍然忠诚而勤恳地坚守他们的岗位。就纱厂罢工而论，我们知道，正当骚动极度猖獗时，很多工人仍按时到厂上工，虽然人数不足，工厂无法开工，但是因为他们照常到厂，资方为了酬答他们的忠诚行为，特地在他们的工钱折子上记上当日工资额的百分之三十。这一事实本身就表示，即使在通常人们把它认为是冷酷无情的实业界中，慷慨的精神并不是全然没有的。

甚至在那些往往喜欢使外国人难堪，特别是在条约权利问题上使外国人难堪的行业中，现在也认识到，以心安理得的态度对待劳工骚动，是有危险的。因此，北京报界有一家同行，近来对于外人和外人利益一直很不友好，但是对于上海各纱厂的罢工，却表示出更有政治家风度的见解，宣称罢工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粗糙的武器。

中国的工业制度要经历其他国家所曾经历的类似的困难，

这并不是违反常理的事。在中国，曾经发生过许多按西方人通常理解的那种含义的劳工争议，但是象上海这次争议，规模如此之大，却是不多见的。在一天之内，不下于二万七千名的纱厂工人参加罢工的景象，如果不是布尔什维主义侵入中国，那是决不会在实际政治领域里出现的。罢工，除了是一种粗糙的武器外，也是一种懦弱的标志；罢工一旦实施，就为许多与该项争议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带来了不便和困难。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中，曾经作出严肃的努力，就罢工是愚蠢的行为一点，对工人们进行教育，并且采用通过协商解决争端的方法；为了协调劳资双方之间的争端，各种机构都已建立，结果便是愈来愈让仲裁在实业界中担负重要的任务。然而，在西方国家中，罢工尚未绝迹。事实上，罢工事件似乎仍象已往那样的多，但不象二三十年前那样听任它们演变为凶恶的斗争。为社会着想的精神已有了发展，各国政府也觉得劳工争议影响国家安宁，因而是不能容许的。中国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上海的罢工，如果是工人们为求改善条件而进行的努力，我们对之不能不寄予同情，虽然他们使用暴力这一点是必须引为遗憾的；但是如果罢工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布尔什维主义显露头角的开端，那么，辞严义正，大张挞伐，决不会是太过分的。

此次罢工所取得的主要教训是：带有布尔什维主义色彩的煽动者，企图在上海的劳工界煽动不满的情绪，否则在新近的骚动中不致发生无意识的破坏财产的举动；这种举动便是警告当局，每逢劳工争议隐约出现之际，狂热分子就在附近乘机而动，除此以外，别无其他作用。我们经过考虑认为，如果不是威胁者

和心怀不满的本地工头的活动,纱厂罢工不会达到现有的规模;如果中国当局决心给予他们应得的惩处,那么,此次罢工所受的损失就不会是白费的。

(译自《大陆报》1925年2月27日)

英国《上海泰晤士报》^①社论《纱厂罢工的重要意义》

随着纱厂罢工的持续,有一点已日益明显,即正在酝酿着一次严重的运动,在上海制造广泛的劳工骚动。当中国人在内外棉纱厂最初罢工时,人们想,如果工人们有什么委屈,向厂方说明,双方很可能达成一个解决的办法。因此,当闸北警察署拘捕了一些违法乱纪的中国人时,厂方不愿处罚他们。但不久就看得很明显:工人是煽动分子煽动起来的,这些煽动分子一部分据了解是从广州来的具有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中国人,一部分是那个布尔什维克主义温床——所谓上海大学——的学生。昨天有比以前任何一天为数更多的工人表示:只要其他罢工者许可,他们愿意复工,因此已有大批工人向厂方领取补助。因为,谁都知道,大多数工人是做一天吃一天,不做工就等于断绝他们每天的口粮。现据可靠消息:华商各厂和其他一些工厂的工人也在露出不安的迹象;那些策动目前骚动的中国人,正在尽一切力量在这广大的工业地区引起骚乱;如果此刻他们还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功,那只是因为工人经不起停工,他们没有准备发给他们罢工救济金的工会。在这种情况下,毫不奇怪,所有雇主都十分担心事态的

^① 《上海泰晤士报》(The Shanghai Times)是英国资本在上海所办的报纸之一。

发展趋势。中国纱厂老板们已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他们但愿太平无事，但在他们所雇用的工人中确有很多骚动的迹象。

这次罢工有一件很奇特的事，就是资方一直搞不清罢工者到底要求些什么。虽然罢工者拟定了一些要求，并已对外公布，但从未将这些要求提交资方，资方也一直没有同劳方所推选的任何谈判代表面谈。工人们实行罢工，或是因为他们听信了煽动分子的话，或是因为他们不敢去上工。就资方而言，他可能的前景是更多的骚乱，如果工厂不关门，厂房设备将遭受进一步的破坏。很自然，捕房保持着最高度的警惕，但是罢工的煽动者据说是以闸北和南市为活动基地，因此，如果不想让罢工运动蔓延，致使上海工业全部停顿，就必须把捕房的大部分活动放在闸北和南市。同时，在这个时候，中国报纸也有责任向大家讲清：工人有委屈痛苦而不以适当的方式提出，是不能希望得到解除的；违法乱纪的行为，例如进行威吓和暴动，将受到严厉的制止。布尔什维克分子，其中包括一些中国妇女和乳臭未干的学生，在企图毁灭工业家的事业时，如任其得逞，十分明显，本埠的贸易必将被全部打乱，而且罢工运动必将从上海蔓延到全国各地。我们绝不愿看到香港的罢工^①在此地重演，香港的罢工也就是这同一批广州布尔什维克分子所发动的，防止这样的灾难的唯一办法就是采取有力行动，不再迟延。

(译自《上海泰晤士报》1925年2月12日)

^① 指一九二二年初的香港海员大罢工，随后蔓延成为香港各业工人的总罢工，终于迫使英帝国主义者接受海员工会的条件。

(三) 淞沪警察厅的镇压和破坏

四区警署不准工人开会

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会函呈四区警署略云：工人等因无端被洋东歇退百数十人之多，致十一厂全体二万余人大动公愤，已一律同盟罢工。但租界在外人势力范围之内，本会拟开大会公共讨论，必难办到，故将会场移来贵署辖境潭子湾地方，请求俯准等情。

刘署长以潭子湾军队云集，恐开会时人数众多，滋生事端，批斥不准，一面传知该处分驻所派警严禁矣。

(《新闻报》1925年2月12日)

警厅制止工人开会

日商内外纱厂工人同盟罢工，拟在闸北潭子湾开会，经四区刘署长批驳，已志前报。

昨日下午四时，该工会会员五百余人，聚集大丰纱厂东首空地上，欲开会讨论。淞沪警厅长常之英特派解督察长带游巡队队士二十余名，闸北侦缉队队员樊国柱亦派探员张福、侦探苏升、张金海、姜金荣，四区刘署长派李巡官带长警两排，前往一再开导。当有刘女士在众中演说，大旨勉励工人循序进行，力图自强等语。时届五句钟，该工人等未曾开会而散。

(《申报》1925年2月14日)

本埠日商各纱厂男女工人同盟罢工,风潮扩大,双方各走极端,一时不易解决。淞沪警厅长常之英,前日据陈交涉员转来日总领事照会,请求派警武力解散该工人等集会。昨日下午三时,据本厅稽查员报告,又有数百工人拟在曹家渡露天开会,特派卜督察长会同四区刘署长、四分所李署员、侦缉队樊队员、游巡队王队长等,各率长警侦探前往该处善言开导,该工人等并未抵抗而散。当将工人所组之义勇队大旗一面扣留,带回警厅存案。

(《申报》1925年2月18日)

警厅布告胁迫工人“安分上工”

淞沪警察厅昨发布告云:

为布告事:照得现值戒严期内,所有集会结社,照章不准;至同盟罢工,亦属有干例禁。前次纱厂工人罢工,曾经本厅长剖切晓谕,并派员开导制止在案。乃工人等愚鲁无知,仍复有聚众开会,抗不遵从情事,似此不法行动,本应按照刑律从严办理,第念工人等本系良民,此次酿成变端,系有不逞之徒,从中煽惑。本厅长负治安责任,然不忍不教而诛。除飭区查禁解散外,为此布告,仰各该工人等一体遵照,其各安分上工,切勿听人唆使,聚众滋事;倘再冥顽不悛,仍有前项情事,一经拿获解厅,定将为首之人尽情严办,勿谓言之不预也。切切。此布。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5日)

逮捕罢工领导人和工会干部

本埠日商各纱厂男女工同盟罢工已历十天，该工人等连日拟在闸北开会，均经警察解散。前日下午傍晚时，有该会代表湖北人邓忠^①、扬州人李金生带领工人施万才、郭永生、陈如杭、杨秀生、施心庆、徐振雨、陈光来、戴三^②、王秀身、陈杜文、王金国、刘升、白义有、马清才、姜阿二、苏勤永等十六人在叉袋角宣传罢工，四区二分所岗警李凤彩、宫廷海、邹景和、凌绍仙等上前阻止，工人等略有抵抗。时适在各厂放工之际，有面粉厂小工及车夫小贩人等附和，经该所祁署员闻信，率同通班长警到场，拘获二十九人^③，转解司法科，昨解本厅讯究。

(《申报》1925年2月19日)

前日下午，又有丰田纱厂罢工工人湖北籍关民宣、孙良会〔惠〕二人，在闸北叉袋角分发传单，宣传罢工。当时因路人均忙足听讲，岗警将关、孙二人拘入四区二分所，转解司法科，昨解本厅核办。

(《申报》1925年2月21日)

远东通讯社译日文上海日报之工潮消息如下：

工人会长之拘捕 东洋纱厂及其他既已参加罢工中之不良

① 即邓中夏同志，应为湖南人。

② 戴三，即戴器吉同志，内外棉五厂工人，中国共产党党员。

③ 据《民国日报》二月十八日消息，二十多人是在工人结队游行时被捕的。

分子,并工人会干部,约五六百名之团体,前日(十九日)午后二时,在沪江大学附近空地,并有女学生混入,开演说大会。推刘某为会长,报告罢工开始后之情形及交涉之经过,谓日本纺织公司方面,前日正式与罢工团开始交涉,不意突然变更云云。不料警察早在警戒之中,即令二十余名之武装警察严重取缔,但昂奋之群众,对于武装警察之举动非常愤激,遂起冲突。警察始终取严厉取缔之态度,遂由当局命将罢工煽动之嫌疑人拘捕,因将工人会长徐锡麟及日〔同〕为首魁之蔡氏^①拘入引翔港警局。

而开会当时之大日本纺织工人会及其他一群,目击两氏被捕,遂各报告于本部,协商善后之策。结果各罢工人会员及其他约一千人,于午后四时左右,群集引翔港警局,并强要释放被拘之二人,因警察拒绝,激昂之群众,大声骚然,渐有不稳之形势。中国警察因寡不敌众,无法可施,遂取最后之手段,并求援于租界捕房。杨树浦捕房无犹豫之余地,捕头率十数名巡捕到场应援,此时实已陷于不可收拾之混乱状态。于是中国警察、印度巡捕出非常手段,开放手枪,以为积极镇压之策。顽强抵抗之群众,受此胁迫而逃。于是警察乘此机会,拘捕目为首领之董某等十五名。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2日)

^① 蔡氏指工人进德会书记蔡之华。徐锡麟是工贼,并未被捕。

搜查和封闭工会

自日商水月纱厂^①罢工后,刻已牵延至十一厂之多,杨树浦大康亦继两厂续起罢工。昨晨同兴纱厂亦告停工,虽经沪西四路商联合会蒋逸民、郭兆吾、吴莘耕等出任调停,尚未妥洽。而闸北三德里之沪西工友俱乐部,昨午后三时半突被军队封闭^②,并将宣言布告等揭除,工人亦一并逐出云。

(《新闻报》1925年2月18日)

杨树浦罢工,昨日双方仍在坚持中。(中略)昨日下午二时,突有警察九人到工会中,将工人驱逐出会所,随用木条将门钉起。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1日)

中国警察自封工会之后,时有便衣探子及警察,往工会左近哨探。昨下午四时许,杨树浦巡捕又在工会附近捕去女教员一人。据目睹者云,该教员行经工会,见工会门上封钉木条,稍停伫望,即遭捕去云。

(《申报》1925年2月22日)

① 即内外棉纱厂。因内外棉各厂所出的棉纱,都是“水月”商标,故有水月纱厂之称。

② 可能是被搜查。据《民国日报》二月十八日报道,十七日下午因工会受军阀干涉,乃有工人游行之举。俱乐部并未被封,因工人以后仍在三德里活动。

加强戒备,严防罢工扩大

闻淞沪警察厅长常之英,昨为纱厂罢工事,特谒陈交涉员,会商消弭办法。闻常厅长业已通飭所属各区署严行戒备,胁迫及煽惑罢工如有发生,着即拿办云。

(《新闻报》1925年2月23日)

浦东三区警署曾署长,昨据警探报告,谓沪西纱厂罢工风潮迄未解决,该工人等日前在苏州河北岸,召集多数工人开大会后,拟分遣不良分子赴各处煽动,期使工潮扩大,并拟派人由其昌栈及洋泾港渡浦,来到浦东煽惑某纱厂工人附和罢工等情。曾署长除传谕各巡逻岗警注意防范外,昨晨特派巡长一名,率领巡逻队巡警五名,会同游巡第三队解队长,加派长警,分往其昌栈陆家嘴等处严密巡防,以弭隐患而保治安云。

(《申报》1925年2月23日)

(四) 工贼的破坏活动

以调解为名,进行破坏

上海工团联合会,昨日下午二时开会,到者电业工会、南洋职工同志会、纺织工会、京汉路驻沪办事处、车磨工会、安徽驻沪劳工会等工团代表三十余人,公推李恒林主席。议决案如下:一、(中略) 二、日商内外棉厂华工罢工风潮案,公决函请交涉

使，转请日总领事向该厂查询实情，再行讨论。一面推徐锡麟、朱润斌、张翼成、徐崇善四代表，持函与该厂工会方面接洽，以便进行调解。三、(中略)议毕，四时散会。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2日)

工团联合会昨日下午二时在贵州路六十八号会所开各工团紧急会议。到浙江驻沪劳工会、华侨工界联合会、上海纺织工会、南洋烟草职工会、安徽驻沪劳工会、丝纱女工协会、制墨工会、湖南劳工会、中国机器工会、参战华工会、安徽工界协进会、中华电气工业联合会、旅沪湖北工人联合会、印刷工会、车磨工会等二十余工团。公推李恒林主席，讨论援助日商内外纱厂罢工工友办法。首由徐锡麟报告办理经过情形。陈钟柔提议对于纱厂罢工工友，应组织临时专门委员会尽力援助，务使工友提出条件达到目的，并望早日解决，免工人受巨大痛苦。公决由与会各工团署名发起召集组织维持内外纱厂罢工委员会，本工团互助之谊，引工人趋于正轨，勿为无价值之牺牲，务达圆满结果。由文书股起草宣言，宣布中外。关于临时调查及应付事宜，推张翼成、徐锡麟、叶明东、李恒林、朱润斌负责办理。五时散会。

(《申报》1925年2月16日)

上海维持日商纱厂工友罢工委员会，商请各界共同发起调解工潮大会，昨由代表陈钟柔、夏寿亭等，分头向各界接洽，已得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上海房客联合总会、汉口路商界联合

会、广西路商联合会、民生协济会暨多数工团等同意。一俟沪上各团体接洽就绪后，即行组织大会。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3日)

上海工联合会昨日下午二时开谈话会，研究日商纱厂罢工具体解决方法。张翼成、郝和阶、叶明东等以为工人方面所提条件，本不甚高，只以无正式代表出面，遂起纠纷；现在暗中主持者，又因别种关系，感觉恐慌，纷纷他往，益滋纠纷。最近幸商界起而斡旋，或可早日解决。本会同入当以工界地位，持积极谋工人利益之主旨，协同进行，以尽职责。徐锡麟、朱润斌等谓，工人所提条件，多是空洞；现据多数工人声称，内有为工人所不必争而竟列入者，有必欲争而又未列入者，此层应请同人注意。最后袁晓南〔岚〕等发言，罢工已近两星期，工人受痛苦已深，须从速解决。次陈钟柔提议，所有种种意见，应以书面提出于维持罢工委员会，众赞成。五时余议毕散会。

(《新闻报》1925年2月25日)

向日本方面提供工运情报^①

本月十日，内外棉会社上海工厂爆发同盟罢工，蔓延于当地我国人经营的全部纺织工厂，形势颇为严重。最初以为罢工是由于共产主义者大夏大学学生的煽动，看成是劳动运动。根据以后的经过观察，罢工并不是局限于对我国人经营的工厂的单纯

^① 原标题为《关于上海罢工》。

的劳动运动,显然其幕后还充满着排日的气氛。(中略) 再则,为了参加京汉铁路罢工牺牲者纪念会,来北京的上海工团联合会代表王光辉,曾带来罢工情报,数度与前次所报告的铃江言一会见,相互商谈罢工团的今后行动。王于二十一日离此返沪。当时,王曾要求铃江同行去上海。而铃江以为为了“声援”,当不吝一行,但有鉴于目前自己的立场,对去上海之举似已加拒绝。铃江与王的关系,于前次所报长辛店举行京汉铁路罢工牺牲者追悼会时始行会晤。此外,铃江以本名与当地劳动团体或其他方面的关系,则在松冈驹吉来北京后,作为他的翻译员开始与各方接触。

大正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驻北京

田内务事务官报告

(译自日本外务省档案显微胶卷第 S 350 卷,第 122—124 页)

投靠官方破坏罢工

上海工团联合会于昨日下午四时,推举代表李恒林、卢哀鸣、何德显三君,前诣江苏特派交涉使公署,接洽解决工潮之办法。由陈交涉使、杨科长、周秘书等,并邀同常警厅长接洽会晤。首由工团代表报告工潮经过之实情,次即作半小时之谈话,其结果大约如下:

一、官厅承认工团联合会为正当的诚意的调解,于必要时并可酌量保护其进行。二、工团联合会须随时侦查工潮之状况,向交涉署报告。三、工团联合会须设法抑止工人之暴动。如工人必须集会时,须由工团联合会召集,并报告官厅派员到场弹压

云云。

(《申报》1925年2月20日)

上海纺织工会等团体拟请何丰林^①出面调解工潮，昨日已函致何氏。何氏接函后，因将赴宁，特委前沪北工巡捐局长许人俊为代表，定于今明日邀请劳资代表讨论和平解决之法，以免风潮扩大。工会致何原函如下：

茂如将军勋鉴：钧座前镇松沪，遗爱在民，同人至今欣慕无已。兹有恳者，近日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因待遇不良，工资微薄，不得已而罢工。不料一星期来，双方各走极端，风潮蔓延，影响治安，如再迁延，则一发难收，殊非地方之福。伏思钧座于沪地中外商民感情素洽，前军需科长、工巡捐局长许人俊与工人情形亦极熟悉，拟恳出为调人，派员向双方斡旋，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或能因人望而解决也。如荷慨允，本会愿为后盾，如何之处，乞即示知为感。上海纺织工会启。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1日)

自纺织工会徐锡麟等函恳何丰林出任调停，兹由何委托许人俊为代表，前昨两日，已与工会接洽多次，而厂主一方，亦于昨午声明愿受何使所派代表许君及各公团之仲裁，并约定俟工人方面每厂推定正式代表后，即择定地点开会解决，以便早日开工。故自昨晨至下午六七时，徐锡麟等正在分赴曹家渡、小沙

^① 前淞沪护军使。

渡、杨树浦一带，嘱各厂正式推举代表，函告许人俊，再由许转约厂主开诚协商。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4日)

另立御用组织，阴谋分化罢工工人

上海纺织工会连日为设法解决日商纱厂罢工问题，与安徽驻沪劳工总会尽力合作，已与各厂罢工工友切实磋商数次，决先组织纺织工会沪西部，以谋有系统的动作。昨日在曹家渡成立，工友加入者已达八千余人，暂推王海云、邱阿四、霍梅生、孙阿五、周阿生、金阿品、顾兴发、谌巨六、王国良等十六人为临时办事员。议定进行办法：一、维持工友七条要求；二、维持工友罢工期内之生活；三、坚实团体、步骤一致；四、勿作问题以外之举动。各罢工工友极表示尊重上述主张。该沪西部并拟在五日内正式组织，负责办理一切。

(《新闻报》1925年2月18日)

此次日商纱厂大罢工，杨树浦大康纱厂亦遭波及。本埠纺织工会以沪东罢业工友亟须维持，特由该会徐锡麟会同工团联合会代表张翼成、袁晓岚赴杨树浦引翔港一带，调查工潮现状，并拟设法调解，已着手组织“纺织工会沪东部”云云。

(《时事新报》1925年2月22日)

纺织工会沪西部与维持日商纱厂罢工工人委员会两团体，于昨日下午二时，在沪西日晖桥事务所，邀集各厂工友协商收束

工潮办法。到者华侨工会联合会、上海印刷工会、制墨工会等十余工团,各厂工人代表计五十余人。公推徐锡麟主席,首先报告本会以息事宁人之至意,出为调停,除已请由工团联合会分函官厅请求秉公办理,以期解决外,并由本会等积极进行调解。各厂工友多已知本会系属正当维持,纷纷来会请求加入云云。当经议决定期召集大会,与各方面共同协商进行办法,一方面进行募捐,以资补助工人生计。议毕,四时散会。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9日)

向工人进行欺骗宣传

安徽驻沪劳工总会刘醒吾等为调解工潮事,昨致各工厂工友代电云:

工友同胞均鉴:此次各纱厂罢工风潮,蔓延十余日之久,劳资双方各不相让,宁愿牺牲,已成对峙,于地方治安,劳工生计,已蒙极大之影响。惟鼓动煽惑,其中大有人在。究此次罢工之工友,已达四万余人,难免强悍狡黠,品性不齐,或受共产主义从中嗾使利用,以一人倡之,百人和之,驯至调解无从,工潮一〔益〕发不可收拾。本会为劳工分子,难安缄默,特进忠言,望吾工友即早觉悟,免累时日,双方和衷共济,与调人以插足调解之地,早日解决,免吾同胞衣食不继者又增困乏之苦,何受愚而至此不悟也。幸垂察焉。安徽驻沪劳工总会刘醒吾等叩。

(《新闻报》1925年2月23日)

无锡驻沪劳工会,昨为日纱厂罢工事,特召集会议,协商救

济办法，到会员七十余人，公推吴公望主席。当由主席报告，略谓：此次日纱厂发生空前大罢工，旷日持久，工友失业者达数万人，不特有关劳工生计，且将引起国际交涉，应如何补救，请从长讨论。次由王国栋、邱士雯、周奇昌等发表意见。金谓此次风潮，实由某党从中煽惑，希冀利用工人，为自身谋发财地步。本会亦系劳工组合，对于日人压迫工人，自当主张公道，予以援助，惟工人方面应推出真正劳工代表，开诚相商，然后始有办法。如果被利用，自甘牺牲，则解决方法愈离愈远，一旦铤而走险，则社会亦将感受影响云云。嗣经各人发表意见，议决办法如下：一、公推吴公望、王国栋等五人为办理此事委员；二、劝告厂主容纳工人要求，以期早日解决；三、劝告工人勿为他人利用，以免受愚；四、请各会员自由捐助，维持工友生计；五、请各团体一致援助，予以调停。议毕，遂散会。

(《申报》1925年2月24日)

丝茧女工领袖穆志英，鉴于日商纱厂罢工，厂主、工人，双方损失，已属不赀，深愿出任调停。昨至杨树浦一带劝告工人，静候解决，勿受利用。午后特至曹家渡内外第三厂见大班陈君，劝其让步，勿滋蔓延，影响治安。厂主、工人，对彼均表好感云。

(《申报》1925年2月24日)

四、各界团体对罢工的援助

(一) 各业工人热烈援助

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等四工会通启

各团体公鉴：日人开设之内外棉纱厂，无理摧残我国工人，叠志本埠各报。日昨又接该厂工会全体工人宣言及敬告各界函，对于日人压迫我国工人种种惨酷行为，言之恳切激昂。夫工人罢工，执政府所公布之工会条例，尚明白许可。日人营业我国，不思我中华民国工友衣食之恩，既开除之于先，复凶狠殴击之于后，其为残酷无情，与尊〔蔑〕视我国国法为何如耶！同人等为争国体之尊严，为谋吾工人之利益，对此工潮，势难坐视。除已对该工会力谋实力援助外，尚望各界热心诸君，随时随地予以援助。至于该工会之七项要求，甚为允当，亦望各界一致主张，不到完全胜利不止也。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淞沪机械职工同志会、上海金银工人互助会、上海雕花业工会同启。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2日)

五工会函张宗昌和警厅，力争罢工自由

本埠五工团昨曾致函张宗昌军长及常警厅长公函各一通，为该罢工工人等乞援。其文如下：

张军长钧鉴：顷接内外棉厂工会罢工宣言及致各界书，对

于日人压迫我国工人同胞情形，言之淋漓，全国各界无不愤激。日人自提出二十一条，经我全国否认以来，无时无地，不以宗主国待遇殖民地方法，压迫我国同胞。此次工人罢工，纯出于压迫过甚之愤激及反应，其所持理由，亦系名正言顺。况工人罢工，本法律所许可，执政府颁有明文，载在工会条例第十四条^①。乃该日人等竟布置电网，锁闭工人六百余于厂内，其藐视我国体，至于此极。素闻贵军长爱国爱民，大军所至，万民欢迎，望对此次工人流离，加以深恤，准予工人在华界集会，并持平办理，及早调停，俾影响二万余工人生计之工潮得早以解决，至纫公谊。顺祝公安。浙江旅沪工会、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淞沪机械职工同志会、上海金银工人互助会、上海雕花业工会同敬启。

警察厅长钧鉴：本埠内外棉厂工人，因愤日人之殴辱及压迫过甚，群起罢工，以争国体，详情已迭志本埠各报，及该厂工会宣言及致各界书，谅蒙鉴及。工人罢工，本为法律所许可，执政府颁有明文，载在工会条例第十四条。乃该日人等竟藐视我国法，满布电网，锁闭六百余工人于厂内，其对待我国工人，较囚犯尚

^① 文中所涉及的工会条例，是指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三日刊出的《执政府公布之工会条例》。全文共二十一条，其第十四条为：“工会在必要时得根据会员之多数决议，宣告罢工，但不得妨害于他人之生命财产。”条例中并规定工人有权依法组织工会，并有言论、出版等自由。经核查，该项条例与广东革命政府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颁布的工会条例（参看《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三编第218—221页）内容完全相同，仅文字上略有出入。段祺瑞政府从未公布过工会条例。五卅运动爆发后，由于全国工人的压力，段政府方始被迫制订了一个工会条例草案，内容极反动（参看上书第三编第242—251页）。疑《民国日报》所载“执政府”公布之工会条例，大概是广东革命政府工会条例之误。

不若。我国势虽弱，究非日本殖民地，奈何以亡国奴待遇我耶！素闻贵厅长主持正义，望本爱国爱民之精神，准予工人在华界集会，并加以保护，至纫公谊。除致函张军长陈情外，特此上达，并祝公安。（署名同上）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3日）

恒丰纱厂等厂工人捐款援助罢工

本埠杨树浦恒丰纱厂工人，为援助罢工工人，特于前星期五（二十日）晚，由布机房全体男女工人发起捐款，同时即得全厂各房工友赞成。咸谓我们中国工人应尽力帮助中国工人，上海各团体已组织后援会，并募集捐款援助。但我工人对于工人关系尤切，更不忍坐视，应起积极援助，募集款项。即由该厂布机房经收，送交上海东洋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前晚已收者有布机房、浆纱房、筒子房、经纱房、纬纱房、穿扣房等六房，共计捐集大洋三十八元，小洋五百四十四角。昨日下午即派代表三人如数送至后援会，请转交罢工工友，并取得收据而返。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3日）

日纱厂罢工期内，曾由各团体组织罢工工人后援会，并曾向社会募捐。兹以风潮业已平静，因于昨日开会商议结束。先报告募捐情形，陆续交来者，有溥益纱厂一、二厂全体工友大洋五百零七元，小洋八百八十八角，铜元二十四枚；恒丰纱厂工人第二次捐款大洋十七元，小洋八十四角，铜元一百五十六枚；华商烟公司女工代表孔慧波、詹慧文交来大洋三元，小洋五十五角，

铜元九百零一枚。连前次共计收大洋六百七十四元，小洋二千四百七十三角，铜元二千四百五十六枚。支出款项，计付：杨树浦工人三十八元；小沙渡工人大洋五百九十九元，小洋二千三百二十四角，铜元三百二十四枚；及该会印刷、竹筒、徽章、邮票等费大洋三十一元，小洋二十五角，铜元七枚。总计尚余大洋十一元，小洋一百三十二角，铜元九百二十六枚^①，统交杨树浦工人。次经众决定，此后本会即告解散，旋散会。

(《民国日报》1925年3月3日)

杭州劳工协会援助上海工潮

杭州通信云：上海内外纱厂之罢工，近日范围更加扩大，渐将演成民族斗争，意味渐渐严重。上海富有爱国热忱之各团体，已起而组织大规模之后援会，筹备举行募捐等等。吾杭地与沪隅相距咫尺，且工团组织素称发达，闻之自有〔无〕不恶心疾首，而起油然同情之者。爰将其情形述之如下：

杭州劳工协会特为此事于今日下午召集执行委员会，到会者张学林等十余人，邵小航主席。首由主席报告上海内外纱厂工友罢工情形，略谓上海日纱厂之资本家，平常辱打中国工人，动辄骂中国人为亡国奴。工潮勃发，又（以）强国之凌威，命令中国官厅禁止罢工。且外国资本家在经济落后之国家设立工厂，全为购买贱价劳力，使田〔其〕产品价格低落，以为经济侵掠之具。试观上海中国纱厂之因日本纱厂资本雄厚，不能与之抵抗，

^① 据核算，应结余大洋六元，小洋一百二十四角，铜元二千一百二十五枚。可能是小洋折合大洋或刊印上有误。

因之倒闭,即可知其一般。故我人对于此次罢工,应视为民族的问题,不当视之为单纯的劳资斗争。吾人并非局外,当然积极援助。次顾悦两、罗剑铨等俱有所讨论。遂议决:一、致电慰问上海罢工工友;二、通电全国各工团及国民速起援助。至切实办法,待联络各团体再行集议讨论。遂散会。电文如下:

一、上海内外纱厂暨各纱厂罢工工友均鉴:此次贵工友等以不堪忍受日本资本家之虐待,起而作坚苦之奋斗,实为我国族争光。敝会组〔凡〕就力所能及,无不积极援助。除已电全国各工团一致奋起外,先此电闻,遥祝胜利。杭州劳工协会叩。巧(十八日)。

二、上海民国日报馆转全国各工团暨全国国民公鉴:帝国主义列强广设工场于工价低廉之地,为深入骨髓之办法。据确实调查,上海一隅,日本纱厂之数竟逾于我全国所有纱厂。彼等资本雄厚,对于我国纱厂倾轧备至,充〔究〕其野心,殆非令我国幼稚之纱业政策完全摧残不止。且彼等对于我工界同胞之谋生于其厂内者,不特工资低减,无以度生,且遭受种种不堪之待遇。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应请全国各地工团及国民立起援助,一致以“反对东洋的资本家”之口号为联合阵线之奋斗,庶可予侵掠者以一严重打击,否则吾工友既将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全民族亦复受莫大之侮辱矣。临电激昂,伫候明教。杭州劳工协会叩。巧(十八日)。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0日)

绍兴工界援助上海日纱厂罢工

致各厂主电 民国日报转内外、日华、大康、丰田、同兴、东华、公大、上海等纱厂总理均鉴：贵厂等均因虐待中国工人，致迫成三万余人之大罢工风潮（观各厂工人要求中均有以后不准打人、罚工一条可知），迄今已逾旬日，尚未解决，若再相持，在工人方面固大受痛苦，即贵厂等亦必损失愈重。故敝会同人，为贵厂利益计，不若完全容纳工会要求，庶工人可早日上工，而贵国人虐待华人之耻，亦可湔雪；否则，既未容纳工人要求，而更勾结军警，以威力相压迫，则欺辱吾中国工人，即欺辱吾中华民族，吾全国人民誓当为工人之后援，与贵国帝国主义及资本家作最后之奋斗。专此电达，还祈三思。绍兴青年工人互助会、绍兴觉社、绍兴印刷工人联合会。

致罢工工人电 民国日报转内外、日华、大康、丰田、同兴、东华、公大、上海等纱厂诸工友公鉴：诸君因屡受日资本家虐待，致迫不得已而罢工，要求改善生活状况；乃日人不特未允诸君要求，且复有勾结军警横施压迫之恶，同人等闻之不胜悲愤。但诸君既为正义而罢工于先，还祈一致坚持到底，非达到目的，切勿上工。同人等誓为后援，共与万（恶）资本家相奋斗。特闻。绍兴青年工人互助会、绍兴觉社、绍兴印刷工人联合会。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1日）

(二) 学生会等团体的同情援助

全国学生总会通启

各团体公鉴：顷接内外棉纱厂工会全体工人宣言及敬告各界书，展读之下，不胜愤激。甚哉！日人之压迫吾人也，无微而不至矣！虽中经“五四”激昂民气之打击，亦终不稍见觉悟，其不顾公理，藐视邻国，早与吾人不共戴天矣！此次又施其残毒之手段，摧残吾国工人，种种惨况，闻之凄酸。工人罢工，情本可怜，夫人不至万不得已时，孰肯以身家性命为孤注？况工人罢工乃民国法律所许可，执政府颁有明文，载在工会条例第十四条。乃该日人等，竟布置电网，锁闭六百余工人于厂内，以我国驯养〔良〕勤恳之神圣劳工视同囚犯。嗟乎！我国势虽陵夷，奈何竟以亡国奴待我耶！敝会素以民族解放、国民福利为己任，对于日人之如此摧残吾国人民，誓不予以宽让。除函请张军长、常警厅长切实交涉，并希各界一致援助。事关国家体面、人民利益，凡属同胞，咸宜愤起。全国学生总会谨启。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2日)

各团体代表纷赴工会调查，赞助罢工工人

昨日下午，本埠各公团闻有二万余人之大罢工发生，当即派代表前往调查接洽，表示赞助，罢工工人深为动容。浜北旷场上，时见工人群守〔众〕围拥各代表谈话或演讲。据闻有数公团预备投函奉军司令部、警察厅、上海县，力言日人激成公愤，当速设法

和平解决。并有谓现时工会条例已公布，罢工为法律所许，决不可轻易施行高迫〔压〕手段，激此二万无告之工人，使酿成巨变云。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2日)

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呼吁勿干涉工人集会

上海国民会议男女两界促成会^①，昨以调解日商内外纺织公司罢工案，特于下午二时备函推派男女代表朱企民、陈广海、蒋自权、向警予四人，先至淞沪警察厅请见常厅长，由科长黄奎元代见。首由朱等申述来意，请厅长对于工人方面妥为保护，因闻公共(租界)捕房对于工人，将有严厉之对待。黄科长答称保护工人，自是本厅天职，捕房方面虽已三次来厅要求，请通融越界派捕弹压，但厅长以有关主权，均未允许。代表等又要求请厅长允许该工人等在界内为有秩序的集合，如有开会集议等事，勿加干涉。黄科长允予转达。朱等退出后，即驱车至沪宁车站奉军司令部，请见张军长，其时适赴沪日领之宴会，由副官处传令股派员招待，而候至下午四时余，犹未见军长回辕，代表等乃略述来意，遂将公函留交该处，请为转达而退。

(《时事新报》1925年2月14日)

① 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是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初由全国学生总会发起，十二月十四日正式成立。先后参加的有工人、学生、商界团体二百多个，其中工人团体有沪西工友俱乐部、杨树浦工人进德会、上海店员联合会等。当选的执行委员中，有共产党人向警予、孙良惠等同志。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是向警予同志等发起，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成立。

江西国民会议促成会援助上海罢工

国民会议江西促成会,二十八日开第六次执行委员会,推方志敏^①主席,报告上次议案及北京、上海各地促成会函电毕,继续讨论各项议决案如下:(中略)

二、援助上海日本纱厂罢工工人案。议决,一方致电段执政,请其令上海官厅切勿压迫工人,一方电慰上海工人,并将此次罢工情形详告本省各界,请一致援助。(下略)

(《民国日报》1925年3月4日)

(三) 工商学各团体合组罢工后援会, 积极开展援助活动

1. 罢工后援会成立

国民会议促成会等组织“东洋纱厂罢工后援会”

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与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于昨日下午二时,借西门勤业女子师范开联席欢送大会,欢送两会赴全国总会代表。到会者有两促成会委员及学生总会,群社、南洋大学学生会、勤业女师校、民治急进社、菲律宾华侨学生会、琼崖新青年社、浙江旅沪金衢严处自治协会、天潼福德等各路商联合会、暨南大学平教研究社、沪北工商学会等团体代表。公推向警予

^① 方志敏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四年夏,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五卅”爆发后,为“江西沪案后援会”组织者之一。

主席，唐公宪记录。首由主席宣告开会，并致开会辞，(中略)再会员演说，有沪西工人〔友〕俱乐部代表报告小沙渡内外棉纱厂受日人经理虐待，横加压迫，开除工人，毒打女工，以致酿成二万余工人罢工风潮，经过情形甚详。受日人之压迫极为凄惨，且常骂我工人为亡国奴等。当时各团体代表闻之，甚为愤激，同时下泪，谓日本帝国主义如此残害我同胞，本会应竭力为工友援助。即一致议决援助办法如下：一、由两促成会联合发表宣言，说明该工人受日本帝国主义下之资本家压迫、罢工之情形；二、推代表四人持函向奉军司令部及警察厅，请其不得禁止工人开会，即推定朱企民、陈广海、蒋自权、向警予为代表；三、由两促成会召集各团体开联合会，组织后援会，定下星期日(十五日)下午二时，即借勤业女师校开会；四、由到会各团体以各团体名义表示同情与援助；五、募集特别捐，为经济上之援助。当场即捐有三十七元^①：钟森荣一元，沈尚平一元，刘一清一元，李一纯二元，王亚璋一元，黄胤二元，赵璧一元，宋家寿一元，李洁永一元，刘福薪一元，蒋自权一元，刘清扬五元，南市市民对外协会一元，上海学生联合会二元，全国学生总会五元，琼崖新青年社五元，上海店员联合会一元。后有俞秀松^②、陈广海、沈光连等相继演说，一方希望北上代表之努力奋斗，一方希望此后本会各团体更能团结一致，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奋斗，必达根本消灭之目的云云。至六时散会。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3日)

① 下面所列个人与团体的捐款数相加，只有三十二元。

② 俞秀松同志，一九二〇年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员，一九二四年在上海参加国共合作的工作，积极开展国民会议运动。

昨日,上海各团体为援助此次内外棉纱厂等工人罢工事,特于下午二时借西门勤业女子师范开联席会议。到者有海员工会、浦东同人会、同文书院、琼崖新青年社、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中国青年救国团、对日市民大会^①、沪西四路商界联合会、沪北公学、金衢严处自治协会、全国学生总会、南市工商学社、上海雕花工会、上海法政大学第一院学生会、上海工商学会、云南旅沪青年励进社、上海非基督教同盟、上海菲律宾华侨学生会、执中速记学校、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南市市民对外协会、浙江旅沪工会、中国青年社、金银工人互助会、黄冶旅沪友谊会、民治协进会、法大非基督教同盟、杨树浦工人进德会、沪西工友俱乐部、共进社上海地方团、上大陕西同乡会、四川垫涪丰青年互助会、上海店员联合会、上海群社、上海纺织工会^②、上海学生联合会、安徽旅沪学生会、中华电气工业联合会^③等四十余团体,代表九十余人。

刘一清主席,报告开会,略谓此次我们最简单之目标,即为中国人应帮助中国人,中国工人三万余受压迫罢工,所以今日我们上海各公团应尽力援助。次前两促成会代表蒋自权、向警予报告向警厅及奉军司令部接洽经过情形,认为均未满意,且昨日尚有二百余军队禁止工人开会。又沪西四路商联合会代表马杰报

① 该会又称国民对日外交大会,是一个资产阶级团体,成分复杂,并有工贼混迹其间。据《民国日报》2月15、16日及《新闻报》2月27日所载,该会初则参加罢工后援会,后又声明退出。

② 为工贼团体上海工团联合会成员。

③ 原参加工贼团体上海工团联合会,五卅运动爆发后又参加上海总工会。

告日前调解情形，谓因资本家不肯让步，致未有结果。又有大康纱厂工人代表高雷报告该厂亦因同受压迫，于昨日起摇班矣，请各公团援助等语。

后经多数代表详加讨论二时之久，有提议组织后援会者，有提议募款援助者，有提议发宣言反对日资本家者。结果，咸认为此事甚关重要，不但应援助三万余罢工工人，即为国家体面关系，亦应力争。日人常笑我中国人无团结、无恒心，吾人应团结一致为工人后援。遂议决：一、组织上海东洋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当推定九团体为执行委员。当选者为：海员工会、沪西四路商界联合会、对日市民大会、琼崖新青年社、浦东同人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女子工业社、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二、发表宣言，说明罢工情形，并请全国各界一同起来援助；三、致公函警告内外棉纱厂社长，要其立即答应工人之要求；四、募捐由各团体用竹筒向各处劝募，筒上贴以“请援助被东洋人压迫的工人”之标语，各人备带“上海东洋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募捐员”襟章，募捐日期共三天，自下星期二（二月十七日）起；五、致公函与各报馆，请援助同胞，多载工人方面消息。

至六时散会。散会后即开团体执行委员预备会，执行大会决议案。并定今日下午二时在西门林荫路正兴里二十三号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6日）

后援会两次会议的报道

昨日上午十时，工人后援会委员会开会，到赵友兰、叶际云、

沈尚平、刘绍先、马杰、唐公宪、俞秀檀〔松〕等，主席叶际云。议案如下：一、推蒋逸民、叶际云、赵友兰、沈尚平为代表，向警厅交涉，立即释放被捕二十余工人及被拘留两代表；二、电段执政，请其一面拒绝日本政府要挟，一面令上海警厅此后不得违反工会条例压迫工人；三、通电全国同胞，说明此次工潮，不尽〈仅〉关系三、四万工人之生计问题，实关系于我全国同胞之人格与国体，我国同胞亦应一致为工人后援；四、沪西四路商界联合会代表马杰，报告内外棉厂今日已派人出面调解，该会亦派代表前往接洽；及与闸北慈善团、普〔统〕益纱厂、各路商界总联合会接洽情形；五、沪西工人〔友〕俱乐部代表刘君，报告工人方面现在已达最大之让步，如日人坚持不肯承认调解，则工人亦惟有联合对付，并谓此计划现已与各方工人接洽妥当；六、推定沪西四路商联合会代表马杰，向工人方面接洽调停办法，限日人三日内答复云。

(《申报》1925年2月20日)

各团体组织之工人后援会，于昨日下午二时开委员会，到者向警予、张人权等十余人。钟森荣主席。先由俞秀松报告：(一)募捐三日之情形；(二)与警厅两度接洽之情形；(三)工人方面之现状。次即由主席提出各项议案，经众议决：(一)派代表接洽联络出任调停之各团体，使趋一致；(二)派代表与华商纱厂联合会及溥〔统〕益纱厂接洽，请求援助；(三)应内外棉厂工会之要求，派代表前往演讲，劝其坚固组织，严守秩序；(四)向有力各团体募款；(五)设法救济被捕工人，以缓和工人方面之空气。当即分

别推定代表,分头进行。五时许散会。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5日)

2. 呼吁各界援助,进行募捐活动

罢工工人后援会之宣言

各界父老兄弟姊妹公鉴：中国不幸，内有军阀之专横，外受列强之欺侮。我四万万同胞日处于外人鞭笞之下，其鱼肉我、奴隶我之野蛮形状，每稍有良心之中国人，莫不愤慨，引之以为奇耻大辱也。同胞中受外人虐待最深，而在劳苦工人尤甚。彼辈因谋衣食之供给，为饥寒所逼迫，不得已工作于外人工厂之中，以博得少数之工资。徒以我国力微弱，彼外人遂得以任意施其虐待，而无丝毫顾忌。我工人同胞无〔茹〕苦忍痛，已非朝夕，每一念及，未有不为之栗栗而不安者。今者上海各东洋纱厂工人，因受日本资本家之酷遇，忍无可忍，不得已起而罢工，现已达三万余人。小沙渡各纱厂动之于先，杨树浦各工厂继之于后，犹有数厂亦起为同情之罢工。其详情原委已见上海各报，谅我各界同胞见之，必一致深表同情。爰将日本资本家虐待我工人最大者数端如下：一、无故打人；二、克扣工资；三、不讲卫生（如马桶不盖盖子）；四、随意骂我工人同胞为贱种、为亡国奴。其余小节不胜枚举。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中国已亡耶？中国人真以为亡国奴耶？日本久欲鲸吞中国，降之朝鲜之列，其蔑视我中国人也固宜，但吾侪既为中国人，应当具爱族爱国之心，其遂甘以贱种自居乎？此次上海各东洋纱厂三万余人之大罢工，一方面为要求

改良自身生活状况，别方面乃为我中华民族争人格。若不甘为亡国奴之中国人，固不宜坐视不救，而宜奋起援助者也。本公团等本爱族爱国之义，爰于本月十五日开联席大会，发起组织上海东洋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誓为三万余劳苦工人之后盾，俾不达目的不止。当场议决一方面急〔竭〕力设法使日本资本家圆满答复我工人之要求，一方面急〔竭〕力募捐，使我工人同胞在罢工期内维持其生活。表张中华民族之反抗力，争回同胞之人格，在此一举。倘若罢工失败，不但三万余工人同胞将处继续受日本资本家之虐待，亦实我四万万同胞之羞也。深望各公团或个人踊跃加入本公团等所发起之上海东洋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本爱护同胞之热心，以尽国民之天责，使日本资本家知中华民族人心固未死也，幸甚。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7日)

通电呼吁同胞奋起对抗

上海东洋纱厂罢工后援会昨有通电发表云：各报馆转全国同胞公鉴，顷致段执政一电，文曰，北京段执政钧鉴，野心日人，欺我工界同胞甚矣！骂之曰亡国奴，斥之曰贱种；开会则设法阻挠；代表则主使拘捕；既污辱于先，复摧残于后，遂致数万劳工流离失所。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呜呼！国未灭而民受殃，身不死而心竟丧耶！工人勤苦，又受酷逼，情实可悯，迫而罢工，诚非不得已。一再蹂躏，其果何心！日人凶蛮，理喻为难，公法不顾，遑言人道！国岂无人，宁容此奸？今彼日资本家，既齐心拒绝我工人之要求，彼领事复尽力为彼日商后援，彼政府且欲引起国际交

涉，人之关心其侨商也如此！顾我国人及官厅之对我工人也则何如？试一对较，岂惟可耻，抑且可痛。要知此举成败，关于数万人之生计者犹小，关于中华民国之体面及四万万人之人格者实大。敝会不敏，愿效前驱，为同胞除痛苦，为国家争光荣。尤愿我执政训令上海警厅，本前此颁行工会条例，应竭力尽保护劳工之责，勿让彼日人窃笑，实深盼祷，等语。苟日资本家就一意孤行，不自悔悟，则愿我全国同胞勿再坐视，共同奋起，以与彼蛮横之日人抗。谨此电告，希共同努力。上海东洋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叩。箇(二十一日)。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2日)

募捐援助

上海东洋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启事 本会由沪西商界联合会、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海员工会等四十七团体所组织，为维持罢工工人生活起见，特于二月十七日起向各界募款三天。务希各界踊跃输囊是幸。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8日)

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昨日发出公函九十余通致各团体，约定于本星期三(十八日)上午十时，由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一同出发募捐，援助日本纱厂罢工工人。兹录其原函于次：

启者：本埠日本纱厂因虐待工人过甚，致激成罢工风潮，虽经各团体调停，终无结果。彼野心之日本资本家，不但否认工人提出要求条件，且勾结为虎作伥之我国官厅，派遣军警，威吓禁

止工人集会,以致全体工人尤为愤激,于此足见日本资本家之手段毒辣矣!现风潮愈酿愈大,各厂相继罢工者不下三万余人。本埠各公团对于此次罢工,认为我国国民重大责任,业于昨日召集联席会议,组织上海东洋纱厂工人罢工后援会,筹备一切援助事宜,定于本星期三、四两日为各团体出发募捐之期。三万余苦同胞及其家属嗷嗷待哺,固属急需救济,狠毒之日本帝国主义者横施暴行于中国,尤为爱国人士所痛恨。本会亦认募捐为援助工人最急最要之办法,而援助此次工人,实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之表现。各会员热心国事,不让于人,务望于本月十八日(星期三)上午十时齐集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西门林荫路正兴里三弄二十三号),与各团体一同出发,担任募捐。倘能邀约热心亲友同来,尤为感盼!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7日)

日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为救济失业工人事,自昨日(十七日)起募捐三天。上午十时会集后,即分十四队出发,计分定:第一队,西门、闸北,女界促成会、女子工业社担任;第二队,公共租界,沪西商界联合会;第三队,法租界,女界促成会;第四队,大马路、静安寺路;第五队,北四川路,琼崖新青年社;第六队,浙江路,琼崖新青年社;第七队,杨树浦,上大陕西同乡会;第八队,石路^①,四川路,琼崖新青年社;第九队,小沙渡,上大四川同乡会;第十队,城隍庙,学生总会、雕花工会;第十一队,民国路,上海书

^① 即今福建路。

店；第十二队，黄浦滩；第十三队，法大马路，金银工人互助会；第十四队，南火车站，非基督教同盟；至下午九时停止，须三日汇总报告。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8日)

该会于前日起募捐救济工人，已志报端。兹悉前日出发之十五队，已将募捐竹筒交办事处封口保存，以便三日后汇总当众开视。

昨日各团体代表仍于上午十时汇齐，分队出发。虽雨雪纷霏，仍沿街募捐。计分定各队地带如下：(第一队)大马路、静安寺路，琼崖新青年社；(第二队、第三队)戈登路，云南新青年励进社；(第四队)新闸路，云南新青年励进社；(第五队、第六队)民国路，雕花工会；(第七队)闸北，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第八队)卢家湾，女子工业社、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九队)棋盘街，琼崖新青年社；(第十队)北浙江路一带，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至下午九时始止。又各团员拟赴各餐馆捐募，以期早集成数。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9日)

3. 警告日本厂主，反对军阀镇压

书面警告罢工日厂厂主

各公团昨联名致阿部彦太郎函云^①：

^① 据《民国日报》二月十七日报道，罢工后援会于十六日开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致内外棉纱厂总经理阿部彦太郎公函。

阿部彦太郎先生鉴：贵国人利用敝国原料及贱价劳力在敝国广设工厂，尤其是纱业，日厂竟超过华厂之数，致使敝国纱厂不堪排挤，停闭者有之，减工者有之。贵国人此种对华侨〔人〕经济侵略，吾侪痛心久矣。日来内外棉、日华、大康、丰田、同兴诸纱厂，又复以恣意虐待中国工人，致酿成三万余人之大罢工。“反对东洋人打人”之呼号，竟普遍于罢工工人中，则各厂贵国人员平日奴视践踏敝国工人之横暴情形，已可概见。敝会同人，不忍穷苦同胞受人虐待，誓为后援。特此函达，请即完全容纳工人之要求，以示贵国人在中国之横行，尚不为已甚；倘复不恤人言，假手中外官厅压迫工人，则受辱者不止工人，凡属中国人势必更进一层，誓与贵国人力谋“亲善”之道。贵国各纱厂又或以停工闭厂压迫工人，日厂果绝迹于中国，则纠合全中国工商业家，设法救济此三万余失业工人，亦敝国人之所甚愿也。专此奉达，诸希鉴察。即请大安。中华海员工会上海支部、浦东同人会、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中华电气工业联合会、琼崖新青年社、沪西四路商界联合会、国民对日外交大会、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上海女子工业社、中国青年救国团、沪北公学、浙江旅沪金衢严处自治协会、南市工商学会、同志劝戒嗜好阅报社、上海雕花工会、上海法政大学第一院学生会、宁绍台工商协助会、上海菲律宾华侨学生会、执中速记学校、上海工商协会、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南市市民对外协会、浙江旅沪工会、云南旅沪青年励进会、中国青年社、上海非基督教同盟、金银工人互助会、黄治〔冶〕旅沪友谊会、上海民治协进会、法大非基督教同盟、杨树浦工人进德会、沪西工友俱乐部、共进社上海地

方团、上大陕西同乡会、四川垫涪丰青年互助会、上海店员联合会、上海群社、上海纺织工会、安徽旅沪学生会、上海市民协会。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8日)

上海东洋纱厂罢工后援会，昨分函此次罢工之各日商纱厂厂主云：

此次贵厂工人全体罢工，实由于贵厂平日之虐待及侮蔑，故其责不在工人，而贵厂须自负之。今工人一再让步，而贵厂则始终似无悔悟之诚，此则深引为遗憾者也。敝会目击我同胞之痛苦，义不能坐视，又愿维持中日两国人民间之亲善，深明〔望〕贵厂能容纳工人最后之条件，不至引起意外纠纷，以其伤我两国人士之和好。如贵厂不鉴此意，而犹再肆压迫，则敝会亦惟有视吾力之所能及，而事之不幸，将来有甚于此者。何去何从，幸自择之！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2日)

责问警厅长为何答应“取缔”罢工

昨日下午二时，上海东洋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为援助各厂罢工工人，特推代表马杰、陈德华持函进谒警厅长，由黄秉德科长代见。先由代表陈述来意，谓此次工人被日本资本家压迫，以致激成罢工。此事有关民族、国家，凡是中国人皆应起援助被压迫之同胞。昨日报载厅长答复日领事，有对于罢工工人当严重取缔等语，闻之非常诧异，故特前来请厅长对于罢工工人，以

后力加保护，以免丧失国体。后由黄科长答称：厅长对于贵会极表同情，甚希望双方让步，早日解决，所陈一切当即转呈厅长。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8日)

向警厅交涉释放被捕工人

东洋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因据工人方面报告，日前被押警厅之工人及代表共二十余名仍未释放，前日又被拘去二十余人，特于昨日下午二时半，派代表叶际云、沈尚平、赵友兰、钟重文四人至警厅交涉，因厅长常之英公出，由机要处黄主任代见。各代表表示，此次发生冲突，因厂主压迫太甚，其过非专在工人，且事情日益重大，倘引起国际交涉，官厅益难措手，而长此相持，恐酿出更大之不幸，故希贵厅释放被捕工人，恢复工人集会自由，使工人之气稍平，调解易于着手，云云。次黄主任答称：以上所言，鄙人极表同情，即常厅长亦同此意，惟以对外交涉，常不能尽如己意而行。诸位所述，鄙人自当代达，惟最好请诸君对工人方面商取意旨，使调解得有具体办法，则官厅方面，自可易于着手。末各代表请其俟厅长回厅后即给回音而出。兹录其致警厅函如下：

警察厅长台鉴，迭接小沙渡、杨树浦工人代表来敝会声说，近日该处华租〔界〕警察协同外人拘捕工人与工会代表，竟至数十人之多。查此次工人罢工，全由日本人压迫过甚所激成，凡属国人，谁不深表同情，急起援助？况集会本为合法之事，设警原以保民，置官志在卫国，贵厅职责所在，独无动于中乎？敝会本

中国人应爱中国人之旨，敬请大厅将被捕之工人与代表立予释放，庶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兹特推叶际云、沈尚平、赵友兰、钟重文四君晋谒面陈一切，幸赐面见，无任盼切。专此，即颂公安。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1日)

上海东洋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前日与警厅交涉情形，已志昨报。昨日，警厅特遣人至该会，请代表前往有所商询。当由沈尚平、俞秀松、钟重文三君，于上午十一时同往，因厅长尚未到厅，由司法科长赵松龄及督察长解恩桂、傅希奕等接待。警厅方面之意见：一、被拘之工人，在厅并未受何等虐待；二、代表等是否可以担保，被释后不至再有越轨行动；三、希望工潮早日和平解决。代表方面之意见：一、此次罢工，纯由工人自动，本会起而援助，实本于民族及博爱之精神。工人是否有轨外行动，无从担保，惟极愿劝导工人力守秩序。二、被捕工人，皆系因公受累，且为贫苦之民，故愿警厅早日开释，以平工人之气，使工潮易于解决。三、现在工人条件已一再让步，惟日本资本家毫无诚心，故愿上海各界能起而警告日资本家，尤愿警厅负保民卫国之责，对工人公平待遇，对日人万勿示弱。赵科长及解督察长则始终申言，愿工潮早日结束，释放工人可不成问题云。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2日)

五、上海一些报纸对罢工的评论和 资产阶级团体的调解活动

(一)上海报纸对罢工的评论

1. 《民国日报》^①

宜一致援助内外棉厂工人

沉 痛

小沙渡内外棉纱厂二万余中国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的虐待而罢工，从九日起已经是三天了。这一件重大的事实，已经引起许多爱国同胞的注意，激起不少热血男儿的愤怒。只要是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他知道了此事，莫不对于二万余受帝国主义压迫最烈的中国同胞表同情，而愿意加以援助，希望他们反抗横暴的日本资本家的大罢工，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这次罢工的原因，是起于日本资本家的虐待，罢工的目标亦便是“反对东洋人的虐待”。日本资本家虐待中国工人的事实，据内外棉纱厂工会告各界同胞的宣言所说，大概有下列几种：一、无故乱打工人；二、借故克扣工钱；三、无故开除工友；四、工

^① 《民国日报》是国民党在上海的机关报，当时为左派所掌握，故对罢工表示同情和支持，尤其是该报副刊《觉悟》（有共产党人参加编辑）的态度更为鲜明。

资不按期发；五、借储蓄名义来剥削工钱；六、常骂中国工人为“亡国奴”，为“贱种”。以上几种虐待的事实，都是促成此次罢工的远因。其近因则为：一、无故开除百余工人；二、被开除的工人去领工钱，不但不肯给工钱，反把七个工人代表捉到捕房里去。工人在此种蛮横无理的压迫之下，为争自己的生存，为争国家的体面，都是忍无可忍的，除了罢工是没有第二条反抗的道路了。所以他们便很勇敢地罢工了。这一种罢工，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是中华民族不甘奴服的表现。

他们向日本资本家提出的要求，共有七条：一、以后不准打人；二、按照每人原有工钱加给十分之一，并无故不得克扣；三、恢复第八厂被开除之工友，并立即释放被拘押之工友；四、以后两星期发工钱一次，不得迁期；五、以前所有储蓄金扫数发还工友，储蓄赏算为工钱，接〔按〕期发给；六、以后不得无故开除工人；七、罢工期间以内的工钱，厂里须照常发给。我们看，这七条要求，没有一条不是正当的。都是中国工人应该向日本资本家争得的。我们每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都应该竭力帮助这些穷苦同胞得到这些要求。我们要知道，这次罢工的胜败，不仅关系于二万余罢工工人，实关系于中华民族的荣辱至大！

日本资本家在中国设立工厂，本是一种侵略中国致中国人死命的狠毒方法，本应为一切爱国同胞所反对，何况他还在中国境内如此蛮横无理的欺侮我们的同胞！现在这些很有志气的同胞——内外棉厂二万余工人，已起来勇敢的反抗日本资本家的压迫，我们难道还不应该继起而援助他们吗？

我们还要希望中国的官厅军警同胞们，千万不要做日本资

本家的走狗来压迫自己的罢工的同胞。应该想一想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横暴可恶,拿住〔出〕良心来处理此事;并且还应该知道段执政府已于一月前公布了工会条例,那条例上已明说工人罢工和组织工会是工人应有的自由权,还说“凡刑律、违警律中所限制之聚众集会等条文”,是不适用于罢工工人的。我想,官厅军警诸同胞,为顾全同胞情谊,替中国人争气起见,为遵守政府命令起见,却〔都〕是不应压迫工人的。

全上海的市民!全中国的人民!一致起来,援助内外棉二万余穷苦的同胞!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5年2月12日)

此次纱厂罢工工人是赤化了吗?

次 雄

昨天《大陆报》的社评说:“中国现在步步趋向赤俄的怀抱里去了。比如此次外人纱厂大罢工风潮,在要求增加工资以外,另具一种赤化的意味……这便是去年五月中俄条约和国民党激烈分子遗下来的结果呵。”

象这样口气的文章,常常发表在《大陆报》上,他们的眼光真锐利呵!在万层压迫底下的中国人民,稍稍有点为自卫而反抗的动作,便推想到是赤化,便加以赤化的名目。可惜中国人并无资格承受这个尊号。半生半死的国民于苦痛中呻吟一二声,已算大胆极了,那里敢谈到“赤化”!

此次罢工原因是为反对慢〔漫〕骂工人为“亡国奴”“贱种”及刻〔克〕扣工资、虐待工人而起的。工人所卖的是劳力,并不是卖

身。扣夺工资、吮吸工人血汗之外，还要加以“贱种”、“亡国奴”种种叱骂及虐待，难道是应该的吗？我们中国还未亡呵！工人的反抗是遍身苦痛所给与的反动，只要苦痛少些就算了，那里敢谈到“赤化”！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5年2月15日）

日厂罢工与民族争斗

成 斋

日本资本家利用关税保护政策，排斥中国货，他去年对华贸易之出超竟达一万数千万元。这还不算，又极力推广直接在中国设立各种工厂制造，就近尽量利用中国的原料及贱价劳力，以达其经济的侵略之大欲。日本在华所设各种制造厂，尤以纱厂为巨擘，竟超过华厂之数。资微力弱的中国纱业，因为不敌日厂之竞争而歇业或减工的厂很多。外商在华设厂制造的害处，已明白地摆在我们的面前。而日商所以能在华设厂，是根据于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我们愈知道取消不平等条约和收回海关，都是发展中国实业必由之路。

口倡中日亲善与大亚细亚主义的日本人，对于中国政治的压迫、经济的侵略一步不放松，在他本国排斥华货华工，日进不已；在中国设厂制造，也日进不已。其厂中虐待中国工人，在中外各厂中更是特色。

现在上海的日商纱厂工人，如内外棉、日华、大康等都不约而同的罢工了。这些两万多罢工工人都不约而同的高呼“反对东洋人打人”！可见日厂人员平日虐待中国工人正成了普遍的

现象,否则决不至有今日。

日本人在本国竭力排斥中国货,而来到中国设厂制造,已经无理了;在中国设厂还要虐待中国工人,更是万分无理!因此,我们认定:日厂虐待中国工人,不仅是日本资本家压迫中国工人的问题,乃是日本民族侮辱中国民族的问题。日本人向在东三省、在天津、在长沙、在沙市、在南京都任意打死过中国人,一向把中国人不当人看待。现在上海日厂的工人被他们打急了,一致起来罢工反抗,民族争斗的色彩很浓厚,凡是中国人都应该起来援助此次罢工的工人。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7日)

官厅与罢工工人

何冰夷

资本家和劳动者,本来就是两相对立的。资本家欲工人如牛马般的驯善,以便剥削和压迫工人,多得些剩余生产品;工人欲资本家放松压迫和剥削,少作些工作,多得点工钱。两方各走极端,以至于酿成同盟罢工的事,这是经济压迫的必然的现象,工人应取的态度。政府如果是表面上代表全国人民的幸福的,就应当与以保护,对于资本家的过分压迫应与取缔,这是情理所应该,并且是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所一致实行的。

此次日本内外棉纱厂工人之罢工,其导火线虽然——由于厂主无故开除第八厂甲班的四十余工人和拘捕六工人而起,但客观上的远因,亦无非是受资本家的经济的压迫而来。况其事发生在租界,所发出的口号为反对东洋人——资本家——,又何况

段执政所颁布的工会条例十四条已允许工人罢工，并且罢工事在刑律与违警律之外。如果官厅不是资本家之御用品，不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现政府不专是资本家之保护者，则在上海之军警，对此事应该怎样？第一，应该帮助工人达到合理的要求；第二，应该保护工人，使不致受外人之拘捕和摧残。再不然，说是怕日本老爷的强大，不好得罪他们，亦应该站在中立地位，以无偏无党的态度处理此事。

始终使我莫名其妙！十三号的下午，正当万余内外棉厂的罢工工人，在滨北大丰纱厂后侧旷场里集合，分队组织的时候，忽然一位巡官老爷带了四五十个武装警察来阻止工人开会（其实并不是开会，是组织），并且叫工人马上跑开，否则即要用武之势。还说什么：“为什么要罢工？东洋人不好，跑到〔到〕中国厂里去做工好了。”“要开会须得我们——官厅——的批准。”哎呀！真要把我连哭带笑的哭死！笑死！老先生，请你清醒点罢！你一天究竟在做些什么？可怜的工人虽不值你们的垂注，而你们段老头子所说的话，总当要注意点呵！

这还不算事，更要令人痛心的，第二天下午，这位巡官老爷，更去约了个第一军的副官，带领了两排武装丘八来耀武扬威。这位有面子的副官老爷样子更装得厉害，并说：“命你们不要开会，总不听；一个官厅连百姓也管不着，岂不丢中国人的面子吗？……”哎呀！老先生，你这句话的意思，我已领会得了！唉！（二月十五日）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5年2月17日）

打人有什么稀奇!

非 奴

诸君没有看见前天《时事新报》那篇时论吗? 他不是说:“此次罢工原因……有谓厂中办事人员平日殴打工人, 致酿成此次风潮……然不值得如此小题大做……”。好一个小题, 达仁先生的眼界真高! 做亡国奴, 给人随便打, 还可以维持治安, 不是很好吗! 这样被人打了有什么稀奇呢! 但是达仁先生为什么不维持治安, 去送给东洋人打呢? 如已送去打过了, 那请恕我不知之罪。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5年2月23日)

2. 《新 闻 报》

日厂工潮之解决谈

记 者

日本纱厂罢工风潮, 事经多日, 不特未见救平, 势且愈形扩大。究竟有何不可解之症结, 而相持不决至此? 以记者局外之臆测, 实亦并无甚深妙义。就工人开示各条件观之, 大抵仍不外待遇与工资两问题, 但使厂主能平心考虑, 开诚容纳, 则偌大风潮又何不可解决之有!

在厂主方面, 当思此事纯为劳资间争执问题, 应就本范围内求和平解决办法, 万不可小题大做, 乞灵于国际示威手段, 转致激愤而益纠纷, 于厂家亦无所利。在工人方面, 即因万不得已而

罢工，亦须认清题目，断不可有轨外行动，或节外生枝，致贻口实。而当地官厅于此，亦宜各就权力所及，秉公理劝，不徇偏私，不为威惕，其亦调息风潮之一道欤。

(《新闻报》1925年2月19日)

调停工潮

独鹤

此次日本纱厂罢工风潮，愈演愈烈，几有不可收拾之势。工潮既起，劳资两方，均受损失；风潮益扩大，则损失益巨，此为一定之理，而任何人所能知者。然在彼此争持之际，又往往纷纭纠结，两不相下，此则意气所激，遂蔽事理，在旁观者视之，固甚可慨叹也。

日前盛传日人方面谢绝调停，而工人提出之条件亦愈趋严重，如是则各趋极端，非至完全决裂不止，此甚非好现象也。盖双方既成对抗，直接交涉，愈成僵局，非有排难解纷者斡旋其间，必不能成转圜之效。故甚望双方能互相谅解，容纳调人之主张，庶几可于短时期内得一结束。而各团体于此，亦应知罢工风潮关系社会，亟起而负和解之责，勿因谢绝调停之故，遂置此事于不顾也。

(《新闻报》1925年2月21日)

3. 《时事新报》^①

述日本纱厂罢工事

达 仁

我国近年以来,时有罢工之事发生,推其原因,由于厂主待遇不良者固多,然因共产党之煽惑,以致工人走极端者,亦在在皆有。此次日本纱厂之罢工风潮,即其一例也。

自内外棉纱厂之工人于九日罢工之后,迄今已有一旬,不但工人无上工之希望,此种风潮且有日益扩大之势。继内外棉纱厂之工人罢工者,有日华、大康、丰田、裕丰、同兴数家,其罢工人数已自九千余人增至三万余人。计:内外棉纱厂一万五千人;日华纱厂三千三百人;丰田纱厂三千六百人;大康纱厂三千六百人;裕丰纱厂三千三百人;同兴纱厂二千人。

闻今日国民会议促成会主持之罢工后援会,已决定派遣代表向厂主提出严重之要求,限其在三日内答复,否则将取激烈手段对付厂主。记者在数日前,于此事已微有所闻。据共产党员某君云,工人方面拟实行暴动,以推倒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之势力,此次罢工风潮似已进入险境。惟记者得此消息之后,即去访晤内外棉纱厂之总经理冈田氏。冈田氏人极和蔼,谓彼对于此事愿意和平解决,且谓厂中平时每日工作十一小时,设有工人学校与工人医院,目前虽在罢工期内,然工资仍照常发给。第不知

^① 《时事新报》是研究系的机关报。

与事实相符否？厂主方面如能让步，则或不致演成惨剧，亦未可知。

此次罢工原因，各方传说不一，有谓厂中办事人员平日屡屡殴打工人，致酿成此次风潮者；有谓中国共产党之赤色宣传，使工人走极端者；亦有人谓日俄条约第四条不利于日本共产党之处，于是联络中国共产党煽惑上海日本纱厂之工人罢工，促其政府省悟，不遽批准该条约。三说未知孰确。惟据记者之意，第三项似不可信；第二项则为确实无疑之事；第一项之事实亦恐难免，然不值得如此小题大做。总之，此次罢工风潮显然有共产党从中煽动，已属不可掩饰者矣。

参与此次罢工之共产党员，闻有数十人。此数十人大半均往工厂区域举行演说，大呼“打倒帝国主义”、“罢工坚持到底”之口号。十八日内外棉纱厂工会发表之通启，亦谓“不达打倒外国帝国主义者之目的不止”。观此，则此次工潮一时决无解决之可能，实有赤化之倾向，未知中国官厅与租界当局究何以善其后也。

工人大半均无知识，不知何谓共产主义，何谓帝国主义，徒供人利用及牺牲而已。某友人言共产党得第三国际之宣传费十余万元，即以此款为延长罢工之用，工人每日一人得洋二角，最近数日共产党每日须费洋六千元左右，共产党且组织有纠察队六十人，每日得共产党洋二元。是耶否耶，余不敢断言也。

共产党近年来专竭力鼓动工潮，以便往俄国报功，领取大宗宣传费，不顾社会秩序，不惜工人牺牲。呜呼，是辈之肉，尚足食

乎！京汉铁路工潮之殷鉴不远，幸此次罢工之纺织工人加以注意焉。

(《时事新报》1925年2月21日)

论日商纱厂罢工事件

圣 心

日商各纱厂相率罢工，迄今旬日有余矣，辍业者近四万人，洵上海年来罢工潮中之最大者也。

余虽未实地调查，然观各报纪载与各方报告，似此次罢工所以激成高潮者，其原因十分复杂，就中可得而言者如：

一、中日感情素恶。其故由于日本在国际上压迫中国过甚，致中国人几人人有对日恶感，同时在中国之日人复骄纵太甚，动辄殴打辱骂。此次罢工当然以“东洋人打人骂人”为导火线。

二、共产派之活动。共产派与闻其事，当为不必讳言之事实，惟谓此次罢工纯由共产派所煽动，恐不尽然。因若无中日恶感与平日厂主苛待工人之事实，吾知纵日有共产派宣传其中，必亦无济于事也。故吾视共产派之活动为继起的与后加的，而其咎大部分在厂主不能立即消弭其事。犹如破伤风，凡体肤有微破，宜速敷以药膏，不然细菌必立穿入。罢工亦然。当事件之初起，若厂家能当机立断，觅社会上有信用之人为中保，立允工人之要求，则决不致有变化。若厂家自以为能耐久，欲以经济力窘工人，则工人亦势不能不走极端，于是共产派活动之机会至矣。此所以吾人评论此事不能不对于厂家大加责备也。且厂家初则

乞灵于中国当地官厅，不能满其要求；复进而乞灵于交涉，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抗议。如此欲国际势力来强压吾人，其荒谬自不待言，且必更激起中日间之恶感，是直欲此事之扩大，而不欲其收束也。故吾人对于此事，决不可因有共产派之活动夹杂其词，而遽对于厂家轻其责难。须知共产派固为吾人所反对，吾人反对共产派不在其共产主义，而在其受莫斯科〔科〕之经济供给，仰莫斯科〔科〕之意旨而行事，所作所为皆有利于俄国而有害于中国，直无所谓共产不共产，乃一亲俄的卖国派耳。然日本纱厂则尤为吾人所反对。吾人反对日本纱厂者以其于实行经济侵略之次，复时时有苛待工人之事实；至于对于罢工问题，竟欲以外交手段用之于完全非外交之问题，足见其以为平日用外交压迫中国屡偿所欲，此次遂亦欲如法炮制也。惟其如此，吾人不能不反对到底。今日吾为此论者，恐读者见达仁君之时论，止注目于共产派，而忘却日本厂家之罪恶也。

（《时事新报》1925年2月22日）

（二）资产阶级团体的调解活动

1. 华商纱厂联合会

公推吴麟书出任调解

华商纱厂联合会，前日曾公推统益纱厂总理吴麟书向内外纱厂出任调停。惟昨据日商纱厂代表方面消息，谓吴君等所提调解条件，于事实上颇多难办到之点，且系非正式文件，故尚在

考虑中,未曾确实回复。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1日)

吴麟书派代表赴工会调解,工人提出最低条件

昨日(二十日),华商溥〔统〕益纱厂代表萧某等二人在工会调停,磋商结果,工人方面表示最后之让步,可如下列之条件:一、不准打人;二、工资加百分之二,无故不得克扣;三、被开除之工人,仍须回厂工作,并即释放被捕工人;四、工资每两星期发一次,不得借故迁延;五、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六、储蓄金须完全发出,以后不得借储蓄之名扣留工资及一切赏钱;又凡无储蓄金之工人,罢工期间之工资须发给五成;如第二条办不到,则罢工期间之工资,须照常全数发给。晚六时左右,溥〔统〕益代表回复,请工人全权代表明日(二十一日)集滨北岸某茶店订约。各日厂将公推日华纱厂经理为代表到会。

(《申报》1925年2月21日)

日本厂主对吴麟书的调解拖延不复

日本纱厂罢工风潮,前日调解,似有接近形势。据昨日消息,则解决之期势将稍缓时日,厂主方面,允于明日答复。据闻此事厂主方面,本推日华大班冈田代表出任接洽。与溥〔统〕益纱厂经理吴麟书君接洽后,吴君即派员至工会接洽。工人与调人商定之最低条件为:一、不准打人、骂人及无故罚工钱;二、工钱加百分之二;三、不准无故开除工人;四、赏工每两星期发一次;五、红簿一律发还。吴君当持以询厂主,厂主方面,本允前

早答复，嗣至晚间八时始遣人答复，谓此事关系各厂，须经开会决议，故待至星期二(二十四日)始可决定。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3日)

调解期间，永安纱厂董事会讨论预防日厂罢工 波及该厂办法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九号
乙丑元月廿七日 第二十一期会议

郭乐先生主席，宣读二十期议案，可合与否？

胡耀庭先生提倡作合。

杨辉庭先生和议，众赞成。

主席言：是日特请诸公叙会，为本纱厂进行事，并及近日日人纱厂工潮事。目下虽是日人纱厂一方面罢工，幸未波及到中国人纱厂。工潮已有十天，未能解决，料此次工潮非工人一方面可能办到，从中或有人暗助指使，未易解决。恐将来波及到中国人纱厂，而本厂亦是同业，不得不要及早预防，万一不幸波及时，以何善法对待。故特请诸公叙会，务望各人留意研究，筹谋完善法子，以免临时办法束手耳。请诸公发表。

郭顺先生言：工潮事虽万国所有，但此次工潮未悉是何种用意，若为经济问题，容易解决，或涉于政治意味，不易从早解决也。昨晚纱厂联合会集议，有欲用联合会名义派代表以双方调和，俾早了结，于大家有益。嗣又恐调和不到反为不美，事遂终止，惟各人留意从事为是。

梁创先生言：目下工潮似含有政治意味，料未易解决。事起之初，弟已即派人调查，据云，因与女职员调换男职员事冲突事起云云。主席先生所详预防各情甚是，但有何善法，祈各位董事诸公指示一切。

主席言：工潮事万一有波及到本厂时，望各位执事人员必要以善言善法调停劝解，临机应变，切勿梗执冲突，激成他等暴动，尤望两位经理先生两位工程（师）晚间轮班在厂住宿，借资照料。遇有风潮争执等事得赖有人主持，镇定解释，裨益不浅矣。

郭瑞祥先生言：主席及两经理先生说及工人罢工及讨论预防各情颇详。但与〔以〕弟浅见，目下中国工人程度尚在幼稚，不及外人情〔程〕度之高。料工人自己方面，多数不愿意罢工，损失自己权利，往往罢工多由歹人挑拨，致受煽动，或迫于势居多。在工人方面，亦如〔无〕可如何。但望经理先生工程师先生随时留意各职员及工头，或将世情艰难开导，或以理详说，一则联络感情，一则俾各职员受益，未始非疏通之道也。因职员工头比工人情〔程〕度较高，可以情理晓谕也。如遇有不可靠之职员及工头等，及早设法疏通或开辞。至开辞之法亦勿持之过急，务以善法行之，免激动他工人生事，有所借口，此亦防范之一道也。

杨辉庭先生言：工人罢工之事，多系被动地位，或受工头所迫，或外界歹人煽动，且工头亦系受人指使居多。先要认真查察职员及工头，如该职员确系妥善，则给薪水高的，亦于公司有益；否则不良职员虽工资极廉，反于公司有所损矣。

主席言：罢工事或不幸波及本厂，各位必须要用善道开导安慰之，望他消灭，免其扩大，否则不堪设想。办理艰难，各宜注意，切要！（下略）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一号郭乐（签名）

（《上海永安纺织公司董事会议录》1925年）

2. 沪西四路商界联合会^①

称罢工使地方不安，决定进行调解

沪西四路商界联合会鉴于近日内外棉厂华工罢工风潮，事关邻近贫民生计，不但工人工厂双方受损，即地方亦觉不安，前日（十二）下午一时特开临时会议，到马松岩、蒋逸民、马杰、郭兆吾等二十余人。马松岩主席，略谓罢工风潮一经决裂，不但双方受损，即地方亦觉不安。我等商人团体，近在咫尺，实难坐视，是非调停不可云云。结果决定办法两则：一、致函工会，使勿暴动，听候调停；二、致函日内外厂经理冈田氏，可否愿受调停，候信办理。当即推定蒋逸民、郭兆吾起草。乃散会。

（《新闻报》1925年2月14日）

^① 该会为小沙渡一带日纱厂区的中小商人团体，二月十五日参加各团体联合组织的“东洋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并被推为执行委员之一。

派代表与内外棉工会接洽

内外棉工会方面，因沪西四路商界联合会曾表示担任调停之意，昨早即去函请该会先行设法释放被捕工人，并保证工会代表至浜南时不受缉捕，以便可以派人过河商议。该商联合会得信后，即派人至浜北工会就近商议，转述内外棉厂主方面愿意让步解决之意。当时双方谈判已稍有结果，定于今晚七时再会议。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5日)

日本厂主态度强硬、拒绝调解

迄于昨日(十六)劳资双方虽由沪西四路商联合会从中调解，但厂主方面，对于工人所提出之七项要求，内如增资十分之一，罢工期内不扣工资两项，坚持不允；至对于将来改良待遇，表示当由公司酌量办理。惟工人方面，内部团结甚坚，对于七项要求，除罢工期内工资照发一层可予通融外，其他非达到圆满目的决不上工。工人组织，设纠察、侦探、代表各部，执行对外事务。沿胶州路戈登路小沙渡一带，工人往来如梭。

(《新闻报》1925年2月17日)

纱厂罢工风潮，沪西四路商界联合会出面调停，交涉数次，迁延数日，尚无确实办法。前日工人方面有让步之意。昨日日内外纱厂，派人请沪西商联合会代表入厂，该会又推派陈蔚文、陈芳坤、郭兆吾、吴廷桢、吴莘耕、窦育麟、孙金东、朱凤仪、李联芳等九人，又邀同该厂包探朱启桢偕同入厂，讨论办法。诨日人冈

田见面后，即婉词谢辞，谓风潮渐大，已延至十数家，非余一家所能作主，俟一致商妥后，再为烦驾云云。该商联合会代表等磋商之下，以调停数日，未有结果，如再迁延，恐生变化，亦当面谢绝，退出调人地位。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0日)

声明力不胜任，已请商总联合会协助调解

沪西四路商联合会启事：

敝会鉴于此次日厂罢工风潮，事关贫民生计及影响商业治安，实难袖手坐视，用特推派代表陈蔚文、陈芳坤、吴廷楨、李联芳、窦育麟、郭兆吾、吴莘耕、朱凤仪、孙金棠诸君，并邀同该日厂工头朱启楨君，同至内外厂调解，与厂主任冈田君作切实之磋商，以期容纳工人要求之条件；一面至工人方面商量退步，庶可调和，易于结束。无如双方意见实难一致，以致调解迄无结果。敕会同同人自惭力薄，恐负各界厚望，特于昨日恳请商总联合会协助进行，一俟得有结果，再行报告，以慰各界盼望。特此声明。沪西四路商联合会全体同人启。

(《新闻报》1925年2月21日)

3. 五马路商界联合会

函请华商纱厂联合会出面调解

上海五马路商界联合会，前日下午八时开会，到者二十余人。公推王汉良主席，议决案如下：(中略)二、日商纱厂华人罢

工案,公决函请与纱业有关之第三者出作公正调停,以期早息风潮,并决定函请纱业联合会^①出为调解。(下略)

(《民国日报》1925年2月17日)

推派代表分别进行调解

五马路商界联合会于前日下午八时开会,讨论日纱厂罢工问题。正会长王汉良主席。议决案如下:一、评议长常玉清^②久居小沙渡,声望素隆,即推常君向工人方面切实调解;二、公推会员李鹤成向厂主方面切实调解。

兹分录其接洽情形如下:一、李鹤成君于昨日上午九时半,前往内外棉株式会社,由大班冈田氏接见。其所答复之工人要求条件如下:(一)殴打工人,厂中并无此规定,想均系工头之妄为,此后应竭力禁止;(二)厂中工钱,原为两星期一发,嗣因日班工人夜间携钱回,在药水厂附近大受强徒抢劫,故改为三星期一发,则日夜班轮流,适均为夜班时发给工资,日间携回,以免不测;(三)捕房、警厅拘捕工人,为治安问题,与罢工问题无关,确非厂主方面所能操纵;(四)开除之五十名工人万难复用(按调人方面,拟另谋安插以资解决);(五)储蓄一层,并非工资,乃额外之赏银,例如应赏十二角,则现给六角,储蓄六角,储满十元后,即不再扣储,完全赏给;但此项储款,遇工人家庭有要事时,或停止工作时,仍然照数发给,毫未留难;(六)加工资百分之二,尚须

^① 指华商纱厂联合会。

^② 据老工人回忆,常玉清是青帮头目,小沙渡一带的流氓头子,曾任内外棉五厂和丰田纱厂的包打听总管,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

考虑(按:调人方面再作恳切之要求,大概可行);(七)罢工期内照付半资亦须考虑(按:调人方面,拟请双方让步,似不难就绪)。

二、常玉清君于昨日下午一时,前往工人代表方面接洽。日华、同兴两厂工人提出要求,与各厂不同者如下:(一)赏工每星期赏一天,不得克扣;(二)生病及有事故请假时,工钱当天结算,不得延挨不发;(三)如加工钱一层办不到,在摇班期中工钱照发;办到时,则摇班期中工钱,应发给五成,不得减少;(四)援助内外棉、日华、同兴等厂全体工友,达到要求目的,始一致上工。并据工人代表称,今日常君出为调停,吾等无不乐于从命云云。次并推出工人代表二人,随常君同往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会商解决办法。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3日)

4. 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

接受沪西商联会的请求,参加调解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前接沪西四路商联合会公函,请出任调解罢工风潮。该会当于十八日晚谈话会时,约定于昨日下午,邀请沪西四路代表及各纱厂工人代表,到会作非正式之协商,以便入手调停。昨日下午,沪西四路到有代表六人,商总联会议董亦到有六人,惟因日纱厂方面已表示拒绝调停,故工人代表未曾出席,谈判亦未有结果。现闻该会以此案风潮扩大,非两方之福,无论如何,必须及早解决。纱厂方面虽已表示拒绝调停,现拟督促纱厂代表仍继续调解,并定明晚召集临时紧急会议,邀请各路

议董到会,商议入手调解方法云。

(《申报》1925年2月20日)

开会议决:尽奔走之劳,冀早日了结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因日纱厂罢工问题,于昨日下午八时在望平街会所开各路议董紧急会议。到王汉良、俞铭巽、潘冬林、蒋梦芸等十余人,工人方面亦有代表列席。开会后,会长主席。首沪西四路商界联合会报告调解经过及劳资两方面意见,次潘冬林发表意见。另有接近日人纱厂方面者,谓工人举动有外界为之帮助,故现时尚未到调解时期;必待工人有诚意磋商时,始可接洽。当经到会者详细研究,结果以劳资两方相持多日,损失已属不赀。现闻纱业界中已有某巨商出任调解,且有明日签约之说,则本会议董亦应尽其私人奔走之劳,希冀早日了结。决定先从各方面接洽入手。定明日下午四、五时,仍在会所交换意见云。

(《新闻报》1925年2月21日)

派出代表进行调解

前日华商纱厂代表调停小沙渡方面罢工,本约昨日召集工人代表谈判,然待至下午四时,迄无回复。唯十一时许,商总联合会代表潘冬林、李联芳二君,及沪西四路商联合会代表姚少甫等四人,曾到工会,约工人代表于二十二日十时到商总联合会会商。据云,被捕之工人及代表,明后日即可保出,并担保嗣后不再捕人。工会方面,即将前日与溥〔统〕益代表谈及之让步限度(见昨

日报)告之。大约今日若有正式会议,罢工风潮或即可解决。然此次会议,日厂方面是否派正式代表出席,谈判签字,则尚未探悉。工人方面,仍极镇静,各厂代表昨日又有会议,工人纠察队仍照常传达消息及代表会议之决议于群众。并闻因捕人之故,已举出候补代表各厂若干人,以备万一云。

(《申报》1925年2月22日)

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前经议决设法调解罢工风潮,昨由袁会长委托王汉良、潘冬林,及五马路职员常玉清等,分向工人及纱厂方面先行探访真情,并用私人名义疏通一切。王君等往小沙渡等处接洽一日,颇有端倪,当晚回报本会,由袁会长补具公函,继续分途谈判。如果两方愿意容纳调和时,再行由该会召集全体议董大会,并邀集纱厂、工人两方负责代表,正式讨论解决办法云。

(《申报》1925年2月23日)

邀总商会会董、日本买办王一亭^①出面调解

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会长袁履登,将于今日因公赴浙,所有调停日商纱厂工潮事宜,已由袁会长请由议长叶惠钧为代表。昨日并由袁履登、叶惠钧、王汉良等公邀王一亭共同调停,王君亦已慨允。一俟厂主方面具体答复后,各代表即赴厂主方面切实谈判。昨已由该会总务科潘冬林分别知照,一面并向工人方面

^① 王一亭当时担任上海总商会特别会董,日清公司买办,并兼任日商东亚麻袋厂董事。

进行调解。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4日)

昨日日商纱厂联合会方面，因各路商界总联合会约定面商调解风潮，特派内外纱厂等代表冈田、原木及日本东京纱厂同业代表武居等三人，于下午二时赴约定地点杂粮公会，会晤商总联会议长叶惠钧、议董王汉良及五马路商联合会职员常玉清等，该会特请之王一亭君，到场会谈。寒暄毕，先由王一亭君与冈田等三代表谈话。王君代达各路商界希望此次风潮早日完满解决之意。日代表颇表同意，谓日纱厂方面，平时待遇工人，素极优待，如工人住屋，均减半取值，并有医院储蓄等，随时为工人谋幸福。此次不幸发生风潮，颇为遗憾，幸已有六成工人自己觉悟，要求工厂无条件上工。工厂方面所以不能立即开工者，实因修理等手续未曾完毕，大约日内当可完全解决。此次承总联合会及王君等出任调解，非常感谢，云云。谈话毕，王一亭君当将日代表之意见转达到会诸人。冈田等三代表旋即辞出，赴淞沪警察厅访晤常之英厅长，面商一切。临行，冈田等允将调人之意见与同业会商后，定今日答复。商总会方面，则请王一亭君于得到结果后，移交总商会共同讨论，以便解决。工人方面并静待今日解决。故今日下午二时各方代表均将齐集总商会会议，此项罢工风潮或能于今日解决也。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5日)

5. 上海总商会

工会代表与日本厂主在总商会谈判

昨日下午二时，总商会王一亭，警厅常之英，交涉署陈世光，商总联合会潘冬林，日本领事及邵力子等，资本家方面之代表数人，工人方面之代表刘贯之、张佐臣^①等六人，齐集总商会开切实谈判。谈判以前，工人代表问资本家代表曰：是全体代表否？答曰：是。于是开议。工人所提要求共有七条。结果：（一）不准打人；（二）不准借故开除工人；（三）两星期发一次工资，不得延迟等三条，均已由资本家方面答应。第四条释放被捕各人，讨论结果，在华界者由总商会担保，签字后立即释放；在租界者由克威律师担保释放。调解结果，颇为圆满。惟（六）罢工期内工资照发，及（七）平时工资普遍的增加百分之二两条，资本家方面不肯答应，工人代表力争，适时已不早，决定次日再议。以上皆昨日在总商会会议之经过。今日续议，除昨日到会者均仍列席外，并由资本家方面每厂派出代表，准备条件议妥时，即行签字。

（《申报》1925年2月26日）

昨日下午三时，由总商会邀集日本纱厂代表、工人代表暨原调人，并请官长监督，在总商会开会接洽。官厅方面，到交涉员陈震东，交涉署科长朱鹤皋，警厅长常之英，警厅司法科长赵松

^① 张佐臣同志，大康纱厂工人，中国共产党党员。

龄；调人方面，为总商会方(副)会长，会董徐庆云、陈良玉、王一亭及徐可升，商总联合会叶惠钧、邵仲辉、王汉良、常玉清、李鹄成、蒋梦芸、张振远、潘冬林；纱厂方面，为内外纱厂冈田，内外棉株式会社武居绫藏；工人方面，为同兴、日华、丰田、内外棉、大康、裕丰四万余工人代表英国律师克威，翻译徐维绘。

先由调人在总商会楼下会客室，向纱厂代表冈田氏接洽。冈田所述日纱厂成立以来之经过并营业宗旨，略谓：除将本求利外，待遇工人向持人道主义，故每日工作只十一小时，而工价优于普通纱厂，与待遇日本工人相等；对于工人卫生、住处，特建宿舍、膳堂、医院；此外又设有工人学校从事教育；至于储蓄奖金，纯为工人利益起见；所定工价，以工作之优劣为标准，聘有极有经验之日本工程师六人，专事稽查工作。此次罢工，实不明系何原因。罢工一事，与工人有损无益。去年纱价大跌，日纺织公会拟主停工，鄙人为顾全工人生计，且情愿蚀本，照旧工作，如此可见日纱厂待遇工人之不薄。此次风潮，既承调停，盛情至为感激，愿闻调解意见云云。当由调人方椒伯、王一亭等，先将工人方面之意见，详为转述，继即邀冈田等登楼，与工人代表克威律师三面接洽。当与冈田商议，得结果如下：

一、工人一律照常优待，如有虐待情事，准可禀告厂主，秉公办理；

二、工人能回厂安分工作者，照旧工作；

三、被捕工人均可释放(由总商会设法)；

四、储蓄奖金，满五年发还，未满五年而被开除，如平时在厂有成绩者，亦可发给；

五、工资每两星期发一次。

以上各条商定后，当约由冈田转商各纱厂允洽后，定今日下午三时，仍在总商会三方签字。闻工人方面，对于此项条件，可无问题，并允即日上工云。

(《申报》1925年2月26日)

日本厂主多方狡辩，总商会擅自取消

重要条件

大罢工发生以后，一直到二月二十五日，始有内外棉公司的代表，与调停者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王一亭、交涉使、淞沪警察厅长等共同商议，当时(工人方面)所提的条件如下：

一、严禁殴打工人；二、增加工资一成；三、工资每二周发给一次；四、回复辞歇的四十人之职务；五、罢工时期内的工资照付；六、公司规定奖励勤勉的工人，废止储金制度；七、无故不得辞歇工人；八、释放被拘工人。公司方面对于上面的条件的解答如下：

一、对于第一项，公司的日本人对于中国的职工，是有同情亲切的态度的，公司方面，严禁殴打的事情，将来也与此取同样的方针；二、公司所给工资，比较中国厂与外国人所营的工厂为多，所以不能增加；三、第三项无异议，公司正在实行之中；四、辞职的工人，不能复职；五、第五项不能同意，但当在罢工之初，曾声明上工者每日支付罢工期内工资三成；六、第六项职工略有误解，此种储蓄制度，与工资无关系，是工厂因为增进职工福利起见，而任意赏给的；七、第七项，无理决不解雇工人

的；八、第八项，是为工部局、警察所〔厅〕禁拘的，释放工人，在公司权限之外。

商议的结果，总商会对于第二、四、五、七及第八项，以为不必提出，遂取消而以下列的条件解决：

一、公司不虐待工人，如有虐待情事，可禀告工场长，以待工场长的公平解决；二、工人复工者，可照以前的办法；三、储蓄奖金依公司规定，满五年者可以支付；中途退职，由公司规定，如成绩佳良者照给；四、工资可两星期一发。

以上条件解决后，工人遂依次上工。不过工友受了这种压迫，自身渐有觉悟，乃于闸北潭子湾组织工会，入会的工人很多。工会组织后，对于职工的权利，自然竭力的拥护，所以大罢工虽解决，而厂内的工潮，未曾稍已。

（唐海：《中国劳动问题》，上海光华书局 1926 年 12 月发行，第 441—443 页）

总商会讨好日本厂主，复工条约草草签字

昨日下午三时，总商会等为调停日纱厂罢工风潮三方签约事，仍邀日纱厂代表及工人代表到会，并请地方长官莅会监视。经调人向双方续申调停意见，时工人方面，对于原议条件，仍有请求修改之处，经克威律师向纱厂代表冈田氏转述此意。冈田氏谓原议条件已向各厂征得同意，若欲再事修改，仍须再征同意。调人方面亦以枝节太多，反延时日，当向工人说明，交涉手续不宜枝节，如有他虑，克威律师及调人方面均可负责保护，工人方面始允遵照。时调人又将此意转致冈田氏，乃由冈田声明今日签字，只余一条，应由电话再征各厂同意，即可代表签字，言

次即由徐可升陪打电话。一面由张振远缮写条约，计正副二纸，余二纸，一交纱厂，一交工人，签约正本由商会保存，副本交克威律师保管。旋冈田入席，报告日纱厂除丰田厂声明该厂工人已愿无条件上工，不必签字，其余各厂，本人有权代表签字，惟第三条保证金只内外纱厂有此办法，其余各厂无此办法，故条约内须另句声明，并请方(副)会长签证。结果由纱厂冈田、工人代表克威律师、见证方椒伯，于六时半一一签字。至于被捕工人，一、警厅方面由商会设法，二、捕房方面由工人代表律师设法。

到会之人数，有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会董王一亭、徐庆云、陈良玉及徐可升，监视官长常警厅长，陈交涉员代表朱鹤皋、戴联奎，调人何茂如代表许人俊，商总联合会叶惠钧、王汉良、邬志豪、潘冬林，五马路商联合会常玉清、李鹤成、杨宗凯，沪西四路商联合会李联芳、陈蔚文、吴廷楨、吴莘耕，通海同乡会沈卓吾，日纱厂代表冈田氏、武居氏、元木氏，工人总代表克威律师，各厂工会代表：同兴刘贯之，大康张佐臣，日华李瑞清，裕丰王金福，内外朱国华〔平〕，丰田张应龙等五十余人。

签定之条约。今由总商会调停，商妥下列各条：

一、工人照常一律优待，如有虐待，准可禀告厂主秉公办理；二、工人能回厂安分工作者，照旧工作；三、储蓄奖金照章满五年发还，未满五年被开除者，如平时在厂有成绩，亦可发给；四、工资两星期发一次(照章办理)。

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内外株式会社上海支店冈田沅太郎。

除前项第三条之外，下记各厂一律同意：日华纱厂、大康纱

厂、裕丰纱厂、同兴纱厂(下签冈田)。

工人代表克威律师。见证方椒伯。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7日)

调解“成功”，日本厂主设宴酬谢

日商内外纱厂总理武居绫藏氏，昨日正午十二时，在静安寺路皇家饭店，设席宴请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会董王一亭、徐乾麟、闻兰亭等，及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会长袁履登、议长叶惠钧，及五马路商界联合会王汉良等多人，并有陈交(涉)使及各厂职员等陪席。席间首由武居君申谢总商会及各路商界总联合会热心调停上次日商各纱厂工潮，并谓各厂待遇工人规则，已陆续改正，希望随时联络云。次方椒伯、叶惠钧等均有演说，宾主尽欢而散。

(《申报》1925年3月31日)

六、工人胜利复工，巩固斗争成果

(一) 工会召开群众大会，报告 谈判经过，宣告复工

内外棉工会等在沪西开大会，刘华报告谈判经过

同兴、内外、日华、丰田四厂工会，昨日下午二时在潭子口沪西工友俱乐部后面空场上开会。到四厂工人一千余人，及各团体代表、来宾、警厅稽查、英法租界包探等。首由该工会代表刘

华报告开会主旨^①，及罢工经过与条件内容后，率工人向各团体代表致谢调停盛情。来宾潘冬林、蒋逸民、鲍叔明、杨(之)华、张佐臣等均有演说。又由工人代表向警署代表李君、商界代表潘冬林要求请交涉释放被捕工人，二君允为办理。议毕摄影散会。

(《新闻报》1925年3月2日)

日人报道刘华和各界代表在沪西复工大会上的演说

这一天工会召开摄影大会(参看照片)。各代表相继上台演说。

一、沪西工友俱乐部代表刘华上台作了下面的发言：

我们这次罢工，即使说没有得到胜利，但必须指出，这是第一次打败日本人，面目为之一新，日本人也低下头来。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呢？各位工友心里都明白，调停人方面也都晓得。上海总商会、警察厅长和各商会会长都出面替我们调解。同时，克威律师也支援我们。这都是由于我们工友抱有热情和义气的缘故。而且这次罢工，人数在七〔三〕万人以上，已经组成了工会办公，在上海可说是掀起一大工潮。现在能够这样结束，真是工会之福，同时也是各位工友之福。可是在这次罢工时，工会只是临时设立起来，还不能说已经很完善。这次罢工开始后，重要人

^① 据三月二日《申报》报道：到会工人二千余人，首由主席报告，略谓：此次纯系看总商会及各团体调停之热忱，今后吾工人之事，正方兴未艾，愿工人同胞努力云云。

物都出来调停,因此得以保全体面。各位要注意的是,我们工会已和从前不同,现在对中国官厅等于已经备案,在租界也得到了承认,已成为光明正大的工会了。今后只要各位对工会热心维护,我想就不愁得不到胜利!在工会刚成立的当儿,必须尽力为大家谋福利。我们工人迫于饥寒,为敌人而劳动,工钱极少,子女都没有求学机会,我们工会,第一要开办平民学校,使工人子女都可上学,不收学费。又工人在厂生病没有诊所,往往只有等死,我们工会,第二要设立医院,作为工人临时诊所,不收诊费。第三要设立养老院。如单身工人年老时精力衰退,不能劳动,苦无生路,可以到养老院渡过余生,不收分文,云云。

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代表潘冬林上台发言如下:

诸位,这次罢工是同心协力的结果,我们非常同情,而且工会内有知识的人很多。现在的时代,各方面都有会,商界有商会,学界有教育会,这样,既然各有公会,在工人方面,工会也就有其必要。而且这个工会,将来还可以作为传授的保证〔原文如此〕。希望各位互相帮助,要始终如一地同工会在一起,而且将来各会联合起来,在社会上就有更大的希望。

三、警厅稽查上台发言如下:

诸位,这次罢工所取得的胜利,都是因为工会的名义,所以才能达到目的,保全体面。可见工会就是各位的主脑,有了它,工作才能得到进展。今后大家要维护工会,如因工人见识有限,或受人压迫,要到工会共同讨论,不要把个人意见对外随便发表。这一点希望各位工友注意!

四、上海总商会代表包商云^①上台发言,赞成工会的旨趣。

五、沪西商联合会代表蒋锡〔逸〕民上台,希望大家拥护工会的旨趣。

六、学界代表杨之华女士上台,希望大家同心协力。

七、同兴纱厂女工代表希望男女姊妹协力进行工作。

八、日华纱厂代表李瑞清希望工人团结一致。

九、同兴纱厂代表刘贯之宣布工会处理事务。

当天下午四时左右演说时,警察署长亲自在场督察,随从卫队数十名均全副武装,提防无知之徒扰乱治安秩序。

以上是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同盟罢工后复工的第三天,各代表在浜北大丰纱厂工会的演词。

(译自宇高宁《支那劳动问题》,第661—664页)

大康、裕丰工会在沪东召开大会,报告谈判经过

自总商会各团体调解工潮解决后,各厂工会代表即返厂报告各工人,安心上工。昨日(一日)下午一时,杨树浦大康、裕丰两纱厂工会在引翔港召集二厂工人开会,由大康代表张佐臣、裕丰代表万金富〔福〕报告调解经过及上工条件。小沙渡内外棉代表朱国平、日华代表李瑞清、丰田代表张应龙,各召集本厂工人在闸北潭子湾空场开会。各工人以罢工过久,牺牲已巨,且因衣食关系,多愿服从工会意旨,恢复工作。昨日二处开会时,华租二界当局,特饬派中西探捕莅场监视,梭巡照料。各厂工人定今

^① 可能是鲍叔明之误。

日(二日)起,一律上工。

(《申报》1925年3月2日)

大康纱厂工会号召工人参加复工大会的传单

条约已经签字,

工友一齐上工^①,

星期^②下午在引翔港工会后面开大会,

大家齐来听章程。

(原件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铅印)

上海日商各纱厂罢工工人复工宣言

日人既挟其坚甲利兵,胁迫我中国与之订立不平等条约,复依据此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设厂制造,以图垄断我国工业,宰制我国国民经济生命。工人等同属国民一分子,乃为饥寒所迫,不得已降志辱身为敌人工作,心怀怆痛,匪言可宣。乃复备受虐待,至于脚踢拳殴。工资之微,几至无以糊口,况复任意迁期,借端克扣,强迫储蓄,期以十年。迫于无奈,始至相率而罢工。工人等既以糊口而事仇,非迫于万不得已,岂肯以细故而自绝生路?是乃此次罢工之真因,敢为天下告也。

日厂方面,知工人等自无储蓄机关,饿极必屈,罢工兼旬,绝无调解之言。后以各界奔走尽力,始肯签约四项如下:第一,今后如有虐待,准告厂主办理;第二,工人回厂照旧工作;第三,储

^① 原件在此句下,盖有朱红色的“大康纱厂工会”图章。

^② 星期日指三月一日。

蓄金满五年发还；第四，工资准两星期发一次。工人等最低之要求，若加工资百分之二，若罢工期间工资照发，概遭拒绝。工人等感各界调解之热忱，又加以饥寒之交迫，遂不得不遵调人之言，尽量让步，以期早日息事复工。惟厂主自恃有力多资，恒操胜算，对此低至零度之约是否践行，又是否曲全约文，加工人团体或个人以迫害，均在不可知之数。

工人等利害相共，生死相依，除此别无求生之路。一旦此路不通，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尚乞全国同胞原谅工人等饥寒所迫降志事仇之苦衷，始终加以援助。谨此宣告，务希鉴谅！

内外棉纱厂工会、日华纱厂工会、同
兴纱厂工会、丰田纱厂工会、大康
纱厂工会、裕丰纱厂工会敬谨宣言

（《五九月刊》第7期，1925年3月）

（二）遵照工会号召，各厂工人进厂复工

工会号召工人全体复工，坚决维护工会（传单）^①

列位工友！我们这次因受日本人欺负，大家团结一致，罢工数十天之久。但凡事总有一定限度，现在警察厅长、交涉员、总商会都出面调解，因此，我们必须有所让步。工钱虽没增加，但有体面，条约已经签字，希望大家全体复工。但下面两点紧要事项必须记住：

① 日文所载原标题为《罢工解决的通告》。

第一,工会是工人的生命,工人要服从工会的命令。无论任何事情,工会自有处置办法,没有工会,资本家更会欺负我们,因此,我们一定要组织和维护工会。

第二,大家要团结一致,不要害怕日本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工人要抱工人的义气,一同前进。

这两点大家必须牢牢记住。

(译自宇高宁《支那劳动问题》,第658页)

内外棉工会的命令(传单)

我们取得了胜利,

我们工友大家复工吧!

你们不用怕日本人的凶暴,

你们不用怕资本家的厌恶,

他们毕竟已被我们中国工人打败!

我们要团结一致,

大家抱义气,

听工会的话!

不要怕日本人向他低头!

不要怕资本家向他低头!

我们这次得到的胜利,

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胜利,

如果厂主再压迫我们,

我们还要来一次罢工!

我们大家听工会的话,

工会保护我们，
我们保护工会！
工人胜利万岁！
中国人胜利万岁！

(译自宇高宁《支那劳动问题》，第658—659页)

各厂工人复工

昨日为日商纱厂工潮解决之第四日，各厂一律恢复原状。杨树浦大康、裕丰二厂工人，约有十分之八上工，并继续开放夜工。小沙渡方面，日华、内外棉二厂，因内部尚须整顿，各厂工头正与厂主洽商间，昨日虽照常开工，工作者约有十分之六。同丰〔兴〕厂全部恢复工作。丰田厂至昨日始开厂，入厂工人甚形踊跃。

(《申报》1925年3月3日)

(三) 继续加强团结, 巩固斗争成果

1. 力争释放被捕工人

总商会函请警厅释放被捕工人

总商会于调解工潮条约签字后，即函致警厅，请释被捕工人。函云：敬启者，此次日本纱厂罢工风潮，经敝会邀厂主及工人代表双方和平调解，业已议妥办法，工人与厂主均已允洽。风潮既已平息，所有被捕人员，应请释放，以告结束。此致淞沪警

察厅长常。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7日)

工人函请克威律师交涉释放被捕工人

又捕房所捕工人，即由工人备函委托克威律师代表向捕房请求释放。其委托书如下：具委托书人张佐臣等，委托克威大律师为裕丰、大康、内外棉、同兴、丰田、日华六厂全体工人全权代表，所有罢工时期被捕房捕去人员，务请大律师向捕房请求释放。至关于厂主方(面)共同订立之条约，此后须请大律师永久保障，此证。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同兴纱厂工会刘贯之、大康纱厂工会张佐臣、日华纱厂工会李瑞清、裕丰纱厂工会万金福、内外纱厂工会朱国华〔平〕、丰田纱厂工会张应龙。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7日)

数千工人热烈欢迎被捕出狱兄弟

昨日工会代表十余人，到警厅欢迎被捕者出狱。下午三四时，出狱者十人，偕欢迎者同乘马车至工会。欢迎群众数千人，沿岸欢呼声、击掌声、鞭爆声，一时并作，颇为热闹，并在炳〔滨〕江茶楼开茶会演说。惟被捕十三人中，尚有戴阿三，已送地检厅，邓忠及孙良惠尚留押警厅未释。工人将向调人交涉。在押捕房者，前日调解时，已定由克威律师担任向公堂保释矣。

(《申报》1925年2月28日)

函请总商会切实交涉释放邓中夏等同志

又在此次工潮被逮诸人，原由总商会担保释放，昨工人特致函总商会云：

敬启者，敝会会员张〔孙〕良惠、邓忠二君，亦因此次工潮被逮，尚未蒙警厅释放，工人等殊为疑虑。查当初工人等慨然允许上工者，实因释放被捕者一条，有贵会完全负责担保故也。务祈贵会向警厅切实交涉，即予释放，俾工人等得安心工作，不至再生风波。又杨树浦大康纱厂日人借口翻译员杨剑华君参加罢工，于昨日无故将其开除，显系违背条约第二条，工人等人人自危。务请贵会严重责问大康日人，依约恢复杨君固有工作为幸。（中略）大康纱厂工会代表张佐臣、裕丰纱厂工会代表万金福。

（《民国日报》1925年3月4日）

警厅被迫答应释放被捕人员

淞沪警察厅接上海总商会来函，谓纱厂罢工风潮，业经召集双方设法调解，现已和平解决，所有因是案而被拘之工人，请贵厅一律释放为荷，云云。常厅长以案既解决，自应释放，拟飭属查核原案，以便照办^①。

（《申报》1925年3月4日）

^① 在群众的压力下，警察厅终于释放了邓中夏、孙良惠和戴器吉三同志，不久他们即前往广州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2. 巩固和发展工会组织

大康、裕丰工会要求警厅启封会所

兹悉杨树浦方面尚有拘捕工人情事，并在罢工期内，工会遵令停止开会，钉闭会所，目下工潮解决，昨工人特向警厅请愿保护启用，以利会务。其呈文云：

呈为工潮解决，恳请维持以利会务事。窃以杨树浦各东洋纱厂厂主虐待工人，迫成此次罢工风潮，厂主工人两方受创甚巨。(中略)兹以各厂工人对签订各条，尚多怀疑之处，以致工作不安；属会正拟分向工人详细解释，以期恢复原来秩序。复因属会前于罢工期遵钧厅分署令停止开会，钉闭会所，会务进行难以着手。现在风潮业已和平解决，工人及属会一切行动，更当特别遵守秩序，绝无轨外动作。既承厅长调停解决于前，更望加意维持于后。为此，呈请厅长转饬所属就近保护启用属会会所，俾属会得解释一般工人照旧安心工作，实为德便。又杨树浦常拘捕工人，恳钧厅设法制止，至为公便。谨呈淞沪警察厅厅长。大康纱厂工会代表张佐臣、裕丰纱厂工会代表万金福。

(《民国日报》1925年3月4日)

工人要求日本厂主正式承认工会

昨日为日商纱厂工潮解决之第五日，全部已入完全平静状态。杨树浦大康、裕丰二厂，昨日上厂工作者达八千余人，工人房四周警备渐撤。小沙渡内外棉十三厂及东洋〔亚〕麻袋厂全部

开工，惟工人挑剔甚严，由工头与日管理接洽办理，工人尚未完全入厂工作。丰田、同丰〔兴〕、日华三厂工作之情形尚佳。工人方面对组织工会事，尚拟要求各厂主正式承认，惟厂主方面，尚无表示。

(《申报》1925年3月4日)

警探口中的工会活动

据某通讯社云，淞沪警察厅常厅长昨日分致所属各署、所、队密令，文曰：

案据本厅督察长徐鸿年、傅希奕呈称，据侦探毛忠闾探报，三月二十四日查得共产党在西门外林荫路正兴里二十三号内特派党徒顾修，赴小沙渡潭子湾大丰纱厂旁边平屋内前工人俱乐部作寓，与刘华等共谋第二次日纱厂罢工，以图死灰复燃，并与振泰纱厂谭麟伯及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之主任向警予女士等时相往来，密谋煽惑工徒等情前来，理合转呈鉴核通传查禁等情。据此，除分行外，合亟密令该署，仰即严密查禁防范，以保治安，勿稍泄漏，是为至要，此令。

(《时事新报》1925年4月2日)

工部局警务处惊呼沪西工友俱乐部已成永久性机关

自从日本纱厂约三万名工人的大罢工结束以来，工会领袖及职业鼓动家，其中包括几个带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在内，在华界非常活跃。闸北潭子湾工友俱乐部，原来是为主持二月罢工而组织的，现在却成为一个永久性机关，每天都在那里举行会

议。目前该机构主要是努力为那些在工潮中被开除出厂的工人介绍职业。在这方面它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但是以前它曾努力设法营救被捕工人，结果所有为中国当局所拘押的人全部释放。(中略)只有因罢工犯罪而为工部局巡捕房所逮捕的鼓动者四十九名于本月被判处自罚金五元至徒刑六个月不等。另有两人交保释放，六人撤销起诉，三人仍在拘押中。

(译自《上海工部局公报》第18卷972期第182页,1925年4月23日)

各纱厂组织联合办事处,工人踊跃入会

三月十二日即大罢工胜利结束后的第三天,李立三同志在沪西工友俱乐部召集一个会议,到会的人有沪西工友俱乐部,各纱厂工会联合办事处和各纱厂工会等单位负责人项英、刘华、孙良惠、刘贯之、郭尘侠、韩阿四、李振东、李瑞清、陶静轩、孔燕南等二十多人,邓中夏、杨之华二同志也参加了。会议由刘华主席,首先请李立三同志讲话,指示加强工会工作的任务。接着各人发言,讨论如何加强组织工作等问题。讨论结果,作出下面的决定:

一、各纱厂已宣布成立的工会,一律组织工厂委员会,委员会之下设立小组;小组的组织形式尽量保持秘密状态暂不公开;没有成立工会的纱厂,设法促进工会的成立;

二、准备成立纱厂总工会。在纱厂总工会未成立期间,仍用工会联合办事处名义负责领导工作;

三、推举项英、刘华、孙良惠、刘贯之、李瑞清、韩阿四、孔燕南为联合办事处委员,组成委员会。委员会主要分工如下:

项 英 委员会主任
刘 华 委员会副主任兼宣传主任
孙良惠 组织主任
李瑞清 组织副主任
刘贯之 总务主任

四、联合办事处的会址设在潭子湾,指定刘华、刘贯之常住潭子湾办事处。

各纱厂工会先后组成了工厂委员会,推定了负责人,随即开展工会会务工作。主要的工作是登记会员。会员登记工作各厂都进行的非常顺利,三月下旬(即是头十天)统计,小沙渡、杨树浦、曹家渡三个地区就登记了二万多人,由此足见工人加入工会的踊跃程度。到了四月份,上海日本纱厂全部(除浦东外),以及麻纺厂、丝厂的工人绝大部分都登记为工会会员,没有登记的人多半是童工、养成工或少数女工。

第二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定于五月一日在广州召开。上海纱厂方面选出项英、孙良惠、刘贯之、张佐臣、陶静轩、孔燕南(女)等为代表,于四月下旬离沪赴粤。刘华、李瑞清二人留在潭子湾主持工会工作。

(刘贯之:《关于1924—1925年上海工人运动的回忆》
〔节录〕,《中国工运史料》1960年第1期)

二月罢工后,工人觉悟有了提高,到“五卅”罢工以前,蔡之华曾秘密通知裕丰纱厂工人派代表到引翔港,成立日商纱厂工会(会所在沪西潭子(湾)口)的分会,当时在引翔港开会的有金

才子等人。

(《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人斗争史》初稿〔节录〕)

七、党的领导人关于二月 罢工的论述和总结

上海日本纱厂罢工中所得来的经验

中 夏^①

上海日本纱厂这一次的大罢工，参加的厂数至二十二个之多，人数至四五万人之众，相持至十八日之久，确是“二七”后一个空前的伟大运动。他不特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辟了一个新纪元，便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所有一切详情，拟编专书论述，这里且把几项所得来的经验先写出来。

我们一说到罢工，便会想到“时机相宜不相宜”、“组织坚固不坚固”这两个先决问题，因此，不能不先把这次大罢工的时机和组织略略叙说几句。

一、时机 当酝酿罢工的时候，工人领袖们，也曾经想到这个问题，也曾经打听目前纱花的行情怎样，也曾经侦查工厂存货和交货日期是怎样，然而都不过是一个模糊影响的概念罢了。但在又一方面，工人群众愤于一百余名工友的开除，愤于领袖被捕被打，群情异常激昂，恨不得立刻就要下手。领袖们在这种紧张

^① 即邓中夏同志。

情势之下，哪里还有你选择时机的余地呢？虽然此时正当纱价高涨之期，是在罢工以后四五天才从报上证实。所以这次罢工，老实一句话，时机是碰巧的，并不是选择得来的。

二、组织 在罢工以前，小沙渡方面，虽然进行过秘密的工厂小组，实际上人数不到千人，而且并不是各厂平均发展，有些厂一、二百人，有些厂数十人，有些厂一个也没有；并且训练期间亦不长久。在杨树浦方面，工厂小组有一千数百人，训练期间比较的长久。虽然两方面都有一个混合的工会雏形^①，实际上基础并不稳固。所以这次罢工，老实一句话，组织是不完备的，坚固更说不到。

“时机是否相宜”、“组织是否坚固”，都被资本家暴虐的高压和工人群情的愤激这一个紧张环境逼迫得没有丝毫考量的余地了。工人领袖当此时只好“背城借一”，只好“死里求生”，只好在万分危急的当中，竭心尽力运用种种战术，以求万一的补救。因此，善于运用种种战术，终于得到相当的胜利，总算是侥幸极了。这些战术是很可宝贵的经验，也就是这次相当胜利的主观原因。现将其条叙于下：

一、事先领得工钱——内外棉第八厂粗纱间开除工人，是二月一日的事。这消息传布后，工人奔走相告，群谋对付。同间的夜班工友，迫不及待，便先行罢工起来。工人领袖们见此情形，竭力劝告“莫乱动”，劝告“领得工钱再举”，百端解譬，方才稍稍安贴。并在此时期中，竭力联络各厂工友。至八、九两日领取

^① 指沪西工友俱乐部和杨树浦工人进德会。

工钱完毕，突于九日的下午四时宣布罢工。这样一个长的时间和大的数量之大罢工，假使当日不领得此项可以支持半个月生活的工钱，那么不□(到)一星期，工人便要因生活恐慌而归于失败了。所以事先领得工钱，是罢工时要注意的。

二、临时组织得力——群众平日既无完善的组务〔织〕，又无相当的训练，自然一到罢工，就显出一种原始状态，乱如纷丝，不可疏理；狂如怒马，不可羁勒。幸而工人领袖们，当罢工酝酿时，秘密的组成了一个“总指挥处”。又确悉杨树浦方面之大康纱厂，亦因裁减工人而酝酿罢工，于是索性于小沙渡和杨树浦两方面各设一“分指挥处”，皆听“总指挥处”的命令。总指挥处之下：设一“书记处”，内分“文书”、“宣传”、“新闻”、“印刷”、“交通”五股；又设一“联络处”，负接洽社会团体之责；又设一“护卫团”，负保护工人领袖之责。“分指挥处”之下，只设组织员、宣传员和交通员。指挥机关既定，所以罢工发动后，一切措施才没有慌张。一面于大会中宣布工会成立，由各厂择其勇敢能干者为该某厂代表，组务〔织〕“代表会”。再一面组务〔织〕纠察队，维持秩序，安慰人心，并劝导不明白的工友莫上工。并提出“要听工会的话”的口号，利用种种机会，竭力解释，竭力宣传，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方把数万群众部勒在工会的指挥之下。工人要有战斗的组织，才能战胜资本家，即或平时没有，临时也应用神速的手段组织起来。这也是罢工时要注意的。

三、口号适当——九日下午四时罢工发动后，五个厂万余人蜂拥出厂，当有旗帜引导到一个大坪里开露天大会。台上一面大旗，便是“反对东洋人打人”斗大的七个大字。这个口号

可说是将工人身受的隐痛简单明了的描写出来了，自然刚刚打在他们的心坎上。所以一经传开出去，不特是已罢工的工友看到眼底，至于心酸涕零，就是未罢工的工友听到耳里，也不觉深深感动，而一致同情的罢起来了。就是后来颇得社会上之同情援助，以及官厅起初之不大压迫，和反动派（如工贼、研究系、国民党的一些所谓“护党”党员）之稍存顾忌，这个带有民族性的口号都是与有相当的力的。其副口号如“中国人抱中国人的义气，工人抱工人的义气”，“大家一条心，反对东洋人；大家一条心，反对资本家”，又都是工人自己的俗语所构成，自己的意识所凝集，自然一听得就风靡一时，勇气百倍了。其后由内外棉五个厂，扩大到内外棉全部十一个厂；再扩大到日华、同兴、丰田；并扩大到杨树浦方面之大康、裕丰，未尝不是这些口号有所感动（自然被虐待的经济条件是主要成分）。

四、传单得力——应付有对内对外两方面。这次大罢工，对内尤难于对外。因为罢工的群众既这么大，平日的组织和训练又那么欠缺，不能安内，何以攘外？虽然工钱领得，目前生活不生问题，然而一时激于义愤而随众罢工起来了，及至回家蒙头一想，人人心目中不免引起一个“罢工期间取不得工钱”、“罢工失败停掉生意”种种的恐慌。况乎家人的交谪，厂家的恫吓，走狗的挑拨，更是纷至沓来，怎不人心惶惶！到此时，“镇定军心”和“鼓励军心”是当前的大问题了。固然此时工会每日要将消息和办法揭条宣布，并要寻事给群众做（群众是不甘寂寞的，故必有事做，但切忌天天雷同，不知变化），使群众不致因无指望或无事干而怀疑、冷淡，以至于颓唐。然而关于道理的解释，谣言的揭

破，消息普遍的流传，敌方弱点的露布，……都靠文字的传单。(但传单要注意简单明了，最好用工人自己的话。)所以传单可说是罢工战线上的子弹，一日没有它，人心便恐慌起来了(但发传单要注意盖章，和命令纠察队向群众说明，以免敌方有传单来时鱼目混珠)。

五、准对敌方弱点猛攻——讲到敌方的弱点，可说甚少，因为日本资本家的组织太完备(如此次发动的内外棉，在上海十一厂，青岛三厂，日本二厂，在一个株式会社统辖之下。还有政府资本，势力已不可侮。这还不算，日本在上海不论是公家资本或私人资本的纱厂已有同业的组织。这还不算，日本不论在国内的或国外的纱厂，并有同业总会的组织，设在东京)；资本太雄厚(日本纱业资本雄厚，简直不可预测。在此纱贱花贵的长期恐慌中，就是英国纱厂也只有仅够维持现状的力量。不久以前，英商的老公茂纱厂股东大会还有收盘的消息。至于幼弱的中国纱业资本更不用说了。数年来倒闭者五、六家，其余亦仅足自保。日本怎样呢？恰恰相反，不特可以维持，而且还有扩充，时常有收买中国纱厂的事。最近宝成纱厂亦被收买去了。大家疲敝不堪，而日本独游刃有余，可见其资本之雄厚。中国纱业资本亦正因被日本雄厚资本所挤，故陷于岌岌不可终日的危境)；行动太一致(此次大罢工消息传到东京后，该地纱业总会立电上海日纱厂嘱其“严厉对付，誓为后盾”。除内外棉株式会社总社长阿部彦太郎立即渡海来华外，该总会亦派代表多人跟踵而至。扩大罢工后，资本稍弱的纱厂，颇有单独解决的进行〔如大康〕，但旋即联合一致了)；后援太强大(他们不特有同业实力的援助，而且利

用他们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传统政策,利用政府外交,提起国际交涉,利用海军舰队,声称登陆示威。这还不算,英美帝国主义者,在扶植中国军阀构成内乱以各遂私欲的政策上,虽与日本帝国主义有剧烈之冲突,而在压迫中国民族革命势力,特别是压迫中国无产阶级势力的政策上,却完完全全全归于一致,而采取联合战线。此次罢工,英美帝国主义一面在报纸上捏造许多谰言,摇[淆]惑社会观听;一面指使租界巡捕不断的捕拿工人领袖,调遣马队践踏工人群众,对被捕者非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这还不算,又胁迫无耻的中国官厅执行与租界同样的残酷行为以摧残穷而无告的苦同胞。经济的、政治的、外交的、武力的种种后援,无一不备)。工人在此种严重的高压之下,几乎无力抵抗,无法应付。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好一方面激励军心,坚持到底,以博最后胜利;一方面扩大民族宣传,运用机会,引起其他日本纱厂工人之同情,相率罢工,以增厚其战斗力;并扩大民族宣传,取得社会上同情为有力之声援。再一方面见到日本资本家最恐惧的是怕打坏厂中机器,于是工人又准对着这一个弱点猛攻。罢工的第二日,便乘其不备,率队打入第九厂、第十三厂、第十四厂,捣毁一些机器,以为暴力的示威。其后工人领袖暗中虽竭力制止群众不继续“打厂”政策,而在外仍然扩大并普遍“打厂”的宣传,而以“里应外合”、“从里面打出”做口号。日本资本家听闻之下,哪得不魄散魂飞,心惊胆落?最后虽明知工人方面日就疲敝,只须再忍痛一星期,工人便须失败,然而亦不得不容纳调解者之请,与工人开对等会议,作相当的让步。苟不如此,工人愤气尚是填满胸臆,进得厂来,难保不再生暴动,后患在在可虑,前途不堪设

想。这是日本资本家胸中雪亮的。

六、有自卫的特殊组织——罢工起后，因为工人的大本营在纱厂的河对面中国地界，为租界权力所不及的地方。这个地方荒僻得很，仅有小小茅屋数十家，起初并未为中国官厅所注意。租界内的巡捕、包打听和厂内的一切走狗，虽欲过河来摧残工会，捕拿领袖，亦不可能。于是想尽方法，则有收买大批流氓打手以求一逞之企图。再一方面，上海著名的以破坏工人事业取得资本家津贴的工贼和国民党中所谓“护党”党员，又欲从中挑拨破坏，大发其传单，大肆其狂吠，无非是想破坏罢工，好向帝国主义请赏。工人在此四面八方破坏压迫之中，不能不有自卫的特殊组织，除总指挥处已秘密组织“护卫团”外，又公开组织“义勇队”。所有领袖和加入做队员的，都要歃血为盟，宣誓。其誓词如下：“反对东洋人到底，不占面子不上工。保卫工会，铲除工贼。同生死，共患难，听总队长的话。如有假心，天雷打死。”有此组织后，一般破坏奸徒，相戒不敢过河。于是大本营得以相安无事。

此外自然还有许多：如领袖到紧急时勇于牺牲；运用种种方法使有意破坏罢工的分子软化；善于收拾罢工；对军警煽动以减少他们被驱使来压迫罢工的愚蠢行为；利用民族口号抵制中国官厅之压迫……等等，限于篇幅，暂行从略。

惟有一事不能不再略为述及的，就是开工之后，资本家如不履行条约，如条约承认恢复工人工作，他虽不明白揭示开除，他却谢绝工人入厂，藉此以探试工人的态度。工人在此时怎样呢？再罢工吗？“在一次罢工胜利后，不宜紧接着惹起新的冲突”。不

反抗吗？条约便从此宣告死亡。这次大罢工后，日本资本家对于罢工中出力分子便是谢绝入厂，而且甘言厚币，使人啼哭不得。工会在此时唯一的方略，便是怠工，大家都入厂，只是不工作；表面上虽然机器开着，实际上没有半点出货。资本家也无法，终于不能不履行条约。这也是这次大罢工开工后对付资本家毁约的一个有效的手段。

（《中国工人》第4期，1925年4月）

上海小沙渡日本纱厂之大罢工

双 林^①

日本资本在中国棉纱业里的势力，大家都知道是很大的。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移资中国，就近剥削中国的廉价劳动，实是最可怕的手段。一则中国工人生活程度低；二则中国破产失业的人多，劳动供过于求；三则中国工业在发达初期，工人都是初从乡下进城的失业农民，绝无职工运动的经验——组织工会、指挥罢工、积聚罢工基金等；四则中国残酷的军阀政治，绝对禁止民众的集会及一切政治自由，而且租界内更纯然是外国政府，对待中国“下等人”可以用对待牛马的法子。所以中国工人工资既低，工作时间又长，待遇又可以随心所欲，不怕反抗，——这都是日本资本家在他们本国求之不得的。因此，日本英国等的资本家，搜括了中国的原料，便在中国建筑起工厂来。这样一来，

^① 即瞿秋白同志。

外国资本家不但可以消纳他自己国内的过剩资本，缓和他自己国内的社会革命运动，而且可以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里，尽先占领中国市场，永世不让中国实业发展，尽量剥削“驯服”的中国劳动者，取得异于寻常的多量利润。

五四以来的抵制日货运动，实际上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展——实业发展的要求所表现出来的运动。从那时起，“提倡国货以杜漏卮”，差不多成了一种口号。其实外货的输入，还是次一等的问题。日本人在中国境内这样发展纺织业，将来一切实业都照这样下去，中国人虽欲排货而有不得的日子。中国人要抵制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不但排货运动没有用，便是宣言提倡国货也是没有用。大家不知道一两年来纺织业恐慌的时候，中国人自己办的纱厂有许多被日本人并了去吗？中国人要抵抗这种帝国主义的侵略，必定要劳动平民觉醒起来，必定要那“驯服的”劳动平民奋起斗争，争得我们中国人民所应有的权利，中国国家的解放和独立！然而要这一斗争能得到胜利，最先的必要条件，便是中国劳动者的自由，中国劳动者一般的生活改善——中国劳动者的政治的经济的权利。

现在中国劳动者已经不再驯服了！

二月九日小沙渡的日本纱厂里二万多的中国男女工人罢工了。中国工人反抗资本家的斗争，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运动，应当从此更深入更扩大起来了。

小沙渡的这些纱厂属于一个名叫“内外棉”的日本公司。这家公司资本很雄厚。它在日本、青岛、上海共有十五个厂，在上海小沙渡的共十一厂。平时这些厂里对于工人非常苛待，工人稍不

听话，非打即骂，惨无人道。工作时间是日夜轮班，每班十二小时——夜工并不加钱；工资也很少——最少的只二百余文一天；而且每月在工资里要扣除所谓“储蓄费”，工人死伤疾病的时候却并不发还，只有每月另发很少的“储蓄赏”；然而差不多个个工人每次领工资时都要被厂里借故克扣，结果所谓“储蓄赏”也是仍旧扣去。再则，其中童工、女工很多，所受欺压更甚。成年男工总要比较强硬些，因此，厂里更有一种极奸狡的阴谋——另外专养一批男女幼童，叫做“养成工”，平日便施以奴隶教育；等到长成之后，便想一批一批的将他们调换成年男工，把那些“不安分”的分子开除出去，——使全厂都是些女人、小孩子，可以随便虐待剥削而不受反抗。这次罢工便是因为有一厂开除一批男工，将“养成工”去替调，并且拘捕工人代表。这种待遇和工作条件之下，中国工人简直是日本资本家的牛马，——他们住的房子是三几家合一间小屋，吃的是喂猪的食料。此等痛苦，难道是宣言抵制日货的人所感觉得到的！如今这种工人已经团结，已经组成工会，二万多人的群众已经开始斗争。中国国民都应当积极起来援助。我们知道：工人的阶级觉悟，工人的阶级斗争的精神，必然比五分钟热度的排货运动彻底。我们知道：工人阶级的组织能力，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必定比其他人民格外巩固。然而日本资本家方面，有租界的外国政府，外国巡捕，外国包探，做他的助手。日本资本家有的是钱，会用收买贿赂等的卑劣手段破坏罢工。工人方面有甚么？什么也没有。除出自己的赤手空拳，只有全国劳动阶级和民族运动的援助。

中国的工人阶级，中国的民族运动者，大家努力起来援助小

沙渡的工人！大家应当起来一致力争：一、严定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工厂的限制；二、严定最少工资及最多工作时间的限度，夜工工资应格外增多；三、特别规定使用女工、童工的法律；四、改良工人待遇，供给工人住宅医药等；五、工人在〔死〕伤疾病等，由工厂担负保险费……；六、上海市现在正谋自治，应当即日废除租界，取消工部局等类的外国政府，一切工人都应有选举权、参政权。

只有如此，中国才能根本消灭外国人剥削中国劳动、占领中国市场的现象。只有如此，中国人才能跳出牛马奴隶的地位！

(《向导周报》第102期，1925年2月14日)

民族的劳资斗争

双 林

上海日本纱厂里的大罢工，从小沙渡之内棉株式会社十一厂里开始，蔓延到同兴、日华、丰田以及杨树浦的大康纱厂，罢工人数已达三万以上，延长到两个星期多，至今还没解决。这种大罢工运动是上海向来所没有的。罢工工人的要求，虽然因各厂情形不同，间或有互相各异的地方，然而大致不出于：一、反对日人虐待；二、照章发给工资，不得延期，不得无故克扣；三、增加工资；四、反对裁减工人。这种一致的要求，可以使我们知道日本人在中国经营棉纱纺织业的方法是怎样剥削中国工人的了。

中国纱业工人要算是全国各种工人中最感苦痛的。——因

为纱业既有相当发展,资本家便能在生产技术方面力谋节省,以便一面减少工人人数,一面增加生产数量。

我们应当知道中国境内四、五年来的纱业发展,完全是中国工人的汗血精髓换来的。社会的生活程度,四、五年来至少增高三、四倍,工人的工作增加三倍,而工资丝毫未加。不但如此,每个工人的工作既在增加,每厂所用工人的人数便可逐渐减少,——所以纱业尽在发展,资本家的利润尽在增多,而工人却不增加,不但不增加,还在拚命裁减。纺织工人之中,大半又是妇女,奋斗的能力当然弱于男工。宗法社会习惯的束缚和种种家务羁绊,以及智识程度的低下,都是女工战斗力薄弱的原因。因此,资本家方面,尤其是日本人,利用工人的这种弱点,更想完全调用女工而撤换男工。平时日本资本家对于一切工人十分虐待。工人稍有不是,非打即骂,扣罚工资,甚至于有些厂里,工人的大小便都要受资本里〔家〕限制:大小便必领取“厕牌”,工人共有三、四千,而厕牌(只)有两块。这种工作条件,岂不是比牛马还不如!

可是中国工人在这种牛马不如的条件之下工作,中国的纱业便在真正发展吗?大谬不然的!表面上看来,中国制造工业里,要算棉纱纺织业首屈一指,实际上呢,中国境内的棉纱业倒有二分之一以上在外国人之手。这次纱厂工人罢工的时候,有一中国警察对他们说:“日本人厂主不好,到中国人厂里去做活好了,罢什么工,开什么会呢!”这句话可以成为历史上的趣话。第一,中国人厂里未必见得比日本人厂里好得多。第二,不但日本厂的工人到中国厂里去容不了,而且中国厂倒闭下来,工人还得

到日本厂里去。原来中国境内,既然放任外人开工厂,而且外人享有政治上、外交上、税则上的特殊权利,有种种不平等条约做护符,所以中国纱业里本国的纱厂,无论如何竞争不过外国人的。已经有许多中国纱厂被外国纱厂挤倒了。中国境内日本人的纱厂事业,不但剥削中国工人,不但使中国农民破产,而且使中国自己的棉纱业也不能发达。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境内设立工厂,将来可以使中国资本家都完全破产,使中国人都变成牛马不如的劳动者,替外国资本家做工、写字、算帐、做包探、当警察……。总之,外国资本家剥削中国劳动,现在还只是最初一步。将来真要使全中国都进那帝国主义的经济罗网,全中国人都做外国资本家的牛马。

这种危险,不但是工人阶级要反抗,中国人都要反抗的。这次罢工,——中国劳动者反抗日本资本家,便是这一斗争的开始。不过,只有工人阶级直接的受着这种奴隶式的待遇,直接的受着这种惨酷的剥削,所以只有工人阶级反抗外国资本势力最彻底。中国人要知道:在现时这种状况之下,中国纱业以及其他各种实业都是不会发展的,要发展,便在外国人手里。中国不能独立,不能解放,一切中国人迟早总要变成外国资本家的奴隶。为中国争独立,为中国民族争解放,便是现在上海日本纱厂里中国工人罢工的意义。一切中国人都应当尽力赞助。中国工人反抗日本资本家,这是很明显的劳资斗争,然而也是很明显的民族斗争。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民权主义者,若不赞助工人阶级这种阶级斗争,永世也不能得到民族的解放和中国的独立。

(《向导周报》第103期,1925年2月21日)

帝国主义的佣仆与中国平民

双 林

上海日商纱厂九〔六〕公司二十二厂三万五千余人的大罢工，从二月九日至二月二十五日，延长了已经两个多星期了。这是势不均、力不敌的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亲日派政府成立之后，早已加紧它对中国侵略的攻势。它有自己国内的海、陆军，有上海会审公堂里的“领事裁判官”，有公共租界的巡捕房，有中国界内的警察厅，——直接压迫罢工的武器，已经是既强且多；然而除此以外，还有间接的工具——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佣仆。

中国三万多劳动平民，一天做十二小时的工作，得二、三角钱的工钱，吃寒饭，喝冷水，挨东洋老爷的打骂，今天假意说发什么赏钱，明天便扣罚工资，天天等着柴米烧饭吃，厂里却扣着钱，两、三个礼拜不发。受这种压迫剥削的劳动平民，素来做惯了恭顺的奴隶，如今忽然不恭顺起来，厂里正想开除这种“不安分”的分子，换用不识不知、任人欺侮的女孩子（养成工），谁知就此激起大同盟的罢工——从内外棉株式会社的十一厂起，蔓延到同兴、日华、丰田、大康、裕丰等厂。中国这些劳动平民，居然开始和外国资本主义直接斗争了。然而劳动平民有甚么势力呢？他们只有自己的阶级团结力。他们曾经参与过第一次伟大的反日的民族斗争——五四运动；他们曾经是那时上海六三运动中的强有力的军队。他们这次反抗日本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同时还

是继续着近年来继长增高的民族运动。所以他们于自己阶级的团结力之外，当然有要求一般中国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助力之权。何况这次罢工的本身，就是民族运动中新起的巨波，而且表示民族运动里，只有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

然而近年来中国买办阶级的发展，使中国的民族运动遇见很大的障碍。外国资本家的佣仆，甘心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惟恐外国财主失势之后，自己也没财可发，千方百计的帮着帝国主义，遏抑中国平民的一切运动。因此，这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纱厂工人大罢工，恐怕也要受这种外国走狗的破坏。中国工人在这种困苦的条件之下工作，难道他们都是理想派的大亚细亚主义者，能“克己自损”，饿着肚皮替日本人做工，绝不反抗，以保存所谓中日亲善，或梁启超之所谓中日文化提携吗？当然不能的。难道要有人煽动才会反抗吗？也是一定不必的。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佣(仆)，居然异口同声的说纱厂罢工是共产党的煽动所致。中国人受着几十年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一听见“排外”，“仇洋”，便自认为是中国“无知小民”的大罪恶，最近更加上了一过激派的徽号。帝国主义的走狗，利用这种心理，所以要〔放〕那些谣言，使反抗日本侵略的纱厂工人罢工成立罪大恶极的赤化罪，以为如此便可以防止这次罢工扩大到普遍的民族斗争。其实，甚么是赤化？赤化便是革命——中国的民族革命，便是争中国的解放独立，使外国资本家不能奴隶中国人。这在外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眼里看来，便算是罪大恶极，便算是赤化。

中国劳动平民的实力，只有这种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谁要

想借谣言作用，削弱民族运动，谁便是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佣仆。

这次上海日纱厂工人罢工，显然得到上海一般公团的赞助。各种工人团体、学生团体、市民团体组织罢工后援会，甚至于《新闻报》、《商报》等都表示同情。本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输出剩余资本于中国，创办工厂，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占领中国的国内市场，这种帝国主义的利益，不但和劳动平民的利益相矛盾，而且和中国工商业的发展相冲突。所以日本纱厂中的罢工很有扩大而成普遍民族斗争的可能。罢工工人虽然有三、四万，然而以日本帝国主义者政治经济的力量，单单要压迫这三、四万工人，始终是很容易的，只要拚着二、三百万(元)的牺牲，不愁组织未巩固以及女工占多数的罢工工人不屈服。他们所怕的，便是罢工运动扩大而成普遍全国的民族运动。尤其怕工人所争的经济改善、待遇改善的些小要求，扩大而成国际的政治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口号。罢工工人的自力虽然弱，他们所受的非人的待遇，却真可以激起全国第二次大排日运动。日本资本家占领中国市场、遏制中国纱业发展的趋势，又很足以使中国跟着罢工工人的发难，简直提出取消日人在华设立工厂的种种特权之要求。此外，北京政变之后，英美势力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间接打击，正在待时而动，想怎样减杀日本的气焰。所以在罢工之初，日本人却有些恐慌。

因此，日本资本家应付这次罢工的手段，第一步便是放谣言，说某会某会(上海总商会、中国纱厂联合会等资产阶级的团体)出资几万、几百万煽动罢工。同时，日本人的机关报竭力否

认这次罢工的性质是单纯的排日的，而一定要张大其辞说罢工是排外运动，社会主义的反对资本制度的运动。日本人这种手段，不但要使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中立，而且要暗示英美帝国主义：中国工人排日的结果，便是排斥一切外国侵略及资本制度。因此，英美的帝国主义者亦恐慌起来，大宣传其罢工工人赤化，并受苏联的金钱煽动等的谰言。日本资本家想造成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以对付罢工的计划，居然实现。日人利用赤化的谣诼，便想掩盖自己虐待中国工人的罪恶，要使中国的“舆论”亦以为工人既受赤化，即使永久处于牛马、奴隶的地位，再受帝国主义的拘禁、拷打、屠杀、宰割，也不足惜。于是日本海军陆战队上岸的消息也来了；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对马号”也开回上海，“以备万一”了；小沙渡中国界的警察也奉令武装解散工人的示威游行了；杨树浦方面，更由租界捕房越界逮捕工会职员，中国警察与租界巡捕围攻手无寸铁的民众，鸣枪轰散工人的集会了；租界捕房对于被捕的人，私刑拷打，惨无人道，都可以无所顾忌了。中国境内的日商纱厂虐待中国工人，以致激起罢工，还要用武装军警、非法法庭，施以残暴的压迫，而中国社会至今还没有丝毫抗议。难道中国人已经都甘心做亡国奴？难道帝国主义的枪炮捕探，真可以压制中国四万万人，使空言的舆论援助却不敢表现吗？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止枪炮捕探，他们还有制造舆论、箝制舆论的佣仆。刚正在警察巡捕高压的时候，上海《时事新报》的社论里，有一位达仁老爷说，日商纱厂敲打工人亦许是事实，然而工人决不值得因此面〔而〕罢工，实在是小题大做，这完全是受共产党的过激宣传和煽惑。上海市里及工人区域也发见所谓

国民党护党委员会和反共产主义同盟的传单，同是这种造谣的口吻。帝国主义者的赤化谣言，正要完全压制罢工，使社会上不敢帮工人说话——帮工人说话的，便是罪大恶极的过激派。而《时事新报》的达仁君及所谓国民党护党委员会、反共产主义同盟，拚命帮帝国主义制造传布这种恐吓社会的谣言，岂不是助桀为虐、逢迎帝国主义的奴仆？

向来中国平民和帝国主义的斗争里，总有这种奸细替帝国主义尽力，卖国卖民，而在这次罢工里，我们看得尤其明白。我们应当说：中国平民不但当认清自己最大的仇敌是帝国主义，并且要知道：这些反对赤化，造谣生事，蒙蔽社会，使不敢奋起帮助纱厂罢工工人，不敢明显地要求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之一切特权的“中国人”，都是我们平民的仇敌，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向导周报》第104期，1925年2月28日）

看了《燎原》以后^①（节录）

李立三

（上略）

《燎原》电影大概是以安源路矿工人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二年间，怎样逐渐觉醒起来，组织起来，怎样取得大罢工的胜利为背景的。一九二一年秋，我们党建立不久，毛泽东同志很快就到安源做了一段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同志当时是我们党的湘

^① 本文对一九二四年党在上海的工人工作，如何运用安源的斗争经验，作了重要说明。

区书记,安源是当时湘区所属范围内最大的工业企业,工人群众最集中的地方,所以特别引起毛泽东同志的重视。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间,毛泽东同志派我们到安源去做工人运动的时候,他对于如何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如何把工人逐渐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已经是胸有成竹。现在还模糊记得他当时告诉我们的话:安源工人众多,受到种种残酷剥削,生活特别痛苦,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的地方。但是应当看到,反动统治势力的强大和社会环境的黑暗,要开展革命工作并不是很容易的。首先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争取公开活动,以便和工人群众接近,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广大群众的核心。因此,他要我们以办平民教育的名义,由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介绍到安源去(关于这件事情,李六如同志在他写的《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中,有比较详细的回忆)。我们开始办的是平民小学,学生多半是八九岁的工人子弟;我们以访问学生家长的名义开始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开设工人补习夜校,已经是过了两、三个月以后的事。平民学校的建立,首先是两个原已和毛泽东同志认识、并有通讯联系的铁路工人帮助筹办一切。为了使平民学校取得合法存在和公开活动的条件,设法通过社会关系,找到了当时在安源商会做事的一个比较开明的绅士给以支持;同时打听到当时萍乡县知事是一个喜爱古文、反对白话文的举人出身的人,因此就用“四六体”写了一篇呈文去请求立案,果然得到了他的“青睐”,很快批准立案,并把这篇“四六体”呈文加上头尾,作为布告张贴在平民学校的门口了。这样,我们就在合法的掩护下开始进行革命的工人运动。后来

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时(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把章程中的宗旨一条写成“联络感情,涵养德性”,也就是为了取得合法,更便于进行革命活动。

俱乐部成立后发展很快,不到三个月就有一千多工人加入。特别重要的是,党的支部也发展很快。大约在一九二二年二月间才建立起六个人的支部,到七月间已发展到三十多人,形成了工人俱乐部的坚强领导核心。这时毛泽东同志又到了安源,了解了各种情况以后,认为组织罢工的条件已在逐渐成熟,告诉我们要从各方面加紧准备。

毛泽东同志非常注意罢工战术问题。他在九月初写了一封信给我们,其中主要意思是: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要靠工人群众有坚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斗志,同时必须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罢工口号。我们正是根据这个指示,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这个口号既激动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战斗决心,又博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对于罢工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电影中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是合乎当时实际情况的。据说有些看了《燎原》的青年,不了解过去工人遭受残酷压迫剥削的惨痛,认为“过去工人生活没有那样苦,影片中表现的工人悲惨生活,是影片作者‘臆造’,或者导演的‘夸大手法’”。其实影片所反映的工人生活,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而且可以说只有描写不够,而决没有夸大的地方。当时工人在各种残酷压迫剥削之下,真是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因此“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这个口号才激起工人群众这样坚决的战斗热情。这也就是“哀兵必

胜”思想的客观基础。

当时毛泽东同志特别关心的事情是加强领导，这样一次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大罢工——在当时湘区还是第一次——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是不行的，因此，不久后就派刘少奇同志到安源来了。刘少奇同志的到来，不仅使安源的同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增强了信心，形成了强有力的领导，而且他亲上前线，直接领导罢工运动各方面的工作。电影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个场面：雷焕觉到矿务局去进行谈判，在反动武装刀枪林立之中，表现出威武不能屈的大无畏的英勇精神，工人阶级的坚强意志，就是反映刘少奇同志当时进行的一场与反动派斗理斗智的坚强斗争。

从上述几点事实，就可以看出安源罢工的燎原大火正是安源党组织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指导下点起来和燃烧起来的。《燎原》影片对于这一点做了一定的反映，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比起当时的实际来，似乎还有不足之处。如果把这一点更明确地反映起来，便会使观众更好地理解，影片中一些个人的活动所取得的成果，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

安源工人运动的一些主要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后来一九二四年，我们到上海做工人运动的时候，也就是运用了这些经验。一开始在上海六个区办了平民学校或工人补习夜校；接着培养了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建立党的支部，组织工人俱乐部。到一九二五年二月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的时候，又根据“哀兵必胜”的思想，提出了“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正是这个口号鼓舞了工人斗志，激起社会的同情，并通过商会的调解，逼迫日本资本家部分地接受了工人的要求，取得上海工人罢工的第一次胜利。

因此可以说，一九二五年上海工人运动的大发展，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起了指导作用的。五卅运动爆发以后不久，又是刘少奇同志到了上海总工会担负起领导上海工人总罢工的工作。

这就是我看了《燎原》电影以后的几点感想和回忆。我想，把这些感想和回忆写出来，对于领会毛泽东同志后来更加系统地发展了的阶级斗争思想，阶级斗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即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统一战线思想，团结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孤立打击敌人的思想，等等，也许会有一些帮助。究竟对不对，还请读者考虑和指正。

(《人民日报》1963年8月4日)

贰、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和青岛惨案

一、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第一次大罢工

青岛日本纱厂工潮之扩大

——青岛通信，四月廿九日

硕甫

外人在华之经济侵掠方法，除用商业资本与银行资本外，更移植资本在中国境内设立工场，利用中国工资之低贱及中国工人组织能力之薄弱以榨取最大限度之利息。此种侵掠政策，要以日本为最甚。单就青岛一地而言，日本资本家所设立之纱厂有七，所雇用之工人共约五万余。其他工厂如火柴，面粉，榨油，丝厂……等及其所收用之工人尚无确数，大约亦不下四、五万人。日本资本家向不以平等眼光视中国人，因之对于中国之劳苦群众，更无法无天。加以举世所未闻之惨暴压迫。此种压迫之惨状，已由月前上海日本纱厂工人暴露其大概。青岛日本纱厂企业家，大都与上海相同，其苛待工人之惨苦情形，亦完全无二样。

此次罢工风潮，发难于大康纱厂，缘由工人组织工会，横被日人搜索宿舍，拘捕代表。

大康工人罢工后，日本资本家即日夜调动中国警察保安队，欲向工人示威。延至廿三^①下午，始由警察厅长提出调停条件，对于工人要求各条虽有少许承认，但均系不关重要。工人等因深知自己组织能力尚薄弱及所受之种种环境，当即将自己所提出之条件，加以最大之让步，仅就警厅之条件略加修改，更备函送至警厅，表示接受警厅调停之诚意。此公函送去后，延至二十四尚未得答复。乃日本人更变本加厉，复于宿舍断绝工人饮食。工人等愤激异常，除一面派代表见厂长交涉发放已届期之工资及资〔赏〕金外，一面又派代表通知警厅，说明日本人之恶劣手段，轻视警厅调停及欺负工人等情，并申明倘日本人不悟，工人收回昨日之修改条件，其责任不在工人。

在大康附近之内棉及隆兴两厂（同在四方）工人，因久受同样之压迫，闻到大康工人罢工后，即已跃跃欲试，特别是吃不饱，穿不暖，挟〔挨〕打挟〔挨〕骂最利害之童工，竟轰轰嘶叫，不安于工作。最初本希望俟大康工人得胜后，彼等可乘便获得同样要求，故另推出三四十代表，议定发一宣言，表示愿作大康之后援。不料大康工人所要求之条件，久未得日人之答复；该厂厂主因见工人不安，更调遣陆军围工厂示威。压迫愈甚，反抗愈烈，急待扩大之罢工风潮，遂一溃而不易收拾矣。内外棉于廿三日下午实行罢工，隆兴亦于廿四日中午停工，铃木丝厂亦于廿五早一致罢工，并闻沧口日本纱厂工人亦将追随四方各厂之后，闻风而起。现全体罢工人数已达一万八千余人。日本资本家采旷日持

① 即四月二十三日。

久、屈伏工人之策,结果如何,尚不得知。

至于工人组织状况,则殊进步。自大康罢工之后,各工厂均相继成立工会,又特别组织罢工委员会。委员会之下,有纠察队、调查队、宣传队,有团有组,队有队长,组有组长,团有团长,以指挥一切。全体工友都极服从命令,秩序极其严整。隆兴自罢工后,日本厂主即雇用二百多保安队压迫工人,不准工人自由出入宿舍和开会等。现在警察厅看工人组织非常之好,已将保安队陆续撤退,宿舍由工会纠察队负责看守,出入宿舍及开会等已能自由。

至各处援助情形,亦颇不弱。上海各日本纱厂工会早已派代表前来。全国铁路总工会亦早发布宣言,号召各路工友实力帮助,胶济路总工会尤为出力。青岛学生界亦热烈援助,再接再厉,他们组织的后援会,甚为各界所注意。商界对于此次罢工亦很同情。尚望全国各界急起援助,勿令日人制胜而窃笑也。

(《向导周报》第 114 期,1925 年 5 月 10 日)

青岛纱厂工人罢工之始末

吴雨铭

罢工的远因 日本资本帝国主义之经营山东,已非一日,自占领青岛后,这块版图,完全变成了它的殖民地。直至于今,青岛名称上虽已收回,实际政治上和经济上,他都有支配和操纵的权力。他在青岛所创办之纱厂,共六个:在四方的,有大康、内外

棉、隆兴三厂，有工人一万三千余人；在沧口的（距四方二十五里）有钟渊、宝来、富士三厂，约有工人一万二千余人，其中以钟渊纱厂之规模最大，有工人八千余人。日资本家平日对于工人之苛扣虐待，无所不至其极。钟渊纱厂以反抗压迫，曾于去年举行一次罢工，可惜无人主持，结果归于失败。日本资本家惟恐再发现罢工事实，更联合起来压迫工人，直欲把工人抑制成为极驯顺的奴隶牛马。哪知压力愈大，反抗力亦愈大，此次罢工之机，遂伏于此。

罢工的近因 大康纱厂的厂主，在济南招募了一班练习生到厂内工作。这班见习生，大半都有高小毕业和中学一二年级的程度，那种狭义的爱国思想，仇视日人的心思极盛，也有少数略具阶级革命观念的。他们内愤日资本家苛待压迫的痛苦，外受胶济铁路工人组织工会同盟罢工的影响，乃暗中联络工人，组织工会，以谋抵抗。事被日资本家察觉，极图消灭工人的组织，搜没工会的名册，开除有觉悟的工人，并逮捕创办工会者数人。群情愤不可遏，罢工的事变遂于四月十九日爆发了。

罢工期内工人的组织和奋斗 大康纱厂罢工的工人数量，有五千余人，其中十分之一为女工，十分之六为童工，十分之三为成年工人和熟练工人。工会中的最高机关为执行委员会，内分秘书、交际、会计、庶务、组织、宣传、交通各股。在罢工期内，执行委员会所决定的对敌人攻取退守的策略，会员应绝对服从并遵守之。执行委员会之下，每间^①十人为一组，设组长一人。

^① 即每一车间。

人数过三组以上者,设支部干事会,依人数之多寡至少三人至多五人组织之。支部干事会中设支部书记一人,主持一切事务。人数不逾三组者,仅设支部书记一人。

纠察队 每十人为一组,设组长一人;每五十人为一团,设团长一人;每四团为一队,设队长一人。军队式的组织,负维持秩序、站岗、逮捕工贼……等职务。讲演团,无定额,向工人讲演,以坚决工人罢工的心思;向市民讲演,以唤起市民同仇敌忾的心思。

捐款分配委员会 接收外界募捐的款项,并按察情形的需要,分配款项的多少。委员会系五人组织之,三个是纱厂工人,两个是铁路工人,内分会计、司帐、文书、交际四股。

军警招待委员会 由六人组织之,专任招待军队,连络下层军人正副目,使他们表同情于工人,而减少其压迫力。

扩大罢工 大康纱厂工人罢工后,内外棉、隆兴二厂工友,起初只作一种声势的援助,以胁迫资本家屈服。无如资本家方面,已联合一致,向工人方面进攻,用了许多收买、利诱、威吓、离间、压迫……种种手段。工人方面,总是坚持到底,毫不为其所惑。同时工人一致联合战线,与资本家对抗。故内外棉、隆兴三〔二〕厂工人,均于廿三、四两日相继罢工,一致与资本帝国主义者奋斗。罢工的战士,骤形增加,有了一万三千余人。

外界的援助 反帝国主义者的呼声,在罢工的工友中,已一天高似一天了;尤其是反日本帝国主义者,更能引起社会上一般人的同情。不要说各地工人当然与以极大的实力及经济上的援助,即其他的团体,如学生会、报界、商会、市民,亦多与以言论

上和经济上的帮助，故能始终与资本家抵抗，毫无惧怕。

罢工的结果 工人与资本家方面支持了二十二天，工人的团结力，一天比一天坚固，丝毫不发生若何恐慌。外强中干的日本厂主，不由得不软化，遂被工人克服了，而得到最后的胜利。

纪念罢工胜利的盛况 九号^①条约签字后，日厂主即宣布十号早(晨)上工的布告，并散放传单。工人以既被征服之厂主，还要大施其厂主威信，可谓无理已极，乃由纠察队将厂主的布告撕碎，并缉捕乘汽车发传单之日人四名，旋由军警当局取保释放，由工会宣布十号晚上工。十号下午三点开纪念罢工胜利大会。到会的人数约万人左右。每人手中都执小旗一面，上书“罢工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资本主义”、“拥护工会”……种种旗帜。另有极大的红色旗帜两面，上写“罢工大得胜利”字样。开会时演说的人很多，每一人演说后，即大呼“工会万岁！”“工人团结万岁！”“工人胜利万岁！”“工人自由万岁！”……等口号。欢呼之声，摇撼宇宙。散会后，结队游行，并举行工会悬牌额典礼。工人簇拥三工会的牌子为前队，次为军乐队，次为中乐队，次为会员，队伍衔接〔接〕，长逾数里，两旁均由纠察队维持秩序。工人高唱胜利纪念歌，一时爆声震天，欢声雷动，三个纱厂工会的牌子，高悬于他们的会所门口了。

(《向导周报》第116期，1925年5月24日)

① 即五月九日。

日本厂主被迫让步,工人胜利复工

胶东通信社云：迁延三星期之日本纱厂罢工潮，经官商方面一再调停，遂于星期日（十日）告一段落矣。兹将其经过情形探记于下：

自罢工潮发生以后，首倡者为大康，继者为内外、隆兴。先则官府百般调解，因双方各不让步，又因厂主方面不肯容纳条件，以致调停不生效果。截至七日，由戒严司令部派副官长徐养之，又邀商会会长隋石卿及会董宫淑芳出而调停，双方始渐退让。工人要求之条件共十四条：一、承认工会为正式代表工人的机关（此为国权所有，自〔只〕要官厅立案批准，厂主当然承认之）；二、日工加薪，每日每人加大洋一角；三、包工加薪，每人加增百分之二十五（该两条合而为一，凡工友继续出勤十五日以上者，即给以白面一袋，厂主只允给〔扣〕洋三元^①，若面价增高而所扣之洋如故，若跌落二成则少扣二成，余类推。现工会已有承认之意）；四、夜工饭钱，自本日起一律加倍（该条无论昼夜一律加洋一分，工厂已承认）；五、取消押薪制度（该条完全承认）；六、工人因公致伤，工资照发（医药在外）（完全承认）；七、一律免收房费（凡在宿舍住房纳原价四分之一房费，承认）；八、吃饭时间延长一小时（延长二十分，承认之）；九、此后日人不得打骂华人（此条以人格有关，完全承认之）；十、如工人违犯厂规，得由工会同意方可处分之（尚在争持中）；十一、公司所罚工人之款，应提

^① 面粉一袋扣洋三元，较市价略低。

交工会作补习教育之用(目前罚款每月超过两千余元,而赏金仅及四分之一之数,今赏罚平均,承认之);十二、此后不得借故开除工会代表(否认)(改为自动辞职);十三、不得扣除罢工期间的工资(该条以双方皆损失,允给以二分之一);十四、公司承认此项条件后,须双方订立合同,并签字盖章,并有证人作保。该条公司不承认,恐失去厂主地位,及经再三婉商,先由厂主盖章后,交于日本领事馆,再转交警察厅给与工会,并由双方国际公会中为担保(原文如此),亦承认之。以上诸条件,经调停人再三婉商,该厂主亦不再过于争持,于是至十日晚六时完全恢复工作。是日该工会宿舍开全体大会,三厂工人均齐集,工人代表苏美一等相继演说,报告经过情形。惟厂主以代表为工人首领,此次工潮虽告结束,而代表等则不欲留用,故代表当场宣言,牺牲个人不足为惜,惟望工会能持久存在,谋工界同仁幸福,是所愿耳。时至午后三点,警察厅长、徐副官长、商会隋会长同时到会,各致训勉之词。各代表自动辞职,计大康二十五人,隆兴、内外二十六人,共五十一人。代表要求厂主补助九个月薪水,厂主仅与三月,外予路费五十元,经商会说项,仍予九个月,于是一场剧烈工潮,遂告终矣。

(《民国日报》1925年5月16日)

二、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第二次 罢工和青岛惨案

青岛日本帝国主义残杀中国工人之惨剧

——青岛通讯,五月三十日

实 敷

日本帝国主义者既挟有张胡帅及安福政府做其工具,已直接取得中国人民的统治权,大可为所欲为,无往不利。中国人民在这种情形之下,只有粉身碎骨,首当其冲者自然为受压迫最厉害之工人及有血性之青年学生!

青岛四方日本三纱厂工人因历来受日人压迫过甚,曾于上月十九日举行一次罢工,支持二十余日之久,工人方面只得到些微小利就恢复工作;通盘筹算,所得实不偿所失。然而日资本家心犹以为未足,以为奴隶似的工人居然敢起来反抗,这还了得;故于工人恢复工作后,故意三反四复地不履行条件,向工人挑衅,借此造作口实向中国官(厅)报告,说工人不安于工作,必须解散工人的工会。中国官厅对着这个太上政府,自然只有唯命是从,故得令后即召集工人代表就□(说)工会应该取消,因为日本人望着工会骇怕;并拿出委任状及金声〔钱〕收买工人代表。可怜工人经过二十余日忍饥耐饿的争斗,所得者钱〔仅〕是工会;差不多工会就是他们的生命,故工人代表屡次都严词拒绝之。如

此延迟至本月二十五日，日本人又指挥了执政府或〔和〕张宗昌，非解散工会不可。故当地官厅即派大批武装警察保安队至四方欲实行以武力封闭工会，卒经工人群众坚决的表示反抗未果。日本资本家见此情形，更逐步加紧，乃仿照上海日纱厂的办法，停止机器，驱逐工人以迫胁之。工人见事不佳，日夜班仍轮流进厂静候作工。如此相持三日，表面上看都很安静的。至二十八日夜深入静时，中国官厅突调大批海军陆战队，协同原有武装警察保安队和陆军，秘密驰赴工厂附近住宿，至夜半后三时许以武力将厂里工人驱逐出厂。中国兵与日本人一齐开枪，工人当场受枪毙命者八人，受重伤者十余人，被捕者七十余人。

中国刽子手逢迎日人意旨，施行这次大残杀后，又恐人民起来反抗或宣布他们的罪恶，故马上施行特别戒严，一面到处乱行搜捕，一面又监视邮电及检查报馆——所有报馆稿件均须经警厅盖印才准出版。因此，工人中死者、伤者，无一人敢伸头探视，一任那般如狼似虎地搬运。被捕者之中有六人已解往济南见张宗昌，大约亦无活命希望。其余被驱逐出厂的男女老少，鬼哭神号，死亡无日，因为以现在日资本家气焰观之，尚难望其即日开厂，让工人进去作工。

全中国的国民！于今真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呵！我们将坐令帝国主义着着进攻，一个个同归于尽呢，还是应急起直追，一致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决一死战呢？

临了，还有几件事实应该胪列报告于下，足堪国民注意：

一、这次大惨杀的产生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事前准备妥当，中国官厅即如法炮制。日本帝国主义者如此行为，不独破坏

工人上次罢工所得之条件，而且是与上海和青岛各厂主联合一致向中国工人进攻，以图根本歼灭中国工人的反抗；故五月二十八日青岛《公民报》载日本政府给驻华领事的训令，内中第一条即不准在上海和青岛各侨商有部分的行动。

二、这次惨剧的发端，在工人方面实毫无破绽可寻，完全是日资本家于上次工潮结束后即强令中国官厅解散工会并停止开工。工人靠每日作工维持生活，资本家不得任意停工，断绝工人生活，因此工人照常上工划到，乃属当然之事，不料结果竟大遭毒手。

三、自上次工潮结束后，工人成立工会时，警察厅长陈韬曾亲自与会。并有其属员登台演说，高呼：“工会万岁！”则是工人成立工会，警察厅长事前就已与闻，并未加以阻止。工会成立后，工会代表即备文至警厅立案，虽至今未邀批准，但亦未见批驳。工人成立工会既已呈报，当不能谓为私立。中国官厅如欲解散工会，当有法定的手续，乃以“日人对工会骇怕”为解散之理由，工人严词拒绝，实属名正言顺。结果工人无端受残杀，可见中国官厅完全成了外国人的走狗，自己毫无主见，惟仰日人之鼻息以行动。

四、青岛当地陆军（属第五师）保安队及警察欲解散工会，延迟至三、四日均不肯下毒手（实无从下毒手！）。结果以张宗昌的命令，不管理由，强迫温树德调海军陆战队协同陆军保安队及武装警察实行解决之。于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者近来在中国敢如此横暴，实为有他凶猛的爪牙奉系军队及安福政府做其先锋！

（《向导周报》第117期，1925年6月6日）

青岛屠杀之经过

——青岛通讯

一、屠杀以前之情形

本来在国际情势上，现在正是各帝国主义者积极进攻殖民地的时期。中国是半殖民地，是国际帝国主义者互相争夺的市场。他们在中国势力范围的不断冲突，遂造成中国军阀不断的内乱。自去年北京政变之后，卖国亲日的安福政府重登舞台，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手豢养的张作霖势力的不断伸张，渐渐占津浦全路而有之。这当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得意洋洋，可随便摧残中国人民的大好机会。惟当青岛纱厂罢工风潮发生时，山东尚不在奉系直接统治之下，郑士琦当地地位动摇之际，自然不愿为虎作伥，结怨平民。在另一方面，工人已得本阶级的帮助和社会的同情，逼迫日本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有暂时的让步，不得不与工人代表居对等地位，而签定条约。但在这次罢工结果，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得引为满意的一点，就是用金钱魔力开除了五十个代表。他以为这样则五十个工人代表可以安心回家，不再预闻工会事，幼稚的纱厂工人，既失掉了五十个能干首领，当然一事做不成，工会也支持不起，条约也可以不履行了，结果不是一场空么？孰料五十个代表虽开除，九个月的薪资虽发给，而他们仍停留四方不走，且一样的为工会办事。在五十个被开除代表之外，还有无数新代表出现，工会居然是一样的存在，公开的存在，并且组织得井井有条，为期虽不过两周，而工会根基却一天一天的向巩

固方向走。这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事。于是得意的资本家又恐怖起来了,又不得不设法来图破坏。他们的破坏手段,最初是收买工贼做侦探,做奸细,侦察工会内部的种种秘密。同时在工会之外,组织一种团体(如大康的自治会,加入做会员的每人加月薪二元……等)以分裂工会。结果为工人团结的力量镇压下去了。自这种卑劣手段失败之后,无耻的日本资本家又联想到五十个被开除的代表居留问题了。他们以为一切祸害都是这五十个人造成的,于是一再请驻青日领事,直接训令中国官厅强迫押解回籍。中国官厅一接到太上长官的命令,当然是唯唯照办,不敢说一个“不”字!但是无论如何,这五十个人一点不法的事也没有,总没有理由要他们离开青岛的。于是警察厅还妙想天开,利用五十个人要求资本家补发历年旧积奖金的机会,要求他们:一、承认离开青岛,准用汽车送他们上车;二、允许摘去工会牌子,并用种种方法威吓和利诱他们。因为当时工会本身已经有群众的基础,五十代表不敢决定,拿到工会来公开讨论,结果被否决(五十代表中的觉悟分子,亦持反对态度),并且议定这是破坏工会的最危险手段,谁去领钱,谁就是破坏工会。于是,五十代表遂弃钱不要,这真是官厅方面禀承洋大人的意志,谋破坏工会的第一次失败。自此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遂愈恐慌起来了!于是一方用外交手段,令日本驻京公使,通牒中国政府勒令严重取缔;一方运用多量金钱,贿买中国官厅使用武力压迫。于是始有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警察厅长陈涛〔韬〕亲率军警解散工会之举。当要解散工会的前一日,警察厅忽然传叫隆兴工会代表孙某到厅,明白通知他明日午后三点要带兵去摘工会牌子,

到各厂去演说……等。工会得报告之后，立即召集临时会议，议决对付办法：一、工会文件一律收藏，停止办公一日；二、派出纠察队传递消息；三、如果工会牌子被摘，一得工会命令三厂同时停车，不出厂、不工作，直至牌子归还时为止。故军警一到，即照预定计划去应付。军警到时，首先围困大康工厂，摘去大康工会牌子。工会得报立时下令，三厂一律停车。于是不到一小时而三厂先后停车，工人一律伏车间不动，由纠察队维持秩序，由小组长、支部长、书记等与官厅交涉。当陈涛〔韬〕向工人演说时，工人同口一辞的回道：“你得了日本人五万块钱，就来压迫我们”，“不要为日人当走狗吧”，“工会是我们的第二生命，摘我们的工会牌子就是要我们的命”，“不要多说话了，还我们的工会牌子，我们就开工”，“打倒日本人”。无论到哪厂，无论说什么话，工人一概不听，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要求：“归还工会牌子”。一直闹到九点钟，警察厅长受群众包围，无可如何，请命督办公署，又将牌子归还工人了。于是三厂工会同时下令开工，夜班照常开工，日班凯歌出厂。在表面上算是一场热烈争斗暂告结果〔束〕。谁知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仍然不肯罢休，工人是开工了，工厂不开电门，声言中国官厅既管不了，我们工厂也不开了。就中最可注意者是这样驱使如意任劳任怨的陈厅长，自三点至九点往来于三厂之间，舌敝唇焦的为日本资本家作说客，末了只报酬以几片干鱼、四个馒头，临行时连目也不送一个！此外所不可忽略的一件事是：这次所调军警每队保安队后，都有两黄衣日兵压队指挥；所有各厂日本人都全副武装起来，身佩手枪，坐在汽车中，往来游行，向工人示威。当内外棉纱厂日工出厂时，迎头撞着一辆

日本人的汽车,连向工人发放两枪,幸未伤人,及至工人围捕时,车已行至厂中矣。又闻当军警开拔之先,日人曾说:“只要你们喊开枪,不要你们动手,我们自己动手就是。”幸赖稍有觉悟的保安队和陆军,不肯发出自戕同胞的口令,故不曾演出流血惨剧。孰料日人的屠杀毒计,不曾见之于当日,而终见之于五〔三〕日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此时已老羞成怒,深恶痛绝此御用工具之无能,遂决计采用最后对付手段。于是一方面电调兵舰来青示威,一面致电驻京日本公使对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谓“中国政府应当负责取缔此暴动化之青岛纱厂工潮,以保全日人之生命财产”云云。

自二十五日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即大加惩戒其御用工具,一面用积极手段,压迫中国官厅,使作最后的屠杀;一面用和缓手段以对待工人,防止毁坏其机器。故至二十七日上午又有第二次的大队军警到四方,由督办公署外交科长牟幼南到各厂内外去演说,劝告工人摘去工会牌子,一样(没)有结果而散。当日陆军中还有一老年队长,痛快淋漓的演说,闻者人人鼓掌。当晚警厅提出什么要把头代表签字,负不毁坏机器责任等条件磋商。二十八日警厅某日本顾问招集一工会代表谈话,问工人究竟毁不毁工厂机器。无一不是迷惑工人疲乏的耳目,使估计不透,缓和工人们的愤气使不毁坏机器,平平静静的让他设下网罗大肆惨杀!此时工人因为战斗经验的缺乏,和长期斗争的疲乏,只知资本家必有最后对待的手段,尚不料其手段之如是恶辣和来势之如是紧迫也。当屠杀之前夜,三工会曾有翌晨举行游行示威之非正式的磋商,孰料此日此时即是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期呵!

故当惨杀之前，各纱厂的机器仍一件未损。

二、屠杀以后之情形

五月二十八日忽然开到两只日本兵舰，要登岸屠杀工人。胶澳〔济〕督办温树德无法处置，遂很恭敬一口承认愿担负屠杀责任。于是当晚遂决定屠杀计划，致电张宗昌作最后的取决。当晚二点得复电，嘱“用武力解决”。于是大队人马，即时向四方出发。当时担任驱逐大康工人出厂的是陆军，担任驱逐隆兴工人出厂的是保安队，担任驱逐内外工人出厂的是海军陆战队。计陆军两营，陆战队两营，保安队两大队，大约共在三千人左右，全副武装。到四方后约三时左右，一面摘去工会牌子，一面驱逐工人出厂，包围三工厂，堵塞三宿舍，同时所有四方各要道口一一派重兵把守，不准行人往来。小小一个四方，围得水泄不通，预备屠杀赤手空拳的同胞，为日本人做刽子手。

闻当军警开枪之先各有训令：就中保安队和陆军（第五师）则只说威吓工人出厂，而海军陆战队则温树德亲口传授“打死人不要紧”的号令。故当三厂军警下令驱逐工人出厂时，大康、隆兴之陆军、保安队所放排枪，尚仰空射击，不肯伤人，惟隆兴保安队用刺刀刺伤一人。至于内外则更悲惨了。当工人排队出厂时，顿闻枪声，止足不敢前进，兵士叱令出厂，并用枪托猛击工人。内有纠察员一人，略为辩白，营官即下令开枪，先中下部未死，某犹忍痛说道：“我们有甚冤仇，定要杀咱们！我不怕死，要打就对胸口打罢！”话犹未已，营官即下令：“打死这个东西！”于是一枪就将他打死。此时门内的人，遂一拥而出，兵士又接连着放了两排

枪。残暴的日本人,竟站在楼上拿着手枪朝人群中连放,中弹的工人遂一个个的倒在地下,鲜血喷流,染遍了内外棉门前的青草;未中弹的工人遂四散狂奔,各自逃命了。杀人的海军陆战队还自鸣得意的向工人说道:“你们还要钱吗?”最悲惨的是未出厂的童工妇女,一闻枪声,相率藏入棉花包中,爬在地沟里面,或是潜伏车间。杀人的刽子手固尚在不知不觉中,故所有工人出厂,此辈犹在厂中,后被日人搜出枪杀、水淹和活抛入海中者,不知其数。至六月二日尚在厂中搜出六七十个奄奄垂死的工人;地沟之中,尚发现一大堆男女尸体;车间发现一个自尽者。此等消息,官厅尚秘不宣布,极力否认,惨矣哉!计这次惨杀于中国兵士、日人所雇刽子手之手者,当场死一人,抬往医院半途而死者一人,死在医院中者四人,惨死于日本人之手而不明真像者,尚不知其数。又内外宿舍中,小孩爬墙头被日本人用手枪打死一人,重伤命在垂危、僵卧病院者七人,轻伤者十余人。这些死伤工人,日人、官厅两俱不管。死伤家庭闻报前来沿途号哭,见人乞援,为死者伸冤,生者求援,官厅竟置之不理,人死勒令其家属当场领尸,否则席卷埋葬。中国人杀死外国人,赔偿不足,还要抵命,外国人杀死中国人竟理都不理呀!这是何等惨事!当日除屠杀外,已封闭四工会^①,捕去代表至七八十人,至今仍囚禁狱中,内有六人解到济南,生命垂危。还有许多住在宿舍里面的工人,日夜用重兵看守,不准自由出入,每日无小无大,每人只给馒头两个,妇女小孩子尚不在其内。所有强壮男丁则囚禁一室,不准移动。小孩子们有时饿到无可忍耐时,至爬墙头出外觅食,

^① 指大康、内外棉、隆兴工会及坚决支持纱厂工人斗争的胶济铁路总工会。

日本人竟在后边用手枪打。许多人由墙头上爬〔抛〕出衣物，托人典当购食度生。这样延长下去，不特死者死矣，生者亦快成饿鬼了！其未住在宿舍的工人则押解回籍，计先后已逐出七八百人，现在尚未停止。

类此惨状，书不胜书，而四方青岛邮政电报都严加监视，以致这样重大惨剧消息传递不出，海深冤苦，无处告诉。稍表同情于工人的《公民报》，竟横遭搜查，通缉主笔，几至封闭，工人来稿至不敢登载。

（《向导周报》第120、121期，1925年7月2日、16日）

三、有关党领导青岛罢工的一些情况

邓恩铭同志领导青岛罢工斗争的片断

（上略）

于一九二三年一月间日寇归还青岛时，恩铭同志就又到了青岛，负责中央〔共〕青岛支部的工作（青岛直属支部至一九二四年春改为市委，直属中共山东省地方执行委员会）。直到一九二五年七月间纱厂工人遭到第二次血腥大屠杀，封闭胶济铁路总工会、青沪惨案后援会，以及各纱厂工会等，全市实行大搜捕时，恩铭同志才由杀气腾腾的恐怖弥漫的青岛市改换服装，徒步跑了七八十里，逃出了敌人虎口，到了济南。（中略）

从一九二五年二月间恩铭同志亲自和四方机厂党组织研究利用胶济铁路淮河桥（即潍河）折断发生南北派矛盾冲突的机会

决定罢工后,在一天夜里,恩铭同志又以新闻记者的身分出席了在四方三义小学召集的该厂中坚工人三十余人的会议上讲了话,提出了罢工五个条件,组织了罢工委员会和纠察队。自从罢工获得胜利时起,至五卅惨案发生前后,在青岛纱厂和机车厂中已卷起了数次轰轰烈烈的大罢工,发生了日本强盗勾结中国军阀血腥屠杀纱厂工人的两次大惨案。在惨案发生后,以恩铭同志为领导的青岛市委即刻作出决定,以铁路工人和四方机厂工人为主,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青沪惨案后援会”,组织了宣传募捐队,到胶济沿线各城镇(直到济南)农村和在乘客中,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屠杀工人罪行的宣传鼓动和募捐运动。(下略)

(摘自侯志《邓恩铭同志传略》。《山东省志资料》1961年第3期)

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的爆发情况^①

(上略)

这次大罢工,最初由大康纱厂开始,接着其他工厂相继响应,罢工浪潮席卷全市。缘一九二五年春天,日本厂主从济南招收了一批高小毕业生到厂充练习生。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来青岛后,内愤日本资本家虐待压迫工人,外受四方机厂罢工胜利的影响,乃暗中联络工人进行反抗斗争。这时大康纱厂已有党的组织,该厂工人在共产党员司明章、苏美一等同志领导下,在小村庄秘密组织工会。后因工会名册放在工人周培牲家中,一

^① 本文摘自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编写办公室《一九二五年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山东省志资料》1961年第3期。标题是编者所加的。

时保管不慎，被军警搜去，交给了日本人，因而遭到破坏。日本资本家得此名册后，大为震惊，竟私行逮捕工人代表，拘禁厂内，毒刑拷打。对日人这种非法行为，中国反动当局不但不予工人以保护，反而派遣军警，密布工人住所，助纣为虐。全厂工人激于公愤，纷纷提前下班，停车不干活，坚决要求释放工人代表。当厂方逮捕工人代表时，幸司明章同志在厂外没有被捕，司一面向中共四方支部书记李慰农同志（化名王伦，安徽巢县人，曾在法国勤工俭学）作了汇报，准备罢工；一面买了很多食物送给工人作晚餐。直至晚上八点钟，工人仍不离厂，日本厂主被迫答应释放工人代表。这时厂内已宣布戒严，不能随便出入，司明章同志只得从墙头上爬到厂房，再从厂房天窗里下去，召集工人开会，决定举行全厂总罢工。

（下略）

（《山东省志资料》1961年第3期，第75—76页）

上海纱厂工会代表函告青岛罢工情况^①

为援助青岛大康纱厂罢工而派去的某代表，来信报告大康纱厂罢工情形如下。

我于（四月）二十一日到青岛，下午面会大康罢工工人。现作详细报告如下：

他们这次罢工，实出于不得已。我们罢工^②的时候，他们正

① 原标题为《上海派出人员向工会报告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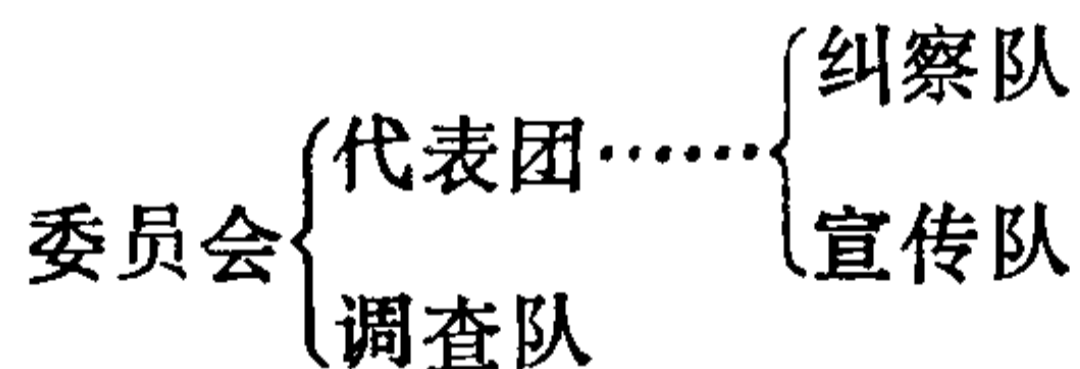
② 指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的二月罢工。

着手组织工会,罢工前加入工会者约达二千多名。其后,日本人竭力想破坏这种组织。十五日工人正在工作的时候,日本人把工会一切文件拿去。工人大为愤慨,马上推派代表三人进行交涉,后因日本人买通卖国贼警察(厅)长把三代表拘押,过三天后才释放,日本人并且把三代表开除。因此,工人召开工会委员会研究办法,当晚委员会通过下列事项:

一、迅速重新编制会员名册(罢工前又增加一千多名,共计约四千人)。

二、立即向日本厂主提出条件,限十九日下午六时答复。

可是到了七时,日本人还没有任何答复,因此,筹备委员下了撤退命令,在九时实行罢工。但是日本人拿着武器严加防备,很不容易做到。后来,一位工人带着罢工使命,偷偷溜进工厂,对所有工人传达了命令。到了九时五分,大家很文明地退出工厂。罢工至今,已逾三天。他们组织得很好。罢工后,马上推出工会执行委员九人,并推定各代表团三十多人,纠察队三百多人(一队十人),调查队六十多人(一队五人),宣传队四十多人(专门分发传单)。以图示之如下:



他们的罢工,因为组织得很好,极有秩序。二十一日下午二时出发游行,每三人一排,未受官厅压迫。现在青岛市民也同情工人,竭力援助。因此,工人们现在更安心,强硬起来。(下略)

(译自宇高宁《支那劳动问题》第670—672页)

日人论著中反映的情况

五月六日，四方沧口的各纺织会社为共同向公众说明罢工的真相而发表声明。首先叙述此次罢工的原因，系由于上海共产党二、三人的煽动。罢工虽已达十六日，但丝毫没有瓦解的迹象，可以推想他们的伎俩确属非常。

（译自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编《我国纺织业罢工事件与五卅事件以及各地的动荡》第一辑，第169—170页）

支援青岛罢工的上海纱厂工会代表返沪

赴青岛之共产派分子，亦已回沪，带有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罢工胜利宣言甚多，正在分发中。

（《纺织时报》第211号，1925年5月18日）

叁、上海人民反对公共租界工部局 越界筑路和四提案的斗争

一、上海人民反对工部局越界筑路的斗争

(一) 工部局强行越界筑路

领事团擅自决定扩充上海租界

大陆报云，据上海领事团计划，本埠租界应即推广，刻已电请公使团提议租界边境应展放，至距现有边境约当来复枪弹最远之路程云。

(《申报》1925年2月14日)

国闻通信社云，驻沪各国领事团前为推放上海租界一案，曾将通过之建议案，送呈北京公使团。昨闻领事团已接到使团来电，谓此项建议案，已审查完毕，认为合宜，即日预备照会外交部，实行开始交涉云。

(《新闻报》1925年2月17日)

工部局日夜在沪西越界筑路

工部局对沪西筑路问题,决计积极进行,徐家汇至虹桥之马路已丈量妥洽^①,不日即将开工。惟乡人方面现仍反对,将来能否收效尚不可知。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5日)

英工部局在法华、蒲淞两市乡越界筑路,虽经沪上各法团及地方绅商各界奔走呼号,一致力争,但仍并力进行,日夜工作。现在虹桥路北各马路,先后完工者不少,而虹桥路南之支路,长有十余里,泥路已成雏形,河上均建木桥,观其工作,有事在必成之势。

(《新闻报》1925年3月14日)

工部局在沪西越界筑路一案,绝无制止之切实办法,刻其筑路工程,西至霍必兰路止,已达基础目的,如植树、水筒、阴沟、地面之阶沿(即路旁设以行人者)、电线等等,一致就绪。(中略)日来筑路工程师,日在查勘霍必兰路西未就绪之路线云。

(《新闻报》1925年5月11日)

沪西越界筑路案近来曾停工旬余,近据法华乡民报告,日来复积极工作。自大西路迄虹桥路,日必有西人视察路线汽车数

^① 据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二日《民国日报》报道：“昨日已开始打庄〔桩〕，不日即将从事建筑。”

起。闻对北新泾拔去木桩之路线,仍拟继续开工。

(《民国日报》1925年5月30日)

工部局对业主进行威胁利诱,强行占地筑路

蒲淞市议会议员潘祖勋、县立高等小学校教员金世苞,昨呈上海县知事公署文云:为国权攸关,批示祇遵事。窃上海英工部局此次越界向法华乡、蒲淞市一带建筑马路,地方各法团暨祖勋等以有损国权,呈请阻止,荷蒙令飭蒲、法两区总董、乡董转着各该团地保拔去英人所立界石在案。詎英人依然工作,始终不止。伏查英工部局当开工作〔筑〕马路之时,因路线所经,有祖勋、世苞两人祖遗之地在内,定欲出钱价买。当时祖勋、世苞以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若让地外人被其筑成马路。不特有损国权,且必腾笑邻邦,是以始终缓〔婉〕言拒绝,不稍通融。英工部局见价买不成,遂于祖勋、世苞地上自由工作。祖勋、世苞知英人无可理喻,乃于己之地上各围篱笆,以防侵占。不料英人知世苞常至校中,兼顾为难,竟将世苞所筑篱笆强自拆除。迨世苞修葺完竣,可骇英人仍敢偷拆,随修随拆,不知次数。世苞无奈,将粪数担泼〔泼〕于己之地上,一面雇工监视,且对英人所雇之筑路工人直(言)声明:嗣后如再有前来拆吾篱笆,莫怪野蛮,定以臭粪抛掷。英工部局闻信,方将该段工作稍事停顿。但英工部局对于祖勋、世苞两人祖遗之地,始终不肯放松,见价买不成,翻然变计于前。突于前日遣人邀祖勋、世苞至英工部局内,一味以金钱交情等笼络手段,互相诱引,大有不达目的不止之势。祖勋等实逼处此,似未便坚决表示。考外人本有更易基地之章,当场亦只得

以请求贵局在马路之旁购买同样之地，相与交换，饰词辞归。比祖勋、世苞返家未久，英工部局接踵遣人一再向祖勋、世苞熟商，声称日内必须建筑粪筒桥梁，嘱祖勋、世苞先将篱笆拆让，俾便工作，且不待世苞之允可，又将世苞之篱笆当马路所直经之东西两边强自拆去，开筑深沟，安置粪筒。（下略）

（《民国日报》1925年4月2日）

（二）上海各界纷纷反对越界筑路

沪西郊区农民愤起拔除工部局所立界桩木标

英工部局在蒲淞、法华两市乡越界筑路，（中略）仍并力进行，自法华乡虹桥路东口沿铁路朝南，经蒲汇塘河滨，转折西北至蒲淞市航空站北，仍与虹桥路衔接，延长有十余里，竖桩插界，间或开沟者。彼处乡民，因妨碍水利农田，或须掘坟，或须拆屋，民情愤激，故连日以来，群起反对，将英工部局所立界桩木标，纷纷拔除。而虹桥路北之马路，纵横交错，共有二十余条，正在工作中。乡民有不愿领价者；有碍及坟屋水利，仍欲请求阻止者。议论纷纭，未免激成众怒云。

（《时事新报》1925年2月28日）

国民保土会议决制止越界筑路办法

本埠自去年因北四川路发生越界筑路事，由苏民自决会、常州旅沪工商乡谊会、平民自治会各团体在曹家渡所组织之国民保土会，曾一再露天演讲主权问题后，至今半载，未曾开会。近

因外人又在沪西蒲淞市地方越界筑路,且有要求扩充租界之说,于昨日又在筑成里开会,由黄冠群主席,议决一面组织演讲团,一面致电政府,请速交涉。

(《时事新报》1925年2月28日)

淞沪市政协会电请制止越界筑路

淞沪市政协会昨日电请政府设法制止外人在沪西越界筑路,以维国土。其原电云:北京外交总长沈、淞沪商埠督办孙、南京江苏省长韩崇鉴:上年英工部局在虹桥路北租界区外擅自筑路,属法华乡者二十余线,蒲淞市者六线,蔑视主权,群情愤激,迭经市乡各议会及地方绅商吁请严重交涉。嗣因战事发生,利用时机日夜工作,此事尚未解决;乃近日英工部局又派工程师从虹桥沿蒲汇塘经航空站一带测勘钉桩,绵延十余里,侵犯国权,莫此为甚。钧座责膺重寄,务恳迅向英公使严重交涉,立予制止,以保主权而维国土。淞沪市政协会叩。鱼(六日)印。

(《民国日报》1925年3月7日)

学商界六团体电请外交部严重抗议

上海留日学会、商帮协会、中等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合会、沪南公团联合会、留欧同志会、林荫路商会等六公团,昨致外交部庚(八日)电云:

沪西外人越界筑路,变本加厉,除蒲淞、法华两乡占地不贳外,更筑两大路,一达青浦之余山,一达松江之七宝,横贯三县,

区域益广。大好国土，受人侵越，租界扩充无形，主权损失益巨，是而可忍，孰不可忍？用特专电上陈，乞一面向外团严重抗议，一面飭驻沪陈交涉员暨常警厅长速行交涉制止，以杜野心而保主权。惟是外人得寸进尺，工作如故。失此不争，势不〔必〕至上海尽变租界；外力侵入松、青不止，惟钩座实利图之。

（《新闻报》1925年5月9日）

少年宣讲团出动演讲，反对越界筑路

中华路少年宣讲团游行宣讲队队员陆文韶、范大璋、陈贤本、申梦世、顾君梅、顾启三、冯国桢、翁福康等于前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时，在该团乘坐汽车出发，赴沪西北新泾镇、曹家渡越界筑路附近地方大空场宣讲越界筑路利害，以及抵制越界筑路方法，并在该大空场高墩上举行化装演讲，讲题为《地皮虫》，听讲者约计二千数百余人，均为动容，掌声如雷。讲毕分送通俗印品宣传国货，并中法药房人丹。至下午四时始散。后又至曹家渡转赴闸北共和路宣讲，陆文韶、范大璋、陈贤本、顾君梅、申梦世、冯国桢等均有演讲，听者约计四百余人，并附送通俗印品。返团时间已下午八时矣。闻该团所乘之汽车，由范大璋君商恳九福公司百龄机汽车应用，全尽义务。该公司之热心，殊属难得云。

（《申报》1925年5月26日）

(三) 军阀政府空谈调查交涉, 欺骗民众

公共(租界)工部局在法华乡越界筑路一案, 迭经该处人民具呈上海县署, 转请交涉公署阻止, 已记前报。兹悉上海县李知事以此案有关主权, 非常注意, 昨又令飭该处各图地保, 将此次该工部局所筑马路占及地亩之业户亩数、字据号数, 分别详细查明具复, 以凭转请交涉署查核办理。

(《民国日报》1925年2月27日)

沪西筑路一案, 迭经沪上各方呈电外交部、省公署令飭交涉署严重交涉。兹闻陈交涉员以办理此案, 须缜密进行, 特与各方要人研究数次, 拟根据洋泾浜租界章程第六款提出严重交涉。

(《民国日报》1925年4月5日)

法华乡西人越界筑路案, 省令迭电阻止。该处巡官李以让, 于前日曾解散小工百余人, 嗣西人复勒令开工, 该巡官即无办法, 乃呈报厅长。常厅长以事关重大, 特派督察长徐鸿年实地复勘, 再定应付方法。

(《民国日报》1925年4月22日)

沪西某绅士有关于越界筑路之谈话一节, 其言云: 此次越界筑路, 工部局在沪西开辟马路至十余条, 而在短时期内, 自行完

成其工程。沪西人士暨全埠各界，曾自始至终竭力反对，呈请当道之文字，当在千份以上，而县、道、省交涉员、外交部之函电，亦喧扰一时，但结果无丝毫抵抗效力。数其交涉经过，由地方呈县，而省，而交涉员，而领事团，而工部局，计一文所需时间，至少亦须七八十日。当该文再由工部局而领事团，而交涉员，而省，而县，及于地方，又须七八十日。往返一次，经五六月，若再据以驳复，或另筹交涉方法，而越界之路，已可通行汽车矣。而列宪对该案，例尽驿递手续，绝不如邮局之双挂号信件，尚有一收条可掣也。盖每一文出，无论任何机关，不复追问其办理情形，一种断线风筝耳。噫，(国)土主权之丧失，谁尸其咎哉？

(《新闻报》1925年5月21日)

二、上海人民反对工部局印刷 附律等四提案的斗争

(一) 工部局阴谋通过四提案，上海 人民群起反对，迫使流产

1. 工部局策划召开纳税外人 特别会议通过四提案

公布会议议程及印刷附律等提案

本届公共租界纳税西人大会常年大会，已定四月十五日下午二时半，在市政厅举行。其特别会议，即待年会终结后继续开

会。所有该特别会议程，业于昨日由工部局公布。兹将议程及提案原文录下：

一及二、会场议事例规案。三、关于洋泾浜土地章程第九款抽收码头捐项下，修正如此：“余俱仿此类推，并准抽收货捐。租界内之人，将货物过海关或在码头上起卸货物下船转运，均可抽捐。此项捐数，不得逾该货关税百分之三。”^①四、请议下列附律，并予通过，列第三十五条(甲)“印刷物”：(一)凡印刷(凡机印者一应包括在内)或发行或主使印刷或主使发行任何报纸、小册、传单、小张招帖以及载有公众消息、事项、评论、意见等等纸类，于印刷或发行之前，未向工部局，或如系西人，未向该管领事将姓名、住址注册者；(二)凡印刷意在发行或散布之纸类而未将印刷者之姓名地址载明于其上，如系一面，则于每张之上，或系多张，则于首末各张之上者；(三)凡发行或散布或相助发行或散布上述之纸类而该纸类未将印刷人姓名、住址载明其上者，得处以三百元以下之罚金或三个月以下之监禁或按法定罚则惩罚。五、附律第三十四条修正案，于当典等字后，加入“证券物品交易所”诸字^②。六、请议附律第三十八条，并予通过。现行之附律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及第四十二条，当予改更(即管理雇用童工诸条)。七、请准工部局进行一

① 码头捐原来是按货价抽收千分之一，现在改为按该货关税(当时关税为值百抽五)的百分之三计算，即按货价抽收千分之一点五，比原数增加百分之五十。

② 即交易所注册案，又称交易所领照案。按照该案规定，凡中国人在租界内开设交易所，均须向工部局登记领照，否则不许营业。

九二四年七月九日童工委员会报告第三章内各建议案。八、洋泾浜章程第六款(甲)末段“由公费支付”句改为“由工部局与地主平均担负”。

(《民国日报》1925年4月1日)

竭力运动纳税外人到会通过四提案

公共租界纳税外人会常年大会,近年来屡次因人数不足,未能将特别会开成。本届年会已定明日下午举行,当局因恐人数仍难足额,特用种种方法使纳税人注意,促其届时到会。驻沪各国商会会员,多数具有纳税资格,除各该商会分别劝告各纳税人准时出席外,并于公共场所揭贴公告,促纳税人勿放弃责任,惟多以保护童工案为题。投票用纸,已于昨日由工部局直接分送各纳税人,明晨起开始投票。本届年会,因保护童工案亦列入特别案,各国纳税人因各方宣传效果,多数赞同,故预料本届到会之人必多,是案定能有完美解决希望。同列特别案中之取缔印刷附律及增加码头捐等案件,因童工案之连带关系,似亦有通过之希望。惟纳税人总数为二千七百余人,其中日侨约占五百四十余人,日侨对于童工案固尽力提倡,惟对于取缔印刷附律等案亦多反对,故尚难预料云。

(《申报》1925年4月14日)

2. 上海各界群起反对印刷附律等提案

反抗印刷附律与码头捐(传单)

一切住在租界上的中国人注意!

同胞们! 快快一齐起来反抗租界外人最近压迫我们的印刷附律! 快快一齐起来反抗租界外人最近剥削我们的码头捐!

“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同胞们都应该记牢这句话。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设立工部局管理上海租界行政, 破坏中国行政权——警察权、收税权等, 利用租界行政权, 摧残住在上海租界的中国人。数十年来所演黑暗惨剧, 如西牢及捕房之私刑, 巡捕包探之敲诈, 真是人间地狱! 又如动以细故逮捕新闻记者视同盗贼, 箝制上海所有中国人的报纸不敢一言侵犯工部局。“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住在上海租界的中国人竟受外国(工)部局这样的摧残!

这还不算, 他们还(在)列强尚未承认民国的政府时霸占会审公堂, 由外国领事裁判中国人的讼案, 破坏中国司法权竟超过不平等条约——洋泾浜条约之领事裁判权以上, 至今不允中国政府依据洋泾浜条约收回此项非分之权。“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住在上海租界的中国人竟北面受外国领事裁判!

这还不算, 他们还屡次想根据中国政府未曾批准的洋泾浜章程, 订立取缔印刷附律, 剥夺中国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 破坏中国国家的立法权。“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住在上海租界的中国人竟要受中国法律以外的压制!

中国官厅在中国领土之内征收纸烟捐，列强竟纷纷抗议，而他们却在中国的上海不经中国政府许可，硬要加收码头捐，加重商民的负担，这又是何等喧宾夺（主）的事！

“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同胞们！我们是中国国民，不是洋奴，快快一齐起来反抗租界外人压迫我们的印刷附律和剥削我们的码头捐。不但要反抗印刷附律与码头捐，还要进一步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永远不许外人在中国欺压中国人！

（《中国青年》第74期，1925年4月11日）

学生会、市民协会等团体合组上海市民反对印刷附律协会

昨日上午九时，上海市民协会、南市市民对外协会、闸北市民对外协会、上海学生会等团体，假西门大吉路永兴里四十八号，特为工部局将提出印刷附律案于纳税外人常会事集议。金谓对于工部局此案提议，宣言反对，响应总商会与书报业四团体一致抗议。当经议决定名为上海市民反对印刷附律协会，会址暂假西门大吉路永兴里四十八号。

（《民国日报》1925年4月14日）

上海市民反对印刷附律协会，为反抗印刷附律及增加码头捐案，昨发出宣言，并于前日下午分队演讲，以唤起市民之注意。兹将讲演情形略记如下：一、演讲队共三十六队，每队三五人不等，各设队长一人引导之；二、分发地点有公共租界、法租界、闸北、南市、西门等处；三、演讲旨趣，解说附律之不平；四、听者人

数统计五万有余；五、听者态度多表示反对，大有不取消不已之势；六、散发传单统计在六万以上，传单原文过长从略。

(《民国日报》1925年4月16日)

总商会函交涉署反对印刷附律和增加码头捐

径启者：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将于本年四月十五日召集纳税西人常年大会，据其宣布议程，则历年人民所反对而因人数量未足未能开议之印刷附律及加增码头捐案，又将继续提出。

(中略)就租界性质言之，华人之居此者，除遵守界内必要之警察章程外，仍受治于本国之法令，其性质与各国人之侨居租界者仍受治于其各该国之法律，正属相同。工部局所提此项附律，其内容与现在各团体陈请撤废之出版法^①，不无几分相似；而网罗之广泛，处罚之苛酷，较之出版法，更非人民所能堪。

出版法第十一条对于信柬、报告、会章、校规、族谱、公启、讲义、奖券、凭证、号单、广告、照片等类之出版，尚有例外，不适用注册及载明印刷人姓名、住址之程序。而工部局所提附律，则为任何小册、传单、小招贴等均须受此律之支配。是则凡用机件复写之纸类，无一不须先受工部局之核准注册，公众之感受不便，岂言词所能拟议。此窒碍者一。

出版法第十四条对于不稟请警署注册及未载明姓名、住址之印刷品，只处以五十元以下五元以上之罚金，且被处罚者仅以发行人为限。而工部局所提附律，非特罚金最高额定为三百元，

^① 指北京军阀政府于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四日公布的出版法。

并得科以三个月之监禁，而规定应负罪责之人复有四种：一为发行人，二为散布人，三为相助发行人，四为相助散布人。是则学校发一招考招贴，商家发一减价传单，或事前未经注册，或临时未将印刷人姓名附载，自校长、店主以至分送传单招贴之雇工，均应受上述之惩罚，詎非荆天棘地而何？此窒碍者二。

又查工部局所提增加码头捐案有云，（中略）按江海关码头捐，向系由关带征，拨充工部局市政经费，按照货价，每百两纳捐一钱，载明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第九款内。兹改为照所征银数抽收百分之三，即系照货价每百两纳捐一钱五分，较之现制，计增三〔半〕倍。年来商人在江海关缴纳捐项，每税银五两，须附缴浚浦捐一钱五分，码头捐一钱，负担已重。且向来码头捐计算标准系按货价每百两抽捐一钱，虽约合关税所征银数百分之二，惟以货价为稽征标准，必须货价上腾，捐项乃能增收。若以关税所征银数为标准，则转瞬裁厘加税以后，进口货税值百抽十二有半者，码头捐依此计算（即现议百分之三比例）是现征一钱之码头捐，届时当增至三钱七分五厘。故工部局一面加增捐率，一面改行计算标准，实可谓双管齐下，而进口货税码头捐，则间接均由华商担负者也。工部局议加码头捐，自为扩充其岁入起见，但码头捐现以税收为标准，是关税加旺，码头捐亦随之增多，毫无疑义。江海关最近税收，较之民国七年以前，不啻加增一倍。本年工部局刊发年报，亦称去年虽有战事，而所收码头捐项仍有增进，即此可为工部局码头捐只有增收并无短缩之明证。其不应加重华商负担，昭然若揭。

以上两案，应请贵署迅予函知领团，声明不能承认理由，请

其转劝工部局撤回前议。万一仍然开议,竟予通过,亦惟有转报外交部,向使团坚持否认。请将此意向领团预为声明,实纫公谊。此致江苏特派交涉员陈。(致北京电略同)上海总商会。四月十二日。

(《上海总商会月报》第5卷第4号,1925年4月)

总商会再函交涉署抗争交易所注册案

敬启者:本届纳税西人大会,工部局拟提出之印刷附律及增加码头捐两款,业于本月十一〔二〕日函致贵署,请向领团声明,不能承认在案。兹查该局所提议案,尚有于附律第三十四条当典之后,加入证券物品交易所一款。查交易所系属特许公司之一,与饮食店、游戏娱乐场不同,其核准设立之权操之于我国农商部。自由证券交易所法及物品交易所条例相继颁布而后,各交易所俱已依法注册,给有部照。华人之经商于租界者,仍应遵守本国所颁之商事法规,其情形正与他国人之经商于租界者只应服从其各该国颁行之商事法规情形相同。盖一则地主之关系,一则治外法权之关系也。工部局欲颁行附律,重令领照,其结论无异令华商不用本国颁布之商事法规,而改用工部局颁布之商事法规。何也?因一公司同时断不能适用两种各别之法规,而按照租界性质言,华人亦断无改变法律管辖之理由。此中得失,关系甚巨,应请贵署迅予并案函知领事团严重抗争,实纫公谊。详细理由,另纸录呈,并请察阅是荷。此致江苏特派交涉员陈。

(《民国日报》1925年4月14日)

上海的童工问题

其 颖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使大多数中国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于是以前在家庭内的儿童劳动，都跑到工厂里做工，一变而成为中外资本家最贱价的小奴隶了。

去年上海工部局童工调查委员会将上海租界内分为十区调查，雇佣童工的大小工厂共有二百七十五个。童工总数共有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人；其中十二岁以上的男工四万四千七百四十一人，女工十万零五千九百二十一人；十二岁以下的男工四千四百七十五人，女工一万八千一百三十五人。

这许多童工，在身体上精神上受极重的损伤。学徒的年龄，以工作的性质各有不同，学徒的期限依照惯例都为五年。在这学徒期内，普通均不给工钱，就是间或有给工钱的，数量亦极少。很多不过六岁的童工，在大工厂里做工。他们多半都是站着，每天做十二小时的苦工。一天的工钱，最多不过两角。工厂里的设备太坏，毫不讲究卫生〔生〕。这些童工，大半是由包工头从乡里雇来，一个月只给他们的父兄银二元，而包工头可在工厂老板处领到四元。因此那些童工的生活，万分痛苦，做了大厂老板和包工人〔头〕的小奴隶，让他们任意剥削。真是可怜呵！

帝国主义者——工部局，公布这个调查而后，提出一个名归而实不至的改良童工建议案，如凡十岁以下的童工，禁止在租界内作工，四年以内，可将童工的最低年龄增至十二岁，童工仍照惯例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其中应有一小时为进食休息时间，对于

日内〔间〕准许工作的童工，轮作夜工时，不全禁止；十四岁以下的儿童，每两周须有继续二十四小时的休息……。

帝国主义者这个所谓“保护”(!)童工的提案，足以表现出他们的伪善。这是洋资本家恐惧工人觉悟，想借此讨好愚弄罢了！同时，他们为着近代工业的发达，已不得不放弃此半封建时代的生产方法，而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借得生产力的发展与增加，对于青年工人好施行更大的剥削。

四月十五日上海的“外国国会”——纳税外人会，又要开会了，工部局这个改良童工的建议案，必将提出讨论。希望上海租界的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个小奴隶联合起来，提出与童工切实有利的条件(如禁止使用十三岁以下的童工；由工部局或厂主设立平民学校，供给童工的教育费用；十六岁以下的童工，每日工作八小时，绝对禁止使用童工做夜工及其他有害健康的工作；十六岁以下的童工，每星期须有继续二十四小时以上的休息，不得克扣工钱；童工工钱，须与成年工人相等，不得克扣；改良工厂中童工的条件……)，反抗帝国主义的这个名归而实不至的骗局！全国的工人阶级和真正民族革命运动者，都应予童工以实际的援助。

(《向导周报》第110期，1925年4月12日)

3. 纳税外人特别会议因各界反对而流产

特别会议到会人数不足，四提案未能开议

公共租界纳税西人会，于昨日下午三时半起，在南京路市政

厅举行大会，(中略)议毕后，继开特别会议，讨论增加码头捐、印刷附律、童工条律诸案，以不足法定人数，未克开议。

另函云：昨日之纳税西人年会(特别会议)，以法定人数不足，未能成会，应议诸案，须照章延至明年重提。

(《民国日报》1925年4月16日)

(二) 工部局再谋通过四提案， 上海各界坚持反对

1. 工部局再度策划召开临时纳税 外人特别会，通过四提案

英领勾结日领策划于六月初召开临时特别会议

《日日新闻》云：驻沪英总领事等因运动在六月初临时召集工部局纳税人特别会议，解决重要悬案，函由日总领事矢田氏请日人方面有权者赞成其事一节，已见前报。兹悉英总领事此函系上星期六发出，请尽本星期一午前答复，为时甚促。日总领事即赶于星期日通知各方面，同时得有权者四、五人之署名，复称日人方面之有权者亦多赞成其事，云云。缘特别会议经有权者二十五名之署名，即可请工部局召集，故英总领事等得日总领事及日人有权者四、五人之同意，将联名提出请愿书于工部局，为相当之运动，以迄开会之日，务期特别会议开成云。

(《民国日报》1925年4月29日)

工部局通告六月二日开临时纳税外人特别会议

文汇报云：工部局已有通告，请纳税外人于六月二日下午五时，开特别会议，以讨论童工、码头捐及取缔印刷业之各议案云。

(《新闻报》1925年5月2日)

工部局发表四提案全文，变本加厉欺压中国人民

工部局前应纳税西人之请，定于六月二日下午五时，重行召集纳税人特别会议。所议各案，已于昨日发表，内容大致仍上届之旧。惟第三案之增收码头捐限度，上届议案为“关税百分之三”，此次则又增为“关税二十分之一”；第五案之“交易所”下，增添“拍卖场”一项；第七案中比上届增“便宜”二字；第八案内上届为“由工部局与地主平均支给”，此次则改为“由任何一方或双方支给，其方法及双方比例，由地产委员便宜定夺”等语。兹为便利阅者查考起见，将各议案并志于下：

第一、第二两案为推举主席、书记等例行会务。

第三案为洋泾浜北首地皮章程之第九条。关于增收码头捐一节，应修改为“并准前述之会，或会众过半数之同意议决，抽定货捐。凡租界内之人，将货物经过海关，或在码头上起卸，或下船，或转运，均可抽捐。捐数多少，照该货应完关税之额，不得逾二十分之一。”

第四案为应请通过及批准下述附律，列作第三十五款甲“印刷物——诸色人等凡印刷（照本附律意义应包括一切机械的复制而言）或发行，或主使印刷或主使发行，任何新闻纸、小册子、

通告、传单、摺叠小页、招贴或其他纸类之载有公众消息或事情，或关于此类之批评或议论者，在印刷或发行之前，如为外人而未向该管领事署，如为其他诸色人等而未向工部局先将其姓名、日常居处及营业地点注册或使之注册者，又或故意妄报遗漏，或故意使之妄报遗漏，致注册各端令人迷惑者；又诸色人等印刷意在发行或散播之纸张，如该项纸张仅印一面而未在正面，或如不止一页而未在封面或末页或登载社论之一页，用明晰易睹之字，载明其姓名、日常居处及营业地点者；又诸色人等发行或散播或相助发行或相助散播此项纸张，而其上面未照上述方法载明印刷人之姓名、日常居处及营业地点者，应科以不逾三百元之罚金，或不逾三个月之监禁，或按照该人管辖之法律上所规定，处以其他科罚。”

第五案为应请修正附律第三十四款，在原文“押铺”之后，加入“证券或物品交易所拍卖场”。

第六案为应请通过及批准下列附律，作为第三十八款，而将原有之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及四十二等款，依次递后一款：

一、诸色人等：（一）自本附律施行之日起四年内，不得在工厂中或工业上雇用十岁以下之男女童；（二）自前述四年期满后，不得在工厂中或工业上雇用十二岁以下之男女童；（三）在工厂中或工业上雇用十四岁以下之男女童，不得令其每二十四小时内工作逾十二小时，此十二小时应连至少一小时之必须休息时间在内；（四）在工厂中或工业上不得雇用十四岁以下之男女童，除非每十四日中至少给予连续二十四小时之休息；（五）在工

厂中或工业上,不得雇用十四岁以下之男女童,令工作于危险而不设防备之机器或危险场所,或令从事于易致严重伤害其身体,或卫生之工作;(六)在工厂中在〔或〕工业上,不得雇用十四岁以下之童子使冒犯危险的情形,而不先取种种必要及合法之方法以保障其安全。

(中略)

第七案为应请授权工部局照一九二四年七月九日童工委员会报告之第三章内所列建议,便宜进行。

第八案为洋泾浜北首地皮章程第六款甲之末段内,“由公家支給”一语,应改为“由任何一方或双方支給,其方法及双方比例,由地产委员便宜定夺”。

工部局并宣布对童工附律之政策如下,今请大众注意童工议案之措词与上届纳税人会议所提出者相同,惟于第七案中增加“便宜”二字,俾工部局可少遇此项附律实行时所将发生之困难。自本年四月间流会后,工部局益复注意此副〔附〕律之种种状态,而尤特殊注意必取何步骤始可免除对于工厂所已雇用诸童工之困难。众于此节曾向工部局提出种种建议。今当切实声明者,拨公款周恤失业之人。工部局之意,此种办法,殊欠正当,工部局所赞成之议,为所议之计划如一旦成为法律,工部局受权实施,当使有主要关系者担负之,以轻为贵。其他建议为工部局所赞成者,当力戒干涉已在工厂工作之孩童;一面办理注册摄影等事,俾副〔附〕律实行后,工厂不再添雇童工。照此办法,则租界内各工厂之童工于若干时期内可适当限定人数,其结果不难使工厂全无童工也。

(《申报》1925年5月20日)

租界当局全力拉拢纳税外人出席特别会议

《文汇报》云 关于下月二日下午五时在市政厅召集之纳税人特别大会事,迩来进行甚急,劝纳税人署名保证出席之书牒,已有一千二百张,由人领去分送各纳税人,请其署名。现圆明园路十九号事务所内尚剩五百张,未曾领出。此外复有日籍纳税人之五百余张待领。凡各行家之代表离沪者,可由各该行出具正式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纳税人患病者可取具医生证明书,委托他人代表。惟现有数纳税人已不在租界内,而选举册上仍有其名,此足以减少投票人数。日人中已有多人协作,惟言语不通,亦为一大困难,仅谙英语者,可望列席,因此投票人数亦不免为之稍减云。

(《申报》1925年5月26日)

2. 上海各界继续反对四提案

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传单)

可是上海却有一个外国政府!就是工部局。我们中国是共和国,言论出版人人都有自由。然而在上海却独不能了,因为这外国政府的工部局,如今提出印刷附律,禁止上海人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照那附律,“印刷发行,主使印刷或主使发行一切种种印刷物,任何报纸、小册、传单、招贴,都须到工部局注册;每张印刷物上也必须将印刷及发行人姓名地址注明,否则便要监禁或罚金之罪”。这样废[残]酷的刑罚,竟由外国政府在中国境

内行使！我们中国各界男女同胞赶快起来反对力争呵！

中国人，上海的中国人，我们还有祖国吗？

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敬告

(原件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商总联会函交涉署要求咨照领事团迅速打消四提案

敬启者：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将于六月二日召集纳税会议，其第三至第六案，即增收码头捐、印刷物附律、交易所领照、取缔雇用童工是也。以上四提案，早经群众反对，而其间尤以一、二案更无容纳之余地。敝会迭次宣言，而工部局期在必行，时事迫切，不得不向钧座简单陈之。

(一) 码头捐 系一八九八年工部局呈请领事团向上海道商订，自第二次增加照税率抽收百分之三以后，商民已受痛苦。此次又改收二十分之一，曷堪增此负担。况码头捐一项，直接间接，租界内地均感受此种痛苦，而工部局何得借口于经费之扩大，而骤增此不平等之苛例，其专横之极。

(二) 印刷附律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各国宪法上一般之规定，而工部局以印刷物限制之，是不啻以奴隶而看做〔待〕华人。进而言之，查工部局之机关，其性质无异于行政，其修改之原议条文上，有监禁罚则之规定，是工部局不啻以行政而侵入刑律。此而可为，则无辜而枪杀华人，亦无不可。

(三) 取缔交易所 按上海现有中国交易所仅有四家。工部局现订章程，其主旨与中国部颁交易所条例适相反。盖交易所系正当营业，若工部局以专横之力干涉之，将来界内营业，无论巨

细,均可干涉。此而可为,是工部局任意干涉中国之部颁商法也。

(四) 童工问题 依据我国关于公布工作〔厂〕之通例〔则〕,其唯一主旨,不外乎生理上、人道上着想,而为相当之取缔。工部局对于此次限制童工,不啻绝童工之生计也。

综以上四大问题,经敝会节〔历〕次讨论,一二两项为全埠市民绝对不能容纳,三四两项,为相当的不能容纳。念以兹事关系巨大,工部局愈形愈迫,务祈钧座咨照领事团,迅予打消原议,以慰公愤而全主权,无任盼切待命之至。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谨启。

(《民国日报》1925年6月1日)

上海各商业团体联名抗议四提案的宣言

上海总商会、上海杂粮公会、上海面粉公会、上海振华堂洋布公所、上海日报公会、上海通商各口转运公所、上海洋货商业公会、上海银行公会、上海中国棉业联合会、上海钱业公会、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海书报联合会、上海茶业会馆、上海纱业公所、上海铁业公会、上海典业公所、上海纸业公会、上海出口各业公会、上海景伦堂纸业公所、上海运输同业公会、上海金业公所、上海书业公所、上海五金公会、上海南北报关公所、上海煤炭总公所、上海油厂公会、旅沪潮州糖杂货联合会、上海绸业绪纶公所、上海粤侨商业联合会、上海书业商会、上海木商公所等团体对于工部局所提增收码头捐、印刷物附律、交易所领照、取缔雇用童工四案一致抗议。其宣言如下: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将于六月二日召集纳税外人会议,其

议案凡八,第三案至第六案即(一)增收码头捐,(二)印刷物附律,(三)交易所领照,(四)取缔雇用童工。吾人对于前三项,无论在法律上、国权上、事实上,均所反对。而对于第四项,则为有条件赞成。兹以最简明之理由,宣言如下:

一、码头捐 现行征收码头捐之办法,系于一八九八年由工部局呈请领事团向上海道商定,照货值抽千分之一。上次工部局提出之议案,拟照税率收百分之三,今又改为二十分之一,即百分之五。此中有三问题:(一)现行办法,系照货价百两收捐一钱,如改为税率二十分之一,照现在税率值百抽五计,即二钱五分;如关税增至值百抽一二点五,即须六钱二分五厘,商人负担实觉太重(若至此时,自依民国十三年海关税一千七百五十四万七千四百两计,则工部局可得码头捐一,三七七,三七〇两)。(二)我国关税受条约束缚,为协定的,不能自由增减。工部局此案如果成立,是外侨自治机关反可自由增加关税。且闸北、南市、浦东等处并非租界,货物上下,须交纳租界之码头捐,天下不平之事,宁有过于此者!(三)现行之码头捐,乃照实〔货〕价千分之一。上次工部局提案,拟改为税率百分之三,今又提议改为税率百分之五。如任其尝试成功,则将来逐渐递增,或加至与关税相等,或竟超过关税,亦未可知。吾人就此三层研究,认外侨自治机关无增加码头捐之权,实则工部局有权或无权征收此捐,亦尚属问题。从前外交失败之案,一时固难于取消,然不能许其增加丝毫,固今日之急务也。

二、印刷物附律 查该附律规定大旨,有凡印刷或发行、或主使印刷、或主使发行任何报纸、小册、传单、小招贴,以及载有

公众消息事项、评论、意见等纸类，于印刷或发行之前，未向工部局将姓名、住址注册，又印刷意在发行或散布之纸类而未将印刷者姓名、地址载明其上，以及发行或散布、或相助发行散布上述之纸类而未将印刷人之姓名、地址载明者，均得处以三百元以下之罚金，或三个月以下之监禁等各语。此中有两问题：（一）事实上之困难。盖该附律包括至为广泛，如果通过实行，非特业印刷者受其束缚，即寓居租界内之华洋侨民，偶使人印刷或以复写或油印或打字机制作之件，亦须经过注册之手续，并须载明印刷人、发行人之姓名、住址于其上。倘偶一忘却注册或记载，则应受三个月以下之监禁，或三百元以下之罚金。然非以印刷为业者，欲印刷文件，亦必注册，其事至为困难。即以印刷为业者，而必逐件刊明姓名、住址等，恒为事实所不许。况偶而忘记注册或刊载姓名、住址，便须受刑律处分，将见人人皆在危险中。刑法森严，如是之甚，凡我国民，孰能容忍？假使中国政府或地方官厅，定一法律，凡外国印刷之印刷品，非注册不得在中国发行或散布，不知外人以为如何？果尔，则外侨若欲在内地雇华人印刷或散布其印刷品，势必不可得矣！（二）工部局是否有权增此附律。查工部局欲提出此附律，不过根据洋泾浜章程第十一条之规定，然细察该条原文，亦仅谓工部局为便利其执行该章程之目的计，得将原有之附律外，增加或修改之。惟此项设立或修改，须得纳税人特别会议之通过经领事团及北京公使之承认，方能生效。而该章程之所谓目的者，乃以警察、防卫、筑路、卫生、募债、征捐等项为范围，而实无与印刷物有关之目的。且印刷附律条文中规定三个月以下之监禁，三百元以下之罚金，已属刑律范围，而非警

察两字所能包括。工部局焉能于该章程目的范围之外，任意提出法律议案？如果任其尝试成功，则以后若工部局另定种种刑律，甚至规定斩决枪决等又将如之何？吾人研究结果，认外侨自治机关，无权订此束缚出版自由、侵入刑律范围之附律。

三、交易所领照 议案第五条主张将附律第三十四条之范围扩充，加入证券物品交易所于条文。就吾人所知，上海计有中国交易所四家，外人交易所二、三家，均系按照中国或该管国之法律注册。今兹修增附律第三十四条之原意，无非强令现有之交易所重复注册。顾其影响所及殆不止此，实将鼓励人民纷纷设立相同交易所于同一区域内也。殊不知此项附律恰与中国法律相违背。查中国交易所法规事，每一区域内，仅准设立同一性质之交易所一家。现查该项附律，工部局原有之权力，业甚广阔，若复任其增加，则嗣后租界内任何商业，工部局将无不可逞意干涉之。租界非殖民地也，照条约与习惯，华人住租界，均适用我国法律。交易所条例为我国商法一部份，外侨自治机关，决不应另订法律代之也。况工部局将来对于交易所规定之章程，与中国法律难保不无异同之处，则吾人将何所适从？

四、取缔雇用童工 吾人对于取缔童工，不惟(不)反对，且甚赞成。然有两点不能不声明者：(一)前年我国公布暂行工厂通则已有幼年工取缔之规定。兹摘录如下：第三条、男子未满十岁、女子未满十二岁，厂主不得雇用之。第四条、男子未满十七岁、女子未满十八岁，为幼年工。第五条、幼年工只能从事轻便事业。第六条、幼年工每日工作，除休息时间外，至多不得过八小时。第七条、厂主不得令幼年工从事于午后八时至翌日午前四

小时内之工作。第八条、幼年工至少应每月给予三日之休息。第十八条、厂主对于幼年工应予以补习教育，并担负其费用，补习时间每星期至少十时以上。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均规定危险或有害卫生之工作，不得令幼年工从事工作。此通则所规定者，不能谓不详尽，而补习教育等之规定，似尤进一步。工部局苟热心人道主义而又尊重我国主权者，何不即在租界内实行此通则乎？（二）童工入工厂工作实为生计所迫，无力生活，无力受教育，故不惜牺牲身体而入工厂工作。此中实含有三个问题，即身体、生活、教育是也。童工工作，固有害于身体，然不能得饱暖生活，不能受教育，其结果之恶劣，将更甚于作工。生活问题，殊不易解决。惟有特许以一部分轻易无危险之工作，在某种限制下，许厂主雇用童工，一面普设义务公学，使不入工厂及受雇工厂之儿童均得受普通教育，实为今日急务。盖无论何处，均有公立义务学校，惟租界无之。其所设之少数华童公学，程度较高，费用颇巨，决非工人子弟所能入学也。吾人研究此问题之结果，以为工部局如果热心人道主义，当一方厉行我国之暂行工厂条例，一方当在租界多设公立义务学校，或拨岁入之一小部分，交纳税华人理事会办理。

五、结论 吾人以为码头捐，现时绝无增加之理。至于印刷物附律、交易所领照，在法律上、条约上、国权上，均应完全反对。童工问题，关系人道主义，吾人在原则上极为赞成，不过以为当实现我国公布之暂行工厂通则，且为贫苦儿童谋相当教育，以免游荡成性，流为盗贼乞丐。说者谓工部局因经济困难，故欲增加码头捐，而不顾及童工之生活，窃以为似不尽然。盖工部局

界外筑路等事,需费甚巨,如果经济困难,又何必出此召怨而不急之务乎?且以一城市之一部,每年收入已达六百万两,而不提拨分文建设公立义务学校,徒言禁止童工工作,利害恐仅足相抵也(码头捐为全国进出口货商所负担,且须征之华界,如移作公立义务学校经费,最为公允)。

(《民国日报》1925年6月1日)

**总商会函请银行公会,将宣言书转送外人,
使其“主持公理”**

径启者,本会及各团体联席会议抗议工部局提出增收码头捐、印刷物附律、交易所领照等案,公决刊印宣言书。兹已印就,特检呈□份,务祈分致贵会各商行,请其各就相熟洋行西人及日人各转送一册,并请其直接或间接使纳税人主持公理,打消以上各案,藉敦华洋商人之友谊。事关重要,而纳税人会于六月二日即须开会,务请迅即进行,是所至禱。顺颂台祉。

上海总商会启 五月廿九日

(上海银行公会档案)

工部局华顾问函促工部局严重考虑各商业团体的抗议

径启者,关于贵局准备提交本年六月二日纳税西人特别会议之议案,自第三至第六案,兹将上海总商会暨其他二十九商业公团一致抗议之意见书一份,随函附上,至希察阅。同人等以贵局华顾问会委员之地位,对于该书声述之意见,亦表赞同,深愿贵局于此项议案提交该会议核准之前,先将抗议事项,予以严重

考虑,是所切盼。此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书记鲁和。华顾问许建屏、宋汉章、袁履登、吴蕴章、罗芹三同启。

(《民国日报》1925年5月30日)

工部局被迫表示将“严重考虑”

工部局召集纳税西人特别会,将议印刷附律、码头捐、交易所注册三案,极为中国商工各界所注意。前日特由华顾问等提出抗议书,申明中国方面反对意见。兹闻工部局总办鲁和氏昨已答复华顾问,略谓接诵尊函,并收到总(商)会暨二十九团体之抗议意见。关于印刷附律、码头捐、交易所注册三案,当再严重考虑,云云。

(《民国日报》1925年5月31日)

肆、顾正红惨案和上海各界 人民的抗议运动

一、顾正红惨案和日商纱厂 工人的反抗斗争

(一) 日本厂主不履行二月罢工的复工条件， 加紧压迫工人，各厂陆续罢工反抗

二月罢工胜利后，工会组织蒸蒸日上^①

工会仍在潭子口存留，由刘华同志主持。刘华同志便是在此次罢工中训练出来的，他原系一印刷工人，后来入上海大学附中做半工半读学生，在此次罢工中表现异常勇敢勤劳，而且善于煽动，于是工人甚为爱戴。此时，我们按各厂企业组织工会，如内外棉纱厂工会，日华纱厂工会，同兴纱厂工会，丰田纱厂工会，大康纱厂工会，公大纱厂工会等等；并于各厂设立工厂委员会（实际上即分工会，于是后来有同志误会说“工厂委员会中国早就有了”，其实它不仅无苏联工厂委员会的性质，抑且无西欧各国工厂委员会的作用），其下并按各工作处组织支部。从

^① 标题是编者加的。

此我们在上海才立下一个空前未有的工会组织基础^①。会务发达，蒸蒸日上。

工会日益发达，在另一方面则引起日本资本家的恐慌。他们以为如果任工人这样下去，那么，那将来的祸患是不堪设想的。厂中纠纷又层出不穷，工会硬出头代表工人利益与厂家交涉。工会的用意，是这样办成习惯，即使工会在条文上未得到明白的规定，但在事实上已被厂家所承认。日本资本家于是决心反对工会了。（下略）

（摘自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42页）

这一次的胜利^②，使工人眼中的工会增长无穷的价值，所以在最短期间内工会运动发展极快，工会分子由二千增加到一万人。

（摘自赫莱尔著、东篱译《中国民族运动与劳动阶级》，广州国光书店1926年印行）

厂主蓄意破坏工会，出钱组织御用工团

曹家渡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为联络感情起见，特组织一工业〔人〕友谊会，赁租房屋，由厂主方面助款。兹已择定劳勃生路大旭里设立会所，由朱启桢筹备一切，定今日上午十时开成立大会云。

（《时事新报》1925年4月12日）

① 有关工会组织发展和扩大的情况参见本卷第460—463页。

② 指二月罢工的胜利。

日商内外棉纱厂第三、四、十三、十四等厂工人,组织工人友谊会,筹备已久。该会昨日午后二时在劳勃生路大旭里开会,到四十五人。公推朱启桢主席,报告开会宗旨,略谓近年工人与厂主时因误会,酿成工潮,此种原因,实以工人无正式团体,受人利用所致。本会宗旨:一、联络感情,谋工人幸福;二、谋厂主与工人互助;三、增高工人地位;四、预防假借之工会团体煽惑工人,云云。沈达卿提议选举,结果叶金山、汤志忠、荣俊生、朱启桢、马文义等为理事。末由主席报告经费问题,谓厂主方面情愿资助云。至五时散会。

(《时事新报》1925年4月14日)

日驻沪总领事函警厅“防范”罢工

淞沪警察厅昨日通令所属文云:

案准驻沪日本总领事矢田函开,五月一日,即谓劳动纪念日,在本埠各工厂工人似有何等计划。惟闻上次罢工风潮发生之日本人设立之纱厂,将于是日亦有开始罢工风说。此说如确,贵厅非于事前厉行格外之取缔,恐再酿成不幸之事实。为特预先声明,专函奉达贵厅长请烦查照,从速设法防范,以免扰害,而保治安等因。准此。除函复暨分行外,合行令仰遵照,一体严加防范,是为至要。

(《民国日报》1925年4月30日)

工会根据复工条约提出三项要求，厂主无理拒绝

前日为劳动节，本埠各纱厂加紧戒备。日商内外纱厂工人会于（四月）三十晚向公司方面提出要求三项：一、二日发给工资；二、工资零款照大洋计算；三、五月一日午后停工半日。从来工资系于满期二周后发放，上次罢工解放〔决〕后，约定四月十日前之工资于十八日发放。公司方面对工会此次要求，因二日为星期六，一日之内，难筹巨款，允改于四日发给，后二条未与应允。该厂前日工作初颇不安，后幸无事。

（《民国日报》1925年5月3日）

四月三十日夜间，共产党人在闸北潭子湾大丰纱厂旁边的东洋纱厂工人联合会中秘密集议；同日夜十时左右，以内外棉、日华、同兴的失业工人为主的代表数名，突然来到内外棉第五厂，提出下列三条要求：

（一）工资依照契约，每两星期发放一次；（二）工资全部按大洋计算；（三）五月一日劳动节许可休假半日，不扣工资。

对于上述要求条件，会社方面说明在总商会所订的契约中，系在订约后两星期内发放工资，对其他两条也各加以解释；并约定在五月一日再度会商。但到一日清晨，有与昨夜不同的代表二十余名蜂拥而来，不问契约如何，坚决主张上次的工资发放日期应从四月十八日算起（比预定早四日），在五月二日发放；并威胁说，如不实行，将来不论引起任何事态均与彼等无关。同时，携带有煽动罢工传单的一群人，开始大量散发传单；工厂内的不良

分子也起而响应,午饭后即行罢工。会社方面立即请求官方加以警戒,同时努力对工人进行镇压。结果,双方成立协定,会社方面将发放日期提前一天,在四日全部发放。事件暂告解决。^①

(译自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编《我国纺织业罢工事件与五卅事件以及各地的动荡》第一辑,第113—114页)

内外棉第十二厂工人罢工

过去上海日商纺织会社的罢工事件,从工人的立场来看,是没有获得成效即告终止的,因此以后包括沪西工友俱乐部、日华纱厂工会、杨树浦工人进德会、内外绵纱厂工会、印刷工人联合会、机器工人俱乐部、同兴纱厂工会、金银工人互助会、上海店员联合会、大康纱厂工会、裕丰纱厂工会等在内的共产派劳动团体的蠢动迄未停止;或者是否将以五一劳动节为期,又复出以某种不稳的行动,各方面对此已不断加以严重警戒。果然,从五月一日早晨起,内外棉第十二厂的气氛即告不稳,险恶的程度随时增加,终于不得已从正午到午后二时止,停工两小时。

(译自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编《我国纺织业罢工事件与五卅事件以及各地的动荡》第一辑,第113页)

内外棉第八厂工人罢工

本月四日本埠内外纱厂第八工场之粗纱女工四十名,突然要求增资,午后细纱部工人百余名亦起而响应,形势颇恶,阅时

^① 原标题为《提出要求条件,双方交涉颠末》。

即全厂停工矣。至夜间细纱工之一部赴沪西工友会^①请求援助，因无结果，遂于同夜十二时许无条件复业。至五日正午工部局外人巡视工场，工人有投以木管者，外人即痛殴之，于是骚扰又起，工作复停。工人提出要求十条，其重要者有四：一、一等工（五角三），二等工（五角二），三等工（五角一），四等工（四角八）之现行制（度）须废弃之，而以五角二分为标准；二、捻纱工资须由五角增至七角；三、一月前解职之工人须仍雇用；四、养成工之工资须与普通熟练工同样支付。

厂中对于工人代表逐条加以解释，似已谅解。

（《纺织时报》第208号，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1925年5月7日）

第十二厂的罢工事件虽然暂告解决，但以后工人的暗中活动仍未停止，继续在闸北潭子湾大丰纱厂旁边的东洋纱厂工人联合会内，以共产派的重要人物刘华为主，连日进行秘密商议。因此各纺织工厂都竭力严重警戒。四日，内外棉第八厂粗纱女工四十名从早晨起又开始怠工，要求增加工资；到午后，波及细纱部，工人百余名怠工，形势渐次恶化，第八厂终于不得已全部工人约一千名停工。他们当时并未提出任何统一要求。罢工以后更形恶化，六日早晨的换班工人从早晨起就不断骚动，到午前十一时左右，细纱工全体停工，被细纱工威胁的粗纱工也参加进去，形势渐次不稳。因此该厂于午后二时命令全体工人退出，表示强硬的态度。在此以前的五日，曾由所谓沪西工友会的代表

^① 即沪西工友俱乐部。

提出要求十〔四〕条,经该会社说明后,当可充分谅解,但在六日又提出同样的条件,向会社方面争论。所谓十〔四〕条的主要内容如下:(内容与前条《纺织时报》同,从略)

以后他们继续怠工,会社方面惟恐发生动乱,决定采取断然处置。七晨召集工人,通知他们:不欲就业的,可离开工厂;打算和平常一样工作的,可留在工厂就业;假若全体拒绝就业,则停止开工。其后粗纱、细纱两部都开始操作。①

(译自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编《我国纺织业罢工事件与五卅事件以及各地的动荡》第一辑,第115、116页)

同兴第一厂工人罢工②

同兴纺织第一厂罢工事件的原因是由于解雇了无工可做的铁工二名。但正在窥伺机会的工友会,遂乘机要求将该两名工人复职。会社方面虽然约定在四日午后二时予以答复,但工会仍煽动工人,从四日午前九时起到十二时半左右停止操作。会社方面允许将两名铁工复职,得告解决。

(译自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编《我国纺织业罢工事件与五卅事件以及各地的动荡》第一辑,第120页)

日华第四厂工人罢工③

曹家渡日华纱厂第四厂工人突然在五月五日提出立即发放

-
- ① 原标题为《第八厂关闭》。
 ② 原标题为《同兴纺之罢工事件》。
 ③ 原标题为《日华厂工人提出要求条件》。

应在七日发放的工资，操作一度停顿，酿成骚扰，以后仍继续出现不稳的状态。一部分工人在骚扰中尚能比较安心操作。到五日深夜为止，在沪西工友会秘密商议的工友会职员，于六日午前向日华纱厂提出四条要求，大意如下：

一、按照过去内外棉会社的契约，工资发放日期提前到与内外棉同一日期；二、不请假奖金，每两星期发给两日；三、星期日休息。此外尚有一条。其中不请假奖金问题，大约到一年前为止，都照上列规定实行，以后减为一日；但现在实行日夜班，已发给三日的奖金。所以会社对上述要求断然予以拒绝。以后虽多少有所不稳，但未酿成大事故。

(译自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编《我国纺织业罢工事件与五卅事件以及各地的动荡》第一辑，第120页)

内外棉第三、四厂工人罢工

内外棉第三、四厂工人自七日晨起，亦皆惰气弥漫，无意作工。至十时许提出要求三件：一、增加工资；二、粗纱部增置落纱工；三、细纱部增添安置木管工。厂中竭力劝之工作仍无效果，午后第三厂全部停工，二时许第四厂工人亦全部出厂。厥后有自称工友会代表者到厂求见当局，卒遭拒绝。至六时许交班时，夜工到者虽未减少，然进厂后三五成群，各自集议。厂中劝之作工，则以工友会要求未遂不复作工为答。二厂四千工人至此遂完全罢工矣。以现状论，尚有波及他厂之虞。

(《纺织时报》第209号，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1925年5月11日)

日商内外棉纱厂第八厂罢工风潮,已告结束,惟第三第四两厂于七日下午四时,复继续罢工。该厂第三厂工人,约三千七百余人^①,第四厂计四千余人^②,同时息业。厂址均在公共租界,由戈登路新巡捕房派包探陈广义及西捕弹压,秩序尚佳,但同时各厂均有不稳消息。昨午该厂经理冈田氏,特至淞沪警察厅谒常厅长,请设法维持,由行政科张科长代见,允转达厅长。又据该厂职员称:工潮日形扩大,一、二日内恐不易解决云。

(《民国日报》1925年5月9日)

内外棉第十五厂工人罢工

前日(九日)第十五厂工人,因该厂发给赏银不照大洋,更改成例,遂即怠工。昨日停工男女工人约数千人,陆续赴潭子口三德里工友俱乐部筹议条件三项:

一、储金赏满小洋十角者,应据原例,照发大洋一元;二、怠工时间照常发薪,不得折扣;三、遵照商会原约^③,不得无故开除工人。

推举代表盛松林、李瑞清,向冈田磋商,卒被拒绝。闻工会方面,竭力主张调停,力劝工人于今晨一律上工,以顾厂家营业,所有条件从缓磋商云。

(《申报》1925年5月11日)

①② 据统计两厂合计约三千余工人,此处数字恐有错误。

③ 指二月罢工时在总商会签订的复工条约。

当罢工气势顿告缓和之际，十五厂工人八百名突然从九日上午七时起开始怠工，因此会社方面不得已命令退出工厂，但他们不理，形似煽动者的男女，在工厂内及工厂外阻止工人退出工厂。工厂内成群拥集，骚扰达于极点。普陀路捕房捕头亲自出马，指挥西捕、印捕、华捕多名，担任警戒。终于在上午十时半左右强迫工人退出工厂，情形颇为混乱，但夜工则照常操作。在此以前，他们在潭子口三德里工友俱乐部议决下列三条，并向会社方面提出：（条件与前条《申报》同，从略）但该项条件被会社拒绝。^①

（译自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编《我国纺织业罢工事件与五卅事件以及各地的动荡》第一辑，第119页）

日本厂主决议排斥工会，以高压手段对付工人^②

上海日本纺织同业会^③于五月七日在日本人俱乐部开会，会上认为对罢工工人的抚慰态度，必然形成承认工会的结果，则将贻祸于将来。由于这一意见占多数，最后决议如下：

（1）最近主要在主义者^④指挥下的工会，强制多数工人参加，每有机会即引起纠纷。根据这一理由，日本纺织同业会不能承认此种工会。工人如有要求时，可直接向会社提出，同业会与此类工会一无关系。（2）假如由于这一决议的结果，工会有唆使工人罢工之事，同业会坚决采取强硬态度，得断然处置，关闭工

① 原标题为《第十五厂之怠工骚动》。

② 原标题为《纺织同业会议决对不纯正的工会不予承认》。

③ 即日商纱厂联合会。

④ 指共产主义者。

厂。(3) 关于上述第二项决议, 应与上海工部局及中国官宪交涉, 以求充分取缔煽动者及工会的活动。

(原注: 对中国官宪, 已由日本总领事交涉; 对工部局已由同业会及总领事进行。)

(译自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编《我国纺织业罢工事件与五卅事件以及各地的动荡》第一辑, 第 121—122 页)

《大陆报》云, 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罢工潮, 昨又蔓延第十五工场, 罢工者约二千人。据该会社上海经理冈田氏言, 现有三所工场罢工, 人数共五千五百名。又据该会社职员及厂主联合会人员言: 此次风潮, 虽不致如上次之大, 但恐在解决前, 尚有数厂加入。

昨日厂主方面仍坚决不与工人磋商, 对于增加工资之要求亦不让步。冈田氏称, 内外工资已较他厂为优, 有数方面且胜过本埠华洋各厂, 工人不能再有奢望。外间谣传工潮由于(过)激党宣传之结果, 更有谣称由于华商所指使者, 皆不可信。此次实因去冬大罢工^①后, 工人方面犹未稳定之故, 现有许多证据表示罢工首领即上次之激动风潮者。工人离厂时, 未起暴动, 亦无示威举动, 故无请捕房保护之必要。宜昌路之第三、四两工场及戈登路之第十五工场, 现均闭门。三、四两工场工人于上星期四(五月七日)已允星期一(五月十一日)回工。第十五厂工人昨晨(五月九日)罢工。若辈表示不稳定状态后, 立于上午九时许离厂。第十二及第八工场自上星期一(五月四日)闭门后, 均于昨

^① 指二月罢工。

晨回复工作。就目前论，工潮蔓延迟缓，渠辈不难应付；所可虑者，惟恐三万工人一时罢工，出于渠辈控制之外，云云。

(《申报》1925年5月11日)

本年二月上海纺织工人罢工结束后，赤化分子依然继续活动，该地劳动界的风潮益形险恶。四月底内外棉工人因要求五一劳动节放假半日并发放劳动节以前的工资未被容纳，而形势更加不稳定；加以会社方面因将工资改为根据生产数量多少而计算发给的包工制度后，结果工资有所减少，不熟练工遂大为不平。他们见青岛纱厂罢工工人能与会社对抗，气焰大为高涨，终于受共产党系统的工会所煽动，而要求增加工资，并决定罢工。

五月四日晨，第八厂首先开始怠工，使工厂不得不因之停工。会社方面含糊接受工会的调停而表示妥协态度后，至五日即告复工。

但各会社联合会^①于七日举行会议的结果，认为该地纺织工人的长期不稳定，是由于工人以外的共产党人组织工会，在工人中募集资金以及每事必企图引起纷扰之故。目前如不加以排斥，则工会基础有更形巩固之虞。故今后各会社约定凡关于工会与公司间的问题，断然不与工人以外的人交涉。若有煽动工人罢工等事，则断然关闭工厂，以持久战对待；并决定尽量采取强硬态度，开除不良分子。由于会社方面表示了这样强硬的态度，工会首脑人物在这样形势之下，认为目下不是罢工的适当时

^① 即日商纱厂联合会。

机,而决定延期到今年秋季。因此,从十一日起全部无条件复工。

(译自日本外务省档案显微胶卷第575卷

MT 5.3.2.155—10,第50—52页)

上海日文报纸报道工人暂行复工情况

《上海日报》云,本埠日商内外纱厂之罢工风潮,因青岛工潮有终熄说,气势大弱。现第八工场已照常上工,其在九日息业之第十五工场,自是晚六时夜工更替后,已复常状。又在最不稳状态之第三、第四两工场工人,亦因公司态度强硬,锁闭工场,于十日晚请求无条件上工,亦于翌晨日工更替后完全上工。各工厂俱以无条件圆满解决,如常开工。又第五工场职员白井、高山两名,前为第三工场罢工团殴伤,现已就痊。弥漫沪西纱厂之息业风潮,因内外厂罢工解决与青岛工潮解决,遂均复常状云。

(《新闻报》1925年5月13日)

《每日新闻》云,自五月一日劳动节内外纱厂第十二工场工人开始息业,其后十日内,渐次波及同兴厂第一工场、日华厂第四工场、博〔溥〕益厂第二工场、内外厂第九〔八〕、第三、第四、第十五各工场。纱厂工人息业事,一时颇堪忧虑。其后沪西工友会内部发生内讧^①,加以资金通融困难,大部分工人,因罢工事颇感痛苦,且市况与期望相反,罢工团忽大软弱。罢工事件,昨遂无条件解决,各工场齐行开工。工人上工者既众,工作亦极静稳。

^① 此系日文报纸无中生有的挑拨之词。

在罢工解决前一日，即前晨(十日)九时，罢工工人及沪西工友会干部曾在该会开协议会，决议上工。其时有主持该会之刘华、邓中夏^①即席演说，谓目下原棉价高，制品甚廉，我侪要求，不易贯彻，可待八九月新棉上市，纱厂营业顺利，再乘机要求，云云。此次罢工无条件解决，公司方面仍持强硬态度，昨日内外纱厂将第十五工场内煽动罢工者三十一名，又第三工场一名辞退。又日华纱厂亦辞退第三、第四两工场工人二名。又内外纱厂于发见上工工人征收沪西工友会会费时，即行辞退。又内外纱厂此次罢工之损失，合有形无形两项计之，其额甚大。该社现正从事调查。据其副社长川村兼三氏谈今后之政策云：罢工次数既多，工人之罢工，亦渐巧妙，此后对于工人，拟充分优遇，一方兼明赏罚，赏其善良者而罚其不良者，力加善导。此非惟公司方面之利益，工人自身，亦可向上。依此次罢工，已略知工人意思所在，云云。

(《申报》1925年5月13日)

(二) 顾正红惨案

为日人惨杀同胞顾正红呈交涉使文^②

内外棉纱厂工会

为日人残暴逞凶枪杀工人请向日领严重交涉惩办凶手、赔

① 邓中夏同志于一九二五年四月离沪去广州，筹备并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后留广州工作。文中说五月十日邓中夏同志尚在上海主持会议，此说待考。

② 该呈文当时以传单形式散发。

偿损失以崇国体而平众愤事。窃日人在我国各处开设工厂，掠我财货，剥削汗血，虐待工人，种种横蛮不法之事，已属共见共闻。而上海日人工厂尤为残暴，打骂工人，调戏妇女，视为常事。工人因虐待而死亡，妇女因羞辱而自杀者已屡见不一。工人不胜其愤，以致酿成上次日人各纱厂之大罢工。后经钧使、警察厅、总商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等竭力调解，日人理屈，始在总商会签定条约四项，承认以后再也不打骂工人，不无故开除工人，并发还储蓄金等。工人等以为此后或少遭欺压，安心上工。不料复工以后，日人虐待，反变本加厉。日人监工入厂，皆携带铁棍手枪。工人偶一不慎，即遭棍击。罚款之苛，数倍于前。刻克〔克扣〕工银，更有奇法。工人等所得工资赏钱，均系大洋计算，日人发给时，对于尾数，只给小洋。譬如尾数为九角九分，只给小洋九角铜元九枚。苛刻之酷，有如此者。而收买流氓，捏造谣言，侵犯工人团体，违背条约，开除代表，破坏工人组织，种种无理压迫，更与工人以难堪。各厂工人积愤不平，屡欲停工，均为工会劝以委屈求全而止。不意本月十日以后，日人更积极压迫，三日之间，无故开除工人代表三十余人之多。本月十四日又无故开除十二厂代表多人，工人等据理质问，日人竟横不讲理，手持铁棍乱殴工人，受伤倒地者五人。又即招巡捕驱逐工人，工人无法，只好四散奔逃。当时各厂工人均欲停工，又为工会劝止。翌日（十五日）各厂工人照常上工，日人藉口无纱，将七厂织布厂锁闭，不让工人进厂。工人要求照发工钱，又不许。后经捕房捕头调解，始允给以五点钟工值。本日下午五时，晚班工人又照常上工，日人仍将七厂锁闭，不让入厂。工人要求照日班办法，发给工值。日人

毫不讲理，手持铁棍乱殴。而内外棉副总大班元木，七厂大班川村，竟乱放手枪，当有工人二人中弹倒地，工人四散奔逃。同时东(五)厂、西(五)厂、八厂各厂工人，闻讯赶出解劝。日人竟聚集各厂职员三十多人，并厂中应〔雇〕用之印捕数十人，或持手枪，或持铁棍，向工人乱放乱殴。当时受伤倒地者多人。日人还将小刀在受伤者身上乱戳，流血满地，惨不忍睹。工人赤手空拳，无以自卫，只得将受伤者扶出，送捕求验。后经捕房将重伤者七人送同仁医院医治，均有伤单可查。手折头破者更(有)数十人，尚不在内。中有女工十余人，十四岁以下童工十余人。日人惨杀之毒，有如此者。血衣血裤尚存工会，以供查验。现顾正红一人，因身中四枪，弹穿肠腹，无可医治，已于本月十六日下午二时殒命^①。工人等专恃工作为活，日人毫不宣布理由，锁闭工厂，拒绝工人上工，是欲陷工人于饥饿。工人要求发给工值，自系正当理由，日人竟任意殴打，集众开枪，直视工人如盗匪，如亡国奴隶。不仅欺压工人，实为侮辱我国国体。群情愤激万分，已向日人提出要件八款。限期(答)复。伏乞向日领严重交涉，要求惩办凶手，赔偿损失，承认工人等之要求，以平众愤而崇国体，实为德便。谨呈。

内外棉纱(厂)工会代表刘贯之、陶静轩
暨全体工人二万五千人呈

(原件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① 另据《民国日报》五月十八日报道，顾正红同志在五月十七日晨七时气绝。

顾正红被杀伤时的惨状

当日人团〔围〕击时，工人赤手空拳，只得四散奔逃。其时顾正红足部已中一枪，尚思向右逃避，而在左之日人迎头向其腹部打一枪，即扑于地，尚未死，起而反奔，头部又中一枪，还要勉强逃命，但已神志昏迷，抱于树上。日人追至，见其未绝，又击一枪，并以铁棍击及其头，即时晕绝扑地。日人尚以毒刀刺之二三下，后经送至医院，未几即死。呜呼惨矣！

(《血潮日刊》第一号，上海学生联合会，1925年6月4日)

《时事新报》的报道

肇祸原因 自上次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罢工解决后，日商与工人间即订立一种条约，双方签字，以昭信守。詎日人则每藉端为难，条约之履行者不多觐，近则时常藉故开除参与上届工潮之工人代表。昨日第十二厂中有六人忽被开除，工人愤甚，始有罢工之举。外传此次风潮起于工资问题，实非真相。

肇事情形 十二厂既罢工，其余别厂工人则工作如故。詎第七厂工人正拟前往工作，日人不许，工人以并未参加罢工，岂有拒绝工作之理，乃群起质问。无如日人并无充分理由答复。工人见无理可喻，乃要求发给工资，然后回去。时工人愈集愈众，一致为坚决之要求。詎闻有该厂小大班川村者^①，及其余职员，突以手枪向工人轰击，当场中弹身死为顾正红（江北人，三十余

^① 枪杀顾正红烈士的凶手为元木和川村。

岁^①)、王福全,受重伤者四〔三〕人,为周阿大、吴阿四、徐阿平〔炳〕,较轻者尚多^②。无何,日人复以电话报告巡捕房,谓“有工人扰乱纱厂,请速派得力探捕前来弹压”,未及半小时,华印探捕各十余人武装驰到,如临大敌,然已在日人放枪之后。工人见此,愤激益深,坚聚不散,印捕乃亦放枪,意在驱散工人,詎枪弹适中潘姓女工。当时西捕多人亦在场,捕房方面旋拘去工人五六人。是役日人方面绝未受伤,厂中器具等件亦无被毁者。事后乃由普陀路捕房派西捕多名,雇坐黄包车送至公共公廨,由驻廨捕头电告中国红十字会驱病车到廨,将受伤工人,车送医院疗治;因伤毙命之工人尸体,已由西捕舁送斐伦路验尸所,候报请公共公廨中西官相验。

(《时事新报》1925年5月16日)

在枪杀中国工人中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上海市民之威吓

若 飞^③

在外国政府统治下的上海人民,已经与亡国奴无异。说话不自由,行动不自由,开会不自由,处处都受着外人枪尖、铁棍的监视。最近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日本人无故拒绝工人做工,工人

① 顾正红生于一九〇五年,时年二十岁。

② 《民国日报》五月十七日关于会审公廨审讯的报道称当场未有中弹身死者;受伤者共十一人,即顾正红、黄福堂、胡培良、胡培洪、吴阿四、王小龙、周阿大、徐阿炳、周阿三、高阿二、丁阿三等,全数被押往捕房;当场被捕者还有徐书林、王明左、万开元等三人。重伤者四人,即顾正红、胡培良、吴阿四、黄福金。王福全或黄福堂都是黄福金之误。

③ 即王若飞同志,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与之理论,他们遂拿取铁棍乱打,纵以手枪轰击,杀死工人顾正红,重伤轻伤不计其数,致激成七千多纱厂工人的罢工,这是何等一件重大的事变!然而上海的中国人们,多噤口不敢过问这个问题。我们试一细察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此事件中所施的威吓伎俩,是非常凶恶险狠的。

第一,在日本人枪杀工人后,又向工部局调遣大队巡捕到场弹压,向被杀伤的群众示威,并捕去工人多名。

第二,日本总领事矢田立即通知中国官厅,要求充分取缔工人行动,若中国官厅无力应付,将自行派兵来华镇压。

第三,遣人警告上海各中国报纸,不许登载有利于工人的消息或宣传,倘不遵守,即将以封闭及逐出租界等事为对付,以致各报皆不敢尽情披露日本人在此事变中之野蛮横暴行为。

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这样严重的威吓之下,于是遂使此次惨杀的呼声,不能充分传入人们的耳鼓。上海的新闻记者和上海的商人对于此事的态度是:“我们知道日本帝国主义者非常可恶,但我们是没有办法。”两句话实可表现饱经帝国主义威吓的小资产阶级怯懦心理。你们竟真无办法么?你们竟永远甘受帝国主义的摧残和奴视么?你们不想解除这颈上的锁链么?如若不然,应该赶紧起来援助工人的奋斗,应该施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如抵制日货、募款援助等——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凶暴。你们应该知道这件事变不是单独发生的,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民众新进攻的许多动作中间的一件。

上海市民对日外交协会各团体已成立日人惨〔残〕杀同胞雪

耻会，学生联合会及文治大学、南方大学、上海大学学生均已奋起募捐演讲，为罢工工人后盾，(这)是很应该的。但是若使工人的后援仅止于学生界及少数团体，则大资产阶级、士绅阶级和新闻记者之漠视民族斗争的冷血态度，不仅为劳苦群众所仇恨，凡有血气者将莫不齿冷而鄙视之！

这次罢工工人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虽十分艰难，然而他们奋斗的勇气却非常之高。于此可见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中，确实是这个革命的先锋队。全中国的工人和农人应一致维持这次罢工，领导中国民族革命的国民党应对于这种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罢工有具体的实际的援助！

(《向导周报》第 116 期, 1925 年 5 月 24 日)

内外棉会社的歪曲报告^①

会社在五月十四日开除第十二厂不良工人两名。中国工人五名同情被开除者，猜想这事是某中国工头向会社说坏话所造成的，遂把他打伤。这五人被工部局巡捕房逮捕监禁，训戒一番后释放。他们素来不良，当日曾煽动别的工人停工，因此，把这五人开除。当夜(五月十四日)第十二厂全体夜班工人要求把被开除者复职，用怠工手段拒绝工作。于是从十五日起不得不把第十二厂关闭。

第十二厂是纺第七厂用纱的厂，第七厂再把纱织成布。故第十二厂罢工，第七厂也必然不得已而关闭。

^① 原标题为《第二次罢工·五月十五日》，上海内外棉会社发表。

十五日晨,会社方面对第七厂来上工的工人说明情况:第十二厂已经关闭,第七厂没有原料,不得已停业;本日虽然没有工作,还是给与半日工资。工人要求全日工资,会社方面努力向他们讲理,他们总不同意。不得已,请普陀路巡捕房捕头弗拉莱来厂,说明会社的意思,他们才退出工厂。

会社看出工人没有从事工作的意思(当然由于工会职员出的主意),进厂而不工作,只要求工资,决定正式关闭第十二、第七两厂。十五日午后二时在厂门口贴出通告如次:

大家已经知道第十二、第七厂从昨日起不断罢工怠工,人心不稳。该两厂今明两天日夜班全部停工,必要的办法以后再行订定。

还有三个厂(第五东、西两厂及第八厂)与第十二、第七厂的纷扰毫无关系,照常开工,但是人心动摇,短时间怠工了数次。

十五日晚,日籍职员配备于厂门的附近,以备万一。第十二、第七厂停工的事已经通告过,但是为了慎重起见,对于来厂工人告以停工,勿入厂内。

起初,三个厂^①的工人进厂完毕时,即下午五时三十分,第七厂工人约七十名(男工四十、女工三十)集于门前,强欲入厂。日本人在门前说明情况。然而他们以暴力破坏厂门,推开警戒中的日本人十数名及印捕二名,强行入内;更打破第七厂东北门,闯入厂内,破坏物料间的门锁及门户,手执棍棒(长约三呎,有圆

^① 指未关闭的东五、西五两厂及第八厂。

形把手,棒端有角)挥舞,一路叫喊,向日本人进攻。职员清水被打伤就是在这个时候。那时,有无赖多人要想破坏大门闯入,日籍职员及印捕前后受敌,尽力镇压暴徒,遂在第七厂东面的空场附近发生冲突。由于暴徒凶猛,极其危险,印捕以枪威吓,也没有效果,印捕及日本人为自卫计,开了枪,结果工人负伤六名,其中一名(顾正红)两日后死于医院。

第五东、西两厂工人约一千五百名听到发生争斗,要想加入,情势益加危险。有数名西捕及华捕驰到,与日本人共同镇压工人,由于工人人多,无法下手。工人们肆意破坏机械,损害达五万两。女工害怕男工的暴乱,从南面入口向外逃避。那时,有大批暴徒要想从南门破门而入。日本人数名竭力警戒,又有西捕应援,才得无事。

不久,第五厂大部分工人要想从北门参加战斗,北门附近印捕想把他们驱逐到东北角去,但没有来得及,遂向暴徒开枪,女工一名颈部受了轻伤。

上述的骚动在短时间内同时发生,其混乱状态不堪想象。在这危急的时候,日籍职员立刻用电话报告普陀路巡捕房,不幸在这时以前附近有火灾,西捕大部分不在捕房内,等到他们来厂,虽然事件已经过去,但仍与日籍职员协力镇压,历时一个钟点,始恢复正常,将工人全部逐出工厂。在争斗中负伤者不愿受日医的治疗,由友人相助,抬到医院去。事件发生地点一般称为内外棉第五厂,其实尚有第七、第八及第十二厂。(下略)

(译自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编《我国纺织业罢工事件与五卅事件以及各地的动荡》第一辑,第217—222页)

《民国日报》刊登的死伤工人名单

前(十五日)晚被日人枪击之工人,计第七厂:一、顾正红,江北人,第一三二五号,身中四枪,已于昨晨七时身死,经同仁医院送往验尸所检验;二、吴阿四,南京人,一三〇六号,刀伤;三、黄福金,常州人,二〇三五号,枪伤;四、周阿大,常州人,一三〇五号,枪伤;五、徐阿平〔炳〕,无锡人,一三〇九号,头伤。第五厂:六、李小龙,江北人,二〇六号;七、潘女工,三二二号,枪伤头部。第十二厂:八、董阿四,江北人,头部打伤。又轻伤无数。

(《民国日报》1925年5月18日)

顾正红烈士塑像碑文

顾正红烈士,一九〇五年生于江苏阜宁,牺牲前在上海日商内外棉第七厂,即现在本厂所在地做工。一九二四年秋,中国共产党人邓中夏等在沪西开展工人运动,组织日商纱厂工人于一九二五年二月罢工,要求改善待遇和反对日本资本家打骂工人。顾正红同志在这次斗争中锻炼成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年五月,日本资本家拒不履行二月罢工时的协议。顾正红同志就在五月十五日带同工人到厂交涉,竟遭到日本资本家的枪击,因而英勇牺牲,死时才廿岁。

顾正红烈士的横遭杀害,燃起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怒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伟大的“五卅”反帝运动就以顾正红事件为起点而爆发了。

顾正红烈士的血没有白流。多少年来,千万个为中国革命

事业而英勇牺牲的战士,以自己的热血,灌溉了鲜艳的革命胜利之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历尽艰难曲折,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现在我们在这里树立顾正红烈士的塑像,使我们瞻仰先烈,知所奋发。

中国共产党上海国棉二厂委员会

1959年5月

(三) 内外棉纱厂工人愤起罢工,强烈抗议 日人残杀顾正红,吁请各界援助

内外棉第五(东、西)、七、八、十二厂工人愤起罢工

昨夜工人群在某方集议,鉴于工人无端受此巨辱,死伤多人,愤怒不平,议决东五厂、西五厂、七厂、八厂,连同昨日罢工之第十二厂工人,均于今日起一律罢工。一面声请各方援助,以伸公理。

(《时事新报》1925年5月16日)

此次内外棉纱厂二次罢工风潮,形势严重。昨日第五东西两厂及七、八、十二等共五厂,罢工工人约两万余^①,在潭子口三德里工会开会集议,组织委员会,分:

一、纠察队 每厂五队,每队十人,均以工人代表任之,维持工人秩序;

^① 据统计,该五厂罢工工人约七千人左右,此处数字恐有错误。

二、交际队 推刘贯之等十人为交际,与各团体接洽援助;

三、救济队若干人,向各方募集经费,补助受伤工人及其家属;

四、演讲队演讲员若干人,担任演讲,开导工人,谨守秩序,勿宜暴动,静候工会交涉,故其秩序尚佳。

(《民国日报》1925年5月17日)

内外棉纱厂工会宣言(传单)

全国各工会各学校各报馆转各界父老兄弟姊妹们呀!

我们上次因受东洋人压迫侮辱,不得已而罢工,后来沪上官厅、商会再三调停,在总商会签定条约。敝会数万工友忍痛入厂,照常工作,以为此后或可少遭打骂侮辱。那想到从三月以来直到于今,东洋人无时无地不是破坏我们的条约,欺骗我们做苦工的。我们的条约要两星期发一回钱,东洋人偏要改为每月五号和念号半个月才发一次。我们的条约要不准无故停人罚钱,现在竟又无故开除三、四、七、八、十二、十五各厂二十余人。打骂侮辱,仍旧一样,并且买走狗,造谣言,破坏我们工会的组织。米粮这样昂贵,东洋人不但加薪水,而且任意克扣,工钱本是大洋,现在领工钱的尾数,那怕是九角九分几,他只有九角小洋,九枚铜子。这是〔岂〕不是剥我们的血肉吗?各厂工友久已愤不可遏,屡欲罢工,工会均竭力遏止,并用极诚恳的好意派代表与厂中交涉,希望他稍有觉悟。那知东洋人仍蛮横无理,毫不容纳;工会为息事宁人计,还是劝工友安心上工。哪知到了昨日(十四

日),一点事情都没有,东洋人硬要停我们十二厂代表的生活。车间里兄弟姊妹们都气愤不平,据理质问,乃东洋人强不讲理(弹花间长日工东洋人),拿起铁棍子,就向我们弟兄们头上乱打,可怜鲜血直流,头部破裂。受伤倒地的工友,还被东洋人短刀乱戳。厂中巡捕又将工友拳打脚踢,半天还不能苏醒转来。我们逼到真正走头〔投〕无路,忍无可忍,十二厂的工友才不得(已而)一致停工,静候解决。当时工会还劝其他各厂照常工作,不要乱动。哪知东洋人藉口无纱,将七厂关闭,不准工人上工。工人要求照发工钱,东洋人仍是不理,后经捕头调停,始允发给五点钟的工钱。下午七时^①,七厂内晚班工人因不知道,照旧上工,东洋人又不准进去,工人要求照日班办,东洋人毫不允许,拿铁棍乱打,元木、川村(是东洋人)乱开手枪,并有厂内雇用之巡捕印度人一齐动手。当时有顾正红枪伤腹部,子弹打穿肚肠,周阿大弹穿前胸,徐阿炳头脑打开,现在同仁医院,命在旦夕。其他重伤者十一人,轻伤者数十人,血肉横飞,惨无人道。东洋人视我们中国工人生命,鸡犬不如,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现在已向东洋人提出正当要求八款如下:

- 一、开除并依法惩办肇祸的东洋人——元木和川村;
- 二、赔偿伤亡工友的损失并抚恤其家属;
- 三、以后各东洋人及其用人不准携带武器;
- 四、恢复各厂被开除工友原有之工作;
- 五、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

^① 应为五时。见《为日人惨杀同胞顾正红呈交涉使文》。

六、罢工期间薪水照常发给；

七、分增赏银不准取消；

八、工钱赏钱须一律照大洋发给，不得折扣。

如果东洋人不肯承认，我们激于义愤，势必与之决裂，虽死亦且不顾。

各界同胞们！我们受东洋人压迫侮辱，实在忍不住了，望你们一致起来打抱不平，救救我们呀！

五月十二号^①

(原件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铅印)

内外棉纱厂工人呼吁书^② (传单)

诸位执事先生台鉴：

敬启者，我们上次为受不过东洋人的压迫万不得已而罢工，如今我们回想起来还有十二分的沉痛。自从在总商会我们隐忍含痛的签了条约，兄弟姊妹们一个个安心上工，总想东洋人能遵循这极简单的几条条约，不再欺压我们了。不料到，从三月以来，直到于今，东洋人倒反变本加厉的虐待我们，欺骗我们。我们的条约上要两星期发一关饷，东洋人偏要改为五号到廿号半个月才发一次。我们的条约上不准无故停人罚钱，东洋人还是乱停乱罚，丝毫(不)依章程，不讲道理。而且买走狗，造谣言，破

① 后面《内外棉纱厂工人呼吁书》所署日期为五月十六日，两传单内容大体相同，且有顾正红受枪伤等语，因此，疑为五月十六日之误。

② 原件系油印件，无题，亦无署名。根据内容判断，为内外棉纱厂工人给二月罢工调解人发出的呼吁书。

坏我们的工会。五月四号八(厂)粗纱间,因为东洋人破坏条约,任意打人罚钱,弟兄们不得已才停工,后来东洋人承认了工友的四项要求,大家才安心上工。不料三天还不到,他又破坏条约,无故开除了八个代表。过一天,三、四厂的东洋人又破坏条约,弟兄们愤不过而停工,工会不愿酿成重大风潮,苦苦地硬劝弟兄们安心上工了。谁想到第二天东洋人便阻止弟兄们入厂,口口声声藉故说我们要打机器,便不由我们分辩,拿着铁棍子和手枪乱打乱放,当时就打伤了我们四个人,还(强)要捉我们去吃官司。我们一个个听从工会的话,按照工会下的上工命令,大家忍着痛苦去上工了。哪知道等我们入厂之后,东洋人便把我们的代表开除了。国耻纪念日,十五厂为厂中克扣赏银,破坏旧例(旧例赏银满十角者即发大洋一元),以大洋十角作小洋十角计算,以致激起众工友愤愤不平,大家停工不做,又由工会力为劝阻,并训示各工友一律照常工作。半天还不到,东洋人又无故的开除了三位代表,继续第二天又开除了一位女代表。八厂亦继续开除了两位女代表。——这都是东洋人欺侮我们苦工人的种种事实。现在十二厂也是无故的开除了工人代表两位,车间里一个个兄弟姊妹都为不平,一致关车援助,而东洋人(五厂弹花间长日工东洋人)竟手拿铁棍,向工友乱打。当时就将工友董阿四头部劈开,鲜血直流,昏晕将倒,东洋人尚且不足,又上前用短刀在该工友头上乱戳几下,经大家拚命救阻,东洋人才放手了。当这项恶消息传到了东西五、七、八各厂,弟兄姊妹们都极为愤慨,一致关车停了工作。后来工会为息事宁人起见,不忍酿起大的风波,夜半十一时还派出代表四位到各厂宣布不准停工。第二

天十二厂要求恢复代表的工作，没有上工，但是七厂并无问题，照旧工作。哪知东洋人藉口没有洋纱，竟致关门不准上工了。弟兄们要求照发工钱，东洋人还是不理，后经捕头(六十一号)调停，才承认发给五点钟的工钱。下午七时，^①晚班进厂上工，东洋人又是不准，弟兄们要求照日班办理，东洋人毫不在意，拿了铁棍子便向弟兄们乱打。元木、川村竟乱放手枪，当时就打中了七厂布机间工友顾正红，一连三颗子弹，打伤了他的头部和下身。周阿大弹穿前胸；徐阿平〔炳〕头部破裂，现在同仁医院，命在旦夕了。其他重伤的十一人，伤手、伤脚的数十人，血肉横飞，真是惨无人道！东洋人看我们中国人的性命，鸡犬不如，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工会现在已向东洋人提出正当要求，如果东洋人强不承认，那我们数万工友兄弟姐妹，势必与之决裂。先生们前次替我们作调解人，我们数(万)工友都很感激！这回东洋人破坏条约，恃强欺弱，开手枪打我们工人；不仅是欺压我们工人，竟是侮辱我们的国体。万望先生们同抱义愤，立责东洋人承认我们的条件；不然，我们只有不顾一切的与东洋人拚一个你死我活。敬礼。

诸位先生康健！

谨启(五月十六号)

条件附后(八项条件与工会宣言完全相同，从略)

(原件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① 参见前面《内外棉纱厂工会宣言》有关注释。

加强领导斗争的机构，推定刘华等为负责人

潭子口三德里总工会^①，昨日自上午七时起，各工厂工人陆续到会集议，由工人代表相继发言，语颇沉痛，听者莫不泪下。结果议决推定临时职员如下：

一、总主任 刘华、孙仲英^②、张佐臣；二、庶务：盛松林、李剑如；三、文牍：郭尘侠、徐晋珊、王瑞安；四、外交：刘贯之、陶静轩、李瑞清、朱国平、戴器吉；五、纠察：涂德虚、姜维新、郑天祥；六、女工办事员：吴显清、孔燕南、石锦妹、邓阿二、朱小妹；七、已罢工各工厂主任：周洪章、江银卿、孙杰三；八、非罢工各厂古月三、张应龙；九、救济员：孙仲英兼、石锦妹、董元坤、罗俊卿；十、募捐主任：张佐臣兼、余啸风、冷双喜。

(《申报》1925年5月18日)

内外棉纱厂工会第二次宣言^③（传单）

各界同胞们：

日人虐杀同胞，到处横行，汉口之田贾，长沙之六一，九江之码头工人；东京地震，虐杀华人，更以千计。足见毫无人道，野蛮已极！

现在敝会会员顾正红君又惨死于日人手枪之下，不仅敝会

① 三德里是沪西工友俱乐部所在地，沪西日商纱厂各工会也都设在此地，故报纸上有总工会之称。

② 孙仲英，即孙良惠同志。

③ 原件未注明印发日期。

所深痛,亦即中华民族之奇耻大辱,此仇不雪,国亡无日矣!各界同胞,必深同愤,请以全力为我后援。敝会会员数万人,誓与之奋斗到底,不达目的,虽死不辞!五九奇辱尚存,十五又见惨杀,国耻未雪,何以家为!同胞们!其速兴起!!!

反对野蛮之日人!

排斥劣货!

誓雪国耻!

(原件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工会邀各报记者茶会,说明惨案真相

内外棉纱厂工会以此次发生工潮,隐情复杂,昨特致函各报馆云:启者,此次日人惨杀同胞,殊堪痛恨。我数万工友,平日备受日人虐待,一切真象,外界多不明了,以致我工友有冤莫白,言之殊为痛心。兹定于本星期五日(即廿二日)下午一时,假英租界宜昌路文治大学邀请各报记者茶会,以便详诉一切。届时务请拨冗莅会为幸。

(《民国日报》1925年5月22日)

日商内外纱厂发生二次风潮,因双方相持,迄无解决希望。昨日下午二时许,罢工工人假宜昌路文治大学阅报室,邀新闻界茶话,报告情形。因路途过远,到者不多,由工人代表陶静轩等招待。其报告略谓此次风潮实由厂主无故开除工人代表,及克扣工银尾数,工人数次要害,未蒙允许,以致第八厂首先罢工,渐次延(及)三、四、七〔十二〕等厂。然八〔十二〕厂为纺纱厂,十二

〔七〕厂为织布厂，故十二〔七〕厂向由八〔十二〕厂供给原料。因八〔十二〕厂罢工，厂主遂欲停止十二〔七〕厂工作。工人以与他厂无关，要求继续工作。因工人要求入厂，厂主拒绝，以致双方冲突，而日人开枪伤及工人。今工人顾正红已身死，各界谅所共闻。现敝工人〔会〕对顾正红身死一节，拟要求当局交涉，并请总商会等团体出而调解，能否有效，尚不可知。此次备承新闻界诸君援助，心感万分，云云。述毕，略用茶点即散。

（《民国日报》1925年5月23日）

工部局警务处关于工会发放罢工维持费的情报

（五月二十日）五月十九日上午九时，有七百名左右内外棉厂的工人（大多数是十二厂的工人），来到闸北潭子湾三德里三十七至四十号沪西工友俱乐部，经申请后，从刘华那里领得罢工维持费牌子。持有这种牌子的人在罢工期间可得到工会的津贴。

（五月二十二日）内外棉东五厂、西五厂、七、八、十二厂的工人仍继续罢工。工会的组织者们仍在努力散发传单和进行一般活动，以便大批人参加二十四日下午一时将在闸北潭子湾举行的顾正红追悼大会。工友俱乐部仍在继续发罢工维持费牌子。据估计，已发出二千块牌子。据报告，罢工工人在下星期头几天可凭这种牌子去领现款。

（五月二十九日）五月二十八日午后继续发罢工维持费牌子，有五百人左右到俱乐部来领。

（译自日本外务省档案一九二五年，《六国调查沪案委员会报告》第26号附件所载《警务日报摘要》）

(四) 举行顾正红烈士追悼会,号召工人坚持罢工

工人整队往迎顾正红灵柩,高呼“要行凶的偿命!”

已死工人顾正红之尸首,日昨由尸属及工会代表领出。当棺木到潭子口时,有男女工人整队往迎,沿途一致高呼:“誓死坚持到底!”及“要行凶的偿命!”等。各工人闻尸属痛哭之声,均无不伤心落泪。盖死者上有双亲,下有幼弱之弟妹,一家数口,全恃死者之养贍也。

(《民国日报》1925年5月19日)

工人在顾正红灵前集会演说,大呼“坚持到底!”

昨日下午工人开全体大会,到四千余人,大呼“坚持到底”、“不达目的死不上工”等。又于毙命工人顾正红停柩处搭台,工人轮流演说,并有女工数人演说时痛哭流涕,闻者动容。

(《民国日报》1925年5月20日)

(五月十九日)内外棉东五厂、西五厂、七、八、十二厂的工人仍继续罢工。五月十八日上午,约有二十人,其中包括沪西工友俱乐部总务主任刘贯之、李瑞清、张应龙等,从该俱乐部出来同往验尸所,把已死工人顾正红的遗体运至闸北。

五月十八日下午二时左右,在潭子湾工友俱乐部门外空场上举行集会,悼念那在五月十五日暴动中因伤致死的内外棉纱厂工人顾正红。约有二千人在会场集合,这里已搭起一个停柩

的竹棚。刘华从俱乐部走出来，手持一面白旗，上书“中国人惨遭日人残杀！”他站到椅子上，举旗指挥女工从男工中分开，站在一边。下午二时半左右，顾正红的灵柩被抬到会场上。这时刘华率领群众三呼“打倒日本人！”群众高呼口号以后，就把灵柩抬进竹棚，据说将停在那里直到罢工解决时为止。一个姓丁的文治大学学生对工人演讲。他说，当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曾受日本教员的虐待。他解释说，这倒不足为奇，因为日本是外国。但当日本人在中国作客的时候虐待中国人，那就很离奇了。他劝告听众牢记这种痛苦，为被日人惨杀的同志报仇。闸北四个中国巡官曾在场，但没有干涉。群众在下午四时散去。

(译自《六国调查沪案委员会报告》第26号附件所载《警务日报摘要》)

工会筹备公祭顾正红烈士

各团体各学校公鉴：敬启者，敝会会员顾正红被日人惨杀，实深悲悼。兹定于本月廿四日(即星期日)下午一时在浜北潭子口三德里空场公祭。哀请各团体各学校派代表参加，以示同仇之慨。如有挽联祭仪等物，请在本月二十三日以前送交浜北潭子口三德里公祭顾正红君筹备处为感。内外棉纱厂工会谨启。

(《申报》1925年5月22日)

纱厂工人定今日下午二时追悼顾正红。兹将各项消息录下：
(秩序)一、摇铃开会；二、奏乐；三、主席报告；四、行公祭礼(全体向灵位一鞠躬)；五、(一)奏乐；(二)再鞠躬；(三)宣读祭文；(四)三鞠躬；(五)答谢(全体会员向来宾鞠躬)；(六)奏乐；(七)

高呼口号；六、报告顾正红历史及惨死情形；七、演说；八、照相；九、散会。

职员（主席）仲英，（总指挥）刘华，（副指挥）作成、银卿（以下纠察、招待、庶务、文书、司仪名单从略）。

（《民国日报》1925年5月24日）

万人大会追悼顾正红

昨日午后一时，为各团体追悼顾正红大会，到者约万人。兹将开会情形分志如下：

会场之布置 会场在闸北潭子湾荒场附近，四周张挂挽联，中间悬顾正红肖像一帧，围以花圈，四周均为各工会匾额，多系绸制。设（讲）演台四处。存枢处设奠幕，旁设募捐处及来宾讲演台。沿途除警察荷枪维持秩序，并有宪兵一排，保卫团十名及第一军骑兵十名弹压。

到会之团体 南洋失业工人团、印刷工及各分局（原文如此）、工人进德会、印刷工人联合会、工商学会、纺织总工会、华商电车工人互助会、杨树浦女工联合会、国民会议促成会、平民导社、店员联合会、浦东工人协会、金银业工人互助会、雕花业工会、学生总会、江淮同乡会、杨树浦世恩学校学生会、大康纱厂工会、裕丰丝〔纱〕厂工会、云南青年励进会、中华电气工业联合会、东亚同文书院中华学生部、上大女同学会、岭南茶叶〔点〕工会、中华工业专门学校、景贤女（子）中学。警厅到者行政科长张楷、司法科长赵松龄，第一军到者宪兵营长宁凯臣，闸北保卫团总尹邦〔村〕夫、支团长韦伯成。

开会之情形 一时摇铃开会，公推孙仲英主席。总指挥刘华报告秩序。奏乐后，主席致开会词，报告开会宗旨，次全体向顾正红遗像三鞠躬，摄影。嗣郭尘侠述顾之略史及遇难情形。奏乐散会。由各团体、各学校代表分头演讲，并随发传单及宣言。末警厅长官至纱厂工会休憩时，嘱令该会将灵柩于最短时期内埋葬。

(《民国日报》1925年5月25日)

五月二十四日，在闸北潭子湾工友俱乐部附近的一块空地上举行因伤致死的工人顾正红追悼大会，参加者在五千人以上。显然同情于共产主义的工人领袖和某些学生，号召会众誓死反抗日本资本家与帝国主义者之压迫。在会场各处悬挂的挽联轴幛中，在分发给到会者的传单中，都宣扬同样的思想感情。鼓动分子对于正在附近一带值勤的一群群中国警察，似乎全然置之不理。几天以后的具体事例更有力地证明他们对待警察所采取的蔑视态度。当时有一个到工友俱乐部来的访问者，他们认为他有充当日本奸细的嫌疑，就把他拘禁了二十四小时以上，并且强迫他忍受这样的侮辱：要他挂着“我是走狗”的牌子，然后给他拍照。在会议上，俱乐部职员对罢工者给予鼓励，接着又补充含糊的诺言，说什么罢工维持费即将发放。据了解，当地各中国团体、学校已为维持罢工目的而捐募了三千多元；工友俱乐部已将罢工维持费牌子发给六千名左右工人。（下略）

(译自《上海工部局警务处1925年5月份工作报告》，

《字林西报》1925年6月17日)

追悼会上

味 辛

前天小沙渡为被杀工人顾正红君开追悼会，我以新闻记者的名义参加。这天到会的足足有一万多人，大丰纱厂后面的大空地上，但见人头黑压压地。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集会，在上海，我敢说是空前的。到会的十分之九是工人；穿长衫，披马褂，或戴白草帽的人，占极少数。他们在拥拥挤挤的数不清的“蓝布短褂”臂围白布的人丛中，稀少零散，象“沧海中之米粒”。我到的时候，公祭已行过了，听说行鞠躬礼时，动止很一致的，这尤足愧煞其他杂乱无章的纪念会或追悼会。女工们的勇敢干练，不亚于男工，往来招待、弹压、传令，非常出力，负责任；我不由地回忆到其他追悼会上有一班赴会的女客们的掩袖、低头、窃笑、扭捏的形态。

(《民国日报》副刊《杭育》，1925年5月26日)

关于顾正红烈士追悼会的回忆

沈孟先^①

一九二五年五月的一个晚上，沈资田同志忽然来到我家里。他进门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正在吃晚饭，他一声不响，默默地看着我。桌子上放着一盏小煤油灯，在暗淡的光线里，我也看得见他那副克罗米眼镜框里的眼睛——那布满红丝的眼睛，说明他

^① 沈孟先同志是当年上海邮局的拣信生，中国共产党党员。

不分日夜地为革命而操劳着。他只有三十多岁，面容却显得颇为苍老了。

他是我十分钦佩的同志。在我们支部里，论年龄，算他最长，论革命工作，是他劲头最足，办法又多，真象好教师对小学生一样，时时对人谆谆教导。我进邮局虽将一年，也参加了革命，但工作没有什么成绩，没有完成党给我的任务，因此见到资田同志就感到惭愧。他常对我讲：“你是个无产者，晓得要反抗，要革命，也很勇敢；但这样还不够，还要懂得为什么要革命，怎样革法，否则工作就不会做，做不开。”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和许多前辈同志一样，我都忘不了。不幸，一九二八年二月，资田同志在杭州殉难了，他那庄重而热情可亲的音容，直到现在还深刻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一九二四年以来，资田就代替赵醒侗同志（一九二八年牺牲于江西）带我这样的“徒弟”，参加各种革命活动，还为我讲形势，讲革命道理。记得一九二五年春天，他曾花了一个星期天，特地带我到小沙渡去访问发动二月罢工斗争的纱厂里的党员同志。我是在他的教育下，逐渐成长起来的。他是个忙人，白天在南市报关业义务小学教书，一下课就为革命事业辛劳奔走，从未到我家来过。这天晚上，他忽然来找我，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心里忖着。

“我和你谈句话”，他见我家里人多，感到不便，就招呼我到外面去。在门外，他递给我一张通知，郑重地叮嘱我：“沪西内外棉纱厂的斗争有了新发展，我们的顾正红同志前几天被日本资本家开枪杀害了，还打伤了好几个工人；工人是勇敢的，没有被

吓倒,罢工在坚持中。日本资本家又勾结租界巡捕房,对工人施用高压手段,连报纸也不许登工人的消息,若不扩大影响,发动工人,学生和各界人士起来支援,要取得胜利是困难的。纱厂工会已决定二十四日在潭子湾举行顾正红追悼大会,党对这件事非常重视,特地发出紧急通知,要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尽力动员人去参加。”他又说:“广连,斗争的大场面你我都还未见过,该在这次斗争中锻炼锻炼。”他又问我能动员几人,我把我能动员到的人,都一一告诉了他。他点点头,又教我如何动员人,到那里去集合,路上遇到巡捕又怎样应付。临末,还鼓励我:干革命,胆子要大,要敢闯,做事要心细。我一一听着,毅然地接受了任务。

五月二十四日那天,恰巧是星期天,我和邮局几个同志,还有一个雕花工人一同去参加追悼大会。当我们走到戈登路(今江宁路)上,感到情况有些紧张,不时看到外国巡捕的马队,一忽向南,一忽向北,往来不息地梭巡着。我们就按照资田同志的办法,避开巡捕的注意,分散开来,一个跟着一个,向大有油厂走去。到了大有油厂渡口,那里已有许多工人、学生模样的人在等候渡船。我们眼望着北岸(潭子口属闸北区,与租界只隔一条苏州河,这里租界巡捕干涉不到),但见有无数的旗帜在天空招展着,潭子口一大片荒地上真是人山人海,显示着我们工人团结的力量。我们许多热腾腾的心,巴不得马上飞过去。

我们焦急地等了一会,才摆渡过去。在跳板那边,站着许多女工和男工,衣襟上戴着白布孝结,来迎接我们。他们怕我们不会走跳板,用竹篙子给我们扶手,一上岸,一个个热情地来扶我们,说:“这种阎王路,你们走不惯。”的确,这哪里是路,只是一片

荒野潮湿的洼地，被人们踩出一条小道来，到处是臭水坑，泞滑难走。在右边荒地上有一排低矮破陋的草棚子，这是工人们搭起来的住家。家家门口放着茶水、长凳，热情地招待来参加追悼会的人。他们看到我们有的穿长衫，比较斯文，也把我们当作“学生”了，彼此兴奋地低声相告：“学生来了。”他们的热情和期望，使我们十分感动。

草棚子对面是一块大荒地，有不少荒冢，追悼大会的台，就搭在西南边的一个坟堆上，台边用大幅红布围着，台上也挂了一块大红布，桌上放着顾正红烈士的遗像，像前供着鲜花，台旁放着顾正红烈士的黑漆棺材。不少女工一到这里，就扶棺大哭，控诉帝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看到这种情景，谁也说不出什么话，只是满腔悲愤。大家忙着把带来的旗子，扎在竹竿上，把挽联在四周挂起来，这又给会场增添了悲壮的气氛。从会场上的各种旗帜可以看出，纱厂工人最多，除内外棉工会外还有丰田、大康、日华、同兴、裕丰等纱厂的工会。此外机器工人，印刷工人等代表也来了，也有他们的旗子。学生也来了不少，上海大学、文治大学都来了。看到蔽天的旗帜，迎风飘扬，感到莫大的兴奋和鼓舞，也感到我们邮局的人来得太少了，心里很惭愧，自己工作没做好。

追悼大会开始了，大家听到纱厂工会代表刘华同志等的报告，更加愤慨，更加激昂，一致挥着拳头，高呼：

“支援日本纱厂工人！”

“反对东洋资本家打人骂人！”

“反对东洋资本家枪杀工人！”

“为顾正红烈士报仇!”

……

口号方落，工人们都激动起来，一个又一个地跳上台去发言。他们大声疾呼：我们工人不能一生一世为东洋资本家做牛做马，天天挨打挨骂，终年忍饥受寒！我们要做人，我们要有生活的权利，我们要联合起来，与东洋鬼子斗争到底。

这次大会教育了我们许多人，大家下决心踏着顾正红烈士的血迹，继续前进，决不后退！

一九三八年五月草稿

一九六五年三月修改

(原稿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工部局警务处关于工会鼓动群众坚持罢工的情报

(五月二十七日) 潭子湾工友俱乐部现发行一种《罢工小报》。该报第一期是在五月二十六日发行的。

(五月二十八日) 五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在三德里三十七至四十号(沪西工友俱乐部会址)举行会议，到会的约有三百名工人。刘华说，他接到报告，内外棉厂资方正设法引诱某些罢工工人到第五厂复工，去揩擦已经生锈的机器。刘华劝告到会的人不要上日本人的圈套，即使日本人答应付每天一元五角工资，也不要上他们的圈套。他还说，工会已有足够的钱在六月五日发给罢工工人。

(五月二十九日) 五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内外棉十二厂男工约一百人和女工约二百人在闸北潭子湾工友俱乐部开会。主

持会议的工友俱乐部副主任刘华，告诉大家要防备那些正竭力劝诱他们复工的阴谋家、密探和走狗；他们应坚强地团结起来，听工友俱乐部的话。如果日本人不接受他们的条件，就将尽力劝告所有工厂的工人宣布同情罢工，还要尽力争取所有公共团体的支持。不管日本人怎样狡滑，工部局巡捕房采取怎样压迫的策略，只要工人坚持到底，胜利一定属于他们。

(五月三十日)五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约有四百名工人在闸北潭子湾三德里三十七至四十号集会。当时刘华朗读了广州国民党拍来的电报。电文的大意是：党员们对日人杀害顾正红异常愤怒，除向日本当局抗议外，将汇款到上海援助罢工工人。刘华还宣布，上海海员工会及其他工人团体已答应援助罢工工人。如果日本人在一星期内不给圆满答复，就将举行总罢工以支持纱厂工人。

(译自《六国调查沪案委员会报告》第26号附件所载《警务日报摘要》)

东洋鬼子又来哄骗我们上工了(传单)

工友们：

现在东洋人，因为他的机器停了十余天未作，要上锈了，他要五〈个〉厂的长日工去作工，替他去揩机器。但是长日工工友很抱义气的，听工会的话，不去擦机器去，并且说东洋人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是誓不上工的。哈哈，东洋鬼子真着忙呵，他又弄出走狗来，骗你们走〔去〕上工。亲爱的工友们！你们想想看，为我们死的工友顾正红仇还未报，巡捕房捉去的工友未放，我们提出的八条件他没有答应，我们这时候要去上工，岂不是完全失败

吗?工友顾正红仇不能报,巡捕房工友不能放,八条件的好处不能享,以后我们还恐怕一个一个的要被他手枪打死呢。工友们!注意呵!不要上走狗的当呵,我们坚持到底呵!要听工会的话呵!

五月二十八号

(内外棉纱厂工会章)

(原件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二、帝国主义、日本厂主及军阀政府 镇压工人的反抗斗争

(一) 日本帝国主义及日厂主的镇压和破坏活动

1. 日本官方迫使军阀当局取缔工会,镇压罢工

日本政府训令沪、青官宪,坚决取缔罢工^①

对于上海和青岛的纺织业罢工事件,我国政府为求保护因罢工事件的暴行而遭受危害的日本人的生命财产起见,已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但是罢工不易终止,反有日益扩大之势,且罢工的幕后确有国民党左倾分子煽动的事实,由于这个缘故,帝国政府以大体如下的方针,对上海、青岛我方官宪发出训令:

一、对工厂经营者,尽力坚持使他们保持协调,不得单独对罢工方面妥协;

^① 原标题为《我国政府的态度》。

二、关于增加工资等经济范围以内之事，可答复罢工方面的要求，进行商议；

三、煽动罢工的不良分子，应予肃清；

四、不得与事实上承认工会的团体直接交涉；

五、劝告中国政府将取缔罢工一项制定适当的法令；

六、罢工蔓延到日本工厂以外的外国工厂时，与各国采取共同行动。

(译自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编《我国纺织业罢工事件与五卅事件以及各地的动荡》第一辑，第134—135页)

日驻沪总领事迫使军阀当局取缔工会，镇压罢工

上海交涉公署昨接日本总领事馆公函，谓现据本埠纺织业同业联合会^①呈称，近来有人假工友会及其他团体名义，向日本人所办之工厂征取会费，殊欠正当，应彻底取缔，以保商业，云云。现已由该公署分咨各机关查照办理矣。

(《申报》1925年5月20日)

内外棉纱厂罢工多日，双方坚持，迄未解决。日领以闸北工友会与工潮不无影响，昨日日领矢田氏亲至交涉署与陈交涉员及警厅行政科张科长交涉，请求取缔工会。闻警厅业令闸北四区宁署长撤去工会招牌。

(《民国日报》1925年5月23日)

^① 即上海日商纱厂联合会。

淞沪警察厅长常之英前日回沪，日总领事矢田氏昨即偕副领事长冈氏往访，谓本埠罢工事件，受青岛罢工之影响，更趋险恶，前途殊堪忧虑，要求严重取缔。常厅长允用适当方法竭力取缔。日领乃即告辞。

(《新闻报》1925年5月29日)

2. 上海日商纱厂联合会的活动

接连召开紧急会议，议定对付罢工办法

日商纱厂同业会，前昨两晚均召集紧急会议，以上次内外风潮，曾引起各厂工人同盟罢工，损失颇巨，此次自应严加防范。除通知各厂外，并分别函请各地捕房警局，派捕弹压。如果发生骚动，则惟有将工场立时封闭，宣布停工，以免危险。一面由同业会派出代表二人，晋谒该国领事，请为援助云。

(《申报》1925年5月17日)

日商纱厂联合会前日午后三时，在蓬路日本人俱乐部续开会议，由内外纱厂报告风潮经过详情，结果认此次罢工有被〔破〕坏纺机等情，为彻底芟除祸根起见，决推特别委员数名，专任研究应付方法，并从事适当处置。至四时半散会。

(《新闻报》1925年5月20日)

要求日领取断然处置，迫使军阀彻底取缔罢工

《上海日报》云 日总领事矢田氏前据上海日纱业联合会特别委员之请愿，向工部局与中国官场交涉，请其严重取缔内外纱厂罢工事，结果陈交涉员允予严重取缔一节，已见前报。惟彼辈罢工团体，虽由中国官场下令解散工人会，而犹宣传不已，每日集合，讲求善后之策。前日公祭顾正红，会众约达三千余，且举行煽动的演说。虽当场派有华警三十余名，亦仅取旁观态度。似此取缔缓慢，究难彻底扫荡不稳分子。日纱业联合会因商议善后之策，兼听取其后之报告，更于昨日午后一时在日人俱乐部开会。总领事矢田氏亦列席。开会结果，决请日总领事更向中国官场报告现状，要求彻底取缔。又决定编纂关于此次罢工之纪录，以供后日之参议，托由专任书记佐立氏办理其事，而此记录中并将含有上次之纱厂罢工经过云。该会闭会后，日总领事矢田氏拟请陈交涉员致意，欲面会常警厅长，因常厅长适赴宁，乃照会陈交涉员，询问取缔之结果。据其答复，对于工友会，已命解散，并将招牌取下，业已严重取缔；关于取缔之结果如何，容向警厅方面调查后再行答复。日总领事已谅其意，待常厅长回沪后，拟再行交涉云。

(《新闻报》1925年5月27日)

又日商纱业联合会因认青岛罢工日趋险恶，本埠中国官场取缔不力，殊难信赖，于昨午在日人俱乐部开临时会，报告罢工经过情形，更决访问日总领事，要求此时即取断然之处置

云。

(《新闻报》1925年5月29日)

要求日本政府出面交涉

日侨商会会长田边辉雄,现任日华纱厂经理,昨日因同业之托,乘“上海丸”回国,向外务省报告此次风潮之起因,并会商根本解决之方法云。

(《申报》1925年5月18日)

《大陆报》云 日本厂主联合会昨日在日本人俱乐部开特别会议,决定请日政府向中政府交涉,取缔内外棉纱厂罢工运动。又据日本实业界表示,日总领事矢田不日将回国向日政府报告一切;又称矢田领事已拜会淞沪警厅长常之英,请其取缔罢工,常氏允即取缔云。

(《申报》1925年5月31日)

3. 日本厂主策划镇压罢工

以关厂对抗罢工

日商内外纱厂第十二工场等,十四日发生第三次罢工风潮。因形势较前两次为重,故收拾较难。兹将昨日调查所得消息分志如下:

各工场相继封锁 此次风潮最初发生于十二工场,未几第七工场等亦相继加入罢工。该厂因形势重大,深恐其他各工场

响应，故毅然将第五、第七、第九〔八〕、第十二等工场先行封锁，其他各工场闻亦将暂时封锁，因之工人生计将生绝大影响云。

厂主态度强硬 工人方面最初之要求为收用开除之工人二名，并释放被拘之工人五名二项。初时工厂方面，对于第一项完全拒绝，第二项允予设法，嗣因第七工场等加入漩涡，风潮扩大，遂改变宗旨，宣布暂时停工，非将肇事之工人完全开除，不愿上〔开〕工，态度非常坚决云。

(《申报》1925年5月17日)

以迁厂回国相恐吓

本埠日商内外纱厂之罢工形势，昨无变化，第五、七、八、十二各工场仍行封锁。上四工场前日对于罢工工人，发给罢工前之工资，由捕房捕探严重警戒，分午前午后二次发放，殆已全部发出，尚未发生事故。又日商内外棉纱厂第十二厂，此次发生风潮，延及第五、第七诸厂，近日以捕房方面，严密防卫，故无暴动发生。然厂主方面，日前因依据日纱厂联合会之议决，请官厅严行取缔工潮，否则，将工厂迁回本国。而工人方面，坚持须厂家对于所提条件，有圆满之答复。双方各不相让，一时似难解决。

(《民国日报》1925年5月22日)

企图歇退罢工工人，另招新工

内外棉纱厂对于罢工解决之策，现正以慎重之态度加以研

究。据闻该厂为彻底起见,绝不承认现存之工友会,即沪西工友会;并因欲先将罢工工人全部歇退,再行另招工人,然后广投巨资,设立工人俱乐部,推选多数工人所信任者从事管理监督,以谋劳资双方之协调。又前日午后,内外纱厂元木光之氏特访上次总商会方面竭力调停之王一亭氏,叙述此次事件之经过云。

(《时事新报》1925年5月24日)

(二) 工部局的镇压活动

逮捕和审讯被日人枪伤的工人

日商内外厂风潮发生后,受伤之工人胡培良、顾正红、伍〔吴〕阿四、黄福堂〔金〕、王小龙、周阿大、徐阿炳、周阿三、高阿二、胡培洪、丁阿三等,遂由工人方面一并车送公共公廨,通知汇司捕房将伤者车送工部局、同仁两医院疗治。并由普陀路捕房特派华探目沈崇礼调查此案起衅实情报告捕头,命将胡培良等提起公诉,并将王小龙等七人管押,于昨晨解送公共公堂。据华探长陆连奎、探目沈崇礼相继上堂禀称,捕房起诉被告十一人聚众扰害租界,惟胡培良等四人受伤在医院医治,其余七人解案,请求展期再讯,云云。次据包探崔顺扣将工人徐书林、王明左、万开元三名押解到案,要求并案讯究。经陆襄猷得供,商诸日副领事田岛,判候展期一礼拜再讯。

(《民国日报》1925年5月17日)

工人代表往领顾正红遗体被捕

日昨由工会派往验尸所领取尸首之代表张应龙、李瑞清二人，被捕头拘去。张已释出，李尚羁留捕房。

(《民国日报》1925年5月19日)

严禁工人为顾正红出殡游行^①

内外棉工人暴动时因日本人与巡捕开枪而中弹的一名工人——江北人顾正红，负伤甚重，至十七日死亡，其尸体则被送往同仁医院解剖。十八日在沪西工友会举行盛大的丧仪。

在这以前，盛传罢工工人团体将抬着灵柩在沪西纱厂区游行，举行盛大的示威运动。捕房当局与各工厂均严密警戒，以防万一。鉴于目前局势，且主办者均系不稳分子，其目的在于示威，因此工部局当局对于即使以出丧为借口，亦采取绝对不许游行的方针，加以严重取缔。

(译自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编《我国纺织业罢工事件与五卅事件以及各地的动荡》第一辑，第129—130页)

沪西区加派日捕和印捕

此次风潮起后，住居沪西之日侨及各纱厂代表联名要求工部局酌派日本警察至沪西捕房服务，已经该局核准。定本月十九日起，由中园部长率日警四人至普陀路捕房，任保护日侨之责

^① 原标题为《死亡工人之葬仪》。

云。

(《新闻报》1925年5月18日)

内外棉纱厂第五(东西两厂)、第七、第八及第十二厂工人罢工,风潮日益扩大。厂家方面,自工人顾正红死后,防范益严。普陀路捕房除派中西捕及包探陈广义梭巡外,并派印捕马巡多骑,维持秩序。昨日各厂恐工人暴动,各厂大门均关闭,禁止工人接近。工潮形势,恐非一时可以平息云。

(《时事新报》1925年5月19日)

工部局捕头下令,准备对示威群众开枪

麦高云^①颁发关于巡捕开枪的第六号警令。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于上海。令各级印捕遵照执行。

兹飭令各级印捕注意遵行;当捕房官员认为情势足够严重,可以使用卡宾枪或左轮手枪而决定开枪时,应对准暴民中最有威胁性的一部分人射击。如系武装盗劫,则应对准盗匪射击,其目的总是在于杀死对方,或使对方丧失骚扰能力。不得朝天开枪。

(译自上海工部局警务处文件)

^① 工部局总巡。

(三) 淞沪警察厅的镇压活动

通令所属严禁工人罢工

本埠官厅如交涉员、警厅长、县知事等，鉴于日商纱厂罢工风潮，虽发生于租界，仍恐蔓延内地，为防止扩大起见，昨已由淞沪警察厅长通令所属各区署队，对于各该管辖区内，如有工人聚众罢工以及煽惑等事，务须特别注意，严行遏止。一面由陈交涉员将枪击工人情形，电陈外交部核示。

(《申报》1925年5月17日)

又淞沪警厅接交涉员公函，谓接日领函，据本埠日本纺织业同业联合会呈请保护云云。常厅长接函后，业于日昨训令所属各署所队，一体严密取缔，并据情函复陈交涉员，转复日总领事查照矣。

(《新闻报》1925年5月21日)

日文《上海日报》报道警厅向日本领事汇报取缔罢工情况

《上海日报》云 日商纱厂联合会前请愿日总领事向中国官场交涉，更行严重取缔罢工。日总领事因于前日向陈交涉员交涉。嗣据答复，容询问警察厅后，再行报告取缔状态等情，已记昨报。兹悉中国警察厅对于交涉员之照会，昨日已以公文报告对于工会与罢工之取缔状态及其成绩等。日总领事署预期本日将见交涉署送到此项公文。昨日交涉员曾非公〔正〕式以口头将警察

厅之报告公文内容通知日总领事。据称中国警察对于工会,已令解散;对于罢工之取缔,亦极严重,已以诚意努力镇压,一方有非议中国官场之不诚意者,实属误会云。

(《新闻报》1925年5月28日)

四区警署监视沪西工会活动

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组织一工会,赁屋潭子湾大丰纱厂后为会所。前日发出宣言传单三种,邀请各界援助。四区宁署长恐该会有恃众暴动情事,特派巡官李益谦带同警探何福、李桂及长警等前往弹压。据会中人刘某云:今日为顾正红开丧,并不开会,且允俟开丧后将会所迁往他处。昨日李巡官又率探警到场监视云。

(《申报》1925年5月22日)

警厅解散沪西工友会,工友会迁地照常办公^①

大约由于矢田总领事向工部局和中国警察当局提出严重取缔的要求,淞沪警察厅根据厅长常之英的命令,急遽开始行动,首先命令解散罢工策源地的沪西工友会。该会接到命令后,虽于二十六日迁出闸北潭子湾三德里,但并未解散,即日又在紧邻的大丰里内公然挂出招牌。中国警察对此也未采取更进一步的手段,罢工团体乘此将再进行策动。

(译自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编《我国纺织业罢工事件与五卅事件以及各地的动荡》第一辑,第131—132页)

① 原标题为《解散沪西工友会》。

三、社会各界对日厂工人 斗争的援助和反应

(一) 各业工人急起援助

杨树浦工人探视被日人残杀的阶级兄弟

杨树浦纱厂(因沪西)罢工风潮被击伤之工人七名,有一人已于十七号晨毙命,因腹部伤重所致。十一时许,有工人七、八十名,乘坐装货汽车,手执“杨树浦工人查视团”小旗,往普陀路捕房询问死者情形,捕房不理,乃向三德里总会方面而去。

(《新闻报》1925年5月19日)

上海各工会代表纷纷慰问

(上略)至连日到(工)会慰问者,有杨树浦各工会代表数百人及工人进德会、文治大学学生会、日人残杀同胞后援会〔雪耻会〕、对日外交市民大会、国民党上海妇女部、上海大学女同学会、东方青年社、金银工人互助会等数十团体。(中略)中国官厅方面,闻工会连日开会,秩序尚佳,亦派人至工会声言:各工人如能始终维持秩序,官厅方面当尽力保护。闸北保卫团亦派人前来慰问,并调查真象。

(《民国日报》1925年5月19日)

上午有就近商店前往慰问，下午一时由上海织袜同业会代表、申新第二厂打包工人代表等前往慰问，并愿援助。

(《民国日报》1925年5月22日)

昨日前往慰问者，有国民党五区十八分部代表、统益纱厂领班高某等，及第八厂打包间头目王某等。又有海员联合会上海支部代表，于前晚前往慰问，并允担任募捐援助。其捐册已于昨日送去。

(《民国日报》1925年5月24日)

参加劳大过沪之北方工会代表前来慰问

此次参与广东劳动大会之北方各工会代表，亦前来慰问。

(《民国日报》1925年5月19日)

昨日上午所到慰问之团体，有青岛胶济路总工会代表，向工人演说，愿予以援助，并允即日回青岛向各方尽力募捐接济，及请求山东各界之援助。

(《民国日报》1925年5月20日)

纱厂工人等捐款支援

昨日前往工会慰问者，有小沙渡路第四厂调查部代表等。又下午二点钟时有一姓李者前往慰问。据说彼新自京来，因昨日在途中看到传单，甚感不安，故特前来慰问。

又该工会近日来收到各处捐款达数百元，其中尤以各纱厂

占多数，且各界尚纷纷投函，告以现正在着手募捐，一俟募好即当送上。

(《民国日报》1925年5月23日)

海员工会上海支部电段政府速向日本政府严重交涉

北京段执政外交部钧鉴：日人在中国各地开设工厂，既剥削贫民，复奴隶工人。最近则上海日商内外棉第七厂日人，且任意惨杀工人。执政政府既为中华民国代表，应请速将日人惨杀顾正红案，向日政府严重交涉，务将行凶之人严办，并赔偿伤亡工友损失。中华海员公〔工〕会上海支部叩。印。

(《民国日报》1925年5月23日)

(二) 学生团体的同情援助

文治大学学生亲往调查，议决援助工人

顾正红被杀之惨状，新闻纸既不为之转载，国人自亦置若罔闻。惟文治大学学生，因校址与内外纱厂接近，闻枪声奋往观视，目睹日人之残暴与工人遭杀之惨，心不能忍，当回校召集开会，议决出发演讲募捐，以冀唤起民众之注意。次日，该校学生谢玉树、施文定二人，即因演讲在东京路被巡捕房拘去。上海学生会得报，即召集紧急会议，大多数同学均愤激异常，力主出发演讲，然再三考虑，签〔金〕以演讲本为和平消极办法，然恐启误会，应先派代表向巡捕房解释，请释被捕同学，当决推代表两人往见普陀路巡捕房捕头，不料该捕房不但不允开释所捕学生，且对学生

会代表深加责辱,代表等不得要领返会报告,群情益愤。然执行委员会仍主和平,又推代表赴交涉署请愿,请抗议、释放学生,但迁延时日,仍未见其释出。二十四日,上大学生朱义权、韩步先等四人,又因公祭顾正红烈士路过戈登路被拘。学生至此始知捕房不可理喻,乃决计不再为无谓之哀吁。(下略)

(摘自梅电龙编述《上海英日帝国主义者屠杀同胞之经过》,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印行)

全国学生总会议决援助工人办法

全国学生总会因内外日纱厂工潮事开会,议决下列五项办法:一、电北京政府严重交涉;二、募集捐款抚恤工人;三、通电全国实行经济绝交;四、发起组织雪耻会,并促各地学生会继起;五、游行演讲。

(《民国日报》1925年5月23日)

上海学联积极援助工人

上海学生联合会根据第四(次)代表会之议决案,于昨日下午三时开第一届执行委员会。(中略)即由正主任张永和主席,讨论进行;(中略)二、讨论援助日人惨杀华工问题,由提议人文治大学代表报告惨杀情形。当议决四项办法:(一)参加日人惨杀华工后援会;(二)电请执政提出抗议;(三)募捐援助;(四)向外宣传禁米出口^①。(下略)

(《民国日报》1925年5月18日)

^① 当时上海学联认为禁米出口,可以抑平米价,有利于工人生计。

上海学生会致执政府电云：

上海内外棉纱厂厂主日人，无故禁止工人上工，并惨杀工人。我国工人不得已而罢工。今数万人之生命危在旦夕，务望速飭外交部向日政府严重提出抗议，以崇国本，而重民命。上海学生联合会叩。蒸^①。

(《民国日报》1925年5月23日)

同胞注意!!! 大家起来反抗东洋人呀! (传单)

诸君在近几天报纸上，想大家都已看见了，日人内外棉纱厂的日本人拒绝上工，克扣工资，并且拿手枪杀死中国工人同胞一人，重伤十数人，现在还有几个性命很危险。这样杀戮我们同胞，这简直是视中国人如牛羊犬豕！同胞注意！

再我们在最近的报上看见在五七纪念时，日本东京中国留学同胞纪念国耻，被日警打击压迫逮捕。最可耻的，把中华民国国旗撕裂，这竟是侮辱中国国体呵！同胞注意！

又在北京武昌等处，日人指使中国官厅压迫纪念国耻爱国运动。指使中国官厅，这是操纵我国的政治呵！同胞注意！

同胞注意！这种严重情形简直等于亡国！

凡是中国的同胞，应该拿出六三运动的精神来，大家齐心抵制日货，并且募款救济被伤害的工人同胞，援助被欺侮的工人同胞。同胞们！（中略）注意亡国的局面呵！赶快起来！

大家一心抵制日货！

^① 代电日期疑误。

救济被伤害的工人同胞!

上海学生联合会

(原件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文治大学学生积极援助工人

文治大学学生，昨日上午开全体学生会，讨论援助工人办法。一面将详情报告学生总会，并沪上各中等以上学校，以便联络表示；一面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派代表向工友会演说，并慰问受伤工人。

(《民国日报》1925年5月17日)

南洋大学学生会通电声援^①

此次内外河〔纱〕厂罢工风潮，全由日人高压所致，威临之下，华工死伤相继。前有工人代表陶君来校，请求援助，由学生会执行委员接见。该代表报告详情后，即由执行委员会开紧急会议，讨论办法，议决：

- 一、发宣言引起国人之注意。
- 二、致函交涉署要求严重交涉。
- 三、由各班长向各同学自由征捐。
- 四、派代表参与公祭被害工人顾正红。

其发出宣言及致交涉使函分录如下：

各报馆转国人公鉴：近来日人各纱厂罢工风潮，层见迭出，于〔良〕以日人暴戾恣睢，奴视华工，鞭策所施，类同牛马；而种种

^① 原标题为《援助被害华工》。

措制〔置〕，更竭力剥削，务使工人血汗，囊括而尽。工人衣食所逼，转辗于淫威之下，茹苦含辱，以求生活，终至忍无可忍，酿成风潮。然总观列次事件，工人处境穷困，不敢奢望，凡所要求，皆极轻微。彼日本资本家如犹稍存天良，当又何惜区区，而必假手警察，借重暴力，或施幽囚，或加伤残。哀我华工，备受苛虐，饮泣吞声，终至屈服。此次上海内外纱厂工人竟又以要求作工而惨遭狙击，枪刃交加，死伤相继。工人本挥血汗以求生，乃遽饮弹丸而捐命。穷凶极恶，甚于豺狼，人道云亡！天理何存！凡我国民，能不痛心！窃思日之履我国土，奴我劳力，垄断我实业，操纵我民生，夙夜经营，以逞其侵略之谋。而国人昏昏，视若无睹，种种侮辱，漠不相关，及今虐杀我同胞，摧残我工人，而犹声色不动，麻木不仁，一至于此。是实见其虎狼食人，而不一援手，畏葸衰弱，不复有一点勇气，麻木性成，已全无恻隐之心。民族不振，民气不扬，言念之下，心伤已极！十年以来，福州之役，长沙之役，地震之役，以迄于今，我同胞之惨被毒手死于非命者，不可胜记！彼磨牙吮血，何知履足？长此以往，行见祸蔓全国，无所底止。凡我国人，如犹有良心，犹有热血，合应义愤填膺，奋袂而起，同仇敌忾，共与搏战！不然者，惟有坐以待毙，相率而趋彼爪牙之下。精力热血，可供奋斗，亦可膏饕吻，幸国人择之！

南洋大学学生会

五月十八日^①

（下略）

（《南洋周刊》第6卷第11期，南洋大学学生会，1925年5月31日）

^① 原文无日期，现按南洋大学学生会临时刊物《五卅血泪》第一期所载校补。

(三) 国民党妇女部等团体的声援活动

国民党妇女部^① 通告参加顾正红追悼会

纱厂工人顾正红毙命后，定于今日开会追悼。国民党妇女部昨由干事向警予等发出通告加入追悼云。

(《新闻报》1925年5月24日)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为日人惨杀同胞宣言

谚云“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我们中国人“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孤独心理太利害了。从前对日还有五分钟的热心，现在连五分钟热心都唤不起来了！所以日人惨杀同胞的事乃层见叠出：湖北之田案，下关之贾案，至今未有解决，而小沙渡又发生了枪杀工人的惨剧。阅内外棉纱厂工会宣言，日人横暴，谁不为之发指！顾正红身中四枪竟于日前一命呜呼了！周阿大弹穿前胸，徐阿炳头脑打开，现正命危旦夕。其余重伤者十余人，轻伤者数十人，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日人的横毒，真是无以复加了！

大家总还记得，早几个月日商水月纱厂工人因不堪日本资本家虐待毒打而激成罢工，日本海军陆战队便要宣言上陆了，但是他们虐待毒打中国的工人好象是理所当然的！

这还不算，国旗是代表国家的，这是何等的尊严。然而日人

^① 指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当时国共合作，该部实际领导工作系由共产党人向警予同志(中共中央委员)担任。

竟因我留日同胞纪念国耻而撕破我国旗，这种侮辱，我们尚能忍受吗？大家想想，如果是中国人打死了日本人，中国人撕破了日本国旗，还了得吗？

同胞们呀！日人打死中国人简直和打死狗一样，日人撕破中国国旗简直和撕破抹布一样，中国人如果还有廉耻，还有良心，可不一致起来反抗吗？

被压迫被宰割的中国人，有廉耻有良心的中国人，一齐起来！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排斥日货！

不准日人在中国设厂！

援助工人同胞！

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

五月廿四日

（《党务月刊》第1期，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1925年6月1日出版）

工商学会^①电促段祺瑞提出严重交涉

北京段执政钧鉴，本月十五日沪内外棉纱厂风潮，系日商开除工人代表，禁止工人上工，暨以手枪、刀棍伤害徒手工人。顾正红一身连中四枪，竟被击毙，其余受重伤者尚有数人，轻伤者数十人，实属蔑视我国同胞。若我政府不能制止此类行为，则我国人将被列强侵害，恐无噍类。务乞提出严重交涉，不胜迫切盼

^① 即闸北工商学会，又称沪北工商学会。这是有共产党人参加领导的进步团体。

祷。上海工商学会叩。啸(十八日)。

(《民国日报》1925年5月20日)

为日人残杀小沙渡工人告同胞(传单)

同胞诸君：

今年五月九日我们举行第十次国耻纪念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从新痛切的提醒十年前日本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承认二十一条亡国条款的耻辱。

现在我们不得(不)再来告诉诸君说：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付我们中国人的气焰和手段现在更加毒辣了！他们现在公然拿手枪无理惨杀我们中国人；租界上的巡捕房公然帮他们的忙！

五月十五日，离国耻纪念不多几天，小沙渡日本人办的内外绵〔棉〕纱厂第七厂关了厂门，不许我们中国的工人去上工；工人苦苦哀求，他们反开手枪打死工人顾正红，被打伤的不计其数。小沙渡是中国的地方，我们让他们来开纱厂剥削我们中国人的金钱，还嫌不够；平日毒打辱骂我们中国的工人，克扣他们的工钱，还嫌不够；现在日本鬼子公然乱开枪打死我们的同胞了！诸君！日本鬼子的眼里哪里还看见有中华民国的体面和法律呵！可怜我们中华民国四万万同胞，如今实际上已算做了亡国奴了！日本人如其高兴的时候，尽可以拿手枪来把我们一个一个都打死，也没人去找他们偿命！

诸君！我们忍得下这样的耻辱吗？我们为争中国的主权，应该反对日本人在中国设立工厂！我们为杜中国的漏卮，应该大家不买东洋货！我们为救同胞的性命，应该要求把开枪的日

本凶手替屈死的小沙渡工人顾正红偿命！起来！起来！

抵制东洋货！

援助小沙渡罢工工人！

闸北工商学会

(原件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四) 工商学各团体联合组织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

三十五团体发起组织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

昨日下午三时,天潼福德两路商联合会、杨树浦裕丰纱厂工会、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沪西内外纱厂工会、上海店员联合会、学生总会、沪南〔西〕工人〔友〕俱乐部、文治大学学生会、沪北工商学会、亚东医大学生会、上海雕花业工会、沪南职工进德会 少年工艺同志会、金银工人互助会、青年努力社、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杨树浦大康工会、京汉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湖北全省工联合会、津浦铁路工会、上海杨树浦工人进德会、恒丰纱厂工会、胶济铁路总工会、津浦(路)济南工会、南市市民对日协会、余姚青年协会、工界救国同志会、郑州豫丰纱厂工会等三十五公团代表一百余人,在西门林荫路正兴里开联席会议。推举郭景仁^①主席。首由主席报告开会宗旨。次沪西内外纱厂工会代表孙杰三报告内外棉纱厂工人被伤事略,请到会诸君讨论援助办法。结果议决办法如下:一、组织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以今日到会代表为

^① 郭景仁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参加上海地委兼区委工作。

发起人；二、发表宣言，说明惨状；三、以筹备会名义电执政府向日本领事严重抗议；四、电致中华全国总工会，请一致援助；五、警告日资本家，促其省悟，并抚恤受伤工人；六、推举代表四人慰问受伤工人。未复选举筹备委员七人，以团体名义为单位。店员联合会、文治大学、学生总会、杨树浦工人进德会、沪北工商学会、天潼福德两路商联合会、大康工会等当选云。

(《民国日报》1925年5月17日)

雪耻会发表宣言，呼吁援助工人

(上略)又该公团等宣言略云：日人在沪设立纱厂，所雇之华工，出资廉而工作多，种种苛待，至激起上次罢工，后经各方调停，工潮始息。然工潮平静之后，日人并未履行自己签订之条件。如小沙渡内外棉十二厂发给之红簿子存款，其不满一元之零数，均给小洋。工人受此亏折，推派代表，请厂主依照市价贴水，而日人不谅，反将代表开除，此岂情理之常？五月十五日，第七厂工人进厂工作，日人闭门不纳。工人以不许工作，要求结领工资，亦属理由正当，乃竟开枪伤人。因伤致毙之顾正红，身中四枪之多，其他受重伤者十余人，轻伤无数，人道安在！敝团体等愤国势之不振，痛同胞之惨死，不得不起而援助。愿我同胞，共起力争。

(《民国日报》1925年5月20日)

雪耻会电段祺瑞严重交涉

北京段执政钧鉴：五月十五日，沪日内外棉纱厂日人拒工人

上工，扣留工资，持铁棍手枪擅自行凶，并招捕为助，伤工人数十人，重伤数人，死一人，现有性命之虞者尚有数人。际此举国谋雪国耻之时，日人乃杀我国人，华族陵夷，国权丧失，前途岂堪设想？国犹未亡，国人已如奴隶！执政尚取〔倘非〕为亡国之元首而不徒执政柄以罔民者，其切实提出严重交涉！上海百万居民，不忍坐视，实不胜待命之至。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叩。

（《民国日报》1925年5月19日）

各团体踊跃加入雪耻会，并组织沪东支部

自十六日三十五团体联席会议，讨论援助日纱厂风潮案，议决组织雪耻会，当即选举委员七人负责进行。该委员等除发表宣言，通电全国促其一致援助外，复征求上（海）各团体加入。昨日有工商协会、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平民导社、机器工人俱乐部、华商烟草公司女工团、申江协会等六团体加入。申江学会〔原文如此〕并提议二事：一、举行大规模示威运动；二、举行募捐救济被难同胞。

（《民国日报》1925年5月20日）

日纱厂工人惨毙，沪上各团体十八日^①开会后，当场组织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筹备会。除派人分头联合征求加入外，昨日又发通告各团体征求加入。其通启云：“国人俱深愤慨，敝团体等爰组本会，期以雪耻。人心苟在，决难坐视。凡我国人，其速

^① 系十六日之误。

加入,共策进行! 通讯处西门林荫路正兴里二十二号。”

杨树浦南方大学四川同学会、江苏同学会、蜀新社女子体育专门学校等十四团体,在该处组织支部,于昨日假南方大学第二院正式成立,定名为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沪东支部。

连日去函加入者为上海学生联合会、景平女学、上海大学学生会、上大山东同乡会、上海琼崖新青年社、上大湖北同乡会、浦东工人协会、大夏新少年社、上海大学江西同学会等十二团体。

(《民国日报》1925年5月23日)

雪耻会开第二次大会,议决募捐等四项援助办法

各团体联合会昨日下午三时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郭景仁主席,首先报告日商内外棉纱厂工潮情形,暨本会组织之经过与从事力争之状况,并谓今日各团体代表重聚一堂,亟应通过章程选举执行委员,正式成立此会。经徐玮^①、林钧、刘一清、陈铁梅等先后发表意见,结果议决六〔四〕案如下:

一、决由各团体分头募捐,抚恤死者顾正红家属。

二、通电宣布工潮真相。

三、加入本会各团体,再分别各自通电。

四、请求交涉使向日领事抗议,并要求下列四条:(一)惩凶;(二)抚恤死者家属;(三)担保以后不再发生此等惨剧;(四)日商须切实履行前次应〔在〕上海总商会所订五〔四〕条件。

次并讨论章程十条,多所修改,逐条通过;并即根据章程,选

^① 徐玮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沪西工友俱乐部筹备人之一。

出执行委员十三人，分六股办事。议毕五时半散会。

兹并录其选举委员十三团体如下：国民会议促成会、学生总会、文治大学学生会、上海大学浙江同乡会、琼崖新青年社、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上海店员联合会、暨南大学学生会、上海学生联合会、杨树浦工人进德会、上大学生会、海员工会、天潼福德商界联合会等十三代表为执行委员。

(《民国日报》1925年5月24日)

日本人无故枪杀中国人，大家起来雪耻，

抵制日货，募款援助(传单)

唉！同胞们呀！日本人不是常常欺侮我们中国么？二十一条，便是最大的欺侮。但是从前是来夺些权利，现在却是要我们的性命。上次东京震灾，我们的华侨同胞被他们的军警杀死不少；他们还说是因为乱忙忙，看做朝鲜人误杀的。可是现在却不对了！他们却是明明白白无缘无故把我们同胞打死了。这件事是出在上海小沙渡地方。这个地方，日本人设了许多纱厂，用华人作工。五月十五日，内外棉第七厂工人，照常进去工作，日本人不准，工人愈来愈多，那时日本人竟不分皂白，即(用)手枪铁棍向工人乱放乱打，工人于是四散奔逃，而凶狠的日本人，还持枪追击，共计受重伤者十一人，轻伤者不计其数，工人顾正红足腹头各中一枪，即因是而死。野蛮的日本人，当时又叫来许多巡捕，反说工人无故滋扰，将工人又捕去十余人。

唉！各位同胞呀！我国未亡，而我们已做了亡国的人了！日本人竟敢在我们的地方，任意打杀我们中国人，这是何等可耻的

事情！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望大家一律即时起来，共雪国耻！抵制日货，与日本人实行经济绝交，以制其死命；从速募款，以救济被难工人。并要求政府向日人严重交涉，要求严办凶手，抚恤已死的家属，担负受伤工人医药费并赔偿损失，日领事须向工人谢罪，并担保以后不再发生此项野蛮事项。

各位同胞呀！这是日本人在我们中国地方无(故)打杀中国人的事情，各位如不要继续做日本人刀枪底下的冤枉鬼，就请快一点起来雪耻！努力奋斗！速起！速起！！

抵制日货！

打倒野蛮的日本人！！

募款援助被难的工人！！！！

日人惨〔残〕杀同胞雪耻会

(原件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大家急速起来雪耻(传单)①

日本人无故杀死同胞顾正红，

大家急速起来雪耻！

排斥日货！

打倒野蛮的日本人！！

募款援助被难工人！！！！

(原件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① 原件无标题。标题是编者所加的。

(五) 资产阶级团体的反应和活动

宁绍台工商协会决定调查惨案情况和慰问受伤工人家属

宁绍台工商协会,昨日召集会议,袁永铨主席,讨论议案如下:

(中略) 二、援助纱厂工人被日人枪伤案 本会昨接工友宣言书,谓日人用枪击伤工人多名,而工人顾正红昨已身死,请求援助云云。议决:(一)公推邹裕传等四人前往切实调查情形,并慰问受伤各家属;(二)函请交涉使署,据情严重交涉,以昭公允,而顾国体。表决,全体通过。议毕散会。

(《民国日报》1925年5月19日)

国民对日外交大会组织“援助内外工人委员会”

前日下午三时,对日市民外交大会^①、市民提倡国货会假甬同乡会开联欢会毕,当有日内外纱(厂)罢工代表要求援助日人伤毙工人一案,即经大会另组织援助内外工人委员会,办理此案,委员团周霁光、唐豪、陈翊庭、翁国勋、孙侠、林炎夫(代表王廷杰)六人。接开第一次委员会,纱厂代表三人均列席,主席周霁光。先由唐豪说明肇事原因及经过实在情形,讨论结果:一、搜集日人惨杀工人证据,再谋对付;二、公推陈翊庭、孙启英调查死者家属及纱厂附近之出事情形;三、公推翁国勋、唐豪至斐伦

^① 即国民对日外交大会。

路验尸所及同仁医院调查伤亡经过；四、每日定下午五时至六时为开会时间。遂散会。

(《民国日报》1925年5月19日)

对日市民外交大会援助内外工人委员会，于前日下午开第二次委员会议，到全体委员六人，工人代表季子善、朱国年〔平〕亦列席。周霁光主席。先由陈翊庭、孙启英提出调查报告书，请众讨论善后。嗣林炎夫、翁国勋均有主张。结果推举陈翊庭、周霁光、唐豪三代表持调查案卷，移送总商会接洽办理。致总商会函云：敬启者，本月十四〔五〕日内外纱厂华工陡起风潮，工人惨遭枪杀之结果，是非曲直，发生原因，无论如何，而日人横加暴行，持枪杀人，其凶横已极。迭经工人代表一再来会要求援助，旋经本会讨论，念以此案关系人命国体，贵会为调解前次工潮最力之团体，非请贵会办理，不足以昭慎重。经全体公决，并当场推出代表周霁光、陈翊庭、唐豪三君，持卷送上，至祈接纳。夙仰贵会领袖公团，必能俯如所请，至纫公谊。

(《民国日报》1925年5月20日)

《纺织时报》的言论^①

青岛工潮发生以来，业已兼旬。各方面虽从事调解，已有具体办法，然其去回复工作之日，当尚有待。乃本埠日厂竟复以二次罢工闻，且有殴伤日员情事。甚矣，好恶之中于人心也。五九

^① 原标题都是《编辑小谈》。

之耻，方当其会，伤时思奋，与有同心，劳工智浅，激动尤易，则日厂工潮之此掀彼起，即谓有人利用，岂宁无故。此邻国同文所当深长思也。

(《纺织时报》第209号，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1925年5月11日)

年来各处各业均有罢工潮流，而渐灭复起，势大援足，未有如近今日厂工潮之甚。其原因复杂，解决困难，则更为世界工潮中所少有，以不仅为劳资之争已也，中日人民间之芥蒂不去，恐终不能永宁。若更操切激怒，持强行凶，虽足驱压一时，后患且将靡已。乃青岛大康既传枪击工人之讯，本埠日厂复有伤毙人命凶剧，窃甚为日厂不取也。

(《纺织时报》第211号，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1925年5月18日)

商总联会深恐罢工“影响治安”，决定先调查再设法调解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因内外纱厂工潮扩大，解决无期，深恐影响上海治安问题，特于昨日下午召集紧急议董会议，讨论办法，到二十余人，正议长叶惠钧主席。公决先从调查着手，推定王汉良、邬志豪、谢惠廷、潘冬林四人为调查委员，俟真相既明，再设法调解云。

(《新闻报》1925年5月21日)

总商会对顾正红惨案避不表示态度

至上次风潮原调停者总商会及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两团体，对此次风潮尚无表示。惟因此次重起工潮，系另有原因，并非上

次解决条件上之争执，故拟暂时不与调解。惟对于受伤工人及失业工人之生计等问题，拟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办法。

(《时事新报》1925年5月17日)

总商会委托潘冬林试探调解，遭日本厂主拒绝而作罢

纱厂工人顾正红被害后，工潮日渐扩张，嗣由文监师路商联合会总务主任潘冬林出而调查〔解〕，旬日以来，仍未见就绪。潘于昨日致函上海总商会及内外纱厂工会辞去调解责任，免误大局。兹录原函如下：敬启者，辱承不弃，以冬林为鲁仲连地位，出而奔走，旬日以来，未得厂方谅解，接洽毫无头绪，对于贵会诸君，抱歉殊甚。诚恐贻误大局，爰特函告贵会诸君，冬林以后不任奔走，免去责任，知关锦注，诸希察谅为荷。此致内外纱厂工会。

又函上海总商会云：椒伯会长大鉴，猥以青睐，嘱冬林奔走调和双方误会，无任愉快，敢效绵薄。詎料迭次向双方游说，未得端倪。工(人)代表方面表示和平，情愿让步，惟厂主方面无确实答复，消息岑寂，旬日以来，徒劳往返。若长此以往，难免不节外生枝。故特函告台端，冬林嗣后辞却鲁仲连责任。务希察谅是荷。

(《民国日报》1925年5月30日)

二十一日，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总务主任、上海菜场摊贩总联合会总务科主任、虹口四路商界联合会会长潘大洲^①，接受总商会的委托，来到内外棉第五厂。他参观了暴行的情况后，甚

^① 即潘冬林。

为吃惊；对工人的鲁莽和带有赤化色彩的工会的行为，大为非难，并声言无论如何不能承认现在的工友会，然后离去。他还说：听了以前所提出的八条要求的内容，以及会社方面对这八条的非正式表示后，本人将把一切向会长报告。最后他说：“本人对会社方面甚为遗憾。”

被看做再度掀起抵制日货的首谋者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主任兼文监师路商界联合会长潘大洲，于二十九日向上海总商会及内外棉发出声明书如下：“日来为调停罢工而东奔西走，竭力调停，工会方面虽表示和平让步，请求调停，但工厂方面坚持强硬态度，不作答复，甚为不妥。因此断然不再过问。”潘的这一行动，可以看出他已知道调停活动不能奏效，同时又暴露了他的排日家的马脚^①。

（译自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编《我国纺织业罢工事件与五卅事件以及各地的动荡》第一辑，第140—141页）

四、工人、学生横遭工部局逮捕， 五卅反帝示威在酝酿中

（一）工部局逮捕工人和学生

逮捕工人和工会干部

江北人李霭白，前在日华纱厂执业，系工友会会员。本月十

^① 本件原标题为《总商会的调停》，分二节，第一节小标题为《潘大洲访问内外棉》，第二节小标题为《潘大洲调停失望》。

五号傍晚,沪西日商第五纱厂^①工人发生冲突,受伤工人舁至公共公廨时,李亦踵至新署门外,向观众演讲日人殴打华工之事,为普陀路捕房西捕头福来氏所见,正欲查究,李遂逸去。前日,公廨中西官莅验尸所,检验枪伤身死工人顾正红之尸体时,李又前往,复为该捕头与探目沈崇礼查见,即行拘获。昨晨解廨,禀明前情,请求改期至礼拜六日领陪审。经关谳员与美雅副领事磋商之下,判被告押候礼拜六解讯。

(《申报》1925年5月20日)

杨树浦捕房控木匠湖北人唐宝生,于五月十九号下午五时,手执“日人屠杀同胞雪耻会宣讲团”旗帜,在韬朋路演说煽惑人心案,唐供演讲者另有其人,伊系听讲等语。经西捕上堂证明,被告执旗演讲反对日本人情形,渠亲眼所睹。官判被告罚洋三十元,无力押满一个月,旗帜没收。

(《新闻报》1925年6月16日)

前日(二十日)下午四点钟,有工人李守宜由街回家,行至宜昌路,被巡捕拘去。另函云:沪西日商第五纱厂,发生冲突后,迄未开工。前日该厂董事电邀普陀捕房请加调解,发给工人工资,当经捕头福来到场调解妥洽,令工人排班领取工资。詎有工会会员湖北人李守宜等,从中阻止,当被该捕头(拘去)昨解公堂,即据捕房代表梅脱兰律师上堂陈述案情,又据西捕头福来带

① 第七厂之误。

同包探稟诉被告于本月三日及五日因分发传单,被捕解入捕房,从宽释放,今又阻止工人领款,要求究办。中西官判被告罚洋二十元,或押二礼拜,并着具结,以后不准滋事。

(《民国日报》1925年5月22日)

前次日商纱厂罢工事件,经捕房查得山东人刘贯芝〔之〕,亦系阻止工人入厂工作者之一,稟请公共公廨出票伤提在案。前日^①,由探目潘连璧、沈崇礼,将刘拿获,昨解公共公廨。刘延克威律师上堂,请求交保候讯。中西官磋商后,判被告准交一百元保,并着具结,对于此次内外棉厂事不准干预,候礼拜六讯核。

(《申报》1925年5月26日)

文治大学学生为工人募捐被捕

文治大学学生会为纱厂工人募捐,行至东京路口,有委员施文定、谢玉树二人,为捕房捕去。现该会除派员至学生总会报告外,并召请各校学生会讨论办法。

(《民国日报》1925年5月24日)

文治大学来函 敬启者,本日阅贵报本埠新闻学生被捕案候日领堂期审讯一则^②,与事实不符。敝校学生施文定、谢玉树于上星期六(二十三日)下午,以课余自由离校,在附近为失业工人募捐救济,当时手持捐启捐册,在东京路某店募得洋二角,欣

^① 据《民国日报》载,系五月二十三日。

^② 指《申报》五月二十六日消息,请参看以下一条资料。

然外出,适为西捕瞥见,认其散发传单,无照募捐,有干捕章,遂即带入普陀路捕房扣留。敝校立时派员交涉,请其一面保释,捕房坚持不准,但允加以优待,由敝校日送三餐,随时探望。至第二日,方有上海大学学生四人经过普陀捕房,因嫌疑被捕,显属两事,至希贵报更正为荷。文治大学启。

(《申报》1925年5月27日)

上海大学学生因公祭顾正红途经租界被捕

普陀路西捕头福来与包探崔顺扣、陈广义及中西探捕,前日午后一句余钟,在沪西宜昌路、戈登路等处,查见文治大学学生施文定、谢玉树,上海大学学生韩步鲜〔先〕、江锦维、赵振寰、朱义权等,手执旗帜,上书“要日本人偿命”、“夺回工厂”、“奋斗到底”等字,结队游行,沿途分发传单,当将施等六人,连同旗帜、传单一并带入捕房,昨(二十五日)晨解送公共公廨请究。据捕房代表梅脱兰律师上堂,声明被告等结队游行,并未得工部局允许给予照会,有违定章。该律师并称:近来日商纱厂罢工风潮甚烈,且损坏纱厂机器,本案与罢工事件有关,故请求改由日领陪审云云。继由一千另〔另〕八号华捕唐振东上堂,证明渠目睹游行情状,谓渠于昨日下午一时一刻,便衣经过该处,见有三排人,每排十余名,各执旗帜,获案之韩、赵、朱三被告,当时手执传单,由赵散发,渠亦得一纸,等语。被告内之施、谢两名,延中国律师辩护。其余四名之代表克威律师,到堂译称:此案被告以其同胞被人枪伤身死,昨日(二十四日)公祭,路过租界被捕,对于纱厂罢工之事,毫无关系,请求准予交保,或将被告从轻发落云云。关

谘员与英马副领事磋商良久，以此案有日商关系，遂下谕云：应否交保，候礼拜六(三十日)解案复核。

(《申报》1925年5月26日)

一周被捕记

施文定

予肄业上海文治大学。今次宜昌路日本内外纱厂工友顾正红被日本人惨杀，敝校同学多(目睹)其血肉横飞之惨状，痛强邻之侵袭，恨公理之不伸，复怜工友为真理奋斗，牺牲工作，罢工数星期，嗷嗷待哺者数万人，狐兔之悲，天人共悯！我校同学义不容辞，组织援助工人募捐委员会，出外劝募，以图集腋成裘，济此穷氓于倒悬。

予被推为委员之一，于五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五十分，分三队出发。予一队共四人，各执捐启数十份，捐册一份，走及东京路，募洋仅得小数。有一九〇五(号)中捕将予所执之捐启传单夺去，谓予曰：“先生等援救工人，殊深佩服！但此地系公共租界，不可自由布发传单，予虽不加干涉，苟西捕查见，必将受捕。”予感其预告，方欲回校，瞥见一目光灼灼之四十号西捕，并不细询理由，如鹰捕雀，予与同学谢玉树君，竟被其强硬之手腕所捕获，径投入戈登路普渡〔陀〕路捕房。噫！从此青年爱国之运动，为帝国主义者所凌辱，于斯开幕矣！

四时三十分，予二人拘进捕房，在写字间立待总巡。座中坐有□八号之西捕三道头，旁有一仰西人鼻息之中国翻译员。西捕以本〔未〕谙中文，命译员笔译。盖使译员此时稍具天良，一念强

邻进逼同胞摧残，未尝不可圆通意旨，以周全于其间，或可从(轻)开释；乃狠心洋奴，加甚其词，费二小时之光阴，翻译成文，可不痛心哉！六时五十分，尚未应审，同学探问者不绝，有送饼干以佐予二人晚餐者。九时余，有一碧眼黄须、形状极险恶之老西捕，手执藤仗，自内出，予忖此必该捕房之捕头也。彼出其厉声之西语，目注予二人曰：速进此铁栏，静听吾言。予二人忍气立入。彼谓予曰：“此地是外国租界，尔中国人并不可在租界私发传单，有碍秩序。且此次工潮，工人之被杀，实由自取，现正缉获肇祸之工人。尔学生胆敢为其捐募，致延风潮，非严办不可！今晚必须拘押，候后日公堂裁决！”言时声色俱厉。予与辩论再三，终受其无理所压制，厉声斥责，视亡国奴为尤甚！敝校校长代表请求保释，亦属无效。

十时，予二人遂关入牢笼，初打手印二十一，次量身之长短，再检查身藏之物件，即裤带鞋袜带，尽被收去。饭食被褥，允许自备。十时半，窗外探询之同学未去，而予二人竟如干犯弥天大罪，急急匆匆，拘入齷齪难堪之铁栅中矣！予于右首小房内，将自备之被褥铺在木炕上，炕以十二块狭板拼成，钉以铁皮，高低不一，卧其上，骨痛难堪。炕下潮湿异常，水虫攒聚。盖此铁栅，低而窄，无窗孔以通风，终年不受阳光所照也。谢君系南洋华侨，与予言语，颇多隔阂，更添愁闷。遂卧倒炕上，默自沉思，静听残漏声声，催晓筹之鸡唱也！

二十四日，天未黎明，猛听栅外高声〔呼〕“走出来”！予二人疾出恭听，二西捕点数而去，斯时乃觉狱吏之威，尊于天帝！左首屋内之三人，中有一工会交际代表刘贯之君，余系私犯。刘与

予谈，颇投机，盖亦一爱国志士也！少顷，同学将予夹袍及早膳送至。九时余，学生总会代表刘君等五人，亦来探问。下午四时，上海大学同学朱义权、韩步先、赵振寰、江锦维四人，欲赴顾君追悼大会，手执旗帜传单，路经捕房，亦被捕入，相见之下，悲喜交集焉！悲国势之日衰，强权之残酷，视吾人有如犬马，藐国体等若无存；差幸犹有为国奋斗之同志，亦足慰岑寂于铁窗中矣。晚饭毕，团坐炕上，工友刘君亦参加谈话，十时半就寝。惟予辗转反侧，一梦未成。夜半，西捕入内巡查，——计其巡查，日必十数次，而来者系三道头，其凶猛狞恶之状，实难堪也！

二十五日，乃赴会审公廨受审。八时，华印捕多人，强拉予二人及刘君，先至写字间铁栏内立待，华捕以洋手铐将予等一一铐住。有一华捕拭泪语予曰：“先生等为国牺牲，何能堪此荼毒？余身食其食，无奈何耳！”予聆其言，而私庆吾国之民心未尽死也。

逾一小时，乘予等于一铁甲之汽车，外固铁锁，有西印华捕六人，悬手枪木棍，随车监压。车驶如飞，未十分，已抵浙江路会审公廨，下车受二校同学之举帽鼓掌欢迎，然予等恐受巡捕禁止，仅表情示谢意而已。在候审室立片时，即开审。二校均延律师出席。值堂会审官系英领事与关炯之，双方辩护，结果，谓事关日商问题，非经星(期)六日领事亲审不可，仍命还押，不得交保，刘君亦然。言犹未终，数捕将予等急拉下堂，仍扣洋铐，遂乘囚车。斯时一片同学之呼援声、慰问声，已震动于公堂之门外矣！时车中罪犯加多，上大同学江君，年仅十五，感受一夜捕房待遇，精神颇惫，又患晕车症，将作呕状。幸一华捕扶坐膝上，手

摩其胸，俾舒其气，殷勤可感，真一热血之同胞也！

车抵捕房，还押铁栏，时已十二时四十分。予等坐炕上静息，意欲向同学处取小说数册，以资消遣，借度六日之光阴。（青年少不更事之心理亦复可怜！）迨二时，予同学竟绝迹不来，校中午膳，亦未送至。方自猜嫌，而老西捕忽率二华捕入，厉声曰：“此地非学校，可为尔等行乐者耶！”并指嘱华捕，速将炕上之被褥取出。华捕心不忍，面呈踌躇色，捕头立掌其颊，不得已，尽卷被褥而去。予等感□痛苦，五中摧裂！并推知今日午膳之迟迟，同学之绝迹，必为捕房门禁所闻〔限〕无疑矣！悲痛之余，默坐对泣者半晌。抵晚，内外音讯隔绝，狱卒送例饭至。饭盛于小洋铁罐，每人一罐。罐上饭余干斑斑，历历皆是，似系终年不洗者，食时必有千万微菌随之下腹。食料为极下等之糙米，稻谷石硝极恶不堪，罐中投入盐萝卜三条（闻系有人包办，每日每人菜钱只铜元一枚云），箸一双倒插其内，从铁栏下，以足尖推入，如饲犬状。并掷赐四条布满蚤虫之毛毡，为予等睡卧御寒之用。众罪犯争食罐内之饭，而予等悲不自胜，但熟视之，手不忍取，口不忍尝也（牢狱之黑暗，非此中人不能道其万一也）。

翌晨（二十六日）五时，西捕持一长竹帚，提一洋铅桶，嘱一贼犯督率予等于屋内泼水打扫，整理厕所。予等不敢呈难色，盖恐鞭鞑，忍气为之。有顷，狱丁送早餐至，予为饥饿所迫，强食之，未数箸，喉梗难咽，相对唏嘘而已。口渴则到厕旁冷水龙头处，双手捧水以解渴。计七日中，从无一点水汤以润肠胃也！午晚膳，仅略食十之一二，以延残喘。闷时互谈谜语故事等，强为欢笑，或步武屋中，或席地而坐，以资排遣！予尝以首探望，有无

同学之来问者，用侧目从铁栅间注视大门至写字间之一小隙，明知望梅止渴，无济相思。每见同学探询，为门禁所限者，日必数十起！而彼等临去时，必反顾铁栅，举帽以示遥慰，一种诚挚之情，关切之谊，诚言之伤心，笔之可痛也！

(《血潮日刊》第22、24号，上海学生联合会，1925年6月25、27日)

(二) 学生会等团体奋起援助工人和被捕学生

全国学总和上海学联向捕房交涉释放学生无效

全国、上海两学生会昨日得文治大学学生会报告，该校同学谢玉树、施文定，因劝捐被捕，虽经该校校长再三交涉，仍未释放，请予援助等语。当经两会各推代表二人，昨日上午十时赴捕房交涉。首由代表张银河谓学生劝捐，并未触犯刑律，希即释出。由接见西人答云：劝捐演说自属法律范围内行为，惟传单内有反对二十一条文字，殊有妨害租界治安，此案已成法律问题，当送交法庭办理，任何人保释，均不能释放云云。结果未达目的，遂相率退出。继又得上大学生朱义权等四人被捕消息，决于明日下午讨论办法。

(《民国日报》1925年5月25日)

全国学总开会议决通告各校出动演讲，唤醒民众

全国学生总会昨日上午九时，在西门大吉路会所开第三次常务委员会，由刘一清主席，何成湘记录。首由主席报告往来文件，次讨论各项议案：(中略)二、援助文治、上大被拘学生案，结

果一方面发表宣言,宣布两校学生被捕房拘捕经过,并促日资本家履行迁厂回国的宣言;一方面通告全国各校,一致出发演讲,唤起民众的注意。(中略)五、纪念六三运动案,决定加入六三纪念会,并发行特刊。(中略)至十一时散会。

(《新闻报》1925年5月27日)

全国学总发表宣言,抗议帝国主义枪杀工人、 逮捕学生,号召废除不平等条约^①

亲爱的同胞们!此次上海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沪上人士尤其是一般学生莫不愤慨异常,纷纷起来援助。只〔这〕可见民气未死,国事正足有为。可是因此竟遭帝国主义的嫉视,无理压迫,又酿出两件意外不幸的事来。一、本月二十三日,上海文治大学学生在东京路募捐援助此次被杀及罢工的工人,被普陀路巡捕房拘去施文定等三〔二〕人;又二十四日,上海大学平民学校学生,赴潭子口追悼此次被杀之工人顾正红君,复被戈登路捕房拘去朱义权等四人。我们想想是什么一回事,学生募捐援助工人和学生追悼被杀工人,本属法律范围的事,竟触犯了什么“特别刑律”,要受捕房的拘捕呢?“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也许他们有他们之所谓法律和理由,可是我们要知到〔道〕,在他们势力范围之内,我们完全无自由之可言。我们连帮助本国人的自由都没有,连追悼本国人的自由都没有!“国犹未亡”,一切自由早已剥夺净尽,所谓中华民国,岂不是名存而实亡?我们对于这

^① 原标题为《学生总会对沪惨杀工学案宣言》,宣言发表的时间估计在五月二十四日以后,五月三十日以前。

种无理的压迫,当然非严重反抗不可。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受“租界”内“法律”的支配呢?谁也知到〔道〕只〔这〕是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因为租界和领事裁判权都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不平等条约不废除,中国人民永无自由之余地。我们甘为亡国奴则已,否则只有大家联合起来努力于下列各种运动:一、废除不平等条约;二、收回租借地;三、取消领事裁判权;四、请日本资本家履行迁厂回国的宣言。全国学生总会启。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6月4日)

上海学联决定继续募捐援助工人,并援救被捕学生

上海学生联合会昨日下午三时开常务委员会。朱咏荷主席。首由主席报告开会,继讨论:一、进行募捐,以维持罢工工人生计;二、援助文治、上大两校被捕同学;三、推举张超出席雪耻会执行委员会;四、筹备夏令讲学会;五、征收会费,由会计委员分托各校委员办理。至五时始散会。

(《民国日报》1925年5月26日)

(三) 全国总工会等团体吁请全国人民一致 援助工人斗争,投入反帝运动

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援助沪、汉、青岛各厂罢工宣言

全国各工会各报馆转全国各团体公鉴:上海内外棉纱厂故意锁闭厂门,强迫解散工会,工人要求开厂上工,日资本家以手枪向群众轰击,死工人顾正红一名,重伤数十名。日资本家复将

工厂锁闭五厂,现在工人失业者八千余人,要求上工不得。死伤工人要求抚恤并惩办凶手,日资本家置之不理,反屡次要求中国官厅取缔工人〔会〕。同时青岛内外棉及大康纱厂资本家日人,锁闭厂门,声言非工人解散工会,厂不开工。工人要求上工,日资本家不允,且大(肆)宣传工人暴动罢工,向旅顺口调来军舰两艘,武力压迫工人。日本公使芳泽反向我们政府大提抗议,服从日本的安福政府竟公然派大队兵警围杀工人。现在工人已被杀死二人,失业者七千余人,要求上工不得。汉口英美烟厂无故开除工人百余名,逼起工人全体罢工。同情罢工者有和记蛋厂、花厂、火柴厂等工人,共有万余人。资本家不允工人要求,且拘押工人首领。

全国工友及各界的同胞们,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工人,是何等的残暴无耻!为日本帝国主义所豢养的中国政府,不独不能保护中国人民,反仰承帝国主义者之指使残杀工人。我们处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之下的人民,如果不愿像蠢猪一般忍受压迫而死,如果要想起来图谋自身的解放,对于上三件受帝国主义枪杀鱼肉的三万工人,应处一齐奋起,打倒帝国主义的无理残暴,援助被压迫的工人取得胜利。

各界的同胞们啊,帝国主义残害中国人民是一样的,今日可加之工人,明日即可加之任何中国人。帝国主义的势力一天不打倒,中国人民所受的侮辱与残害,就要继续一天。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对于目前这三个重大事件,就不得不一致奋起。各界的同胞们呵,奋起,打倒帝国主义,援助被压迫枪杀的工人!

全国的工友们,工人阶级的利害是一致的,压迫阶级给我们

的压迫,没有彼此的分别,我们应该一致的团结起来。总工会极望全国各工会对上海、汉口、青岛被压迫枪杀的工人,马上起来,一致与以实力的援助。

打倒残暴无理的帝国主义!

援助被压迫枪杀的工人!

被压迫阶级解放万岁!

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京报》1925年6月7日)

沪西工友俱乐部收到全国总工会及各地工会声援电和传单

(工部局警务日报五月二十七日) 五月二十五日工友俱乐部收到从广州、青岛、济南、安源、湖南各地工会拍来的表示同情和答应支持的电报。青岛的电文如下:“这是咱们第二次和当代帝国主义作斗争。我们希望在你们的帮助之下咱们共同斗争到底。你们必将获得胜利。”

(五月二十九日) 五月二十八日潭子湾工友俱乐部收到全国总工会自广州寄来的传单一包。该传单鼓励工人坚持下列条件:一、惩办枪杀中国工人的日本人;二、受伤工人和死难工人的家属应由厂主负责赔偿;三、厂主应严格遵守原有协议的条件,此外,并应接受工人现在提出的要求;四、厂主应向工友俱乐部道歉;五、日本领事应向中国当局道歉。

(译自《六国调查沪案委员会报告》第26号附件所载《警务日报摘要》)

北京学生联合会援助上海、青岛、汉口各处罢工工人宣言

全国各界同胞们！最近所发生的上海、青岛、汉口各界〔地〕工厂工人罢工事件，都已知道了吗？我们不要袖手旁观吧！这是我们民族独立运动中最急进的先锋队的大争斗。他们反抗洋资本家，就是代表我们一般民众的利益，向帝国主义进攻。他们的成功与失败，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过程中的一次发展或失败史。我们也应整齐我们的队伍加入争斗，与帝国主义者拚一死战，作他们的后盾。原来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工人，于三、四月中，因久已在日本帝国主义者铁蹄践踏〔踏〕之下，蹂躏得他们行将粉身碎骨了，忍不住这样的痛苦（起而罢工，获得斗争）中的小成功，要求得了各条极为低廉的条件；而残忍不仁的洋资本家，事后反覆无常，不肯〔顾〕双方签定的条件，所以又激成了此次的大罢工。在上海的洋资本家于此罢工中，反枪杀工人多名，伤者无算。青岛的野蛮的日本帝国主义，更要调遣军舰来大加屠杀。汉口的工人最近亦受不住英美资本家的压迫，各业工厂罢工者万余人。各国狼心狗胆的洋强盗们，不惟不念中国工人的困苦，早日允许工人的要求，使此数万罢工工人立即恢复工作，反对〔而〕一齐摆出他们横蛮的面孔，向他们御用的走狗政府提出抗议。工人有罢工自由，中国既非他们属国，他们可以深入内地的在中国来当强盗，不许中国的主人翁对他们有怨言，不许中国工人为求得三餐饱食而罢工，他们更可在中国领土内来压迫中国人，不平之事，宁有此极！全中国的（被）压迫同胞们，我们试想想：帝国主义者刮剥中国的民众，久已至于肉销骨瘦了，他们有军舰来镇压我们

的商埠，他们有大炮来威胁我们的同胞，他们更有□□□□□
(卖国贼政府)供他们的驱使，所以他们可以肆无忌惮的在中国横行起来。每逢我们一有反抗的行动，他们便要我们血流街市，弹洞胸臆。我们一般民众的自由，常被他们以直接或间接的手段，武装的褫夺无存。我们一般民众的脂膏，常被他们摧残殆尽，弄得全国兵匪满地，哀鸿遍野。他们又在中国广开工厂，一方面破坏我国的产业，凋弊我国的民生；一方面更尽量掠夺我国的工人，教他们作十二时至十四小时的工作，但只给最低的工资，使全国的工人群众饥身枵腹，以供他们的挥霍。至工人们的妻小家属，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寒风啸壁，无被为温，暴雨穿屋，寝地成河，这是洋资本家所不肯举眼青盼的！中国民众的痛苦，中国工人的惨状，恐在世界上要算首屈一指的了！但这般的强盗凶横，我们真让他跳梁无忌吗？全国民众的奴隶锁镣，我们真(让)它们永存于我们的手颈之上吗？他们的军舰大炮，我们真让他长在中国横冲直撞，准对我们的头颅轰击吗？不！我们绝对的不！这只在我们的努力呀！现在炮烟朦胧的反帝国主义的战线上面，已发现我们最急进而勇敢的先锋军，反帝国主义的上海、青岛、汉口等地的罢工工人。我们整顿起我们的队伍，加入斗争的前敌，援助我们的被困在敌心的上海、青岛、汉口的罢工工人。只有拚命的反抗可以敌当〔抵挡〕他们的军舰大炮，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可以援助我们的工胞，拯救我们自己。奴隶们的兴起就在目前了，我们不要恐怖(而对)工人阶级取旁观态度，以致灭杀我们反帝国主义的势力。因为如日本帝国主义的行为，除压迫工人以外，如在东京侮辱中国国旗，在北京、武昌指挥中国□□(军

阀)摧残中国学生国耻纪念运动,这是向全国国民进攻,绝不意〔止〕压迫中国工人。中国工人的反抗,也绝不止为着工人们自己而反抗,是很明显的事实。抵制日货的手段准可复用,以对待英美和帝国主义者。罢工的工人们应坚持着你们的反抗精神,接应的大队就是我们,你们不要馁气,工农兵学商各界的反帝国主义大联合时机到了!起!!起!!!

(《京报》1925年6月2日)

松江国民外交会援助上海工人斗争

二十九日下午四时,松江国民外交会开紧急会议。一、九江日清公司买办逼毙工人李瑞成,浔海关验关西人殴伤机伙及青岛当局压迫纱厂工人,本会应如何表示案。议决:由本会代电九江学生联合会,查询详情,俟复到再行核办。一面警告青岛当局,持平办理。二、内外纱厂日人残杀顾正红一案,迭经本会通电警告,并请省当局严重交涉,迄无办法,本会应如何力争案。议决:由本会再电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一面由本会会员演讲,以唤起群众注意,并函知各商家停进日货。三、帝国主义相逼日甚,国耻事实层出不穷,本会应力争废除不平等条约案。议决:由本会设法宣传,冀达目的。

(《民国日报》1925年5月31日)

(四) 五卅反帝示威在酝酿中

上海大学等校学生代表开会酝酿

上街演讲,恽代英到会指导

(工部局警务日报五月二十八日)来自各校的三十二个学生,于五月二十七日下午三时半在麦根路廿二号同德医专内开会,讨论抵制工部局提出的印刷附律和增加码头捐的办法,由担任上海大学教师的共产党员恽代英主席。在宣布开会以后,恽说,工部局除竭力策划制定那些我们应坚决反对的可恶的附律之外,最近巡捕房又逮捕了爱国学生,因为他们力图援助那些遭受日本纱厂主残酷迫害的中国工人,这证明工部局当局有助长压迫的非正义的倾向。然后就讨论和通过了下列决议:一、通过传单和露天演讲向公众说明罢工的真实情况;二、募款援助因罢工而急需救济的工人;三、现在被拘押的学生,如果到五月三十日尚未恢复自由,应采取措施,设法营救。会议在下午五时结束。有代表参加的学校包括小沙渡路二〇一号大夏大学,西摩路一三二号上海大学,宜昌路一一五号文治大学,劳勃生路群治大学,麦根路二十二号同德医专。

(译自《六国调查沪案委员会报告》第26号附件所载《警务日报摘要》)

六十余团体举行援救被捕学生联合会议,决定扩大宣传

文治大学、上海大学学生六人被捕,本埠各团体特于前日联合各团体开上海各团体援救被捕学生联合会,到者景平女校、合

作社上海分社、东方大学、大夏大学、南洋大学、艺术师范大学等六十余团(体)代表八百余人,雪耻会代表主席。议决:一、出版特刊;二、组织演讲队;三、经费由各团体负担,并向外募捐;四、由交际股向本埠各团体接洽共同进行,如必要时,由委员会派代表向外埠出发宣传;五、派代表向交涉使署请愿;六、联合本埠反对越界筑路、反对印刷附律等团体接洽。发〔末〕通过章程九条,并举袁文彰等十五人为委员,组织委员会,总理一切事宜。

(《民国日报》1925年5月29日)

南洋大学学生会为日人惨杀华工第二次宣言

自从这次内外纱厂工潮引起了惨伤的结果,我们就决定联合各界积极援助,以为中华民国爱〔争〕国体,为中华民族争人格。

工潮原是因为无可忍受的压迫与侮辱而发生的,而从工潮所收的成效,是日人的枪刀与顾正红君等的鲜血,这种凶横无礼的举动,绝灭天理人道的惨暴,引起我们愤激的援助。而我们援助所得到的,是警察巡捕对许多工人学生的监禁。他们非但有皮鞭铁棒,他们还有手枪利刃;他们非但有手枪利刃,他们还有巡捕警察;侮辱欺压虐待不算数,还要你的命;要了你的命不算数,还要不许人家说到你的事件,甚至于(不)许人家参与你的祭礼。

如果一只狗打死了,那也未必会不许人家谈论吧,那也未必会禁止何家悲怜的同情吧。但是现在当顾正红君在日纱厂门前伤到〔倒〕(在)手枪(利)刃交加之下,扛他到医院里去的几个工人也被捉去。各界公祭的一天,巡捕又施他的权威了,终久〔将〕

公祭的代表也捉去,募捐的学生也捉去,同时更通令各报馆不许记载各项工潮消息。试问外国人到底拿什么看待中国的人呀!美国人之下的黑人,英国人之下的印度,我们也从不曾听见随便可以公然杀人。现在小沙渡还是中国土地,中国人还不是亡国奴,而竟杀死了人连冤都不能呼一声吗?(世)界上还有天理,还有人道吗?中国还成国吗?中国人还是人吗?

我们处于这种肆无忌惮的压迫、绝灭天理的暴虐之下,我们惟有反抗,惟有奋斗,我们不但要援助工人,援助被捕学生,我们还要为天理争,为人道争,为中华民国争国体,为中华民族争人格

国人还要想做人吗?人是不可以随便加欺辱的,人是不可以恹恹,含垢忍(辱)而屈服的,人是有恻隐之心,有羞耻之心的,人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国人还要想做人吗?请大家一致起来援助,一致起来反抗奋斗,一致起来为中华民国争国体,为中华民族争人格,我们凭我们(的)勇气,凭我们的热血,我们尽〔情〕愿做前驱!

五月廿九日

(《五卅血泪》第1期,南洋大学学生会临时刊物,1925年6月2日)

援救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工人学生(传单)

大家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它趁着它的爪牙张作霖的得势,

夹〔挟〕持着卖国的段祺瑞政府,

无顾忌的压迫我们中国人民!

它在东京禁止纪念国耻,撕破我们的国旗;

它在北京指使段政府,压迫我们的爱国学生;
它在上海故意苛待工人,激动罢工,杀伤多数工人;
拘捕表同情于工人的学生,禁止报纸登载一切关于罢工的消息言论!

工人顾正红已经被日本暴徒枪杀了,凶手却没有人敢于过问!

学生朱义权等已经忍受饥寒的关禁在牢狱中了,完全受日本领事官的自由宰割!

当真亡了国吗?当真我们大家已经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牛马了吗?

大家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应当一致的援救被压迫的工人与学生,

要求惩办凶手,抚恤受伤工人,开释被捕学生,

禁止日本在中国办理工厂,排斥日货,与日本人经济绝交!
我们中国人帮助中国人!反对一切袒护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外势力,我们要求大家起来向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战!

(原件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日人惊呼学生被捕后反帝宣传更加猛烈^①

内外棉依然继续停工,不见任何解决的迹象;罢工工人方面仍在进行强烈宣传,不见有轻易复工的形势。最近的宣传好象几乎全部转入学生之手。日前,这些学生中有十三名^②被逮捕,

① 原标题为《宣传打倒帝国主义》。

② 疑为六名之误。

因此学生的宣传更加猛烈，尽力散发传单。毫无能力的中国官宪似亦不能加以镇压。传单内容多数为援助罢工工人和宣传共产主义。二十六日以后，出现以打倒帝国主义为目的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排日倾向的宣传也不少。有乘此机会煽动排日的形势，不良分子显然在这方面努力进行。

(译自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编《我国纺织业罢工事件与五卅事件以及各地的动荡》第一辑，第142—143页)

上海学联决定组织演讲队到租界宣传

顾正红被惨杀后，附近之文治大学学生会，即召集会议，决定出发讲演募捐，以期唤醒民众之同情。次日，该校学生谢玉树、施文定二人，在东京路讲演被捕入狱。上海学生联合会得报，即召集紧急会议。同学愤慨激昂，一致决议，先派代表向捕房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和学生。当推定代表二人，往普陀路捕房。捕头拒不许入，辱骂随之，代表等失意忍怒而返。

代表返会报告，群情愈愤，然上海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仍转〔主〕和平，复推代表赴交涉署，请提抗议，释放学生。时日迁延，仍未释出。二十四日上海大学学生朱义权、韩步先等四人，因公祭顾正红，经过戈登路，复被拘入狱。闻者，莫不为之切齿。本会亦不能再向横蛮成性之英人，作乞丐式之哀告。

同时，外人恃强提出三项无理之要求，上海各界同胞，均惊惶失色，由租界外人会议通过，即欲起始实行。

- 一、印刷附律；
- 二、码头捐；

三、交易所领照。

上海学生联合会见政府之软弱无力，民众复徘徊不前。挺身履险，得此纷至沓来之祸事，向民众痛陈，冀以博得群众之同情，一致立起抗争，打消外人横加吾民头上之苛约，昭雪工人之耻辱。乃于五月十九日〔二十九日〕开会^①，决议出发讲演，并规定以五人至七人为一组。南洋大学、复旦中学、同文书院担任一、二、三、四、五等马路一带；南方大学担任杨树浦一带；同济、中公、商大、复旦、暨南担任北火车站一带；上大、大夏、东华、同德、文治担任静安寺路、爱文义路一带；定次日下午一时，分头出发。

(摘自上海学生联合会编《五卅后之上海学生》
第一章，1925年12月30日)

(上略)上海学生会于五月二十九日那一天，开了个会，决定：(一)组织决心牺牲的演讲队向租界出发演说；(二)联合各团体一致运动。他们预料到租界演说，巡捕一定要出来干涉，出来拘捕。所以组织先锋队、后备队二种，设队长一人，以为指挥；先锋队被捕，后备队便继续上来，务使演讲员从五个增加到十个，从十个增加到二十个，使巡捕捕不胜捕，如此乃可引起市民的关注。他们的计划决定以后，便预备了许多旗帜传单，并拟定了演说大纲通告各校各团体，大体是：(一)说明日厂主对工人的强暴及工人反抗的意义；(二)说明中国纱厂因受日本的压迫而致失败；(三)说明此次学生援助工人的意义；(四)说明最近列强压迫中国

^① 系根据党中央二十八日的决定，参看本卷第138页李立三《纪念蔡和森同志》一文。

的事实,如东京五七事件,洮齐铁路事件,渔船侵入内港事件;(五)以援助工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释放被捕学生为口号。

他们决定了,便于次日(五月三十日)向租界出发。但是我想他们的可谓决心牺牲的演讲队,必定以为演讲的牺牲,至多到了拘禁为止。无情的枪弹,竟会突口而出,真是他们所梦想不到了。(慎予六月四日补记)^①

(《国闻周报》第2卷第21期,1925年6月7日)

学生代表偕工人代表赴各校呼吁,各校学生 决于五卅停课出发讲演

顾正红惨毙之案既出,上海报纸无敢载其事者。学生界前往质问,则直以报馆开在租界,登载顾案,则立时可以被封被逮。工人集资,欲将顾案登一伸冤广告,各报亦皆婉辞拒绝——而每日连篇累牍反载工人横暴、资本家宽仁之新闻。上海大学学生有因此愤而捶胸痛哭者,然迄无法使社会知有此不平之冤抑。

五月二十七日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委员会^②开会——列席委员二十八人,均系各校青年学生。余以此事为中国民族对于帝国主义之问题,如竟如此无声而没,则将来何堪设想。讨论结果,决定翌日全体委员向学校请假,每一委员带一工人代表,赴各学校报告日人虐待工人之经过。二十八日^③上海

① 原标题为《南京路之血》。

② 该会当时由共产党人恽代英同志领导。

③ 据《中国青年》第八十二期(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八日出版)《学生与革命》一文的叙述,为二十九日。

各校学生得此报告，均甚愤怒。次(二十九)日又得二十八日青岛日本纱厂勾结张宗昌军队及温树德部海军陆战队，以排枪轰工人，并将尸身塞入阴沟灭迹之讯。二十九日深夜，二十八委员报告执行部，言各校决定于三十日停课，出发讲演。当时执行部计算，以为次日或可有五百学生出发。

五月卅日清晨六时，公共租界南京路福州路等处，即发现学生约三千余人。(下略)

(萧楚女：《民族革命运动史大纲》，第56—57页，汉口长江书店1927年3月)

伍、五卅运动的爆发

一、五月三十日的反帝宣传示威和 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

(一) 反帝示威参加者和惨案 目睹者的报告与回忆

上海大学学生的流血奋斗^①

学术的研究与社会的运动必须相辅而行，这是我们同学一向所取的态度。我们就根据了这种态度和我们平时研究与活动所得的结果，知道现在的中国非经国民革命，我们的民族决不能脱离半殖民地的地位，从帝国主义的严重压迫下解放出来。要达到国民革命的目的，先要唤醒国内被压迫的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共同奋斗，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同学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负担了我们的责任——向民众宣传，做反对帝国主义运动。而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为要维持他们苟延残喘的生命，始终想破坏革命的势力，

^① 本文摘自马凌山《本校同学三年来的奋斗工作》第三节《五卅运动以来的努力》，标题系编者所加。

以消灭这种运动。所以对于我们取了绝对仇视的态度,任意诬蔑,妄加摧残!这次五卅运动,是中国民族处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必然发生的事件,决不是受任何方的支配和指使,也不是偶然发生的事实。我们的同学平时饱受着帝国主义者严重压迫,和我们在事前的观察,已认清了这运动的真正意义,所以有首先出来做民族解放运动的志愿和决心。我们虽自恃力薄,对于这次运动不能有特殊贡献,然而在客观的事实上可能的奋斗与努力,却自信不敢后人。若烈士何秉彝的奋斗以至于死,尤足以鼓励同学,振发国人。此外同学中或被捕、或受伤而百折不挠、愈加(奋发)的现象,更可证明我们奋斗的决心与勇气。现在把我们在这次运动中活动的经过,分述于下:

一、五卅以前的活动

自小沙渡日本内外棉纱厂第二次罢工后,我们即认为有重大的意义,决不是普通的罢工可比。到了顾正红被惨杀以后,这种事实益加显明的表现出来。我们在这时就组织讲演队,并募捐援助工人。五月二十四日本校同学率领平民学校学生,公祭惨死同胞顾正红,在普陀路为英捕阻止,当时拘入捕房者为同学朱义权、韩步先、江锦维、赵震寰四人。

捕房既捕去我们同学,如获大盗似的。同学及被捕者家属前往看视,亦遭禁止,并不准传递衣服食物及信息。每天仅给两次砂米相杂的冷饭;晚上睡在全室幽暗、空气不通的潮湿水泥地板上。一日须点名二十次,以杖数人,如驱猪羊,起(身)稍有缓者,则鞭打随之。天微明即将冷水冲入室内,不问室中人是否起身,

致身上衣服常湿，鞋袜非脱去不可。……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已看出帝国主义的阴谋，不单是压迫我们的劳动阶级，显然是向我国人一致进攻。我们认为这时再不起来反抗，将永远的被他们压迫着。所以我们一方面联合各校同学，组织一个被捕学生援助会，讨论营救被捕同学的方法；一方面向帝国主义者示威与唤醒我们的民众，希望运动的范围扩大。等到援救会通过了我们的要求，我们就定于五月卅日全体出发，在南京路、福州路、河南路及会审公堂一带演讲，说明帝国主义者侵略我们经过情形及惨杀我们的同胞、拘捕我们的同学等等事实。这时已有同学可望开释的消息，但我们并不因此中止我们的运动，我们还是继续努力着，做我们宣传的工作。这时我们恐怕捕房用缓和空气的办法，来消灭我们的运动，所以我们暂置被捕问题于不顾，用全力于民众的宣传，以期得更大的效果。

二、大惨杀中的奋斗

五卅的早上，我们被捕的同学已全部交保释出^①，我们在开欢迎会的时候，就议决了即日出发演讲，并决定组织的方法。每组十人，设组长一人。每组中只要有一人被捕，全组必须同往，改以他组继续演讲。盖必如此才可表示我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才可引起民众的同情。当日出发时共三十八组，人数在四百人以上。每组均有“学生讲演团”的旗帜及传单。我们全部分配在

^① 据《字林西报》六月一日报道，被捕学生于五月三十日受审后，再一次还押，等候特别审问。故“交保释出”是暂时的。

南京路新世界至抛球场一段，都争先恐后的集合于敌人的大本营——老闸捕房门口演讲。在两小时以内我们同学被捕(入)捕房者有百数人，然后以人数过多，捕房不能容纳，随即鞭打足踢的驱逐出来。未经释放的有三十五人，即捕房之所指为首领者。

捕房虽以暴力压迫我们，而我们同学仍是继续着演讲，不但毫无惧色，反而勇气倍增，因此听讲的人数愈多起来。而丧心病狂的西捕竟大肆其兽性，开放手枪，向群众射击至四十余发。一时死伤遍地，血肉横飞，而冲上前锋之战士何秉彝同学，就牺牲于帝国主义的走狗的枪弹之下。于达同学亦负重伤，此外轻伤者亦十余人。这是本校同学从事社会运动第一次的大牺牲，亦即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一次大损失。我们相信这次南京路的血痕，将永远地遗留在民众的脑海里，成为一个深刻的印象，以期最后的努力。

三十一日，本校同学因昨日的惨杀，愤激异常，一面通电全国，促全国民众一致奋斗，一面仍继续出发演讲，大都集中在南京路新世界至石路口一段。是日仍有六十余人被捕，内有女同学五人，但随时即释出。下午三时许，我们又参加市民大会，要求总商会签约，商界必于明日一致罢市，结果通过了我们的要求。

六月一日，我们同学仍出发演讲，分配在浙江路福州路一带，仍有多人被捕，但不久即释放；又联合工商界及各校，实行罢工、罢市、罢课，运动之范围始扩大。(下略)

(《上海大学三周年纪念特刊》，1925年10月23日)

从杀工人到杀学生，从杀学生到杀全国人

身居上海，张眼一看，真可怜，哪一个地方可以显得出上海是中国的上海？哪一件小事可以说上海是中国统治之下的？你看，他们怎样的奴视我们，怎样的苛刻我们，怎样惨暴的杀害我们？他们还哪里把中国当国家？哪里把中国人当人类？言念及此，心痛如锥！现在我要忍着呜咽，同国人讲讲。

这是五月三十日的那一天，我们同胞的血溅到帝国主义所盘据的英租界大马路，上海顶顶大名的最繁华的英大马路（就是南京路）。我们学生是游行宣讲去的，是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引起国人注意去的，是为了华工顾正红先做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牺牲品，工人代表、学生代表被捕而去的。他们老实不客气把枪打我们。我们没有枪，我们只有手里拿的旗子，嘴里喊的口号，所以终被打死了好多。但是，大家听着，我们的小旗子，我们的口号，真可以打倒他们荷枪的外国人；只要我们牢牢记着五卅，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做爱国运动，大家上前奋斗！

一、工 潮

日本惨杀华工，现在容我略告。在小沙渡日本所开的内外纱厂里的华工，因为平日受了日人之苛刻待遇种种残酷，乃提出要求四项：（一）勿无故殴打工人，（二）勿任意开除工人，（三）两星期发工资一次，（四）发还存储金。其实这四条照普通的眼光看来，哪里算什么条件，正是工人应有的权利。哪知日本人非但不答应，并且开除工人代表。工人以切身的关系，自然愤慨，是

以决计停机(停机与罢工不同),再派代表赴各方奔走接洽,好容易调停稍有眉目,于是相率要求上工。可是就在那工人齐集厂门要求进厂的时候,日本人即时行凶。一时秩序紊乱,工人顾正红身被四枪,(中略)一个可怜的同胞已做了日本人枪下的冤鬼了!大家请想,这是什么事情!日本人无故枪杀中国工人,这是多么重大的事!但是日本人非但不惩凶、赔款、认罪,他还勾同〔通〕了英法捕房,在公祭顾正红的那一天,拘捕我们学生代表、工人代表多人。更可怜的,中国官司要外国人办。代表提〔捉〕去了,会审公堂开审非正式的要判决监禁六年。嘿!这是什么话?学生工人又没有杀人,又没有偷东西,国人请看外国人要我们的性命,夺我们的自由,是这样一斑的!而更可恶的是从这次工潮后,工部局即通知各报馆不准记载。各报怕他的报馆封了,怕他的主笔要捉去,只好让工人们死而无闻,连轻描淡写的记载都没有。这是多么凶狠的压迫手段啊!

二、五月三十日南京路的血

第一次审过,第二次就要正式判决,日期就是五月三十日。我们的血是热烈的,我们的心是仁爱的,我们怎能坐视无辜的同胞横被蹂躏!所以学生联合会就开会讨论,议决于五月三十日全体游行、演讲、请愿。我们南洋^①并且在隔夜开了一个全体大会,请工会代表来会报告被压迫情形。一时气夺风云,全体议决上午九时出发演讲,并预备大家到巡捕房去与被捕同胞共甘苦。

^① 即南洋大学,后改名交通大学。

五月三十日上午八时，南洋学生齐集大操场向国旗行礼。阴森森的天色，肃杀的喇叭声，伴着同胞们向残缺的五色旗行礼。一个暗示给他们：“行军气象”、“男儿马革裹尸在沙场！”于是大家整队出去了。在火车站、会审公堂附近，略为散发传单，对众演讲。走到租界上，外国人就来干涉，把我们的小旗子传单一起拿去，并且押到巡捕房去的人，共有四十余人。大家壮气益增，在巡捕房里还喊“打倒帝国主义”、“援助工界同胞”。捕房以人数过多，索性一起放了。同学当然继续进行工作，仍在界路附近宣讲。外国人哪里肯放过！突然来了一个便衣探捕，不管什么，把宣讲的人推进火车站的铁栅（那里不是租界了），几至动武。我们始终用我们的武器——口号来抵抗。中国人谁说没有天良！大家听了，都拊膺切齿。这时候，被捕学生已交一百元的罚款，放了出来。但是学生为援助工人同胞，到底犯了什么罪要罚钱呢？大家是义愤难平，并且许多工人还没有放出，怎么可以罢手？所以决定下午至交涉署去请愿。

那一天天气很热，大家奔走了半日，吃过饭，天变阴黑，顿现恐怖。那时候，同济、法政、复旦、上海、文治等大学中学以及各校之私人加入者，都约定会集交涉署。我们南洋与复旦两校同行，排好了队出发，行经各马路，大家都带着好奇的神气咸来询问。他们能注意，正是我们所希望的。直到先施公司那边，就有一个中国巡捕同我们讲：“你们不要过去吧，那边外国人在那里捕学生！”我们当然十分感谢他的美意。但是，看他的很诚意、很凄惨的神情，越使我们悲痛，越鼓起我们的勇气。更听得外国人捕学生，我们大家都很慷慨地说：大家一同去好了，不要说关到

巡捕房,就说死也没有什么怕!一鼓作气,跑到英大马路,几个印捕和英捕举起了棒正在打那蠕动的人众——国人。一会儿,一个学生被捕了去,他们不肯放松,我们也岂愿罢手!大家挤上去,巡捕只得放手。他们一次捕人,我们一次挤上去,杂着一片呼声:“中华民国万岁!”“打倒帝国主义!”非但我们学生如此热烈,路旁的看客,甚至电车上、汽车上的乘客,大家都挥帽大呼。咳!这是多么雄壮的呼声!多么勇敢的民气!在外国势力最盛之区,这样表示真不可多得的!然而,英巡下令开枪了。中国巡捕是十分可怜的,他们在严令之下,不能不遵守,但是大家是中国人,——并且对方面又是一辈青年学生,又怎忍开枪?——不得已朝天开了几枪。在印捕和英捕方面,自然多打死一个中国人好一个,他们杀人不闭眼的开枪了。白烟弥漫了,枪声紧密了,(中略)可怜已有许多同胞辗转车尘马迹之间了。在劳合路那里,一辆人力车,坐着一个头破血流的学生,旁边还有许多学生扶着。那位可怜的同胞,一个手按着脑部的创口,一方手巾差不多全染了鲜血,那一个手还拿着一面“打倒帝国主义”的小旗子。扶他的同学们口里不住的喊:“这是外国人打得这样的,大家看啊!”这是怎样的触目惊心啊!这是多么惨的事!路上看客,都说照这样我们非罢市不行!

一条华丽广大的大马路,一霎时遍染了我们同胞的赤血。外国人有势力,我们有比势力更强的民气;外国人有快枪利刃,我们有赤血热心。他们现在把我们同胞残杀,我们大家只是忍着血泪的牢记着。大家团结起来,罢工,罢市,罢课!已经牺牲了许多同胞,我们大家牺牲到底,奋斗到底!

三、六月一日的大屠杀

果然这样大流血的大屠杀，好久压服在外国威权下之民气激起了。总商会跟着学生联合会罢课，也议决了罢市，工界当然分别罢工。好大的一个运动！外国人忿极，气极，骇极。可怜同胞又于六月一号被他们大屠杀，死者数十人，伤者更夥！

大家看吧！中国人还能生活吗？还要在上海说话吗？大家看呀，大家看外国人怎样的杀人如狂呀！大家看看昨日的《血泪日志》，这是怎样痛心的事呀！

中国人处于外国种种压迫之下，谁不愤恨？自从学生们号呼出反抗的声音，谁不情愿响应，谁不愿拚命？这几天来，国人冥不畏死，国人奋勇的态度，可以令人战栗，可以令人疯狂。

但是可怜各报馆，处于外国人监视之中，记者们蜷在电话间，主笔们（在）编辑室屏息着。报上只登着连篇累牍的电报，他们哪里知道外面愤慨、紧张、惨酷、暴戾的情状！五月三十一日，死伤情形他们一点没有登。六月一日只随便写着伤了十余人，这样连国人杀完了，他们也只会在排字房里排公函通电。现在学生自己有自由车队的组织，自己传布真实的消息。

自从五月三十日突然发生悲惨的大流血之后，学生的勇气更其奋发。当日晚上大家一面分散到各报馆，要求他们此次一定要登载，一面分散进行大罢市大罢工。但是中国现在的群众组织是不完备的，所以大家虽然是愤激义勇，但是仍旧散漫纷乱。总商（会）开会开六点钟之久，纱厂公〔工〕会一呼就到纱厂工人代表三千人，各界热烈的态度可以概见。然而罢工罢市，五

月三十一日还没有结果。学生在五月三十一日继续出去演讲散传单,但是大家为避免危险都分散着,一个二个逢人便宣传,巡捕来捉的时候,大家听他捉去。放了出来仍旧去宣传。所以那一天发生的惨剧不十分多。

到六月一日租界各中国商店完全罢市了!外国工厂完全罢工了!电车、电灯厂、电话厂〔局〕、自来水厂工人早就决定一致行动,因外国兵警严重监视未果。

然而这种竭力的不合作运动,引起了外国人重大的恐慌与残忍。他们调集了全体队伍,全体武装,来凭临我们赤手空拳的国民。于是发生了这一天遍地的大屠杀!

六月一日实是外国人在租界上杀人狂的那一天。义勇队向各路游行示威,各机关一齐戒严。天蟾舞台屋顶上架着机关枪,紧要路口架着炮车。捕房门口停着救火车,架好喷水管。海军陆战队、马队,他们所有可以拿出杀人的一概拿出来。他们逢人乱打,看见学生或者工人就要开枪。然而有一辆电车还在戒严得最厉害的南京路捣毁了。

学生这一天,仍旧出去演讲,发传单;而工人的精神,这一天,尤其惊人。工人们因为许多学生为他们争斗而死在外国人的枪弹之下了,他们就群趋于外国人枪弹之下。他们一点也不顾外国兵队的威武,一点也不顾机关枪的凶狠。他们看见电车还在开行就出来阻止,看见有人演讲或者巡捕动武,就高呼响应。

结果六月一日一天中死伤了约二百人!

(《五卅血泪》第2期,南洋大学学生会,1925年6月4日)

五卅之回顾

君 梦

五卅事件，前人之述已备。余所欲言者，乃当时余所经历一切情形。

五卅之晨，全校^①同学分队出发演讲。余排在第一队，队员十人，各级具备。先至苏州河畔，继往靶子路，散传单演讲。一般工人聆吾人之言论，为之唏嘘者久之。时方正午，闻某捕房以同学在租界内“扰乱治安”，逮捕数人。时同队者仅余三四人，恐其余已遭不测，遂直奔某捕房。其他同学之陆续到者，户限为穿，咸以“自首”为幸，此乃吾人事前所预定之计划也。捕头及包探三五辈，环绕吾等，似为非正式的拘留者。彼等要吾等签名，吾等则大书特写，争先恐后，表示为正义受耻辱有无上之光荣者。彼等见吾人意气昂昂，相顾愕然。吾人乃一不作二不休，大呼“打倒帝国主义”、“援助罢工工人”等口号，声若洪钟，响震市井。间有一形似包探者作不豫之色曰：“你们呱那呱那啥嚟事！”吾人欲饱以拳头，恨以身处司法地方，不宜出此。乃质之曰：“侬呵〔阿〕是中国人？我们作爱国运动不应该吗？侬吃了洋人饭就忘了国吗？岂有此理，混帐东西！”喧嚷间，一人向人丛中来，其人金发碧眼，着黄制服，所谓三道头者是也。渠向吾辈谈判，吾人不屑用亡国语言直接与之谈，彼乃引一寄人篱下之华人作翻译。其问答如下：

^① 指南洋大学。

“你们为什么到租界内来演讲？你们晓得租界内不许发传单演讲的吗？”他问道。

“因为日本纱厂厂主无故打杀华工，我们特出来请各界主持公道。租界是中国土地，不管许不许，我们总要游行的。”同学黎君答道。

“打杀工人与你们何干？”他很得意地问道。

“哼！打杀我大中华国民，当然要出来向那帝国主义者上一上。”某君答道。

他听了就连忙说道：“前天晚上有个用枪击我之中国匪徒，你们为什么不帮助他？”

“呸！他是非法之徒，不但不能帮助，并且还要重重的惩戒。”我们中之一人答道。他无话可回，只好打过招呼，叫我们出去。并同时说道：“你们一定要把旗子传单收起来，不许再到租界内胡闹。”同人以未尝铁窗风味，好不高兴，复相率往北车站附近进行。到该处则见学界已先我而至者数千人，盖拟联合游行租界也。已而达南京路，时方三下，群众云集，水泻〔泄〕不通。只以路径交涉，搁浅良久。红头阿三，高鼻洋鬼，奔前扑后，忙个不休。虽前方之障碍重重，吾人曾未少退，工人行于前，学界随于后，观众参杂其间，口号雄壮，声震屋瓦，传单飘飞，满蔽天日。行行重行行，霎时而大空前之惨剧作矣。（下略）

（《南洋周刊》第8卷第10期，上海南洋大学学生会，1926年5月30日）

关于五卅惨杀案的一封信

陈 复^①

美魂姊手足：五卅反帝国主义大运动之经过，七八日仍未报告，实在对你们不起。接到你来信，使我觉得再不能迁延了。

五卅事件，我之所以称之为反帝国主义大运动，乃因这并不是上海一隅的事，更不是工人被杀偶然的事，而实百年来帝国主义压迫侵略我国之反响的大爆发。倘能好好的与世界革命势力联合进行，这次运动不但可痛快地打倒帝国主义，使中国永脱离其蹂躏；并且全世界弱小民族与被压迫阶级一齐解放，成功了伟大的世界革命，光明了历史的篇幅。看！政治之侵略，租界，领事裁判权，不是已被反抗了吗？文化侵略，教会学校，不也被反对吗？约翰、圣芳济、震旦都解散了。最毒之经济侵略，不也被反对得最力吗？不合作主义已实行了。这可证明此次运动不单是反对日英人之横暴枪杀工人，而横暴之事不过激之成。再看，现下全国民众都已起来响应了，这可证明此次运动不是上海一隅的事，而上海不过是做这运动的前锋。可惜，许多人误解此次运动只对英日而发，不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更说不涉内政而不同时反对军阀，把这次运动的意义缩小。自然，我们要打倒英帝国主义，能利用法国去掣它也很好的，但我们绝不能靠法国替我们打英国，我们可以利用它，绝不能象“五四”时之被人利用。并且事实已告诉我们，帝国主义者在掠夺中国利益时，每会自相冲

^① 本函作者陈复，当时是复旦大学的学生。

突,但到对付中国革命运动时,总是联合战线的。我们要真真打倒帝国主义以自救,联合无产阶级与殖民地人民共同动作,才是正路啊!至说不涉内政以讨好军阀,冀减少压迫,实是无可如何的痛心事。然而我们应晓得军阀之助我们是靠不住的,正因军阀要靠帝国主义才能生存。你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不啻是打了他的父亲,他哪里肯放过你!你且看卖国的段政府之所谓交涉,便知道是毫无诚意的了。慢看啊!他老狗将来一定会执行帝国主义之命令来压迫我们的。在这潮中,我们始终应高呼“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速开国民会议!”因为只有如此,我们中国才有得救。

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弱小民族,最初是采用武力政策,强订条约,迫与通商,以推销其剩余商品,借以调剂所谓“经济恐慌”;其次便是搜罗原料,一经运回制造,又来括〔刮〕一大批钱;再次,即在其势力范围广建工厂,收买贱价劳工,如此,则搜罗的原料可不费运输之烦而得刮钱之利。现下中国之受侵略,可说已至第三期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不平等条约,在我国建了许多工厂,早就把我国实业打坏,使主张实业救国之思想再不能扰乱有见解的人心。然而帝国主义者对待代其生利之工人并不稍好,虐待之处,比谁的厂主都毒辣。打骂苛刻与劳苦,酿出今年二月间之工潮。后来经商会调停,日人方面答应以后不打人骂人,不无故开除工人,与待遇之改善,工人才忍痛上工。不料自此以后,日人之残暴仍有加无已:(一)工钱则借故刻〔克〕扣,如大洋一元九角九分,只发大洋一元,小洋九角,铜元九枚。试思在生活程度飞涨中之上海,差一分而损失了小洋四角多钱,困苦的

工人将何能过日!(二)打骂仍如常,“亡国奴”、“中国狗”之恶名,时加在我们同胞身上,每日站着做工十二时,一有怠慢,即遭毒打。有一童工竟被禁入黑房一夜,明早视之,已经闷死矣。(三)工人仍无故开除。日人最忌工人们觉悟,所以竭力压迫与破坏工会。数日之中,无故开除其代表二十余人,此不独予工人们以兔死狐悲之心,且证明其反复不顾条约,因为如此,遂激起一部分工人罢工,其他各厂多还照旧工作。

不料五月十五日,内外第七厂日人宣言停工。工人们以一日不做工,则一日没饭吃,乃请之开工,后经外捕调停,乃发半日工金给他们算数。到下午夜工到厂,又被拒绝,工人乃请求照日工办法发半日薪以维家计。然而,日人竟行凶起来,联同印捕工贼舞刀放枪向工人进攻,于是死伤遍地。日人犹未足,对受伤者拿剑子乱刺几下。别厂工人闻讯,立刻上前质问,复遭同等之杀戮。事后调查,工人被杀者,顾正红一人,重伤者八人,轻伤者不计其数。外人工部局对日人之残杀行为不特不加以干涉,而对受伤工人与领尸首之工人,却大捕而特捕。至是,三万余工人遂不能不罢工以待解决了。上海各报对此均合口不言,不特看不出批评与抗议,连公平的记载只字也没有。就是上海党报^①也是一样的灰色与软化。这是何等的可伤心啊!

学生运动委员会即于十六日开党团会议,议决“募捐与出发演讲,以唤醒人心并援助工人,倘使同学们不做,我们同志也要做”。文治大学学生目击工(人)被杀惨况,遂首先实行捐募。英

^① 指当时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

捕看见,即拘了他们两个入捕房里。五月廿四日,各界公祭被杀工人顾正红,上海大学学生行经租界,复被拘禁四人。至是,各报仍取哑口态度,只字不登。《民国日报》处叶楚伦先生之下,也一样的糊涂。我们真忍无可忍。二十六日复开党团会议。(中略)遂议决设法使各校学生出发演讲,即使不能,我们同志应身为表率做出来给人看。此后我们在本校里募捐,结果得七十余元,旋即送与内外纱厂工会。二十九日,工会代表、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到各校宣传,并告以三十日全上海学生集中公共租界演讲。大部分学生都愿意去,即晚我们便编排队伍。上海学生会本定三十日下午一时出发,因通知错误,南洋、复旦两校九时便出发了。至先施门前,即分队各往各地,有的往北站,有的往新世界,我一队入北京路。上午所讲,言语激烈,英捕并未干涉。我当然很疑惑,大概租界当局也取段祺瑞不理主义,任我们自消自灭,而其他各校都不敢出来了。至下午一时,讲了数处,传单发光了,又不遇见其他队伍。于是,各人都散回校了。但我(从)学生联合会打听消息,方才知道是定下午出发的。继又有人来报告,南洋、复旦同学在海宁路被捕,余退往北站等语。我于是携了大捆传单想给他们,沿途不断有人演讲,听者动容,几至泣下。至北站,则他们已转往南京路参预惨剧矣。时同济学生正徒手南下,我乃将传单交给他们,问以南洋与复旦同学往哪里去,他们也说不知。正徘徊之际,通讯员通知我四点钟在霞飞路交涉署前示威,我乃转赴该处,不克参见南京路壮烈之牺牲。

是日下午,各校学生源源而来,沉痛的演讲醒了不少垂死的人们之迷梦。于是,“中华民国万岁!”市民们高喊出来了。英捕

始而拘捕，但别一队接着讲了，如此，再接再厉，新世界、西藏路、南京路、浙江路附近，都被捕去不少（一百以上）爱自由的中国人。群众旋集南京路捕房前示威，请他放人。不料以残杀当勇敢的英国人竟行凶起来了，五十多响枪向人群射击，当场打杀四人，重伤至明日毙命者七人，轻伤者不可计数。“打倒帝国主义！中国民族解放万岁！”从浴着血垂死的学生口中发出来，使没死的人们的住房不住的震动。我在交涉署前听到这不幸的消息，热泪几不禁夺眶而出。呜呼！最平常之演讲，今已变作送死之路，我们的愤恨，谁能形容呢？在这信，我对你报告平安无恙，然而，我羞耻得很，我也不多说，更不愿太自寻烦恼，以为牺牲不到便无面见人。我们后死之责还大呵，努力前进呵！

自五卅惨剧以后，涌出个反帝国主义大运动，烈士们的血也不算虚流了。然而我们后死者，应努力使这运动成功，方才对得住我们先死的烈士们。三十一日与六月一日，我们仍毫无畏缩地继续着在公共租界演讲，然而复有不少的工人与学生继续着流血。我现下告诉你最能起顽立懦的一件事。六月一日，因学生们苦苦请求，各商店均一律罢市。强盗式的外国兵戒严得很，机关枪、大炮、马队、救火车，逢可杀人伤人的事物，都准备着。路上聚满不少工人与学生，仍是勇烈的演讲，甚或有些拦电车而对坐客讲的，叫中国人大家勿坐外国车。外兵立以救火车向之射水，但多数工人仍直立不动。看救火车的水力是多么大啊！然而，他们仍立着，苦口劝消防队的中国人不应如此。他们的精诚，他们的勇敢，令挂名革命党籍而不实事求是的人们何等惭愧，真要羞死！英兵看见这样，又开起枪来了。当场打死了许多

人,但他们到死仍是勇敢地高呼着。自六月二日以后,各校学生便不再到租界作无谓的牺牲了。

现下还报告外人之毒计给你。英美报纸开口闭口便说我们是暴徒,作排外之暴动,好使他们自己联合战线起来,以厚势力,并可以随便采取对付暴徒之法来残杀我们。巧妙的是说我们赤化过激,好来使中国官厅压迫我们,使我们内部互相猜忌而分裂。然而,他们这样的宣传,反使国人觉得过激与赤化才是中国自救之路。最毒的,有一次日本人乔装中国学生,内衬西装,于六月二日晚,在新世界拿手枪向英国商团射击,于是英美人即以机枪向群众扫射,死伤枕藉。旋英兵入新世界搜查,日人已脱去长衫,遂无之何,然把几个中国人拘去。次日,日本报纸登载,竟谓“中国学生军数百,在先施附近袭击义勇队,发生市街战,此辈学生军似来自杭州者云”。日人的意思,一来可报太平洋之恨,二来可引英美人屠杀多些中国人,三来更可把中国之仇恨完全落在英美人身上。

现下简单地报告近日情形,以结束此长信。自六月一日起,各校均陆续罢课,公共租界各商店罢市,门前满贴伤心的字句。法租界曾于五日自动罢市一日,后经学生会、商会劝告,即于次日复业,因欲免法捕房也同趋于反动之故。各种工人,尤其是与外人有关系的工人,均已陆续罢工,计西饭店、洋行、西报馆、面包业都无华人上工,英美烟公司工人亦已罢工,工部局之清道夫与华捕亦多相继离职。罢工人数至少有三十万以上,由上海学生会四出募捐接济他们。(下略)

即请近安!

弟复上。八日。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6月18、19、20、22日)

流血记

星 无

我今天上午九点钟的时候，从家里往东新桥去，刚走到海宁路预备乘电车的时候，忽然看见许多青年学生手执白旗，上书“学生讲演队”、“援救被捕同学”，并有“反对越界筑路”、“反对增加码头捐”、“反对印刷附律”等小旗子。我看得很起劲，于是电车也不要乘，随即向讲演队方面去听讲。

走近讲演队时，有一个穿制服的学生给了我一张传单。我接过来一看，大意是说明列强如何侵略中国，压迫中国人民。看完之后，就听见一个学生演说。我听了他的演说，顿时心里非常难过。许多同胞们听了很勇敢的说：“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我听完这队演说后，就沿马路走。经过浙江路、垃圾桥、厦门路、北京路、偷鸡桥、宁波路、天津路一带，都有学生讲演。听众的心理都是很激愤的。（未完）^①

（《民国日报》1925年5月31日）

被捕者的一个报告

我同我的弟弟在五月三十日下午三点半钟的时候，到静安寺路去拜访一个朋友。走过南京路的时候，看见路上的人拥挤不堪，也有立停了看的，也有向各处奔跑的，秩序真是纷乱极了，晓得又发生了什么乱子。又走了几步，就在人群中望见马路

^① 经查六月份报纸，并无续篇。

旁边躺着七八个鲜血满身的青年,有(的)直僵的躺着完全不动了,有的还是举起双手不住的颤动,似乎要挣扎起来,再作临死时最后的奋斗。

这是什么景象呀?那时我们二人还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或者我们当时神经受了强烈的刺激,旁人的话没有听见)。后来,定一定心,要想问问。恰巧有一个三道头巡捕走过来,我的弟弟就问他这是什么道理。他怒气冲冲说:“你们明天看报就知道了。”一面就把我们向前驱逐。同时后面的人,就在那里发出一片悲壮的声音说:“外国巡捕打死我们的爱国同胞呀!”我二人心中才明白打死这许多爱国青年的,就是那口讲“人道”的外国人。

那个时候,我二人心中除充满了悲恸以外,又平添了许多说不出的愤慨。恰巧又来了许多全副武装的外国巡捕。我二人就很严厉的诘问。岂知他们不问情由,挥拳就打,我弟弟的嘴上和我的下额上都着了一下,鲜血就立时淌个不住。他们又连推带挽的把我们拥进捕房。与我们同去的还有大夏、同德、南方、上海各大学的学生,约有四十多人及许多不相干的路人。我们想大家手无寸铁,决无抵抗的可能,就大家随着他们进去,以为或者还有法律来保障我们。当时我们虽受了他们无理的拘禁,但是想一想,为了同胞惨死,我们俩能仗义执言,人格还在。所以,他们无论如何处置我们,我们精神上觉得非常安慰。

同去的青年中说:“我们几位同学,本来预备为国牺牲的,已经达到他们的目的了。我们也打算前仆后继,鼓励同胞的爱国心,求得最后之胜利。”也有几位想到了我们中国国势不振,一般军阀又自相残杀,拿人民来作为牺牲品,弄得被人轻视,就痛

哭失声。他们青年奋勇的精神和爱国的热忱，真教人佩服呀！后来我们二人由礼明律师，在法庭上再四争辩，方才恢复自由。

（六三纪念日太仓吴雨苍作于上海）

（《民国日报》1925年6月4日）

五卅杂忆

心 冷

民国十四年的五月，我正在上海国闻通信社服务，也正是周报刚产生的第二年。那时北伐虽未成功，可是革命的高潮在上海很显得紧张。因为共党正在萌芽时代，各处的工会，十分的活动，也就是共党跨进工界新酬初试的时期。自从日本纱厂的华工顾正红的死引起大众的公愤，总工会既积极的活动，学界也很表同情。谁知在这时，竟造成了繁华的南京路上空前的惨剧！

五月三十日是一个晴和的日子。上午我从社里出去买书，回到望平街时，沿路随处可以看见很多小组的学生，手里拿着卷着的小白布旗。第一天我们就知道学生预备分组演讲，但当我看见他们时，心里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回社以后，和同人谈起，揣测到演讲的结果也许会受租界巡捕的干涉，但不曾料到会演成血案。

当天午后，我们担任外勤的几个同人，分着地段担任采访新闻。在下午二点钟时，在每条马路上都可以看到有一簇簇的行人，驻足凝神的听学生们演讲，可是到处都被巡捕干涉，因为他们阻碍了交通。

南京路上的演讲队，在先施公司附近开始他们的工作。因为

隔上一二十家店面,就有一组,在那行人车马好似穿梭似的南京路,行人便道上顿时围上不少的听众。那时我正走到那里,身高髯虬的印捕,走过来驱散围着的人们。结果因为学生和巡捕起了冲突,嘈杂的马路上格外显得人多。最初有一组将被巡捕带往老闸捕房,其余各组的学生,都聚合起来。这一次被捕房拘了好几十个人。

南京路学生被捕以后,各处的学生立刻都得了消息,渐渐的集合在捕房的附近。再加上爱看热闹的闲人也围集起来。学生是想推代表和捕房交涉,释放被捕者;闲人呢,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事,都站住了不走开,想看个究竟。

我刚从永安公司借电话报告消息给社里,才一出门,便听得砰砰的响声。枪声从老闸捕房方面发生。那时街上的人都拚命的奔跑,没地方逃的便向先施永安两个百货公司里直奔。这时恰是惨案发生的一刹那。在闲人可以躲得,我们当新闻记者的随你多危险也得瞧个究竟。(中略)我沿着永安公司向西,便瞧见捕房前面的马路上,有横躺着的,有还在挣扎想起来的青年。他们身上的血,给通商以来八十多年的上海南京路行了个洗礼,同时也表现出中国民众真实的力量。

我走到离捕房左近四五丈的地方,印度巡捕早已拦住了去路。我告诉他我是新闻记者,他不理不睬的将我向后推。我想不能前进,只得另想别的办法,迈进了一家时常照顾的商店,和店伙寒暄了几句以后,便请求让我登楼,可以看得清楚些。那时救伤车开到了,把那些血泊中的人一个个搭上了车,一会儿风驰电掣而去。那时我觉得只有回社,再不然就沿路问问学生们当

时是怎么的情形。我离店时是由他们的后门绕道到别条马路，因为没有遇见学生，当时便一直回社，报告这惊人的消息。

过了一小时半我再到南京路。除掉巡捕都佩着枪——平时只拿指挥棍——而且加岗以外，马路上又恢复了往来如织的行人。这些人里有大部分并没有知道捕房门前盈丈之地，曾流过鲜红的热血，曾演过一幕屠场的惨剧！

这天晚上我们的工作特别紧张。学生联合会、总工会以及其他的团体都在纷纷开会。我们不是用电话询问，便是向医院里去探询受伤者的情况，结果发稿比较平时迟了两小时。

* * *

三十一日的早晨，报贩的喊卖声特别的动人。隔夜的事，早传播到全上海人的脑际。我正在盥漱的时候，只听得两声枪响，社友严慎予君叫我同出去看看。我急忙披着上衣，由汉口路向大新街走去。走到半路上才发觉我并没系领带，可是前面喧嚷的人声使我们不得不前进。穿过福建路，无轨电车里一个乘客也没有，再向前去，简直须在人丛中挤过。在这时候，我们听得“不坐电车”、“坐电车的不是人”的语声。好容易挤到大新街口，只听得玻璃被击碎的声响，连停着几辆三路五路的电车，阒无一人，玻璃也没有一块完整的。这时众口一词的呼声，便是“不坐英商的电车！”在那里挤了十分钟光景，救火的水带激射出水来，向群众洒来，一阵慌乱中，有好些人是衣履尽湿了。我们幸亏避到新惠中旅舍的门里，才不曾沾湿。远望有大队的印捕，在洒水中骑着马追逐行人，于是胆小的只得四散奔逃。

回社以后，外勤的几位朋友都早聚在编辑室里，因为知道这

天的新闻重心在总商会，于是便总动员一齐出发。到了天后宫桥总商会里，学生工人商人已到得很多，而且还源源而来，将总商会楼上楼下以及外面的空地，都挤满了。专就新闻记者计算，差不多就有一百人左右。

总商会的大会场，举行市民大会，各界人士，继续不断的发表意见，大多数都主张罢市罢工。我们在记者席上观察到会者脸上的神色，大部分都兴奋到了极点，空气的紧张是从来所没有过的。最后一致议决罢市罢工和抵货运动；但商界因为罢市有关营业，所有上海商界的领袖，在楼上的会议室开会，由上午起直到午后七点钟，经过市民大会代表几次的陈说，方才决定六月一日起罢市。

当商界领袖迟疑不决的时候，我们一会儿上楼，一会儿下去，探听消息。更值得纪念的，便是我们是午前去的，一直饿到晚间；在下午有人想出去买些东西吃的，被包围着的学生和工人们拦阻住。虽然告诉他们：“我们不出去，新闻怎么能发表？请让我们回去报告吧！”他们的回答是：“不管是什么人，总而言之，罢市罢工不通过，谁都别想出得去。”这时前门后门都早被他们把守住了，简直莫想越雷池一步。

第三天商店罢市了，英商的工厂罢工了，码头工人也加入罢工同盟。于是繁华热闹的公共租界，变成冷冷清清。街上除了英兵和巡捕以及英侨组织的便衣特别巡捕而外，行人比以前少得多了。一切的集会完全在华界举行；我们每次采访以后回到望平街，走到租界里，都受盘诘。而且有时还有巡捕拿着手枪对着，浑身都得搜检过，因为他们疑惑我们是学生。直到粤港断绝

往来以后，香港受了重大的影响，英国人这才软化下来，知道中国民众是有伟大的力量，不可轻视。

* * *

第二年的五月间，老闸捕房门口搭起了木架子，几个泥水匠在那里砌墙，这是英国人恐怕中国人还图报复，特地将沿南京路的老闸捕房门口用砖砌了墙，另外由别条路上的门出入。而且这一天的英侨都不曾出门，公共租界上无形中戒备得极严重，可是总算平安地度过了这一日。朋友！你若是到上海南京路散步，由先施公司往西，紧靠着同昌车行的一座砖墙，那就是从前老闸捕房的门，那里曾流过学生工人商人的血。死者长已矣，可是他们的血，不算白流，因为从这里给了外人一种教训，知道中国人民确具有真正的力量。

（《国闻周报》第9卷第21期，1932年5月30日）

上海大屠杀事件写真

光

屠搢藩君目睹的惨剧，各报上不敢说的实情。

上海外人把中国人当牺牲^①般的屠杀，我们虽在报上看见一些，究因报馆怕惧外人压力，不敢尽情披露。今天屠君从上海回来，谈起外人的蛮横，真令人气煞。五月三十日下午，他和三个朋友在肇事地点左近听学生演讲。忽听见枪声辟拍，知事不妙，回头一看，见枪口正在对面照准，而且有三人跌倒在血泊之

^① “牺牲”的原意是祭祀用的牲畜，本文所用“牺牲”一词都是这个意思。

中。起初,他朋友对他说:“恐怕开枪呢!”他说:“不会的。你看上千的是人,不是牺牲,哪有这样忍心!”唉!不料竟致开枪,我们中国人真是牺牲不如!

演讲的时候,有一个同济学生被巡捕拉进去,放出来后仍演讲。又被巡捕拉进去,拳足交加的打了一顿,放出来了。他仍在捕房前演讲,一西捕头就对他肩头上放了一手枪,血流如珠〔注〕。但是他仍旧讲演,并说道:“我不死,我仍旧要喊!”那时捕头便对准他胸口放了两枪,一个爱国男儿便结果了!唉!我们中国人真是牺牲不如!

当时因为打死的,广东人居多,所以先施、永安首先罢市。^①接着大马路、法界、城里也都罢市了。当各团体在总商会开会,要求总商会通知罢市,方椒伯不肯签字,有一个学生撞死在他脚下^②,他方才签字!昨日(六月一日)有许多店家不肯罢市,男女学生便跪在店前要求,虽然倾盆大雨,也非等到关门不立起。电车虽开,没有一个乘客。

昨日起,学生出来讲演,巡捕滥捉。但他们愈捉愈多,声言:西牢没有上海甚〔那〕么大,如何捉得完上海全体学生。就是捉剩一个人,还是要演讲!他们在前面贴传单,巡捕跟在后面扯。但是随即又有人贴起,愈扯愈多!

现在,上海各界已决定三种办法:

(一)不用外国钞票;(二)不替外人做事;(三)抵制一切外国

① 当时因马路上斗争很激烈,先施、永安老板怕受损失,故临时闭门,停止营业,并非首先罢市。

② 此系传闻之误。

货。昨日捕房在泥城桥排三座大炮，准备再行大屠杀！唉！牺牲不如的中国人，还不起来反对吗！

（《时事评论》，新隆时事评论社，1925年6月5日）

关于五卅反帝宣传示威的回忆^①

沈孟先

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以后，我每天一下班，就到资田那里去听消息。在二十九日那天，资田同志兴奋地通知我们说：“我们党已经决定五月卅日下午在租界上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演讲活动，给帝国主义来个措手不及的流动示威，以唤醒各界民众起来跟帝国主义斗争！”他接着解释说，帝国主义太欺侮人了，不仅杀工人，捉工人，而且乱捉援助工人的学生，还硬要通过压迫中国人的恶毒提案（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等等），连商人也感到不满，所以我们党决定了要把工人、学生和商人的反抗和不满汇合起来，发动各阶层人民联合起来进行斗争。

我们听了也非常兴奋，异口同声地喊着：“好呀，这下要跟帝国主义大干一场了！”资田同志说：“这场斗争，说不定又有不少人会被抓起来，你们要作好准备！”大家回答：“没有问题，参加革命，早就作好了准备！”最后，他要我们参加“二区二分部”的会议。

二区二分部是国民党在南市的一个分部组织，机关设在林荫路正兴里二十三号一个石库门房子里，是一九二四年冬成立

^① 这篇回忆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即五月三十日反帝宣传示威，不仅有各校的学生群众参加，而且有不少职工群众参加。

的。在一九二三年底,孙中山先生接受了我们党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和改造国民党的建议,我们党很多同志都参加了那时的国民党,一个暮气沉沉组织涣散的党,从此有了新的生命。二区二分部在资田同志的领导和推动下,在南市几个学校和手工业工人方面进行了很多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这天晚上的会议比往常显得格外热烈紧张,一个客堂改的教室(以二区二分部名义在这里办了一所平民学校)里,已坐满了人。一见面,总是我们共产党员采取主动,先和他们——国民党员谈起沪西方面消息。对这件事,稍有民族自尊心的人,话也容易谈得拢,会议开得也顺利。尤其是资田同志,很会做工作,他的动员有条有理,鼓动性很强。在讨论中,人们纷纷表示愿意参加明天的演讲活动,就是几个倾向西山会议派(右派)的人,表面上也不得不表示赞成。会议时间不长,会后许多人留下来忙着写标语、做旗子等准备工作。等到一切事情做好,已是午夜十二点半了。大家怀着快慰的心情,在静寂的深夜里,迎着凉风和稀疏的灯光回家。

我倒在床上,再也睡不熟,总是想到明天这场有意义的斗争,一直到天快亮,才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

我在邮局退信房工作,沾了两个外国“上司”(一个是白俄——前白匪军官——瓦而特,一个印度邮务员)的光,他们星期六下午放假,我也可以乘机休息。我不断地看墙上的钟,巴不得马上到十二点,再也无心工作。好容易,那个白俄和印度人提早下班了,这是好机会;未到十二点,我就匆匆地离开退信房,跳上到斜桥的五路电车向林荫路赶去。到了二区二分部,大家都

已在等我了。

我们这支队伍一共有三十来个人，绝大多数是职工，有邮局的职工，有雕花工人，有铁厂工人，摇袜工人、红木工人和其他手工业工人，还有估衣业店员和洋行职员，此外，就是中小学教员。其中多数是“大学”（共产党员）、“中学”（共青团员）和靠拢我们党的积极分子。也有一些是国民党员，但右派分子一个也没有来，还制造紧张空气，说什么“去不得”，“去了一定会出毛病，不要上共产党的当”。我们有好几个同志，一面咬着大饼，一面谈笑，大家在讥笑那些右派嘴上讲得漂亮，实际上进行破坏的无耻行为。每个人都作了思想准备，准备被捕关起来，可是绝未想到会有别的意外发生。

出发时间到了，大家都拿着旗子和宣传品，由资田同志带头，三三两两地沿着民国路（今人民路）向预定的地点——东新桥走去。到了东新桥，资田同志选择电车站写票亭子前面一块小空地，指挥大家聚集在那里。他风趣地说：“就在此地开张！”他高举标语旗，领导大家喊口号。他喊一声，大家也跟着挥旗子高声呼喊：

“反对印刷附律！”

“反对增加码头捐！”

“反对越界筑路！”

“撤销领事裁判权！”

“援助内外棉纱厂工人！”

“为顾正红报仇！”

“打倒帝国主义！”

.....

一声声的响亮的口号声，象春雷一样惊动了东新桥一带的居民，许多人从老远奔过来向我们索取在分发的传单，一刹那，我们就被市民群众密密层层地围在核心中。资田同志第一个开讲，由于人多，他站在地上，伸长着脖子喊得再吃力，后面的人还是听不见，许多人不停地往核心中挤。对面烟纸店里一位热心的店员，端了长凳过来，在“写票亭”喝茶的电车卖票，也送来了热茶。大家很感激他们——这是对我们有力的支持，鼓舞了我们的斗志。

资田同志站在长凳上，群众看到了他，他也看到了群众，秩序好起来了，他就从容不迫地向大家演讲。他把日本纱厂工人遭受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工人为了生存而斗争和顾正红被杀害的经过，把帝国主义对罢工工人和声援工人的学生进行凶暴压迫的情况，以及租界当局压迫市民的种种事实，有声有色地向大家报告。许多听众被感动，都热烈地拍起手来，表示声援和支持。这一来，四面八方的群众都赶来了，人越聚越多。站岗的华捕，三番五次地过来干涉，激起了听众的不满，对他讲道理：“大家都是中国人，手臂不要朝外弯”，“中国人都要抱义气，不给帝国主义当走狗！”那华捕被听众说得很难堪，掉头就走。我们几个同志轮流讲了半个多小时，才向五马路移动。

我们走了，有些听众仍旧紧随着我们。在梁溪旅馆门口，我们就站住脚。有几个热心人，帮我们借凳子，维持秩序。群众都站在我们一边，我们的力量更大了。五马路华捕来干涉，群众就挺出来掩护我们，帮我们说服华捕。

正在我们讲得起劲的时候，总队部（是我们党以“学联”名义组织的演讲运动的指挥总部的代号）联络员何秉彝同志从电车上跳下来，和资田同志谈了几句话，又匆匆地跳上电车往南京路赶去。他走后，资田同志告诉我们说，他是上海大学的，负责指挥我们这一带演讲队的活动，他通知我们，捕房已出动了大批巡捕，到处捉演讲队的人，叫我们注意。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心中更加气愤，个个都抱着被捕的决心，没有一个被吓倒。有些群众也激昂地说：“要捉，大家一道去！”这更鼓励了我们的斗志，我们鼓起精神，继续演讲下去。

随后，我们沿着大新街（今湖北路）一点一点向北移，一边走着，一边喊口号。我们喊一声，群众跟着喊一声，一路上轰动了来往的行人和两旁的店员们，有的站出来看，有的追上来索取传单，有的相互打听……这时我们已成了一支示威队伍。刚到四马路，何秉彝同志又急匆匆地奔过来，高声向我们大家传达命令：“巡捕房方面已全部出动了，在南京路上，见到演讲队就捉，总队部通知所有演讲队都向南京路集中，决不后退。”他急促地讲完，又到别的地方通知去了。

这个命令，使我们格外兴奋，大家都磨拳擦掌，准备参加南京路上的战斗。资田同志立刻下了动员令：“同志们！紧张战斗的时刻到了，革命的，跟我去！”我们毫不犹豫地跟着资田同志手里的旗子，一路高呼着口号，大队人马雄赳赳地向南京路开去。

到了热闹的南京路、浙江路口，并没有见到大队巡捕——他们大概被调到别的地方去捉人了；只见来来往往的行人和拥挤

的车辆，象潮水似的涌来涌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简直无法把人群召集拢来，连我们自己一群人，也给那川流不息的车辆冲散了。大家正在着急的时候，在一乐天茶楼门前的一只邮筒被资田同志发现了。资田大声喊我：“广连！你年纪小，身子灵活，快爬上去演讲。”我遵照命令立刻爬了上去，高高地站在邮筒上开始演讲。“同胞们！父老们！……”我用劲叫了几声，可是在热闹的南京路上，我的声音一下就被吞没了。资田看我急得无计可施，说：“不要讲了，喊口号吧！”经他一提醒，我就领着大家高声喊道：“援助内外棉纱厂工人！”

“为顾正红烈士报仇！”

“打倒帝国主义！”

“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

这一声声的怒吼，惊醒了被压迫的人们，许多行路人都停下脚步围拢过来，有的跟着我们呼喊，有的向我们鼓掌叫好。群众越聚越多，轰轰的声浪，象狂风怒潮横扫南京路，吓得几个外国巡捕东西乱窜，象猎狗一样搜寻目标。我们不愿放松一分钟的机会，在沸腾的气氛中，继续不停地怒吼着。

突然，一个凶恶的西捕，象饿狼似的扑过来，一拳把我从邮筒上打下来，几乎昏倒在地上；他还狠狠地叉住我的喉咙，不让我动弹。邮局的周颀同志（送信工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七年八月在上海牺牲）勇敢力大，冲过来给西捕一个巴掌，西捕一松手，我才从地上爬起来。“巨巨……”，不绝的警笛声从西捕嘴里慌乱地吹着，这是向他们的人发出紧急的呼号。“不要怕，大家一起去！”资田同志又发出战斗的命令。我们全队都是勇敢

的，没有一个逃避的人，大家继续高喊着口号，准备受捕。这时，八九个印度巡捕，从老远奔过来，对我们形成一个包围圈。但他们只能捉住我们的人，没有办法抑制住我们的反帝激情和愤怒的口号声，尤其是千百个群众的掌声和怒吼，他们再也无法阻止。他们人手太少了，我们还有十多人，他们也没有来得及抓。资田同志勇敢地喊着：“大家一道去，看他们能把所有的人都抓去吗！”在我们的后面还有一群自投捕房的人，在跟上来。

我们被捕的一群，形成了一支倔强的队伍，雄赳赳地走在南京路上，昂着头，挺着胸，一边挥着旗子，一边喊着口号，不停地向南京路两旁的群众鼓动。这时，在日升楼，在一乐天，在先施、永安，在每一个商店的窗口上、阳台上，在整个南京路上，都挤满着人群，他们有的挥着拳头，有的挥着手帕，有的挥着帽子，向我们呼喊着重、鼓励着。马路上以至车辆上的许多人，都忘了他们私人的事务，纷纷投到反帝的热流中来，再也听不到车辆、人马的喧嚣，只有广大的强烈的民族的吼声！……

走进了老闸捕房的甬道，我们更加奋发起来，不时地回转头来，向着捕房门口的人群，跳跃着、呼喊着重。任何压力、任何摧残，也抑制不了我们的怒吼。里边的几个西捕，见到我们愤怒的一群，也无能为力，只是露出卑怯的鬼脸。在拘留室里面，已挤满了被捕的同志，我们被拦在审讯室的一角，三四个西捕和一条走狗——译员，警犬似的轮流监视着重，一刻进，一刻出，显得慌乱无措。我们的身体虽一时失去了自由，但压不住我们心头的怒恨，口号声还是不停地响着。西捕更疯狂起来，挥着重他们手

中的藤鞭，在我们头上飞舞。我们大家也不示弱，资田带头喊：“不许打人！不许打人！”大家一面跟着他喊，一面挥着自己手上的旗竿，招架着，抵抗着，来抗议这些强盗的凶暴行为。我们的呼声，我们的斗争，惊动了拘留室里的同志，他们马上响应，高喊着口号。审讯室和拘留室的吼声，此起彼伏。那些外国强盗象一群无头苍蝇，不知慌乱地忙些什么。几只电话机上的铃子闹个不休，那接电话的西捕，手忙脚乱，向每个打来的电话，哇啦哇啦地叫着：“这里抓的人太多了……没办法，没办法！……”一看这情况，就知道外面形势一定很好，到处都是演讲队，到处都是反抗的人群，他们已没法应付。

“恢复我们的自由！”资田善于抓住时机，响亮地喊出了一句新口号，于是大家都跟着他呼喊。闹得那些西捕六神不安，感到“头痛”和“麻烦”了。一个西捕头无可奈何地下令把我们“赶”出去。我们一群约有百来个战友，说不出的兴奋，在资田同志带领下，又浩浩荡荡地从老闸捕房的甬道上呼喊着重跳跃着走出来。外面的人群真是人山人海，一见到我们出来了，大家高兴得跳跃起来，热烈地拍手欢迎我们，和我们一起高喊口号：

“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收回租界！”

……

走出巡捕房的门，一看南京路上这么多的群众，就知道附近各条马路的演讲队都开过来了，其中有上海大学的，有复旦大学的，有同济大学的，有南洋大学的，还有沪西纱厂工人的。他们和

成千成万的工人、店员、市民群众混在一起，谁是演讲队员，谁是听众已很难分辨出来。只有穿白号衣的东亚、大东旅馆和新雅酒店的职工，一望就知道不是演讲队的人。这许多群众，是在我们被抓进去时，就守候在老闸捕房门前声援我们的。

我们一出来，就和群众汇合在一起。人多力量大，千万人的口号声，象轰雷般持续地暴发着，这是第一次显示上海人民的力量，现在是我们的世界。

在人群中，何秉彝同志站在最前面，他挥舞着拳头，领导大家呼喊口号。他那勇敢的姿态，多么使人钦佩呀。一定是他把南京路上——东到外滩，西到新世界——各处的演讲队，调过来支援我们的。看到他和我们一道示威斗争，大家斗志更坚强了，劲道更足了。

南京路被人群阻塞了。电车被迫停下来，任何车辆都不许通过。巡捕房又慌张起来，三四个西捕率领一队印度巡捕，奔过来冲向人群。几个西捕象疯狗似的乱舞着藤鞭，向群众猛抽猛打。他们的野蛮暴行，又激起群众的愤怒。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没有被他们打退一步。有一个西捕从左侧冲打过来，被群众抓住，夺下他的鞭子和警笛后，又把他从人群中推出去。人们高喊着：“不许打人！不许打人！”这个口号立刻成了千万人的呼声。西捕没有得逞，才住手走了。

我们的行动，是宣传，是示威，不是殴斗。我们不愿在南京路上久待，和西捕冲突下去；也不愿让千万个热情的群众，被那些野蛮的狼狗——西捕任意鞭打。何秉彝同志和资田同志商量

后,向我们许多演讲队宣布:这里被抓的人已放了(后来知道还有一部分人未释放)，“新衙门”(即会审公堂)还关了许多被捕的人,现在群众多了,力量大了,大家一起到“新衙门”,去营救他们。

“到新衙门去!”“到新衙门去!”我们一致高声地喊着,转过头来推动群众向浙江路走去(“新衙门”在浙江路、海宁路口)。我们原来是最前哨的带头者,这一来就变成了尾哨推动群众前进。拥挤的人群,渐渐走过贵州路,不料又有三四个西捕从背后追上来,用鞭子向我们野蛮地鞭打,不许我们结队行进。群众又哄起来,象潮水似的退下来抗议,有几个勇敢的群众,上前夺西捕的鞭子,阻止他们打人。这时何秉彝、沈资田和我们许多人,被夹在中间,一面呼喊:“不许打人!”一面劝告群众继续前进。可恶的西捕还是不住手地抽打,我们很多同志都挨了鞭子。何秉彝同志和几个会说英语的演讲队员,就挺身而出向西捕质问、抗议,要求立即停止打人的野蛮行为。经交涉后,他们好象接受了似的,一个个都退走了。于是我们又喊着:“到新衙门去!”“到新衙门去!”群众前拥后挤地向浙江路走去。

正在一浪推一浪前进的时候,突然巡捕房对面有人大喊一声:“枪!”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西捕头带着一排托着枪的印度巡捕,站在老闸捕房门前靠西那一边,对着我们作预备射击的样子。有人说:“这是吓人的,不敢开的。”哪晓得这话刚说完,万恶的西捕头就向我们“砰”地开了一枪,十多个印度巡捕就劈劈拍拍地对我们放起来……。

我不知怎地被人绊倒在地上，身上感到有些压力，似乎有人已失去自主能力倒在我身上。只听得在我身边和不远的地方，还有人倔强地喊着：“打倒帝国主义！”

“收回租界！”……

这些声音虽不大，却引起了几声枪响。可是口号还在那里继续喊着，声音渐渐地远了，小了。那倔强的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响着，响着，没有停息似的。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受了伤，躺在地上回想着开枪一刹那的情况。忽听得资田喊我：“广连，你怎样了？”

我移动了一下身体，慢慢地爬起来。我看到旁边血泊里仆卧的人，就惊叫起来：“呀！何秉彝同志！”再往前面又看到有十几个中枪的人倒在地上，血染红了南京路，我不忍再看下去……

“血！”资田同志指着我的竹布长衫上的一大滩血。“没有什么”。我摸摸自己身体，“只是何秉彝同志他们……”我痛苦地几乎要哭出来，眼望着牺牲在南京路上的几位战友，我不忍离开。

“走吧！呆下去不行呀！”资田同志看到西捕又在出动，坚决地拖我走。

“这个血仇！……”

“走吧！同志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更多的人将会参加斗争！”他拉着我往广西路走去。进了一条弄堂，他提醒我把血长衫脱下来。我脱了长衫卷起来拿在手里，还是不想走。

耳边又听到人群在奔跑，有人说，巡捕又在捉人了。马路上，弄堂里，店铺里，到处是愤怒的人群，在议论和控诉帝国主义的

血腥暴行。愤怒的人民是镇压不了的，这是一个扑灭不了的力量。

“广连，这是第一个回合，斗争仅仅才开始，你怕了没有？”资田同志看我不走，以为我害怕了。

“没有，绝对没有，我要为同志们报仇！”

“这就好，同志呀，干革命，总会有牺牲的；不牺牲，哪会有胜利！我们有党的领导，有工人有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共同斗争……只要大家继续奋斗，胜利的日子总有一天会到来的。”

“明天怎样？”我问了一句。

“明天继续斗争下去！”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看着他走远了，一种希望跟着他，盼望他马上带来斗争的命令。不胜利，不罢休！

一九三八年五月草稿

一九六五年三月修改

(原稿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参加五卅反帝斗争的回忆^①

陈宝聪

在五卅的前一天，梅电龙同志根据中国共产党上海地委的指示来到吴淞镇。下午四时到达了同济大学。当即对尹景伊和我传达了党中央五月二十八日的决议精神，要求我们立即响应

^① 本文是陈宝聪同志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应我所约请而作，因篇幅所限，由编者作了一些删节。

党的号召，动员同济大学全体学生于五月三十日到上海大马路参加反帝爱国宣传大示威。我们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必须响应党的号召，立即召开全校临时大会。由尹景伊和我分头同有关系的各部门负责同志进行协商，一致认为事情是必须进行，而且必须做好。但可能不是一帆风顺，要同学去南京路示威游行，演讲，进行反帝斗争恐更难实现。我们经过多方面的努力，终于克服一切困难，说服和启发了畏难怕事的人，决定由我负责召开全校学生自治会的临时大会。大会决定在下午七时召开。因为时间太急迫，连发通知也来不及，结果由尹景伊和我到饭堂作了口头临时通知，并且又到宿舍里逐室通知。这样，无形中形成一种紧张的气氛，但我们不可能估计大会是否可以开成功。

同济大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从青岛迁来上海。虽然是国立，但教学的方式方法、课程、规划、制度，还深受着德帝国主义的影响。同学中读死书，不关心政治，保守、顽固、求安的坏风气比较严重。一九二三年以后，恽代英同志经常来校演讲，同时也同我们发生密切的联系。由于恽代英同志的积极努力，校内不关心政治，怕谈政治的气氛有了急剧的转变。当时校内还不容许共产党组织公开活动，我们只可能利用中国国民党在校内已经公开的四区区分部来进行一切活动。在此以前，我校就已经有了党的地下组织，是由尹景伊和何志球同学负责的。我是由何志球的动员，并得到尹景伊进一步的帮助，由尹、何两人介绍，经恽代英同志同意，参加了党小组的工作。在校内我们先后组织起“学生自治会”、“学生生活合作社”、“国民党区分部”（革命

的)以及读书小组。在同济大学和吴淞镇、宝山县一带进行了各项政治宣传活动。这方面尹景伊同学的贡献为最大。他虽然还很年轻,但对人谦虚有礼貌,能沉静待变;损己利人,急人之急;不骄傲自满,善于亲近人,接受别人的意见。尹景伊同学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在他被帝国主义枪杀的前三天,他曾诚恳地对我说,无论何时何地“千万不要忘记宣传”,宣传做得好与不好,是标志着是否忠实于党和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尹景伊在工作中还一再鼓舞我和何志球要坚定立场,加强革命信心,有毅力克服一切困难,千万不能动摇变节,虎头蛇尾,畏难思退,见异思迁,开倒车,背叛革命,甚或投敌求荣。

尹景伊同学在学校时生活朴素,苦学勤读,刻苦耐劳。在全体同学中有很高的威望。

下面继续写当时学校开大会的情况。

五月二十九日下午七时召开的学生自治会临时紧急大会,当时我们担心因为会前来不及作思想动员和充分准备,可能不会顺利开好。但是事情的发展,出乎我们意料。这次会议不但顺利开成,而且开得非常成功,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同济大学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得最好的一次大会。会议原定七时召开,还没有到六时三十分,整个会议大楼就塞满了人,因此提前开会。会议由我主持。会场反帝情绪异常高涨,群众万分愤怒,激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取消治外法权”,“要杀人犯偿命”,“支援罢工工人”等等口号。同时还有人站起来,愤怒地举起双手,发誓要替工人们报仇雪恨。跟着梅电龙提出要求同学们到上海南京路游行示威,宣传募捐支援罢工工人,也得到全体同

学的热烈响应。尹景伊同学更在会上一再高呼：“我们要斗争，”“我们要宣传，”“我们要革命，”“我们要为祖国而奋斗，”“我们要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粉身碎骨，流血丧身，绝不后退。”他的言语鼓舞着广大的群众。他在大会上还提出要募捐支援罢工工人，建议组织筹募委员会。也立刻得到全体同学的支持。我校支援罢工工人募捐委员会就此成立起来，很多人当场踊跃地献出大批钱银现款，有些人写了认捐数字，有些人把身上的全部现款拿了出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收集现款六百多元，而认捐数字是大大超过千元以上。

会议最后决定全体同学在五月三十日上午出发到上海南京路参加反帝爱国斗争示威。并举出尹景伊、陈宝聪、陈维新、袁文彬、陈必贶等同学负责组织编队和出发前后一切准备事务，陈宝聪担任游行示威大队总领队队长，尹景伊副之。

这次大会一直开到夜深将近十一时才结束。在尹景伊同学带头、鼓舞、领导下，我们又集合了三十多个同学点起洋烛开会，一直弄到天明前才搞好一切事务，决定把同济大学在吴淞镇的七百多名同学编成一个大队，十六个小队。为了避免巡捕的注意，使队伍能顺利地到达目的地，我们决定把大队化整为零，等全部到达租界再集零为整。因此整个大队分为十六个小队，每四个小队又组成为一个中队。每隔一小时从吴淞镇运进上海一个中队。进行的路线是各中队分四路前进，每一个中队的四个小队亦要分隔开进行，规定小队与小队之间的距离要保持在五百米至七百米之间，不得过长或靠近，以免意外，而又便于联系。第一中队上午八时从吴淞到天通庵站，入北四川路过苏州

河到达南京路转外滩。在中午一时半再从外滩把队伍倒头转尾,转回南京路,同第二中队连结起来,向南京路静安寺方向前进。第二中队在上午九时从吴淞镇出发,亦在天通庵下车,入北河南路,过苏州河时要慢些前进,到南京路在一时半同第一中队连结起来向静安寺路前进。第四、第三两个中队在上午十时从吴淞出发,在上海北站下车。第三中队入北山东路向南京路前进,下午一时要同第二、第四中队连结起来,向静安寺路方向前进。第四中队抵北站后直入北浙江路,到先施、永安公司附近,等待第一、二、三中队在南京路集齐。然后把第十六小队变为领队(冲击队),第一小队变为押尾队,示威同学拿出小旗,呼口号,进行示威。

这一夜,三十多个同学整夜没睡,忙着编队、写标语、制小旗,油印传单,预备救伤包,等等。尹景伊同学表现更突出,晚饭也未吃,饿着肚子干了一夜。天拂晓,他又到各处找那些对斗争有思想顾虑,怕参加政治活动的同学聚谈,进行帮助。这一次全体学生都参加了斗争。可以说是通过他细致工作得来的。

第一中队的第一个小队队长是由尹景伊兼任,我是兼任四中队十六小队队长。我所领的第十六小队是整个大队最主要的冲击队,唯一责任是开路行进,无论在怎样艰苦困难下,要尽力克服,要抵挡着敌人的袭击或武力干涉。而尹景伊同学则要对整个大队负责领导、督促、调度的重任。

五月三十日,我们按计划执行任务。当我从北站向前推进到北浙江路苏州河北岸时,本校和各兄弟学校的自行车联络队队

员们来报告说,各校同学在各路前进过程中,不断地被巡捕捕了很多人,现关押在老闸捕房,要求立即动员本队全体同学急去营救。我经过慎重考虑之后说:“同学们被逮捕、关押,是预料中之事,但我们今天斗争的目的是要向上海市人民彻底揭露帝国主义枪杀、镇压上海人民的暴行真相,看清楚帝国主义侵略的野蛮本质,目前最主要是通过宣传,以唤醒和组织群众参加斗争,不能先后倒置,营救工作应放在末后。”我要本校自行车队联络员转达各队同学必须坚决执行原定计划,一定要把所有力量集中到南京路上,千万不能动摇。一时前我队到达永安公司,我正在面馆前展开宣传。这时许多人围上来,听说是反帝都拍手叫好,当即有人叫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替工人报仇!”突然赶来七个红头阿三,蛮横地干涉和禁止我们站在这里讲演,并把我推走。我大声愤怒地说:“这是中国土地,我有权讲话,你不许我站在路边讲演,我就在马路上边走边讲。”我们同学随即叫道:“同胞们,要听讲演跟我们来!”许多人就跟着我们一道走。我边走边讲,人是愈来愈多。当我们将要走到永安、先施、天韵楼的时候,由高空散发出过万张五彩美色的传单,这时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支援罢工工人!”“替顾正红报仇!”口号声响彻云霄。

这时,四个印捕将我双臂紧紧捉住,群众看到印捕捕捉讲演学生更加愤怒,越向前走人群集聚的愈多,群众都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成百成千的人,紧围着印捕,同我们一道涌进了老闸捕房。尤其是工人、劳动大众,他们赤着膊,光着脚,挺起胸膛,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我们一起涌进了老闸捕房的办

公室。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人冲了进来，他们感到措手不及，用武力，关人都无济于事。为了避免更大的暴动，他们想把冲进来和先前关进来的讲演学生全部赶出去。他们赶不动，就用藤鞭抽打。这时真是引进来容易，赶出去难。我被印捕拖进来时看到不大不小四间房子里塞满了人，被捕的学生占多数，约有二百人。个个没有胆怯之色，而是斗志昂扬。有的坐在台上，有的坐在椅上，有的则立在窗台边，各种式样都有。大多数在叫喊，拍台椅，冲击墙壁，打窗门。不知何时，拖我进来的印捕不见了，而涌进捕房来的群众还是源源不断。帝国主义就用皮鞭、藤鞭乱抽乱打，这样才把关进来的和涌进来的逐步撵了出去。在帝国主义撵走被捕学生和示威群众的时候，许多学生、群众和这些野兽们讲道理，责问他们为什么将我们捉进来，现在又有什么道理把我们打出去？帝国主义者理屈辞穷，无话可答，只是一股劲地把人群赶出捕房，撵到马路上。这时我被帝国主义者打得遍体鳞伤，立足难稳，口干头昏，歪歪倒倒，口吐白沫，气喘急迫。我的同学和许多不相识的人，抢着救护我，忙不迭地把我送到捕房东边一家车店里。车店里的老板和店员关心地用毛巾抹了我脸上的汗，又给我送来了一大壶温开水，我一口气全部喝干。这时我又兴奋起来，走出车店又投入了反帝的洪流中去。我又回到了我们游行示威队伍中，只听千言万语都说：“去呀！会审公堂。”于是大队人群向会审公堂涌去。队伍才走到永安公司正门前，就遇上了一大队华印捕混合编队，拦阻游行人群不许前进。这时后面有人传话，说捕房又捕进了许多人。话一传开，队伍立即又转回捕房。当我们一转身，发现大批巡捕

已经杀气腾腾把我们包围起来。这时只有想办法冲出去，我和同学们就带头向巡捕身上冲。突然间有个外国巡捕冲着我走过来，一条木警棍狠狠地打在我的头顶左边，当场头破血流，鲜血如注。

我拿出一条白手巾，染上自己的鲜血，高高扬起，呼喊“血呀！”“血呀！”这时其他各处游行演讲队伍也闻风赶来，一起冲向巡捕。人群的愤激情绪，如黄河决口，势不可挡，大家又一次冲到距老闸捕房头门有两三丈远的地方。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异常狡猾的。吃了亏就不再上当。他们接受了先前的教训，决心在南京路上施行武力镇压。当我们再次冲到老闸捕房门前时，帝国主义者已经把巡捕调集好，有十二个印捕，二十四个山东籍华捕，分三排组成一个三分之一大的半圆形阵势，安排在老闸捕房头门外边，南京路的西边，迎面对准群众。每一个巡捕都是把枪枝平拿着，手指扣着枪机，等着下令屠杀我们。十二名印捕怒目而视排在这个半月形队伍最后面一排。在他们前面的第一二排是二十四名华捕。在这个半月形队伍的右边站立着一个又高又瘦削的英国人，他就是五卅在南京路上屠杀我们中国人民的凶手爱活生。当时谁都知道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马上要开枪杀人，但谁也没有被它吓倒或后退。群众离开他们约有两丈远。我立在前面，比示威群众要走前几步，仍然高举血巾喊口号。凶手爱活生阴险地注视着每一个示威群众，只见他咔嚓一声扳动了枪机，对准我的方向就射，我迅速把头 and 身躯向右边移转，正好一颗子弹从我左耳边飞过，打在我身后的尹景伊同学的左胸心房上。中弹以后他才转了身，可是

凶手又从他背后射进三粒子弹。他中弹倒地以后，确实仍勇敢地高呼了“宣传”，“斗争”，“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事后是抬进山东路仁济医院，当晚七时死亡。

凶手爱活生放第一枪，是给巡捕们下达开枪命令。接着巡捕们放了三排枪，共一百零八发子弹（华、印巡捕分三排共三十六人，每人先后放了三次）。这三排枪打死打伤很多人。伤者死者当时是倒在南京路的两条电车轨道当中，另一部分倒在南京路的南边，倒在北面的也有，但没有南面的多。尹景伊是倒在我左边背后，也就是南京路的北面。有两人子弹打在大腿上，大腿动脉的血象自来水一样射出一尺多远，不多时就死了。这三排枪据我估计和亲眼看见最少要死四十多人。以后报纸报道的死亡数字是少于实际数字的。在我受伤住院时，我曾对来慰问的人说明死亡人数，并函各报要求更正，但未见结果。这又显然是工部局威胁压制的结果。无论怎样是不止死了十几人。当时老闸捕房对面有一间饮食茶店叫“四五六”，墙上满满是枪弹痕，玻璃也打碎，而且流弹也伤了顾客。

帝国主义在南京路进行开枪屠杀后不久，救护车就从南京路西边开进，拖走很多尸体，这可能就是以多报少的一个阴谋。同时有车开进来，用水冲洗马路血渍。帝国主义动作这样快，显然他们杀人是早已安排好的。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杀人行为。

（原稿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五卅反帝宣传的回忆

俞 昌 时

市学联受到帝国主义打击，决定搬到亚东医科大学办公（全部占用了我们校舍），分成十余科，二百余职员。我担任了报告科科长——即汇总各处情况。得到党的决定，要举行大规模的反帝游行示威。五月二十九日晚（五卅前夕）学联召集各学校开代表大会，开了一整夜。连日带夜研究全面动员工、学、市民参加及如何迎接战斗的各个具体问题，重要的决议是：确定行动口号，起草宣言、通电、标语口号；规定集合地区和游行路线；组织总指挥部和各处指挥部；组织纠察队、交通队、宣传队；设秘密总指挥部于四马路孟渊旅馆三楼十四号，决定秘密口令“下雨”、“吃饭”两种；拟定如在宣传时有巡捕来抓人，我们即拥上前去大呼口号，跟着他们走，以群众气势压倒他们；又规定何校担任何段马路，必须上租界宣传，不在华界。以上决定立刻写好，即派交通队分头传达。同时又油印数种传单，写好各种大横幅和旗帜、标语等等。连夜又租来了多辆脚踏车，以给交通队作为传达命令、巡视队伍之用。最后决定总发动时间为五月三十日下午两点钟。当天晚上全体工作同志二百余人兴奋地忙了一整夜，到天快亮的时候，刚刚可以休息一下，忽然接来电话报告，复旦、圣约翰等几个大学数千学生兴奋过度，已经自动地整队向大马路出发了。我们听了都激动地叫起来，为了怕他们人数单薄吃亏，遂决定将下午二时总出发的计划改变，临时通知十余学校上午出发，以为声援。不到九时许，得报告几条重要的马路上，已经

有二万多的学生了。以后陆续地各校学生都出发了，到下午一时许，各马路上塞满了四万多的大中学生和不少的工人队伍，再加以看热闹的群众们，挤挤攘攘，遂使交通为之断绝。于是伟大的五卅运动，就在大马路先施、永安公司门前，由于巡捕头子爱活生指使发射第一枪声而宣告开幕了。

五卅运动爆发后，大约一个多星期，我即参加李立三和刘华等同志负责筹备成立了上海总工会。他们领导了闸北、沪西工人代表们，我和沪南工人代表惠顺福等同江南造船厂及一些小铁厂的工人代表，共计三十余人，在闸北的一个石库门后楼里开了一个成立会。全上海三十余万工人罢工，其下分六个办事处，进行对工人宣传、组织、训练、武装等四项工作。我和恽代英同志负责南市第六办事处辅导工作，办事处设南市沪军营煤屑路六号。同时代英同志还就近负学联党团领导工作。我们每在白天做工会工作，忙的无空吃饭，总是买几个烧饼吃吃就算。每晚党团会议经常开到天亮。回想起当时生活，真是无限感慨与兴奋啊！

(摘自俞昌时《俞昌准同志传略》附：《我的革命事略》)

纪录片“五卅沪潮”拍摄经过

徐 碧 波

“五卅”运动，是我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上的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五月十五日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顾正红同志的被杀害。当时，最先积极起来援助工人的是上海各大学的学生，他们激于义愤，在顾正红被惨杀的第二

天,就纷纷到街头去演讲、募捐,把顾正红同志被帝国主义惨杀的真象,告诉广大的群众。公共租界外国巡捕房的巡捕,逮捕了一些演讲、募捐的学生,并宣布要在五月三十日这天,以“扰乱治安”的罪名,审问他们,这就引起了学生的更大愤怒。

五月卅日那天,上海各学校两千余学生,在租界繁盛马路上举行演讲、示威,并散发印有“援助被惨杀的工人顾正红”、“援助被捕工人学生”,“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的传单。帝国主义派出了大批武装人员,到处驱散、殴打学生。就在这时,在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上,英帝国主义者命令巡捕向徒手的中国工人、学生开枪,当场被杀害者四人,因伤重死在医院里的七人,受重伤的八人,轻伤者无数。帝国主义的无耻暴行,激起了我国人民的愤怒,上海人民并举行了工人总罢工,学生总罢课,商人总罢市的三罢斗争。在蔡和森、瞿秋白等同志领导下,上海成立了总工会,并组织了“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来具体领导这一反帝运动。

当时,上海影戏公司正在风起云涌,刚刚创办的友联公司在五月卅日那天,曾及时拍摄了有关惨案的纪录片。该公司创办人陈铿然和摄影师刘亮禅,那时都还只有二十二、三岁的青年,他们不怕危险,在出事后一小时就由司机胡廷芳驾了汽车,飞速赶赴南京路现场,出其不意冲着捕房门前拍了正在冲洗血迹的一些镜头。巡捕看见他们后,立即派马队追赶汽车,在新世界附近(南京路西藏路口)勒令停车搜查。幸亏女演员徐琴芳把那具小摄影机“埃摩”藏在下身大裤管里(当时妇女都流行穿大裤脚管的裤子),所以没有搜查出来,省却了好些麻烦。汽车驶出了戒严地带,还在四周拍了一些惨案发生后的凄凉景象。六月二

日上午,他们又赶到斐伦路验尸所,想摄取烈士的惨死遗容,但因这里是属于公共租界管辖,没有拍到。后来通过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的介绍,到南码头同仁辅元堂拍到五具牺牲了的烈士的尸体。当时尸室内光线太暗,用“埃摩”镜头很难把死者面部拍清楚,经陈、刘二人仔细研究后,并经该堂工人大力帮助,在屋顶上开了个临时天窗,又费了好些周折,才拍好这几个镜头。当天下午,同济大学全体学生抬了尹景伊烈士的棺材游行街市,从斜土路走到徐家汇东谨记路的齐鲁别墅,沿路之上,友联公司也把这些沉痛的场面摄入镜头。

最使人感动的是在医院里拍摄重伤者的几个场面。当时指定收容重伤者的医院,只有白克路的宝隆医院和山东路的仁济医院。这两个医院周围满布了武装岗警,极难进去。可是富于正义感的医师们,眼看同胞们惨遭屠杀,义愤填膺,经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的联系,他们就答应帮忙,由他们把摄影器具藏在手提药箱里夹带进去,摄影人员也乔扮了护士和助产士混了进去。病房外虽有人巡逻,可是得不到医生的允许不能进入病房,所以在摄取重伤者的镜头时不致受到阻碍,这些镜头也就拍得比较多。

他们还拍摄了其他许多镜头,如英军在黄浦滩登陆示威,租界上武装商团作恶帮凶,上海大学被封闭,各学校罢课,学生沿途演讲,工商界散发传单,商店罢市以及群众集会等等场面。有些场面是摄影师冒了绝大危险偷偷拍摄来的。共剪辑成三本,字幕是由我编写的,片名定为《五卅沪潮》。记得有这么一个特写镜头:一个医生手掌心里托着一粒刚钳出来的子弹,我用愤怒而讽刺的口吻写道:“呜呼!这是帝国主义的恩赐!”

此片完成后，租界上当然是禁演的，只好在当时（老）西门和闸北比较小的电影院里放映，那时友联还没有拍出长故事片，就加在别家公司的正片前放映。在苏州也放映过。这已是三十二年前的旧事，大家恐怕都已淡忘了。

在拍摄这部新闻纪录片的时候，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方面有一位青年（名字记不起了）常来联系。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友联公司曾把一个拷贝赠送给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那年六月廿七日，上海学生联合会还借老西门方浜桥的“共和影戏院”放映《五卅沪潮》和另一部故事片《一年前》，把全部收入接济了罢工工人。

友联公司地处闸北，后来两次为日寇兵火摧毁。这部影片的底片早已消失，正片也无处可找了。但不知赠与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的那个拷贝还在人间否？

（摘自《中国电影》1957年5月号）

（二）五卅反帝示威中散发的传单

上海学生市民工人反抗帝国主义大运动宣言

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然而自从帝国主义强迫开埠以来，上海租界上的中国人，吞声忍气的蜷伏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比十几国的奴隶还不如！

帝国主义者抽收房捐、铺捐、各种牌照捐，敲削盘剥，无所不用其极。现在又要加增码头捐及各项捐税了，然而纳税华人完全没有过问上海政治的权利！

帝国主义者在上海的报纸丑诋中国各界人物，可以肆无忌惮；然而他们千方百计箝制中国报纸，逮捕新闻记者，还要颁布印刷附律，剥削中国人一切言论出版的自由！

他们在中国开设工厂，象牛马一样的役使中国工人，不许工人有一点反抗。最近小沙渡中国工人被迫罢工，日本资本家封锁工厂，杀伤许多工人。他们不但不惩办凶手，而且禁止各报登载此项消息，拘捕表同情于工人的文治大学、上海大学学生！

我们忍无可忍了！我们已经联合各校学生及一切爱国的市民工人，从今日下午起，分队到公共租界各大马路讲演，唤醒全埠中国人，一致起来反抗帝国主义！

我们已经预备牺牲一切，冒犯各种困难与危险，为全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作先驱！

我们希望全上海的中国人闻风起来！

我们希望全中国被压迫的四万万同胞闻风起来！

(原件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打倒帝国主义

列位！你们觉得生活困苦吗？你们知道为什么比从前要苦吗？这因为：

一、英、美、法、日各帝国主义占据海关，把入口税弄得比出口税轻；所以国货不振兴，外国人把洋货来换了洋钿去，因而弄得我们一天穷一天了。

二、英、美、法、日各帝国主义常常借手〔债〕给军阀，拿了铁路、矿产种种权利去。军阀借了债，又向他们的流氓买军械来打

仗,打得我们生命都难保。

三、日本人杀我们工人同胞,巡捕房反捕了工人去。学生要募捐去接济,免得工人暴动,捕房又捕了去。我们又去吊被杀之顾正洪〔红〕,又被捕房捉了去。他们在牢里,又饿又冷;不但衣服食品拿不进,连望望都不准。但是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呀!

四、最近工部局越界筑路,侵占中国领土,又要实行什么印刷附律,码头捐,……处处压迫我们。鸦片之毒,人人皆知。但卖鸦片的大本营,是在租界(更其是在法租界)。

这样的压迫是要压死的,我们起来同他们争生路呀!

大家团结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

(原件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学 生 被 捕

日本人把我们的同胞顾正洪〔红〕无理枪杀了。凡是中国国民自然个个要起来表示哀悼和加以实力的援助,同时要激烈地反对日本人的!但是帝国主义者是互相勾结的,相互依靠的,这种反抗他们中间一个的举动,自然不许可的。他们的巡捕房,当然对于这种直接间接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举动要一律禁止了!因此要募捐去接济、免得工人失败的文治大学学生二人,和去公祭顾正红而路过租界的上海大学学生四人都被捕房捉去了,关在牢狱里了!

同胞们!我们救济同胞的被杀是不应该吗?我们援助同胞的被辱是不应该吗?我们是独立国家的人民,我们有一切自由

权,但是现在呢? 一切都被外国人剥夺了!

被捕的学生不但关在牢狱里已一星期了,而且横暴的捕房更加以种种越法的虐待呢! 探望是不许的,送饭是不能的,衣服是不可换的,棉被是不准盖的! 学生何罪,要受此恶毒无理、无衣无食的虐待!

同胞们,我们要明白,这次学生被捕,不单是学生的事,这是: 帝国主义者向中国人民的示威运动!

帝国主义者要中国人民永久屈服!!

帝国主义者表示给中国人民看,——要是反对他就要坐牢狱!!!

同胞们! 我们愿意受他们的压迫吗? 我们是他们的奴隶吗? 起来! 起来!! 大家起来反抗!!!

(原件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三) 中外报刊对反帝示威和五卅惨案的报道

1. 中文报刊

《热血日报》的报道^①

屠杀惨剧之因由 此次大屠杀的发生,从远点说,自然是因

^① 《热血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五卅运动爆发后为了及时指导运动而创办的日刊,由中共中央委员瞿秋白同志主编。本件原标题为《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六月一日——二日上海外国巡捕屠杀市民之经过》。署名舒严。

为帝国主义几十年侵略中国，及最近变本加厉压迫中国人民之结果。反帝国主义的心理和思想，自欧战以来，已一天一天地普遍于全中国被压迫的民众。到最近仇恨帝国主义，几为沿海各埠及内地各大都会一般市民所共有的心理，于这几日屠杀后，上海一般市民的表示，便可明白了。这便是必然要激起帝国主义决意屠杀中国人民之主因。

此次屠杀之直接原因自然也因受帝国主义压迫而起。本年二月上海日商纱厂四万余人罢工不得胜利而上工之后，日本资本家越发横行无忌。四〔五〕月十五日，日商内外棉第七厂甚至于故意停闭工厂，不许工人上工。工人群向资本家理论，被日本职员枪杀工人顾正红，打伤十余人。就这个小屠杀便已筑下此次大屠杀的根基了。纱厂革命的工人呼号惨痛之下，引起同情的只有上海革命的学生。二十一〔三〕日文治大学学生为工人募捐，被西捕捕去二人；二十二〔四〕日上海大学学生赴顾正红追悼会，途中被西捕捕去四人。这六人所谓“扰乱治安”的学生，已定于三十日在所谓会审公廨开审。同时，公共租界的国际帝国主义工部局又要于六月二日纳税外人特别会通过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取缔童工法案等四案。这四案通过不仅不利于工人和学生，而且大不利于上海的大商人，以及一般的商人和市民。所以到了被捕六学生开审那一日，即三十日，上海各校革命的学生二千余人，发起到公共租界讲演援助罢工工人及被捕学生，同时也反对纳税外人会的“四案”。大屠杀的惨剧于是乎演成了。

三十日屠杀的经过 五月三十日上午九时上海各校学生群

赴公共租界各繁盛街市讲演,当时即被捕房捕去十余人,但不久即释放出来。到午后各校来的学生愈聚愈多,听讲者亦愈聚愈众,捕房重新开始捕人,计捕去的达一百余人之多。当时听讲的群众看见学生被捕,愤怒异常,也随着其余学生跟到南京路老闸捕房。西捕和印捕藉口维持秩序,举棍向站在前面的学生乱打,头破血流者无数,那时已将近四点钟,西捕见解散群众无效,遂命令开枪。华捕向空放一排,印捕平放一排。结果学生五人及市民死十一人,重伤十余人,在狱尚有四十余人。屠杀后学生即往交涉公署迫陈交涉员速往交涉,但结果交涉不得要领。

屠杀后各界之表示 此次学生讲演的主因系援助工人罢工,屠杀之后表示最愤激的自然是在工人和学生。

上海各业工人于屠杀后即纷纷预备罢工。上海的工人绝不会忘记学生的流血主要是因援助工人而起的,他们而且认清此次屠杀与顾正红之被杀是一件事,要并案解决才是。所以三十一日在总商会开会时候,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会派代表与会,热烈要求罢市,并对此提出七条切实的要求:(一)惩办打死工人学生的凶手,并赔偿损失;(二)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权利;(三)禁止殴打工人;(四)改良工厂卫生;(五)禁止虐待童工和女工;(六)不许再用外国巡捕;(七)反对印刷附律。上海各业工人将要举行总罢工,故一面成立上海总工会,以为总指挥机关,同时他方面,内外棉纱厂工会又于一日派多数工人到各马路劝导罢市。一日起胶州路美丽工厂工人四百五十人即已宣布罢工,一日午后,上海总工会成立,即发表总同盟罢工宣言,并提出七条件,大意与内外棉纱厂工会所提出的相同。二日起各业工人纷

纷罢工。小沙渡除原有罢工各厂外，内外棉第三第四厂及日华、同兴各厂均已罢工，工人且被日人协同西捕枪死四五人，沉尸水中。杨树浦方面，祥泰木行、恒丰纱厂及怡和码头工人等均已罢工。电车工人于一日纷扰之中，即已有数路停止工作，自二日起已罢工十分之八，其余工人因被公司扣留未能跑脱，但亦只有一二路电车开行，每次都系空车。电话工人于一日午后五时起亦开始罢工，电灯工人六班之中已有四班出厂，只余二班在机关枪的包围里不能逃出。印刷工人方面，上海二大书铺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工人都已罢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也停止工作。可见工人阶级此次表示之坚决了。

上海学生之愤激自不待言。屠杀后学生群赴交涉署，请陈交涉员向捕房力争八条件：（一）立即释放被捕学生；（二）凶手须偿命；（三）医养受伤学生；（四）租界当局向中政府及各学校道歉；（五）抚恤及赔偿；（六）对于国民爱国运动不得制止；（七）向日纱厂交涉，允许工人要求；（八）各报自由登载新闻。并定于三日纪念“六三”运动，游行示威。

商界亦表示同情。中等商店表示甚坚决，尤以小商人及店伙为最。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于屠杀后，即纷纷投函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请求罢市援助工人和学生。三十一日在总商会会议，商总联合会首先表示赞成工人和学生团体之罢市要求。总商会最后亦表示愿意。而罢市中，店伙小商人的革命性表现得很明显，自己写着许多标语，而不只限于象总商会之反对印刷附律、码头捐、交易所、童工等四案之要求，于此充足证明上海市民在八十余年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积愤至何等程度呵！

帝国主义屠杀之继续 三十日的鲜血，帝国主义还不以为满意的。自一日罢市起，接着每日帝国主义都要试演其屠杀手段，而且每次的屠杀总是比前死伤更甚，流血更多。一日，上午十一时西捕协同万国商团用排枪向罢市的群众射击，结果死(伤)二十二。二日，小沙渡工人被日人与印捕枪杀工人数人。二日午后六时，在新世界附近，美国兵复用机关炮向新世界及宁波同乡会轰击，杀死五十余人，重伤者不计其数，捕房捕去二百余人，随后多数释放，但尚留少数拘禁。

截至二日为止，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炮火下牺牲的已达百余人，但此种屠杀到今还无终止希望，南京路还是照旧在恐怖战争状态，大炮、机关枪排列在各街巷，然而现在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已普遍全国，被压迫的人民联合起来，便是打倒帝国主义的武器！

(《热血日报》创刊号，1925年6月4日)

《血潮日刊》的报道^①

霹雳一声，似飞将军从天而下，连外国人也措手不及，大家都觉得突如其来的学生演讲队，昨天在公共租界到处发现。巡捕陆续拘捕，他们毫无畏惧，然举动却很文明，绝未抗拒；惟前捕后继，以口舌倾吐其爱国的苦心及热忱。诃帝国主义者之西捕，竟不知以何藉口，开枪轰击(华捕多从旁劝散，绝未威逼，可见爱国同胞人同此心)，以致死伤多人，风潮骤然扩大，正不知如何了

^① 《血潮日刊》是上海学生联合会为五卅运动而出版的日刊。本件原标题为《外人屠杀我同胞之大惨剧》。

结。此事之起因，本原于纱厂工潮，而此事真相，因上海各大报馆受工部局严厉之压迫，连事实都未敢登载，致全国同胞莫名其妙。本报于此忍无可忍之时，不得不将此事之以往经过原原本本详述如下，以求全国同胞之了解。

(一) 纱厂工潮之经过详情

上次小沙渡日本人所开之内外纱厂内之中国工人，因不堪日人之任意打骂，发生罢工，经总商会等调停结果，工人绝未占何利益，惟提出不能任意打骂等当然之条件，经厂主承认。詎知事后日厂主非特不照约行事，并开除代表四十余人以示威，复发明克扣新法，以小洋发工资，理争无效，于是十二厂工人不得已罢工，但他厂尚未罢工也。乃第七厂工人上工时，日人不许其上工，工人以事先既未布告，今已准备上工，当然不能任意遣回，因要求照发工资；经捕头调停，总算允给半日。晚班工人亦未知该厂停工，仍纷纷而来，及至后方知，因亦要照发工资，詎日人非特不允照发，即日班办法亦不允，见工人不退，即用手枪轰击，并用铁棍毒刀击刺，同时他厂工人闻声群集，亦被打作一团，结果打伤工人多名，其(中)顾正红一人随即身死，其余二人至今尚未脱险。

(中略)

(三) 捕房拘囚苦主

顾正红等既被杀伤，其余工人及顾君之亲友等当即抬伤者至公共公廨诉冤请验。记者有友人当日亲见垃圾桥堍交通为之

阻塞，哀号涕泣之声，闻者为之酸鼻。乃捕房自将伤者送医院，一面即将送来之工人及伤者之亲友多名拘捕，并驱散同情堕泪之人。资本家可以杀人，劳动者并诉冤亦罪，蛮不讲理，至斯已极！

(四) 上海报界之箝口结舌

此事发生后，工部局即以红须绿眼、全般恐吓之面目，严厉禁止各报馆登载，非特不许主持公道，加以评论，并连事实亦不许登载。（日人机关报上代表日本资本家的话，那自然是可以大登特登的。）各报馆屈于威力，莫可如何，即向以强项著名之《民国日报》，亦以数次主持公道，屡被捕房控办，此次更受捕房极端威吓，有驱逐经理、封闭报馆之势，乃亦箝口结舌毫无表示，甚至工人欲出钱登广告，各报馆亦不敢接，可见工部局之淫威矣。但此亦足见其做贼心虚，怕听公道也（按工部局之黑暗凡在上海稍久者类能知之；如包庇烟赌军火之贩卖、贿赂、西捕包探奸淫妇女等，几为司空见惯之事，在捕房中曾侃侃道之，记者有友人亲自听得。然上海各报无敢稍有一言指摘者，否则即以妨害公务论罪。上海人之箝口结舌，实比在军阀统治之下还要利害也。惟工部局威势既如此，而对于上海烟赌军火盗犯，终无办法，即可见其黑幕，盖此正其利之所在也）。

(五) 学生被捕

工人于此次杀伤事件发生后，罢工者万余，曾请各界募捐以资救济。学生界既极表同情于工人，因有募捐之举。及文治大

学学生某等二人，当向一商店募得小洋二角，欣然走出时，即为巡捕捉去。同〔次〕日上海大学学生朱义权、韩步先、赵振寰、江锦维四人，因偕同二十同学共往小沙渡致祭工人，途经普陀路捕房，亦被捕去，余人得乘机逃脱。此六人所犯何罪，真莫名其妙！是晚即拘留一夜，次日即解会审公堂，并用手铐，如待盗犯。盖捕房认为与工潮有关，即有重罪也。经请律师辩护，要求取保，乃问官宣布谓（日）领事来函云，此事与工潮有关，无论学生工人能否保出，均须日领堂期讯夺。日人欲得而甘心之意显然。而是日之英国问官则尊重之，可见其帝国主义者勾结一气；而我国会审官则格于向例（其实即不平等条约亦曾规定我国会审官为主，是可知帝国主义者于更有利益时，即不平等条约亦不遵守），不能作主，可叹之极。是日为星期一，而日领堂期须星期六，于是此六个无辜之爱国学生，至少须受六日之牢狱生活，而不知其究将得何罪也。噫！

（六）工人演讲被捕及工人代表被捕

木工唐宝生，愤于此次日人辱我国人太甚，手持白旗，至韬朋路一带演讲日人屠杀同胞及种种暴虐，被捕捉去。又李守宜及工人代表刘贯之亦被捕去，其虐待更不待言矣。

（七）捕房待遇被捕学生之酷虐

被捕学生当初捉进去时，尚许人探望及馈送食物。乃自公堂送回捕房后，捕房对待，忽形严厉，不准探望及送食物，并衣服棉被亦送不进去。被捕之日，天气本颇热，而次日即冷，乃被捕

学生犹单衣,夜卧水泥炕上,六人合盖毛毯四条,其冷可知。捕房中食物甚恶劣,食不得饱。其不准馈送食物之理由,谓曾有人被所送食物毒死,已极滑稽,至不准送衣送被,则毫无理由矣。各学校同(学)曾数次向其要求说情,而捕头脸色异常难看,口角下垂,每听一语,即以“呸”一字报之,后家属往视,始得一许,见在囚者脸色已大形瘦削矣。

(八) 我国官厅之颛预

自工人被杀伤,学生被捕后,我国官厅,如会审官之不能做主,既如上述;而工人学生数次请求交涉员陈世光严重交涉,彼概不接见,惟派二三等科员敷衍了事,而一方面日本反提出无理要求于彼,彼奉令惟谨。此外日本领事还要求军警弹压工人,军警长官亦奉令惟谨,警厅甚至连顾正红的灵柩都不许停,以图讨好日人。彼等原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三等走狗,也无足怪。

(九) 各界援助工人学生之酝酿

自上述之事发生后,各界均异常愤慨,而尤以学生界为甚,各自奔走联络,拟作一次大规模之群众运动。既有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之发起,又有各团(体)援助被捕学生联合会之组织,继又联合组织,定期齐起表示,而轩然大波于是起矣。

(十) 学生界之激昂

学生界既极愤慨,于是群集于学生会谋表示之法,讨论结果即派代表分头接洽各学校,并由工人偕往,各学校均大为感动。

文治大学、上海大学因自己同学被捕，自急于援救；此外同济、复旦各大学均愿全体出发演讲，以唤醒同胞；尤以南洋大学更为热烈，除允全体出发演讲外，并愿每人至少捐三元为救济工人之资，且在罢工期内，全体茹素，其热烈令人可感泣也。此外各校亦大都表同情，愿援助。

（十一）昨日学生讲演情形

上海各校既激于外人之蛮横的压迫与凶暴的行为，复感动于文治、上海两大学学生之救国精神，莫不慷慨奋发。于昨日上午九时，一部分学校已开始出发，下午一时，大队齐出，在南京路、海宁路、老靶子路等处讲演，将日本人之如何欺侮残杀中国人之情形，作简单的讲述，并发传单，秩序井然，精神奋发，既不畏怯，亦不粗暴，听者均为动容，而岂知变生不测耶！

（十二）捕房惨杀学生情形

当学生演讲时，华捕尚不甚干涉，惟从旁劝阻；西捕来则挺胸凸肚，遇队即捕。学生亦甚见机，或走避换地再讲，或避不及则受捕，虽无畏怯，亦不抗拒。乃各校学生愈聚愈多，前捕后继，因之西捕愈捉愈狠，即路人亦群起不平，愈聚愈众。每一演讲队（员）捕去，其未被捕者即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口号，态度极文明，气概极激昂。四时许群众更形拥挤，大马路（日）升楼一带交通为之梗塞。捕房遂派出大班西捕全副武装，到场示威，并捕去多人，且加殴辱。学生遂又大喊，群众和之，跟随至市政厅门首，西捕即回身以手枪相向，示群众将开枪即勿再前。乃群众初未信

巡捕对于彼等赤手空拳之人真能开火,加以众烈之气正张,遂均挺身而出,说:“你们打好了!”其实此时加以拦阻,不得前进,或用别法遣散之,均属易易,乃西捕竟然开枪(此并非彼等真恐群众有实力可以闹事而然,实以他们向来轻侮凌虐中国人之心理上以为杀死几个中国人算不得一回事,于顾正洪〔红〕之被杀可见),当场杀死五人,内形似工人者三人,学生二人,重伤者二十余人,被捕者百余人。死者在路暴露多时,始车送斐伦路验尸所,伤者送仁济等医治,闻在院又已死一人。(下略)

(《血潮日刊》第1号,上海学生联合会,1925年6月4日)

《民国日报》的报道

昨日下午四时,有学生结队游行,手持旗帜传单,上书“反对越界筑路”、“实行经济绝交”、“反对印刷附律”、“反对码头捐”、“抵制日货”、“援助被捕学生”等字,沿途分发演讲,并将上项字条贴于道旁之电杆木上。经过南京路时,巡捕即拘数名,带入老闸捕房,群众亦即蜂拥而往,捕房旋将学生释出。继捕乃开枪,接连数响,击伤十余名,皆倒于路上。霎时交通阻隔,电车亦莫能驶过。该地捕头乃派通班武装中西探捕出外,当场捕去学生二十余人,押在捕房。其受伤者则由工部局病人汽车载送红十字会总医院及仁济医院、宝隆医院等处治疗。内有重伤者五、六名,不及医治而毙。尸体已送斐伦路验尸所,候报官检验。

自此惨剧发生后,老闸捕房戒备顿严。前门临南京路,派有印度骑巡七、八名在捕房左近梭巡。故南京路自英华街迤西至西藏路之一段,行路初颇不便,因道旁观者拥挤不堪,直至九时

后稍息。而警务长麦高云于六时下紧急命令，召集各捕房高级警务人员，在四马路总巡捕房会议。

又讯：昨日下午一时半，有各校学生沿途散放传单，至南京路演讲。捕房逮捕学生数人，嗣后将被捕学生释出，然围聚之人仍不散去。嗣有某捕举棍将一学生毆击，面部有血，于是众上前责问，捕遂开枪。一时南京路自新造之新新公司起，西至竞芳照相馆间，枪弹纷飞。当被击毙数人，重伤而投天津路红十字会者有：石志宝，年二十一岁，弹由右肩穿过，住法租界方志路仁寿里八号；乔志迎，年二十七岁，住劳合路宁波路口新顺庆里二十一号，头部受伤；冯乐均，年十八岁，天津籍，住香山路宝仁里八十二号，背部受伤。此外受伤者分投仁济医院，亦有多人。

又一消息：昨共死四人，伤七人。西捕头下令放枪，印捕平放一排，华捕向天放一排枪。肇事时某君目见南京路北卧地五人，路中卧二人，南卧三人，北云南路二人。

(《民国日报》1925年5月31日)

《时报》的报道

昨日午后二时余，有学生一队，约百余人，手执白旗，上书南洋第一队、第二队、第三队及复旦第四队等字样，分发传单，排队游行华租两界，由闸北之四川路，经美租界而至英租界。诂各学生行至浙江路英大马路转角，被该处站岗巡捕拦阻，不准游行，并将各学生手中所执之纸条传单，散掷马路中。各学生遂折回走天津路，绕行至广西路，出英大马路，转西行至老闸巡捕房大门前，印捕等阻止前行，劝令折回。诂各学生不听，仍欲上前，

其时沿途跟随及大马路站立观看之闲人，亦有百余人。各学生因见西捕等力阻，意欲拥入巡捕房大门，西捕等恐其冲入，遂出手枪，先向众人恐吓，各学生仍不肯退，乃实行开枪，大马路中受弹倒地者计有八九人。各学生见捕开枪，始行分散。查被击毙之数人，有穿羽毛纱长衫者，有穿淡竹布长衫者，有形似工人，年约三十余岁，身穿蓝布短衫裤及白布短衫裤者。据闻击毙之数人中，仅学生一人，其余均系随观之闲人，并有一身穿羽毛纱长衫，形似学生，年约二十余岁，头戴白草帽之某甲，胸部被中一枪，尚负痛向北狂奔，沿途流血不止。其时电车不克通行，汽车马车，均绕二马路及宁波路而行。大马路附近云南路口各商店，当时因闻枪声，并见人众纷扰，均各闭门停业。老闸巡捕房大门，则加派荷枪各捕，站立门前，驱逐闲人。嗣经派人将尸体等车往虹口验尸所，始行恢复交通。

(《时报》1925年5月31日)

《申报》的报道

上海各大学学生暨各中学学生为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顾正红身死暨学生被捕事，共同发起在租界演讲，南京路捕房出面干涉，酿成风潮。兹将情形分录如下：

出发之情形 昨日(三十日)上午九时许，法租界二路电车由徐家汇东驶，莘莘学子乘车而来，至西新桥东新桥一带落车，纷纷向北面公共租界行去。

演讲之情况 学生三五成群，柱旗一面，上书“学生演讲队”字样，并分发传单二种，一为《学生被捕》，一为《打倒帝国主义》。

另由演讲人声述日商纱厂罢工并击毙工人、学生出而募捐被捕房拘捕之种种经过事实。

肇事之梗概 下午二时，有某校学生一组，在先施公司门首演讲，由南京路捕房上前干涉。学生不理，仍在演说。既而将该组学生拘入捕房，事为他组闻知，亦蜂拥自行投入捕房。捕房遂乘势将学生尽数放出，但禁止其再行演说。而学生仍演讲如前，卒至用武。先由某西捕开放空枪一响，印捕遂放排枪。时在下午三时半，学生及路人均有死伤，详数未悉。一时南京路东自浙江路，西至新世界，北及天津路，南至九江路，万头攒动。电车汽车等，均不能通行。直至下午五时，路人犹未尽散。

死伤者之处置 其因伤立时毙命者闻有四人，当即车送斐伦路验尸所。伤者则分送宝隆医院及红十字会之时疫医院。

(《申报》1925年5月31日)

是日(五月三十日)下午二时许，学生队行抵浙江路南京路左近，沿途演讲，分发传单，并将白纸所印红字各种长条，贴于电杆木上。经二百五十四号三道头华捕查见，因向阻不服，即至老闸捕房报告，请示办法。捕头传令如有不服制止者，准予拘究。此令一下，当捕去五六名。各学生即随被捕者拥去，而看热闹之人亦相随而往。将至捕房门前，学生将头戴之帽与手持旗帜传单，抛弃于途。是时南京路自英华街迤西至西藏路之一段，人如蚁聚，巡捕驱之不散，乃继续拘拿，连前共捕二十余名。捕头爱活生氏见群众有共有〔同〕拥入捕房之势，乃调集英捕一排，华捕一排，守于捕房门口，一面用警棍或手杖挥之使散，而群众不退。有

巡捕为群众所迫,向西退却者。爱氏乃取出手枪向空开放一响,群众仍不稍退,爱氏遂传令开枪。首由印捕放枪一排,当场饮弹身死者四名,受伤者二十三名,皆倒于同昌脚踏车行门首附近。迨将死者舁入斐伦路验尸所候验,伤者送往仁济及红十字会等医院后,即由救火会汽车到场,取水将路上血迹浇尽,而途中所聚之人,始逐渐散去。此时老闸捕房共拘有学生等已达四十六名之多,捕头遂命交保。截至昨午止,每人存洋五元保出者,不逾十名,余均仍在捕房。但至昨晚至〔止〕,闻在捕房尚有九人云。

(《申报》1925年6月1日)

《新闻报》的报道

昨日上午下午各大中学学生分途出发演讲、并分发传单者,有三、四千人之多。上午演讲时,凡经巡捕上前劝阻后,即易地再讲,故未肇事。下午一、二时,有在南京路一带演讲者,由捕房探员干涉拘捕,计先后拘入南京路捕房一百余人。一部分系关入铁栅内,一部分立在办事室内,见有续拘入捕房者,即齐声欢迎,呼“来得好”、“中华民国万岁”等语。捕房见所捕人数太多,即将立在办事室内之数十人先行释放,惟被释学生见关在铁栅内之同伴数十人尚未放出,均立在捕房门口不散。数分钟后,路上行人愈聚愈多,交通为之阻塞,当由释出学生公议谓捕房既将一部分学生留住不放,不如大家重入捕房,取一致行动。捕房方面见门首聚众不散,并有涌入捕房之状,即举枪示威,实行弹压。惟人数众多,一时不能退散,正在人头攒动之时,忽闻一阵枪声,前

立者已纷纷倒地。于是人心惶急，秩序大乱，闻共死学生行人五人，伤九人。学生方面死伤者，以同德、大夏、上大、南洋、法大、同济等校为最多云。

(《新闻报》1925年5月31日)

五月三十日在南京路流血而死者，闻以同济学生尹君^①为最惨。尹被弹后，初不觉，仍高立演讲。第二弹洞其胸，仍未觉也，演讲如故。至第三弹中脑，始仆地而绝，而口中则仍演讲未断也。

(《新闻报》副刊《快活林》1925年8月5日)

又一报告云，昨日南洋、同济、上海、文治等各学校学生，因上星期日人纱厂枪毙华工案，纷至华租各界演说，并发白话文传单。上午十时许，南洋大学学生三百余人，经过界路，即为西捕驱入铁栅，该学生乃在车站空地上演说，午刻至景贤女校休息。午后闻得各校学生已分头在租界演说于山东路、河南路、浙江路一带，曾为巡捕拘入捕房。学生以上次普陀路捕房曾拘捕学生，今又有同志被捕，甚形激昂。是时各校学生及工人至闸北集合，陆续到有数百人。当即有人动议结队赴会审公廨及交涉员公署请愿，众皆附和。遂列队由北福建路经天津路，从贵州路走南京路，先至交涉公署请愿。行过老闸捕房，因知有数学生被拘在内，领队者即临时动议，先请捕房释放。老闸捕房闻有大队学生

^① 即尹景伊烈士。

游行,已早有准备。其时为下午三时三十五分,当学生入捕房头门时,西捕即率华印捕持枪拦止。学生不得入,大愤,乃思鼓勇冲进,在前者被(巡)捕先用棍击伤头额数人,而在后者复拥进不已。某捕遂喝令开放排枪,顿时倒地者数人。学生及行人即纷向先施公司方面奔避,而子弹复向其方向射击,行人受伤者又十余人。其时浙江路南京路口正在热闹之时,男女行人不及逃走者,复被挤倒若干人,声如鼎沸,势若大乱。有数商店被惊,即上排门,纷扰一时许,始渐平靖。学生工人虽被驱逐,南京路、福州路等处商民,闻声出视者,拥挤不堪。当由总巡立饬全班中西探捕上街维持秩序,并派马巡驱逐闲人。万国商团亦下紧急集合命令,派机关炮车至南京路捕房附近戒备。至晚十时,犹未撤退。仁济医院门前亦派有西捕四人,禁止外人入内,盖因受伤者入院求治甚多,各界均麇集医院探问,甚为拥挤也。至下午六时,总巡率探亲往医院查视受伤者。闻首先开枪之捕,已由捕房看管候审云。

(《新闻报》1925年5月31日)

2. 外文报刊

《字林西报》的报道^①

中国学生和纱厂工人长期以来的骚动,在上星期六(五月三十日)举行的一次愤怒而激昂的示威中达到了最高峰,造成了极

^① 原标题为《学生在南京路暴动,几个中国人死亡》。

其严重的后果。有九名中国人被枪杀，三名在记者执笔时正躺在医院里，奄奄一息，命在旦夕。还有很多人受伤。这是中国人与租界巡捕斗争的结果，为近年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暴动。说实在话，自从一九〇五年中国人大举袭击并烧毁老闸捕房以来，上海的历史还没有受过类似这样严重的事件的扰乱；老闸捕房又一次成为暴风雨的中心。

学生群众早已对内外棉纱厂发生的罢工事件表现出积极而密切的关注，特别是最近一两个星期来，学生有撇开纱厂工人的任何正当的经济的不满而引入各种各样政治问题的趋势，以致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骚动已经变得具有明显的排外色彩了。

星期六(五月三十日)发生的疯狂暴乱是由会审公堂审讯案件直接引起的。有学生六名因参加一家纱厂暴动，一直在被拘押；他们因为找不到保，没有被开释而被拘押这一事实，是燃起具有政治头脑的学生们的愤怒的第一个火星。当这六个犯人在星期六被提到会审公堂要在日本陪审员田岛先生和陆襄谏面前受审时，有大批学生聚集在公堂外面等候审判结果。

可是这仅是一次属于程序性质的审讯，被告再一次还押，等候特别审理。他们可交保银一百元在外听候传讯，但他们都付不出，因此必须继续扣押。他们被押回到老闸捕房一事就成为产生这样不幸的后果的暴动的信号。

富有煽动性的旗子

当被告们被从老闸捕房押解出去时，全体学生都跟随在他们的后头。学生们对此次审讯的心情可从他们所持旗子上边的

词句中清楚地看出来。今举数例如下：“日本人撕毁我国的国旗”，“反对增加码头捐”，“取消治外法权”，“反对越界筑路”，“反对印刷附律”，“援救被捕学生”，“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外国人在华一切租界”。可以看出，这些口号与纱厂工人提出的所受的不公正待遇脱离得很远。这些口号实际包括象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之类团体所特别卖力的鼓动工作的全部领域。在游行队伍中，几乎上海每个中国教育机关都有代表在内，其中突出的团体有上海宣讲团、上海法政大学、南洋大学及上海大学等。上海大学在数月前因被公认为“布尔什维主义的学校”而闻名。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也有不少人参加在内。

老闸捕房进行拘捕

当学生群众沿着浙江路游行时，参加游行行列的人自然地愈聚愈多。及至他们走到南京路时，示威群众已达数千人之众，其中大多数人显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参加游行，也不知道游行是为了什么。游行队伍的首领们一到老闸捕房门口，他们就立刻向捕房大门冲去。当时门口仅有少数华捕和印捕守卫。巡捕以同样的速度拦住了冲过来的群众，中间逮捕了一些学生，把他们带进了捕房的院子。接着群众又一次向捕房大门冲去，这次又被拦住了。接着巡捕又拘捕了一些人。捕房急忙向总巡捕房告急，而集结于浙江路西藏路之间的群众，这时情绪已非常激昂。在几个西捕头的参加之下，一批印捕及华捕将群众从捕房门口赶到南京路上，一直把他们驱逐到市政厅还过去一点点。走到这里，三个西捕，史蒂芬、韦德和柯尔，遭到群众的毆击，群众还

企图夺取他们所带的手枪。他们竭力挣扎，手枪未被抢走，但被中国人狠狠地打了一顿。

狂暴而激愤的群众

游行群众这时又集结起来，把巡捕的警戒线推过马路，再度到达老闸捕房门口。群众象潮水一样地汹涌澎湃，地上撒满了在斗争中失落的帽子、衣服。有一些过路人也被卷进了群众的洪流，身不由主地跟着群众一起涌向捕房大门。这时队伍中发出喊声，“杀外国人！杀外国人！”毫无疑问，如果捕房大门真被冲破，捕房院子内一定会立刻被这批如今已变得疯狂、紧张和不负责任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这时求援的呼吁已得到响应，最先到达者当中有一批在运动场上打球时被唤来的捕头，他们还穿着运动衣就投入混战。但是增援的人数仍不足以驱散捕房周围的群众。及至学生再一次高呼“杀外国人”向前冲去时，老闸捕房负责人爱活生捕头(Inspector Everson)就下令开枪。印捕立刻执行命令。中国人四名当场被打死，另有多人受伤。群众听到枪声就纷纷逃命，不到几分钟，捕房门口就杳无人迹。有些伤者由同学抬走，其余躺在马路上的伤亡者立即被抬进捕房院子里。这里呈现出一种悲惨的景象——死亡四名，重伤六名或更多些，还有一些人受了轻伤。

共有九人死亡

尸体被送到验尸所，伤者迅即被送至最近的医院。有受伤者五人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或进医院不久就死去，一共死亡九人。

昨天(五月三十一日)还有重伤者三人病情严重,已无生还希望。捕房统计受伤人数为十四人,但实际受伤人数一定大于此数,虽然可能是一些轻伤。

在这场灾难性的搏斗停止以后,捕房就派出了大批巡捕在南京路上各处站岗。在这条路上,现在机关枪连的铁甲车正在巡逻。万国商团也接到紧急通知,但尚不需要出动,他们整天都在待命之中。

从下午两点多钟示威开始后到三点三十五分,群众暴动已到达最高潮。但又过了好几小时,南京路这一段才有一点点恢复正常的样子。学生群众冲向老闸区的目的,无疑是想袭击捕房,营救他们的朋友。他们对待这件事的心情,可以从他们对过路的外国人所喊出的口号中看出来,许多外国妇女被饷以唾沫,他们甚至对汽车和电车吐唾沫,车上的外国人饱受毫不客气的辱骂。

“爱国运动”

有一群学生立即跑到法租界交涉员公署找陈世光先生谈话,催促他立刻提出抗议,并要求释放被拘留在老闸捕房的学生。他们还提出下列要求:立即惩办“凶手”;要租界当局向中国政府及有关学校道歉;今后不再禁止“爱国运动”;日本纱厂厂主接受中国工人的条件;取消对新闻出版自由的限制。各校代表又去找总商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的负责人,要求他们协助对伤亡同胞取得赔偿。昨天下午(五月三十一日)总商会召开了特别会议,研究目前的局势。

根据切实计算,巡捕一共射击了四十四发子弹,大部分子弹

都击中。印捕使用了他们的连发式马枪，据信两支自动手枪的子弹也全部打完。站在印捕后面的华捕无法对群众开枪，他们打出的枪弹打碎了一些南京路对面房屋的砖头。有些医生认为有许多子弹是同时击中两个人的，因为伤亡者中有些人的伤口位于同一部位及离地面同一高度。内行认为四十四发打出的子弹命中率至少到百分之八十，因为除了死亡的和住在医院里的受伤者而外，还有更多的受伤者已经坐了黄包车回去。

据捕房调查所得，站在群众斗争前列的大多是上海大学的学生，另外是南洋大学的学生。有一个在医院死去的受伤者，自称来自南洋大学。（中略）

工部局的官方报道

星期六晚，工部局发布官方报道如下：

本日（五月三十日）下午一时五十五分，老闸捕房据报南京路上各处，有学生多名发表含有排外性质的演说，并持有排外字样的旗帜；当巡捕命令他们解散时，他们拒不从命。于是爱活生捕头率领西捕一队前往巡查，当即拘捕三人，其中一人正在向群众演说，其余两人则持旗在旁站立。

当将被捕者带回捕房时，一批群众跟在后边。这些学生承认他们的演说含有排日的性质，并且说，他们曾和其他各大学的学生商定在公共租界各处集会，抗议西区某纱厂内日本人枪杀一名华工的事件。当时将被捕者三人拘留，命令群众退出捕房。他们不肯听从，遂一并加以拘押。数分钟后，爱活生捕头又据报西藏路上正在举行同样的集会，乃前往巡视，将持有排日旗帜的

学生一名逮捕。大批群众跟在后边,一同到达捕房,因为他们不肯离去,便把他们也拘押起来。

下午二时四十五分,西藏路上首次发生反抗巡捕的暴行。西捕史蒂芬试图驱散群众,因而遭受殴辱,被击倒地。群众中有六人被捕。当他们被带到捕房时,有许多人跟在后边,闯入询案间。当时下令将他们逐出,在混乱中被控行凶的几个人也逃走了。

费了极大力气,方始把群众赶出捕房,群众沿南京路缓缓向东退走,在这时机,巡捕开导他们安安静静地散去。当走到永安公司对面时,他们站住了,表现出恫吓的态度。有几个人殴辱西捕韦德和柯尔,后者被击倒地,其时有群众数人企图夺取他的手枪。如今巡捕自由使用手杖和警棍,但是群众已变得无法控制了。巡捕逐渐被迫退回到捕房大门口。大批群众高呼“杀外国人”,力图攫夺西捕的枪械。正当群众快要拥进捕房大门之际,爱活生捕头下令开枪,捕房门口的印捕和华捕遵令开枪,当场击毙四人,击伤许多人。有受伤者六人由巡捕从老闸捕房送至山东路仁济医院,其中三人刻已因伤重死去。被枪杀者无疑是学生。开枪产生了驱散群众的直接效果;交通随即恢复原状。

(译自《字林西报》1925年6月1日)

《大陆报》的报道^①

昨天(五月三十日)上午,有最近在内外棉纱厂罢工中逮捕的工人六名^②,在会审公堂由陆襄猷及日本陪审官田岛审讯,当

^① 原标题为《在排日暴徒企图袭击捕房后巡捕开枪》。

^② 系学生六名之误。

即发生示威运动。

暴徒们手持排外性质的大旗，分发传单，高呼“杀外国人”，在浙江路上游行，到南京路口，他们转向老闸捕房。

巡捕命令暴徒们散去。他们拒不从命，巡捕就把在马路上演说的学生三名逮捕。这些学生承认他们的演说是针对日本人的。有一大群人跟着被捕的学生一同到捕房去。巡捕命令他们离开捕房，他们不肯离开，因此也被监禁。

同时，从永安公司起到西藏路止，这一段马路上挤满了人，印捕和华捕尽力阻挡他们走近捕房。

攻击巡捕

下午二时四十五分，暴徒们把愤怒转移到西捕史蒂芬身上。当他试图驱散他们时，他们把他击倒在地。攻击他的人有六名立即被捕，巡捕把他们拖到捕房询案间，就在那里把他们监禁起来。暴动者跟随着被捕人犯一道走进捕房；巡捕费了极大的力量，才把他们驱逐出去。

大约在这时，老闸捕房向总巡捕房告急，即有增援的巡捕赶往出事地点。万国商团也奉命全部出动。昨天直到深夜，他们仍在待命之中。

巡捕尽力把暴徒们赶回到永安公司附近，在那里暴徒们重新站住。他们忽然攻击西捕韦德和柯尔两人，把柯尔击倒在地。当时约有二十人向他猛扑过来，想夺取他的手枪。

巡捕使用警棍和手杖开路，赶来抢救柯尔。柯尔设法爬了起来，但到那时暴徒们已无法控制了。他们迫使人力单薄的巡

捕向后退却,直至他们退守捕房大院门口为止。

“杀 外 国 人”

暴徒们高呼“杀外国人”,向前拥来,要劫夺捕房官员和巡捕的步枪和手枪。

正当暴徒们要冲入捕房院内时,负责老闸捕房的爱活生捕头命令开枪射击。当即有暴动者四名倒下来死了,其他不少人被枪弹击中。

刹时间,整条南京路及其邻区变成象一座被围困的城市。从西藏路到浙江路,从九江路到北京路,每一处路口都有以二人或三人为一组的后备巡捕守卫着。他们握着手枪,准备随时射击。这些后备巡捕大部分是在出事后匆忙奉命出勤的。那时他们正在跑马厅打网球或玩板球戏,穿着白法兰绒裤,这与他们手中所握的恫吓性的手枪适成一奇异的对照。南京路上不准行驶汽车和人力车,商店也迅速关闭,装上排门。但从楼上窗口,不时有一二个人头偷偷地伸出来窥看外边的情形。

混乱的景象

在群众被枪杀和枪伤的地方,一大堆一大堆的鲜血沾污了人行道。在个别角落里,可以看见群众在扭打时以及其后逃避枪弹时所遗弃的鞋帽。在通向老闸捕房的甬道口,站着一队由九名西捕、二十名印捕、再加上二十名华捕组成的全副武装的警卫。恰好在人行道上躺着被枪杀者的尸体,鲜血从他们的裂开的伤口涌向路面。外国和印度骑巡在捕房四周守卫着,以防任

何突然的袭击。捕房院内，还有二十名以上的华捕，作为后备队。捕房询案间桌上，放着一大堆刚才示威游行所携带的旗帜；被捕的学生领袖就在邻近的牢房里，这次惨案就是由于要求释放他们而引起的。他们对于自己的行动所造成的流血事件似乎并不感到烦恼，他们懒洋洋地靠着牢房的铁栅。大多数年纪很轻，穿着西服，整洁而潇洒，好象这里是他们刚参加的一个游园会。

又有三人死去

有受重伤者六人被送到山东路仁济医院，其中三人傍晚死去，其余三人后来也奄奄待毙。其他受伤者有不少人由暴动者自己抬回去。他们的正确人数，是无法知道的。

当骚动呈现出巨大的规模时，四辆装甲汽车曾由总巡捕房赶来巡逻这个地区。但九点钟后不久就撤回了。除将额外子弹分发巡捕外，捕房还准备好更多的弹药。老闸捕房逮捕并拘押了一共四十四人。被捕者大多数是学生。其中有许多人不能讲上海话。人们认为这些人是由广州国民党总部派遣北上指挥罢工活动的。

昨夜，捕房准许各该被捕者交保银五元开释，但是到了夜半，只有十五人能交出五元保银。其余仍命拘押在牢房里。很多被捕者不肯说出他们的姓名，有的据信是对巡捕说了假姓名。有七个人据信是此次运动的首领，不准他们交保。他们暂被拘禁，等候公堂审讯。

精密计划

据调查人的意见,此次事件是有精密计划的。他们说,上海二十二所大中学校的代表举行过一次会议,当场决定“向市民宣讲关于上海日本纱厂罢工的性质”。这次会议是在五月二十七日举行的。示威者所携带的传单和旗帜,都证明这是一次以外国人,特别是以日本人为目标的攻击。但是观察者注意到,假使暴徒中有人携带武器,那是极少数。

昨夜捕房调查人前往仁济医院去查问受伤者时,发现只有极少数人愿意谈话,有的也是因为伤处太重,说不出话。

在骚乱发生时,苦力和过路的华人对在南京路附近的外国妇女,说了很多不礼貌并且富有敌意的话,其中很多外国妇女是因为电车受阻,不能行驶,停留在车上。

捕房意料暴动者昨晚将卷土重来,采取了特别警戒措施,但到今晨一时,并没有发生新暴动,虽然成群的人依然聚集在老闸捕房附近。

昨晚十时,有一小群人聚集在北河南路,但是他们迅即为值勤巡逻的巡捕所驱散。

被控参加内外棉纱厂罢工运动的六名学生,于昨日上午在会审公堂,由陆襄猷及日本陪审官田岛审讯。经过简单讯问后,决定还押,等候特别审讯。所有各该被告交保银一百元并具结开释。就在这六名学生受审讯过后一些时候,北浙江路上示威游行开始了,游行很快地发展到骚乱的地步。

陈世光采取行动

昨日下午暴动发生后，各校代表往霞飞路交涉员公署晋谒交涉员陈世光，要求他采取措施，务使由于暴动事件而被捕的学生得以立即恢复自由。陈交涉员访问上海领袖领事德罗西（G. de' Rossi），领袖领事要他去找工部局。于是陈交涉员访问工部局总巡麦高云（K. J. McEwen）。麦高云答称，骚乱的首领必须拘押，等待查办；其他被捕者，只要能证明没有参加骚乱，可以释放。

今天学生代表，将在给陈交涉员的呈文中详细报告事件的经过，并提出他们的要求。陈交涉员已于昨夜向北京政府外交部作了此次事件的报告。今天一清早，陈交涉员分别到受伤者所住的各医院巡视，并且正在进行详细的调查。

（译自《大陆报》1925年5月31日）

《密勒氏评论报》的报道①

五月三十日下午上海发生的骚动，是若干日以前日本内外棉纱厂罢工风潮的延续，内外棉纱厂罢工时曾经发生极大的骚动，有中国工人一名遭受杀害。五月三十日上午，中国工人六

① 《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是美国人密勒（Thomas F. Millard）于一九一七年六月在上海所创办的周刊。两年后由鲍威尔（J. B. Powell）继任该报主笔。本件原标题为《五卅运动罢工全貌》。

名^①在上海会审公廨受日本陪审员田岛和正审官陆襄猷的审讯，这时中国某些方面的人士，特别是学生界日益沸腾的愤怒之情，已经转化为行动了。必须注意：五月三十日星期六下午是半日例假，大部分外侨，包括工部局的一些捕头，不是往江湾看赛马，往恒利(昆山青旸港)看赛船，便是到跑马厅参加经常性的体育活动。

大部分中国学校的学生组织游行示威的队伍，虽然租界当局禁止游行示威，但是学生依旧坚持执行预定的计划，开始在靠近跑马厅的南京路和附近各大马路示威游行，手持旗帜，旗上写着抗议性和煽动性的词句。带头的人向各界华人群众发表演说，这些人是拥到这里来看热闹的。

学生示威游行经过的街道在老闸捕房辖区之内。老闸捕房位于南京路北几百呎的一块场地，从南京路通到老闸捕房有一条约十五呎阔的甬道。二十年前，由于公共会审公廨中国正审官与英国陪审员，因处理女犯问题发生争执，引起群众的骚动，这块地基上的老闸捕房就在骚动中为暴徒所烧毁。

五月三十日下午将近二时，老闸捕房据报学生正在发表带有煽动性的演说，手持写有排外词句的旗帜，即派巡捕一队分赴各肇事地点，饬令学生散去。他们并不听从。老闸捕房捕头爱活生得到报告，带领西捕一队前往调查，并拘捕学生三人，其中一人当时正在演说。

学生被捕以后，群众跟着巡捕与被捕者一道到捕房去，这是

^① 系学生六名之误。

上海司空见惯的事。被捕学生承认他们的演说和游行是学生反对日本纱厂杀害中国工人示威运动的一部分，承认他们的演说和游行是属于排日的性质。拥进捕房的群众大部分是三个被捕学生的同学，捕房吩咐他们离开，他们并不听从，非但不听从，而且“坚持”留在捕房，于是他们便被收容下来。几分钟后，捕头前往西藏路，另一群学生在该处集合。有一个手持排日旗帜的学生被捕，群众也一道跟到捕房。同样的事又在这里重演了一次。拥进捕房的学生们要求和他们的同学一起被拘留在捕房，于是他们也被拘留起来。

当时各处巡捕力图控制南京路、西藏路以及附近各马路上数量很多的群众。将近下午三时，西捕史蒂芬正在驱散群众之际，被人击倒于地。有华人六名被捕，群众又照例一道跟到捕房。拥进捕房的群众中，有许多人为了表示对被捕者的同情，要求被拘留，但捕房当局觉得拘留所已经拥挤不堪，无法收容，因此改变策略，下令驱散群众。接着发生混乱，在混乱之际，与袭击西捕一案有关的被捕华人便乘机逃逸。

据巡捕报告，在他们把群众赶出老闸捕房的场地后，他们挥舞着棍棒，把前面的群众沿着南京路赶去。当群众拥到永安公司前面十字路口，路上挤得水泄不通，暴徒的声势顿然浩大，几个外国巡捕遭受袭击，其中一名被击倒在地，暴徒企图夺取他的手枪。仅仅倚仗人多的力量，广大华人群众把大队西捕、印捕、华捕赶了回去，并且使出全副力量，意图夺取他们所带的枪械。这时“杀外国人”的口号喊出来了，当时巡捕们慢慢地退回到老闸捕房的入口处。就在这里巡捕们沉着抵抗。当群众企图向巡

捕猛扑时,捕头爱活生下令开枪,几名印捕当即奉命开枪。华人四名立即毙命,许多人受伤。就捕房附近情况而论,开枪虽然制止了混乱的局面,但这一事件却引起了一个运动,运动的结局如何,尚难逆料。

学生运动已赢得一般华人的同情。中国学生散发的传单,讲到帝国主义,讲到外人在中国各地、特别是在租界里所据有的优越地位,讲到工部局越界筑路等等事件。传单所述对事实大大地予以歪曲,但是总的倾向就是煽动华人的舆论。

当时几乎为人忽视的一件事,就是六月二日召开的纳税人特别会议,会上准备讨论通过强制印刷登记、取缔童工和增加码头捐等附律。以前屡次企图订定这些附律,但都未成功。华人声称反对这些业已提出的附律,会议虽未停止召开,但出席会议的纳税人尚不足法定人数。应该注意:数年前关于印刷登记问题的附律提请纳税人讨论时,日本纳税人一致到会参加讨论,现在他们对于这种附律显然不感兴趣。华人用广告和旗帜对这些附律表示强烈的异议;由于到会者不足法定人数,这些附律始终不能生效。外国纳税人会应某些纳税人的请求,准备通过他们的提案;对于这些提案的反对行为,现在在华人中间已经转变成成为一种运动,其用意并不在于排外,而在于使外人治理租界的声名扫地。

工部局所采取的首要措施之一就是戒严。万国商团奉命出动,从此以后,除短期轮班休息外,始终在值勤。虽然学生极力反对,虽然各华人团体纷纷提出“要求”,虽然有许多外侨认为关系人命的五月三十日那一天下午巡捕开枪杀人的行动过于轻

率，但在事件发生之际及事件发生之后，巡捕房的态度就是：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租界治安。

五卅事件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号召总罢业。最初表现在中国商店闭门停业上面，——这对外侨社会并不引起什么不便。但是不久各外国工厂的工人接着罢工，到笔者撰文时止，最激烈的是在英日两国运输业、特别是英国运输业的罢工。就工厂而论，中国工人罢工的重心，特别是在纱厂、烟厂和印刷厂方面。这些罢工事件，虽有几分是学生煽动和新组成的工会威吓的结果，但是应该注意，这些工厂都是中国资本家近年大有进展的企业，而中国印刷厂和烟草公司对于已经筹募和正在筹募的罢工期间工人失业救济金，恰好是大宗捐助者，这大概不仅是一件巧合的事。

从骚动开始时起，上海外国报纸曾经指出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在幕后操纵这些骚乱。虽然举不出什么事例来确实证明这一点，但布尔什维克党的势力，在中国、尤其是在学生界中间，确实有其影响。在骚动的头几天，若干俄人因煽动暴乱嫌疑被捕，但最近几星期，除会审公堂审讯陶适“同志”一案外，并未闻有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

(译自《密勒氏评论报》第33卷第8期，1925年7月25日)

(四) 五卅殉难者调查表及部分烈士传略

五月三十日殉难者调查表①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职业	前往南京路事由②	被帝国主义者枪击情况	死亡日期	备注	注
何秉彝	男	23	四川彭县	上海大学学生	反帝宣传演讲	弹穿肺肝	5月31日下午二时十二分死于仁济医院	参看本卷《何秉彝烈士传略》	《何秉彝烈士传略》
尹景伊	男	21	山东日照	同济大学学生	反帝宣传演讲	弹入肺部	5月30日晚七时四十分死于仁济医院	参看本卷《尹景伊烈士传略》	《尹景伊烈士传略》
陈虞钦	男	17	广东梅县	南洋附中学生	反帝宣传演讲	弹中腹部	5月31日下午五时四十五分死于仁济医院	参看本卷《陈虞钦烈士传略》	《陈虞钦烈士传略》
唐良生	男	22	江苏苏州	华洋电话局接线生	听演讲	弹中背及膀胱	5月30日晚八时十五分死于仁济医院	参看本卷《唐良生烈士传略》	《唐良生烈士传略》
陈兆长	男	18	广东新会	南京路东亚旅馆厨工	听演讲	弹中胸部	5月30日下午死于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前	一作陈兆常。参看本卷《陈兆长烈士传略》	《陈兆长烈士传略》
朱和尚	男	16	江苏苏州	洋务职工		弹中胸腹部	5月30日下午死于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前	具体职务不详。据《血潮日刊》6月16日记载,朱之牺牲,激励了洋务职工愤起罢工。	《血潮日刊》6月16日记载,朱之牺牲,激励了洋务职工愤起罢工。
谈金福	男	27	江苏镇江	九江路味香居教门馆伙友		弹伤右臂及胸部	6月9日下午死于仁济医院	一作谈全福	一作谈全福

邬金华	男	15	浙江奉化	新世界职工		弹入肺及心房	5月30日下午五时三十分死于仁济医院	石松盛略历载《时报》6月4日第二张第三版
石松盛	男	20	浙江上虞	南京路大中华电器公司工程部主任		弹由腰入，穿破两肾	5月30日下午七时三十分死于仁济医院	陈兴发牺牲情况，参看《申报》6月2日消息。
陈兴发	男	22	浙江宁波	九江路陈发昌包车车匠		中弹具体部位不详	5月30日下午死于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前	
王纪福	男	36	浙江宁波	裁缝		弹入小腹，伤及大肠	5月30日晚八时死于仁济医院	
姚顺庆	男	28	浙江慈溪	谋得利琴行漆工		中弹具体部位不详	5月30日下午死于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前	据《新闻报》7月8日消息，姚牺牲时无人知其姓名，后经其家属来沪查问，才由工商学联合会查明。
徐落逢	男	26	江苏松江	洋货商人	因事赴汉口路乐余里，返时经过南京路	弹中左肋	5月30日死于家中	一作徐洛逢。据《申报》7月23日报道，徐死后由其家属自行棺殓，未向外间报道，后经沪北六路商联合会调查，始将情况查清。

① 本表专指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在南京路被帝国主义开枪当场打死或事后身亡者。据目前资料核对属实者共计十三人，其中学生三人，职工九人，商人一人。

本表资料来源，除已注明出处者外，主要根据《新闻报》6月17、18日所载上海学联法律委员会编制的《五卅死亡调查表》以及《血潮日报》6月4日至17日所发表的《烈士略史》。

② 本栏只填明六人，尚有七人未填。据当时报刊记载，朱和尚、谈金福、邬金华、石松盛、王纪福等五人，系因事经过南京路，或被列为“路人”；陈兴发、姚顺庆二人则情况不明。但因事经过南京路，也有可能停下来听宣传演讲，以至激起反帝爱国热情，一起参加斗争，如厨工陈兆长就是这样（参看本卷《陈兆长烈士传略》）。现因缺乏足资证明的材料，表格中暂留空白，以待补充。

何秉彝烈士传略^①

君讳秉彝，字念慈，四川彭县人。初毕业于彭县中学，继升入成都工业专门，因苦其设备不善，于十二年秋转学出川。时京沪各地学校均招考期过，乃赴杭自修。十三年春，应考大同大学，获取入校，专工〔攻〕理化。顾以国事日非，民不聊生，乃慨然叹曰：“目前吾国外遭帝国主义之侵略，内受万恶军阀之蹂躏，吾人陷此水深火热之境地，欲求救国救人，舍行国民革命外，其道无由。致力自然科学，虽有相当之价值，然非此时所需也。”即于（是）岁秋间转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肄业焉。

君为人忠诚勇敢，坚毅卓绝，热心社会运动，其一往直发〔前〕之精神，师友咸敬佩之。“五卅”日于上海英租界南京路讲演此次日人枪杀工人之经过及帝国主义侵略之阴谋，以期唤醒同胞，共御大敌，激昂慷慨，听众无不动容。因之大遭英捕之嫉视，开枪向君射击。君中弹身倒，口中犹连呼“打倒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不已。

闻君家尚有衰年祖母及双亲，一弟两姊两妹，并遗一娇妻幼

① 据当时曾在上海大学学习的同志回忆，何秉彝烈士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邓中夏同志在《五卅后中国职工运动之新现象》（载《人民周刊》第一、三期，1926年2月7日、24日出版）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共产党历年来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而牺牲，兼且为一般民族利益而奋斗，而牺牲。京汉罢工杀了施洋、林祥谦，此次五卅运动，上海杀了何秉彝、刘华，青岛杀了李应〔尉〕农，安源杀了黄静原，其余被杀被捕者尚难指数。共产党是革命前线的先锋。”这就更可证明何秉彝烈士共产党员的政治身份。又《血潮日刊》第3号（1925年6月6日出版）《烈士略史》也曾刊出何秉彝传略，内容与本文基本相同，故从略。

子。君殉难之年，甫二十三岁云。

(《上大五卅特刊》1925年6月15日)

悼五卅死难烈士何秉彝同学(传单)

我们敬爱的救国烈士何秉彝同学呀！你如今是回去长眠在故乡了！你的救国热血，流在南京路上，渗入国民心里；血泊中的三声“中华民国万岁！”将永远在爱国男儿脑中激荡。我们含着满腔热泪送过了你；回头来，要找着你我的仇人算帐。亲爱的同胞呀！莫让我们的救国烈士之血白流，我们要找着我们的仇人帝国主义算帐。起来，起来，大家起来！我们的烈士已长眠在地下，我们的仇人还耀武于国内；和我们仇人帝国主义拚命呀！他是杀灭中国爱国男儿的敌人呀！

上海大学学生会

(原件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尹景伊烈士传略^①

尹君景伊，字希农，山东日照人，年二十一岁。父业商，君光绪三十一年生于沪上，宣统元年归里，入涛雒镇高小学(习)，毕业后，即入同济大学机师科肄业，应于今夏毕业后，拟再入工科肄业，以求深造。君聪明勇敢，勤苦耐劳，有大志，常以宁为国牺牲而死、不为惜身而生以自勉。此次与陈君宝聪及全体同学，在

^① 尹景伊烈士，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参看《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1957年)第二册“五卅”照片说明。

租界游行演讲。陈君宝聪在前，一英捕在旁以枪拟之待发，为尹君瞥见，自后推陈君，弹适飞来，自陈君额际掠过，血流如注，尹君见状，急前出手巾为之缠束。英捕即上前对准其胸发枪，君立仆，所穿工〔上〕衣血流殆遍。此衣学生欲取得之留作纪念，英捕阻止，即送仁济医院，衣即剝〔剥〕下焚去，于五月卅日下午七点十四分气绝。当时遇害情由，多数同学在场目击。君父母俱亡，兄在青岛行医，有妻未婚，今不幸为国牺牲矣，伤哉！

(《血潮日刊》第2号,1925年6月4日)

陈虞钦烈士传略

陈君虞钦，粤之梅县人，年十七，生于清宣统三年，家住婆罗洲山口洋。陈君为椰子商陈宴棠次子，其兄即足球〈及〉运动健将陈虞添也；有一姊现肄业于大同大学。陈君年十一岁时，就学于新加坡道南学校，翌年来沪就学于南洋附小，去年冬毕业升入附中，而仍任附小童子军总队长。君自幼聪敏活泼，而尤善于运动，同学均视为后起之秀。五月三十日，为学生示威运动，在上海南京路为西捕枪击，腹部受弹，送入仁济医院割治无效，延至民国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五时三刻毙命。诸师长同学及上海童子军总司令沈同一闻之，均为之痛哭云。

(《血潮日刊》第4号,1925年6月7日)

唐良生烈士传略^①

唐良生烈士，年二十二岁，江苏人，系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俗称华洋电话局）八七八号接线生。他在工作中，因经常受到英帝国主义分子的欺压，深感不平。五月三十日他在家^②休息（当天值夜班），下午出门遇到各校学生在马路上宣传反帝，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遂和学生一起拥至老闸捕房门前，要求释放无辜被捕的工人学生。不料野蛮残暴的外国巡捕，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弹中他的背和膀胱，因伤重不治，当晚八时一刻于仁济医院逝世。烈士于临终时犹念念不忘于反帝爱国。他说：“学生是国民，我也是国民，不得不表爱国的同情。”“我因爱国而死，何痛之有！”“国将没有，哪里有家呢？”

唐良生的牺牲，使电话公司的职工大为激动。五月卅一日，该公司西行的接线生在共产党员王西庚带领下，愤怒地掼掉了听筒，一致罢工；第二天，总行和其他各区行的全体接线生也加入了反帝罢工行列。这天全体接线生七百余入一起开会，公推王西庚同志为总代表，负责筹组工会。王西庚激昂地说：“我们这次罢工不是为了加几个工钱，而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枪杀我们的同胞兄弟；我们中国人，尤其是工人，被帝国主义欺负了几十年，我们这次一定要站起来，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大家感

^① 当时报刊并无关于唐良生烈士的专门报道。本篇传略系根据下列材料编写而成：一、《新闻报》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所载上海学联法律委员会编制的《五卅死伤调查表》；二、《民国日报》一九二五年六月三日所载宝兴里房客联合会通告；三、电话公司老工人褚士良等回忆。

^② 据《民国日报》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报道，唐良生家住南京路大庆里。

动极了,全体高呼:“为五卅烈士报仇!”“为唐良生报仇!”“打倒帝国主义!”“坚持罢工到底!”

唐良生的牺牲,使一般市民也受感动。沪北宝兴路宝兴里房客联合会在六月二日发出的通告中说:“学生为爱国心所激,公祭被击毙的顾正红,乃竟发生从来未有之惨剧(即五卅惨案)!稍具人心,宁不下泪!万恳各界速起一致行动,并请不忘唐良生临死时所言(略,语同前)”。可见唐良生烈士的遗言,已成为激励群众进行反帝斗争的动力。

陈兆长烈士传略

陈君兆长,广东新会人,年十八,充亚东〔东亚〕旅馆厨工。家极贫,有兄一人,同在亚东〔东亚〕旅馆服务,友于〔谊〕颇笃,富于情感。日纱厂惨杀工人案发后,君愤极,时发简单之爱国言论。五月三十日,君外出,适各校学生在马路上演说,闻言之下,益明帝国主义之虐待华人。谁知英捕开枪,竟于此时开出,君身中数弹,因以不起。噫,爱国男儿,冤遭不白,惜哉!

(《血潮日刊》第14号,1925年6月17日)

五卅殉难烈士墓纪念碑碑文

蔡元培撰文 谭延闿书丹

在江湾阙五图方家木桥。

五卅殉难烈士墓碑 中华民国十六年十月□日,五卅殉难烈士墓成,烈士丧葬筹备委员会乞文于余,以告来者。余当五卅惨案发生之日,方避地欧洲,于举国人士激昂悲壮之奋斗,虽未

获躬预其役，然自五卅惨案发生，中国民族独立运动震撼〔撼〕世界之伟大影响，则所耳闻目睹。辛亥革命而后，帝国主义者以北洋系军阀为工具，继续其宰割蹂躏中国民族之行为，久视中国为次殖民地。吾党总理孙先生，独持三民主义，以广州一隅之力，与全国之军阀、世界之帝国主义者战，期完成辛亥革命之使命。十余年来，憔悴忧伤，坚苦卓绝，终以党员之不努力、国民之不觉悟，北伐未成，国民会议之主张复失败，赍志饮恨，于十四年三月十二日病逝于北京行馆。孙先生死，帝国主义者与军阀益肆无忌惮。国民党员与中国民众痛导师之丧失，知舍努力国民革命中国无以自存，故当帝国主义者压迫加甚之日，被压迫民众反抗之中心亦与之俱增。孙先生逝后七十八日，遂有公共租界工部局英捕屠杀中国爱国民众之惨剧。先是上海某日商纱厂，因压制罢工，残杀工人顾正红，工会与公正之中国人士诉之英人主持之公共租界工部局。工部局置之不理，同时为压迫租界中国人民计，工部局复于是年公共租界纳税人年会提出印刷附律、交易所条律等，剥夺中国居民之出版自由，侵犯中国政府之经济主权，中国民众忍无可忍，遂群起为和平之呼吁。国民党员与青年学子，均自动集队讲演，以激励国人之爱国心。工部局竟悍然不顾，命令街捕遇讲演者无论男女悉加逮捕。一小时内，被捕达百余人，老闸捕房狱为之满，后至者尚踵相接。时讲演者前仆后继，不稍退却，听讲之群众亦愈聚愈众，南京路途为之塞。群众虽义愤填膺，然皆徒手，无暴动之行为。工部局总办鲁和，竟纵任英捕头爱活生开枪示威，群众闻枪声纷向后退，而途塞，急乱不得出路，爱活生乃续令各捕向徒手图退之群众开实弹之枪，至四十四响之

多。是役也,前后殉难者,计:何秉彝、陈虞卿、顾正红、尹景伊、王纪福、邬金华、唐良生、石松盛、金念七、杨连发、蔡阿根、谈金福、徐桂生、魏国平、罗文照、谈海根、詹仲炳、陈兆常、朱和尚、傅芳贵、王奎宝、陈兴发、徐洛逢、王芸生、姚顺庆等二十五烈士^①,伤者不计其数,弹皆由背入,足证死伤之群众均于退让后受创。呜呼惨矣!英帝国主义者在华之残酷凶恶,至是悉暴露无遗。惨耗所播,海内外之国人与列国主张公道之人士,莫不群起斥英帝国主义者之暴行,愿为上海被压迫民众之声援。各地排英举动风起云涌,不约而遍于全国。上海公共租界商店罢业者二十七〔六〕日,工人罢工者三〔二〕十余万人,罢工期间延长至两阅月。广州民众因响应上海民众之排英,复演六月二十三日之惨剧,殉难者数十人。自此而后,英人在华之商业一蹶不振,中国被压迫群众与帝国主义者之肉搏,亦由此开始。本党总理孙先生唤起民众共同奋斗之遗嘱,乃见诸事实。中国民族在国际上之独立运动,五卅烈士实开其端,诸烈士之死,岂寻常哉!继诸烈士之后,奋斗牺牲,以达完成中国国民革命、实现总理三民主义之目的,是则后死者之责也已。中华民国十六年十月五日蔡元培撰。

(《宝山县再续志》卷十五,艺文志,金石目)

^① 此系整个五卅运动期间在上海牺牲的烈士名单。

二、全市人民紧急行动,决定罢工罢课罢市, 一致反抗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

(一) 各界团体紧急集会,发表通电, 反抗帝国主义的屠杀

1. 学生会和工会

学生会、工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对抗办法

昨日下午肇事后,上海学生联合会、各工会、各团体,均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善后救济办法。惟此事能否和平解决,尚难预卜云。

(《新闻报》1925年5月31日)

(工部局警务处五月三十一日情报): 昨天下午四时,在闸北潭子湾三德里三十七至四十号工友俱乐部内开会。刘华告诉到会的约一百人说,工会将发动工人举行罢工,以支援被巡捕逮捕的学生。另一个煽动者陶静轩说,他刚才听到有几个学生在游行时被巡捕杀死。学生已为工人而牺牲。他号召工人奋起报仇。

(译自《六国调查沪案委员会报告》第26号附件所载《警务日报摘要》)

全国学生总会通告召开临时紧急会议

卡德路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得悉肇祸情形后，立即通告本埠各大学学生，请即推派代表，准于昨晚九时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对付方针。

(《新闻报》1925年5月31日)

全国学生总会和上海学联急电全国各界吁请援助

万急。全国各地学生会均鉴：本日上海各校学生出发演讲，被英捕房枪杀多人，全埠震动，余情再报。 全国学生会。

(《新闻报》1925年5月31日)

全国学生会另有一电致全国各学校，报告巡捕开枪(死)伤多人情形，并要求各校学生就本地演讲、有〔为〕之后援。

(《民国日报》1925年5月31日)

全国父老均鉴：日人于此次工潮中杀工人顾正红，复拘捕上海大学、文治大学学生。本日上海各校学生出外演讲，捕房始则拘捕，继乃放排枪，死者数十，伤者无数。详情再报。望我国人速予援助。上海学生联合会。

(《民国日报》1925年5月31日)

各校学生促交涉员向帝国主义进行交涉

肇事后，大队学生赴交涉公署报告经过，请为交涉。当由陈

交涉员及杨小堂科长出见，以人数众多，嘱为推举代表。当由各大学学生公推九人，进内声述一切并主持其事。陈交涉员据报后，当派干员调查，比即偕杨科长赴领袖（领事）公馆交涉多时。回署时已八点钟余矣。

（《民国日报》1925年5月31日）

学生方面得交涉员报告^①，开临时会议，到者有南洋代表李宣誉、上大陶月杰、复旦大学方超骥、同济袁文渊、亚东侯星白、复旦中学房苑林、法大胡长源、大夏朱作人、上海学生会刘一清、文生氏、秦坤城等廿余人。议案如下：一、立刻释放被捕学生及工人；二、凶手抵命；三、负责医治受伤学生。学生开会后，即赴交署请陈交涉员根据上项三例向领袖领事交涉，交涉员允为尽力交涉。

（《民国日报》1925年5月31日）

学生呈交涉署文：

呈为英捕枪杀我国学生、工人，恳即转向领袖领事严重交涉，以保国权而维民命事。窃学生等昨日（三十日）散布租界演讲之目的，仅在唤起中外人士之同情，一致援助日商内外纱厂被压迫之工人同胞。此系一种爱国运动，乃工部局不明原委，嗾使中西巡捕妄加干涉。经学生等一再声明，彼仍置若罔

^① 据《大陆报》五月三十一日报道，陈世光的交涉毫无结果。工部局总巡称，“骚乱的首领必须拘押，等待查办；其他被捕者，只要能证明没有参加骚乱，可以释放。”因此，学生极为不满，随即开会讨论，提出条件。

闻,且复恣意逮捕学生及工人。学生等向之理论,彼不但置之不答,且转以警棍及手杖抨击。学生等热血填胸,复继续进行演讲,顷刻间为巡捕逮捕者几百人。学生等目睹此种惨状,遂至捕房门首,以极和平极诚恳之言词,要求释放。彼等始则严加拒绝,继则连发排枪数十响,群众不及回避,因枪伤毙命者九人,重伤者十余人,轻伤者不计其数,头破脑裂,血流染地,凄惨之状,悲痛之声,凡稍具人心者,无不为之堕泪。乃彼等不但无丝毫怜恤之心,而且声势汹汹,犹欲继续发枪,大有杀尽群众而甘心之势。学生等手无寸铁,御暴无方,更不敢铤而走险,以演成滔天之惨剧,遂退而推举代表,向贵使要求面向领袖领事严重交涉,业经贵使亲往交涉,与以口头之答复。学生等以此事关系重大,特恳贵使再向领袖领事正式严重交涉,提出下列最低限度之条件(余情容候查明续呈):一、惩办打死工人、学生之凶手并赔偿损失;二、释放先后被捕学生及工人;三、承认工人要求,迅速解决工潮;四、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绝对自由;五、收回会审公堂,取消领事裁判权;六、反对越界筑路;七、取消外人纳税会议,组织中国人的市议会,管理租界市政;八、不承认印刷附加律、码头捐;九、不准用外国巡捕;十、向中国政府道歉。(下略)上海学生会张银河。五月三十一日。

(《申报》1925年6月1日)

各校代表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继续

上街宣传,要求各界准备“三罢”

上海各男女学校,每校推派代表一人,于昨日上午十一时,

齐集西门方斜路东亚体育专门学校大教室开紧急会议，到会者有百余人。首由主席报告经过详情，嗣由各代表相继发言，讨论甚久，仍决意奋斗到底，一面请中国官厅严重交涉；一面派代表吁请各团体援助，并向工商学各界要求，至万不得已时，一致罢工、罢市、罢课为最后武器。并议决今日仍集队游行演说，散发传单。至下午一时始散会。当主席报告及讨论办法时，各代表无不纷纷泪下，痛哭失声。

(《申报》1925年6月1日)

2. 商会及其他团体

商总联会和各马路商联会讨论对付办法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闻讯后，当于即晚八时，召集紧急会议讨论相当办法，并闻其他各路商联会暨各团体，均有紧急会议之召集。

(《申报》1925年5月31日)

本埠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自此事发生后，非常愤激，有议决主张实行停业以待解决。昨日山东路、河南路、爱多亚路、五马路、四马路等各商联会，纷函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从速召集紧急会议，讨论救济办法。

(《民国日报》1925年5月31日)

商总联合会函请总商会和纳税华人会举行非常会议

敬启者：顷据学生联合会紧急报告，本日(三十日)午后三时，生等因爱国起见，分队演讲，通过南京路，西捕始则棒击，继则开枪，立毙学生五人，重伤者十余人，轻伤者数十人，血流遍地，状极悲怜，被拘者无数各等情到会。同人于即晚八时，召集紧急会议，念以兹事关系国体民命，殊非浅鲜，若不亟谋对付，民何以堪？夙仰贵会领袖公团，对此重大事项，定有最后办法，合亟函达，速请贵会举行非常会议，筹谋对待。时事交迫，勿延为禱！此致上海总商会(致纳税会函相同)。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启。

(《民国日报》1925年6月1日)

闸北商联合会、法租界商联合会称与 各团体一致进行，援助学生

闸北十一路商联合会于昨日下午八时举行联席会议，到蔡洽君、张秉鑫等二十余人。议决案之第二款为学生游行演讲与捕房发生冲突致演惨剧案，议决与其他各团体一致进行，援助学生界。

(《新闻报》1925年6月1日)

法租界商业联合会昨午后二时为南京路之大惨剧案，会员咸向该会探问究竟，不期而至者甚众。当开紧急会议，多数会员主张请外交部向北京公使团提出抗议，严重交涉，务达惩凶道歉

目的而后已，一面应随同本埠各团体表同一态度，以树声援。

(《新闻报》1925年6月1日)

少年宣讲团紧急会议，决定扩大宣传，警醒群众

中华路少年宣讲团为因南京路枪杀学生事，特于昨晚(五月三十日)八时开临时紧急委员会。到者为顾九如、范大璋、申万世等。由陈贤本主席，讨论宣传方针。议决援救办法：一、知照游行宣讲股召集全体股员，即日出发，举行大规模宣讲。二、拟发起游行大会，由化装演讲股股员化装沿途表演，以期警醒群众。届时并请各学校各团体共同参与。

该团游行宣讲股，当晚由主任郑镇昌通告各股员，故昨日(五月三十一日)已由主任偕同陆文龙、范大璋、葛仲高、蔡正明、陈贤本等，分中央队第五队，冒雨出发，赴邑庙一带宣讲。听讲者约三百余人，均为感动下泪。

(《民国日报》1925年6月1日)

留日学会、教职员联合会电段祺瑞，要求严重交涉

上海留日学会、中等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合会，昨为南京路血案致电北京当局。

致段执政电 陷日(三十日)上海学生在租界讲演，突被捕房拘去，拘禁不足，继以排枪，死伤数十，全埠震动，乞速飭外部严重交涉，以维国体而重人道。

(《新闻报》1925年6月1日)

(二) 工人学生冒雨上街宣传,并包围总商会, 推动实现“三罢”斗争

工人学生继续到公共租界宣传,推动商界罢市

昨日(三十一)上午南京路一带,尚为沉寂。至十二时后,学生由各处来者,络绎不绝,均散聚于永安、先施公司门首,手中并不持旗帜,亦无特殊标志,仅有各校之徽章。有一部分学生胸悬白花一朵,以作记号。至下午二时许,人头愈形复杂,有工人模样者,有苦力者,有各团体之代表者,均手持传单,向路人分发。学生则仍聚在公司门首,听候消息。后忽由某校学生传语谓速向惠罗公司聚集,有紧急事项宣布。众乃冒雨奔至惠罗公司,知召集者系商科大学学生,并无十分紧急之事,不过嘱咐学生从速乘机向各商家劝告,以作后盾。众又奔返原处,斯时大雨如注,学生等均如落汤之鸡。后学生等即三五成群,分赴南京路各大商号演讲,并分发传单,大致为“援助工人”、“反对印刷附律”、“反对码头捐”等词句。女界有向警予等分头演讲,向将传单贴诸于玻璃窗上。自南京路云南路口起至北四川路口止,均有学生踪迹,并有学生乘坐自由车来往传达消息,秩序尚佳。

(《新闻报》1925年6月1日)

公共租界南京路,昨日上午八时许,有学生数人一队,逐一向各商店声述肇事情形,请各本天良,一致援助,云云。下午二时,又有学生分贴传单。闻曾与捕房又发生小冲突。捕房并以

救火车两辆，扭开水管，预备喷射，而学生则沿途击掌高呼，向天后宫桥方面踱去。

(《民国日报》1925年6月1日)

学生在南市游行演讲

上海全体学生昨日分组游行。午后一时许，男女学生三百余名，各持请同胞援救被捕学生之白旗，行经大东门肇嘉路时，适值大雨。各学生均冒雨演讲，声泪俱下，听者动容，并沿途分发传单、泣告书颇多。

(《新闻报》1925年6月1日)

被捕女学生的一封信

献微、暨之诸兄：此信传阅后，请转交武昌师大章国希女士。日前寄上各件，谅已收阅，不知何故竟无只字复我。现在报告一件极伤心痛心的事件。这消息想早于报中得悉，但沪上各报馆受帝国主义者所监视和威吓，因此不敢登载此间真实情形，委实使人痛心呵！希望你们各地人士的援助，不然上海的同胞，恐将尽死于帝国主义者枪锋之下！

五月三十日，全沪各学校学生因日纱厂惨杀同胞，出外讲演，唤醒人民之自觉。殊知工部局开排枪乱打，死的伤的，一齐抓了去，不许拍照，更不许人看望。伤心呀，伤心！失踪者有之，被捕者不知若干。

三十一日，大雨淋漓。九时，我才得昨日消息。当即热血沸腾，向外奔跑，会同各同学向各商店讲演，要求他们罢市。一直

奔跑了大半天。午后三时，口已说干了，力竭声嘶，精神疲倦到万分。跑到大马路^①，只见武装洋兵、印捕、中国巡捕沿途站立，群众亦异常拥挤。大家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外国人！”外人闻之，即以棒击，受铁棍打伤的甚多。

我校四位女同学，我也是一个人，当即被捕入捕房。我怕吗？不，一点也不怕！入内，将我等与男学生关在一个铁栏内。昨日今日先行进去的人们见我等入，鼓掌欢迎，高呼不怕的打倒帝国主义。然而同时就铁棍打了一大顿，无以问罪，就放了他们。我们其后另移一室。我坐铁窗下，仍向外面中国的巡捕宣传，颇能获得他们的同情。坐了几点钟，我就说几点钟的话。将晚我们亦放出。外人那种凶恶轻视中国人的态度，恨不能食其肉而寝其皮。但是当我出入之际，竟高呼我胸中要说的话，当外人与我谈话时，我告之“你们提〔捉〕吗，打吗，无论如何，只能束缚禁止中国人之身，确不能束缚禁心〔止〕中国人之心。中国人民之心不死，民族解放革命工作不息，不打倒你帝国主义不止。被你们打死的中国人，他们虽然死了，还有我们，还有四万万的中国入哩。老实告诉你们，我中国人已觉悟了，万众一心的争民族独立自由平等，死有何畏！这种蛮横至极的举动，竟出于你们文明国第一等国的手！哼，文明国……现在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觉醒起来了，要革你们帝国主义的命，怎样……？”

既出，见武装的怪物更多，沿途安置水龙，预备冲群众。此

^① 即今南京路。

时会商齐集总商会开会，我去看(望)探听死于院中^①同学后即赴会。同[会]场人山人海，群情愤恨，当即议决许多案件，等总商(会)签字罢市后，乃散。大家决心，学生听学生(会)的命令，商人听商会的命令，工人听工会的命令。

六月一日，我昨夜寝不安眠，就写给各地报告。今晨起即外出，见黄浦滩尽外人武装兵士，马队密布，南京路一带水机多架。各商店罢市了。到校知同学立校前者，捉去五个。既而分头出外讲演。午后我沿路走，见那些武装兵士马队，在各路横冲直闯，冲散伤死者不知若干。群众赤手空拳，到处与外兵抗，奋不顾身的冲锋，因此死者二三百，计十九处开枪打人。喷[哼]，今天的上海，雨霖而云密，天色惨淡，尸体满地，血泪成河，惨目伤心，有如是耶。死者已矣，后死的我们，应当如何继起呵！工部局出布告，晨五时前，晚八时后，不许人行，如违打死，不负责任。电灯公司工人已决罢工，惟外国海陆军包围甚紧，出以枪击，其他各机关亦然。街上有四人共语即捕，反抗即枪击。我因热血沸腾了，仍外出。于静安寺、长滨路一带，与运输筑路工人作了几度的谈话，结果他们均表示异常愤激。但是危险来了，包打听——侦探——(华人作外人之走狗者)认识了我，报知狗东西外兵，乘汽车者来停行[在]我讲演处，幸我见机(行事)，不然又被提[捉]了去，吃铁棍。

最近各方情形观察起来，的确证实了世界的政治局面，已入于极反动时期，所谓法西斯[斯]蒂的政策，布满了全世界。但有

^① 指医院。

何足畏！正以有此客观的情形，才能促成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大革命。朋友们，被压迫的我们，趁此时机又当如何呢？明天又不知死伤多少？唉！静候你们及各地同胞的声援呢！

复光忙中。六月一日晚。

(《京报》1925年6月8日)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圣陶^①

从车上跨下，急雨如恶魔的乱箭，立刻湿了我的长衫。满腔的愤怒，头颅似乎戴着紧紧的铁箍。我走，我奋疾地走。路人少极了，店铺里仿佛也很少见人影。哪里去了！？哪里去了！？怕听昨天那样的排枪声，怕吃昨天那样的急射弹，所以如小鼠如蜗牛般，蜷伏在家里，躲藏在柜台底下吗？这有什么用！你蜷伏，你躲藏，枪声会来找你的耳朵，子弹会来找你的肉体，你看有什么用？

猛兽似的张着巨眼的汽车冲驰而过。水泥溅污我的衣服，也溅及我的项颈。我满腔的愤怒。

一口气赶到老闸捕房的门前，我想参拜我们的伙伴的血迹，我想用舌头舐尽所有的血迹，咽入肚里。但是，没有了，一点儿没有了！已给仇人的水机冲得光光，已给腐心的人们践得光光，更给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洗得光光！

不要紧，我想。血总是曾经淌在这地方的，总有渗入这块土的吧。那就行了。这块土是血的土，血是我们的伙伴的血，还不

^① 即叶圣陶同志。

够是一课严重的功课吗？血灌溉着，血温润着，行见血的花开在这里，血的果结在这里。

我注视这块土，全神地注视着，其余什么都不见了，仿佛已把整个儿躯体融化在里头。

抬起眼睛，那边站着两个巡捕；手枪在他们的腰间，泛红的脸肉，深深的纹刻在嘴围，黄的睫毛下闪着绿光，似乎在那里狞笑。

手枪，是你吗！？似乎在那里狞笑的，是你吗！？

是的，是的，什么都是，你便怎样！我仿佛看见无量数的手枪点头，听见无量数的狞笑的开口。

我吻着嘴唇咽下去，把看见的听见的一齐咽下去，如同咽一块糙石，一块热铁。我满腔的愤怒。

雨越来越急，风吹着把我的身体卷住。全身湿透了，伞全然不中用。我回身走才来的路，路上有人了。三四个，六七个，显然可见是青布大褂的队伍，虽然中间也有穿洋服的，也有穿各式衫子的短发的女子。他们有的张着伞，大部分却直任狂雨乱淋。

我开始惊异于他们的脸。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严肃的脸，有如昆仑的耸峙，这么鬱怒的脸，有如雷电之将作；青年的柔秀的颜色退隐了，换上了壮士的北地人的苍劲。他们的眼睛冒得出焚烧掉一切的火，吻紧的嘴唇里藏着咬得死生物的牙齿，鼻头不怕闻血腥与死人的尸臭，耳朵不怕听大炮与猛兽的咆哮，而皮肤简直是百炼的铁甲。

佩弦^①的诗道：“笑将不复在我们唇上！”用以歌咏这许多的

^① 朱自清的号。

脸，正是适合。他们不复笑，永远不复笑！他们有的是严肃与鬱怒，永远是严肃与鬱怒！

似乎店铺里人脸多起来了。从家里才跑来呢，从柜台底下才探出来呢，我没有工夫想。这些人脸而且露出在店门首了，他们惊讶地望着路上那些严肃的鬱怒的脸。

青布大褂的队伍便纷纷投入各家店铺。我也跟着一队跨进一家，记得是布匹庄。我听见他们开口了，差不多掬示整个的心，涌起满腔的血，这样真挚地热烈地讲说着。他们讲及民族的命运，他们讲及群众的力量，他们讲及反抗的必要；他们不惮郑重叮咛的是“咱们一伙儿”！我感动，我心酸，酸得痛快。

店伙的脸比较地严肃了；没有话说，暗暗点头。

我跨出布匹庄。“中国人不会齐心呀！如果齐心，吓，怕什么！”这句带有尖刺的话传来，我回头去看。

是一个三十左右的男子，粗布的短衫露着胸，苍黯的肤色标记他是在露天出卖劳力的，眼睛里放射出英雄的光。

不错呀！我想。露胸的朋友，你喊出这样简要精炼的话来。你伟大！你刚强！你是具有解放的优先权者！我虔敬地向他点头。

但是，恍惚有蓝袍玄褂小髭须的影子在我眼前晃过，玩世地微笑，又仿佛鼻子里发出轻轻的一声“嗤”。接着又晃过一个袖手的，漂亮的嘴脸，漂亮的衣著，在那里低吟，依稀是“可怜无补费精神”！袖手的幻灭了，抖抖地，显现一个瘠瘦的中年人，如鼠的黧棘的眼睛，如兔的颤动的嘴，含在喉际，欲吐又不敢吐的是一声“怕……”。

我倒楣，我如受奇辱，看见这样等等的魔影！我愤怒地张大眼睛，什么魔影都没有了，只见满街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

微笑的魔影，漂亮的魔影，惶恐的魔影，我咒诅你们：你们灭绝！你们销亡！你们是拦路的荆棘！你们是伙伴的牵累！你们灭绝，你们销亡，永远不存一丝儿痕迹，永远不存一丝儿痕迹于这块土！

有淌在路上的血，有严肃的鬱怒的脸，有露胸朋友那样的意思，“咱们一伙儿”，有救，一定有救——岂但有救而已！

我满腔的愤怒。再有露胸朋友那样的话在路上吧？我向前走。

依然是满街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

（《文学周报》第 179 期，1925 年 6 月 28 日）

暴风雨——五月三十一日

沈雁冰

昨晚延留到今晨的密雨，趁着晓风，打扑人脸越发有劲。C 和 S 一早起来，已接到“十二点钟出发，齐集 N 马路”^①的命令。昨日下午的惨剧，昨夜的噩梦，仅仅三小时许的睡眠：都不但不曾萎缩了他们的精神，反而使他们加倍的坚决勇敢。不久，G 和 H 也来了，四人便开始了热烈的谈论。

后来，话也说完了，时候也不早了，他们预备出去。G 说：“我们今天都不带伞，也不穿雨衣；还要少穿衣服；准备着枪弹下热

^① 指南京路。

的难受。”

“今天未必再吃枪弹了，倒须预备受自来水的注射”，S微笑的说，“湿透了的衣服是会发散血管里的热度的，所以还是穿了雨衣去的好。”

S的提议立刻被多数否决，大家还是不带伞也不穿雨衣，行无所事的出发了。各人脸上有一种好奇的踊跃的喜气，眼光里射出坚决的意志。这是勇敢的战士第一次临阵时所有的一种表情。

* * *

他们四个到了N马路时，S百货公司的大钟正指着十二点三十分。N马路两旁的行人道上已经攒聚着一堆一堆的青年学生和短衣的工人。那时雨下得很大，他们都站在雨里直淋。GH四人沿马路往东走了百余步，看见二三小队的女学生正散开来各店铺内演讲；GH他们也立刻加入了这项工作。

他们刚要走进第十三家商铺去讲演的时候，忽然“吉令令……”的铃声在马路中间乱响，四五辆脚踏车从西向东驰去，一路散放小传单，成百的在湿风中飞舞。这是命令！这是聚集的命令！这是出发的命令！立刻攒聚在行人道上的青年们都活动起来；从横街里小弄里出来一队一队的学生和工人都分布在N马路；“援助工人”、“援救被捕学生”、“收回租界”、“取消印刷附律”、“打倒帝国主义”……等的揭帖和小传单都开始散发并且粘贴在沿马路商铺的玻璃窗上；每一个街角，每一家大商店前，都有人在那里演讲，都有一群市民攒聚着听；口号的呼声，此起彼伏，压倒了隆隆的电车声。长且阔的N马路立刻塞满了演讲者，

听众,和散传单人。

* * *

有好几起的“三道头”和“印捕”拔出手枪擎起木棍来驱逐群众,撕去揭帖了;但是刚赶走了面前的一群,身后的空间早又填满了群众,刚撕去了一张揭帖向前走了几步,第二张揭帖早又端端正正的贴在原处。冷酷的武力不能浇灭群众的沸腾的热血!昨日的炮火已把市民的血烧到沸滚!

自来水向密集的群众注射了!但是有什么用?“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像春雷似的从四面起来,盖过了一切的声音。W百货公司房顶花园的高塔上忽然撒下无数的传单来,趁风力送得很远,鼓掌声和欢呼声陡的起来欢迎。沿马路每家商店楼上的窗洞里都有人头攒动,阳台上也挤满了人,都鼓掌,高喊,和马路中的大群众呼应。

这个时候,将近三点钟,沿N马路商店的玻璃窗上早一色贴满了各种的揭帖和传单,讲演亦已停止,满街飞舞的是传单,震荡远近的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CS等四人此时站在S公司的门前跟着狂呼。在一个呼声过去之后,擎着手枪怒[怒]目拟[凝]人的“三道头”、印捕、华捕,又冲到群众面前示威。马路里暂时沉寂一下子,但是即有一个尖音破空而起,大家忽然看见一位女学生站在马路中间——离刚刚过去的示威队不及一丈——高喊那些口号,两旁的群众立刻齐声应和。那一种慷慨热烈的气概即使是铁汉见了也要心抖。C推着S道:“这是密司蒋,密司蒋!”

* * *

脚踏车队又传布命令：“包围总商会！”于是N马路上的学生工人群众都向北而去，让负有“维持治安”责任的巡捕执行他们的“职务”，布起防线来。热烈的空气移到总商会去了！那里有总商会的先生们正在一个小阁内静静的开会。

“持重老成”的先生们全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是可恼的探报一道一道的传来：大队的学生象潮水似的涌进来了，总商会被他们占领了！他们在戏台前开会演说了！女学生们把守一重一重的门户，只准进不准出去！他们誓言“不宣布罢市，死也不出去”了！

“老成持重”的先生们侧耳听：好威武的呼噪声呵！好热烈的鼓掌声呵！忽然又寂静无声。这是个可怖的神秘的寂静！这是暗示将有大鼓噪的寂静！果然呼声夹掌声轰然而起，似乎那小阁子也震动得岌岌颤抖。呼声的怒涛里跳出浮出“请总商会会长出来答复！派代表去请！”的白沫来，在小阁子里也隐约可以辨得清。

热烈的空气终于冲进了冷静的高高的小阁子里。F先生^①象受了“城下之盟”似的对众宣布了“同意罢市”。在万众欢呼“明天罢市！”的呼声里，女学生的防线撤了，群众也渐渐散去了。那已是又一个黄昏。多么可纪念的一个黄昏！

（注一）S埠总商会在天后宫内，里面有一个戏台，历来的市民大会多数是在这里开的。

（《文学周报》第180期，1925年7月5日）

① 指上海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

在工人学生包围下，总商会被迫同意罢市

前日南京路流血惨剧发生后，各界以事出非常，均有会议，以便表示。前夜全国、上海两学生会及商界总联合会等，均连夜集会，决定于昨日下午三时，在总商会召集各团体开联席会议。各团体代表及各校学生到者，已达万人，除各团体代表在会议厅开会外，男女学生均环绕总商会外花园隙地中，监守门户，禁止外出。

开会后由学生会代表刘华^①主席。旋有学生赵权生^②登台演说，演说毕，昏倒不省人事，即昇入同仁〔济〕医院医治，即已毙命。

次相继演说者甚多。学生方面群要求商界罢市，以为援助。当经议决由各团体推代表二人组织委员会，专司其事，并要求：一、释放被捕学生；二、抚恤伤亡；三、外人道歉；四、取消印刷附律；五、取消码头捐；六、收回会审公廨。议决后并推代表向警予、沈泽民、郭尘侠等向总商会要求赞助罢市。

当由总商会、纳税华人会、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分别会议。商总联合会，以大势所趋，各会员既一致主张，首先表示赞成，由各路签字。纳税华人会旋亦表示赞同。惟总商会则以会董会须在晚间十时召集，手续上未便即行赞同。各代表均以大众既已赞同，务请即行表示。该会方会长乃至会场，当众表示可以赞助，众拍手。嗣学生复要求方君以书面表示。（中略）方见势已如此，

① 恐系林钧之误。

② 恐系商务印书馆编辑赵金生之误，当场昏厥，以后苏醒。

乃签字赞同。至是会场群众及大队学生乃陆续散去，时盖已六时半矣。

后上海道尹张寿镛复派代表朱士嘉到会，与方接洽，询问情形。总商会并将情形电京，请政府派员来沪主持云。

(《申报》1925年6月1日)

昨总商会召集临时紧急会董会，在议事室开会；纳税华人会亦开理事会；各马路商总联合会亦在常会室开会。同时各界各团体亦假总商会议事厅开会，到者有代表五千余人。预定由总商会之会董会议决后，请其宣布办法，再行开会。当时即有男女工人及学生等在台上演说，语多沈痛。

至四时，有人主张先开会，由学生代表林钧主席，宣布协议结果。先由各团体各推代表二人组织委员会，办理罢工事件，众赞成。并议决(一)惩凶，(二)抚恤，(三)道歉，(四)及(五)抵制码头捐与印刷附律，(六)收回会审公廨为要求张本。次先后推代表请总商会宣布议决办法。

至五时五十分，副会长方椒伯乃在二层楼上宣布：总商会、纳税华人会、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议决于明日(即今日一日)罢市。嗣由到会各团体分别签字，乃散会。

当开会时，有大队学生在议事厅外静候消息，并守护总商会大门，只准入内，不准于散会以前出外。

远东社云：当会议未开以前，有商务印书馆编辑赵金生，到会报告(学生)经过南京路抛球场一带，又被巡捕干涉，并击伤多人，拘捕十余人。言时非常忿激，竟至心血冲动，当由商总联合会

柏坚乘车送赴麦根路同济医院，闻未及医治，即行毙命。其热衷国际问题如是，闻者痛心。

又前日在南京路中流弹伤者毙者之家属，昨亦出席会议，请求伸雪，约计男女妇孺三十余人。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会亦有代表到会，并当场提出七条件如下：一、惩办打死工人学生之凶手，并赔偿损失；二、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权利；三、禁止殴打工人；四、改良工厂卫生；五、禁止虐待童工及女工；六、不得雇用外国巡捕；七、反对印刷附律。

（《民国日报》1925年6月1日）

关于五月三十一日总商会会议的回忆

孙 筹 成^①

五月卅一日上海总商会之会董临时紧急会议，是由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总会议〔会〕长袁履登、会〔议〕长叶惠钧，是日清晨同访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告以惨案发生后，昨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纷纷开会，全以此案关系重大，应请上海总商会起来领导全体商人与帝国主义奋斗。其时商会正会长虞洽卿在北京，故方副会长即打电话至商会秘书处，赶发是晚开会董临时紧急会议之通告。

届时方椒伯赴商会三楼主持此会议，各界民众全赴总商会大礼堂，静听此会议之消息者数百人，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会员居多数。会议三小时，议决分电北京执政府及南京军民两长，报告发生惨案经过，请严重交涉。方椒伯将此决议案至大礼堂向群

^① 孙筹成是当时上海总商会秘书。

众宣布,一致表示反对,以为商会太不肯负责,如是重大案件,仅向政府身上一推,太讲不过去。全体一致主请上海总商会发罢市通告,而使团结与帝国主义奋斗。方椒伯允将众意向会董会报告,请他们覆议。詎料各会董听礼堂上民众愤激之言,都已吓跑了。方见人去室空,回至礼堂向民众说明会董已散,无法复议,因他们所议决者无罢市字样,所以他不敢擅专。众皆愤激,谓非罢市不可,将方包围不许其走。方睹此情形,知非罢市不可,乃叫秘书处拟罢市通告,当众朗诵,并亲笔签字。群众认为满意,即往付印。因时促,印就后由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派人将此通告向各马路分发。

(摘自孙筹成日记补述)

《字林西报》关于总商会被迫同意罢市的报道^①

星期天(五月三十一日)在河南北路总商会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讨论五月三十日老闸区枪杀学生一案和租界华人应采取的对策。出席大会的约有一千五百人。其中大部分是学生和工人,在其他的人当中有一百多个比较次要团体如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各过激派团体和店员联合会等的代表。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林钧担任主席。

下午三点二十五分,会议开始后,上海学联代表赵权生宣布说:今天大会要讨论上海历史上一件最大的事件,就是巡捕惨杀学生的事件。拖延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因此,上海华人应该

^① 原标题为《宣布总罢市》。

立即宣布总罢市。赵权生于是就在台上叩头恳求大家同意他的意见。这个方法获得了预期的效果，大家都鼓掌表示同意他的意见。

新闻路商界联合会代表王朝宗接着提议说：要等到工部局不肯惩凶赔偿以后，我们才好宣布总罢市。这个意见遭到会上一个不知姓名者的驳斥，他说：只有总罢市才是唯一可能生效的武器。这时会场上引起了片刻的混乱，但福建路商界联合会会长邬志豪一上台又恢复了秩序。邬志豪说，总商会和纳税华人会代表正在和几位法律顾问商量起草一份建议书，准备提到大会上通过，这样才使会场平静下来。广东路商界联合会代表王汉良证实了邬志豪的说法。大会随即休会十分钟。复会后，大会通过了由一位姓名不详的学生提出的下列议案：

- 一、立即停止向工部局纳税。
- 二、宣布对一切外国人暂时实行抵制。
- 三、劝导中国人只用中国货。

会场的讨论超出了原定的议题。有一个自称闸北潭子湾工友俱乐部会员的工人坚决主张上海所有商店和工人应全部宣布总罢业。另一个也是来自潭子湾工友俱乐部的煽动分子，则尽情斥责本埠各报不刊载有利于工人方面的罢工消息。金锡香粉纸厂业主范大璋起来表示反对总罢市，他认为这样做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他正说到这里的时候，有一群工人走上台去打断他的话，并将他赶下台去。主席林钧随即起来说话。他扼要地叙述了中国工人在日本纱厂所受的虐待。他认为，只有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对付外国人，这种耻辱才能得到湔雪。中国的军阀都为

外国人控制，因此人民不能指望从军阀那里得到什么帮助。这些话得到闸北潭子湾两个工人的赞同，他们愤怒地痛骂日本雇主。

会议旋又回到原定的议题。总商会和纳税华人会的代表向大会提出了联合起草的下列提案，并得到了大会的通过：“大会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由到会各团体各推代表二人组织之，办理大会所讨论的事项。”

这个决议通过后，出席大会的激进分子要求将赞成总罢市的提案立即提交大会讨论，并且邀请总商会的会长到会表明态度。他们要求作出的决议案随即提交大会讨论，并经大会通过。当时会场上显然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是不赞成这个决议的，但由于怕挨揍，没有表示他们的意见。大会派出了四个代表去邀请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耽搁，方椒伯带了袁履登一同到了大会会场。方椒伯站在阳台上，神情显然是受到胁迫的样子，带着犹豫的声调说：总商会赞成总罢市的提议。袁履登随即加上一句话说：“我们应该凭良心办事。”

方椒伯随即同意在六月一日由总商会向市民发出通知，其措词如下：

“鉴于我国同胞惨遭枪杀，本会决定实行总罢市。上海总商会。民国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这个通知的一份草稿上盖了总商会的图章，交给了上海学生联合会。这个总罢市的决议，也受到出席大会绝大多数马路商界联合会的代表的赞成。这时，一个自称代表电气工业联合会的人提出保证说：全体电气工人将以参加罢工的行动来表示

他们的同情，他们的罢工还要扩大到包括所有外商雇用的人，其中也包括职员和仆役在内。最后由一个煽动分子领导大会齐声高呼：一、打倒帝国主义！二、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三、全体工人、商人、学生联合起来，一致为同一目标而斗争！

除上述决议外，大会还通过了以下的决议：一、宣布拒用一切外国银行的钞票。二、中国人把存在一切外国银行的存款提出来。三、巡捕房交给中国人管理。四、命令外国兵舰驶离黄浦江。五、立即释放一切被捕的工人和学生。六、杀害学生和工人的凶手应受到审判，一切受害人应给予赔偿。七、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的权利。八、不准工厂殴打工人。九、改善工厂卫生条件。十、禁止虐待女工及童工。十一、工厂停止雇用外国（印度？）巡捕看门。十二、反对工部局关于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和交易所领照的提案。

有一个商务印书馆的职员名叫赵虎廷，在大会上讲完话后，就昏倒在地。他被抬到仁济医院，在医院身死^①。大会进行期间，还散发了三种不同的反日传单。到下午七点钟，大会宣告散会。在散会前，主席报告这次枪杀事件的受伤者当中已有九人死亡。

工部局总巡曾告诉我们说：上海总商会对于实行总罢市的建议并未表示同意，事实上，该会坚决反对这样的措施^②；任何

^① 商务印书馆职工看到《字林西报》这条消息后，曾去函该报说明赵昏厥未死。

^② 据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所载，就在五月三十一日晚上，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往晤工部局总董费信悖，向费信悖保证总商会对运动并不同情，他之所以在宣告总罢市的文件上签署，完全是强迫和威胁的结果，云云。

关于实行总罢市的传单都没有获得该会的许可。

(译自《字林西报》1925年6月1日)

(三) 号召罢工罢课罢市的传单

上海市民速起反抗外国人的残暴!!!

外国人在我国横行无忌，暴虐已极！掠我土地，强设租界。
在租界居住的市民，完全成了亡国奴隶！

对于商人 勒派苛捐

对于学生 任意拘囚

对于工人 殴打残杀

对于新闻 非法箝制

现在又有更加暴虐的四案！

印刷附律 码头捐

交易所注册 童工问题

日人又任意在小沙渡惨杀工人。昨日学生为反对外国人种(种)
暴虐出发演讲，又遭捕房毒手！

惨杀九人， 重伤者三十二人！

市民呀！同胞呀！外国人把我国人的性命看做猪狗不如！我们
还能忍受，甘心做亡国奴吗？！速起来反抗外国人的暴虐，罢市罢
工罢课!!!

(原件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同胞们,赶快罢市罢工抵抗!①

巡捕房因为学生反对印刷附律及码头捐枪杀学生十余人。

同胞们,赶快罢市罢工抵抗!

上海全体学生泣告

(原件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告电车、汽车、黄包车工友

中国受外国的凌辱欺压真是到了极点!

外国人成了中国的皇帝!

中国人成了外国的奴隶!

尤其是你们天天受外国人的打骂侮辱,一定更觉得痛苦!

昨日学生为反对外国人种种强暴的行为,如印刷附律、日人残杀工人等,出来演讲,又被外国人开枪打死了十几人。

痛心呀!可耻呀!

凡是中国人,一致起来反抗呀!罢工、罢市、罢课。

握着上海生死机关的交通工友起来罢工呀!

反抗外国人的强暴!!!

(原件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告上海自来水厂和电气处工友

各校为抗议日人残杀工人而出来演讲,学生十余人被巡捕

① 原件无标题。本标题为编者所加。

开枪打死了。

外国人简直把中国人的性命看做猪狗不如!

凡是中国人,必须一致起来反抗。我们要求全体学生、工人、商界赶快罢课、罢工、罢市!

你们手里握着重要机关的工作,所以你们必须起来罢工,反抗外国人的暴虐行为。

(根据《上海会审公廨审理五卅惨案记录》英文本所附证据文书第四号译出。《字林星期周刊》第156卷第3024期,1925年7月25日)

商界同胞应立刻罢市响应^①

商界同胞们:

今日上海全体学校都已罢课起来反抗外国人惨杀中国同胞;今日上海各工厂亦已罢工起来反抗外国人惨杀中国同胞!

我们商界亦应立刻罢市响应,才对得住国人啊!!!

(原件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告中国巡捕

我们中国受外国的凌辱欺压,真是到了极点!

外国人把我们中国人简直当做牛马奴隶看待!你们一定要觉得痛苦的!

昨日学生为反对外国种种强盗行为——如印刷附律、日人

^① 原件无标题。本标题是编者所加。

残杀工人等在马路上演讲,又被外国人开枪打死了十几人,打伤了几十人。把中国人的性命看做猪狗不如!

我们同是中国人应该一致起来,反抗这种强暴的行为!

罢市,罢工,罢课。尤其希望,望你们罢岗!你们看见中国同胞无故被外国人残杀了,痛心不痛心呀!

(原件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罢市! 罢工! 罢岗! 罢课! ①

外国人要定印刷附律,剥夺中国公民的自由。外国人要增加码头捐,加重中国商民的负担。日本厂主虐杀中国工人,还要停闭工厂,绝人生路。

中国人! 中国人! 已经成了亡国奴! 爱国的中国人,演讲救国醒同胞,反对这些东西洋来的强盗,反对外国人的恶律苛税,反对日本人的停厂虐杀; 哪知外国强盗动野蛮,在大马路开枪打死同胞十余人,重伤的好几十,捉去的好几百,这种现象成何世界! 上海是中国地方,哪容外来的洋人随便枪杀中国人! 我们难道甘心做外国人的牛马奴隶!

起来! 起来! 快起来! 大家一齐心,不怕外国人。

中国商人罢市!

中国工人罢工!

中国巡捕罢岗!

中国学生罢课!

(原件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① 原件无标题。此为编者所加。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五卅运动史料 第一卷

作者 =

页数 = 7 5 7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